

目录

[重版說明 2](#_Toc58922258)

[出版說明 3](#_Toc58922259)

[總編輯序 4](#_Toc58922260)

[第一章 導言：舊秩序 5](#_Toc58922261)

[歷史和中國的革命 5](#_Toc58922262)

[舊社會 9](#_Toc58922263)

[行政 18](#_Toc58922264)

[對外關系 23](#_Toc58922265)

[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亞洲腹地 27](#_Toc58922266)

[清帝國在亞洲腹地 27](#_Toc58922267)

[滿洲 28](#_Toc58922268)

[蒙古 33](#_Toc58922269)

[新疆 39](#_Toc58922270)

[準噶爾 40](#_Toc58922271)

[東突厥斯坦 45](#_Toc58922272)

[六城的對外貿易 51](#_Toc58922273)

[瑪赫杜姆家族 53](#_Toc58922274)

[西藏 55](#_Toc58922275)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 70](#_Toc58922276)

[人口的壓力及其后果 70](#_Toc58922277)

[教育、庇護制與社會晉升之路 73](#_Toc58922278)

[嘉慶的改革 74](#_Toc58922279)

[危機的征兆：漕運 77](#_Toc58922280)

[貨幣制度與稅收制度的混亂 80](#_Toc58922281)

[叛亂的根源 82](#_Toc58922282)

[苗民叛亂 83](#_Toc58922283)

[南方的秘密會社 83](#_Toc58922284)

[白蓮教叛亂 85](#_Toc58922285)

[中央的軟弱與學術界的新趨勢 89](#_Toc58922286)

[魏源——經世致用論與今文經學研究的范例 91](#_Toc58922287)

[保衛邊疆是關心的新焦點 94](#_Toc58922288)

[第四章 廣州貿易和鴉片戰爭 104](#_Toc58922289)

[廣州貿易的特點 104](#_Toc58922290)

[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 104](#_Toc58922291)

[英—中壟斷商人 105](#_Toc58922292)

[壟斷制的告終 107](#_Toc58922293)

[鴉片貿易 109](#_Toc58922294)

[律勞卑事件 111](#_Toc58922295)

[關于鴉片問題的爭論 113](#_Toc58922296)

[廣州查封鴉片 117](#_Toc58922297)

[走向戰爭 119](#_Toc58922298)

[戰爭的第一階段 123](#_Toc58922299)

[贖回廣州 126](#_Toc58922300)

[戰爭的最后階段 127](#_Toc58922301)

[中國戰敗：南京條約 130](#_Toc58922302)

[第五章 條約制度的形成 135](#_Toc58922303)

[條約制度的透視 135](#_Toc58922304)

[1842—1844年條約的締結 138](#_Toc58922305)

[條約口岸的開放 141](#_Toc58922306)

[通商口岸的外僑團體 142](#_Toc58922307)

[英國與廣州的對峙 145](#_Toc58922308)

[中國沿海的騷亂 146](#_Toc58922309)

[上海的興起 148](#_Toc58922310)

[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 152](#_Toc58922311)

[1858年的和解 155](#_Toc58922312)

[清帝國政體和貿易擴張的對峙 157](#_Toc58922313)

[1860年的和解 160](#_Toc58922314)

[條約制度的實施 162](#_Toc58922315)

[第六章 太平軍叛亂 167](#_Toc58922316)

[起因和發展 167](#_Toc58922317)

[社會背景 167](#_Toc58922318)

[洪秀全的夢幻和金田起義 168](#_Toc58922319)

[進軍南京 173](#_Toc58922320)

[舊制度的保護者 177](#_Toc58922321)

[對正統反對派的改組 177](#_Toc58922322)

[湘軍的發展 179](#_Toc58922323)

[內訌與衰落 181](#_Toc58922324)

[太平天國統治的特征 181](#_Toc58922325)

[太平軍中央的分裂及其領導的恢復 183](#_Toc58922326)

[曾國藩出任統帥 185](#_Toc58922327)

[外國的介入 186](#_Toc58922328)

[太平天國的失敗 192](#_Toc58922329)

[捻軍的組織特點：一個比較 194](#_Toc58922330)

[太平軍叛亂的透視 197](#_Toc58922331)

[第七章 中俄關系，1800—1862年 200](#_Toc58922332)

[擴大商業的努力歸于失敗 200](#_Toc58922333)

[東北滿洲的喪失 208](#_Toc58922334)

[第八章 清朝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 221](#_Toc58922335)

[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會 221](#_Toc58922336)

[新疆：瑪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226](#_Toc58922337)

[張格爾的圣戰（1820—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年） 226](#_Toc58922338)

[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1835年） 234](#_Toc58922339)

[圣戰的繼續 239](#_Toc58922340)

[西藏的隔絕和印度的壓力 245](#_Toc58922341)

[第九章 清代的中興 259](#_Toc58922342)

[清朝獲勝的原因 259](#_Toc58922343)

[曾國藩：考驗中的儒家經世致用之學 259](#_Toc58922344)

[清帝國的政策：向同治時代過渡 262](#_Toc58922345)

[外國武裝和太平軍的失敗 266](#_Toc58922346)

[長江下游的戰后問題 271](#_Toc58922347)

[收入的窘困和文官政府 271](#_Toc58922348)

[農業稅的恢復 275](#_Toc58922349)

[捻軍戰爭及其影響 280](#_Toc58922350)

[捻軍對華北的沖擊 280](#_Toc58922351)

[戰爭的第二階段 288](#_Toc58922352)

[對中興的透視 292](#_Toc58922353)

[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306](#_Toc58922354)

[理論：對自強運動的早期倡導 306](#_Toc58922355)

[恭親王和文樣 306](#_Toc58922356)

[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 308](#_Toc58922357)

[郭嵩燾與馮桂芬 310](#_Toc58922358)

[政治和財政結構 312](#_Toc58922359)

[宮廷政治和總理衙門 312](#_Toc58922360)

[通商大臣：李鴻章的興起 313](#_Toc58922361)

[赫德和關稅 317](#_Toc58922362)

[早期階段：長遠的規劃 319](#_Toc58922363)

[兵工廠和造船廠 320](#_Toc58922364)

[西學：同文館的局限 323](#_Toc58922365)

[兵工學校和造船學校 326](#_Toc58922366)

[海外培訓 329](#_Toc58922367)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 336](#_Toc58922368)

[傳教事業 336](#_Toc58922369)

[起源和早期歷史 336](#_Toc58922370)

[羅馬天主教 337](#_Toc58922371)

[新教 338](#_Toc58922372)

[條約與傳教活動 339](#_Toc58922373)

[第一個條約的影響 339](#_Toc58922374)

[法國的保護領地和第二個條約 341](#_Toc58922375)

[基督教傳教的機構、規模和經費（1860—1900年） 341](#_Toc58922376)

[傳教方法和結果（1860—1900年） 342](#_Toc58922377)

[天主教徒 342](#_Toc58922378)

[新教徒 343](#_Toc58922379)

[傳教事業和舊制度 344](#_Toc58922380)

[過去的遺產：把基督教當作異端 345](#_Toc58922381)

[傳教士對傳統社會制度的威脅 346](#_Toc58922382)

[傳教士和紳士 346](#_Toc58922383)

[傳教士和老百姓 348](#_Toc58922384)

[舊制度的反應：反基督教的暴力行動 349](#_Toc58922385)

[傳教士和中國政權的削弱 350](#_Toc58922386)

[真正的排外主義和政治上的排外主義 351](#_Toc58922387)

[傳教事業和新制度 352](#_Toc58922388)

[傳教工作的專業化 352](#_Toc58922389)

[醫學 352](#_Toc58922390)

[教育 353](#_Toc58922391)

[傳教士促進西學 354](#_Toc58922392)

[科學和數學 354](#_Toc58922393)

[歷史和國際法 355](#_Toc58922394)

[中國的改革思想和活動：傳教士的影響 356](#_Toc58922395)

[婦女的解放 356](#_Toc58922396)

[沿海地區的“基督教”改革派 357](#_Toc58922397)

[19世紀90年代的新改革派 358](#_Toc58922398)

[參考文獻介紹 364](#_Toc58922399)

[第一章 導言：舊秩序 364](#_Toc58922400)

[第二章和第八章 清朝的亞洲腹地 364](#_Toc58922401)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 367](#_Toc58922402)

[第四章 廣州貿易和鴉片戰爭 368](#_Toc58922403)

[第五章 條約制度的形成 370](#_Toc58922404)

[第六章 太平軍叛亂 371](#_Toc58922405)

[第七章 中俄關系，1800—1862年 372](#_Toc58922406)

[第八章 清朝的亞洲腹地（已見上文，茲不贅） 373](#_Toc58922407)

[第九章 清代的中興 373](#_Toc58922408)

[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374](#_Toc58922409)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 376](#_Toc58922410)

[參考書目 379](#_Toc58922411)

[（甲）書刊名稱縮寫法 379](#_Toc58922412)

[（乙）西文書目 380](#_Toc58922413)

[（丙）中文和日文書目 419](#_Toc58922414)

[中國和日本出版社 448](#_Toc58922415)

# 重版說明

《劍橋中國晚清史》于1985年2月出版后，受到學術界重視，報刊上發表過多篇評論文章，引起了對一些問題的探討。出版后不久，書即售罄。近一兩年仍然有讀者詢問或函購此書，為滿足需要，決定重排出版。此次重排改正了編校方面的一些明顯錯誤。

本書上下兩卷為《劍橋中國史》第10卷和第11卷的中譯本。本社已出和正在印制的《劍橋中國史》其他卷次的中譯本有：

第1卷《劍橋中國秦漢史》

第3卷《劍橋中國隋唐史》

第7卷《劍橋中國明代史》上、下

第12、13卷《劍橋中華民國史》上、下

第14卷《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年》

第15卷《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年》

其他卷次在國外出書后，我們也將盡快翻譯出版。

# 出版說明

本書原為《劍橋中國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時代，止于辛亥革命。這兩卷能夠自成體系，可以單獨成書，我們特先譯出，以饗我國讀者。為了兼顧《劍橋中國史》原書名和它所論述的晚清時代的實際內容，此書定名為《劍橋中國晚清史》。

劍橋歷史叢書在國際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對《劍橋中國史》已出的各卷，國外紛紛發表過書評，予以肯定。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書前為止的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水平和動向。我們希望這兩卷中文版的出版，對促進中外學術交流能有所助益。

本書有不少地方可供我們參考，特別是某些國內不經見的材料可為我們所用。但是，它也有某些提法是我們所不能茍同的。例如，正文和插圖中有所謂“中國本土（本部）”、“滿洲”、“清朝治理區”等等說法，我們均照字面直譯，未加改動。不言而喻，這決不表明中文版編譯者同意這些提法。再例如，地圖中疆界的畫法、地點的位置和名稱，原書也存在著錯誤和問題（如地圖一、地圖二均缺南海諸島；地圖二的川藏界畫在大渡河一帶；邊境上兩國共有之河流未能盡按共有之慣例繪制，等等），內容與插圖前后也不盡一致，這些地方我們也未加改動，原樣照譯或復印。又，本書各章撰者立言也不盡一致，請讀者自行鑒別，不一一贅言。

這幾年我們國內出版過若干新資料，本書作者限于條件未能及時加以利用。對此，我們對他們就更不能有所苛求了。

本書引用的中文材料，我們均盡力查找過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僅系片言只語，遍查不著；某些引文引自在臺灣省或外國出版的書刊，我們無書查對；個別書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這些情況下，我們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譯辦法，幸讀者鑒諒和指教。

本書各章譯者均在每章之后署名。全書則由張書生和楊品泉兩同志統一校看。我們因識見所囿和水平有限，譯文舛錯在所難免，懇切希望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編譯室

1983年4月

# 總編輯序

在英語世界中，劍橋歷史叢書自20世紀起已為多卷本的歷史著作樹立了樣板，其特點是各章均由某個專題的專家執筆，而由各卷學術地位較高的編輯中的主導編輯總其成。由阿克頓爵士規劃的《劍橋近代史》共16卷，于1902—1912年期間問世。以后又陸續出版了《劍橋古代史》《劍橋中世紀史》《劍橋英國文學史》以及關于印度、波蘭和英帝國的劍橋史。原來的《近代史》現在已被12卷的《新劍橋近代史》代替，而《劍橋歐洲經濟史》的編寫也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編寫中的劍橋歷史叢書包括伊斯蘭教史、阿拉伯文學史、論述作為西方文明中心文獻的《圣經》及其對西方文明的影響的圣經史，此外還有伊朗史和中國史。

就中國史而言，西方的歷史學家面臨著一個特殊問題。中國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的文明史更為廣泛和復雜，只是比整個歐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圍稍小而已。中國的歷史記載浩如煙海，既詳盡又廣泛，中國歷史方面的學術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高度發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幾十年為止，西方的中國研究雖然有歐洲中國學家進行了重要的開創性勞動，但取得的進展幾乎沒有超過翻譯少數古代典籍和編寫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綱的程度。

近來，西方學者已經更加充分地在利用中國和日本的具有悠久傳統的歷史學術成果了，這就大大地增進了我們對過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細的認識，以及對傳統歷史學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這一代西方的中國史學者在繼續依靠歐洲、日本和中國正在迅速發展的中國學研究的扎實基礎的同時，還能利用近代西方歷史學術的新觀點、新技術以及社會科學近期的發展成果。而在對許多舊觀念提出疑問的情況下，近期的歷史事件又使新問題突出出來。在這些眾多方面的影響下，西方在中國學研究方面進行的革命性變革的勢頭正在不斷加強。

當1966年開始編寫《劍橋中國史》時，目的就是為西方的歷史學讀者提供一部有內容的基礎性的中國史著作，即按當時的知識狀況寫一部六卷本的著作。從那時起，公認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現、新方法的應用和學術向新領域的擴大，已經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史的研究。這一發展還反映在：《劍橋中國史》現在已經計劃出14卷，這還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時期，并且還必須舍棄諸如藝術史和文學史等題目、經濟學和工藝學的許多方面的內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寶貴材料。

近十年來我們對中國過去的了解所取得的驚人進展將會繼續和加快。進行這一巨大而復雜的課題的西方歷史學家所作的努力證明是得當的，因為他們所在各國的人民需要對中國有一個更廣更深的了解。中國的歷史屬于全世界，這不僅因它有此權利和必要，還因它是激發人們興趣的一門學科。

費正清 崔瑞德

（楊品泉 譯）

# 第一章 導言：舊秩序

## 歷史和中國的革命

近代中國的歷史，即人們現在認為在那里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充滿了爭論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已被人們所了解，但對于它們的意義卻存在著爭議。同時，許多較次要的事件仍然未被人知或者被忽視。

引起爭論的第一個原因是普遍存在對歷史的無知狀態，因為在這個尚不發達的領域中，還缺乏一批被人們普遍接受的研究和著述。我說“歷史的無知狀態”，是因為歷史學的任務就是了解所有有關方面的情況、動機和作用，但如果只涉及沖突一方的片面知識，則會使我們對這場沖突中的另一方仍然一無所知，因而就不大可能理解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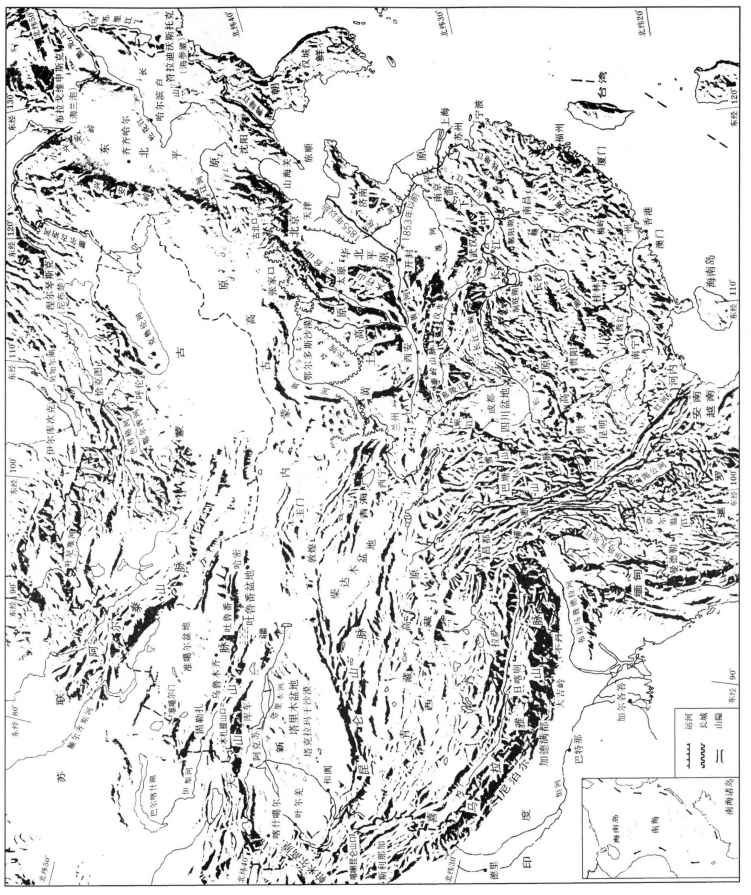
例如，關于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英國方面的文件在當時就已大量公布，而中國方面的文件一直到90年以后，即1932年才發表。而且，雙方的文件主要提供的都是官方的觀點；在戰爭期間普通中國人民的經歷則沒有詳細的記載，也沒有被很好地進行研究。甚至這一表面上已很清楚的事件，仍然沒有為人們所充分了解。例如，當地的中國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了英、清兩國戰爭的消極旁觀者？他們進行愛國主義的抵抗的程度又有多深？各種觀點和事例是相互歧義的。

引起爭論的第二個原因是那種把歷史事件主要參與者分割開來的巨大的精神文化鴻溝——這不但是指19世紀外國侵略者和進行抵抗的中國統治階級之間在語言、思想以及價值觀念上的差異，而且也指在20世紀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一旦成為革命者時，在中國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存在著的類似的差異。簡言之，中國的近代史就是兩出巨型戲劇——第一出是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西方同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中國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第二出是從第一出派生出來的，它揭示了中國在一場最巨大的革命中所發生的基本變化。

這些巨大的沖突和變革的運動，即發生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以及在新舊中國之間的這些運動，已經在歷史記載和歷史學家中引起了各種不同的觀點。對西方歷史學家來說，最突出的就是維多利亞時代對世界的看法；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擴張主義者就是按照這種看法，在19世紀中期建立了不平等條約制度的。他們信仰民族國家、法治、個人的權益、基督教和科學技術，以及使用戰爭來為進步服務。

舊中國統治階級對于世界的看法也是一清二楚的。它信仰經典的儒家教義和天子在整個世界中至高無上的權力：天子高居于一個和諧的、存在著等級和名分的社會秩序之巔，以他的富有教導意義的道德行為的榜樣來維系自己的統治。在這個舊秩序里面，經典的教義只能容忍限于傳統內部的變化，擴大的家庭制度支配著個人，恪守職責的信條高于享受權利的信條，文官控制著軍事，并且使商人為其所用，道德行為的準則凌駕于人的情欲、物質利益和法律條文之上。誠然，兩種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

當比較古老和變化較緩慢的文明在較現代和更有生氣的文明面前步步退卻時，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員中一代先行者尋求改革的目標，并逐漸形成對于世界以及中國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的新的觀點。產生于季世的這種新觀點，不可避免地缺乏它以前的傳統觀點的一致性。隨著中央權力的衰落，思想領域的混亂增長了，只是到了20世紀中葉，通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于中國的毛澤東思想，一種新的歷史正統觀念才得以建立。



地圖1 中國地形圖

隨著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繼續發展，毛澤東主義的歷史觀也將繼續發展；西方的、日本的和其他外國的歷史觀也同樣如此。可以預期，它們之間在一定程度上會吻合的。不過關于近代中國發生了什么事情，這些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和為什么會發生，當代的各種思想對這些問題仍會繼續進行激烈的爭論。19世紀對中國的和外國的、儒家的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各種歷史觀的對立，現在已被各種水火不相容的觀點的論戰所代替。現在的這些互不相容的觀點都涉及近代史的性質這一領域，這一事實只會加劇它們之間的爭論。但是，在了解今天的歷史淵源的努力中，各種思想的繼續論戰歸根到底只會加強促使各國人民相互了解的共同紐帶。

雖然歷史學界關注的中心問題一代與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國而言，某些尚未解決而又需要闡明的問題，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時期內先引起注意。一個需要闡明的重大問題就是外來影響的程度和性質。19世紀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顯著增加，并且變得越來越有影響，越來越向社會各方面滲透，最后終于促使中國人的生活徹底改觀。然而外國人的沖擊和中國人的反應的進程是逐漸開始的，幾乎不能覺察出來。對這一過程的覺察，是經過了其強度和復雜性不斷增長的一系列階段才顯示出來的。

在最初階段，中國和外國的觀察家都認識到：古老的農業經濟一官僚政治的中華帝國，遠非進行擴張的、推行國際貿易和炮艦政策的英帝國和其他帝國的對手。外國對中國侵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在1840—1842年鴉片戰爭以后不到15年，就有1857—1860年的英法聯軍之役，又過了10年左右，發生1871年俄國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奪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10年，爆發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9年以后，日本在1894—1895年大敗中國，緊接著是1898年爭奪租借地和1900年的義和團之役。伴隨著這些戲劇性的災難而來的，是傳統中國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國為中心看待世界的觀念——的破滅；這一破滅與那些災難相比，雖然幾乎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卻有著更加深遠的影響。

因此，回顧起來，中國在19世紀的經歷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劇，成了一次確是巨大的、史無前例的崩潰和衰落過程。這場悲劇是如此緩慢、無情而又徹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舊秩序為自衛而戰，它緩慢地退卻，但始終處于劣勢；災難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厲害，直到中國對外國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權、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正統觀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組成的統治上層等事物，一個接一個被破壞或被摧毀為止。

還有第二種認識在20世紀初的中國革命者中很普遍，即他們發覺自己處在一個不同的世界，猶如民族主義者發覺自己置身于一個擴大了的民族主義的國際社會一樣。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清王朝舊政權在19世紀后期所承受的外國特權的負擔日益沉重。不平等條約體制的不斷擴大就表明了這一點：通商口岸從1842年的5個增加到1911年的大約50個；締約列強各國的僑民及其財產、貿易和工業都逐步享有領事裁判權；外國船只在中國水域航行的范圍，從沿海的炮艦擴大到行駛于主要河流的商輪上；不但在中國海關，甚至在某些內地稅卡、郵局和鹽務官署都雇用了外國官員；傳教士的活動滲入到每一個省份和文教衛生部門。還有許多其他的特征，如1900年以后外國在北京駐軍，1911年以后海關收入先撥作償付外債和賠款之用。這一切都表明了外國人對中國人民生活的特殊影響。對近代的民族主義者來說，還有什么能比這一切更能激起愛國的義憤呢？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這種外國的侵略就日益被稱為“帝國主義”，并且帝國主義的侵略被認為是必須加以消除的國恥。

伴隨著這個觀點而來的還有另一種認識，即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所以得逞，是借助于中國人的弱點，這弱點不但在于軍事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也即中國人缺乏愛國主義的獻身精神：這表現在他們為外國人工作，并且從罪惡的鴉片貿易、販賣苦力以及在沿海港口建立工業來剝削勞工的罪惡活動中同外國人一起牟利。道德的墮落也同樣明顯地表現在軍閥的割據、地主的自私自利、家庭第一的裙帶關系等方面。中國的這一切弱點大多是根源于腐朽的統治階級的各個階層——即滿洲人的異族朝廷、古代經典訓練出來的陳腐官吏、享有壟斷較高文化知識特權的文人學者和剝削貧苦佃農的地主。所有這些制度和積習的總和可以用“封建主義”一詞來概括。

這樣，在20世紀，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這對孿生兄弟就被認為是19世紀中國災難的根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這些術語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它們的闡述，就被用來描述中國的近代史。在一個農民依然占絕大多數并對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日本的侵略記憶猶新的廣袤國度里，國內統治階級和外國的侵略仍突出地成為過去遺留下來、而今天仍然必須與之搏斗的兩大罪魁禍首。

當中國運用帝國主義的概念時，它已被擴大了。回顧起來，從20世紀20年代以后，無論是在國民黨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中，帝國主義的作用有增無已。它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帝國主義從鴉片戰爭時起就活動開了，這比19世紀90年代列寧主義的金融—資本型的帝國主義的興起要早得多。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的概念，不但遠溯到包括維多利亞早期商業擴張時代的戰爭和炮艦外交，它還把帝國主義概念擴大到幾乎包括19世紀外國與中國的一切形式的接觸，把基督教的傳教活動當作文化帝國主義就是一例。由于西方國家經常的侵略擴張活動在歷史記載中是一目了然的，歷史學家一般認為有理由作出這一廣泛的結論，即中國人民遭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和欺凌。作為一般性的結論，這是幾乎不容置辯的。歐洲的侵略擴張和它后來的變種，是近代世界歷史的一個主要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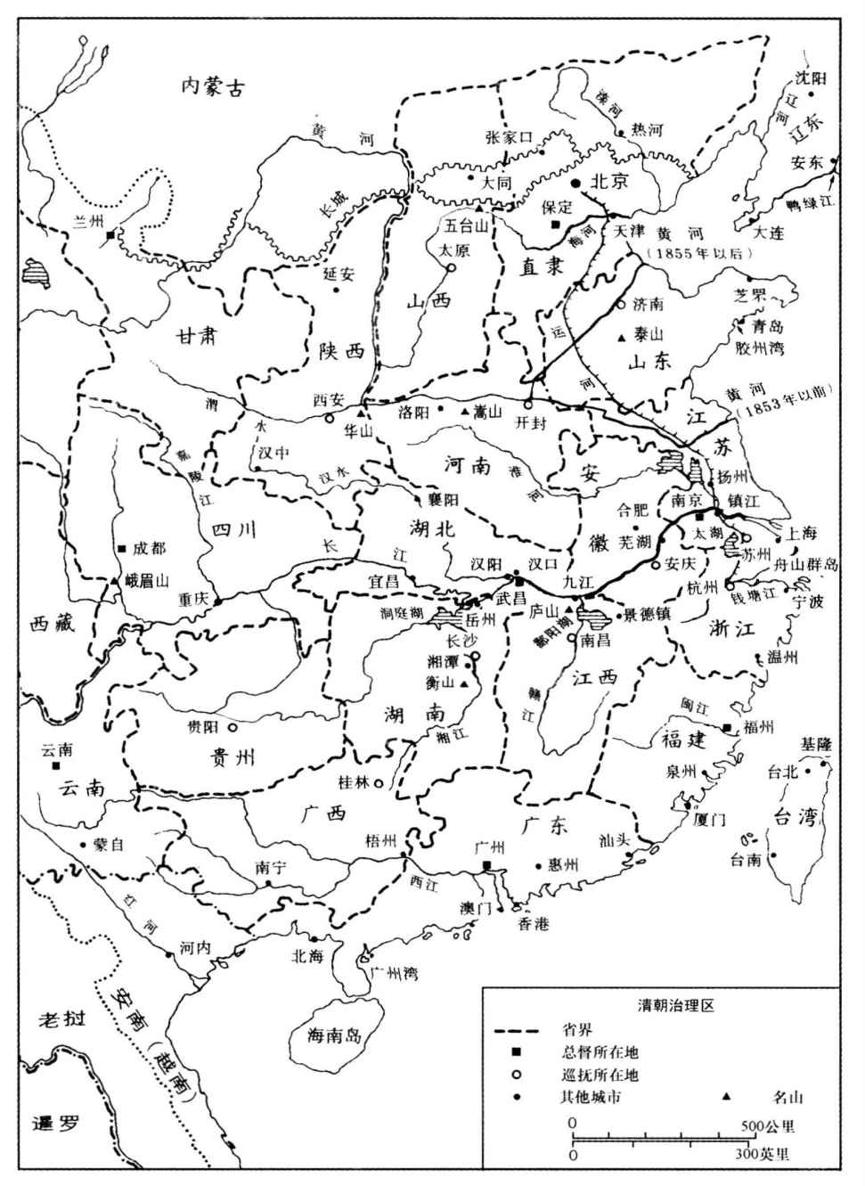
然而，我們這一卷既要重視現在，又要重視過去，因此，本卷的研究將要再現生活在歷史事件發生時的人們的觀點、動機以及他們在歷史上對這些事件的理解。由于中國的歷史觀在革命過程中發生了變化，因此必須了解中國人當時的生活狀況，同時還必須了解他們在舊秩序下的自我形象。一旦著手進行這樣的研究，帝國主義的形象就會被勾畫出來。帝國主義從一種自外部傾覆中國的單方面力量而變成了一種相互作用的產物，而且當今天對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這種相互作用進一步進行研究時，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就將分解為種種因素和情況。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中國社會是個龐然大物，它各地的情況又千差萬別。由于它的幅員遼闊，它不易受到外來影響，并且對于與外國接觸的反應也是形形色色的和分散的，而不是一致的和集中的。總的說來，中國自給自足的程度是非常高的，這首先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它在國民經濟中仍是一個比較次要的部分。其次，清帝國由于在18世紀50年代征服了伊犁，以及在恰克圖和廣州分別成功地對付了俄國人和英國人，就建立起一道貌似強大的軍事防線。最后，在清朝統治下，具有絕對權威的儒家思想幾乎不能接受任何外國的政治觀念。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利于形成高度的自給自足。但是還有另一個歷史傳統使得中國對外國的侵略反應遲鈍，這就是蠻夷入侵的傳統，以及這些入侵的蠻夷被吸收或同化于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況。由于這個原因，擁有絕對權威的儒家思想變成了一種超民族主義的體系，它是不會輕易賞識外國的民族主義者的感情的。

這樣，一幅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圖景就浮現了出來，它在19世紀早期是自給自足地專注于它自己的國內生活，而不能對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應。后來中國人與侵略者打交道時自有定見，就沒有遷就外國的制度。例如，清朝并未把對外貿易和外國的投資當成對國家有重要作用的事業而首先予以關注。清政權主要關切的是維持它所統治的和賴以取得主要生計的農村社會秩序。對外關系似是不關痛癢的事情。最初，西方人被認為事實上能納入中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秩序之中而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只許他們在邊遠地區活動，正像其他外國人過去曾經做過的那樣。

幅員廣大、自給自足、統治階級的麻木不仁和漠不關心，所有這一切使清帝國在與西方國家接觸時毫無應變的準備。更確切地說，當這種接觸在近代成為事實時，導致中國衰落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中國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經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國的衰落，就必須懂得中國早先取得的成就，因為這種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國的領袖人物對于災難的降臨毫無準備。正如改革家梁啟超后來在1896年所說：“今有巨廈，更歷千歲……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紀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也。”[[1]](#_1_Liang_Qi_Chao____Yin_Bing_Shi)

## 舊社會



地圖2 19世紀的中國本土

有關這個傳統社會的另一批需要闡明而尚未解決的問題，是傳統社會的社會結構、其政府的行政機構和思想體系，以及它的經濟發展。一種廣泛的假定是：這個傳統社會建立了如此有效而均衡的思想和實踐的結構，以致難以對西方的接觸產生富有革新精神的反應。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成熟”可以從它的穩定性和它維持幾乎類似生理學的體內平衡狀態的能力中得到證明。換句話說，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像滾雪球那樣成了足以阻止改革的巨大力量。結果便是一種強大的惰性，或者叫做堅持成法的頑固性，這是一種只許在傳統之內進行改變的傾向。這一關于中國有惰性和對外麻木不仁的看法，還得到所謂文化自主觀念的支持：這種觀念認為，中國的方式方法是獨特的，它們之間互相呼應，因而對外部影響具有排他性。

諸如此類的浮泛觀念，當然只是代替了深入的思考。它們無疑顯示了我們今天知識淺薄的程度。可是，如果要讓非歷史學家懂得歷史，就必須運用一般的概念。包括1800年前后中國的一般情況和典章制度在內的一幅中國國家和社會的真實圖景，是形成一般概念的必要前提。當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了3億，幾乎為包括俄國在內的歐洲的兩倍，同時可以有把握地說，它的國內市場和國內貿易也遠遠超過了歐洲。

19世紀初期，中國社會體制的惰性明顯地表現在各個階層中，即表現在鄉、鎮上的老百姓中，表現在左右著地方事務的地方上層或“紳士”的名門大戶中，表現在從地方官員直到北京宮廷的帝國政府的各級官吏中，以及表現在高居于這個人類活動舞臺之巔的君主政體中。這個中國人的世界（“天下”）被認為是非常統一的、具有共性的和能長期延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確實如此。

帝國的統一是中國文明的第一個偉大的成就，同時它也是一件使人關注的大事，因為統一意味著和平。可是帝國的巨大幅員和各地的差異卻時常助長分裂。18個省份被自然條件分割成若干彼此隔離，但卻有著明顯特征的區域，各地區又都是相對地自給自足。例如山西省的中部太原平原和汾河流域，便是兩面傍山，兩面以黃河為界。灌溉條件良好的四川大盆地四面為群山所環繞，它與中國其他地區的交通主要是通過長江的峽谷。位于西南的云南省則是一個與國家其他地區難以往來的高原。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湖南、湖北兩省這幾個大糧倉，都各自為地方政權提供了基礎。外國人在20世紀所稱的南滿，即19世紀中國人所稱的遼東，則是又一個地方權力的根據地。滿人建立的清朝在1644年奪取長城以南以前，就是在那里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的。

此外，中國從南到北延伸得如此遼遠，氣候的差異使得南北兩地的生活方式迥然有別。在南部和東南部，夏季大量的季節風雨有利于雙季稻的生長。反之，西北邊塞地區雨量稀少而又變化無常，使當地人民經常面臨饑餓的威脅。生活在干旱地區的北方農民，可以住在夯實的土筑墻或者用簡陋的土坯砌成的茅屋里，而住在多雨地區的南方農民，則必須用在窯里焙燒過的磚和瓦蓋房。他們為了防雨和擋太陽，穿的是草鞋木屐，而不是布鞋；戴的是寬大的斗笠，而不是北方那種帶有護耳帽邊的防寒皮帽。南方的運輸大多靠水道，或者另外在不能行車的石頭鋪的路上進行。扁擔、手推車和小毛驢比比皆是。但是在北方典型的運輸工具卻是在土路上運行的兩輪車，它往往會陷在被風刮起來的幾英尺厚的黃土之中。尤為明顯的是南北景物迥異：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周圍筑墻以防御騎兵突襲的村莊星羅棋布；在典型的華南山鄉，騎兵就無用武之地，農村可以以更小的規模，更廣泛地分布于茂密蔥郁的林陰之中。由于種植水稻比種旱地作物產量更高，所以中國南方的口糧標準較高，同時在這里的務農人口中有著更加發達的地主所有制和租佃關系。[[2]](#_2_Zai_1949Nian_Yi_Qian_Yi_Ge_Sh)

以精耕細作的農業、嚴密組織的家庭生活和官僚化的行政機構為其特征，中國這一逐漸擴展的文明就賦予整個國家從南到北、自西徂東以一種內在的共性。也許在居統治地位的上層分子的意識中，這種共性比一個社會學家在實際中所發現的共性還要大。然而，它一般說來只是一種假設。有如政治上的統一一樣，文化上的共性也是中國偉大的社會神話之一，因為無非想用它證明儒家生活方式的普遍存在。因此，各地區的差異和地方風俗習慣的各種形式還沒有得到足夠的研究，因為把中國廣大的國土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歷來成為風氣，今天依然如此。

這種政治上的統一和文化上的共同性的觀念，是中國生活方式從史前新石器時代就不間斷地延續下來的那種異乎尋常的連續性造成的。由各個家族在定居的村落里從事的鋤耕農業，于公元前5000年在靠近黃河河套的渭河流域（如西安郊外的半坡村遺址）就出現了。雖然軍人統治者們不時入侵，但中國的鄉村生活從那時起，就以一種社會的和技術的突變似乎都不能打斷的連續性穩步地向前發展。維護村社的和平和秩序，一直是中國的統治階級（與軍人們同樣古老）所特別關切的事情。它經過歷代王朝逐步建立了一套復雜的官僚政治機構。直到1800年以后為止，這個農業經濟—官僚政治的中華帝國，就是這樣保持著一個比歐洲的商業一軍事社會更加古老、也與它大相徑庭的社會體制。包括運用暴力在內的個人才能和進取心，在中國農業社會里沒有被培養出來，但在歐洲人的航海技術、好戰精神、探險和海外移民活動中，卻已蔚然成風了。

我們可以想象，到1800年時，至少占人口4/5的普通農民在對親屬的義務、盡職責、講禮貌和社交等方面都受到良好教育而成為有教養的人，但他們又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因此，他們在生活中不太信奉儒家的性理之學，反而信守民間傳說、迷信和道教佛教儀式。作為農民，他們大多數與大自然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他們習慣于大自然的美景，但也為眼病、皮膚病以及腸道寄生蟲病這些流行性疾病所苦。作為老百姓，他們充分意識到統治的上層人物及其特權，但卻很少親眼看到這些人。他們主要地被吸引在自己的以農村和集市為中心的村社中了。

普通村子大約有百戶人家，不能構成集市，也不能自給自足。村社的真正中心在集鎮上，鎮當然不超過兩三英里遠，步行可達，在趕集時使家庭成員可以在當天往返。集鎮的集日一般以十天為一個周期，相鄰的集鎮則相互配合，把集日錯開：比如說，有的集鎮在三、六、八日趕集，有的小鎮則在二、四、七、九日或三、五、八、十日趕集。這樣，以更大的集市中心為經營對象的貨郎擔和行商，就可以輪流在這個區域趕集做買賣。最低一級的或標準的集鎮周圍一般有12—18個村子，總計約有1500戶，或7000人。一個農戶中身體健康的男子，不多幾年就可以趕集千把次，這樣在集鎮上的茶館里，在當地的寺廟里，或者在不定期舉行的大型集市上，以及在節日的燈會上，他就有機會碰得到大部分屬于這個集市社會的人們。

這個社會不但有以剩余農副產品交換紙張、鐵器、陶器和其他商品的經濟基礎，而且也有它的社交基礎。因為許多村子基本上是同族聚居，族外婚的規定使得許多家庭往往必須通過集鎮上的媒人到外村去找新娘。如果有秘密會社會堂的話，它們一般集中在集鎮，農民在那里也會碰到統治階級在當地的任何成員或官府的代表。[[3]](#_3_Shi_Jian_Ya____Zhong_Guo_Nong)

在這個農民社會里，個人依靠他自己的親族維持生計，得到在現代社會中要通過保險才能取得的安全保護，還可以得到教育、娛樂和建立主要的社會關系。從孩提時代起，他就被教以要嚴守家庭關系準則，尤其要講孝道。三綱的經典教義是有權威的，它要求子女孝順父母、妻子順從丈夫、臣民忠于君主。但是在個體家庭內部，這種身份的等級關系只是親屬關系體系的組成部分，親屬體系向外延伸，成為把大多數家庭都聯系在一起的具有共同血緣關系的集體或宗族。

宗族（又稱為氏族）是一種超越階級界限的擁有自治權的組織，它通常包含兩極：一極是貧困無告的人，另一極是那些已經取得了上層身份的人。一個宗族往往保有自己的宗祠，并把祭祀祖先作為一種宗教儀式來進行。它通常負責安排婚姻，也可以為教育天資聰明的兒童開辦學校。它力圖在它的成員中維持法律和秩序，不讓他們的糾紛發展成為牽動官府的訴訟。出于同樣的原因，它擁有的權威還可以承擔保證氏族成員納稅的責任。在發生騷亂時，它甚至可以組織地方民團進行防御。宗族的地位為清朝的法律所承認，法律總是維護族長的威信，并且按照親屬關系身份進行懲處。國家就是這樣給家庭結構以法律上的支持，這是它維護社會秩序的一個明顯的手段。

我們今天是不易理解個人對家庭這種服從關系的全部含義的。父母的權威和子女的孝順是絕對的，兒子違抗父母之命就要受到父親的懲處，甚至把兒子殺死，只要這個行動不是“慘無人道”的，那么在法律上也可以免罪。另外，父母還可以要求當局懲處，甚至流放一個不孝之子。“打罵父母或使父母的身體受到任何傷害者都要處以死刑。”[[4]](#_4_Ju_Tong_Zu____Chuan_Tong_Zhon)

在宗族里對長者的敬重，訓練了普通農民對他的上層階級的上司的順從。集市社會的最上層是地方上的上層分子，也稱“紳士”，這個名詞相當于英文中的“gentry”，雖然它的意義是不明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現代式的研究還幾乎只是開始時，麥克斯·韋伯對中國社會所作的有影響的分析就強調了士子文人是中國國家和社會體制中的舉足輕重的官員。此后的研究描繪了這些及第舉子各自在這個功名獲得者構成的官僚等級制度中，所占不同品級的情況。同時，另一些研究強調了地主在這個耕地缺乏的農業社會中的關鍵作用，到1800年時，這個社會已經感到了人口迅速增長的壓力。這樣就可以通過兩條途徑來了解支配農村的地方名流的作用。一條是社會政治的途徑，另一條是經濟的途徑。雖然這兩種方法有時在闡述上引起了一些爭論，但如果我們逐個地注意它們，也許有可能使它們一致起來的。

在19世紀初期，大多數功名獲得者是通過了府一級考試的生員，另外一些則是通過捐納取得同等身份的監生。這兩種人估計約有110萬人。他們之間的比例一般為2：1，即是說，擁有最低一級功名的人，有1/3是按規定的價格向政府捐納而取得這一身份的。還有一些人是通過較高級官員的薦舉而取得功名身份的，但他們為數甚少。因此，對有才能的人來說，按照傳統三年一次的考試是他們取得功名的主要機會。

當然，取得功名身份本身還不等于得到官職。陸續通過幾次更高級的考試，得到薦舉，以及最后獲得特旨任命，這些都是一個人開始仕宦生涯的必由之路。某人如果在24歲成為生員，一般可望到31歲時在鄉試中考中舉人，在35歲左右通過會試成為進士，如果他能達到這個地步的話。因此，功名獲得者形成了一個尖頂金字塔。在外地，帝國只有2000個左右基層行政官員的職位，再加上1500個教職；按官制，全國的官僚大約只有2萬名文官和7000名武官。官吏階層在職者為數甚少，而與此相應的另一個情況是，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只有少數合格的功名獲得者：舉人共有1.8萬名左右，進士2500名左右，受到尊敬的北京翰林院的翰林650名左右。的確，現任官員是一個精選者集團。這一情況就產生了一種看法：人數逾100萬之眾的取得最低一級功名的人，就被認為是“普通的士子”，他們是一個過渡的階層，例如，他們已經豁免了勞役，但實際上并未廁身于官吏的行列之中。這些“小紳士”可以身著受人敬重的長袍，從事訓導、教學、書吏或他種與這一裝束相稱的活動。取得了較高級功名的人，即“大紳士”，人數有限，他們組成了隨時可以對官場進行補充的后備隊伍，并且作為一個起作用的集團，向官場內部滲透。

在地方上，當地的小紳士，以及有時也可能出現的大紳士，他們左右著眾多的事情。他們共同主管各種公共事務，如修橋梁，設津渡，建圍墻和寺廟，籌措學校和書院的費用，發起和印刷地方志，參與地方的祭祀和祭孔活動。在當地遭災時，他們也會組織對流民、無家可歸的人、老人和貧民的救濟；當發生騷亂時，他們可以在皇帝的認可下資助、招募甚至統率民團。在所有這些活動中，地方上層人物運用他們在民眾中的聲望和與政界的關系，還運用他們對儒家行動準則和地方行政的知識，既提供錢財，又發揮個人的領導作用。他們構成了地方官吏和官府統治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官府是不能有所作為的。反過來，地方上層，尤其是那些大紳士，便一起利用他們與官府的聯系來保護他們的經濟地位，因為國家制度并沒有提供有效的法律豁免權來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免遭官府的勒索甚至沒收。他們對官府施加影響和免除勞役或肉刑的特權被審慎地維護著。紳士們有一派紳士風度來表明他們的身份——長袍，長指甲，能詩善賦，有欣賞藝術的閑情逸致，彬彬有禮。總之，過著一種與老百姓相脫離的生活。在社會安定時，這些地方上層人士，即統治階級，有著強烈的自覺性和內聚力。他們的理想就是組成一個內有若干庭院的大家庭，幾世同堂，婢仆成群，共同聚居在一起。[[5]](#_5_Jian_He_Bing_Di___Zhong_Hua_D)

要把紳士作為社會—政治的官員和作為地主這二者的作用協調起來，方法之一就是要承認個人和家庭之間的區別。簡言之，各級功名按其性質來講只能為個人所持有，而財產卻是由家庭占有和傳下來的。上面述及的士子文人在非經濟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由個人履行的，而在一個地主所有制與家庭觀念緊密連接在一起的社會里（尤其在華南），個人同時又是家庭的成員。由于財產主要不是由法律，而是靠勾通官府來保護的，士子文人—紳士就能夠利用他們的政治社會身份來維護地主—紳士的經濟地位。這兩種起作用的成分，即士子文人—紳士和地主—紳士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加強，時常交織在一起，有時則是合二而一的。可以認為，19世紀初期的地方上層人物，首先是由一些擁有財產——主要是擁有土地的家庭組成的；其次，大部分科舉登第的人都出身于這類家庭。雖然，有些功名獲得者是靠個人才干而獲得成功，有時，還能在社會上飛黃騰達，但是，如果不能獲得家庭的支持以便在早期有時間學習和得到一個家學淵源的環境，那么能起步的人無疑只是極少數。

地主—紳士之家似乎有一種使自己世代交替的特殊本領。與農民比起來，他們的兒子結婚要早。他們可以納妾，他們的嬰兒死亡率也較低，因此，縉紳之家，由于多子多孫，其后代產生有才之士的機會也較多。一個世家還可以同時在鄉下和大城鎮扎下根基，以分散它的人力和物力資源。當農村發生災荒和騷動時，這個家庭的城鎮部分可以安然無恙。而當城市里改朝換代或出現官員造成的禍害時，他們在鄉下的老家卻風平浪靜。當發生內戰或外族入侵時，雙方陣營里都可以找到同一個家庭的成員，而各為其主。舊中國的這些世家大族都渴望子孫滿堂，十分重視維系家庭—宗族的世系。這就需要在生育和婚喪中競尚奢華，培養與官府的交情，在教育上下本錢，使得其兒子能通過科舉考試而飛黃騰達。

因此，功名獲得者的個人社會—政治作用和地主—紳士家庭的經濟作用是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今天沒有必要在地方上層的這兩個分析基點作區分或選擇了。雖然如此，由于歷史的情況，便產生了相互對立的解釋。首先，由于1905年廢除了陳舊的科舉，不可能再產生新的功名獲得者；因此，地主所有制，或者至少是“外居地主經營制”，便明顯地增加了，致使現代的土地革命便把土豪劣紳當做首要目標，他們仍然是地主，但是剝削性更大，而不再是地方上的社會領袖。從說明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長江下游地區的“租棧”的活動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這種大規模的“外居地主制”經營的實際情況。這些租棧代表它們借以建立的宗族或氏族，同時也接受別的大家族的委托而當它們的代表。它們收租、納稅、收各種費用，雇傭家住農村的收租人，也在主要的事務所雇傭文書和工作人員。它們在和佃戶們打交道時也能得到衙役的協助。一個租棧經管著成千畝土地，佃戶們按照租約耕種大量分散的小塊土地；租約是沒有限期的，可以父子相承。這些租約上的租佃權可以買賣。它們可以由幾個兒子繼承并且在他們之間進行再分配，或者相反地，由租佃人經過積累而再把租地集中起來。盡管可以繼承，但是這些租約并沒有建立起一個“法定的農奴制”，相反卻允許有一定程度的機動性。一般說來，長江下游地區一個佃農交納的平均地租占收獲量的50%以上，而地主交納的土地稅則僅為地租總額的13%左右。收租人負責下達“租棧”發出的收租通知，充任收租人者可能是當地的村長、僧侶甚至寡婦。為了強行收租，當地的衙門可能發出拘捕令，并出動衙役逮捕那些欠租者，這些費用則由地主租棧支付。因此，在19世紀末期，至少在中國的這個生產最發達的地區，地方官府和租棧所代表的地主家族之間已經明顯地存在一種密切的關系。租棧的管理人員開列不良佃戶的名單，地方官便出動差役捕人，因為收租是政府和地主的共同利益，只有地主收到了地租，他們才能從中交出土地稅。[[6]](#_6_Yi_Gu_De_Cun_Song_Ku_Ci_Jiao)

有關更早時期和其他地區的這類活動，文獻記載就不很詳細了，到1800年時，中國農村的大戶可能已經在對村社進行謹慎的領導，和對佃農進行以自己家庭為中心的自私的剝削之間維持了某種平衡；但在這種平衡中偏重于哪一方，則是另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現在得知，一般在農業產量較低的中國北部和西北部，出產、收獲、運出和出售給城市消費者的剩余糧食比較少，租佃關系也就不大發達。這里出現了一片嚴重貧困的景象，所以實行地主所有制是不合算的。在此期間，關于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農民中發生的貧困、騷動和叛亂在文獻中有越來越充分的記載。這樣，地方的上層分子在多大程度上是村社的領導者或剝削者，這一沒有解決的問題就可以和農民的貧困及中國人一般的生活水平這一問題結合起來考慮了。

我們在這里面臨一個基本的、壓倒一切的事實，對它的全部意義歷史學家至今仍然沒有估計出來，這就是：中國的人口在18世紀至少增長了一倍，這個總的增長趨勢一直繼續到1850年，雖然增長率有所降低。這種人口增長的影響表現在許多方面：無地的貧民人數增多了，許多人從人口稠密的地區遷出。在這些移民定居的地方，交通可能依然不發達，政府統治依然無力。在新建立起來的生活艱難的地區，自然要發生貧困、沒有法制和像白蓮教之類的起義運動。這反過來又使吏治敗壞，使清朝的威望遭到損害（見第三章）。糧價上漲，倉儲枯竭，政府倡導勤儉節約，以及其他許多表示物資緊張的征候，在清朝的中葉是史不絕書的。[[7]](#_7_Po_Jin_Si____1368__1968Nian_Z)

然而，人口的增加決不只是一種災難。它意味著消費人口的巨大增長，因而促進了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對土特產品的需求。其結果便是，由于商業的發展的刺激，進一步建立了銀行業和信貸業，運用了行會和商會這種新型的組織，以及采用了如匯兌銀票這類新的業務。簡言之，人口和貿易在近代早期的增長，在中國像在同時期歐洲的某些地區一樣，促進了商業化，并且提高了商人的作用。

在士大夫所寫的浩瀚的歷史記載中，很少注意商人階層。早在漢朝，商業就是中國人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商人集團很少能成功地爭得獨立的社會地位。恰恰相反，他們仍然從屬于官府，不得不從官方獲得特許并交納捐稅，而且為了免遭非官方形式的榨取，他們還得依靠與官僚們的個人關系。官方控制商人的一個結果，就是中國的文獻只注意記載政府的體制以及知識階級的思想和學說，而從圓仁和尚或馬可·波羅時代起一直到今天，那些個人對中國城市生活的觀察卻往往強調其攘往熙來的商業特征——這真是咄咄怪事！

在舊時的中國，經濟事業跟宦海生涯或一般的社會生活一樣，是以家庭為單位并且依賴于所建立的私人關系。因此，商業依賴于家庭商號，在這里，親屬關系成了主要的忠誠紐帶。個人在家庭商號里承擔著無限的責任，但在一場危機中，他也可以指望得到家庭無限的支持。在缺乏不講私情的法律保護的情況下，在沒有保險機構和商業法的情況下，一個商人的主要資本便是他的信譽和擔保人，但他和官府當局的私人關系也同樣重要，因為從那里他的商號才能獲得準予開業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認可。商人階級防止官府控制和剝削的主要手段是商人集團的團結。很久以來，同一行業的商店都開設在城市的同一條街上。商人們奉命按照行業而結合在一起，到晚唐或宋代時，他們經過與官府的周旋，建立了行會。

在發展周圍的私人關系時，商人們仿效士子的慣例：士子們首先發展的是他們與其感恩戴德的老師、考官和恩主的垂直的私人關系。在橫的方面。他們與同科士子、在同一老師門下受業的士子以及同一思想流派的士子建立密切的私人關系。這類關系就結成了士大夫生活的庇護制網絡。就商人來說，他們在橫的方面與其他同行商人或手工業者之間，即與他們最接近的競爭者之間的共同結合，可能比他們與官府的垂直關系更加重要。尤其是遠離故土的商人往往同經營其他行業的同鄉建立強固的聯系。這就形成了同鄉會的基礎。像上海的寧波會館、北京的廣東會館，這些商會有時覺得同時也向同鄉士子和鄉紳提供膳宿是上算的。其結果便是同鄉會館激增，它們有時純粹是按籍貫組成，有時按經商的行業組成。但在19世紀以前，這些自愿組成的會館很難做到鞏固商人的利益和力量的程度。相反，由于這些行會分屬不同的貿易行業，代表著不同的經商地點，就使得它們仍然是各自為政。[[8]](#_8_He_Bing_Di____Zhong_Guo_Hui_G)

政府用種種手段控制商人階級。其中一種辦法便是經營某些行業需要政府的特許，如鹽的產銷和采銅鼓鑄等行業即是。另一手段便是直接控制，如通過從長江下游到北京的漕運制度來控制糧食貿易，又如通過蘇杭的皇家織造和景德鎮的官窯，以分別管制絲織品和瓷器的生產和貿易。但總的說來，政府寧可保持一種支配地位，而不實行嚴格的壟斷。這種支配地位基本上是通過特許制來實現的，它給政府提供收入，給主管官員帶來外快，給商人則帶來了官方的認可和機會。廣州的公行和揚州的鹽商便是已經對之進行過研究的典型事例。

在人口于上世紀增長了一倍以后，到1800年前后國內貿易的增長可從它的出口量推算出來。先從邊遠地區說起，我們可以看到公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之間在廣州進行的茶葉貿易急劇增長，同時在從暹羅來中國進行的貢使貿易名義下，與曼谷之間的大米貿易也增加了。在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初期，與琉球——也就是間接與薩摩族時代的日本——的朝貢貿易以及與長崎的直接貿易，都顯示出類似的增長。到日本、琉球、馬尼拉和東南亞（南洋）去的中國平底帆船貿易的增加，必須看作是一種標志，即使用這類船只的中國沿海和內河商業的發展還要大得多。從寧波以及長江下游諸港口到南滿的航運比得上從廈門到南洋的商船貿易。我們知道，國內貿易增長的另一個標志就是運河的運輸體系：除了載運漕糧以外，它這時還是由私商運輸船只進行的私人貿易的渠道，這種貿易不但占支配地位，而且還在發展。

總之可以假定，中國在開辟通商口岸前好幾十年，經濟就有了增長。18世紀的人口只有通過交換南北各專業產區剩余產品的國內貿易的發展，才有可能增長。1760年以來，外國人通過廣州參加中國貿易已經完全有了基礎，但是它并不意味著外國對中國的入侵已達到了使歐洲的海上貿易和中國國內的內陸貿易進行接觸的程度。的確，后者在產品的數量和質量上往往超過歐洲的商品。中國從外國得到的是原棉、白銀以及通常銷路不佳的毛織品，而輸出的則是昂貴的茶葉、絲綢、瓷器、漆器和其他手工業產品。1840年以前，這類貿易在中國國內增長的幅度仍然無法估計。它直接使得像中國資本主義始于何時，貿易的增長是怎樣使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失去平衡等類似的問題，都不能得到解決。

還產生了一個有關農業的尚未解決的問題。隨著人口的增加，我們知道有更多的土地被開墾了出來，在新墾的、只有限界價值的土地上的作物（如馬鈴薯、玉米、花生、煙葉、罌粟等）以及早熟稻種都得到了進一步推廣，可是農業卻不得不更加占用勞動力和精耕細作——即是說，每個耕作者的生產效率降低了。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雖然像過去一樣辛勤勞動，但由于土地報酬遞減率的作用，每人生產的剩余產品更少了，因而更加貧窮了。

我們還不能恰當地從技術角度和分配角度來權衡，以說明近代中國農村的貧困究竟哪一方面起的作用更大。如果沒有科學種田的現代技術，包括化肥、農藥、良種，連成一片的土地，貯存和銷售設備、改良農縣、新的管理方法，以及這一切所需要的巨額投資，顯然，中國農村的生活水平永遠也不能跟上新的人口增長。無論如何，在19世紀初期，為了使農業現代化本來可以從農業中利用的剩余潛力，卻沒有為此目的而被利用。

非現代化的農業技術和對擁有的剩余產品分配不當，這兩者看來一直是互為影響的難兄難弟。中國農村生產率的低下，與許多社會罪惡、揮霍浪費的積習以及政府的腐敗，不幸是互為表里的，它們都被分配論者解釋為造成中國經濟停滯的原因。事實上，剩余農產品用各種方式給糟蹋了。老百姓中的許多勞動力都投閑置散，在中國北方的冬季尤其如此。在祝壽、結婚和喪禮中競尚奢華，揮霍了儲積的財富，而厚葬又轉而造成了墳地的浪費和土地的分割。尤為重要的是，地主的田租、高利貸和政府的稅收支撐著上層階級的寄生生活、游手好閑和奢侈浪費，其中還支撐了大量專為私人服務的行業。最重要的是，政府缺乏打破傳統和把經濟搞上去的魄力、意向和動力。[[9]](#_9_Po_Jin_Si_Bian____Cong_Li_Shi)當然，我們這一卷書中，將會更多地論及這些日積月累的問題，而不能多談到它們的解決辦法。

## 行政

中華帝國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個很小的官員編制，來統治如此眾多的人口。為了說明這一點，必須先看一下地方官員是怎樣行使職權的。

一個由北京任命的縣官來到的地方，那里不是根本沒有地方當局和地方權力機構的；他的首要任務是和地方上層人物搞好關系。他在北京被皇帝召見后，就通過驛站前往該縣就職。他沿著驛道每天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一站一站地行進，也許要走一個月或更長的時間。每到一站，他會受到地方官員的接待，并在驛站下榻。當一個地方長官最后被簇擁著走向他就職的縣衙門（即一個由官署、住宅、監獄、倉庫、棧房一起組成的大院）時，他通常會帶來兩類私人助手：第一類是他個人的雇員；第二類是他的私人幕僚，他們是行政事務方面的顧問或行家。這些人被稱為幕友，他們都具有士子的身份，通常是取得功名的人，尤其擅長法律和財政方面的事務。雇員和幕友的薪俸都由該地方官自己開銷。他們和該地方官一起來到一個陌生地區，因為有名的“回避法’禁止官員在自己的省份任職，這使他和他的幕僚都成了外地人，他們可能不懂當地方言，也與當地的利害關系沒有瓜葛。

這些新來的人在他們的衙門里會發現兩種人：第一種是書吏班子，他們處理衙門內部的日常文書工作，并且熟悉公文檔案和某些專門事務；第二種是從事外勤的衙役，他們代表衙門與老百姓打交道，負責維持秩序、收稅和緝捕罪犯等工作。這些地方官的班子中的本地人，當然在地方上有著廣泛的根基，所以地方官的首要任務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駕馭他們的工作。因此，他安置他的私人雇員把守衙門的大門，以控制出入，并派他們主管文案以處理文件。這樣就可以在皇帝任命的外地官員和當地機構之間建立起平衡，外地官員則通過這個機構來行使他的職權。

一般的地方行政官職權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在表面上管轄著一個約有20萬一25萬居民的地區，地方長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該地唯一代表。這種表面地位造成的結果，就是地方長官只有在與當地紳士頭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在理論上，他須具備的主要優秀品質是要“親”民，但實際上，他必須與上層分子保持密切的接觸。北京依靠他與他們的合作來維持穩定。朝廷必須防止縣級政府演變為純粹維持紳士的政權，為此必須經常向紳士灌輸恤民的思想。沒有一個王朝能夠建立起比紳士所希望的更好的政府。簡言之，清朝的中央政府是高度集權的，但集權又是極為表面的。它防止出現地方自治，但又對地方官員委以要他與地方上層合作的重任。規章是僵死的，但卻放之四海而皆準。它們必須在各地方貫徹。要官民遵奉它們，得威之以刑，但通常是靠協商來實現的。

地方政府的另一個特點是它沒有獨立的預算，它們被指望用當地征收的陋規自行支付費用來進行工作。這樣，它們由于包稅的積習而腐化起來（至少按照近代西方的標準來說是腐化了）。政府指望按預定的總額得到稅收。衙門的書吏和差役都靠陋規維持生活，地方長官則靠他取得的當地稅收，一方面維持行政開支，一方面上繳攤派的稅收定額。因此，清代面臨的不是廢除不正當的勒索的問題，而是取消過分勒索的問題。

這就產生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政府。它大大地偏向于當地縉紳之家；他們能夠對納稅做出最巧妙安排，使得事實上按照稅率遞減制納稅，即富人按財產的比例納稅較少，而窮人納稅較多。如果誰變得相當富有，并且有優越的社會關系，他就可以向政府交很少的稅。紳士利用他們的功名身份、特殊關系和特權干預地方行政，可以說不是代議制政府的形式，而是上層人物統治的形式，即使當紳士們認真地實行父母官式的和愛民的統治時也是如此。結果是：清政府政治的清明和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地區當地居民的道德和紳士頭面人物的操守。[[10]](#_10_Ju_Tong_Zu____Qing_Dai_Zhong)

因此，清王朝政府又有了另一個特點，即是它具有人的特性。皇帝被渲染成父親般的人物。官吏和紳士對他和他的家系的忠誠，是出于具體的個人關系，而皇帝對帝國的統治是靠他個人的每日統治活動來進行指導的。他的王朝能夠取得權力，最根本的一條是由于它有能力對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實行統一的統治。中國的統一在今天民族主義的語言里有它的現代意義，即要使中國能夠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在現代以前的時代，統一的真正價值是通過鎮壓內亂、地方上的無政府狀態和盜匪的騷亂給中國人民以安全。在過去，分裂就是災難，這首先是因為它對上層和老百姓都同樣意味著內戰和不安全。統一意味著和平，從而帶來了豐衣足食。這是一個至遲從戰國（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21年）時期起就徹底建立起來的中國的價值觀念體系。和平和秩序支持著王朝的統治。這兩者的實現依靠的是一個王朝的中央權力，王朝高居于地方官僚統治之巔，而在官僚統治下面則通過宗族關系和紳士領導集團的忠誠來維持對地方的控制。這種忠誠是儒家學說的產物：只有通過儒家學說，才能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形態。

政府統治的活動可以區別為兩類：一類是往下只到地方縣一級官員的正規官僚機構的活動，另一類是由各地縉紳之家進行領導和施加影響的非正規的網狀系統的活動。這種區分在解決糾紛時就很明顯。一般說，地方官的法庭只是在非正式的調停無效時才進行法律解決。鼓勵通過家庭、宗族以及同業行會和其他非政府機構來解決爭端。正式的“族規”責成族內的成員盡可能避免法律訴訟，要他們在族長的主持下在族內解決一切爭端，而不為衙門吏役所左右。因此，民事訴訟和商務爭端盡可能留給宗族、商業行會和其他非正式的機構去裁決。

清律列舉了大約4000種犯罪行為，同樣也逐一列舉了對這些犯罪的處罰。刑罰分為五等：第一等是笞，第二等是杖，用于大約1000種犯罪行為。常例是笞一百折為杖四十，但因受刑以后會感染，這對生命仍有嚴重的威脅。第三等是徒，服這種刑時，為了使囚犯能經常吃飽飯和得到照顧，就要通過貪污的獄吏的服務，這需要給他們花很多錢，以支付各種開銷和行賄。第四等是流，或是終生，或到遠方，或在邊疆服軍役。最后，最重的刑罰是死刑，適用于大約800種犯罪行為；死刑又有輕重之分，逐步加重，包括絞、斬、曝尸、磔裂（即“千刀萬剮”）。

清朝的司法體系從下到上大致有六個地區等級。它從1500個縣和相當于縣級的地區開始，然后上升到高一級的180個府和18個省。再往上，案件送交京師的刑部審理，由刑部再呈送第五級，即三法司。皇帝是最高一級。他可以批準或駁回下面呈上來的有關死刑案件的擬審意見。這個體系組織很嚴密，判刑執行得也極為認真，至少從記載看是這樣。在判決時要引用案例，但這種引證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只是作為類似的案例提出來的。

實際上只有笞杖之刑通常是在縣一級定案，向上申報即可。縣長可以即時處理一些情節較輕的案件，可是必須把包括徒刑或更重的判決在內的嚴重案件報送上級，附上擬審意見。縣幕友對他進行指導，但幕友是不能出庭的。縣令通常受到催迫，得在一定的期限之內拘捕罪犯，并在一定的限期之前結案。例如，強盜作案之后，必須在4個月之內破案。因此，縣官也得給他的衙役規定限期，并根據完成任務的情況對他們進行獎懲。知縣可以在法庭里對原告和被告雙方進行刑訊，使用標準刑具來鞭笞、掌嘴或拶指和拶踝骨等。只有根據某條特定的法律條款，才能進行判決，還要有關人犯寫出供狀、畫押并接受判決。但是，如果判錯了案，縣令就要受到嚴懲，如果證明是他的錯，他就應身受冤屈者受的刑罰。

縣令在執法時，既要遵循晚清法典中436條基本法律條文（律），又要遵循1900個左右補充案例（例），而這兩種法律條款還可能互相矛盾。法律既不是主要的，也完全不帶普遍性，而它的含義又是模棱兩可和含混不清的。因此，縣官必須小心翼翼，當他作為一名法官時，地位是很不可靠的。他還不得不為牽扯到案件中的私人利益所左右，做出不致引起紳士階層會通過其他途徑向他的上司表示不滿的判決。對于任何一個縣令來說，當他坐在法官席上時，斷官司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在老百姓當中，打官司對有關各方都是一場災難。花在衙門差役身上的錢，可以使被告和原告雙方都傾家蕩產。因此，在清代的中國社會中，訴訟只起著較小的作用。皇帝的諭旨甚至勸誡老百姓不要進法庭。反對上法庭的偏見波及那些以寫狀紙為職業的人。他們被責難為煽起爭訟的人。在這個沒有律師的國度里，從事法律活動的職業得不到承認。最主要的是，法律被看成是應該在家庭和宗族里通行的個人關系的支柱。法律體現了儒家的社會準則。當這些準則得到嚴格地遵循時，就不必訴諸法律了。[[11]](#_11_Bu_De___Mo_Li_Si____Zhong_Hu)

總之，結論只能是這樣的：傳統的中國在地方一級是受擴大了的家庭或者說受宗族的支配，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傳統中國是等級名分結構的主要支柱，而這個結構是遵循著有關宗族關系的經典教義而在起各種作用的。宗族教導人們要順從長上，對父親或丈夫，對紳士或官長都應如此。官僚政治及其進行政治控制的各種機構代表著統治者，并想方設法向統治者效忠。但官僚政治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的作用較小，宗族制度則起著主要作用。在現代革命中，平衡改變了，現在官僚政治居于支配地位，而家庭一氏族制度則被弄得七零八落。但對于19世紀初期的清代，我們只能在舊的基礎上才能加以理解。

清帝國的政府組織保留著明代從1368年起建立的三大機構：由天子統治和主宰、由朝廷領導的文官政府；在長城以內和邊境地區維持秩序的軍事組織；以及對各級政府的行政情況進行嚴密監督的監察系統。這個王朝三權鼎立的每個部門都是從明朝承襲下來的，滿洲人只是進行了某些修補。

在文職行政機構方面，中央政府由六部組成，各部之首是滿、漢大臣和副大臣，他們一起行使職權。這種包括六方面的體制是從唐朝沿襲下來的，它把各種行政事務劃分為吏、戶、禮、兵、刑和工六類。這種六方面的體制也反映在從省到府縣政府的各級衙門里。18個省的巡撫除少數例外，都與總督共同管理他們的轄區，而總督在大多數情況下管轄兩省，因此，每個總督和兩個巡撫共事。通常清代的巡撫是漢人而總督是滿人。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私人衛隊。總督和巡撫一般聯名向皇帝呈報本省的各種事務。在他們下面的各級地方行政和機構中，道是由兩個以上的府組成，府又包括兩個以上的縣，縣是最低一級，全國共有約1500個縣或相當于縣的機構——道員、知府、知縣這些職位幾乎全由漢人擔任。

在軍事部門，清朝的綠營是從明代遺留下來的駐防軍（衛和所）衍化出來的，在遍布全國各地的小哨所駐防。滿洲人在這種軍事組織之外增加了自己的軍隊——旗兵——作為最主要的后備力量。早在占領中國北部以前，尚武的滿洲民族就建立了合軍政為一體的“旗”。在旗這種制度下，有戰斗力的滿族男子都按其出身分屬八旗中的一旗，并在不同地區撥給他們一份土地為謀生之用。在這個基本的行政結構之外，還增建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加在一起，這二十四旗就是一支招之即來和直接效忠于清王朝的攻擊力量。八旗的軍官由皇帝任命，他們的生活資料由朝廷以土地或俸祿的形式授予。各旗在任何地區都沒有根據地，而清朝在擢升軍官時則著眼于不致出現私人派系，從而不使出現對朝廷不忠的行為。

監察機構的主要代表是都察院，這也是從唐朝和唐以前沿襲下來的一個機構。都察院的人員從正規的文官中抽調，任期數年，然后再回到一般官府中任職。他們在京師六科和按省分設的十五道中任職，其職掌是體察民情，對同僚們進行糾察彈劾。御史在古代向君主進諫的職掌在清朝并未完全廢棄，但已退居于次要地位。還有一些其他機構也代表皇帝管理政務——首先就是宗人府。對宗人府的親王們則謹慎地防止他們插手朝廷和各省的權力，但在必要時，可以召他們前來處理某些重大問題。宗人府是為皇帝儲備得力助手，并且是培訓他們效忠嗣君的場所。按照清朝的傳統，皇帝臨終時將繼位皇子的名字置放于一密封盒中，而他的遺愿便具有祖宗之法的威力。誠然，這并沒有制止康熙諸子之間的兄弟相殘，也沒有阻止人們懷疑繼位者雍正篡奪皇位（最后，雍正將他兄弟中的五人置于死地）。宮廷的宦官也是實行監視的另一類重要人員，因為宦官是后宮必然產生的特殊產物；反過來，后宮之所以需要，是為了生育眾多的皇子，以便有可能從中挑選出才具優長的皇位繼承者。明代宦官專權的經驗教訓，使得有清一代建立了嚴格的制度防止他們掌握權力，他們一般是不準干預政務的。清政府最初不是在宦官當中而是在漢人奴仆（最早的家奴）和在旗的漢人中找到了他們最可信賴的臣仆，在清朝統治的頭一百年，這些人擔任了許多高官要職。但是宦官在皇宮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最后，在19世紀后期慈禧太后這位女主當權時，他們又曾有過短暫的黃金時代。

皇帝高居文官政府、軍隊和監察機構三大支柱的頂端，他在日常政務中操持著那些或者協助他維護權力，或者幫助他行使權力的為數眾多的機構。專門的機構處理皇家親貴、皇族以及旗民的事務，對宮廷內務，則與宦官一起處理。內務府財源很廣，有皇莊、專門的稅收和貢物（包括廣州貿易的特稅和貢物），有對人參和皮毛的壟斷，有罰款和籍沒的家產以及官窯和皇家織造，因此歲入很大。但是這些巨額的財富是保密的，是滿清皇朝的特別支柱，它與政府的收入完全分開。

在北京的幾百個官署里，數以千計的書吏將幾十萬件文件謄錄和歸檔。在這整個抄寫和傳送的過程中，傳統上有內廷和外廷之別。外廷是正式的最高機構，它由六部和包括從明朝承襲下來的內閣等其他高級官署組成。內廷則是皇帝的較不正式的顧問和幫手，主要是親王、后妃、宦官等人，他們以個人的身份協助皇帝處理政務，其中最初包括有挑選出來進行這類工作的內閣大學士，后來則名為軍機大臣；后者最初為了處理軍務于1729年前后設立，他們組成了一個更不正規但卻更有實效的機構。皇帝的意志通過這些名目不一的工具和復雜的程序形成和表達出來，做出這個金字塔式的政府的最高決定。

在政務過程中，各省高級官吏給清帝本人的奏章是通過騷站傳遞的。清朝統治者通過這種制度從遍布全國的可靠的官員那里獲得情報，他們可以向皇帝進呈只有天子本人才能親啟的“密折”。在這些批復的文件上，也許有皇帝親筆批示的諭旨，或有關道德倫常的訓諭。也可能有比較高級的官吏甚至老百姓的請愿。皇帝在對他們批復時，便頒布解決問題或對建議做出決定的敕令，這些決定又通過騷站送出，在許多情況下，它們由幾家商號以所謂邸報的形式在宮廷之外張貼，以供傳抄并分發至各省省會。[[12]](#_12_Wu_Xiu_Liang____Zhong_Guo_De)

天子在理論上具有無所不包的君權，但實際在相當程度上卻是虛有其表的，他的統治就是這種理論與實際二者的結合。君主支配著社會的最上層，不但控制著軍隊的指揮和民政，而且還通過諸如對食鹽的專賣，以及對一切大規模經濟活動的特許和調節來控制國民經濟。此外，皇帝就是圣人，他的起居行為能樹立一個有教育意義的道德典范。他發布道德倫常方面的訓諭，同時，他也是鑒賞各種優秀藝術的行家和文學風格上的楷模。他的統治既講究禮儀，又完全集中于個人，而且在理論上還是無所不能的。但皇權這樣集中的結果，就使他的統治機器浮在上面了。

雖然皇帝可以控制國家和社會的最上層，但他在官府看不上眼的平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卻只是一個象征。皇帝的官員從來不去大多數中國人民住的鄉村，只是在作為農村生活中心的集鎮才有衙役代表他們。因此，我們對19世紀早期的中國的了解不會全面；相對地說，我們對帝國上層的制度有較多的了解，而對人民大眾的生活則知之甚少。民間的道教和佛教所以能夠在農村社會里盛行，是因為它們已經被迫一直保持分散的形式，不能再提供與統治結構相對抗的或取而代之的組織。習俗保存了豐富多彩的廟會、宗教儀式和節慶日活動，它們有著宗族的支持和地方紳士的領導，但和官方的關系卻非常疏遠。這就在強大而又脆弱的國家機器與老百姓不斷發展的自給自足生活之間形成了勉強的平衡。

清代的欽定儒家思想的宏偉構思，把道德和政治結合了起來，并且把社會秩序和宇宙秩序融為一體。它實際上乃是摻雜著儒家和非儒家學派各種成分的混合物。最初，經典的儒家教義強調道德榜樣和善良行為對公眾的熏陶，以便使社會的身份等級制度不受觸動。但是早在西漢時期，帝國政府又對儒家的教義添加了某些法家的學說。它們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既強調使老百姓就范而實行的刑法和獎懲手段，又強調指導掌權者進行統治的方法。法律和方法二者都由那個意義含混的術語“法”來表示，因此，所謂法家學派也可以稱為執政者的學派。按照他們的觀點。掌權者首要的任務就是在官吏隊伍中發揮人的才干，保證他們正常地履行職責，他自己則充當最高的主宰以保持政府的運轉。因此，在清代官員老于世故的從政手段和他們用以應付政府各種問題的“經世致用之術”的背后，有著一個十分古老的傳統。

除了這個欽定的儒家學說和法家學說的混合物外，清政府還有另一套性質相同的原則，這就是把官僚政治的和個人—封建的組織方法結合起來。從遠古時代起，中華帝國就產生了官僚政治的特征。漢代的皇帝給一個官吏一定范圍的轄區、一定的俸祿和固定的職責，通過文書來往給以指示，并對他的權力加以一定的限制：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證使這個官員能正常而不斷地完成其任務。中國古代的這種不徇私情、客觀公正和有明確權限的吏治，頗有點“現代”味道。從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開始，不斷加強的中央集權政權，通過任命官員建立郡縣一直在推廣這種官僚政治體制。可是就在同時，一種個人的或個人—封建型的政治繼續和官僚型的政治平行發展。這不但明顯地表現在皇帝任命官員時著眼于他們對皇帝本人的忠誠，而且他還繼續給他的親屬和支持者分封采邑和爵位。每一代天子都保有一個由忠于他本人的藩封組成的寡頭政府。他也繼續要求他們進貢和效忠，如果外國統治者希望與中國保持關系，中國皇帝也要他們納貢和效忠。我們在這里采用中世紀歐洲封建時代流傳下來的英語術語“fief”，“vassal”和“tribute”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中文的術語（“封”相當于“fief”，“藩”相當于“vassal”，以及“貢”相當于“tribute”）看來有著極為相似的含義。甚至每當涉及皇帝的恩澤和官僚的感戴和忠順之情時，官僚政治在習慣上也用帶有人情的術語“恩”和“忠”來表達。這些封建術語也和王室家庭內部的親戚關系交織在一起。

實際上，在清朝的政治生活中，儒家和法家，官僚政治和封建主義的原則都很明顯。例如，從宋朝沿襲下來的保甲連坐制就是法家的手段，它使所有的居民都因鄰居出事而受到牽連，這樣就導致他們為維護法律和秩序而相互監視和告密。保甲制要被組織得不讓它落入地方紳士領袖之手，并且打破自然村的界限，使地方的影響仍然是分散的，而縣官則可以通過任命保甲長來維持自己獨立的統治機構。

對老百姓進行思想控制的其他手段則帶有明顯的儒家色彩——例如，祭孔的大典以及清初為勸誡老百姓安分守己而宣講鄉約和宣讀皇帝圣諭的制度就是如此。當然，考試制度主要是儒家的手段，它鼓勵那些企求入仕的有才之士進行自覺的自我訓練。此外，地方上還建立了對老年人和德高望重的人的旌獎制度，以表示對長者和善行的尊敬。[[13]](#_13_Xiao_Gong_Quan____19Shi_Ji_D)

## 對外關系

在對外關系方面，19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家和社會仍然認為自己是東亞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圍非中國人的關系是假定以中國為中心的優越感這一神話為前提的。但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對外關系問題，是有一個緩慢的演變過程的。古代華北平原的中國人曾經做了許多嘗試來對付那些可能從長城外面的草原侵入這一地區的野蠻部族的騎兵。當足夠強大時，中國人能夠征服他們或把他們逐出中國領土。當不夠強大時，中國人就與他們斷絕往來，或者給他們糧食、絲綢，甚至用公主和親來換取和平。當中國衰弱時，人數眾多的中國人仍然能夠同化人數很少的蠻夷入侵者。但是很難長久地與他們建立平等的關系。根本的問題在于中國人用一套金字塔式等級制度來安排他們的事物。沒有全體中國人對皇帝的至高無上地位的默許，他在中國國內的地位是無法維持的，這就同樣要求野蠻部族也接受君臣關系。

中國這個國家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形象，即雄踞于中國舞臺之巔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早期的歷史學家就提出了同心圓式的等級理論，據認為，地理距離越大的外圍蠻夷與皇帝的關系也就越淡，但不管怎樣，他們仍得臣屬于皇帝。和中國皇帝只能保持藩屬關系這種觀念雖然不時受到重創，但一直延續了下來。在漢朝的力量衰落以后，朝貢一詞就已被確認，以致它既可用于與蠻族的外交關系，也可用于與它們的貿易往來。中國在隋、唐時期重新強大后，這種唯我獨尊的理論也得以復蘇。可以指出，在唐朝時代，皇帝的恩澤已遠達四裔。這給中國的優越感和非中國人的貢屬地位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13世紀蒙古人的征服使蠻族的入侵達到了頂點，但除了蒙古人最后接管中國政權這一點外，它并未給中國人什么新鮮的經驗。但是蒙古人的接管是創傷劇痛的。在唐朝曾經顯示過的這種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和中國人的優越感融為一體的觀念，此時破滅了。取代它的是蒙古的元朝用自己的天子凌駕于全人類之上的單一的觀念，但是這個強有力的政治神話不再是純中國式的了。1368年明朝建立，中國人的力量得以復興，因此為重新樹立中國傳統的優越感提供了一個心向往之的機會。明代的第一個皇帝和他的強有力的繼承者，樹立了古老的儒家德治思想。為了從在他們所知道的世界內爭取各國朝貢，他們力圖顯示天子的一視同仁，以證明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們也表現出了家長式的慷慨大度。明朝的奠基者洪武帝一開始統治，就把毗鄰的朝鮮、安南和占婆的山川視為應納入中國版圖的自然地勢，立碑為記，并且舉行祭祀大典。對外國統治者，他授予封號，賜以官印，讓他們采用中國的歷法，并給貢使頒發通行敕書。他通過批準外國統治者的繼位，來行使予奪王位的大權。所有這一切都按規范進行，包括來往文書只用中文，不用臣屬國的文字書寫。這表明中國是君臨一切的中心。中國的統治者的職責是把所有其他統治者當作他的臣屬。

洪武帝的強有力的繼承者永樂帝派出的遠征航隊是由宦官率領的，他們與其說是中國政府的代表，還不如說是永樂皇帝的私人代表。在22年中，共出使48次。他們給朝貢國的統治者帶去了珍貴的禮物，同時也帶去了一支威武雄壯的艦隊給他們提供保護。皇帝加封當地的大山，以此表示這些屬國像中國自己的進納貢物的行省一樣，已被納入中國體制。[[14]](#_14_Wang_Geng_Wu____Ming_Zhao_Ch)

清朝進一步發展了中國天子慷慨地允許非中國人加入文明體制的宏圖大略。還在1644年以前清朝就已在滿洲特設了理藩院，來維護滿族統治者對它的亞洲腹地的同盟者——首先是蒙古人——的優越地位。清朝皇帝從一開始就用這種辦法統治漢人和非漢人。對漢人他運用前述兩個體系來統治，即通過地方官吏集團的官僚政府，及通過私人關系的個人—封建的臣屬關系。與皇帝有人身依附關系的藩封，首先是與皇帝有血緣關系的皇族。然后又擴大到包括中國國內的“內藩”。所有這些藩屬都有世襲身份，不過爵位等級可能逐代遞降。他們都得到封號，封號甚至也給予王子和嬪妃。內藩也要進貢，貢物只是些禮品而已，但也包括像從長江三角洲各省運來的“貢米”（漕貢）那樣的地方賦稅。這種個人—封建關系的結構然后再擴大到“外藩”，他們位于中國本土之外，然而也屬于皇帝關心的范圍之內。他們也得到封號并且要進貢。屬于外藩的有蒙古的親王，西藏的統治者，亞洲腹地其他的人物，以及像朝鮮、安南（越南）等毗鄰國家的統治者。最后，遠方的國家如果也想和中國建立關系，也被列為遙遠的朝貢國，他們仍都被認為是“藩”。這就完成了同心圓式的分成等級的世界體制。

在應付這些不同類型的非中國的統治者時，北京的天子有一整套老練的方法和手段。首先是軍事力量，它在中國各省進行彈壓，也可以開往邊境甚至遠征國外。其次是官僚政治的“法”的體系，利用它就可以通過頭人（土司）對非漢人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在西南）實行政治統治，完全像對漢人本身實行的統治那樣。第三是德治，即通過顯示天子的德威，來發揮合乎準繩或思想意識的道德榜樣（德）的影響。利用宗教的影響是這一手段的變種，尤其在同拉薩的關系上是如此；清初的統治者就充當了支持當地僧侶階層的明王（庇護者）。

最后，對于那些由于地理上的距離和文化上的差異而使武力、行政或者道德示范均感鞭長莫及的非中國人，中國統治者卻擅長于使用物質利益（利）的一套手段。這首先是采取允許通商的形式，也采取賜贈禮品的形式。外國人確有貪得無厭之心，但可用來誘使他們行禮如儀，以便納入中國人對事物的體制中去。例如近在1795年荷蘭使節在尋求貿易特許時，在清朝宮廷里頻頻行叩頭禮，即其明證。最后，中國統治者還有一套外交技巧，有時玩弄一視同仁，有時又搞以夷制夷，總之是萬變不離其宗。[[15]](#_15_Fei_Zheng_Qing_Bian____Zhong)

關于中國人優于非中國人的神話，就這樣維護了一條古老的王者無外的信條，這信條反過來又能認可非中國人王朝的統治。蒙古人在13世紀征服的先例是有利于滿洲人在17世紀的征服的。同時，這兩次征服都強調天子為普天下之主的作用，因而與只由中國人組成的政府相比，它們很可能使得帝國政府獨斷專行的形象較多，民族主義的色彩較少。以上這個概括絕非事情的全部——也許專制主義完全是隨著統治方法和控制手段的演進而加強的。但是，這些征服者王朝作為統一了的諸部落集團的少數民族，不是按照中國人立嫡立長的習慣，而是按照部落的習慣，即以英武和個人才能作為條件來選擇自己的領袖。因此，征服者擁有精力過人的領袖。唐、宋兩代皇帝進行統治時，通常是由他們的大臣處理帝國的日常政務。一個部門的大臣可以向地方政府發布命令并且任命低級官吏。但是蒙古人的征服改變了這種狀況。當明初的開國之君在1368年以后著手親自統治時，就是效法蒙古人行事的。

清王朝是這一漫長發展過程的頂點；它繼承了中國人的許多權變手段并結合著自覺的征服者所特有的活力，因為他們只是不到一百萬人的一個小小的少數民族，他們知道為了生存必須緊緊團結。他們擅長于進行戰爭和把持權力。

清初的統治者建立了驚人的業績。努爾哈赤在他于1626年去世以前，已經在南滿建立了一個漢化的國家，并且創立了作為攻擊力量的八旗制度。他的繼承者皇太極（死于1643年）征服或者改編了蒙古人和漢人同盟者，在他們當中推廣了八旗制度，此外，還置朝鮮于屬國地位。以攝政王身份執政到1650年的多爾袞，完成了對中國北部的占領。在入關后第一代皇帝順治（死于1660年）的統治下，入侵者建立了華—夷聯合政府。后來，康熙大帝（他從1661年執政到1722年）鞏固了清政權。他不但鎮壓了一次大規模的叛亂，而且開始了使清朝在文化上同化于中國文人政府的傳統。漢人的南方三藩，曾經與滿人的征服合作，后來又企圖并滅滿人，但康熙在從1673年至1681年的內戰中打敗了他們。他最后在1682年至1683年控制了臺灣，并且通過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把俄國人從黑龍江流域趕走。后來他又在1696年戰勝了以噶爾丹為首的西蒙古人（即準噶爾人），從而保住了清廷對東部外蒙古的控制。這一驚人的成就似乎應部分歸功于康熙的靈活性。他在觀點和方法上還沒有完全漢化，所以能在清宮使用耶穌會教士做顧問，并且認為只要在外交上合算，就可便宜行事，與俄國人在平等地位上打交道。

雍正皇帝繼續加強了君權。1729年他建立了一個新的更加得心應手的行政機構——軍機處，同時發展了密折制度，這使他能夠和整個政府中挑選出來的官吏保持直接聯系。他的繼承者乾隆皇帝保持了國內和平，但卻屢次在帝國的邊境地區用兵。他的十全武功中有兩次是鎮壓四川的叛亂者（1747—1749年、1771—1776年），一次是對緬甸、但最后又從那里撤出的遠征（1766—1770年），另一次是對越南北部、但也很快從那里撤出的遠征（1788—1790年），還有一次是鎮壓臺灣叛亂的遠征（1787—1788年）。然而，乾隆的主要武功是在亞洲腹地，他的軍隊在18世紀50年代在那里殲滅了西部蒙古人，到1760年又攻占了塔里木盆地。同時，清廷于1720年、1727—1728年和1750年派遣遠征軍進入拉薩，利用喇嘛教來間接控制蒙古。1790—1792年兩次對尼泊爾廓爾喀人的遠征使得對西藏的用兵最后得到成功。在所有這些戰役中，滿洲的旗兵表現了英勇氣概，他們的將帥得到了很高的榮譽和優厚的犒賞。

表面上看，清朝的統治到18世紀晚期正處于空前的鼎盛時期。但是到19世紀中期，它就證明是一個軀殼中空的巨人。為了正確理解這一突然中落的巨變，我們的研究必須從被忽視的北京觀點開始，把清帝國看作是一個整體。只有用這個不一般的研究方法才能說明到1800年時亞洲腹地在清朝戰略思想中的突出地位。

（黃乘矩 譯）

[[1]](#_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2頁。

[[2]](#_2)在1949年以前一個世紀，描述中國地形和生態學的一批西方地理學家中，克雷西是旅行地區最廣的學者之一，他的兩本著作敘述生動，仍值得介紹，見《中國的地理基礎》（1934年）和《五億人的國土》（1955年）。

[[3]](#_3)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4第1期（1964年）。

[[4]](#_4)瞿同祖：《傳統中國的法律和社會》，第28頁。

[[5]](#_5)見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以及何著此書中所引的著作。

[[6]](#_6)已故的村松枯次教授把他的八篇日文論文要旨概括寫成《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度的文獻研究》一文，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卷29第3期（1966年），第566—599頁。

[[7]](#_7)珀金斯：《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散見于此書的各處。鈴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章。

[[8]](#_8)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

[[9]](#_9)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特別是第49—84頁；里斯金所寫的《近代中國的近代產品和停滯》；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10]](#_10)瞿同祖：《清代中國的地方政府》；瓦特：《中華帝國末年的縣官》；王業鍵：《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

[[11]](#_11)卜德、莫里斯：《中華帝國的法律》，以及此書中所引的著作。

[[12]](#_12)吳秀良：《中國的通訊聯絡與皇帝的控制：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

[[13]](#_13)蕭公權：《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

[[14]](#_14)王賡武：《明朝初年與東南亞的關系》，載費正清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15]](#_15)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 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亞洲腹地

## 清帝國在亞洲腹地

18世紀發生了三個決定中國此后歷史命運的變化。最為學術界注意的是歐洲人的到來，并牢牢地在這里扎下了根。不過從長遠觀點來看，另外兩個變化可能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其一是中華帝國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其二是中國漢人人口增加了一倍。這三個因素的相互作用，便決定了近代中國歷史的方向。

到了19世紀初年，中國主權的有效控制范圍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大，中國正處于政治、經濟和文化都開始發生質變的階段。這種質變通常被看做是“現代化”，這不僅是受到歐洲文明的直接或間接影響的結果，而且是中國內部社會演化的結果。中國人口和領土的增大所造成的它本身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其力量不在外來壓力之下，它們決定了中國向現代轉變——這種轉變至今仍在繼續中——的基礎。

在1800年以前，清代歷史的焦點集中在亞洲腹地，即集中在它的征服，它的政治活動，以及一個幅員遼闊而文化迥異的地區被一個單一的、不斷漢化的中華帝國所吞并和消化的過程。在1800年以后，重心開始轉向中國本土和沿海。清代的亞洲腹地在19世紀開始慢慢地被吸收入擴張中的中國版圖，并且開始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但是直到19世紀60和70年代穆斯林變亂期間中俄在此互相交鋒的時候，這個地區才開始向現代轉變。

足足相當于今日中國疆域一半的清代亞洲腹地，盡管幅員廣大、資源豐富和有著多種多樣的文化，歷史學家都令人驚訝地很少給予注意。就對外關系而言，直到本書撰寫時為止，還沒有一本書根據19世紀清代政策和英俄角逐的背景來論述清代亞洲腹地的歷史。[[1]](#_1_Can_Jian_Ru_Jiang_Qi_Si_Lang)就中國的本國史而言，也沒有人研究領土擴張對中國本土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等歷史所產生的影響。這樣的工作還有待今后來完成，因為本書的有關章節僅限于概述1800年到中國西北本部和新疆穆斯林大叛亂前夕的清代邊疆史。在這幾次叛亂以后，滿、蒙、新疆和西藏都開始發生巨變，清屬亞洲腹地的歷史才真正具有現代的面貌。本章對于所論到的地區并不是無所側重，論述最充分的是新疆，這是因為它的文化的復雜性和叛逆態度，也因為至今還沒有一本令人滿意的新疆史可供英語讀者使用。西藏雖然同樣復雜，但是它的歷史和文化已經有了很好的可讀之書，所以寫來無妨從簡。[[2]](#_2_Zui_Jin_Chu_Ban_De_Shu_You_Qi)

從長遠的歷史后果看，17、18世紀清軍進入亞洲腹地意味著漢族的影響、文化和人口都有所擴展。這并不是滿人的本意。清王朝需要充分利用漢人的才干，尤其是在帝國的非漢族地域需要鼓勵漢人向亞洲腹地邊境移民，可是，清政府直至19世紀才模糊地和遲遲地意識到這種需要，而這時要在新疆和滿洲充分擴展清朝的版圖就為時太晚了。盡管清政府在18世紀努力防范漢人擴展，但漢人還是擴展了。不過，為中國亞洲腹地邊疆的漢化打下基礎的還是滿人。對這一漢化過程很難進行深入的研究，可能今天也還是這樣，因為文獻不足。滿族各部、蒙古人、西藏和說突厥語的穆斯林以及所有旗人，在清帝國內都是沒有納稅記錄的。

盡管有相當多的漢人向滿洲、內蒙部分地區、青海和新疆北部移民，但是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漢人應留在中國本土。清朝從不委派一般非在旗的漢人到亞洲腹地為官。那里是旗人的天下。在1800年，亞洲腹地包括四個主要地區，即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各地均由清軍戍守，但是卻由不同種類的行政機構進行治理。滿洲分為三省。蒙古雖然被分為許多小塊，并且處于嚴格控制之下，但是與其原有的行政仍有許多相似之處。新疆由伊犁將軍統轄，但在地方一級，土酋和土官吏仍擁有不同程度的權力。西藏則處于分割狀態。它的本土保留著完全是本地人的政府；但東北部（青海）直接向清政府納稅，歸西寧辦事大臣管轄；極東部（康區東部）也要向清政府直接納稅，歸四川省當局管轄。

從理論上說，至少清政府希望它的亞洲腹地的屬地（蒙古、新疆和西藏）和東北各省（奉天、吉林、黑龍江）能夠自給自足。各該地政府都被要求在當地征收足夠的賦稅以滿足自己的行政費用。但是除了蒙古和奉天之外，基本上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尤其是在新疆，維持帝國統治所需要的軍費必然要大大超過它的稅收能力。

管理蒙古、新疆、西藏這些清屬亞洲腹地的藩屬來清京朝貢的事務，以及管理與清帝國境外亞洲腹地的各國的關系，則由北京的理藩院負責。清帝國境外極西部的尼泊爾（在印度統治之下）和乾竺特（罕薩和那噶爾，其居民為七什葉派穆斯林，稱伊斯邁依勒）直接向清朝進貢，而拉達克、錫金和不丹則是西藏的附屬國，與清帝國沒有直接聯系。巴爾提商人在新疆和西藏的市場經商，但是清朝只把巴爾提斯坦看作是一個并不存在的所謂博洛爾國（此為吉爾吉特古稱，清代所謂博洛爾主要指巴爾提斯坦）的一部分，[[3]](#_3_Xu_Song_De___Xi_Yu_Shui_Dao_J)所以同巴爾提的統治者沒有建立穩定關系。在喜馬拉雅山南是印度各邦和英屬東印度公司：當18世紀的時候東印度公司曾幾次企圖進入西藏，它的積極程度日甚一日。但是，理藩院在19世紀之初對西藏的西鄰幾乎仍無所知，甚至不知道在印度的東印度公司和在廣州的英國商人是來自同一國度。[[4]](#_4_Ling_Mu_Zhong_Zheng____Wei_Ra)

新疆以西是操突厥語的穆斯林哈薩克游牧民，他們既向俄國也向清朝納貢。還有在山區的柯勒克孜各部，也是穆斯林。以費爾干納為中心的浩罕是主要從事農業并定居于城鎮的伊斯蘭國，其統治者向清朝納貢。但是清朝也向浩罕納貢，因為清政府為了保持新疆西境的安定，定期賜予浩罕統治者以銀兩和茶葉。在清帝國看來，塔什干、布哈拉、“博洛爾”、巴達赫尚（巴達克山）和杜蘭尼人的分崩離析的阿富汗國，都是向清帝國朝貢的國家。

在清政府的心目中，納貢的地位就是給外國人在特定條件下以經商權，使皇帝對外國朝覲者的權威合法化。但是這并非附庸關系，也并不表示要求清朝保護。僅有的真正的“保護國”是在帝國邊境以內的屬國，其中某些統治者被認為是貢謁者，不認為是外國人。

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使莫斯科政府無可奈何地承認了整個黑龍江流域為中國領土，并且向北向西撤退到無爭議的俄人地帶。雖然清朝政府認識到俄國是西伯利亞的大國，卻不了解俄國人在技術上多么先進和軍事上多么強大。結果清廷對滿洲以北諸部仍采取“羈縻”政策。清朝派員前往豎立中俄界樁時，他們竟把界標馬馬虎虎豎立在距離商定的邊界線以南很遠的地方，放棄了根據尼布楚條約規定應屬清帝國的領土約2.3萬平方英里。[[5]](#_5_La_Wen_Si_Tan____E_Guo_Ren_Za)俄國則乘清朝不注意黑龍江以北領土之機，在18世紀繼續在西伯利亞移民和勘探，進而鞏固它在那里的地位。

## 滿洲

在進入19世紀時漢人已開始向滿洲移民，這使先前與外界隔絕的、操通古斯語的旗人和部落民的偏僻地帶到20世紀變成了中國發展中的工農業地區。滿人通過八旗戍軍和部落聯姻進行統治的那種早期方式已被打破，漢族移民不斷流入并帶來了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從而把滿洲在社會和經濟方面都與中國本土連在一起了。在18世紀之末滿洲地方的人口大概已超過100萬，到19世紀中期又翻了兩番。[[6]](#_6_He_Bing_Di____Zhong_Guo_Ren_K)

官方是禁止漢人向滿洲邊地（吉林和黑龍江）移民的。但是在整個18世紀，清政府日益舉棋不定，時而封鎖移民，時而對漢人滲入柳條邊佯作不知。到1800年，想要保持奉天為滿族的禁獵地，或使其不受漢化，顯然是已經太遲了。不過在吉林和黑龍江，人口和文化方面這種不可逆轉的趨勢不如南部顯著。清朝政府——至少是它的最高層——還是竭力阻止移民，力求減少漢文化與滿洲邊地的接觸。例如在1811年，北京政府就曾明令重申，禁止漢族移民，一如既往。

清朝政府之所以極力要保持吉林和黑龍江的旗人和部落的特點，被認為有四個主要動機。一是想為清王朝留下退路，如果滿人必須放棄中國的話；二是想保持一支不受漢文化影響的八旗軍后備力量，以維持滿族對中國廣大人口的統治；三是想要保護清廷對人參（一種價值很高的發情劑和藥用植物根莖）、貂皮、珠寶和黃金的壟斷；四是想要保持滿族文化和滿族王朝的祖宗傳統。

現在看來，這四個理由就在19世紀之初也沒有一個是很令人信服的，雖然頭兩個理由在那時還有其原來心理和戰略方面的某些意義。即令如此，滿人在1800年時已不需退身之路。后來在19世紀中期中國本土爆發起義時，清政府使用了大量的滿洲旗兵，但是在1800年，這些軍隊也許除索倫兵外都缺乏訓練和裝備，毫無斗志，不像是一支清王朝用來準備維護對中國統治的軍隊。不僅如此，當時實際上是中華帝國的清王朝鑒于俄國人即將來犯，應該鼓勵漢民前往黑龍江以維持清帝國對當地的控制才是上策。只有漢人才有能力充分開發滿洲的資源，如果政府鼓勵移民并謹慎地把壟斷項目包給漢人的話，它本來可以從人參、貂皮、珠寶和黃金等物產中獲得更大的利益。同吉林相比（且不說黑龍江），漢化的奉天更是滿族的老家和滿族帝國的發祥地；因此，防止滿洲邊境不受漢族影響，并不可能保留住滿族的信仰、文化和傳統。總之，到19世紀之初盡人皆知，要阻止漢人移民、偷獵者和逃犯前往滿洲邊境，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隨著中國人口在18世紀迅速膨脹，漢民北移的運動加速了。由于滿洲南部的漢族農民已達飽和，越來越多的漢人更往北流。滿洲邊境當局不可能阻擋這股洪流，便開始向定居的漢民征兵征稅，即使這樣，地方當局仍未通過征收土地稅來完全正式確認這些定居者的地位。地方當局也有可能支持漢民移往邊境，這是因為前來定居者開發了滿洲的經濟資源，從而提供了額外的收入。

到18世紀末，吉林城鎮人口的80%—90%是漢民，黑龍江也大概如此。盡管公開禁止，清政府還是向滿洲委派了漢族官員前去治理移民區。到1800年，黑龍江以南的滿洲幾乎人人會說點漢語，許多滿人甚至已經丟掉了自己的母語，此即漢化的結果。蒙古人則散居在滿洲一部分邊遠地區，過著與定居漢民和滿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只有他們才基本上沒有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7]](#_7_Luo_Bo_Te__Li____Qing_Dai_Li)黑龍江的漢商雖然可用漢語同滿人進行貿易，但是要同蒙古人做買賣，還得學習蒙古語。黑龍江以北人煙稀少，生活原始，能說漢語的人一定是很少的。清政府曾在1765年派遣富僧阿到此地調查。他夸大其詞地報告說：江北渺無人煙，其地嚴寒，水草牲畜俱無。[[8]](#_8_Jian___Da_Qing_Gao_Zong_Shi_L)

滿洲在地理上是非常有助于安置中國迅速膨脹的人口的。東北部土地肥沃，盡管它的生長季節比清帝國其他農業地區短，滿洲農民還是可以期望得到適量的雨水。不僅如此，滿族征服中國時曾征用大量的滿洲人口，使得處女地未被開墾，即便是已耕地，也由于農業技術比中國本部者簡陋，產量僅及漢族農民所得的一部分。

在19世紀之初，東北邊境森林為中國市場提供的人參和貂皮，比起滿洲的農業潛力更為人們所知。在18世紀，毛皮和人參的供應量已經下降。毛皮供應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俄國人已經大量進入東西伯利亞。不過在1800年時，合法的或走私的人參貂皮買賣也還興隆。除此之外，滿洲的山山水水和森林還生產黃金、珠寶和木材，還有大量令人討厭的蚊蚋和咬人的昆蟲。根據20世紀的情況判斷，瘧疾一定也很流行，尤其是在滿洲東部和黑龍江流域，不過這種疾病對人口的影響尚不清楚。肺結核、天花和梅毒必定也是很普遍的。[[9]](#_9_Na_Luo_Qi_Ni_Ci_Ji____1860__1)

“滿洲”是歐洲人的稱呼，而不是漢人或滿人的稱呼，這指的是滿族王朝的發祥地遼河地區和北部邊境的部落民地區，包括按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所規定的黑龍江流域。滿洲是中國行省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人稱它為東三省。因此根據法律來說，它不是一個附屬國。奉天位于東三省最南部，省會是盛京（今沈陽），同時也是清帝國的陪都，不過純粹是名義上的都城。這樣一來，盛京也有一套由五部組成的行政機構，即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類似北京的六部，但缺吏部。這五個部分管滿旗的許多事務，也管理不斷增加的漢人的民事事務。同時，奉天還設將軍一人，他也有權治理旗人，在許多方面與盛京的五部有重床疊屋之感。這便造成政事的沖突和混亂，導致大量的治理不當，使得吏治腐化，官僚主義的弊端叢生。

滿洲北部兩省是吉林（省會即稱吉林）和黑龍江（省會為齊齊哈爾）。兩省都由將軍統理軍政和民政。也與清代亞洲腹地其他地方一樣，將軍必須由旗人充任：首先是滿人，其次是蒙古人。他們管理旗人和漢民（農民和城鎮居民），也管理其他部落民地區。清政府不打算把那些部落編入旗制，因此它們仍保留其原有的部落組織。

滿人入關之后，清政府按照入關前的舊制（除滿洲）將滿洲北部和東部諸部落編為新旗，由滿、蒙、漢人構成；又在歸牙剌、北虎爾赫、赫哲、索倫和錫伯等部，以及操蒙古語的達斡爾部，建立所謂新滿洲旗，把他們編入帝國的軍隊，受吉林和黑龍江將軍指揮。這些編為旗兵的部落構成清軍的一部分，得到免稅的旗田以維持生計。他們參加吉林和黑龍江一年一度的冬狩，由將軍直接統率。除了在黑龍江行獵的旗人外，他們不納貢。這些行獵的旗人是特殊的一類，既充當滿人正規戍軍的輔助力量，同時又被要求進獻貢物：清政府顯然是按照他們的各戶人口多少來征收貢品的。

在邊遠的黑龍江流域和瀕海地區，把所有部落都編入旗制是不現實的，因此清政府只滿足于將它們視為國內的納貢者，實際上讓它們自行其是。毛皮，特別是昂貴的黑貂皮和黑狐皮，要定期向清廷進貢以示忠順。有時也許可這些部落民進京納貢，由理藩院負責管理貢使，但是在一般情況下，則由各部落將貢品送到指定交納地點，主要的地點是三姓、德棱或穆棱。清朝的收稅官就在這里挑揀上等皮毛，不夠標準的都聽任出賣。這樣一來，那些收納貢品的地點便發展成為定期集市，漢人和蒙古人都定期前來貿易。清廷回賞之物對滿洲邊境來說是奢侈品，它們的市場價格高昂；因此，那些部落酋長通常都將其出賣。例如瀕海地區的頭人，一般都把清帝回賞之物賣給日本官吏以換取毛皮，再賣給漢商。[[10]](#_10_Luo_Bo_Te__Li____Qing_Dai_Li)為使滿洲北部諸部落同清帝國聯系在一起，清廷還授予爵勛。起初，還把滿族姑娘嫁給部落酋長，以聯姻來聯盟，但是過了19世紀初就不再采取這種方式了。

1800年之際的滿洲社會，主要是由三大集團組成，即旗人、漢人和部落民，他們又各自分為不同的社會階級。從人種學來說，他們也互不相同。旗人包括信仰薩滿教的滿族，絕大部分信仰西藏黃教（格魯派）的蒙族，和信仰佛教、儒教及其他民間宗教的漢族。部落民有幾種宗教，但是一般都歸之于薩滿教；他們的族源很雜，大多數講通古斯語，但住在庫頁島和黑龍江下游的基里雅克人（吉列迷人）則操一種與通古斯語無關的語言。

在表面上旗人作為創建大清帝國的成員，在社會上高人一頭，但實際上只有他們的高級官吏即上層軍人才能如此，只有他們在社會影響和政治權威方面才在整個滿洲名列前茅。大多數在旗軍官都是來自滿洲的旗人，至少在吉林和黑龍江是這樣。然而最高層官員照例是來自北京的旗人，他們比其滿洲同胞的漢化程度要高得多，也要老練得多。中國本土的滿人接受的是漢式教育，在清帝國的大多數地方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前途即已取決于此；但是在滿洲，學校只教滿語加練武，僅有少數私人教育是例外。盡管17、18世紀產生了一批滿文文學（包括大量翻譯和文藝作品），但要創造一種成熟的滿文文學的努力卻終歸失敗。20世紀以前，政府文件中一直以日益僵化和沒有生氣的方式使用著滿文，但滿文教育的用處則很有限。清政府為那些受過漢式教育并通過府考的滿洲旗人規定了錄取的名額，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這名額也逐漸增加。但是，學得很好的旗人很少，即使是那些夠格的也必須去盛京趕考，因此這府一級的考生也是寥寥無幾的。有資格去北京應省試的考生就更少了。

滿洲的漢民主要是農民、商人、手工匠和流放的官員。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而且我們可以料到，絕大多數漢民集中在奉天省，其次是在吉林省，只有極少量的漢人在黑龍江省。在整個18世紀，隨著滿洲的漢民不斷增加，城鎮也逐漸增多，到了19世紀之初，滿洲的城鎮化已初見端倪。當然，最重要的城市是在南部，特別是在盛京；不過，吉林、寧古塔和齊齊哈爾也在發展。1799年設立了長春廳，作為管理周圍地區定居漢民的行政中心。這些城市不僅是軍政治所，又是市場中心、各種手工業和新興工業的基地以及娛樂場所：這里賭風盛行，性道德也比在中國本土松弛。

在1800年的滿洲，富有的漢商居于社會上層，僅次于高級旗人官員。他們同旗人官員在社會、文化和商業方面有很多聯系，官商之間往往平等相待。滿洲的漢人社會是沒有根基的移民社會，除在奉天省者以外，大多數人到此只有幾十年的歷史。那些定居者主要來自直隸、山東和山西，他們帶來了各該省的許多風俗習慣。但是他們出身寒素，缺乏教育，直到19世紀初，奉天省才有像在中國本土常見的那種“紳士”階級，他們也成了書香門第，有錢有勢，世世代代在當地領袖群倫。不過，還不能說滿洲邊境確已存在著這種階級。中國的文人都輕視商人，可是在邊遠的滿洲，往往正是最優秀的文人才變成了巨商，因為除了軍政機關少數人例外，吉林和黑龍江省的真正文人都是一些被清政府流放的失意官吏。從理論上說，這些以前的官吏喪失了官位和權勢，同老百姓并無二致。但在事實上，他們通過經商，或者就任滿族官員的西席，很快就改善了自己的命運。為滿族官員的孩子授課還帶來別的機會，因為雖遭放逐，那些官員的舊影響還如影隨身，所以滿人的上層社會還引為同類，樂與過從。

滿洲的中上層商人中另一大支是與中國本土的漢人商號一起經營的合伙人，特別是與18世紀時在滿洲的生意日益興隆的著名山西錢莊一起經營的合伙人。他們的經營當然要與流放的過去的官員及當地的漢商（其中有些人也有巨額生意）的企業有聯系。這類巨商在社會上有地位，完全不同于小商小販、手工匠和農民（這些人基本上同普通旗人不分上下，只不過沒有在旗的那種軍事建制上的表面優越地位而已），比他們高得多。

從理論上說，吉林和黑龍江各部首領都擁有清政府授予的特別稱號，他們的社會地位理當非常接近于最高層旗人官員，但在實際上，部落民同滿洲較有文化的居民很少往來，許多部落首領住在北部邊遠地區和瀕海地帶，地理上也是孤立的。他們因公出或經商而進入城市時就顯得粗野和土氣。隨著滿洲的漢民不斷增加和旗人進一步漢化，隨著這個地區越來越發達，部落首領就更加地位低落。當然，普通的部落民比他們首領的漢化程度更淺，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有的采取漢族習俗，有的則越來越孤立于變化中的滿族社會之外。

處于社會底層的是沒有手藝的工人、家仆、妓女和流犯，包括奴隸在內。滿洲，尤其是吉林和黑龍江兩省，被清政府用作流放地，那里不僅流放被貶謫的官員，而且流放判刑的罪犯。犯人罪行越重、態度越頑固，清朝的司法機構就把他們往北發配得越遠。許多犯人后來從事手工業或經營小買賣，竟變成了靠得住的社會成員，但是隨著他們人數越來越多，使得滿洲邊境社會增添了一種一方面無法無天、一方面尚有一定用處的特點。

從1796年起，清政府大大減少了流放滿洲的罪犯，但是由于把一些重犯當作奴隸發配給滿洲旗人干活的做法已經造成許多問題，以致必須進一步采取官方措施。問題的核心在于旗人太窮，無力養活清政府配給他們的那些奴隸，因此，迅速釋放奴隸是符合奴隸主和奴隸雙方利益的。這樣一來，奴隸就可以用錢買得自由。有時奴隸主甚至干脆把他們釋放。這類罪犯的少數人后來回到中國本土，但是大部分仍留在滿洲，加入了那群自由流動的亡命或半亡命之徒的隊伍。以上不論哪種情況都使清政府感到不安；于是它在1810年正式禁止奴隸主允許奴隸贖身，在1813年還一度停止向滿洲發配流犯。為了減輕旗人供養奴隸的負擔，清政府還采取適當步驟，把貧苦旗人的奴隸轉移給更需要家仆、也有能力養活他們的富裕軍官和滿族行政官員。

吉林和黑龍江的大多數地方人跡罕至，但這兩省仍住有大量漢民亡命之徒。他們來到清帝國禁地從事偷獵、挖參和采金，也當土匪。這類非法流民在18世紀迅速增多，在19世紀也還有增無已。其中特別是采金者和土匪，形成了有組織的團體，還有其原始的地方政府。在滿洲當局權力所不及的山林地帶，有一幫所謂“黑人”的非法挖參者經常騷擾邊遠的部落地區，致使吉林將軍在1811年不得不派兵進山把他們趕出來。但是滿洲當局發現，由于交通困難，要想把非法流入的漢民驅出邊境是不容易的。雖然采參是由政府壟斷，分給旗人和漢民承擔，由戶部發給執照，然而省當局卻無力在遙遠的滿洲山林實施政府的禁令。

到19世紀之初，滿洲的漢化已不可逆轉地取得進展。奉天省早已主要成為漢人的地盤和中國的一部分，吉林和黑龍江將軍雖然負責維持旗人在社會上的優越地位，但未能維持住現狀。旗人缺少漢族移民所具有的勤勞和技術，只可守成。他們不像中國本土來的移民那樣致力于成家立業，開發新土地。滿族和部落民的文化傳統也沒有為他們提供任何手段去同遷來的漢人競爭：漢民在數量上逐漸超過他們，比他們勤勞，收買他們的土地。盡管政府三番五次采取措施，旗人還是迅速貧困，越來越依靠清政府的救濟過活。他們當中模仿生氣勃勃的漢族文化榜樣的人越來越多。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旗人，連部落民也開始采納漢族文化，深受漢人的嗜好、集市和行事方式的影響。只有寒冷而又人煙稀少的黑龍江流域還沒有吸引中國本土來的移民，基本上仍舊處于漢族范圍之外。

## 蒙古

蒙古始終是中國典型的邊疆，因為蒙古的游牧民自古以來就幾乎是對于中國農業文明的經常不斷的軍事威脅。但是到10世紀之末，蒙古的游牧生活方式已經完全衰退。昔日游牧民的強盛和獨立已成過去。戰爭一度曾給游牧民帶來榮譽和團結的基礎，這也變成了過去，清朝把內蒙和外蒙的蒙古人——盡管他們的生活是流動的——同中國緊緊連在一起。由于缺乏人口統計資料，只能作一個最粗略的估計，但以下的估計并非臆測：在1800年之際，清帝國全部操蒙古語者可能多達350萬人（不包括旗人），其中多達70萬是在外蒙（大量居住在北部中央地帶），260萬是在內蒙（集中于東部）。其余20萬是在新疆和青海。如果這個估計正確，也許從1 8世紀前半期或更早以前，蒙古人口就已經在逐漸減少。[[11]](#_11_Zhe_Ge_Wen_Ti_Huan_Xu_Yao_Zu)

畜牧是游牧民的傳統生計，蒙古人在這方面已陷于困境，因為他們要經常從西伯利亞輸入牛馬。當然，偶爾輸入牛馬并不表明游牧已長期衰退，因為天災有可能隨時來襲。有時“積雪過多而無法出去放牧，有時降雪不足而不能在干燥的寒冬維持牧場的飲水”。有時過多的牲畜集中于小塊牧地而糟蹋了牧草，使牲畜無草可食；最常見而危害最大的是一陣異常的暖潮過后繼之以突如其來的冷凍，使牧草為薄冰所覆蓋，困于寒冬的牲畜無草可食，幾天之內就可能死亡成千上萬。[[12]](#_12_La_Tie_Mo_Er____Zhong_Fang_M)然而有證據表明，蒙古從西伯利亞輸入牛馬并非在一場不可避免的天災之后為了補充牲畜而偶一為之。[[13]](#_13_Fa_Wu_Si_Te____1727__1805Nia)

無論在內蒙或外蒙，都沒有一個本族的全民族政府。清帝國在內蒙是通過駐扎在其南部和東部邊境的軍事力量實施統治的。這些軍隊緊密地控制著內蒙事務，所以到19世紀內蒙并無實際的自治而言。外蒙也有清軍駐扎，它因遠離中國本土而享有較多的自治，不過清朝在這里的控制也是嚴格的。按照規定，全外蒙是歸只有旗人才能充任的烏里雅蘇臺將軍管轄。但在實際上，到了1800年是由庫倫的大臣總管外蒙東部，即土謝圖汗和車臣汗地區的事務，烏里雅蘇臺將軍則掌管賽因諾顏汗和扎薩克圖汗的領地。外蒙最西部的科布多周圍地區，最初歸屬烏里雅蘇臺，此時則劃為行政特區。清政府是根據《大清會典》及其前身《則例》（1818年以后為《事例》）管理內外蒙古的。只有在內部糾紛方面，外蒙古人（喀爾喀人）才被允許依照傳統的喀爾喀法解決分歧。

蒙古社會主要是由兩個階級組成：貴族和平民。扎薩克（即旗的王公）由貴族產生，是清代為游牧民設置的基本政治單位——旗（和碩）的世襲統治者。旗下劃分“蘇木”（“箭”），六蘇木設一扎蘭（參領）。蒙古諸旗的屬民應與滿、蒙、漢軍旗人嚴加區別，因為后者是支撐清朝的基本力量。“旗人”一詞僅用于稱呼清朝的八旗軍成員，蒙古諸旗的屬民則稱為“旗下屬民”。

每一個蒙古貴族都接受清朝貴族爵位，分成從和碩親王到四等臺吉的十個等級。只有扎薩克即旗的王公才有世俗統治權。為了表示對清朝的臣服關系，扎薩克每年要按規定向皇帝進貢，主要是進獻一定數量的牲畜和畜產。其中最有名的是外蒙古諸汗進獻的“九白”之貢，即八匹白馬和一匹白駱駝，不過到了1800年，“九白”實際上已改用其他物品，諸如毛皮、獸革和精選的家畜。蒙古的進貢者則得到綢緞、布帛、瓷器和金銀作為回賞。這些回贈之物至少與貢品價值相當，因此可以設想，清政府并不認為進貢是對進貢者的一種經濟負擔。[[14]](#_14_Can_Kan_Luo_Bo_Te__Li_De___M)

蒙古的平民（阿拉特）絕大部分是阿勒巴圖（旗下屬民），他們要向清政府和扎薩克納稅和服役。這種稅通常用實物，主要是用牲畜，后來多用銀兩。阿勒巴圖還要交納特種稅，例如每年要交納清帝所需的牲畜、毛皮、氈、帳、珠寶和其他土產；此外還有一些別的攤派，例如1819年嘉慶帝出巡多倫諾爾，喀爾喀人就曾進獻幼畜4萬頭。徭役則包括戍邊、驛役和其他官私差遣。每個旗下屬民都屬于某一旗，未經旗扎薩克許可不得擅自離去。扎薩克斟酌情況，把放牧權分配給其屬民，分配的多寡是根據男丁的人數而不是根據他們需要放牧的數量來進行的。[[15]](#_15_Na_Zha_Ge_Duo_Er_Ji____Meng)所分牧地面積以肥沃程度來定。有時扎薩克為了牟利，竟不顧本旗屬民的牧地不足，非法允許外旗屬民前來放牧。這便迫使本旗屬民侵入鄰旗以謀生。

旗下屬民分為蘇木屬民（蘇木阿勒巴圖）和屬于旗扎薩克及本旗其他貴族的農牧奴（khamjilgha）。從理論上說，前者只要向清廷進貢，向政府納稅和服役，而扎薩克只能靠清政府分給他的農牧奴和俸銀俸緞過活。但是到19世紀，蘇木阿勒巴圖與農牧奴變得界線不清了。雖然法律禁止，扎薩克還是經常篡改簿籍，或者用較窮的農牧奴交換較富的蘇木屬民，或者勒索蘇木屬民以供自己揮霍。社會上還有另一類人為宗教仆役，即所謂沙比，其原意為“弟子”，但他們不是佛門弟子，而純粹是仆人。他們是屬于寺院或某些活佛（呼畢勒罕）的免稅奴；扎薩克有權把自己管轄下的平民戶撥給寺院或活佛充當沙比。這些平民戶充當沙比以后，即不再屬于原在之旗，他們的勞動及其產品則用于供養寺院或活佛。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是奴隸，其中大多數是政府判刑的罪犯。這種奴隸不是永久的，也不是世襲的社會階層。

除了草原比不上中國本土的工業和技術以外，還有三大因素促使蒙古游牧部落一度稱雄的軍事力量中落，使游牧經濟走向衰退。第一就是分旗制度，滿人用這種方法劃分蒙古，割斷了諸部之間的傳統聯系。各旗的牧地都有嚴格的限制，不像清代以前的蒙古那樣可以比較自由地放牧（這在經濟上也能高產），從而使得沒有一個王公能夠擴張而取得優勢。更重要的是，那些從前從屬于一位首領的諸大部落，現在被劃分為幾個旗，每旗各有在本旗享有自治權的扎薩克，他們各自直接向清政府負責。

原有的艾馬克——或部落領地，僅僅留下一點痕跡，取而代之的是滿人建立的盟；盟受清政府的嚴密控制，每三年聚會一次，除了調解各旗間的糾紛以外，別無更多權力。在外蒙喀爾喀人中，諸如車臣汗、土謝圖汗、賽因諾顏汗和扎薩克圖汗的后裔雖仍有汗號，且其品位在清代貴族等級中高于和碩親王（“汗”在滿語中指皇帝），但就政治權力而言，他們也不比那些著名的旗王公大多少。他們的領地名存實亡，因為滿人已經將它們改變為盟，它們以三年一次盟會的所在地命名。除外蒙四盟和內蒙六盟外，還有一些大區，如達里杭愛、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旗、阿拉善地區、科布多邊境和沿中俄邊境的巡哨區等；清政府對這些地區的控制是更嚴更直接的。在青海，蒙古人（主要是屬于和碩特部的厄魯特人，還有喀爾喀人的一個蘇木）組成一盟，擁有29旗，由駐西寧的將軍管轄。

旗王公或盟長犯事，清政府則予以奪職削爵而不論其血統多么高貴。例如在1800年，清政府即曾革退車臣汗桑齋多爾濟的盟長職務，盡管他是成吉思汗之后裔，并剝奪他本人及其子孫的汗稱號。成吉思汗家系的成員也通過結親與清王朝聯系在一起，滿人總是小心翼翼地讓這些王公感到他們在清帝國占有特殊地位：清廷曾將他們擢升為清朝貴族，并使他們意識到，他們作為最早的軍事盟友，地位高于被征服的中國官僚。但是到了1800年，清王朝久已接受漢族的文化價值和標準，蒙古人顯然不是盟友而是臣屬了。

第二個使稱雄一時的蒙古人馴服的因素是西藏的黃教，即格魯派。對于內蒙來說，住在北京的活佛章嘉呼圖克圖是清廷支持的集權寺院體系的首領，也是內蒙最重要的宗教領袖。他屬下的寺院和喇嘛免稅免役，還享有許多特權。內蒙也有不屬于章嘉呼圖克圖為首的北京系統的寺院。它們雖無皇家寺院那樣的法律地位，不過清朝官員、扎薩克和老百姓也習慣地給予他們許多同樣的特權。基本上每個活佛都各有寺院。只有一個特別的例外是多倫諾爾的大寺，這里是章嘉呼圖克圖和其他十二位活佛的卓錫之所。[[16]](#_16_Qiao_Ben_Guang_Bao____Meng_G)

外蒙人的宗教領袖是庫倫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他是一位有很高聲望的活佛，在蒙古人心目中居黃教第三位，僅次于西藏的達賴和班禪。清政府極力阻止蒙古發展一個統一的宗教，免使蒙古社會借此重新統一，因此有意扶植章嘉呼圖克圖來抵消哲布尊丹巴的影響，并且精心地策劃在蒙古保持達賴喇嘛與這兩位蒙古活佛之間的權力平衡。為了防止世俗貴族同喇嘛教結盟而造成蒙古社會團結的危險后果，清政府還不許從貴族之家尋覓轉世活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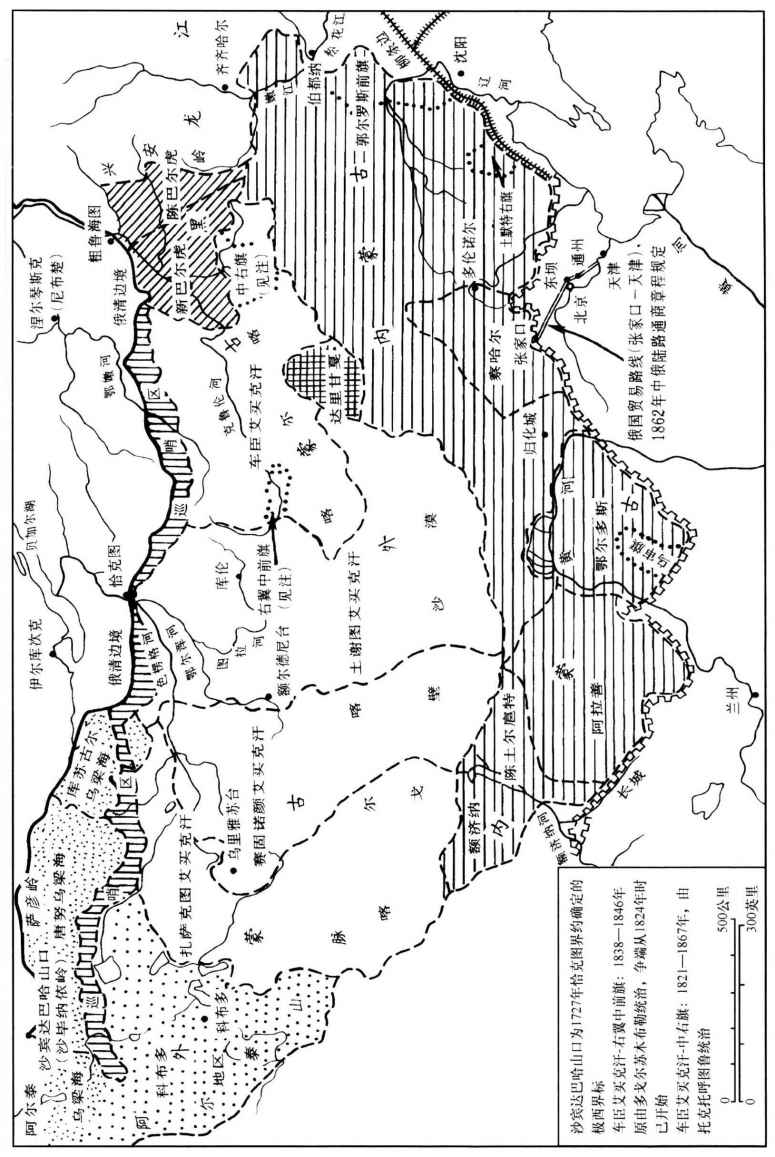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清政府又想把蒙古同清帝國結合在一起，因此在蒙古宗教感情許可的限度內，采取一種使喇嘛教與漢族宗教觀念相融合的政策。例如，第二代章嘉呼圖克圖（1717—1786年）就曾受到鼓勵用藏、滿、蒙三種文字編寫禱詞，把漢族的關帝君同黃教三大神相扯在一起。在18世紀之末，清朝還資助在滿洲和亞洲腹地周邊各省建造關帝廟，作為旗人官員的監護神。關帝被視為與毗沙門天相同，而毗沙門天則長期以來被視為西藏和蒙古的民間英雄格薩爾汗的化身。漢人流傳的有關關帝的種種讖言，也開始被譯成蒙文，進一步推進了清朝的宗教融合政策。在19世紀下半期，清朝支持的蒙古僧侶干脆就把關帝一格薩爾汗奉為佛教的守護神。[[17]](#_17_Jian_Hai_Xi_Ge___Meng_Gu_De)

寺院和活佛本人愈來愈靠日益增多的沙比——即扎薩克賞賜的農牧奴——的供養。扎薩克還為牧放寺院牲畜提供大片牧地，喇嘛們則經常向旗下屬民勒索貢品。普通牧民不敢拒絕；每逢舉行宗教儀式，寺院還要揮霍大筆資財，如用黃油塑造佛像等，窮人則忍饑挨餓。到19世紀之初，外蒙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得到大量的沙比和牧地，致使他的財產要由沙比專衙管理，實際上已形成了一個獨立的艾馬克。其實清政府在1822年就已把沙比衙署的商卓特巴（司庫喇嘛）提到相當于盟長的地位，以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由于政府對寺院及其沙比免稅，便大大加重了旗下屬民的賦稅負擔。與此同時，寺院還利用其財產從事各種商業交易，其中獲利最多的是放貸。

在蒙古人看來，佛教及其教義是與成吉思汗以來蒙古古老的世俗文化及其傳統的領導力量相抵觸的。所以有些陳巴爾虎的蒙古人仍然信仰薩滿教，而且直到18世紀之末薩滿教在俄境布里亞特蒙古人當中還有強烈的影響。直到19世紀頭幾十年，布里亞特人的薩滿教用具與衣著才被搜出焚毀。另外，蒙古佛教的兼容并包傾向使得許多薩滿教的傳統也能披上佛教外衣而殘存下來，但是，薩滿教作為蒙古社會一支不可輕視的力量則已成為過去。在整個18和19世紀，許愿當喇嘛的蒙古優秀青年越來越多。但是他們并非全都脫離畜牧勞動而住進寺廟。約有2/3的喇嘛留在旗內；一個喇嘛兼做世俗貴族的農牧奴倒沒有什么不合適的。[[18]](#_18_Can_Kan_Bao_Deng___Yi_Jian_1)然而，進入寺院的年輕人確實越來越多，結果越來越多的蒙古牧場和牧產被用來支付寺廟繁文縟節的開支，而不是用于供養人民。

雖然人口不斷減少，寺院卻不斷增加。到20世紀初，內蒙寺廟之數或已逾千，外蒙的寺廟也有約750處，而且兩地還有大量的小廟。估計內蒙竟有30%—65%的男子出家（至少平均每家一個兒子），外蒙在1918年出家者占男人的45%左右。同西藏相比，19世紀末期的西藏估計也只有1/3的成年男子當喇嘛。[[19]](#_19_Mi_Le____Nei_Meng_Gu_De_Si_Y)這些估計同1800年的蒙古形勢有何聯系，還不得而知，不過很可能的是，僧侶的人數和寺院的數量在19世紀都增加了。

到了1800年，寺院及其庇護下的商業活動也促成了社會另一方面的發展，即發展了城市中心，它們最初是在內蒙發展，后來逐漸擴大到外蒙。在大寺廟的附近，尤其是在庫倫——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駐地，集市發展成為喇嘛、漢商、手工匠和窮苦流浪漢云集的城鎮。在庫倫、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等外蒙的要鎮，戍守的清軍也是促使城市化發展的另一因素。



地圖3 19世紀60年代的蒙古

第三個促使蒙古社會經濟衰退的因素乃是第二個因素作用的延伸。建造寺廟為漢商的滲入蒙古開辟了道路。在早期，蒙古人是在草原邊境用牲畜和畜產品交換他們所需要的中國等地的物產。另外，他們也隨貢使前往中國京城進行貿易，或者同帶著商隊從中亞前來草原的少量穆斯林商人進行物物交換。除了這些中亞商人的輸出、入貿易外，蒙古人內部的商業規模很小，只有相當有限的非市場交換，也沒有一個蒙族商人階級。蒙古人同俄國人也做些買賣，合法的地點是在恰克圖，非法的地點是在俄蒙邊境的其他地方；1728年的中俄恰克圖條約一個主要的后果，就是把對俄貿易轉到了漢商之手。

寺廟大大有助于漢商建立對整個蒙古商業的控制。從前除了牧民的營帳以外別無所有的廣大草原，后來建起了擁有圍墻的寺院，變成了市場和貨棧，使漢商得以直接進入草原。這并不意味著中蒙邊境的貿易不再存在，因為在有清一代，漢人商號在邊境市鎮，特別是張家口，都在不斷增加。[[20]](#_20_Tian_Shan_Mao____Qing_Dai_De)但是漢商主要是北京幫和山西幫，他們帶著貨物安全地進入蒙古腹地，引起了人們對中國商品的喜愛，打開了銷路。過去被牧民視為奢侈品的東西，如茶、煙、雜品等等，蒙古人也認為是必需品了。中國的奢侈品一直是表示游牧貴族富有的象征，但是隨著寺院勢力的增長，喇嘛也開始追求各種奢侈品，不斷向人民榨取供奉來購買。這便引起廣大民眾的不滿。在18世紀之末和19世紀，許多地方，尤其是在土謝圖汗和車臣汗的領地，發生了排斥漢商的騷亂。暴徒經常痛打漢商，劫掠商店，銷毀賬簿。[[21]](#_21_Jian___Meng_Gu_Ren_Min_Gong)漢商也經常激起寺廟和世俗人的憤怒，不過權衡得失，寺院所起的作用還是支持漢商貿易的。

在18世紀，清朝的政策是保持蒙古人作為后備軍事力量。鑒于漢商滲入蒙古有損于這一目的，清廷曾想方設法限制漢商活動，尤其是在外蒙，但并無成效。清政府要求在蒙古的漢商每年都換領一次執照；禁止他們娶蒙族婦女；禁止他們在蒙古人的帳篷中過夜；除特殊情況外，不許建造永久性房屋。由于漢商不遵守這些限制，清政府便力圖將無照商人逐出蒙古，如在1805年就曾這樣做過，但這些措施收效甚微。對擁有蒙古債戶的商人，必須讓他們繼續逗留到收清債款。但是蒙古人不僅不能清償債務，而且還得繼續舉債；這樣一來，漢商就能留在蒙古照舊經商了。清政府本身也越來越依靠漢商交付的執照費，以維持它在蒙古的行政機構。總之，清政府逐漸轉向采取支持在草原的漢商的政策。

蒙古人的畜產品是有季節性的，需要盡快出賣，他們的需求品則有連續性。因此，漢商得以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并且投放貸款。結果是蒙古人普遍舉債，蒙古的財富就這樣源源流入漢商之手。漢人的商號也像錢莊一樣，向那些未經世故的蒙古人放高利貸。甚至整個旗都被抵押給了這些商號；到19世紀時漢人高利貸者生意興隆。隨著蒙古人債臺高筑，利息也暴漲。扎薩克、喇嘛和商人一起共同提倡賒購辦法，當扎薩克本人也因欠債過多而無力清償時，就非法地將征稅事務直接交給漢人商號，從而使那些商號和私商開始“擁有”蒙古阿拉特（平民）。把勞役和實物稅折成貨幣稅后，更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嚴重局勢。在18世紀蒙古已經開始轉向貨幣經濟的發展，到19世紀時銀兩已普遍成為必需的支付手段。寺廟也堅持要其所屬沙比交付銀兩。與此同時，銀價不斷提高，而沙比必須向寺院支付的和旗下屬民必須向旗王公支付的所有這些定額銀兩，就使他們不堪負擔了。這種嚴酷的經濟局面，再加上王公向屬民增收賦稅以清償所欠漢商的債務，便逐步導致蒙古民窮財盡。

雖然貿易和借款大部分控制在漢人手中，但是也有旗王公同漢商合作的情況，并且也有旗王公和喇嘛變成漢人商號和錢莊的股東。不管是有意或無意，王公、寺院和漢商的攜手合作終于摧毀了蒙古傳統游牧社會的殘余。與此同時，在草原的邊緣開始了另一個具有更深遠意義的轉變：漢族移民在那些過去是牧場土地的周邊從事耕種。

## 新疆

天山山脈的山脊把天山兩邊隔成兩個不同的地區。天山南部的東突厥斯坦是農業區，天山北部的準噶爾是草原世界。在18世紀50年代，乾隆帝的軍隊征服了天山南北，占據了這塊當時在亞洲腹地要算人種最復雜的領土。他們稱準噶爾為天山北路，稱東突厥斯坦為天山南路。清軍把這兩個地區當作清帝國的屬地予以管轄，統稱之為新疆，意為甘肅的“新疆域”。這里盛產玉、金、銅和棉花，富于耕地和牧草。政治動亂也發生頻繁。

同以前的準噶爾人一樣，滿人也把他們的行政中心設在伊犁。他們將以前的準噶爾部首府——哈薩克人和其他穆斯林稱為固勒扎——改稱為寧遠，并且在其以西另建一座新城，即惠遠。哈薩克人稱此新城為新固勒扎或小固勒扎，1762年清朝即置將軍于此。寧遠被稱為老固勒扎，繼續作為源源前來伊犁的穆斯林移民的經濟文化中心。在18世紀，清政府還在伊犁地區建立了另外七座城市。但不出所料，發展最快的是將軍衙門所在的新固勒扎。

新疆的全部行政機構實質上是一支由將軍統率的巨大戍軍部隊。從理論上講，他還對洛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爾、巴達赫尚、阿富汗和乾竺特等外部地區實行“羈縻”政策。他對準噶爾的厄魯特（加爾梅克人）各旗，對柯勒克孜和哈薩克各部、對平民移民地、對哈密和吐魯番王公領地以及對所有六城等，都有行政管轄權。但是，清政府的政策是盡量不插手當地民族的內部事務。在新疆的官員“既不尊重也不熟悉治下諸民族的語言和習慣”。[[22]](#_22_Luo_Sa_Bi____1368Nian_Qi_Jin)

清政府還在烏魯木齊（迪化）設置都統協助伊犁將軍，前者負責管理天山北部和維吾爾斯坦（哈密和吐魯番）的官員。新疆駐軍還分別在伊犁的新固勒扎和新疆西北部的塔爾巴哈臺（楚呼楚）設參贊大臣；在喀什噶爾也設參贊大臣，東突厥斯坦人稱之為“汗昂邦”，他負責管理六城的官員（從字面上講，“六城”即除哈密和吐魯番在外的東突厥斯坦）。將軍一職和各地高級官員均由旗人擔任。駐軍總數在1萬到2.3萬人之間，主要是來自熱河和中國本土的旗人，但也有游牧民（內蒙察哈爾人和降清的厄魯特殘部，有些是熱河牧民，以及從伏爾加河歸來的沙比）、滿洲諸部（來自奉天省的錫伯人、來自黑龍江省的索倫和達斡爾人），以及甘肅和陜西的綠營漢軍。他們作為無限期的占領軍攜家帶口而來，實際上乃是永遠留駐新疆的移民。

這些軍隊分駐南、北、東三區戍守。北區由伊犁將軍直接管轄，兵員1.3萬多人，是最大的一個區。到19世紀之初，北區達9.8萬余人，包括附屬人員在內。北區駐軍主干（實際上也是全疆駐軍主干）是駐在新固勒扎的主力旗兵；還有一支龐大的旗兵歸惠寧領隊大臣統轄，附近則是錫伯、索倫、察哈爾和厄魯特四營，各有其領隊大臣；此外還有沙比營、達斡爾營和從綠營來的漢族軍事移民。察哈爾營和厄魯特營主要從事放牧，向駐軍供應馬匹以及其他作戰、運輸和食用牲畜。

東區由駐烏魯木齊的都統管轄，有兵員5000人到6000人，絕大部分是旗人。其中駐奇臺（古城）1000人、駐巴里坤（鎮西）1000人，此外還有數量不斷增加的綠營兵。

南區不同于東區和北區，沒有常駐軍，大部分駐軍是來自其他兩區的換防兵。他們五年（最初為三年）一換，不得攜眷前往。旗人和綠營兵駐守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沙爾和烏什吐魯番。來自天山北部的綠營兵則駐守焉耆、庫車、賽里木、阿克蘇、和闐等地。陜甘總督派來新疆的其他綠營兵則駐守哈密和巴里坤。總計在南部的清駐防軍約在6000人左右。此外，喀什噶爾還有一支由500名東突厥斯坦士兵組成的小部隊，他們由本族一名總管和六名屬官率領。當地居民也執行站崗放哨等半軍事性勤務。

在剛進入19世紀時，即當浩罕崛起為地區性強國和英俄勢力滲入清代中亞的前夕，清政府似乎把外有天山和帕米爾作為屏障的東突厥斯坦視為政治和軍事上的死胡同。因此，清政府集中注意于防衛和開發天山北路，把六城視為維持軍隊的大稅源。

在新疆駐軍乃是耗資巨大之舉，僅士兵每年薪餉一項就要耗費白銀約300萬兩，而當地每年稅收遠不及此數。向六城居民每年征收的稅銀和生銅僅達1350萬蒲爾（指六城銅幣），但此數不包括外貿關稅和其他雜稅在內。根據1801年的銅銀兌換比價（220個蒲爾等于1兩白銀），這筆收入還不到6.2萬兩。[[23]](#_23_Zhong_Wen_Ban_Bian_Zhe_An__Y)政府每年征收的谷物總計達64.9萬擔，主要來自準噶爾地區。即使算上一切貨幣和實物的附加稅收，包括政府經營的銅礦和牧場的收入，新疆也是自力難支的。到1800年，駐軍的官倉是滿的（伊犁糧倉儲備有50多萬擔小麥，這是政府的唯一儲備糧[[24]](#_24_Can_Jian_A_He_Mai_De__Sha__N)），但是每年為維持新疆的耗費得從中國本土提解白銀120萬兩。

新疆貨幣有兩個分割的流通區。第一個流通區是在準噶爾和維吾爾斯坦，遠至西部的喀喇沙爾（焉耆），貨幣用白銀，按重量計值，一如這些銀兩的來源地中國本土那樣。但是，早在1814年，北京政府就已開始努力減少向新疆輸出白銀。伊犁也鑄造中國的標準合金銅幣（制錢）。第二個流通區是在六城，它的貨幣制度為銅本位，但不是使用伊犁銅幣，因為整個新疆鑄造銅幣沒有標準化。六城貨幣的基本單位是蒲爾，這是一種純紅銅錢幣，漢語稱之為“紅錢”。幣面像中國本土的錢幣，鑄幣地則鑄以阿拉伯文和滿文，50蒲爾合1個坦伽。在1800年，六城僅有一家造幣廠在阿克蘇，六城以外地區則不流通蒲爾。六城以內沒有金幣或銀幣。不過，半錠和1/4錠的銀元寶以及少量甚至很普通的碎銀也在市面流通，按重計值。

阿克蘇造幣廠年產2.6萬吊（每吊1000蒲爾）。伊犁造幣廠平均年產量為1722吊（每吊1000文）。兩家造幣廠每年各鑄幣兩次，一在春季，一在秋季。阿克蘇蒲爾錢和伊犁制錢重量一樣，均為一錢二分，但是蒲爾錢為純銅，1蒲爾錢值伊犁錢五文。大部分生銅，尤其是阿克蘇造幣廠用銅，都是來自渾巴什的官辦銅礦，那里由清軍工兵開采，年產銅2.1萬英鎊（16200斤）以上。由于當地產銅，而白銀必須從外地輸入，銅的價值與白銀相比就日益低落。

### 準噶爾

從文化和歷史方面來說，天山北路的牧區乃是蒙古地方的展延。統治游牧民的世襲扎薩克處于伊犁、庫爾喀喇烏蘇（烏蘇）、塔爾巴哈臺和焉耆的清軍官員的嚴密監視之下。來自伏爾加河的加爾梅克人的兩個盟也在準噶爾放牧。烏納恩素珠克圖盟由舊土爾扈特十旗組成，分四路安置：北三旗在塔爾巴哈臺，西路一旗在精河附近（艾比湖南部），東二旗在庫爾喀喇烏蘇，南四旗在喀喇沙爾西北、裕勒都斯河地區的天山南麓。青色特啟勒圖盟由和碩特四旗組成，放牧在裕勒都斯地區的南路舊土爾扈特附近。土爾扈特和和碩特部除免交牲畜稅以外，其他如行政管理、進貢納稅和社會組織等都與內、外蒙古各盟相同。伏爾加河來的加爾梅克人也同其他蒙古人一樣，信仰西藏黃教，因此黃教在北疆的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響。清廷作為黃教的保護者，也同支持蒙古各地的黃教寺院一樣，向準噶爾的黃教寺廟作布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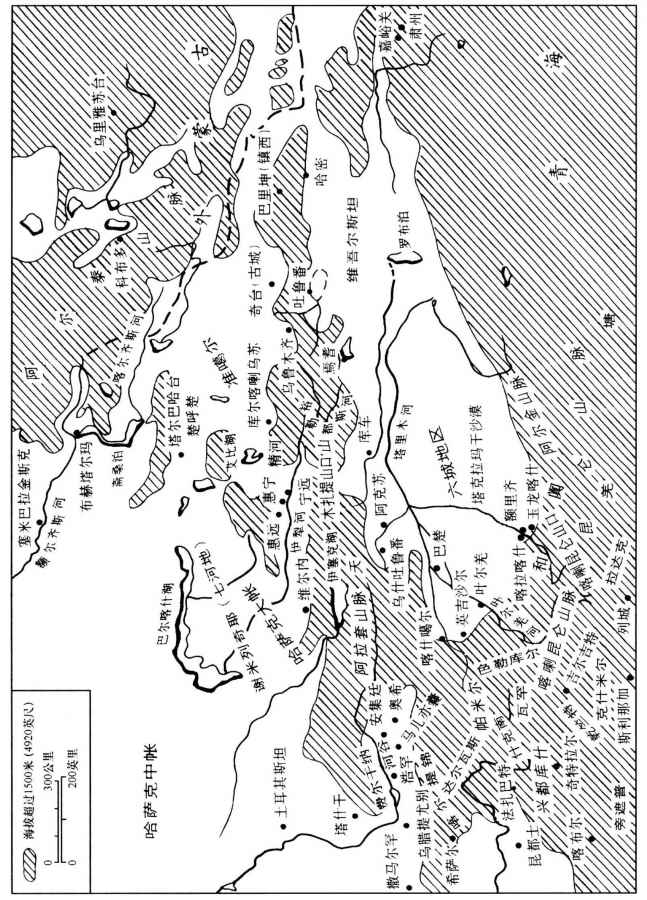
在邊卡以西的各部地區和清帝國邊境以外的草原地區，操突厥語的穆斯林游牧民（哈薩克人）可以隨意放牧，事實上不受當局干涉。他們被視為外國納貢者，每三年可到北京進貢一次，擁有同清政府進行雙向貿易的壟斷權：按官方規定，當局壟斷著對哈薩克人的貿易，從理論上講，準噶爾官員不許其他外國人在北疆經商。清廷與哈薩克之間這種以物易物的官方貿易，僅限于伊犁和塔爾巴哈臺。哈薩克按規定價格用牲畜（主要是馬）交換衣物（主要是絲綢），因為察哈爾部和厄魯特部的養馬不能滿足軍隊的需要。然而哈薩克人還利用其進貢權另外私自進行交易。當局雖然向東突厥斯坦駐軍供應哈薩克馬，卻不允許哈薩克人到東突厥斯坦出賣牲畜，東突厥斯坦人也被禁止前往哈薩克牧地購買牲畜。1808年曾有一些哈薩克人前往喀什噶爾出賣牲畜，當地官員便狠狠殺價，使哈薩克人只好帶著牲口失望而返。在準噶爾和蒙古，政府當局限制稍寬。有時哈薩克商隊以各種借口繞過政府限制，不時前往烏魯木齊、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烏梁海地區和喀什噶爾。但是，清政府嚴禁向哈薩克、柯勒克孜和其他中亞商人出賣金屬制品。

哈薩克人作為進貢者，是允許在清帝國邊境之內放牧的。如遇暴風雪，清政府甚至讓他們進入邊卡區度冬，只征收百分之一的馬匹作為報償。新疆當局每年都派員前往草原向他們征稅。由于哈薩克是外國人，清政府就沒有在他們中間任命扎薩克，也不打算把他們劃分為旗。在清帝國境內放牧的哈薩克人可以隨意來，雖然哈薩克的首領們享有作為清朝進貢者的好處，但他們大多數人同時也承認自己是俄國的依附者。

對哈薩克的內部組織，清政府的了解是模糊的，這是因為在18世紀，中帳首領阿布賚既是中帳的汗，也統治大帳。在18世紀50年代，清朝當局大概是按照準噶爾或哈薩克當時的分法把哈薩克人劃分為兩部：由阿布賚領導的極東部中帳和大帳稱為左部；其余部分由阿布賚·穆罕默德領導的西部中帳哈薩克人稱為右部。[[25]](#_25_Zuo_Kou_Tou_Zai___18He_19Shi)后來發現極西部還有小帳，他們又劃出第三類而稱之為西部。這種劃分反映了18世紀后期哈薩克草原的實際政治現實，不過，清政府雖然知道哈薩克有三帳，卻有張冠李戴之失。1782年出版的第一部官方新疆地方志正確地把左部同阿布賚和中帳聯系在一起，右部卻被編者誤認為小帳和大帳，還說中帳首領阿布賚·法伊德（阿布賚·穆罕默德之子、阿布賚的對手）是大帳的汗。[[26]](#_26_Jian_Fu_Heng_Deng_Bian___Qin)1821年官方出版的《新疆識略》，部分地更正了這些錯誤。[[27]](#_27_Mian_Xin_Deng_Bian____Qin_Di)但是，史學家和政論家魏源遲至1842年仍把小帳和大帳視為右部。[[28]](#_28_Wei_Yuan____Sheng_Wu_Ji____J)顯然，19世紀之初清政府對哈薩克人的“羈縻”政策是極為松散的。

另一支在新疆西部邊境說突厥語的穆斯林游牧民是柯勒克孜人。清代史料稱他們為布魯特（柯勒克孜人并不使用這個名稱），俄國人則稱他們為石山野人、石山里人或石山人（由于他們是住在難以攀登的山區里），或稱喀喇（黑）柯勒克孜人（因為與哈薩克人不同，他們的統治者不是王族，即非成吉思汗的子孫）。19世紀的俄國需要使用這些稱呼來區別柯勒克孜人和哈薩克人：俄國人稱兩者為柯勒克孜—哈薩克人、柯勒克孜—凱薩克人、凱薩克人或徑稱柯勒克孜人，以區別于俄國本土的哥薩克人。

清朝政府把柯勒克孜人分為兩部：東部在天山之西，西部在帕米爾。但這種劃分對柯勒克孜人的自我看法沒有什么關系。[[29]](#_29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事實上，他們分成許多單個的小部從事游牧，沒有什么政治總體，在情況需要時，他們隨遇而安，可以自稱是浩罕，或巴達赫尚，或喀爾提錦（希薩爾的東布哈拉省），或清帝國的臣民。在清廷看來，他們是貢民，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帝國的臣民。他們被要求每年進貢馬匹，獲準在新疆（遠至東部阿克蘇之地）放牧；還可以在喀什噶爾進行貿易，即在這里購買棉布和其他產品，而以出賣牲畜為主。他們支付的牲畜稅是每三十納一。至于其他貨物，標準的稅率是貨價的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但是在實際上，這些人幾乎完全不受法律的約束，清政府也不曾打算限制他們的進出國境。



地圖4 1800年前后至1860年前后的新疆

準噶爾除了牧場以外，還有適于農耕的大片土地；所以，清政府曾將大量東突厥斯坦人的家庭遷至舊固勒扎地區（被稱為回屯）生產糧食以充軍政之需。這些人被稱為塔蘭奇人，到1800年之際已達3.4萬之多。清朝還派遣漢族綠營兵、錫伯、索倫和察哈爾兵攜眷屯居于天山北部而組成非旗人的永久性兵屯，他們每年向新疆駐軍交納一定數額的收成。不過在18世紀之末，這些兵屯的生產力顯然不高；因此當局在1802年又在伊犁河北岸新固勒扎以東開鑿了一條大型灌溉渠，創建了旗屯。盡管清政府對需要使用這些旗人農民干什么還拿不定主意，最終還是寧愿把他們訓練為士兵，而允許他們將土地租給佃農，通常是租給塔蘭奇人。政府當局曾不斷完善灌溉系統，因此伊犁的農業地區得到不斷發展。

從長遠意義說，更重要的是政府決定從中國本土將普通漢人和中國穆斯林舉家移居到北疆，這一政策是清廷在滿洲北部未曾采取，而在蒙古地區當局也只是后來才被迫予以默認的。征服新疆以后不久，清政府就鼓勵從中國本土移民定居于天山北部，把大片大片不用的牧場變為戶屯。到19世紀之初，定居北疆的中國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漢民即達數十萬人，他們主要是在巴里坤、吐魯番和烏魯木齊等地。像在滿洲一樣，清政府也把罪犯流放到準噶爾來耕種流犯墾地（即犯屯，或遣屯）。到1777年，天山北部約有10750戶綠營兵和將近500戶流犯和配軍，他們耕種著總面積約22.73萬畝的土地。在天山南部，主要是在哈密和吐魯番，也有一些屯墾地，但其總面積不到上述數目的1/3。

在18世紀的最后幾年，屯田的綠營兵并沒有大增，流犯的人數也從未超過2000，這是因為政府在1804年開始取消了犯屯。但是，由于被政府給每戶提供30畝土地的措施所吸引，戶屯的人數則大大增加。在1775年，戶屯數目不足17200戶，約72000人，主要是在烏魯木齊一帶，開墾的土地總面積將近280253畝。到1800年，操漢語的人口肯定已翻了幾番，因為在1808年，烏魯木齊各縣的民戶農田數量已是1775年的10倍。[[30]](#_30_Ceng_Wen_Wu____Zhong_Guo_Jin)伊犁的墾地和客戶也增多了，到19世紀新來的移民已有在庫爾喀喇烏蘇和精河定居者。他們取得了土地，像在中國本土一樣納稅服役。清政府也允許工匠和商人攜家從中國本土移居北疆，準許他們在北疆和哈密地區做買賣。

準噶爾地區最寶貴的資源就是這里的地下礦藏。在1801年，清帝由于擔心淘金熱會從中國本土引來大批人口而造成政治麻煩，降旨禁止在準噶爾開采貴金屬，但是，黃金和煉礦卻由政府管制，交私商開采。計有金礦14座，雇工1223人，每人每月向政府交黃金三分。這樣，政府每月的黃金收入就有36.69兩。鐵礦和錫礦（主要用于造子彈）也曾開采；在19世紀頭10年，準噶爾的銅礦也開始被采掘，主要是供伊犁鑄幣廠使用。

伊犁的農業人口在行政上由駐新疆的將軍管轄，但是駐烏魯木齊都統管轄的東部地區的漢族農民、工匠、商人和礦工，歸甘肅省政府節制。治理他們的是駐在烏魯木齊的鎮西（巴里坤）和迪化（烏魯木齊）道臺，他負責三個行政分轄區的軍政事務：鎮西府、迪化獨立州和吐魯番廳。

來自陜西、甘肅和四川的中國穆斯林被東突厥斯坦人稱為東干人，他們占操漢語的移民之絕大部分，僅在新固勒扎一地就有1500戶。東干人是遜尼派（正統的穆斯林），他們有些法官是屬于哈乃菲法學派，有些是屬于沙菲伊法學派。蘇菲教團（神秘兄弟會）也在他們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有納赫什班迪派的“老教”或“舊教”（庫菲亞，即“靜默”兄弟會），他們同18世紀早期的傳道者馬來遲有關系；還有馬明心（1781年去世）的新教，這是納赫什班迪派的另一支，人稱札里亞派，即“口傳”兄弟會。東干人讀阿拉伯文禱告書，用漢語傳教和解說。他們過著嚴格的生活：剃須、戒煙酒、不食豬肉。他們逐漸離開鎮西、迪化和吐魯番屯區，不久就在伊犁和塔爾巴哈臺成為主要的居民。盡管清政府禁止向東突厥斯坦移民，他們還是有許多人來到天山南部的綠洲，在那里開飯館和販茶葉為生。

不過，東干人的穿著同漢人一樣，很不容易同東突厥斯坦人和其他中亞穆斯林相混淆，因為后者都把東干人看成異己和入侵者，容易把東干人看成一般漢人。然而，不論東干人走到哪里，他們的經商才能及其處于漢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之間的中介地位，使得他們在商業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所有非穆斯林的漢人實際上都是陜西人或甘肅人，大多數屬于綠營兵。其他漢人則是書吏、商人、工匠，當然還有農民。因為東干人操漢語，所以他們能與那些人打交道，這就使他們得以接近政府的低級官員，并能加強他們自己同熟練的漢族工匠和中國本土商號的聯系。東干族男子通常也娶漢族婦女。因此，通過婚姻紐帶進一步擴大了商業聯系，并且通過用伊斯蘭宗教灌輸子女而擴大了穆斯林團體。又因為許多東干人會講一點韃靼語，所以他們也能在伊犁和塔爾巴哈臺同哈薩克人做買賣中沾光。當地戍軍看中東干人不貪污受賄，便寧愿使用東干人而不用其他少數民族成員充任警察。隨著時間的推移，東干人的人口、經濟勢力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影響也不斷地增長。[[31]](#_31_Jian_Wa_Li_Ha_Nuo_Fu___Quan)

### 東突厥斯坦

東突厥斯坦，即小布哈拉，位于天山之南，由東北區和西南區兩部分組成。東北區舊稱維吾爾斯坦，西南區即塔里木盆地，比東北區大得多，稱為六城或喀什噶里亞；有時六城或喀什噶里亞之稱也表示整個東突厥斯坦。在維吾爾斯坦和六城兩地區，居民幾乎全部操突厥語。只有少數人還懂得塔吉克語這種中亞形式的新波斯語，而到19世紀，懂塔吉克語的人就更少了。[[32]](#_32_Wo_Sen____Zhong_Guo_Da__Da_L)在宗教方面，東突厥斯坦人是遜尼派穆斯林，奉哈乃菲派法律。他們雖然不無自己的文化特點，但仍是中亞突厥—伊朗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不算外國人和外國人娶當地婦女所生的子女，這里土生土長的人口大概不到30萬，其中70%以上住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即喀什噶爾地區，東部的維吾爾斯坦人口僅約占此數的1/10。[[33]](#_33_Zuo_Kou_Tou____Dong_Tu_Jue_S)從1759年至1820年清朝進行征服期間，東突厥斯坦的人口和耕地似已增加一倍。

作為一個整體，東突厥斯坦人除了耶里克（意即“本地的”）以外沒有一個共同的族稱。他們分別用所在綠洲的名稱來稱呼。在喀什噶爾的本地人自稱喀什噶爾人，在吐魯番者自稱吐魯番人，余類推。甚至外國穆斯林也不把東突厥斯坦人視為單獨的人種集團，例如19世紀頭25年內曾在新疆經商的西伯利亞韃靼商人穆爾塔德—法伊德·阿丁·瑪爾真就曾混淆東突厥斯坦人和西突厥斯坦人，而統稱之為“烏茲別克人”。[[34]](#_34_Jian_Nie_Bo_Er_Xin___E_Guo_D)

但是，也有幾個人種集團不同于綠洲操突厥語的一般居民，例如焉耆、庫車、阿克蘇、烏什吐魯番和葉爾羌等地區的刀朗（多蘭）人。他們講突厥語帶有自己的口音，他們的婦女則像柯勒克孜人用白巾裹頭。在阿克蘇和烏什吐魯番地區，他們飼養那種厄魯特人普遍飼養的羊，還為新疆駐軍管理驛站。烏什吐魯番地區還有一種牛蓋特人，顯然是柯勒克孜人血統。他們夏居氈帳，冬返定居點，依靠飼養牲畜為生，專司為清政府掃除木扎提山口的冰雪。英吉沙爾和葉爾羌兩地之間的居民中，也有這種夏居帳篷冬返村居的人群。[[35]](#_35_Mi_Er__Yi_Zha_Te__A_La____18)羅布泊地區的定居者多少不同于其他東突厥斯坦人，他們可能并不都是穆斯林。[[36]](#_36_Jian_Wa_Li_Ha_Nuo_Fu___Quan)在1800年，除了少數例外，烏什吐魯番的居民似乎不是當地土著，他們的父祖是大約30年前被清政府從塔里木盆地各地遷來這里的。遠至東部的甘肅肅州還通行突厥語；過了肅州，中亞商人就需要會講漢語的譯人了。[[37]](#_37_Jian_Mi_Er__Yi_Zha_Te__A_La)

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主要是在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一帶，有一大批外國商人，其中包括一些與外商有聯系的工匠和越來越多的混血兒。清政府曾于1795年禁止外國人娶當地婦女為妻，但這禁令難以貫徹，天長日久，外國穆斯林（主要是浩罕屬民）與喀什噶爾婦女成婚者越來越多。他們的子女被稱為察爾虎特，盡管其語言、住地和文化不同，但仍隨他們父親的國籍。這種混血兒所生子女同樣被認為是察爾虎特，不算清朝屬民。旗人也有娶當地婦女為妻者，不過法律是禁止清朝官吏娶東突厥斯坦婦女的。這類婚生子女則被認為是當地人。

在喀什噶爾地區的塔什密里克居住著柯勒克孜的土拉吉爾欽察部，該部在19世紀50年代約有五百戶。這是清政府唯一允許住在東突厥斯坦而與綠洲定居居民同等看待的柯勒克孜人。在葉爾羌地區的有些村落中，還有一些從奇特拉爾和瓦罕釋放出來的奴隸前來定居，他們就是所謂的什葉派（拉菲迪）。在許多山區則有塔吉克人、哈爾查斯人（山地塔吉克人）和瓦罕人，他們都講伊朗語，在清國領土上過著半游牧生活。雖然他們現在是穆斯林，卻還保留著伊斯蘭時期以前的伊朗拜火教殘余。[[38]](#_38_Jian_Wa_Li_Ha_Nuo_Fu___Quan)甚至在塔里木盆地綠洲的東突厥斯坦人當中，也還有著前伊斯蘭文化層的遺跡，尤其在社會底層人民當中是這樣。例如祈雨巫師還有其市場，他們將巫石涂上動物之血，或將它放置在“甜水”中，就可以作法降雨降雪。還有薩滿教徒也仍然行他們的舊法。[[39]](#_39_Jia_Lin____Ji_Dong_Tu_Jue_Si)

六城和維吾爾斯坦兩地的經濟都依靠綠洲農業以及手工業和貿易；除少數人外，東突厥斯坦人幾乎或者從事耕種，或者在城市經商為生。綠洲的兩大生活區一方面是天山、帕米爾和昆侖山，另一方面是塔克拉瑪干和羅布泊沙漠。山脈是河流的發源地，最終提供了地下水，沙漠則吸收水，并形成了一個逾此界限即不能定居的區域。在靠山一側，這個區域與牧場渾然一體。在沙漠一側，它的寬度僅達人力灌溉所及之處。這里的雨量少得“幾乎滿足不了放牧所需之水”，即使下雨也不一定是好事，因為春天下雨能把陽光擋住，而雨量卻不足以“彌補太陽不能融雪為水的損失”。[[40]](#_40_Zhang_Zhi_Yi____Xin_Jiang_De)據一個旅行家說，葉爾羌這地方是煙塵彌漫，難見新月，降雨如降泥水。[[41]](#_41_A_He_Mai_De__Sha__Na_He_Shi)

除缺水和偶爾發生地震外，東突厥斯坦的環境是合乎衛生的。與相鄰的甘肅相反，這里夏季氣候干熱少雨，冬季嚴寒，流行病不易發生。性病在城市和牧民中倒是常見，但流行性傷寒卻很少，流行性霍亂則更為罕見。[[42]](#_42_Dai_Bu_Si_De___Zhong_Guo_Tu)偶爾也有結核病，但是沒有瘧疾。[[43]](#_43_Ge_Long_Bu____Dong_Tu_Jue_Si)

灌溉方法最初是從西部傳入東突厥斯坦的，它廣泛利用水溝、水管和地下水渠——坎兒井，以適應透水性強的黃土和沙礫地區，因為這里地面水會很快被吸干。某些作物收獲量是很高的。特別出名的是維吾爾斯坦的葡萄和瓜，最好的是吐魯番葡萄和哈密瓜。吐魯番出產的無核葡萄干譽滿中亞，遠銷印度和中國本土。農業技術和銷售方法雖然實用，但比較原始，總的說來，糧食產量可能遠較中國本土為低。農民種植苜蓿以肥田，不采用輪耕法。儲糧的普通方式是建倉庫，但因氣候干燥、冬天寒冷，糧食也可以儲藏在地下，所以貧苦農民一般都采用地窖，特別在不太平年月居民普遍采用此法。

葉爾羌與和闐地區盛產長毛羊的披巾羊毛，“這種羊幾乎每個地主都有一大群”。[[44]](#_44_Wo_Sen____Zhong_Guo_Da_Da_Li)六城西部多種桑樹，這里產絲，主要靠婦女勞動。不過大宗經濟作物仍是短纖維棉花，農民用棉花交稅，或把原棉賣給政府和新興的紡織工廠。大麻也是有價值的農作物，和闐就有規模相當的制繩廠，并且也有地毯織造業。大麻還用以提取麻醉品和其樹脂汁（charas）。[[45]](#_45_Guan_Yu_Ta_De_Xu_Shu__Jian_D)）罌粟殼之汁液（kōknār）也頗受人歡迎。大概在19世紀之初也已開始種植煙草，而且漢人隨著清軍的征服而流入北疆，也帶來了酒類，可能還擴大了鴉片的使用。但是對天山以南這些工業在1800年之際的發展情況，則不甚了解。在18世紀早期東突厥斯坦就已開始釀酒，但對19世紀早期的制酒情況還一無所知。

政府在阿克蘇地區的渾巴什開辦了一個重要的煉銅廠，在烏什吐魯番設立了一家硝石公司。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端出產玉石，是由政府壟斷的。和闐地區的河流出產白玉，美玉的價值同銀相等。葉爾羌地區出產綠玉，這里也開采金礦，同樣由政府壟斷。克里雅有一個產量很高的金礦。和闐諸礦經常雇用的工人約二三百人。在冬季，和闐“全體居民”都得前往路程有40天之遠的地方為政府采金。在克里雅金礦附近的河沙中，也發現有黃金。[[46]](#_46_A_He_Mai_De__Sha____Lu_Xing)還在焉耆、庫車和烏什吐魯番等地開采硝石。在阿克蘇和庫車開采硫磺。阿克蘇、庫車和賽里木的居民則開采附近的銅礦。

綠洲之間也有一些貿易往來。例如和闐就有販賣瑪什魯（mashrū’一種絲、棉混紡布）、綢緞、紙張、金砂（盡管有政府壟斷）、絲、葡萄、葡萄干和其他商品的商隊前往葉爾羌，葉爾羌也向和闐輸出銅壺、皮革和靴子。和闐的收入超過葉爾羌。

在清朝統治之下，東突厥斯坦社會僅有三個官方承認的階級：土官（伯克）、宗教上層人士（阿訇）和普通屬民（阿勒班克什，意即納稅人）。對伯克和阿訇是免稅的，法律對一般宗教人士來說，解釋是很寬大的；賽伊德、毛拉、派爾札德和法基爾等人都免交人頭稅（阿勒班）。普通屬民則要向政府交納人頭稅和服役。城市的普通屬民用貨幣納稅，農民則交納谷物。[[47]](#_47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居住在六城地區的外國人，即使同妻子老小一起定居在這里，也依然被視為過客，免交人頭稅。[[48]](#_48_Jian_Mi_Er__Yi_Zha_Te__A_La)

普通屬民當中人數最多的是：（1）自由農民（rā‘āyā’，拉阿雅），他們自有土地；（2）官地或官田（khāniyya，卡尼雅）上的佃農；（3）私有土地者的佃農。少數有地的農民——主要在哈密和吐魯番——擁有免稅的財產。其他從清代以前繼承所有的土地擁有者，則應繳納什一稅，即向清政府交納其收成的十分之一。此外，自由農民還要為政府舉辦的公共事業服役。政府的佃農可以得到種子、耕畜和農具，但要向政府繳納一半的收成。私有土地者的佃農則要定期重新商訂租約，條件當然前后不會一樣；但是也要向政府交納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給地主者大概至少要占十分之二。清政府盡管確實采取了某些專門措施，但在1800年之際，東突厥斯坦的土地租佃、納稅和服役方式基本上是一仍舊貫，同中亞其他穆斯林地區的方式非常相似。[[49]](#_49_Can_Jian_Du_Man___Qing_Di_Gu)還有一種農民叫“煙齊”（yänchi，即家奴），他們不以自己的名義納稅，所以不在普通屬民之列。家奴最初是犯人，為伯克干活。后來因為伯克強迫農民當“煙齊”，而有些農民為了逃稅和避債也自愿當“煙齊”，所以家奴的數目增長了。

宗教組織由三種人組成。在清政府看來，第一種是阿訇。他們憑借其能力和教養行使宗教職能，是唯一擁有官方地位的宗教階層。他們當中有法官、法學顧問（穆夫提，舊譯木甫提）、清真寺神職人員和經文學校（madrasa）教師。政府從所收人頭稅中撥出一小部分給經文學校學員、毛拉、法基爾和游方教士。第二種是圣族（賽伊德與和卓），他們在東突厥斯坦的居民中最受尊敬，其中最重要的是瑪赫杜姆家族，他們是16世紀著名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的教長（謝赫），即瑪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后代。另一個是庫車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的和卓們的圣族，他們是15世紀阿勒沙德·阿丁教長的后裔，使莫臥兒人皈依伊斯蘭教的就是這位教長。第三種是出身比較卑微的謝赫和蘇菲兄弟會的成員，尤其是納赫什班迪教團的幾個分支，也包括烏瓦依什亞、庫布拉維亞、哈迪里亞教團等等。蘇菲兄弟會在東突厥斯坦也同在準噶爾的東干人當中一樣，具有很深的影響。

在清朝征服以后，也許除了哈密和吐魯番當地的統治者有權視需要任命毛拉擔任政府職務外，東突厥斯坦的阿訇已經沒有其他中亞地區的毛拉所享有的那種政治權力了。這樣便沒有人溝通土官與被統治的民眾之間的鴻溝了。只有阿訇在經文學校學習阿拉伯文、波斯文、可蘭經及其各種注釋；因此，宗教教育在東突厥斯坦的影響便不如在土耳其—伊朗世界那樣大，雖然單是在葉爾羌一地就有十所用捐款建立起來的宗教學校。

清政府似乎承認大部分瓦庫夫（waqf，宗教捐贈）的土地、墓地建筑和其他圣地有免稅特權，免稅甚至包括距離喀什噶爾舊城東北十里左右的牙忽都地方的阿法其墓在內。清政府在牙忽都還派兵保護和卓的陵墓，這可能是別有動機的，因為牙忽都乃是新疆的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最神圣的中心，也是此派同情者的集會場所。既然有私人提供新的宗教捐贈，政府顯然就無需資助了。[[50]](#_50_Bo_Luo_Fu_Ke_Fu_Zai_Ta_De)如果阿奇木伯克，即當地統治者，把政府官地作宗教捐獻，那些土地也免稅。[[51]](#_51_A_He_Mai_De__Sha____Cong_Ke)瓦庫夫財產為照看墓地和寺院的謝赫提供了經濟基礎，甚至使他們生財有道。其中許多謝赫是蘇菲，都出身于圣族。

在東突厥斯坦的兩大地區中，維吾爾斯坦（主要是哈密和吐魯番）與中國交往的歷史較長，清朝對那里的控制也有很深的根基。像蒙古的旗王公一樣，哈密王和吐魯番王也屬于清皇家貴族之列，是世襲統治者（扎薩克），而不單純是清廷官員或代表。因此，哈密和吐魯番的地位與蒙古諸旗相等，駐烏魯木齊的都統僅對他們的事務實行單純的監督作用。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將近2400名綠營兵和約200名漢民流犯（流犯都在哈密境內），他們耕種著總數約45200畝土地。[[52]](#_52_Ceng_Wen_Wu____Zhong_Guo_Jin)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還有漢族移民和來自中國本土的漢商。不過對于維吾爾斯坦當地定居民的治理，哈密和吐魯番的扎薩克享有完全的自治權。他們自己向清廷進貢，但只有他們才有權向所轄屬民征稅。不全適合這條規矩的唯一例外就是：耕種清政府官地的當地人（主要是在辟展），每年得向清政府交納土地使用稅（其總數約為糧食3500擔）。

東突厥斯坦的另一主要地區——六城，在政治設置方面大大有別于維吾爾斯坦，因為塔里木盆地的整個官僚機構是直接受清廷駐喀什噶爾的參贊大臣統轄，參贊大臣則歸伊犁將軍節制。來自伊犁的旗兵和來自甘肅、陜西、烏魯木齊的綠營兵組成的主要戍軍，指揮部設在烏什吐魯番，該地是通向連接六城與伊犁的木扎提山口的要沖。在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葉爾羌，有一支較小的戍軍是八旗兵和綠營兵；焉耆、庫車、賽里木和阿克蘇等地也有綠營兵駐守。主要的軍事墾區在焉耆和烏什吐魯番。和闐也有綠營兵，但是在一般情況下，烏什吐魯番以西之地不駐漢軍，以免引起六城居民——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塔里木盆地的兩端——的反感。

清政府擔心漢族商人會控制六城的經濟（就像漢人商號和錢莊在滿洲和蒙古所作所為那樣），從而激起東突厥斯坦人的憤怒和反叛，因此采取一種嚴禁六城與漢人接觸的政策。派到六城的清軍也采取換防制，以防他們久留當地；清政府還盡量少用綠營兵，而把六城官地租給當地農民生產糧食以供軍政之需。清政府不在六城設立流放地，也不許平民移民和商人進至哈密以西各地。沒有恰當的理由和合法的護照，清朝當局不許可漢族平民前往東突厥斯坦的任何地區。

清朝政府還竭力把其官吏同六城土著隔開。在塔里木盆地的每一主要城市，清朝都建造了有圍墻的要塞，作為衙門所在而與當地土著居民分開，這是滿人或漢人的縣治，稱為焉吉沙爾（新城），或哈拉伊沙爾（城堡），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則稱為古勒巴格（意為“玫瑰園”）：清守軍、官署和非本地官員即居住于此。這些滿人城堡位于舊城之外。在某些小居民點，它們僅是一些位于舊城鎮旁其圍墻僅及肩高的土圍子。到19世紀中期，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在庫車就已經混雜而居。新城與舊城之間的交通限制是嚴格的。只有在白天清朝人員才可與當地人接觸。入夜則將城堡大門上鎖。未經邀請和批準，東突厥斯坦的男女人等不許進入滿人城堡。同樣，清朝官員也不能隨意前往土著村鎮。唯一的例外是得到當局許可（但卻未必合法）的少數清朝官員在那里開設酒店、客棧和酒廠。政府是限制放債、雇傭當地勞力和訂立其他商業合同的。

清政府對于伊斯蘭和當地習慣持不干涉政策：允許東突厥斯坦人使用回歷，穿著傳統服裝，除伯克外可不留辮子。不過，比這些象征性姿態更重要的是，清朝盡量保持了許多是在莫臥兒人、準噶爾人和瑪赫杜姆家系和卓們統治之下就已存在的當地的統治形式。盡管清王朝像先前加封哈密和吐魯番的統治者為貴族那樣，也把庫車、拜城、阿克蘇、烏什吐魯番與和闐的幾位東突厥斯坦支持者封為貴族，但在六城卻沒有設立有統治權的扎薩克，而是建立了一個東突厥斯坦人的官僚階層。由伯克和阿訇組成的這個官僚階層住在土著城鎮和鄉村，直接治理當地居民，并按照流行的哈乃菲學派的法律成例審理案件。使外國人印象很深的事實是：穆斯林與“中國人”（指滿人、綠營兵和六城地區其他非土著屬民）之間的糾紛也用穆斯林法律解決。一位旅行家就曾經指出：“法律執行得很嚴，即使對貴族也一樣；如果某王公殺死一個窮人，兇手也沒有指望可免死刑。”不過，在司法方面，清政府至少從中國本土帶來了一個新花樣：外國的穆斯林曾因看到罪犯戴枷而表示吃驚。[[53]](#_53_A_He_Mai_De__Sha____Cong_Ke)

在清朝統治下，土著官吏一經任命便都擁有伯克頭銜，即使那些官職是非世襲的也如此；即使任職的官員也不必選自清代以前就有世襲伯克頭銜的貴族之家。換句話說，“伯克”過去是貴族的稱號，這時已經變成“官員”的同義詞。雖然有些伯克因世代為伯克而出于禮貌之故被繼續稱為伯克，但是清朝采用這一頭銜的實際作用在于侵奪塔里木盆地土著傳統貴族的領導，并使滿人的王朝成為一切世俗權威的來源。

最高級的伯克（清制三、四品）要著漢裝和蓄辮。政府對于他們的任命遵循“回避法”，就東突厥斯坦的情況來說，這意味著土著不得擔任當地的主要伯克。在理論上，回避法旨在防止貪贓枉法，但是清政府在六城推行回避法的主要理由，還在于它在政治上駕馭哈密和吐魯番的統治者家族以及庫車和拜城的新貴族（因為他們的地位完全是受清朝之賜）比駕馭東突厥斯坦其他地方的上層貴族更有把握。這類伯克的官職不是世襲的，但是除非瀆職，都能繼續留任，不像清朝駐軍員司那樣定期更換。換句話說，六城的最高級伯克們都是行政首腦和官員，而且一般都是貴族，但他們與哈密和吐魯番的統治者不同之處是不能世襲。他們最后要受理藩院管轄。最高層伯克享有每年進京朝貢皇帝的特權，從而使他們得到相當可觀的回賞和許多好處；直到1859年，這種做法才被廢除。

統率土著官員的是幾位阿奇木伯克，即幾位地方的總管，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管八大城行政的阿奇木伯克：這八大城即焉耆、庫車、阿克蘇和烏什吐魯番組成的所謂“東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額里齊（即古和闐，和闐之名此時已用于總稱全區）組成的所謂“西四城”。這些城市各有屬區，由許多小城鎮和鄉村組成。喀什噶爾和英吉沙爾的阿奇木伯克有權直接向北京的皇帝上奏，其他地方總管同中央政府打交道則要通過新疆駐軍當局，如果必須同北京聯系，可以通過駐喀什噶爾的參贊大臣。在阿奇木伯克之下，則是一大批專司其事的小伯克。

伯克沒有直接薪俸，他們的收入來自賞賜的官地（多寡視品級而定），享有官地的全部收成；還有賞賜的奴隸為他們耕種和承擔其他勞役。按照清朝慣例，國家還給予他們少量養廉銀，在調動工作時由政府出盤費。作為一種權力象征，伯克堅持要下屬叩頭，且蓄發留辮。浩罕和布哈拉的官員往往不通文墨，六城的伯克則不同，他們既通漢文和滿文，也懂得一點宗教和歷史。伯克們可能遇到的一項令人頭痛的禮儀就是每月月初清晨都要到孔廟祭孔，不過他們似乎已將這種國家大典同自己的宗教調和起來了，伯克們在這里要向皇帝畫像跪拜。他們也模仿清朝旗人，又喝酒，又吸鴉片。[[54]](#_54_A_He_Mai_De__Sha____Cong_Ke)

官方所承認的一部分宗教集團不受當地官吏的管轄，但是按照慣例，必須在公共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受他們的司法官員的監督。同土著民政官員擁有伯克頭銜一樣，那些教團的成員也都有阿訇的頭銜。阿訇，實即東突厥斯坦的官員烏列瑪，他們執行地方司法職能，組織和領導居民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各地教團的主要人物是大法官（阿拉姆阿訇），其下屬有法官（哈孜阿訇）和顧問（穆夫提阿訇）。大清真寺的掌教、捐施收集人、教區清真寺主事以及在經文學校傳經授課的阿訇，都對當地的大法官負責。阿訇們的生活來源還不清楚，不過他們似乎是依靠捐贈和不動產收入。許多阿訇，特別是最富有的阿訇，都從宗教布施中獲得收入。

六城地區土著的內部事務雖然掌握在當地的伯克和阿訇手中，但是東突厥斯坦人還是要直接向清政府納稅服役。上面提到的六城年產銅價值1350萬蒲爾，其中價值160萬蒲爾的生銅系產自渾巴什，其余全是當地的稅收，絕大部分是向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居民征收的。六城居民每年要納糧6.6萬余擔，繳棉布14.3萬余匹，其中大部分也同原棉一樣是來自塔里木盆地西端。

這些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是用銅或糧食的形式收繳的人頭稅（相當于“每人每月一盧比加上土地收成的十分之一”）。[[55]](#_55_Wo_Sen____Zhong_Guo_Da_Da_Li)政府也允許用鉛、棉花、布匹或硫黃、硝石（火藥原料）代繳。此外，個人的商業交易、店鋪、市場、菜園、果園、煤礦及其他建筑物等等，也都要交稅。在另一方面，政府把黃金和玉石視為貢品，要求直接送往北京，新疆駐軍不得征稅。參加守望哨所的東突厥斯坦戶和500名喀什噶爾兵則免人頭稅。還有一種特別稅用于維持木扎提山口通道（這門差事主要是由牛蓋特人擔當）的開支。關于地方官員的開銷，由阿奇木伯克在六城對每戶征收一種半官方的四十取一稅（qïrqlïq），如有不足，阿奇木伯克還可征收附加稅。每遇清軍駐軍官員巡視六城哨所，阿奇木伯克還要加征稅項以充迎送費用。伯克有時還向普通屬民無償征收衣食和其他用品；若有清朝旗人征用財產，伯克便加征特別稅以補償財產主的損失。除了這些捐稅以外，還有一種中亞傳統的驛馬稅（ulagh），那是向有馬之家征收的。城市官員要定期向戶部報告稅務；盡管稅額固定，貪污現象顯然是很普遍的。

當地的伯克及其上司清朝官吏還以其他方式濫用職權。各級政府之間都是賄賂公行。阿奇木伯克并利用職權在市場按固定價格收購貨物，到收獲季節以高價賣出。伯克們還非法買賣官地以謀利。他們操縱著農民灌溉用水，而不公平合理地分配。他們開墾荒地而不上報。他們向小農放款，使他們債臺高筑而淪為“煙齊”（家奴），伯克則占有其財產和勞力。貨幣作為納稅和市場支付的規定手段用得越來越多，這便加強了伯克上下其手的能力。農民實際上只得出賣自己的作物去“買”錢，然后用錢去買生活必需品和交納政府的需索，特別是那些非正式的需索。

### 六城的對外貿易

貨幣的使用便利了對外貿易，對外貿易也促進了貨幣的使用。19世紀前25年的材料表明，這里貿易是自由的：就賣給東突厥斯坦人的貨物而言，并無走私貨。[[56]](#_56_He_Er_Mai_Sen____Guan_Yu_Ji)進口貨主要是牲畜、水果、披巾羊毛、毛皮、鴉片、吸煙用印度大麻、歐洲制品（多數是俄國貨）以及奴隸——男女孩童（他們的價格從200—500盧比不等）和成年奴隸。這些奴隸是由巴達赫尚、瓦罕和什克南的商人從乾竺特、吉爾吉特和奇特拉爾販到葉爾羌來出賣的。[[57]](#_57_Mu_Er_Ke_Luo_Fu_Te___Te_Lei)合法的出口貨主要是珍珠、寶石、生絲（此項貨物也進口）、綢緞、羽紗、棉布、棉紗、瓷器、基連（kiriana，即香料和藥材，尤其是大黃，后者是向中亞西部出口用作藥材和染料的大宗貨物）、大麻汁和茶葉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茶葉，那是從華南用馬隊馱運到和闐轉口的。茶葉分箱裝散茶和茶磚（每馱載30—40塊）兩種；茶磚質量低下，只有窮苦人家使用。非法的輸出品以金銀錠（金錠、銀幣和銀元寶）為主，其中許多是來自中國本土，特別是茶葉、金銀、寶石、絲綢和香料藥材（基連）等，主要是山西、陜西、江蘇、浙江一帶的商人運來的；商人們又從這里購買當地出產的絲綢、牲畜和其他貨物運回中國。

關于中國本土與新疆之間的商業往來還有待研究，不過很清楚的是，清朝的歧視性稅制偏向漢族商人。輸入中國本土的貨物只有玉石在嘉峪關納稅。中國本土與六城之間的貿易在烏什吐魯番是合法的，東突厥斯坦人把絲綢、粗白布、毛革和其他商品賣給來自中國本土的商人，要照價納稅十分之一，而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出賣，只要納此數之半。在烏什吐魯番，安集延人和其他外商出賣貨品僅納稅5%，漢商把除茶以外的貨物賣給六城商人，所納之稅甚至更低，只交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

從甘肅運到新疆供本地消費的茶磚是由特許商和政府經營的。根據1760年的法令，政府也允許非特許的山西私商經由蒙古向準噶爾販運少量布匹和未分類的茶葉，主要供輸出到中亞去。四川商人則在古城出賣大米和白面。江浙商人經常設法到葉爾羌經商，但是在政策上漢商是不準進入六城的。部分例外就是允許甘肅茶磚特許商前往六城，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未經特許的山西商出賣的茶葉和其他商品在六城市場上日見增多。就往來新疆的漢族茶商而言，非特許的山西未分類的茶葉貿易（當局是不大容易控制的）比特許的甘肅茶磚貿易獲利更多。但是從政府的觀點來看，得自甘肅特許商的收入要比山西商人交納的稅為多。[[58]](#_58_Jian_Ku_Zi_Nie_Zuo_Fu___19Sh)

除了烏什吐魯番之外，六城、準噶爾與中國本土貿易的主要集散地是焉耆，這是六城地區唯一允許蒲爾和伊犁銅幣同時自由流通的城市。焉耆的人口大部分為厄魯特人（加爾梅克人），它的周圍地帶又是六城唯一允許漢移民定居和擁有私人土地的地區。因此，根據清朝的隔離政策，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的居民和外國商人都不許進入焉耆城內。其他地方的居民雖可進入該城，但是不準定居于此。[[59]](#_59_Jian_Dai_Wei_Si___Ying_Shu_Y)

盡管六城的貿易興旺，東突厥斯坦的商人卻沒有發財，這是因為有權勢的官僚對私商橫加干涉，敲詐勒索。這里官吏的貪婪和儒家的一向輕商這兩者互為影響。這樣的商人不論如何富有，都沒有社會地位；一度起過相當作用的貿易公會，在清朝征服之后也失去影響，不再成為溝通官商的橋梁。甚至就教育程度而言，當地商人也比中亞西部的商人為差，因為在中亞西部，商人一般都在宗教學校受過教育，學識僅次于毛拉。

喀什噶爾商人到國外經商，是在1794年開始受到限制的。他們只能獲得通行證，成群結隊越過邊境哨卡到最靠近的柯勒克孜人當中進行交易，僅此而已。他們受到官方稅收的歧視，進口稅負擔沉重，官吏又勒索敲詐。他們甚至必須用錢購買經商權利。

一般說來，清朝推行的政策在效果上是有利于外國商人而不利于六城商人的，因此當地商人在某種程度上只得依附于外商。發了財的六城商人要留居塔里木盆地就得隱瞞資財，假裝貧窮。否則，如果買賣做得相當大，他們就得前往伊犁或烏魯木齊去住，那里的官府壓力要輕一些。對于作為清朝貢民的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所進口的牲畜，政府照價征收關稅5%，而對于外國人所輸入的牲畜，政府只征稅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喀什噶爾商人輸入的絲綢制品和毛皮要納稅10%外國人輸入的同樣貨物僅納此稅之半數。就大多數商品說來，當地的進口商要交稅5%，外國商人只交納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但若系“克什米爾人”（包括巴爾提人和帕米爾諸國的商人）則只交2.5%。從巴達赫尚進口寶石，稅率是每斤500蒲爾。[[60]](#_60_Jian_Wa_Li_Ha_Nuo_Fu___Quan)這項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白銀外流，清政府曾經試圖制止而未能奏效。

大多數外商都是來自浩罕、布哈拉、巴爾提斯坦、巴達赫尚、乾竺特、克什米爾或哈薩克草原，但也有伊朗人、希爾凡人、俄國韃靼人（或諾蓋人）、印度人、中亞猶太人（他們聚居于浩罕者人數很多）和亞美尼亞人。帕米爾的柯勒克孜人大概總是冒充當地屬民前來的。清朝當局弄不清這形形色色的外國人，便統統把他們看作“安集延人”（安集延是浩罕控制下的費爾干納一個城市和地區）或“克什米爾人”，[[61]](#_61_Jian_Mu_Er_Ke_Luo_Fu_Te_He_T)所以政府甚至許可非進貢國的商人前來新疆做私人買賣。其實所謂“安集延人”就是在喀什噶爾經商者，所謂“克什米爾人”就是在葉爾羌經商者。但是，作為貢使似乎更有利可圖，外國使節往往向駐新疆的將軍和其他高級官員贈送馬匹，得到的回贈總是比原來禮物的價值更高。[[62]](#_62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

浩罕的屬民和來自布哈拉及中亞西部其他地方的商人，都在喀什噶爾（它在19世紀頭25年比布哈拉更大）進行大宗的對外交易。[[63]](#_63_Jian_He_Er_Mai_Sen___Guan_Yu)因為清帝國的官方態度是把貿易看作一種給予外國人的特許（認為是他們需要富饒的中國的物產），以換取安定和對清廷的忠順姿態，所以外國商人就取得可以討價還價的地位和一定程度的自治，這兩者都是本地商人所沒有的。浩罕的屬民，即真正的安集延人，地位尤其出眾（因為“他們的舉止和習慣很像”喀什噶爾人），[[64]](#_64_Jian_A_He_Mai_De__Sha___Lu_X)是喀什噶爾的外商當中人數最多的集團，因此，在當地的外商界占支配地位。為了替這些商人說話和監督日常的市場活動，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與外國商界共同指定一位高級外商做監理（滿語hû da-i da，即商目）[[65]](#_65_Gan_Xie_Gang_Tian_Ying_Hong)：他也像中國沿海商埠的大班那樣并不是清朝的官員。但監理又不同于大班，他（至少在起初）對一切外商進行監督，而不是一個監理單獨監督與新疆通商的某一國屬民；外國商界有此監理，便享有高度自治權，擺脫了清朝統治的干涉。

這種外商監理通常是用浩罕人，后來這一職位逐漸變成浩罕政府試圖控制喀什噶爾對外貿易的工具。喀什噶爾的對外貿易大部分取道浩罕，這一事實就進一步促使浩罕政府插手于喀什噶爾，而喀什噶爾的貿易又反過來促進了浩罕經濟，對18世紀之末浩罕國的迅速發展大有裨益。起初，清政府對此采取妥協態度。1809年清朝通知浩罕統治者阿里汗說，鑒于他們的行為恭順，著令該國當年輸入新疆的商品免繳關稅。清朝又說，以后浩罕輸入商品的關稅將減半征收。

同印度、西藏、拉達克、巴爾提斯坦、阿富汗和帕米爾諸國的貿易則集中在葉爾羌（此地人口甚至比喀什噶爾更多）和色勒庫爾地區，這些地方也是印度與俄國通商的會合點。在這里和在和闐，安集延人在外商中所占的比重都小得多，更多的是巴達赫尚人、克什米爾人、阿富汗人、巴爾提人、西藏人和印度人，但是沒有猶太人或俄國韃靼人。[[66]](#_66_Wo_Sen____Zhong_Guo_Da__Da)這使外國人的成分比在喀什噶爾更復雜。是否也有像喀什噶爾“商目”那樣的單一的外商監理，目前還不得而知。

準噶爾與六城之間的貿易集中在阿克蘇，這是因為此城靠近經由木扎提山口越過天山的通道。在阿克蘇的市場上，東突厥斯坦人同哈薩克人和天山柯勒克孜人的貿易占重要地位，至少早在18世紀70年代，每逢集市就已經是“街市紛紜，摩肩雨汗，貨如霧擁”。[[67]](#_67_Chun_Yuan_Qi_Shi_Yi____Xi_Yu)到80年代末，大量俄國商品開始涌入阿克蘇，清朝不能制止，其部分原因是恰克圖的中俄貿易已經終止，清朝商人便從阿克蘇把這些商品轉運到清帝國各地。越來越多的外國商人在阿克蘇定居下來，到19世紀20年代中期，阿克蘇的人口包括本地人和外國人，合計似已超過1萬戶。其中約有8400戶登記為清朝屬民。[[68]](#_68_Cao_Zhen_Yong_Deng_Bian____Q)

入境外商到達清帝國境內的第一道關卡是要出示護照，獲得許可以后方能通行，這需要得到一名新疆保商——類似中國沿海商埠的“行”商（見第四章）——提供的書面保證，其中言明：“被保人向無債務，其出境后如有涉訟事項，均由保人負責承擔。”外商將此文書提交當地伯克，伯克轉呈清朝駐軍當局。后者留下原件，將漢文譯件交給外商。[[69]](#_69_Jian_Yi_Zha_Te__A_La___Zhong)來自中亞的外商用這種方式取得合法護照后即可前往六城西部和準噶爾經商，但是不準去庫車、焉耆、吐魯番、哈密和中國本土。有些外國人，其中多是浩罕人，但也有布哈拉人、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甚至設法（常是借助于伯克）把商業利潤投資于六城土地。外商在清帝國境內購買土地是非法的，然而安集延人顯然用銀子購買了土地。甚至也有官地流入外商之手。外人擁有的土地主要集中于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阿克蘇地區，它們被租給當地農民。

六城大概沒有類似廣州公行那樣的官商幫，主要的往來似在外商與六城伯克之間。這種往來基本上是融洽的，偶爾也有過沖突。例如在1808年，清朝駐喀什噶爾的參贊大臣斌靜污辱了一位“商目”的女兒。其父為浩罕商人，怒而殺女，持頭揮舞闖進斌靜衙門：他這種公開抗議行動，毫無疑問表明他根本無懼于清朝官府。[[70]](#_70_Can_Kan_Dai_Wei_Si___Ying_Sh)塔里木盆地的官員得到外商賄賂，給予外商以特別照顧而減收關稅。邊境官員有時只檢查外商的部分行李。像硝石這樣的軍用物資是不許賣給外國人的，但也有竟然得以出口的事情（即使這項禁令有重要意義，其有效程度也大有可疑，因為19世紀中葉的旅行家曾親見硫黃在浩罕公開出賣，并且看到過“當地制硝”的情況）。[[71]](#_71_Jian_A_He_Mai_De__Sha___Lu_X)浩罕人前往麥加朝圣時佩帶的那種“中國短劍”[[72]](#_72_Wo_Sen____Wu_Zi_Bie_Ke_Di_Qu)是否也在禁止出口之列，現在還不清楚，不過，走私是十分普遍的，當局一般也不予聞問。

### 瑪赫杜姆家族

安集延人在六城西部占有的特權地位對清朝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因為外商使六城居民與其先前的統治者（即納赫什班迪兄弟會的阿法其和卓，當時住在中亞西部）保持著聯系。納赫什班迪家族在布哈拉的發跡已有幾個世紀之久，它在中亞的蘇菲派各團體當中是最有影響的，因此六城的很多外商都是納赫什班迪教團的徒眾。

瑪赫杜姆家族是瑪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子孫，他們在清代以前就在東突厥斯坦的納赫什班迪教團中占有統治地位。瑪赫杜姆和卓家的兩大派即黑山派和白山派，在那時就已在爭奪教團的領導權。白山派聯合準噶爾人而在1755年基本上消滅了他的對手黑山派以后，又促成了滿人對六城的征服。納赫什班迪教團的某些支派沒有抵抗清軍，清朝便加封幾位不屬阿法其派（白山派）的瑪赫杜姆和卓為貴族，要他們遷居北京。庫車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的和卓——即阿勒沙德·阿丁（全盛時期約在1450年）之后代，他們和印度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穆扎德之后裔）同清朝顯然沒有沖突。但是在1759年，兩位主要的白山派和卓曾被迫逃往巴達赫尚，并且死在那里。六城人跟隨他們外逃者有幾千戶，其中大多數后來都定居于浩罕。

這些外逃的喀什噶爾人，以及被逐的黑山派和白山派宗教領袖，通過在新疆經商的商人與其六城同胞保持著接觸。黑山派在葉爾羌的勢力尤其強大，早年黑山派的和卓們便葬在葉爾羌的莫臥兒汗的古黃金墓地。在喀什噶爾西南部、英吉沙爾與和闐的居民中，黑山派也占優勢。他們指望浩罕境內馬兒亦囊地方的和卓能成為宗教領袖，每年都向他們奉獻。白山派的主力是在喀什噶爾及其東北城鎮，還在阿克蘇和庫車。1800年時他們期待被清朝趕到巴達赫尚的不兒罕·阿丁和卓的子嗣能進行宗教領導。不兒罕·阿丁之子穆罕默德·阿明便是眾所周知的薩木薩克：此人曾遍游中亞西部，晚年定居于浩罕境內，死于1798年或稍晚的時候。[[73]](#_73_Ji_Mu_Ke_Fu_Si_Ji____Jing_Me)清政府為爭取浩罕協助保持邊境安寧，每年都向浩罕統治者饋銀1萬到5萬兩，[[74]](#_74_Qi_Shu_Mu_Zi_200Dao_1000Yuan)還贈送大量茶葉，以酬答浩罕對薩木薩克的控制。但是許多來往的商人和柯勒克孜人都是白山派的追隨者，他們使薩木薩克同他的六城人民保持著聯系。

薩木薩克遺有三子：穆罕默德（馬哈木）·玉素普、張格爾和巴布頂。玉素普居長，1797年似曾率領一支柯勒克孜軍襲擊新疆邊境而被清軍擊走。在薩木薩克死后，約在19世紀之初，有個玉素普和卓（可能就是這個穆罕默德·玉素普）曾訪問埃及、沙里佐爾和巴格達；他在巴格達，曾被當局逮捕，后未經解釋原因便交給了英國領事，由英領事把玉素普和卓作為犯人押送印度。這位和卓在孟買脫身后逃往巴士拉，后往色拉子，以后又到德里蘭。他在德里蘭設法得到哈札兒政府的恩遇。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只要有可能就要當國王”。

玉素普和卓同約穆特和戈克蘭的土庫曼人結盟，在1813年進攻哈札兒。第一次失敗之后，他又重新組織了2萬約穆特和戈克蘭兵把哈札兒人擊潰，但是按照穆罕默德·塔齊·西皮爾的說法，“一個熟悉喀什噶爾和卓的土庫曼人認出了他，便立刻行動，向他開槍。玉素普和卓被擊中，落馬而死。先是巴達赫尚國王欲為其父蘇勒丹沙報仇（據說蘇勒丹沙是因為報復白山派和卓們的謀害而被殺的），發誓以金銀重賞購買玉素普和卓的首級。當時土庫曼人之間為爭奪玉素普和卓的尸首曾有一場惡戰，死亡甚多。最后是土庫曼人奪到了他的首級，伊朗人用戰馬踩爛了他的尸體，并摘下他的圖章、戒指和腰佩匕首，一并獻給了哈札兒王”[[75]](#_75_Mu_Han_Mo_De__Ta_Qi__Xi_Pi_E)。然而，玉素普和卓在1813年可能根本沒有被殺，因為有一位“來自印度或中國邊境”并曾經率領土庫曼人襲擊伊朗邊境的神秘的“蘇勒丹汗”，據說于1819—1820年曾住在基發[[76]](#_76_Can_Kan_Ge_Li_Ge_Li_Ye_Fu)，而穆罕默德·玉素普確無疑問地又在1830年露面，領導了一次對六城的入侵。

薩木薩克的次子張格爾似是繼承了宗教事業，在19世紀之初可能住在布哈拉；幼子巴布頂則顯然住在浩罕。這兩位白山派和卓與其六城追隨者的聯系基本上保持未斷，六城有些伯克還同浩罕政府保持接觸，以圖進行政治投機。特別是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玉努斯還與浩罕的穆罕默德（馬哈木）·烏瑪爾汗有通信關系。1813年俄國的譯人納札洛夫就曾在浩罕遇見一位中國“使者”，似為玉努斯商隊的頭目。[[77]](#_77_Can_Jian_Na_Zha_Luo_Fu___Zho)

六城伯克和浩罕政府在阻止白山派和卓入侵六城方面，利害關系彼此一致，因為入侵對浩罕與喀什噶爾的貿易不利。玉努斯顯然曾鼓動穆罕默德·烏瑪爾汗請求清朝當局允許浩罕政府在喀什噶爾派駐一位官方政治代表，以取代半官方的胡岱達。浩罕政府約在1813年年底提出過這一請求，請準許授予浩罕王委任的官員以哈孜（法官）伯克的頭銜，并接替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的監督商務和對浩罕商人征稅的職責；換句話說，浩罕要求得到治外法權，要求得到在清帝國境內征稅的權力。伊犁將軍松筠拒絕了這一要求，并且懲罰了玉努斯，禁絕六城伯克與浩罕進行一切聯系。

1814年烏瑪爾汗以威脅相報。他說他一直約束薩木薩克之子不入侵六城，因此要求減少浩罕商人的關稅作為報答。松筠再次拒絕，并且根據前一年所作的調查，表示懷疑薩木薩克是否真有兒子。滿人照舊向浩罕汗賞賜銀兩和茶葉，但是清帝授權松筠警告烏瑪爾，他若重提要求就要中斷貿易。

到了1814年，清朝當局已經牢牢控制了東突厥斯坦。然而，遭受苛捐雜稅折磨的農民和工匠、境況不佳的商人、后悔其收入落入滿人手中的伯克等等，都相信這種愚昧的統治是根本不合法的，也不會長久。盡管領導反滿圣戰最可能的領袖是薩木薩克的兒子，可是浩罕人貪圖與中國貿易之利，不讓他們越山進入新疆。在黑山派看來，利用這一時機的時候似乎已經到來。

早在1814年，塔什密里克有一位黑山派蘇菲名叫仔牙墩，開始與其宗教信徒和一些柯勒克孜人密謀推翻清朝統治。塔什密里克的阿奇木伯克是柯勒克孜人，這里住有數百戶土拉吉爾欽察人。1814年秋，柯勒克孜的首領圖爾弟邁莫特比根據可蘭經發誓要支持仔牙墩起事。[[78]](#_78_Can_Jian___Da_Qing_Ren_Zong)許多柯勒克孜人加入陰謀者隊伍。叛亂者于次年夏季動手，向清軍馬廄縱火，攻擊駐軍并號召居民起事。但居民沒有響應。清軍展開反擊并調集柯勒克孜人馳援，柯勒克孜人見事不成，便協助捉獲仔牙墩而恢復了秩序。只有少數人越過邊界逃到浩罕境內。

清政府處決了起事者，并追查所有叛亂的參加者。最困難的是分清柯勒克孜人的好壞，因為許多人同雙方都合作，例如被判死刑的圖爾弟邁莫特比便是這樣。這次起事是局部的、短暫的，但它預示著更大的麻煩還在后面。19世紀的新疆就要成為清帝國最動亂的地區了。

## 西藏

西藏不同于滿洲、蒙古和新疆而享有相當程度的獨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路程遙遠險阻之故。在1800年之際西藏政府頑強地采取閉關自守政策，但這種自我孤立并非西藏在此以前的歷史的特點。的確，有人認為“19世紀才是西藏真正可以稱為‘禁地’的唯一時期”。[[79]](#_79_Si_Nei_Er_Ge_Luo_Fu_He_Li_Ji)

在1800年，全部菩提亞人口（即西藏本土的藏民和所有其他地方的藏民）大約不超過600萬，而直接歸拉薩政府管轄的人口一定大大低于400萬。[[80]](#_80_Ci_Shu_Liang_Bei_Yu_Qian_De)供養這些人口的經濟是以種植和放牧為基礎的，這種方式起源于中東的早期文明，但為適應西藏高原的環境而有所改變。西藏的牧區遼闊，然而西藏人口從事農業者卻有5/6左右。這里的政治文化中心總是位于農業區。

青稞能生長在海拔14000英尺的地方，是西藏的主要農作物，也是人們的主食。此外種植的還有蕎麥、豆類、蘿卜和芥子；在低海拔地方也種植小麥、水果（杏、桃、梨）和核桃。只有錫金、不丹和康區南部某些地勢較低的地方種植水稻。水利灌溉是必需的，因為高山阻擋了主要農業谷地的降雨，因而雨量不足。土地所有者從拉薩政府領得土地，協助政府維護水渠系統，農民則根據其財產的多寡提供勞動力。灌溉良好的土地幾乎可以連續耕種。

所有菩提亞人都說藏語，至少信仰三種宗教中的一種，即喇嘛教、本教或伊斯蘭教。本教和喇嘛教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二者都進一步與西藏各種宗教傳統發生緊密聯系，但這些傳統又獨立于本教和喇嘛教之外。人們對西藏地方文化特點的了解莫過于它的婚姻習俗，貴族和平民都行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包括父子共妻或母女共夫的情況。與幾個姐妹或同輩的幾個婦女發生非婚性關系的情況也有。這些婚俗通過“容納大量過剩的婦女”而抵消了一妻多夫制造成的后果。[[81]](#_81_Shi_Tai_An____Xi_Cang_De_Wen)當然，在穆斯林當中采用的是伊斯蘭婚姻法。

在政治方面，菩提亞人分屬幾個不同的國家。最西部的是巴爾提斯坦或小西藏（這一稱呼有時也包括拉達克）：自14世紀以來這里就是穆斯林（十二伊瑪目派的什葉派）地區，但是也受到努爾巴赫什派的蘇菲兄弟會很深的影響。自從佛教在巴爾提斯坦絕跡以來，這個國家就已完全獨立，不用其他菩提亞人國家即使是名義上的保護。卡多（斯卡爾杜）、什卡和喀普魯的統治者都放棄了他們同拉達克早期的地區性聯系。人們繼續講巴爾提的藏語方言，藏文已隨同舊的宗教一起消失，而有文化的巴爾提人則用波斯文從事寫作。

另一個處于西藏政教關系網絡之外的菩提亞人國家是拉呼爾，它的統治者為印度的庫盧王公。不過這里也還保留了拉呼爾早年曾經是拉達克保護國的殘跡，因為拉呼爾的酋長們仍向拉達克王進貢，在某些地方還向他交租。

其余的菩提亞人國家——拉達克、錫金、不丹及康區東部和安多各地區——是拉薩達賴喇嘛的屬邦（但不是保護國）：這種關系有的是直接的依附關系，如拉達克、錫金和不丹即是；有的是通過宗教聯系的間接依附關系（如安多和康區東部的地方酋長），但宗教聯系也有潛在的政治意義。

在這些外圍藏族土邦中的最西部是拉達克王國，它的西北為巴爾提斯坦，其方言各不相同。拉達克的首府列城是大商埠，這里的經商者主要是克什米爾人，有商路通往拉薩、羌塘、葉爾羌、克什米爾、旁遮普、庫盧和英屬印度。國王控制著一些土王、世襲的大臣和酋長，其中如卡吉爾、楚朔、七塘、帕貢和索德等地的尊長是穆斯林，他們的屬民也像巴爾提人一樣是十二伊瑪目派的什葉派。列城地區有大批外國穆斯林商人；每隔三年總是由一位穆斯林商人和一位佛教長老率領拉達克的進貢使團前往拉薩。這些外國穆斯林多半是遜尼派，因此他們顯然不反對拉達克的佛教政府在和平時期允許拉達克人私下結成幫伙襲擊巴爾提斯坦的什葉派。襲擊者按照殺害巴爾提人的多寡而得到土地報償。[[82]](#_82_Fu_Lan_Ke____Xi_Cang_Xi_Bu_S)巴爾提人的反應則是派遣奸細前往帕貢、索德及其周圍地區，以求達到“離間列城政府與農民（他們的什葉派教友）之間的感情”的目的。

與西藏其他地方一樣，拉達克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宗教是喇嘛教，主要教派是主巴噶舉派（它和王室有特殊關系），以及格魯派，即達賴喇嘛的教派。噶舉派的主要寺院在希米斯，拉達克的主要格魯派喇嘛廟是畢圖克廟。

世俗統治者治下的錫金向南延伸到特拉伊叢林區，即所謂磨朗，向北則越過邊境深入到西藏本土。雨季時國王居于春丕谷，牧民則按季節或遷居在錫金，或遷居于達賴喇嘛的領土，同時向兩個政府納稅服役。有14支菩提亞人（王族即其一）是16世紀從康區遷來錫金的，現在已經控制了主要由列普恰人組成的當地土著。在理論上，而且僅僅是在理論上，國王具有絕對權威，可以隨意重新分配菩提亞人各支酋長的領地。這里的菩提亞人和列普恰人都是佛教徒，主要的教派是寧瑪派，主要寺院貝米翁齊，只許可純藏族血統者當喇嘛。噶舉派的分支噶瑪派在錫金也有3處寺院。

不丹是一個宗教國家，在某些方面同達賴喇嘛的國家相似，但不丹的教派是噶舉派的支派主巴派，全國實際上都奉它的香火。全國沒有別的教派的寺院。政府的名義首領是肖仲仁波且活佛，是一位宗教領袖，通稱為法王：他是11世紀印度但特羅大師那若巴的化身，又是噶舉派創建者的師尊。宗教體制控制著不丹社會，到處是寺院，甚至世俗官員也要保持獨身而與其家庭分居，當了高官還要完全拋棄家庭。不丹的世俗事務由一位世俗行政長官負責，稱為德卜王，他是由六省省長和其他高級官員組成的委員會任命的。官員們的職位一般都視包稅條件而定。山區的菩提亞人壟斷了所有要津，只有某些有特權的家族才能擔任高級官員。地處低洼平原的不丹人（噶特人）中的印度居民從事農業，或者為高原的菩提亞人充當仆役和奴隸。

康區東部在18世紀為清政府所吞并，其地由世襲土司管理，受四川總督節制，不過，每年還要到打箭爐向達賴喇嘛照付5000兩稅款。達賴喇嘛的宗教地位仍然得到康區東部僧俗領袖人物若明若暗的承認，但是不應忘記，在西藏人的心目中，宗教與政治忠誠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即使在靠近中國本土的康區極東部，清朝的控制也不容易維持，尤其是在金川（嘉戎），當地的本教勢力比在西藏許多地方都大，那里的人民說的藏語根本不同于西藏本土的方言。

被清朝合并的安多稱為青海，蒙語稱庫庫淖爾（藍湖），因它的最北部有一大湖名為青海湖。這里歸中國甘肅省管轄，居民有藏人（稱唐古特，漢語稱西番）、厄魯特蒙古人，還有幾個較小的土著部落和越來越多的漢族移民。當地人由當地的首領統治，歸清朝駐西寧的辦事大臣節制；西寧辦事大臣還管轄西南部的囊謙地區，雖然西藏人仍認為囊謙是康區的一部分。雖然安多由清朝直接管轄，達賴喇嘛依然在這里派有代表管理貿易和當地寺院，而且有證據表明，至少有些人還向拉薩納稅。[[83]](#_83_Bi_Te_Qi____1728__1959Nian_X)畜牧業比農業更占優勢，典型的鄉村風光是：藏族牧民住在類似中東黑帳篷的帳篷里，厄魯特蒙古人的帳篷則是突厥蒙古式的圓頂氈帳。在土著牧民中，清朝法律的執行比較松弛。在1807年，為了鎮壓康區鄰近地區的兩位果洛部牧民首領，清朝派出了8000軍隊，同時達賴喇嘛政府也派來一支軍隊。盡管康區歸清朝管轄，西藏軍還是在這里待了兩年，以平息這些部落民。

在青海東北端的湟中，有一個操蒙古語、藏語、突厥語和漢語的民族，叫做蒙古勒族（土族）。他們信仰喇嘛教和薩滿教，但他們的薩滿教摻雜著中國的道教。還有一支操突厥語的穆斯林撒拉族，也起著重要的作用。納赫什班迪教派和馬明心的新教對他們的影響似乎相當大。當地的中國穆斯林也是如此，他們在青海的商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清朝對新教是禁止的，西寧的官員在1789年粉碎過一小撮新教教徒制造的騷亂，[[84]](#_84_Shi_La_Mu____Gan_Cang_Bian_J)但是政府并未能成功地禁絕這個運動。伊斯蘭教繼續有所發展，穆斯林的數目不斷增加。不過，占統治地位的還是西藏佛教，特別是格魯派。格魯派的兩大寺院，即塔爾寺和拉卜楞寺，擁有大量財產，統治著大批農牧民。

達賴喇嘛的國度（西藏本土）由四大地區組成：康區西部；包括衛藏在內的中部各省；阿里；以及大部分空無人煙的北部草原，即羌塘。達賴喇嘛還宣稱阿薩姆杜瓦爾斯為其所有，這是一條東西向的狹長低地，在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約30英里。統治康區西部的是僧侶集團、世俗王公和達賴喇嘛任命的官員，他們都直接聽命于拉薩政府。阿里地區早年曾處于拉達克的保護之下，此時是一片草原；羌塘則幾乎全是草原。衛區包括拉薩，藏區包括日喀則和江孜等重要城市，這兩區主要從事農業，就跟在政治上依附于衛藏的較小省份工布和塔布一樣。這些農業省份的主要河流是東流的雅魯藏布江，此江往南流入阿薩姆，然后又向西流成為布拉馬普特拉河。

西藏本土的世俗和精神統治者都是達賴喇嘛，他是格魯派的首領。達賴的坐床處是拉薩的布達拉宮，人們相信他是活佛。達賴喇嘛未成年時往往由攝政行使西藏國家首腦的大權，在19世紀，政權都由攝政把持，達賴只是偶爾掌權，時間也非常短。八世達賴喇嘛死于1804年，終年46歲。他對政治就很淡薄，一切聽由攝政處理。九世達賴死于1815年，十世達賴死于1837年，十一世達賴死于1855年，十二世達賴死于1875年。

到19世紀之初，達賴喇嘛政府在清朝支持下已把西藏的世襲地方首領完成了完全官僚化的貴族。清朝曾試圖迫使西藏政府允許平民為官和實行軍政分離，但未能奏效，可是拉薩卻基本上打破了西藏本土貴族的獨立性，直接控制了從阿里到康區西部的整個地區。只有兩個值得注意的例外：雅魯藏布江南部自治的拉嘉里王和河套附近波瑜的世襲統治者。但是這兩個家族要向拉薩進貢，并與衛藏貴族通婚。拉嘉里王甚至派一人在達賴政府里擔任官職。[[85]](#_85_Qia_La_Si_Ke____Xi_Cang_De_T)

達賴下面的西藏政府包括兩個平行的部分：宗教部分和世俗部分，各有官員175名。世俗行政由所謂噶廈（內閣會議）領導，直接聽命于達賴喇嘛。噶廈由四位噶倫組成。在1800年，四噶倫之一必須是僧官，但是從1804年至1878年，政府不再保留這一僧官席位，四位噶倫都是俗官。噶倫如被解職或退休，就不能復職。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達賴在世之時不得任命他的親戚當噶倫。為了管理各省的行政區（大部分在衛藏），拉薩政府給每一區任命了一位（俗官）或兩位（通常是僧俗各一名）行政官。他們負責收稅、執法、維持秩序和聽取民、刑案件（這些案件在必要時可直接向噶廈上訴）。出身于大貴族的年輕行政官往往并不到任而住在拉薩，由管家代行職權。管家還管許多有收益的政府財產。西藏的武裝力量由地方軍組成，緊急時刻可以動員，通常是由一位噶倫指揮。衛藏分別設置兩三位戴琒（地方將領）。

宗教部分是由一位能夠直接接觸達賴喇嘛的大總管（總堪布）領導。他的下面設譯倉，由四位大仲譯組成，與噶廈相對應。譯倉經管寺院，但拉薩的格魯派三大寺院（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除外，它們直接聽命于達賴喇嘛；譯倉還負責登記轉世喇嘛。譯倉之下是一整套由三大寺僧官組成的宗教官僚體系。他們大多數是平民出身。僧官管理宗教事務和達賴喇嘛的家財，并擔當其他各種職務，例如同俗官一道擔任行政長官。這套政府結構，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都是創于18世紀20年代，“在以后的200年中，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動”。[[86]](#_86_Bi_Te_Qi____Xi_Cang_De_Gui_Z)

俗官出自西藏貴族，他們因擁有農田和擔任官職而具有貴族血統。根據達賴喇嘛政府的觀點，牧民當中不存在貴族。從理論上說，貴族地位必然與政府職務聯系在一起，兒子不能繼承父親的地位就被認為降成了平民，除非他出家當喇嘛。然而在實際上，貴族家庭的諸幼子很少過平民生活。貴族家庭的收入來自達賴喇嘛的政府撥給的世襲領地，這是為了報償貴族派出一個（有時是兩個）兒子去擔任政府職務之故。這些領地是貴族的主要地產。貴族家庭通常用他們領地的名稱命名，但是貴族還可以擁有其他土地，他們不僅依據領地的名稱來命名，也還依據他們拉薩府第的名稱來命名。如果某家貴族沒有兒子擔任政府職務，就要為其領地支付空缺費，直到補上空缺為止。

貴族的官職與他的收入沒有直接的聯系。高級貴族出身的官吏都是富家子弟，即使擔任低級職務，收入也多；窮家出身的官吏就是擔任高級職位，收入也較低。官員可以以優厚的條件從政府貸款，但卻以更高的利率轉手放債。他們作為包稅人，要按規定數額向拉薩政府交納，但征收時總是超過規定的數額。如果官員調動，他們可以得到政府的特別津貼，可以差遣農民服役。他們往往濫用這種權力，要農民為他們搬運私人貨物。

衛藏的貴族血統是各不相同的。最古老的貴族是中央集權在拉薩鞏固之前就當西藏統治者的藏王和西藏大臣的子孫。但是在18世紀，隨著格魯派勢力的鞏固，達賴喇嘛諸家族也加入了貴族行列，這些新貴族很快就比舊貴族甚至更重要。一般說來，貴族男子只能娶貴族婦女；如果無嗣，可以過繼其他貴族之家的兒子。過繼者便從繼父姓氏，并為這個家系接代傳宗。在政府擔任過最高職務的貴族享有特權，不過政府盡量不使任何家族長期把持某一行政職務。貴族的領地和擔任政府職務的權利是世襲的，但是他們的職位不能世襲。實際上，拉薩政府的政治影響僅能施之于衛藏貴族，以及工布和塔布的主要家族。藏區在18世紀較為重要，但是大約在1792年以后衛區的作用變得更突出了。少數幾家貴族壟斷了政府中的最高職位，在整個19世紀，這類貴族家系的數目僅略有增加。

衛藏世家大族為中央政府提供官員從而形成了貴族政治，此外地方上還有大量地主、顯貴和宗教權貴，例如本巴（本教巫師）和阿巴（即驅雹師，因冰雹給西藏許多地區帶來可怕的災害，這些人作法驅雹，可得一份驅雹稅），他們在地方上行使一種半官方的權力。在西藏本土的外圍地區，還有一些當地的家族也很重要，它們是過去的當地封建主后裔。在有些地方，他們儼然就像當地的小貴族那樣行事。但在另一些地方，他們不過是持有免稅土地并有權支配村民勞動的世襲頭人。[[87]](#_87_Jian_Qia_La_Si_Ke___Xi_Cang)

格魯派寺院集團在很大程度上與世襲貴族相互勾結，同世俗貴族一樣有權勢。次于達賴喇嘛的最重要人物是班禪，他也是活佛，在黃教居第二位，坐床在日喀則附近的扎什倫布寺。班禪喇嘛的轄地是一個模仿拉薩的具體而微的自治小邦，當地世俗貴族也得到領地，作為在政府供職的報答。康區西部的格魯派諸活佛在管理自己的土地中都多少有些自治權；格魯派喇嘛和寺院在西藏境內到處都有。貴族在寺院集團中一般都擁有特權地位。活佛常常產生于貴族中，貴族出身的喇嘛享有的機會通常是平民出身的喇嘛所得不到的。貴族出身的僧官比一般僧官更有威勢，貴族出身的喇嘛從家中得到的財政支持也較多。

拉薩政府的僧官都是選自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最有資質的男孩，他們經過設在布達拉宮的專門學校訓練，學校嚴格實行獨身制度。與俗官不同，僧官所擔任的職務顯然沒有個人領地作為報償，除非他擔任的官職擁有可專門維持官員生活的土地。這樣，他們就得主要依靠本寺來維持生活。僧官的生活來源有限，同格魯派諸活佛擁有的財富形成鮮明的對比，因為這些活佛不僅占有良田，而且還從放款和經商中得到額外收入。

古老而“未經改革”的教團寺院，只要承認達賴喇嘛的政治權威便可以得到土地；所有的土地在理論上都是屬于達賴喇嘛的。這些老教派就是薩迦派、寧瑪派和噶舉派，它們被統稱為紅教，但是像格魯派那樣，它們只是寺院的教團而不是什么宗派；“紅”的稱呼更適合用于表示噶舉派噶瑪巴宗的所謂紅帽喇嘛，以區別于黑帽系統。在西藏本土，薩迦派享有特殊的地位，它的長老統治著藏區西部一個自治的宗教邦。

在1800年，西藏各喇嘛教派的男性喇嘛總數約有76萬，分屬于近2500個寺院。[[88]](#_88_Da_Si____Xi_Cang_De_Si_Yuan)各個階級的男子都可以當喇嘛，只是賤民（如分尸者、屠夫、漁夫、船工和鐵匠，西藏西部還要加上樂師）和殘廢人除外。不過富家男子更有機會依次晉升（候選—見習—受戒喇嘛—學銜獲得者—法師），因為當喇嘛要部分地自給，在每次晉級之前要交納各種費用和宴請僧眾。所以許多貧家出身的候選者只能升到見習，而依靠給俗家當牧人，管理寺產或作手藝過活。某些教團的最高職務一般都不用從下層上升的喇嘛擔任。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活佛，格魯派中許多擔任最高職務者也是活佛。不丹的主巴派、錫金的寧瑪派和拉達克希米斯寺的首腦也都是活佛；薩迦派和寧瑪派主要寺院的統治階層和長老則都是世襲，不讓有才干的喇嘛接近這個禁臠。最重要的例外是格魯派創始人坐床的甘丹寺，它的長老一職倒是對有才干的喇嘛開放的。

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人都從事商業。最有利可圖的商品，尤其是茶、羊毛和稻米等，通常都被政府壟斷而被分配給寺院和個人來經營。最大的商人是寺院和活佛喇嘛，他們也是主要的放債者。平民經商的處境很不利。他們即使有錢，但是地位低于最小的官員，不準穿用絲綢。手藝人的勞動也處于不利的地位。政府利用農民的勞動力經營一些紡織和某些專門工業，對其他手工業還有權以非常低的價格購買產品。在阿里，政府壟斷了金礦，以三年為期租給包商，并授權后者征用自由農民的勞力去開采黃金。如上所說，鐵匠是賤民。在拉薩也同在列城一樣，占統治地位的外商是克什米爾人、尼泊爾人和漢人。西藏商人中有許多人來自康區。

隨著1792年乾隆帝對西藏—尼泊爾戰爭采取軍事干涉，清朝對西藏的影響臻于極盛，此后則逐漸衰退。清朝對噶廈的監督是由在拉薩的駐藏大臣、幫辦大臣和一支小小的駐軍執行的。如同在滿洲、蒙古和新疆一樣，駐藏大臣及其幫辦總由旗人擔任。噶廈和戴琒出缺，在理論上均由清帝親自任命。實際上那只是形式，但達賴喇嘛或其攝政照例向駐藏大臣推薦這類人選，駐藏大臣則向北京呈報。不僅如此，清朝還承認這里的世俗官員為噶倫，屬于清帝國官員，并擁有清朝特封貴族的三品頂戴，如同新疆六城的阿奇木伯克那樣；其他高級官員包括戴琒在內，則為四品。有時清帝還加封一位藏官為二品，以示殊寵。達賴和班禪兩位喇嘛位在極峰，不入品級；但是，官品在西藏人心目中是有威望的，這從西藏的上層官僚一般都是“四品”之稱的事實中可以看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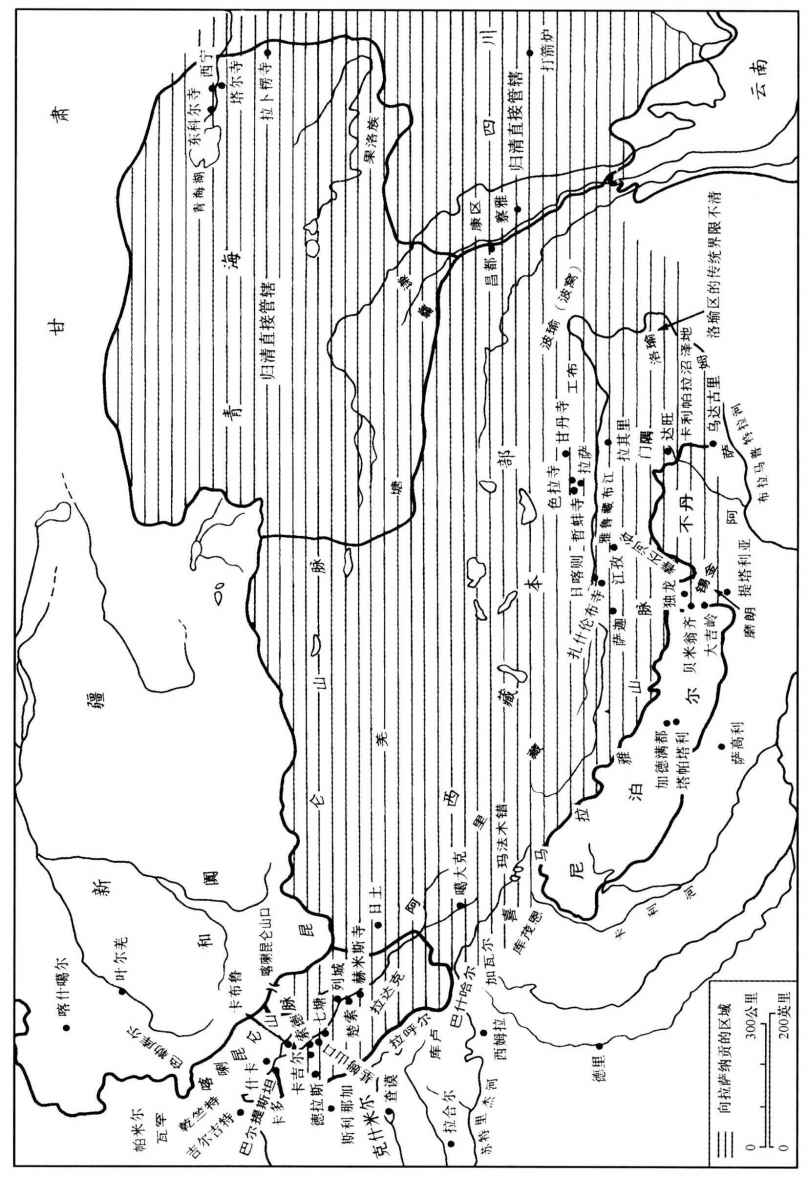
清廷和西藏人是站在兩個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皇帝與達賴喇嘛的關系的。在清廷看來，達賴喇嘛是強有力的宗教領袖和圣僧，但歸根結底還是受清帝保護的。在西藏人看來，清帝不過是喇嘛的世俗支持者。這意味著西藏人把達賴喇嘛的地位看得高于清帝，因為在西藏，俗人有義務向僧侶提供物質支持，而僧侶才是占統治地位的（就格魯派而言），俗人無論如何有錢有勢，都是處于從屬地位。西藏政府清楚地知道清朝的觀點，但要清廷作出解釋，對西藏人來說則是不策略的。西藏政府經常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把敵視清朝的藏民的利益同寺院、貴族和北京政府的不同利益加以調和。

一個長期不得解決的問題是選擇活佛的方法。在1793年，乾隆帝向拉薩致送金瓶，命令今后尋覓達賴、班禪和其他活佛的化身，要將候選者的姓名各寫一簽，貯于瓶內，由抽簽決定。傳統的確定方法則是根據一系列測驗，例如讓候選的幼童辨認其前世活佛的用具。選定的活佛一般都是主要藏官所同意的貴族。清廷則下令達賴喇嘛要在平民中選擇，并將金瓶送往拉薩，以阻止藏官按照占統治地位的政治集團的利益在貴族中選擇。在清廷看來，選擇像達賴這樣一位重要的活佛而用排除皇帝權威的辦法，那是不可思議的。西藏人不但認為金瓶是一種不受歡迎的干涉，而且還認為這是清朝在西藏具有權威的象征，正像清政府自己所認為的那樣。因此，在達賴圓寂之后，拉薩政府一方面要使西藏公眾相信指認活佛是采用傳統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向清政府保證，達賴事實上是從金瓶當眾抽簽選出的。

金本巴瓶在19世紀實際使用到何種程度，依然是個神秘的問題，不過在1841年和1858年這兩次一般都公認曾經使用過它，這時清朝在西藏的影響卻正處于最低潮。這表明當清朝的力量微弱到不足以在西藏發揮真正的權威時，西藏人還是愿意使用金瓶作為受清朝保護的象征。但是，在清朝強大時，西藏人為了強調西藏的自治，對金瓶的使用是有所猶豫的。

就在八世達賴圓寂以后的1804年，金瓶問題曾引起公眾對清朝干預的不滿。騷動者散發傳單，張貼告示，西藏政府為了穩定局勢吁請北京方面減少駐軍。清廷表示同意之后，拉薩政府的回報是囚禁了反清示威的魁首。然而抗議運動繼續進行，這是因為藏人認為噶廈官員與駐藏大臣同流合污，插手政府財政。攝政為了平息日益增長的民憤，曾將兩位噶倫加以軟禁，并派藏兵保護駐藏大臣，以防可能發生激怒清政府的事件。

公眾的猜疑似是有某些根據，因為在1805年，清政府經過調查曾將一位駐藏大臣枷押而歸，將另一位大臣流放烏魯木齊。攝政則將兩位被控貪污的噶倫降級，并把反清示威的頭目逐出拉薩，以回答清政府所作的姿態。在1808年，清朝還允許藏人選擇九世達賴喇嘛使用傳統的方法而不用金瓶。但是，清朝駐軍的聲威繼續下降。在1801年，駐藏大臣曾被迫向達賴和班禪借銀2萬兩以應駐軍需要，因為北京政府未將銀兩解到。但當駐藏大臣想再次告貸時，西藏人就拒絕了。不僅如此，清朝駐軍不能依例三年輪換。因此士兵與藏族婦女通婚，用這種微薄的收入贍養家口，弄得很窮困。這種婚姻關系也使北京對駐軍的忠誠發生疑問。到1815年，駐軍的財政發生危機，只得削減彈藥，減少操練。駐藏大臣變成了“不過是一位政治觀察家而已”。[[89]](#_89_Xia_Ge_Ba____Xi_Cang_Zheng_Z)



地圖5 19世紀初期的西藏

西藏政府面臨的另一個長期問題，是如何對待尼泊爾和英屬東印度公司。西藏人同尼泊爾訂有貿易協定，允許尼泊爾商人入境經商。東印度公司則是另一回事。西藏人不希望看到這樣一個強大的異己力量在西藏建立它的勢力。英國人會構成兩重危險，即他們不僅可能蠶食西藏，而且他們的蠶食可能引起清朝的反擊。1792年尼泊爾人的入侵曾導致滿人的干涉，并在拉薩建立了清朝的權威。英國在西藏的活動，也可能促使清政府加緊它對西藏的控制。這是西藏人所急于避免的；因此，他們盡量同英國保持一段距離。

1792年清朝的干涉切斷了西藏與孟加拉的貿易，也不許英國人到不丹。但是，商業前途仍然強烈地吸引著東印度公司的經理們，他們希望西藏能夠成為與中國內地直接通商的過道，希望能在西藏和不丹得到金銀去廣州購買茶葉。東印度公司還想在它的境內種植茶葉。在18世紀，他們曾試圖通過西藏得到茶種而未獲成功，但是他們后來仍在積極活動。為了達到這些目的，東印度公司把注意力轉向1792年之后成為清朝屬國的尼泊爾。盡管西藏和不丹都是對英商關閉的，東印度公司還是認識到，進入尼泊爾的英國貨可以假手尼泊爾商人到西藏出賣。因此，英國人很快利用尼泊爾人對清朝的不滿情緒，在1801年獲得在加德滿都派駐代表的權利。然而，當時的形勢尚不利于英國擴大對廓爾喀統治者的影響。英國與尼泊爾的關系迅速惡化，在1803年東印度公司只得撤回它的代表。當東印度公司繼續對尼泊爾施加壓力時，尼泊爾人則把他們向清朝的納貢說成是受中國人保護的關系。然而，1812年的尼泊爾貢使在北京卻沒有說服清政府答應在它同英國一旦發生戰爭時給予援助。清政府實際上拒絕了這一請求。

后來發生的1814—1816年英尼戰爭，使得清政府對屬國尼泊爾的立場明朗化了。尼泊爾政府再三向駐藏大臣呼吁說英國想吞并尼泊爾，也想取消尼泊爾對北京的進貢。錫金王擔心尼泊爾的擴張而左袒東印度公司，但對英國擴張主義更感憂慮的不丹人則同情尼泊爾。在西藏本土，班禪和某些拉薩官員也敦促清朝幫助尼泊爾。不過，西藏的攝政卻勸尼泊爾講和。最后，清帝指示駐藏大臣，此事盡管與清政府有關，但只要加德滿都能夠繼續五年一貢，尼泊爾人甚至可以歸順英國。正如駐藏大臣在致尼泊爾政府的信中所說：“皇上對你們是否親英毫不介意。……你們同英國打仗是在我們境外。我皇上不能發兵前往。”[[90]](#_90_Gen_Ju_Ni_Bo_Er_Wen_Shi_Liao)顯然可見，尼泊爾并不處于清朝保護之下。

英尼戰爭也看清楚了清朝的“一視同仁”理論的真相，按照這一說法，清帝對帝國境內外的一切國家是同等看待的。尼泊爾是納貢國，東印度公司則不是。然而清政府竟援引一視同仁的原則，來為它拒絕保護一個納貢國進行辯解。[[91]](#_91_Ling_Mu_Zhong_Zheng____Wei_R)英國人幾經挫折后戰勝了尼泊爾人，強迫他們讓出卡利河與蘇特里杰河之間的全部領土。清朝政府對此竟無動于衷。北京在推卸保護納貢國的責任時奉行的這種方針，使它在后來面臨朝鮮、琉球、哈薩克草原、帕米爾和清帝國其他邊區發生的許多不幸事件中能夠自我解嘲。

如同在中國本土一樣，清朝在亞洲腹地的權威也像一把重錘，平時對它的子民是高懸不用，一旦發生反叛則迎頭打擊。清朝的上層建筑幾乎從不干涉平民的事務，但是它的存在維持了當地統治集團的權勢，保留甚至固定化了當地的結構。

盡管清廷的政策是把亞洲腹地同中國隔離開來，但到19世紀初漢人向那里的擴張已經開始。在政府的同意下，奉天、青海、康區東部邊緣地區和準噶爾，都有漢民耕種土地。中國的州縣制也隨之而來。漢族農民還開始非法滲入滿洲邊境和內蒙古草原。漢商人數也增加了。在吉林和黑龍江的大小城鎮都有漢族商人和手工藝人，漢族流犯從事采礦和在林區挖參。漢商左右了從恰克圖到張家口的蒙古貿易，在草原各地做買賣。漢商和東干商在準噶爾的商業中起著重要作用，他們也在西藏的邊沿地區做買賣，甚至日益試圖將他們的活動伸向東突厥斯坦。只有西藏中部地區他們才未涉足。

雖然如此，這種擴張在19世紀初期也還有限。對亞洲腹地的平民來說，中國和漢人是遙遠的。旗人和清朝官吏只能偶爾見到。

北京從亞洲腹地各屬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多。誠然，清朝除了從它們那里求得安寧外，別無他求。滿人之征服亞洲內陸是出于戰略而不是利潤的考慮，目的是想防止敵對強國的興起。在陸路上，中國本土終于得到了妥善的保護。邊境問題也是存在的。英屬印度的擴張使清朝在西藏的權威受到潛在的威脅。浩罕的商業野心和瑪赫杜姆家族的宗教政治威脅著清朝對新疆六城的控制。強鄰俄國對新疆、蒙古和滿洲邊境也虎視眈眈。但是從中國本土看來，這些都是遙遠的麻煩。在1815年，北京對它們還幾乎毫無察覺。

（志勇 譯）

[[1]](#_1_1)參見入江啟四郎《中國邊疆和英俄角逐》；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克拉布：《中國和俄國的“大賭博”》；拉烏爾：《中亞的政治》；羅薩比：《1368年迄今的中國和亞洲腹地》。

[[2]](#_2_1)最近出版的書有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體》（我認為此書對寫這一章非常有用）；拉姆：《不列顛與中國的中亞：1767—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黎吉生：《西藏簡史》；涂奇：《雪山之國西藏》（德賴弗英譯）；夏格巴：《西藏政治史》；斯內爾格羅夫、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百太安：《西藏的文明》（德賴弗英譯）。

[[3]](#_3_1)徐松的《西域水道記》（卷1，第18頁）似將博洛爾置于吉爾吉特山谷。參見坎寧漢《從自然、統計和歷史角度看拉達克，兼及其毗鄰諸國》，第45頁；穆罕默德·海德·達格拉特：《中亞莫臥兒人的歷史》（羅斯英譯，伊萊亞斯編），第135、384—385頁；伯希和：《馬可波羅游記注釋》卷1，第91—92頁；佐口透：《俄國和亞洲的草原》，第181頁（顯然是根據徐松著作寫成）。

[[4]](#_4_1)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第179頁；坎曼：《不列顛打通西藏的最初嘗試》，第140頁，尤其是注73。

[[5]](#_5_1)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第66頁。

[[6]](#_6_1)何炳棣：《中國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第158—163、283頁。

[[7]](#_7_1)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第23、113頁；參見賽諾《雜談關于亞洲腹地的史學（Ⅰ）》，載《亞洲史雜志》卷7第2期（1973年），第186頁。不過羅伯特·李是正確的。盡管1927年豪沃還用滿文護照，但在20世紀，講滿語的人是很罕見的。

[[8]](#_8_1)見《大清高宗實錄》卷743，第4頁（1765年10月4日）。此條我參考了孟思明1949年未發表的論文《1858年璦琿條約的簽訂》，第10頁。

[[9]](#_9_1)納羅契尼茨基：《1860—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50頁（關于19世紀70年代庫頁島的天花和梅毒）。

[[10]](#_10_1)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第47—48頁。本節主要依據此書。

[[11]](#_11_1)這個問題還需要作認真的歷史研究。關于對20世紀人口的估計，可參閱邁斯基《革命前夕的蒙古》第2版，第28—30頁；米勒：《內蒙古的寺院和文化變化》，第25—72頁；《人民中國手冊》，北京1957年版，第14—15頁。

[[12]](#_12_1)拉鐵摩爾；《重訪蒙古》，第33頁。

[[13]](#_13_1)法烏斯特：《1727—1805年俄國的對華貿易及其背景》，第85頁。

[[14]](#_14_1)參看羅伯特·李的《滿洲邊疆》一書中關于打牲諸旗所負擔的納貢義務，第51、56—57頁。

[[15]](#_15_1)納扎格多爾濟：《蒙古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拉鐵摩爾英譯），載《現代亞洲研究》第1卷第3期（1967年），第268頁。

[[16]](#_16)橋本光寶：《蒙古的喇嘛教》，第199—200頁。

[[17]](#_17)見海希格《蒙古的宗教》，載涂奇和海希格編《西藏宗教與蒙古》，第408—410頁。

[[18]](#_18)參看鮑登《一件19世紀的蒙古法律文書》，載《波恩大學中亞研究》卷3（1969年），第231、247頁注36。

[[19]](#_19)米勒：《內蒙古的寺院》，第27—31頁；邁斯基：《革命前夕的蒙古》，第42—43頁；鮑登：《蒙古近代史》，第160頁；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體》，第121頁。

[[20]](#_20)田山茂：《清代的蒙古社會制度》，第280—281頁。

[[21]](#_21)見《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第2版，第211—212頁；鮑登：《蒙古近代史》，第173頁。

[[22]](#_22)羅薩比：《1368年迄今的中國和亞洲腹地》，第171頁。

[[23]](#_23)中文版編者按：原文此注在第60頁上者漏印，我們僅就其第61頁上者翻譯如下。“……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7669000蒲爾——見曾問吾前引書第286—287頁），外加渾巴什的生銅（值1600000蒲爾以上——見曾書第290頁），再加向居民征收的生銅（11053斤，等于1092000蒲爾以上——見曾書第290頁）。關于銀兩兌換率，見曾書第289頁。這個問題需要仔細研究。也見納羅契尼茨基前引書，第110—111頁。”

[[24]](#_24)參見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從克什米爾經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道森英譯），載《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50年第12期，第383頁。

[[25]](#_25)佐口透在《18和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中的說法與此相反，見第272—279頁。

[[26]](#_26)見傅恒等編《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2，第17頁；卷44，第23等頁。

[[27]](#_27)綿忻等編：《欽定新疆識略》卷12，第3—4頁。

[[28]](#_28)魏源：《圣武記》卷4，第32—33頁。

[[29]](#_29)瓦里哈諾夫：《全集》卷1，第301—302頁。

[[30]](#_30)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275—278、282頁；但第280頁又說近14倍，此數同第278—280頁附表的數字不符。

[[31]](#_31)見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0—341頁，尤其是注3；又見涅波爾辛《俄國的中亞貿易概述》，載《俄國皇家地理學會論叢》卷10（1855年），第341—342、347頁；又見貝柳《喀什噶爾史》，載于福賽思《1873年出使葉爾羌報告》，第201頁（其中的“沙菲派”，即指沙菲伊法學派）。

[[32]](#_32)沃森：《中國韃 靼里亞與和闐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卷4第48號（1835年12月），第662頁。

[[33]](#_33)佐口透：《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197—198頁；又見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2頁。

[[34]](#_34)見涅波爾辛《俄國的中亞貿易概述》，第345、347頁；赫爾麥森編：《關于基發、布哈拉、浩罕和中國西北的報告》，載《俄國與亞洲鄰國知識》第1及第2輯（1839年），第95—97頁；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2頁。赫爾麥森和洪堡德把法伊德·阿丁記作薩伊夫·阿丁和“塞伊夫林”，見上引《關于基發、布哈拉、浩罕和中國西北的報告》，第89頁。

[[35]](#_35)米爾·伊扎特·阿拉：《1812—1813年中亞游記》（亨德森英譯），第30頁。

[[36]](#_36)見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39頁。20世紀以后中國西北的突厥族中還有人信佛教。

[[37]](#_37)見米爾·伊扎特·阿拉《中亞游記》，第38頁。

[[38]](#_38)見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295、297、338—339、341—342、389、419、643及657諸頁。又見哥隆布《東突厥斯坦的土地耕種：綠洲經濟和游牧》，第25—26頁。

[[39]](#_39)賈林：《記東突厥斯坦的薩滿教》，載《人種學》1961年第1—2期，第1—4頁；米爾·伊扎特·阿拉：《中亞游記》，第28頁；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7頁。

[[40]](#_40)張志義：《新疆的土地利用和定居的可能性》，載《地理評論》第39期（1949年），第58、66頁。

[[41]](#_41)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旅行記》，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卷25第4期（1856年），第348頁。

[[42]](#_42)戴布斯的《中國突厥斯坦的發現和探察史》（本書有中譯本，題為《新疆探察史》，1978年，新疆博物館。——譯者）第75頁提到1886年喀什噶爾曾發生流行性霍亂，但哥隆布在其《東突厥斯坦的耕種》第9頁上則稱并無此事。關于霍亂和地震的情況還可參閱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9頁。

[[43]](#_43)哥隆布：《東突厥斯坦的耕種》，第9—10頁（根據20世紀的情況）。

[[44]](#_44)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5頁。

[[45]](#_45)關于它的敘述，見德雷克《大麻種植者手冊》，第6頁。

[[46]](#_46)阿赫麥德·沙：《旅行記》；又見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7頁。

[[47]](#_47)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3頁；但應參照阿赫麥德·沙的《旅行記》（第384頁），他指出只有農民才要繳納人頭稅。

[[48]](#_48)見米爾·伊扎特·阿拉《中亞游記》，第27頁。

[[49]](#_49)參見杜曼《清帝國對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的征服》，載齊赫文斯基所編《滿人在中國的統治》，第285—287頁。作者給人以錯誤的印象，使人們覺得這種土地制度是清朝的新創。

[[50]](#_50)波羅夫科夫在他的《喀什噶爾所出1812年的瓦庫夫文書》（載季赫米洛夫所編《考古地理學1959年年鑒》，第344—349頁）一文所引1812年的瓦庫夫條目中，并未提到清政府。關于19世紀新疆的宗教捐贈的文書，現保存在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尚未編目），其中兩件的日期是1804年，一件是1867年，一件是1879年。1867年的文書寫在羊皮紙上。其他三件是抄本。

[[51]](#_51)阿赫麥德·沙：《從克什米爾經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4頁。

[[52]](#_52)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276頁（據載，1777年有耕地45186畝，綠營兵為2380人，流犯為180人）。

[[53]](#_53)阿赫麥德·沙：《從克什米爾經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3頁。

[[54]](#_54)阿赫麥德·沙：《從克什米爾經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4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9頁。

[[55]](#_55)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

[[56]](#_56)赫爾麥森：《關于基發、布哈拉、浩罕和中國西北的報告》，第81頁。

[[57]](#_57)穆爾克羅夫特、特雷貝克：《1819—1824年在印度斯坦喜馬拉雅山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記》卷2，第479頁（本書參考書目為1825年——譯者）；又見戴維斯編《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第357頁。

[[58]](#_58)見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16—19、92—96、115頁；又見作者的同名文章載《哈薩克科學院院報：歷史、考古、人種學專集》3（17）（1961年），第84頁。

[[59]](#_59)見戴維斯《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第25—26頁，又見第312、335頁。參見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6頁，作者說庫車人口主要是加爾梅克人。他說：“富有的要人住在城內，窮人則住在郊野的帳篷里。”沃森的材料是19世紀30年代的，他顯然把庫車與焉耆混為一談了。

[[60]](#_60)見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680頁（書中將shelkovymi誤作melkovymi）；伊扎特·阿拉：《中亞游記》，第24頁；阿赫麥德·沙：《從克什米爾經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2頁（書中“百分之四十”應系“四十分之一”之誤）；涅波爾辛：《俄國的中亞貿易概述》，第347—348頁；庫茲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19頁。

[[61]](#_61)見穆爾克羅夫特和特雷貝克《在印度斯坦喜馬拉雅山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記》卷1，第452頁。

[[62]](#_62)《大清宣宗實錄》卷262，第24（1835年2月16日）、26頁（1835年2月19日）。

[[63]](#_63)見赫爾麥森《關于基發、布哈拉、浩罕和中國西北的報告》，第96頁。

[[64]](#_64)見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51頁。

[[65]](#_65)感謝岡田英弘在1971年把這一滿語詞匯的含義告訴我，據告那是由漢字“胡岱達”音譯而成。參見佐口透《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380—383頁；佐口透：《浩罕王國的東方貿易》，載《東洋文庫研究紀要》第24期（1965年），第86—89頁。

[[66]](#_66)沃森：《中國韃 靼 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4頁。

[[67]](#_67)椿園七十一：《西域聞見錄·新疆紀略下》卷2“阿克蘇”條。參見佐口透《浩罕王國的東方貿易》，第68頁。

[[68]](#_68)曹振鏞等編：《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9，第5頁（1826年2月14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1818年）卷742，第11頁。

[[69]](#_69)見伊扎特·阿拉《中亞游記》，第45—46頁。

[[70]](#_70)參看戴維斯《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第340頁上記述了浩罕人綁架一名清朝邊境官員的材料，可作旁證。

[[71]](#_71)見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52頁。

[[72]](#_72)沃森：《烏茲別克地區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卷3第32期（1834年8月），第378頁。

[[73]](#_73)季姆科夫斯基：《經蒙古至中國的旅行記》卷2，第77頁，注1（七和卓中四人被殺，兩人被清俘獲，僅薩木薩克一人得脫）；甘科夫斯基：《杜蘭尼人的帝國》，第31—32頁；哈特曼：《察哈臺汗的終結與和卓在喀什噶爾的統治》，載作者所著《伊斯蘭東方》，第314頁。

[[74]](#_74)其數目自200到1000元寶不等。見庫茲涅佐夫《論張格爾運動的反動實質》，第77頁；佐口透：《18和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10頁；佐口透：《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復興》，載《亞洲學報：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通報》14（1968年），第15頁；阿布杜·卡里姆·布哈里：《1740—1818年中亞史》，謝弗法譯本，第217—218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172、317頁；納里夫金：《浩罕王國史》，A.多藏法譯本，第132頁。

[[75]](#_75)穆罕默德·塔齊·西皮爾：《薩拉丁·哈札兒傳記》第一部分，穆罕默德·巴齊兒·比布迪編，第229、231頁。

[[76]](#_76)參看格里戈里耶夫《東突厥斯坦或中國突厥斯坦》，此處材料不同，載作者自編《利特爾地理志：與俄國接壤的亞洲國家地理》，見《俄國地理學會論叢》第2分冊第1章，第441—442頁。

[[77]](#_77)參見納札洛夫《中亞民族和地區概述》，第42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1317頁。

[[78]](#_78)參見《大清仁宗實錄》卷312，第30頁（1815年12月27日）。

[[79]](#_79)斯內爾格羅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27頁。

[[80]](#_80)此數兩倍于錢德拉·達斯在《西藏的寺院》（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卷1第4期〔1905年〕，第106頁）中所估計的19世紀藏族男性人口數；但低于麥克唐納在《喇嘛的土地》第115頁對20世紀早期的估計。

[[81]](#_81)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96頁。

[[82]](#_82)弗蘭克：《西藏西部史》，第127頁，引文轉引自穆爾克羅夫特《在喜馬拉雅山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記》卷2，第28頁。

[[83]](#_83)彼特奇：《1728—1959年西藏的貴族和政府》，第13頁；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73頁。

[[84]](#_84)施拉姆：《甘藏邊境的土族：第三部分：土族系譜記錄，湟中土族史與魯家家史》，載《美國哲學協會會刊》1961年新刊，卷51第3號，第65頁；關于摻雜道教的問題，見施拉姆《甘藏邊境的土族：第二部分：他們的宗教生活》，載同上會刊，1957年新刊，卷47第1號，第84—90、126頁。

[[85]](#_85)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體》，第137—138頁。

[[86]](#_86)彼特奇：《西藏的貴族和政府》，第7—19頁。

[[87]](#_87)見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體》，第127—136、213頁。

[[88]](#_88)達斯：《西藏的寺院》，第106頁；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體》，第121頁。

[[89]](#_89)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70頁。

[[90]](#_90)根據尼泊爾文史料“Itihas Prakas”，見羅斯《尼泊爾：求生存的戰略》，第73—87頁（引文見第86頁）。

[[91]](#_91)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第174頁。

#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

要廣泛地闡釋清代晚期的歷史，必然要回頭談一談清王朝衰落的面貌。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晚清時期某些政治和社會的細節就會感到，對清王朝的衰落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來說還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不足之處；而且這種考察還可能借此發現把晚清同中國近代史的廣泛趨勢聯結起來的某些長遠的社會和政治變化。清王朝的衰落在傳統上還包含有官僚制度喪失了道義和行政活力的意思。可是，這種現象從官僚賴以生存的社會和政治現實的角度來看比從常見的衰落中的道義范疇這一角度來看更容易理解。當然，官僚制度中存在著大量貪污腐化；但是早在19世紀初期，在中國著名的學者和行政官員中間就已經出現了關心制度改革和國家防務的浪潮。[[1]](#_1_Wo_Men_Liang_Wei_Zuo_Zhe_Ying)

清王朝的衰落向來被理解為中央集權的式微和地方總督權力的擴大，是國家和社會之間均勢的瓦解。這種權力分散過程的某些方面在19世紀確實有所表現。但清代的制度在19世紀的毀滅性內戰之后仍能令人驚異地把中國維系在一起，這個事實保證了20世紀的革命變革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而且能夠達到保住國家的首要目的。因此，我們在考察乾隆末年以來清代權力衰落的問題時，中國已經取得的全國政治統一的程度——即使在學者名流的公共生活中泛濫著腐化的庇護制度的情況下——是必須考慮在內的。

這時期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詐盤剝、追求私利和顢頇無能：所有這些都促進了群眾性的叛亂活動。要理解這種現象必須從嘉慶初年政治危機的后果及其在推行基本變革方面所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就開始。

嘉慶帝在他父親于1799年去世時所面臨的最緊迫的任務，是使他們的政府清除和珅的影響。皇帝采取了迅速的行動。在他的父親死去不到一個月和珅就死了，他的心腹也都紛紛被貶。剩下的問題是怎樣對付和珅那一派所建立和卵翼的龐大的庇護制網絡，因為和珅派的影響已滲透到各省官僚界中，特別是滲透到了軍事部門之中。皇帝決定，由于這些人人數眾多，官職牽涉面廣，不宜搞一場清洗運動。他寧可認為許多人都是誠實的官員，只是誤入歧途而已，因此他們在正確的領導下是可以恢復工作的。他還進一步擔心，無窮無盡的清洗會恫嚇住官僚政治，使他想重建官吏和皇帝之間互通聲氣的努力不能實現。他論證說，許多人當時是沒有別的選擇，只有走侵吞公款的道路，如果他們想保住他們的職位的話。[[2]](#_2___Da_Qing_Ren_Zong_Shi_Lu)

因此，皇帝本人在某種程度上就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來消除和珅20多年影響的流毒。為了這種沉默態度，他在當時就受到了批評。[[3]](#_3_Jian_Hong_Liang_Ji_De_Yi_Feng)但是，嘉慶政府中的另一困難是潛在的復雜的社會問題，這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組織能力所完全不能解決的。其中的中心問題是資源與人口比例失調。

## 人口的壓力及其后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國社會史的最顯著特點是人口的增長。當時的許多獨特情況也許可以用這個問題來加以說明，雖然在當時已被人們有所察覺的人口問題的具體影響之所及至今仍未被充分地加以研究。從17世紀末起到18世紀末白蓮教叛亂時為止這一長時期的國內和平階段中，中國人口翻了一番多，從1.5億增加到了3億多。僅在1779—1850年時期人口就增長了56%，所以在19世紀中葉大叛亂爆發的前夕人口已達4.3億左右。[[4]](#_4_He_Bing_Di____Zhong_Guo_Ren_K)

在這個相對安定和人口增長的時期，商業設施已有了發展，可以滿足地方貿易和地區間貿易日益增長的需要。18世紀是內地農村定期集市開始發展的起點，也是南北海運繁榮的起點。城市的商人行會的增多和信貸組織——最初的錢莊和山西的票號——的出現，表明貿易的性質和范圍都有了改變。這種私營貿易的增長也表明了商人在政府控制的鹽務稅之外正在積累和投放資本，要知道，鹽業是那時商人集中投資的目標。歐洲市場對中國的茶、絲和瓷器的需求又進一步刺激了國內貿易的商業化。雖然商業化給人口稠密的平原和沿海地區的城鎮帶來繁榮和富裕，但那些不與貿易集散地和交通要沖發生聯系的地區仍然處于貧困和不景氣的狀態中。無地的移民，作為人口變動的產物，他們反而浪潮般地涌入這些偏遠地區。

從明代以來，有許多因素使中國的食品生產趕上了它的人口增長的比例。由于地區間的移民，又由于在新開發的土地上種植從美洲移植過來的新食品——甜薯、玉蜀黍和花生，因而新墾殖土地面積的增加使得增長的人口能投入生產。更多的人口也意味著有更多的人力可用于種雙季稻的精耕細作之中，還意味著有更多的大糞肥料。這種耕作制度在18世紀末就已明顯地開始感到了它的報酬在減少，因為這時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經達到了它的頂點。

更重要的是，人口對于土地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連那些邊遠地區的人口也呈飽和狀態。例如，富饒的四川盆地在18世紀就吸收了大量的外來移民，早已人滿為患；甚至它的東部山區也已住滿了其他省份因歉收而來的難民。廣西的幾條河谷地帶是廣東東部客家在18世紀移居的地方，這里土地的競爭也很激烈。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來移民在1795年與當地的苗族爆發了嚴重的沖突。也許長江下游各省是人口極端稠密的地區，它們不久變成了當時最具毀滅性的內戰的戰場。[[5]](#_5_Po_Jin_Si_Ceng_Jing_Yan_Jiu_L)許多仍然留住在農業定居地區的無地農民則替政府當勞工，或者被雇為兵勇，或者當了地方官的吏役。所以，農業經濟中日益增長的盈余與乾隆時代的長期和平，曾經生產和哺育了日益增長的人口，但是沒有促使經濟和政治出現新的發展以吸收那么多的人口。在傳統體制內的這一繁榮時期，埋下了19世紀最初幾十年危機的根子。[[6]](#_6_Ling_Mu_Zhong_Zheng_Fa_Zhan_L)

在中華帝國末期的歷史中，人們已在許多方面感受到了人口的增長，這是由清代社會和制度的特點決定的。如果說人口的增長對農民生活的影響最終是毀滅性的，那么，它對政治制度的影響也同樣嚴重。這個時期的政治生活的特點是，各級官員激烈地進行競爭，以謀求升遷和保全官職。這種競爭往往采取違法形式：它也許是使人員流動升遷的正常機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長這一事實所決定的。

雖然對這個問題研究得還很不夠，看來中國那時可能已在經歷著有時與現時代不發達社會相聯系的那些典型癥狀：文化人生產過剩，因為容納他們并給他們以報酬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能力有限。促進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一為教育制度是專為培養公職人員的；一為價值體系往往禁阻有文化的干才從事其他事業；一為行政機構阻止它自身擴展或重新組成新形式，以適應周圍正在變動的社會。

不論是政府公職的法定數額，也不論是科舉的名額，都沒有按照人口的增長速度而增長。雖然在某些地區進士的分配名額有所增加，但比起整個18世紀增長的人口數來說，進士及其以下功名的總數實際上是顯著下降了。乾隆時代的進士名額在絕對數字上已有所減少，生員名額則是穩定的。甚至從前不受數量限制的童生，在18世紀末也受到了限制。人們要求得到這種社會地位的愿望是如此強烈，致使縣官們可以靠接受希望避免除名的童生的賄賂而大發其財。清代實行捐監，即為榮譽學銜和實授公職舉辦捐納，它雖然不斷地用這種辦法來開辟財源，但捐納制度顯然還不能充分滿足人們希望得到這種優越社會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出售功名和官階使適合做官條件的人數增加，因而實際上加劇了對有限官職數量的壓力，這在某種意義上就突出了仕途升遷道路顯然不足的狀況。[[7]](#_7_Guan_Yu_Gong_Ming_Ming_E_De_B)

這種要求必然要另找出路。在地方上，最顯著的后果是各級行政機構冗員充斥。他們不是行政等級制度中的正式成員。他們毋寧說是一些隨員和食客、官吏的家屬和幕賓、個人的助手和仆役、受雇的勞工和普遍存在的胥吏。干著記錄、送信、催科和地方性任務的吏役階層充滿著唯利是圖之輩，他們許多人都識字，但合法的晉升道路對他們來說是堵塞的。一位按察使于1800年抱怨說，近年來書役超過了定員不知多少倍。原來有一個書吏，現在有了幾個文案，原來有一個差役，現在有了十多個幫手。如果這一估算大致不差的話，吏役階層在18世紀時期是大大地繁衍了。[[8]](#_8_Luo_Zhen_Yu_Bian____Huang_Qin)

明末開始實行“一條鞭”法改革之后縣級政權負擔加重，這是這些員額膨脹的部分原因。[[9]](#_9_Wa_Te____Zhong_Hua_Di_Guo_Mo)但是，根深蒂固的社會壓力也在起作用。各級政府都變成了越來越增多的職業大軍所附著的機體，他們利用帝國的行政機器作為自己經濟斗爭中的武器。1803年一位御史的悲嘆表明了這一斗爭是成功的，因為按照他的說法，胥吏和幕友現在的衣著是如此豪奢，以致現在不再能夠分辨人們的上下貴賤了。[[10]](#_10_Luo_Zhen_Yu_Bian____Huang_Qi)這些冗員都要靠得自庇護網絡結構的錢來養活，錢雖然掏自官僚的腰包，但歸根結蒂是從納稅人身上用敲詐勒索的辦法搜括來的。[[11]](#_11_Gong_Qi_Shi_Ding____Qing_Dai)

19世紀初葉是在這以前的一百年內中國統治下的和平的頂點，[[12]](#_12_He_Bing_Di____Qing_Dai_Zai_Z)因此它產生了有教育的一代新人，這些人在文官制度中找差事，但文官制度的缺額并未隨人口的增長而加多。結果是所謂候缺的官員人數增加——這些人都有做官的資格，但無官可做；同時有越來越多的生員，他們在低級科舉考試制度中上了榜，但在攀登高級考試時因名額受限而被擯棄。[[13]](#_13_Di_Ji_Gong_Ming__Ru_Jian_She)許多人設法捐買高級功名，這個辦法隨著政府因開辟新財源而越來越流行。許多人在謀取官職時受挫，也有許多人轉而在官制以外謀求其他職業。

在激烈競爭的情況下，有些善于權變的文人想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管理性事業中找出路。一種人是包稅人，這種行業雖然懸為厲禁，但把老百姓的稅收委托人代辦（即所謂“包攬”），在地方社會上卻是一種很流行的能賺錢的職業。另一項有利可圖的行業是“訟棍”（“訟師”），他們在縣衙門里幫別人包攬詞訟。我們認為可以把這些人看作是初期的辯護師，但在官場看來，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健訟者和莠民。清代的法律制度沒有給他們以合法地位。但是很明顯，又做包稅又做包攬詞訟角色的“刁生劣監”，在地方政府中起著一定的作用。有優越社會關系的包稅人能夠給他們的庇護人以某種保護來對抗衙役的專橫，而合法的健訟者能夠通過他們的文牘技巧和在縣衙門建立周密的聯系來潤滑司法機器。這兩種角色都與某些人所行使的地方行政職能的商業化有關，因為他們的政治才能未能得到合法的機會來施展。[[14]](#_14_Guan_Yu_Jian_Song_Zhe__Jian)

從官方的觀點看來，在地方的這些實權派集團中，書役是最陰險狡詐、最沒法管束的。清代的回避制度以及根深蒂固的官場風氣都表明，縣令都不甚了了他們縣署行政工作的細枝末節。因此，雖然大家都承認書役為患之烈，可是沒有了他們，哪個縣令也辦不成事。[[15]](#_15_Wang_Yun_Wu_Bian____Dao_Xian)

## 教育、庇護制與社會晉升之路

明清兩代的主要晉升道路是通過教育和文官考試制度。明代的多數教育機構都是私人辦的，在清代它們逐漸受國家官員的控制。雍正時代，一系列省一級書院受政府之命建立起來，由國家給予津貼。[[16]](#_16_Sheng_Lang_Xi____Zhong_Guo_S)后來的乾隆時代是以宮廷用敢作敢為的方式關心學術活動著稱，這種關注既采取了慷慨庇護制的形式，也采取了大興文字獄的形式。雖然國家還沒有直接控制省一級書院課程，但政府創辦這些書院的一個公開的目的（用雍正帝的話說）是“黜浮崇實”和杜絕考試制度中的“流弊”。[[17]](#_17_1733Nian_Shang_Yu__Zai_Tong)乾隆時代文字獄的重點在于貶斥有關北方和西北邊境問題以及關于陸海軍事防務問題的學術著作。[[18]](#_18_Fu_Lu_Te____Gan_Long_Shi_Qi)雖然文字獄時期的種種限制在1800年以后已迅速減弱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但自19世紀以來，很大數量的書院在政府控制和檢查制度的雙重壓力下已蛻化成為專門教授科場文字的技術學校了。當時批評這一點的人舉出了許多的理由，其中一種理由是，由于靠個人推薦和靠行賄以獲取教職起了重要作用，致使教學質量下降；一種理由是指過分重視了考試的及第與否。[[19]](#_19_Sheng_Lang_Xi____Zhong_Guo_S)

考試性質的變化也是求職的競爭日趨激烈的反映。一方面，受教育機會越來越增加，也越來越規范化。其次，地方書院網建立以后，學生可以離開本鄉本土求學，這無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養了希求上進發跡的愿望。在中國新開發的地區，升遷的機會更是有增無已。但就總的趨勢來說，特別是在富饒而人口稠密的東南地區，上升的機遇則是每況愈下的。[[20]](#_20_He_Bing_Di____Zhong_Hua_Di_G)

在19世紀社會中取得成就的合法道路上的這些滯礙，即教育和文官制度中的問題，促使人們訴諸非法途徑，從而提高了非法途徑的重要性，特別在富裕和有權勢的人們中更是如此。這些滯礙也鼓勵那些當權人物力圖因人設事以用于收容一個朋友或報答一件恩寵，從而擴大了候補官員的隊伍，他們麇集在水陸交通要道等候著不可能兌現的任命；同時這也在考核合格的謀求官職者中增加了薦舉的重要性。[[21]](#_21_Guan_Yu_Ren_Ming_Zhi_Du__Jia)

對社會升遷現存渠道的壓力，無疑地促成了清代中國政治行為的特殊型式——即庇護制網絡結構——的形成，在這個結構中，在庇護者與被庇護者的關系中負擔的義務比他們在政府工作中通常承擔的要多一些。庇護網結構有它傳統的社會關系的根源。這種社會關系主要表現為親屬關系和同鄉關系。共同的家庭紐帶或者共同的鄉里關系是與陌生人交往時應用的第一原則。它被用來確定社會的親疏距離和等級制度，也被用來辦理公務和確定相互間的義務。在沒有這種紐帶的情況下，通常就制造假親屬關系來代替它。這種關系是非正式社會交往的基礎，也是常設性社會組織——從詩社到秘密會社到商業行會——的支柱。在學界和官場上，教育和考試制度也維系著同樣的庇護人—被庇護人的關系，在這里上級就是先生（“老師”），下級就是學生（“門生”）。“老師”不僅包括學校中的教師，也包括政府官員，即鄉試和會試中的主考官，以及各省的提學。

在非私人的制度中摻進些私人關系，這一趨勢在社會交往中的各個方面都有所表現。這種趨勢在行政和公務中至少都被認為是發揮效率的潛在障礙，而從最壞的方面說它被視為腐化的根源。這樣結合起來的私利能夠破壞行政中的公益或者商業企業中的集體利益。招權納賄、任人唯親、裙帶關系以及所有饋贈和小恩小惠，是中國官場的通病，而這種事實是被接受，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是被體諒的。所以問題不在于消滅這些陋習，而是如何把它們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圍內。

這種妥協需要比政府力所能及的更細心的平衡。通常的辦法是由官方禁止一切行賄、饋贈和徇私枉法之舉，因為假定：凡是繼續偷偷摸摸地干的事，就能夠把它們保持在可容忍的范圍之內。因此，新皇帝登極時總是布告天下禁阻這種種弊端和搞這些活動的派系。那些被認為是國家官吏之間搞結黨營私的行為，要受到彈劾和懲治。凡是這些政策被嚴格執行的時候，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即不論在社會上和官場上，都不可能又要討好上官而又不冒遭到批評的危險。一紙便條、一句話、一次訪晤，都可能使這一行動的主、客體雙方招致疑慮。

自然，由于社會交際從來不會禁絕，甚至嚴厲的禁令也不能阻止形成政府所反對的那種私人的政治和社會聯盟。因此，測量官場腐敗到什么程度的好方法是看私人的派系紐帶在某一時期公開表現，甚至夸耀到了什么程度。這反映在和珅官邸外面的干謁者門庭若市這一丑聞上，也反映在一位官員的言論中，他在贊譽另一位顯宦的品質時說，他的門內沒有私人干謁者。官場和學界中庇護人—被庇護人關系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在吏治混濁時代的變本加厲，對庇護人和被庇護人來說都變成了一個負擔。許多官員拒絕當提學，因為這個差事有過多的政治義務。許多及第的士子沒有得官，因為他們忽視，或者更糟糕的是拒絕了向有權勢的官員表表例行的“敬意”。

據說，中國的黃金時代是師即吏而吏即師的時代。19世紀是教育腐敗的時代，這正是因為它與官場風氣聯系太緊之故。由于老師是庇護人，而門生是被庇護人，也就明顯地包含有政治義務在內。當然，政治關系的確立可以通過向要得到其恩寵的人送禮，并自稱為他的“門生”。用這種方式，雖然不光彩，但可以變成權勢人物的“門生”，即使前者年歲較輕和學識較淺也在所不計。[[22]](#_22_He_Chang_Ling____Huang_Zhao)

## 嘉慶的改革

嘉慶帝認為，掐斷了和珅的庇護制網絡結構的花朵，它的根株便會自然枯萎。他逐步地撤換并貶斥了和珅在各省政務中的一大批有權勢的追隨者。他對和珅時代仍保持廉潔的那些在乾隆時期被重用的顧問們再次表示信任，此即他從前的師傅朱珪、軍機大臣董誥和前都御史劉墉。他號召公開批評政府中的問題，命令官員們可以直接和秘密地給他上奏議，不需求助于曾經成為和珅影響的中心的軍機處。[[23]](#_23___Da_Qing_Ren_Zong_Shi_Lu)與此同時，他還強調，他決定要祛除軍機處的私人陰謀活動，派了一位御史來監管軍機處的科室。[[24]](#_24_Liang_Zhang_Ju_Bian____Shu_Y)但是，上層行政的改革不能醫治19世紀官僚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弊病。省級行政是如此腐化，致使嘉慶帝在掌權六年之后尚未恢復鄉村的秩序，盡管他下狠心要根除秕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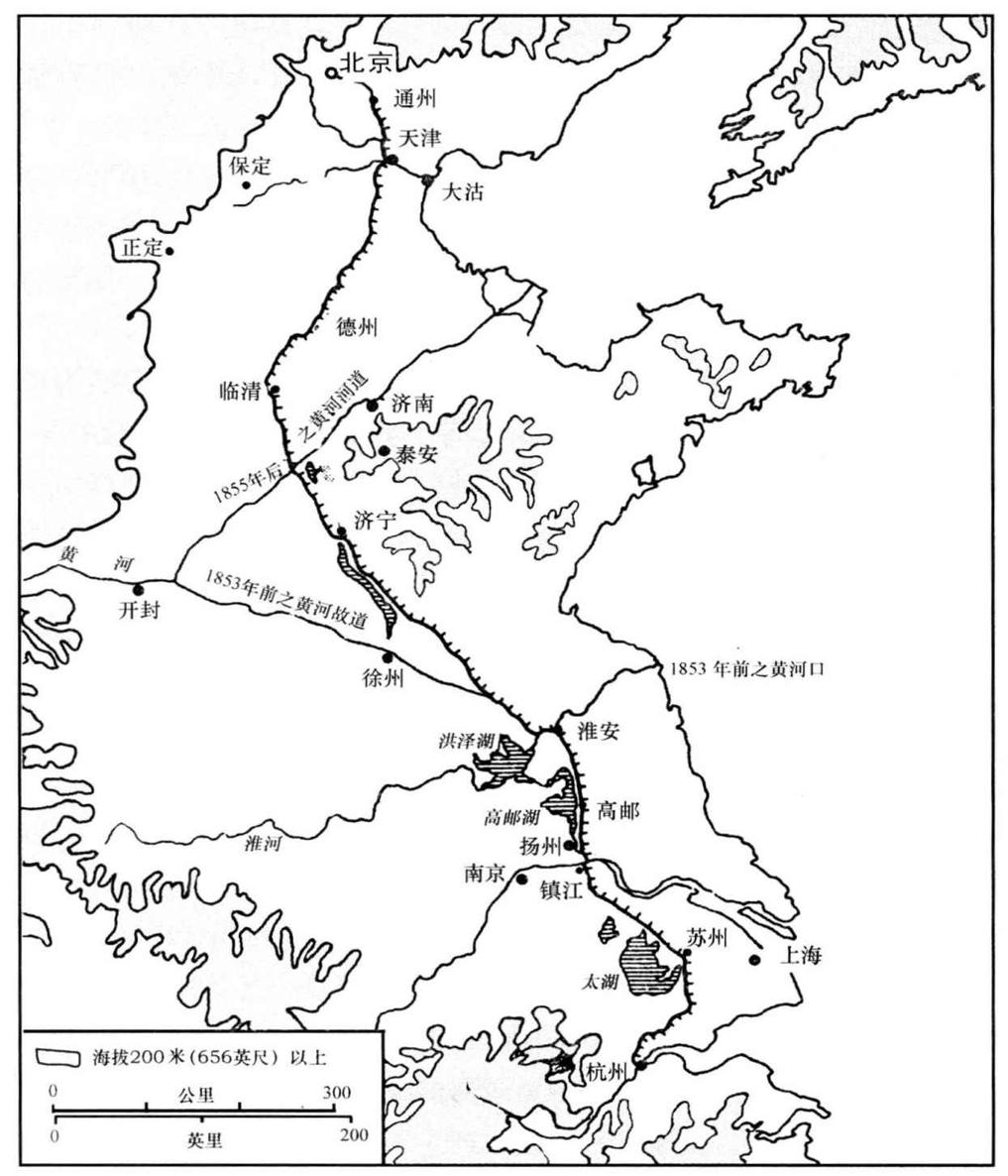
嘉慶帝把他們的改革集中在兩方面：撤換官員和節約開支。和珅時代大部分省一級高官都已被撤換。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11個身居要職的官吏中，6個被迅速撤換：他們是駐南京的總督、陜甘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和云貴總督，以及漕運總督。次年又撤換了河道總督二人。[[25]](#_25_Qing_Shi_Bian_Zuan_Wei_Yuan)

這些改革是把和珅的老朋友換成了原來反對過他的人，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曾因和珅的關系受到過貶謫。例如，取代景安為湖廣總督的吳熊光，曾經因和珅于1797年用了計謀而未能保持軍機處的職務。1799年彈劾和珅的一位副都御史之兄高書麟，因與和珅沖突而被貶往西部邊疆地區任職。和珅死后，高書麟當上了云貴總督。其他官員都由朱珪薦舉到各省任職：王秉韜被任命為河南的河道總督，荊道乾被任命為安徽省的新巡撫，阮元則被任命為浙江省的巡撫。[[26]](#_26_Guan_Yu_Zhe_Xie_Bian_Hua_De)

在這次改革中下臺的這些省級官員，都受到御史們為響應皇帝重新廣開“言路”——對政府進行批評的傳統渠道——而上呈的彈劾奏章的指控。[[27]](#_27___Da_Qing_Ren_Zong_Shi_Lu)但是，皇帝左右的一位滿族親王卻認為，嘉慶帝早在這時以前就已經聽信了忠言，并且在消除和珅集團的行動中乾綱獨斷地作出了決定。[[28]](#_28_Zhao_Lian____Xiao_Ting_Za_Lu)

根據最近的考察，嘉慶時代開始了漢族官員在清朝省一級政務中占支配地位的局面，而這種種族比例的變化原來被人們認為開始于太平天國叛亂的時期。[[29]](#_29_Kai_Si_Le____Qing_Dai_Sheng)因此應該注意到，許多滿族御史是屬于1799年響應改革的號召和提出彈劾的人。[[30]](#_30_Zhao_Lian____Xiao_Ting_Za_Lu)這個時期的任命中是否考慮了種族界限，這還是一個尚待研究的問題。至今尚遠遠沒有證據表明，嘉慶初年的改革是執行了一條種族主義的路線。

1799年迅速接連發布的新任命在事實上是否預告省一級行政在進行一次真正的改革，這一點還不太清楚。所有新的被任命者都是和珅時代官僚政治的一部分，而不管他們是否屬于和珅集團。況且和珅集團中許多被撤職的人員，以后又出現在其他官位上，或者準許他們保留爵位舒舒服服地退休。現在正在進行的研究表明，1814—1820年標志著漢人在省級官職中逐漸占上風的轉折點。[[31]](#_31_Zhe_Yi_Yan_Jiu_Shi_Ge_Lun_Bi)在以林清叛亂（1813年）和道光帝繼位（1820年）為標志的這一時期，也在省一級行政的上層發生了同樣迅速的人事變動。這幾年讓好些新人參加了省一級政府，被任命者都已得到了功名并且在和珅時代之后得到了官職，他們當中越來越多的人都是從漢人占優勢的都察院和翰林院提拔上來的。像過去一樣，皇帝物色人物是靠幾個心腹顧問的推薦。這些新任命者中的許多人，包括改革者湖南人陶澍在內，都是蔣攸铦（當時的御史，后來當了省一級顯宦）的同僚或朋友，而蔣攸铦本人則是漢軍旗人。他們也因參加了北京的一個非正式詩社——即宣南詩社——而彼此聯結在一起，這個詩社后來還包括了著名的“經世致用”論改革者林則徐和魏源。



地圖6 漕運體系

這個時期的漢族文人在清代官僚行政中重新得勢，可以被看作是太平天國叛亂及其后的同治中興時期以曾國藩及其門徒之興起為頂點的這一趨勢的開端。它也表明，翰林院和都察院中漢人對省一級政府職務的興趣有了增長。

嘉慶及道光兩朝的改革的第二個特點，是大肆宣揚減少宮廷浪費和重大消耗的節約開支活動。嘉慶帝終止了豪華的南方巡游的傳統，而這正是他父親的統治的一個標志。他想通過官方政策和以身作則來放慢中央國庫資財流出的速度，來改變貴族和官場成員中泛濫的懶散生活方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停止了邊疆省份省級官員的每年貢奉，皇袍也被人頌揚地說上面打了補丁。可是，這些改變不論在京師地區的滿洲貴族身上或在各省的官員中都沒有取得持久的效果；在給乾隆皇帝服滿國喪之后這些變革便遭到了頑強而成功的抵制。[[32]](#_32_Ting_Zhi_Ge_Sheng_Jin_Gong_D)例如，對日益繁衍而貧困的北京旗人人口和內務府的供應，就仍然是財政上的大問題。[[33]](#_33_Jian_Cao_Zong_Ru___Zong_Guan)

## 危機的征兆：漕運

嘉慶政府的省一級新官員上任時帶著皇帝的詔書，要他們在自己權限內改革官僚行政。可是，中央政府的改革辦法在省一級遇到了和珅時代流毒的干擾。由于這種干擾，產生了在對待平定白蓮教叛亂和對待地方政府腐化問題上的沖突。第三方面的沖突是漕運制度的行政問題。

漕米是中央政府在省里經管的三大要政之一（其余兩件是鹽務和黃河的河道管理）。漕米之政是征集中國南部和中部八個省份的租米，然后運來北京用以供養京師的宮廷成員和貴族，并儲積在倉廒中以待在中國北部分配。這種征集和運輸制度有它自己的主管部門，它與正規的省級官制相平行，并且與河道總督衙門相重疊。它的主管叫“漕運總督”，衙署設在江蘇省的淮安。漕運總督之下設省一級漕官，擔負漕米之省各設一人，這些漕官直接向漕運總督負責，不向他駐在省的總督負責。漕官則監管征集漕米的體系，其人員大部分是非官制的人員。這些人員中多數是由住在運河邊的屯田的世襲船戶“旗丁”組成。雇用這些船戶的運糧船組成了多達一百只船的船隊。漕運衙門也有它自己的用于護衛運糧船的民兵，沿運河的河閘有它自己的檢查員和檢查站，也有它自己雇用的肩夫，后者把糧米從縣的征集站運往運河上的倉庫中。[[34]](#_34_Guan_Yu_Cao_Mi_Zhi_Du_De_Zu)

在嘉慶時代，這個龐大的漕米機構由于各級組織都人浮于事，也由于糧米每易一次手或通過檢查站都要交付陋規而變得腐化了。世襲船戶，或“旗丁”階層，形成了清代社會中許多集團之一，原來指望他們在一個經濟增長、通貨不斷膨脹和人口增加的時代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由于他們人數加多，“旗丁”階層中的許多人不能取得他們的合法的、賴以生活的世襲田地（“屯田”）。[[35]](#_35_Guan_Yu_Fu_Fei_Wen_Ti__Jian)此外，漕運制度越來越依賴被稱為“水手”的那個被雇傭的游民勞動者階級。這一幫人逐漸取代了曾經作為明代漕運制度支柱的“旗丁”，他們需要在自己的工錢之外索取租米中自己的一份小費。在嘉慶年間，“水手”的人數增加了兩倍多，估計增加到了四五萬人。[[36]](#_36_Xing_Bin_Fu____Da_Yun_He__Zh)同時，漕運站又是官場中庇護制的焦點之一。數以百計的候補官員麇集于此，作為中央政府的委員（“差委”或“漕委”）領取薪餉。[[37]](#_37_Meng_Sen____Qing_Dai_Shi)

由于漕運機構的人員增加，18世紀的價格也上漲，所以應交給每一條糧船的船費也相應地上漲不已。1732年每條船的船費為130兩到200兩，1800年漲到300兩，1810年漲到500兩，到道光初年（1821年）甚至漲到了700或800兩。糧稅費用的增加使得地方上的紳士謀求談判免稅，這就增加了納稅戶的負擔，并且最后也使得征集的實際數量下降，因為貧苦的納稅人已被剝奪得精光了。它的一個結果便是漕米的逐漸商品化，因為地方官吏被迫從私商手中購買稻米，以補足他們的定額。[[38]](#_38_Xing_Bin_Fu____Da_Yun_He__Zh)

彌補漕糧定額是省一級糧官唯一的最重要工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與北京倉廒的監管官密切地合作。這些京官的職位是形成官吏侵吞公款的重要根源，甚至也許是省里漕米機構與北京官吏之間的關鍵性的中介人。[[39]](#_39_Xing_Bin_Fu____Da_Yun_He__Zh)漕米定額是向縣里征收的，但征收本身在縣里不是歸漕米機構經辦，而是由正規的地方政府經辦。納稅人交給地方經紀人，由后者把漕米送到縣的征集點；在這里由縣長驗收，他負責把它交到漕運機構的代理人那里去。因此，漕運制度催征的負擔最后落到了內外交困的縣長身上，縣長只好向他自己的法定的省一級行政上司那里去發牢騷。[[40]](#_40_Guan_Yu_Cao_Yun_Ji_Gou_Qiang)

這些抱怨最后就導致某些省級官員與在漕運中有既得利益的官員發生沖突。1803年之后當漕運制度已露出百孔千瘡的苗頭時，利害的沖突開始集中在向皇帝提建議是否贊成使用海路的問題。與漕運有聯系的官員力圖保持運河的內陸運輸體系；許多正規省一級官員則希望放棄它，主張利用沿海的海運。1824—1825年的海運辯論達到高潮，那時內陸漕運體系已暫時瓦解。

漕運危機早在1803年就已見預兆，那時黃河的漲水淤塞了運河，使開往京師的運糧船運行不暢。那時有許多長篇大論的計劃和奏疏上呈給皇帝，主張另辟新徑發展海路，像元代和明初所實行過的那樣。黃河大水一退這些建議就又都銷聲匿跡，但它們在1810年又被提出來考慮，因為運糧船這時再度被延誤，因而迫使皇帝急于征詢關于運河河道與海運同時并舉的意見。絕大多數省一級官員這時的反應是持否定態度。在浙江和江蘇兩省高級官吏的支持下，南京總督勒保上疏條陳十二大理由，說明海運為什么既不可行，也不可取。1815年問題再次被提出，又再次被否定。一個最重要的理由是說不應該改變祖宗的成法。持這種觀點的人后來把皇帝本人在1816年否決海運建議的措辭強硬的上諭當作護身符。[[41]](#_41_Xing_Bin_Fu____Qing_Mo_He_Yu)

由于私營沿海貿易這時正蒸蒸日上，就顯得持反對海運的大多數論點是昏庸無知的。雖然海盜猖獗、氣候惡劣以及造船費用昂貴（凡此都被用作不便開辟可以行之有效的海運的理由），并沒有妨礙在嘉慶時代已有約3500條江蘇省商船（“沙船”）的長江下游商人進行海上貿易。當時已知有少數企業主擁有三五十條船的船隊，他們主要把華北的豆子運往南方牟利。贊成開海路的人們認為，這種私人貿易可由政府與私商合作來加以發展，其結果是最后會使他們得利。大家知道，大宗沿海貿易是從北到南的走向；北上的船因載貨少而往往裝載泥沙壓艙。戶部尚書英和建議，運載漕米的私商在北上時可分撥20%的噸位裝私人貨物；回船則可以完全裝商品貨物。[[42]](#_42_Bao_Kuo_Ying_He_Jian_Yi_Zai)

從贊成開辟海道的人看來，海路最重要的是有經濟上的優越性，因為它是一個避開運河航道上無數檢查站和中間人的辦法。海運的倡議也恰恰因為這些理由而遭到得運河之利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43]](#_43_Zhang_Zhe_Lang____Qing_Dai_D)到19世紀20年代，這些最有勢力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便是那些已經出牌在沿運河各站擔任“漕委”的候補官員集團。這些官員的任命是受漕運總督本人督辦的，因此“漕委”被視為私人庇護制的獨立王國，別人是不能染指的。例如，1819年清帝就指斥漕運總督在一年之內增加了他下面的札委人數達140人。[[44]](#_44_Shan_Kou_Di_Zi____Qing_Dai_D)

不論運河上的商人或是沿海貿易的商人，都傾向于聯合起來反對開辟海路。反對的一個理由是這樣一種事實：嘉慶年間運河上的糧運已大大商業化了。北上的糧船上相當大一部分載貨是在私人手中，南下的船只則裝載著能獲利的私鹽。[[45]](#_45_Mei_Ci_Ge____1740__1840Nian)其次，沿海貿易的商人也不愿政府染指私人航運，因為自1684年康熙帝取消沿海商業的禁令以來，海上貿易已是他們的禁臠。那些反對海運的官員最初用的一個法寶是向海員本人調查沿海情況，而他們的報告異口同聲地都是使人泄氣的。[[46]](#_46_He_Chang_Ling____Huang_Zhao)

海運論戰中兩派的沖突在1824年后期達到了不可開交的地步，因為開往北京的運糧船隊陷進了淤泥中，并且長期受阻于高郵南部的洪水地帶。這一危機迫使道光帝恢復了他父親統治時期已開始的辯論。可是，這一次危機的嚴重程度足夠使他們達成妥協。開往北京的糧船僅僅四分之一順利地通過了黃河；其余船只全被絕望地阻滯在路上。皇帝接受的海運的主要計劃是英和寫的，由另一滿洲政治家琦善監督執行；后者在危機期間曾被任為代理南京總督。琦善在那里與新任命的江蘇巡撫陶澍以及布政使賀長齡合作，計劃從上海派出海路運糧船只。漕運總督衙署似乎暫時被打入了冷宮，它有兩年時間充斥著一批批被札委的官員，其中還一度包括剛剛發跡的、皇帝的年輕寵幸穆彰阿。[[47]](#_47_Guan_Yu_Zhe_Ci_Wei_Ji_De_Ji)

從一開始，皇帝就竭力讓所有官員都認識到，開辟海路的倡議是臨時性質的。事實上，批準啟用海運是以在第二年立即著手修復運河為條件的。河運辯護者認為，修復工程本身會為世襲河工提供必要的就業機會，不然，他們就會因使用了海路而變得無所事事了。琦善的繼任者在1827年強烈地要求繼續使用已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海路，但他的建議被駁回了。[[48]](#_48_Meng_Sen____Qing_Dai_Shi)

直到19世紀40年代后期，政府才被迫放棄河道，永遠改用海路。這時之所以作出這個決定，是因為有些因素已經改變了權力斗爭的格局。水手們已經組成了秘密會社，使他們組織起來的信仰很像把白蓮教的信徒們聚集在一起的那種信仰。19世紀40年代這些會社開始表現出有政治抱負的樣子，并且開始在纖夫，甚至在旗丁中間擴展影響和發展組織。[[49]](#_49_Xing_Bin_Fu____Qing_Mo_He_Yu)當鴉片戰爭以后這些組織采取了反滿的意識形態時，中央政府繼續支持他們的興趣便急劇下降了。1845年以后，由于京師又發生了嚴重的糧食短缺情況，海路便未經什么辯論而被采擇施行。太平軍叛亂的爆發和1853年黃河災難性的改道，排除了重新考慮恢復運河體系的可能性。[[50]](#_50_Xin_Dun____Jing_You_Yun_He_D)

不管1824年以后清帝主張恢復河道的理由是什么，他在政治上并不反對那些主張改道的人。陶澍做江蘇巡撫一直到1830年，后來被擢升為南京總督，在這個總督任上任職九年之久。琦善雖然短期降過級，但仍保持重要的省級職位，一直到他1841年與英國人打交道被貶黜時為止。改革者也有在漕運總署內任過職的，如1830—1832年有吳邦慶，1834年有朱為弼，1837年有周天爵。[[51]](#_51_Qing_Shi_Bian_Zuan_Wei_Yuan)事實上，1831年正是在陶澍領導下，在兩淮地區對鹽務進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重要的一次改革。[[52]](#_52_Mei_Ci_Ge____Tao_Shu_Dui_Hua)

監督這些改革的道光帝被迫從朝廷的高度來考察行政上的問題，因為朝廷仍然是水路航運和官僚行政的庇護制網絡結構的最高機構。他看來是一位謹慎小心的，甚至是膽小的統治者，寧可與幾個心腹顧問進行密議，而不愿接受實際的批評或警告。只要反對海運的人向他進言海運可能毀棄祖宗成法，而且可能使運河數萬雇員有解雇的危險時，他并不是一位可以指望進行漕運改革的君主。

另一方面，鹽務則是另一個樣子。雖然鹽的私運和非法販賣本身是一件有決定意義的既得利益事業，但私鹽販子和運河工人還是有著重大的區別。第一，運河工人被雇于一個合法的官方機構；私鹽販子則是在國家鹽稅之外活動并且干著反鹽稅的勾當的。第二，運河體系是以北京為中心而且與正規官制相平行的等級制行政組織的一個組成部分。反之，私鹽販子常像海盜那樣，沿著海岸和南方內地航道，在地方網絡結構中活動，最多也只是在地區網絡結構中活動。從漕運中的榨取所得是在上層官僚中分享其利，私鹽販子則是私商和投機商，他們侵奪的是正常鹽務行政中的官員和商人的收入。

除此之外，朝廷里還有一個有權勢的集團想從取消鹽務的走私來獲利，同時他們又能夠限制鹽務改革的范圍。這個集團就是內務府。[[53]](#_53_Mei_Ci_Ge____Liang_Huai_Yan)這個組織的大部分收入都來自鹽政，后者在傳統上又被內務府的任命官員所把持。內務府在鹽務爭論中的作用和在其他爭論中一樣，也沒有留下多少文獻記載，但人們已經知道，自從18世紀初以來，內務府的財政收入在中國政府的總稅收中的比重一直在增加。[[54]](#_54_Ying_Wen_Zhu_Zuo_Zhong_Guan)

自然，鹽務改革的建議也會危及鄉村的穩定，因為這些建議會把據認為是人數最多和最難駕馭的無業游民和無地搗亂分子弄得無所事事。[[55]](#_55_Guan_Yu_Zou_Si_Yan__Jian_Zuo)但是，關鍵的問題不是怕疏遠了鄉村的居民；它倒不如說是為了安撫宮廷官員們的利益。可是，我們對這些利益集團的組成、性質和重要性的了解還很有限，必須等待進一步的研究。

漕運危機是這個世紀最初幾十年公共職能普遍崩潰的一個方面。它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官僚的玩忽職守。在漕運方面，除了玩忽職守之外還加上了復雜的運河體系——它的中段與河道總督轄區相交——的自然困難條件。這種自然困難來自嚴重的土壤侵蝕和華北平原定期泛濫所引起的泥沙。到18世紀末期，黃河的河床提高到了危險的高度，威脅著堤岸，并引起觀察家們預言它可能改道；結果黃河果然在1853年發生了改道。但是，漕船為了到達北京必須在淮安附近之點穿過黃河。在這個危險匯合處的西邊有一系列吞吐湖，它們用來容納黃河的溢水，并且在運河不通的時候提高運河的水位，這個政策被稱為“借黃濟運”。多年的淤塞改變了運河系統的蓄水狀況，致使黃河渡口的積沙和整個運河體系的升高了的河床本身使這個系統沒法調節水位，否則勢必誘發洪水災害。淮安的洪水不僅威脅北京的糧食供應，也威脅到鹽稅的收入，因為受害地區包括兩淮的許多鹽廠和曬鹽設備。

河道總督的粗疏大意、愚蠢的經濟措施和玩忽職守，是1780年以后一些官吏奏折中相當注意的事情，但腐化繼續在19世紀初期危害這個機構。根據許多記載看來，河道總督當局的目的不是在防止洪水，而是細心地在財政收支上下工夫，即要使洪水定期地每隔一段時間發一次，以證明資財源源流入河道總督當局是正當的。傳說南部河道總督當局三天一巡的宴飲和無休歇的戲劇演出表明，每年撥給它的600萬兩銀子，只有1/10是作了正經用途。例如1808—1810年，政府據認為曾用了800萬兩來疏浚河口；但在后來的兩年中水災卻比以前嚴重了好幾倍。[[56]](#_56_Hu_Chang_Du____Qing_Dai_De_H)

非官方記述則認為這種腐化的根子是在18世紀末期，那時河道總督是按照和珅時代的庇護制網絡結構組成的。那時進入河道總督機構的人必須給和珅的私人腰包塞錢，以換取他繼續給予的恩寵和庇護。和珅死后，這種錢再也沒有送到北京過。在道光時代，治黃工程與運河一樣，都變成了失業官僚的避難所。據說，拿了一位在朝官員的信件去河工任所的新翰林可以指望得到1萬兩銀子的年俸和其他的好處；如果他是個“舉人”功名，仍然可以得到這個數目的十分之一。[[57]](#_57_Zhe_Yang_De_Ji_Shu_Jian_Yu_L)

## 貨幣制度與稅收制度的混亂

由此可知，到19世紀初期，庇護制體系泛濫的影響是隨處可見的：這個體系的潤滑油是錢，其結果是各級官庫無不出現虧累。和珅倒臺以后，政府開始致力于迫使地方官彌補國庫的虧欠（或虧空），甚至要使現任官員追補前此歷屆任下所遺留的虧累。按照學識淵博的省級官員賀長齡的話說，虧欠問題在19世紀20年代是使官吏們全神貫注的當務之急。[[58]](#_58_Ling_Mu_Zhong_Zheng____Qing)

大家都承認，這些虧欠不是由于人民虧欠了稅賦，而是由于官吏們自己盜竊國庫造成的，因為他們必須償付一套隨從人馬的需要，以及履行他們對其庇護者官員的義務，甚至在他們適當地照顧到自己的腰包以前就必須這樣辦。在庇護制度下，給上司“饋送”是宦場生活中應有之義。在18世紀末期的環境中，官吏們不會因為賬務虧累而受處分。的確，正像一位御史無可奈何地指出的那樣，誰的虧空越大，誰受的待遇可能越好。[[59]](#_59_Luo_Zhen_Yu____Huang_Qing_Zo)可是，和珅之后的形勢反而變成了對民眾實行更大的剝削，因為縣官們都在更多地搜刮納稅人，設法彌補他們的赤字。巡撫們用削減縣官們的“養廉”來彌補自己的虧空，而縣官們則從老百姓身上索取更多的“陋規”作為對付之策。這種把所有財政負擔轉嫁給納稅人身上的辦法是如此根深蒂固，致使道光帝在1820年即位時因官員們的壓力而被迫撤銷關于凍結“陋規”的上諭。[[60]](#_60_Ling_Mu_Zhong_Zheng____Qing)

從短期看來，清代的稅收制度是妙用無窮地適應有組織的剝削制度的。雖然基本稅額（每個管區必須上交給中央政府的稅收）在18世紀初期已經“永遠”固定，但為地方政府的開銷征課的附加稅已經制度化，并且變成了稅收制度的無限制的擴張部分。靠政府事業謀生的人加多，意味著附加稅的增多。夏鼎關于晚清賦稅制度的典型研究，揭示了在稅收專門官員和書吏手中的這個制度有很大彈性的問題。這種制度上的弊病的影響，在清代高度貨幣化的經濟中引起越來越大的災難。從明代以來就已廣泛實行把租谷和勞務折算為銀兩的辦法，這種趨勢意味著實際的稅率很容易被官方操縱，因為他只要把折合比率變得有利于收稅者而不利于納稅人就行了。通過這種操縱，納稅人實際上要比官方的租米定額多交付幾倍。操縱價格和換算比例也廣泛地被官吏和衙役所采用，因為他們用自己所定的勒索性低價收購（“采買”）谷物，以彌補政府倉廒中的虧損。[[61]](#_61_Xia_Nai____Tai_Ping_Tian_Guo)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貨幣經濟的普遍影響竟然使得這種變為常規的敲詐勒索行為臻于極盛，甚至使得農民的力量也支持它。這理由就是谷物價格長期上漲，使生產者變得有利。在18世紀，價格大約增長了300%，因此能夠使農民付得起日益增加的稅收。在這種價格上漲方面還有一個更加明顯的理由，就是歐洲輸入的白銀增多。商業中心日益增長的人口也刺激了谷物價格上漲。下面的事實也可能是真的：和珅時代遍及全帝國的貪污腐化被長達百年的谷價上漲弄得火上加油（谷價上漲曾使得農業能夠經受官僚的敲詐勒索）。

可是像觀察力敏銳的馮桂芬在回顧歷史時所指出的那樣，乾隆時期繁榮的基礎事實上是“附屬性”財富（馮桂芬是指商業活動的發展），而不是“基本”財富，所以它是特別不穩定的，能勃然而興；也同樣能忽然衰落。事實上，價格上漲在1800年后已開始拉平，在19世紀第二個25年時期價格又來了個急劇的倒退。[[62]](#_62_Guan_Yu_Gan_Long_Shi_Qi_De_J)

像價格上漲那樣，價格的急劇下跌也可以在白銀的輸入上找到原因。在19世紀30年代，鴉片貿易的后果已在實行復本位貨幣制度的中國被人們所感覺到，因為白銀之流出國外是為了用于償付鴉片這種違禁品的進口，而這種收支的不平衡迅速地破壞了稅收和商業。銀與銅的比價中價值的上升，這使幾乎所有社會集團都身受其害，唯獨投機者、兌換商和高利貸者除外。因為農民是用銅錢或谷物交納賦稅，但官吏上解時用的是銀兩，所以實際的稅率取決于需要多少銅錢或谷物折算成定額的銀兩數目。由于白銀越來越稀少，因而它與其他貨物相比就貴了起來，結果使實際的稅率翻了一番或者更多，從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于絕境。

在這種令人絕望的情況下，農民簡直沒有辦法能夠交足銀兩定額及其附加稅。在長江下游這個或許是中國賦稅最重的地區，省一級官員被迫承認災情嚴重，結果，那里出現了省一級主管用謊報天災的一套花招以希圖北京給予免稅的情況。19世紀20年代在陶澍和林則徐當政時確實開始應用了這個辦法，而且以后又成為定例。顯然，這要比讓皇帝敕準減少稅額容易一些，敕準減稅的措施要到19世紀60年代才見諸實行。由于長江下游各省的租佃率都很高，現在不清楚的是，這種偷偷摸摸的減稅辦法究竟使耕種者得到了多少實惠。無論如何，從國家財政收入的觀點看來，除了地方政府普遍貪污腐化以外，缺乏通貨和貨幣混亂的后果是很嚴重的。到1848年末，累積起來的田賦拖欠約相當于整個國庫的儲備數量。[[63]](#_63_Peng_Ze_Yi____Ya_Pian_Zhan_H)

人民對缺乏通貨和實際稅率上升的反應，是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爆發了大規模的抗稅運動，特別在長江中下游更是如此。為首的分子通常是地方的小名流——“生員”和“監生”等有功名的人。抗稅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從打官司，到集體請愿，到暴民的暴力行為，無所不有。騷動有時導致公開造反，甚至占據行政城市。有一次抗稅事件曾有過詳細的文件記述，它表明許多這樣的運動都有出奇的溫和和忠君的特點；它們沒有用反清的政治目的來為其起事作辯護的企圖。[[64]](#_64_Heng_Shan_Ying____Tai_Ping_T)

地方的小名流在抗稅運動中的態度是非常模棱兩可的。似乎無可置疑的是，他們作為政府和人民的中介人經常卷入非法的包稅活動（“包攬”）中，這也使他們容易在思想感情上卷進抗稅運動中去。在貨幣混亂的情況下，官吏的殘暴壓迫行為現在似乎為他們自己的剝削兼管理者的角色提供了一個令人尊敬的社會目標：他們能夠成為地方社會和敲詐勒索的稅吏之間的緩沖人。這一新的角色似乎給包稅人的形象增添了光彩，使他們有辦法獲得人民的支持。[[65]](#_65_Ku_En____Zhong_Hua_Di_Guo_Ho)

可是，如果認為這些地方領袖真正有覺醒的社會良心，或者認為他們為了地方社會的利益會反對國家，那就大錯特錯了。生員—監生集團缺少上層紳士能夠借以得到官吏青睞的那種社會顯赫地位和聯系。因此他們是一個脆弱的集團。但同時它們又是一個有文化和有地方影響的集團，是地方行政中一個關鍵性的中間階層。所以他們取得抗稅運動的領導權是不足為奇的。但是作為學者（有時作為包稅人），他們的傾向性取決于現存的國家制度，所以他們的政治觀點是矛盾的。國家總有辦法使他們就范，因此這些運動沒有產生過持久的抗議傳統。但是他們進一步分裂了地方社會，加深了人民對清代官僚政治的憎恨，從而為太平軍運動——它的軍隊在抗稅運動最激烈的長江各省征集了數十萬兵員——的到來鋪平了道路。

## 叛亂的根源

雖然無疑問的是，人口壓力是晚清叛亂的根源，但也應該注意，這種叛亂的火焰在新開發的邊疆地區比在人口稠密的長江、珠江及其流域更容易點燃。因此，人口壓力的后果通過清代的大量國內移民而擴散開來，而在從18世紀初年起就已出現人口不斷涌入的地區一般最容易發生叛亂：例如在臺灣島、四川省多山的邊區、廣西省落后的農村和湖南貴州交界線上土著苗民的寨子等地方，即是如此。這些地區的社會特點仍然未經充分研究，但是從中也可以發現有幾種促使發生叛亂的共同因素：一種強烈的共同體或少數民族的心理意識——它因邊境地區人口的復雜種族來源而變得尖銳化，而且常常由于語言歧異而得到了加強；另外就是高度軍事化組織，這是由于邊境地區的土匪活動或村社械斗的需要而產生的。隨著19世紀社會危機的加深，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叛亂往往擴展到平原和三角洲的定居人口中而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 苗民叛亂

漢人和滿人對中國中部和西部土著社會的壓迫，部分是由于清政府在原來自治的地區推行正規官僚統治的結果，部分是由于漢民遷移到內部山地邊區尋求農業土地的結果。所謂“改土歸流”的政策開始于18世紀20年代，引起了苗民的猛烈反抗。接著便發生了一系列苗民起事，它們在整個18世紀以及19世紀的好多年內一直持續不斷。苗民叛亂招致文武官員的進一步高壓。叛亂苗民的土地被國家沒收，一系列軍事要塞建造起來以支撐在苗民地區建立的政府權力。隨著清政府的行政和軍事控制，漢族移民前來尋求土地，漢族商人和高利貸者前來追求利潤。

湖南貴州邊境1795年苗民大叛亂之所以發生，顯然是“客民”——即尋找土地的貧苦的漢族移民——大量涌進邊境地區的結果。雖然政府也曾試圖在18世紀后半期控制這一移民趨勢。但移民的壓力已顯得太大，控制行動也太不得力。到1795年，已沒有有效方法來攔阻大量移民了。移民和地方官及書吏在一起，發現苗民為容易掠奪的對象，苗民土地開始迅速地轉入到漢人手中。苗民領袖石三保和石柳鄧領導的1795年初的武裝叛亂，促使大量清軍分遣隊進入了苗區。沖突是長期而殘酷的，只是在1806年才以最后粉碎苗民的抵抗而告結束。[[66]](#_66_Guan_Yu_Miao_Luan_De_Qi_Yin)

叛亂迫使清朝的官員注意到必須穩定邊區漢苗民族關系這一緊迫問題。負責殘酷鎮壓苗民的縣官傅鼎，起草了據以嚴密監督漢苗關系的條例。建立了軍事農墾地（“屯田”），它的雙重目的是把漢移民和苗民都置于軍事紀律之中，同時建立漢人的民兵力量來保衛政府當局。貿易只許在官方嚴格控制下在指定地點進行。苗民頭人可以擔任像苗弁這樣的地方職務，漢人衙役則禁止進入苗民村寨。這就是要求把種族間的接觸減少到最低限度，同時就不會發生雙方土地互相轉讓的情況。地方官員后來又感到很難保持軍墾地的統一性，因為有大量移民繼續擁了進來。下面種種原因事實上導致了進一步的沖突：在政府沒收的土地上要求苗民佃農付出高得使自己無以為生的佃租；傅鼎精心制定的政策，即引進漢族教育和禁止傳統的宗教儀式活動來摧折苗族文化。1855年又爆發了大規模苗民起事，一直延續了18年。[[67]](#_67_Fu_Ding____Zhi_Miao_____Zai)這些事實上是與漢人文化世界相隔絕的苗民群眾的起事，與漢人的叛亂沒有產生過持久的聯系。然而它們卻是晚清社會內部正在產生的無情的人口壓力的征兆，即它們表明中國人開始蠶食當時看來是他們最后的邊疆。

### 南方的秘密會社

通常被稱為“三合會”（Triads）的會社實際上是一種組織松散的結社，它有許多不同名稱，例如三合會、三點會、天地會，或者集體地稱為洪門。這種三合會出現在清代初期，或許是去臺灣的福建移民所創建。它們在18世紀流傳到大陸上的福建、廣東和廣西諸省，到19世紀的開頭數十年已發展到長江各省。這一結社的最初成員是內陸河渠上的勞工和船戶、流徙的城鎮工人以及官府中的小吏員。它也變成了海面和陸地上匪幫效忠的中心。三合會勢力的擴展顯然與清代社會的某些主要發展趨勢有關，特別是與國內移民、城市化運動和國內外貿易的發展有關。其中每一個進程都產生了像下面這樣的人民群眾：他們傳統的社會紐帶已經削弱或被割斷，只有秘密結社這種假親屬結構能夠給他們以安全、互助和組織安排。

從國家的觀點來看，這些秘密結社最危險的方面是，它與詐騙及盜匪活動相結合就可能最終導致叛亂。但是三合會的犯罪的一面和政治表現是可以截然分清的。結社的基層分會（“堂”）是盜匪幫伙、走私者和沿海海盜的理想組織形式，它們的成員多少脫離了定居社會的母體。同樣地，它們的內部聯系和紀律是用來在集市和城市中搞欺詐和賭博活動。它們的成員之所以免受告發，是因為有人滲透到了衙役中間。它們在這些牟利領域中活動的主要目的是想與正統社會求得共存，以便利用它為自己謀利，而不是想搞垮它。

但是，秘密會社也是南方諸省的無望的、但又是堅持不渝地忠于明室思想的匯聚地。它們的儀式和政治傾向都是為了復辟（“反清復明”）。它們反滿的調子是斥罵北方入侵者，因為入侵者篡奪了王位并敗壞了漢人土著文化。然而，這些南方會社的思想意識中沒有什么東西表明要推翻現存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它們的觀點不僅是復辟派的，而且還有些保守派色彩，因為它們在力求加強內部紀律方面所用的語言是以傳統的親屬原則為基礎的。它們的平等主義與真正血緣家族中的平等主義沒有什么不同；在這種血緣家族中，（理想地說來）經濟競爭受到壓制以利于血親集團范圍內的互助。他們對于君主和官吏的看法完全是傳統的看法。恢復明室的思想仍然是用來發起零星的地方反抗的正當理由，但幾乎不能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工具。

可是，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社會危機產生了：三合會行動主義的浪潮，也造成了秘密會社社會性質的異常的變化。1786年臺灣移民集團在三合會領袖林爽文的領導下爆發了大規模暴動。雖然它很快地被鎮壓下去，三合會的活動在后來幾十年內在大陸上迅速蔓延，導致了福建、廣東和廣西許多縣里的地方起事。在18到19世紀之交，三合會參與了安南人支持的、騷擾中國南部海岸的海盜活動。19世紀最初幾十年，三合會的影響擴展到了湖南與江西交界的南部多山地區，即橫跨在從廣州北上的貿易和走私道路上的地區。到19世紀中葉，秘密會社已在某種程度上深入到了湖南廣西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中間。

但對政府說來，更加危險的是秘密會社新近在珠江三角洲周圍富庶諸縣組織定居農民的能力發展了。這一過程似是開始于19世紀40年代，它標志著該會社的社會基礎有了明顯的變化。它們的組織原來主要在城市和貿易道路上的破產者以及在山間和海上的亡命者中間招兵買馬，現在能在富饒的三角洲諸縣的定居社會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了。其原因至今還不清楚。練武術（包括傳統的拳術）的三合會會員在互成世仇的宗族中間找到了方便的庇護所。或許更加重要的是，三合會有能力使一部分農民抱有得到集體保護和在經濟競爭中幸存下來的希望，因為他們得不到正統家族制度的好處。以公共捐贈的田地及其收益為形式的宗族的資產往往歸富戶豪紳掌握；它們的利益很少澤及貧苦農民。在人口過剩和激烈的經濟競爭的情況下，瀕臨赤貧境地的農民可以通過加入三合會會堂得到幸存的機會。三合會會堂的網絡結構也向西延展到廣西省的各河流域，它們在這里變成了小股盜匪和走私活動的大本營。由“米飯主”主持的會堂的公共金庫把贓物分給會徒。雖然這種組織與流浪的盜匪建立了緊密的和謀求財物的聯系，但它們本質上仍然保持著地方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村莊和集市社會中有尚待填補的社會和經濟需要。

這種由共同神話聯結起來的信徒們的網絡結構使廣泛的動員有了可能性；所以緊接在鴉片戰爭的大破壞之后，廣東的分裂的社會產生了一些更加野心勃勃的三合會冒險活動。從19世紀40年代中葉開始，人數達數千人的各股三合會會徒開始集結，它們侵占城市，廣州城也受到威脅。地方民團和政府軍隊的鎮壓行動只取得了暫時的成功。高潮是1854年紅巾軍的大規模暴動，數萬名三合會會徒攻占了許多縣城，包括廣州西南的大鎮佛山在內。但是在他們最得勢的時候，叛亂領袖卻失去了勢頭。他們的恢復明室的口號沒有得到地方名流的支持，同時他們想建立文官政府和整飭擄掠行為的企圖使他們與其追隨者離心離德。城內的三合會被隔絕，得不到鄉村的支持，因為地方名流領導的、以宗族組織為骨干的民團與之進行了激烈的戰斗。民團得到政府的堅決鎮壓行動的幫助，使紅巾軍在1855年初被擊潰。由于沒有新的、令人相信的皇室旗號可資利用，又沒有新的社會幻想足以動員和訓練它們的徒眾，這些秘密會社便注定地陷入了瓦解和失敗的命運。[[68]](#_68_Guan_Yu_Hong_Jin_Jun_Pan_Lua)

### 白蓮教叛亂

以三合會來衡量，白蓮教不是一個秘密的會社，而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集會的網絡結構，它是西起四川省東到山東省這一地帶幾個省的民間宗教的主要傳布工具。這一教派發源于11世紀的一個世俗宗派，是更古老得多的佛教凈土宗的繼承者。它的僧侶能結婚，主張吃素和念誦白話經文，這使得它同時受到正統佛教僧侶和儒家文人的反對。白蓮教由于扎根在地方社會中，它所信奉的經典因地而異，而且各個教派的信仰是兼收并蓄的。白蓮教在它原來的阿彌陀佛教義中又增添了創世的神話和民間道教的養生法，以及彌勒佛的千年太平說和摩尼教教義。這后兩種因素看來是使它參與叛亂的手段。“未來佛”——彌勒佛——的降世表示要進入世界歷史的最后階段和建立一個和平與富饒的盛世。而且一個降生的摩尼教神袛——“明王”——將在世界最后大劫難中使光明戰勝黑暗。像三合會那樣，白蓮教在各地方的村社中有一個普遍的、分權主義的組織基礎。另外，它與三合會不同的是，它把熱誠的信仰和叫人非信不可的末世論具體化起來，使這些宗教因素能夠動員廣大的信徒群眾起來反對現存的國家制度。[[69]](#_69_Ao_Fu_Mai_Ye_De___Zhong_Guo)

還有一點與三合會不同，白蓮教以能夠回顧自己的一個重大的歷史功績而感到自豪，即它在14世紀中葉的大叛亂中幫助打垮了異族的蒙古王朝。雖然它在元朝的繼承者明朝的統治下遭到殘酷的鎮壓，可是在明代快要垮臺之前，這個教派仍然不斷地參加了動蕩不安的17世紀的許多次起事（最著名的是1622年的山東叛亂）。

它在清初的地方社會中掙扎著生存了下來，但直到18世紀的最后二三十年它才又開始顯示出大肆活動的新跡象。

乾隆時代重新恢復起來的白蓮教領導是由教首們組成的松散的網絡結構：這些教首的地位是通過世襲獲得，他們的內部關系則是通過師徒的紐帶結合起來的。他們的信徒用捐錢來支持他們，有些人便當上了游方的傳教師，并把白蓮教教義傳布到了許多省份里去。例如，未來的叛亂基地鄂川陜地區是由河南和安徽來的人廣為傳道而改變了宗教信仰的。政府的迫害實際上反而使這種傳教活動得到了發展，因為它的領袖們總是遷移住處以避免被抓獲。使白蓮教恢復活動的先驅是河南人劉松，他早在1775年便被認為是白蓮教的組織者，并被驅逐到甘肅省。他的傳教事業被他的主要門徒劉之協所繼承，后者顯然是一位有魅力的人物和能干的戰略家，他馬上宣稱發現了明宗室的合法后裔，并且宣布劉松的一個兒子是彌勒佛轉世。這些啟示性的政治信條是爆發人民叛亂的強大推動力。恢復明室的思想（與在元代有恢復宋室的思想一樣）看來是一個附屬要素，一個主要是乞靈于漢族種族主義的機會主義提法，而不是白蓮教教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劉之協負責在湖北西部建立了許多組織，但他沒有能夠把領導權集中在自己手里。他的一個門徒與他鬧分裂，自己另外招募了一批追隨者。各地方的組織迅速發展了自己的領袖，但它們只把劉之協等人在精神上尊為巡方式的先知。

1793年，政府意識到了叛亂迫在眉睫，下令調查整個中國中部的白蓮教組織。對地方政府中掠奪成性的人來說，這證明是一次特許他們敲詐勒索的好機會，于是農村籠罩上了恐怖的統治。白蓮教的組織在被迫要么出錢或要么教徒死亡的情況下，紛紛拿起武器自衛。湖北西南部的宜都和枝江等縣由于附近的湖南和貴州在1795年爆發苗亂而實行了軍事化措施。在白蓮教的影響下，這些地方自衛組織變成了抵抗的核心。這些武裝起來的村社面對著不可忍受的官吏壓迫（地方官還往往暗示它們與苗民勾結），便于1796年2月爆發了公開的叛亂。叛亂沿著湖北西部邊境山區迅速向北擴展，并且迅速席卷了湖北、四川與陜西的三省交界的地區。白蓮教徒從一開始就缺乏保衛和治理戰略城市的能力。他們攻占過行政中心，但都不能長久占領。白蓮教徒退回山區中的設防鄉村，襲擊山谷里的市鎮來取得給養和征集兵員，頑強地抗拒派來消滅他們的清軍。

中國民間宗教和叛亂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難以解釋清楚的問題。鈴木中正和奧弗邁耶等人的最近研究[[70]](#_70_Ao_Fu_Mai_Ye_De___Zhong_Guo)表明這種糅合諸說的教派，如白蓮教和它的許多地方性變種形式，主要的宗旨是拯救靈魂和治療疾病，因而這些功能便形成了它們村社集會的主要重點。怎樣說明這些信神的村社教派與大規模反王朝叛亂的爆發之間的歷史聯系，這已經成了研究傳統中國叛亂的主要課題。由于華北及華中諸省受佛教影響的教派同華南秘密會社之間在形式與宗旨上存在著混淆不清的現象，所以這個研究題目變得復雜了。如果說三合會包含有一種充分發展然而是暗藏的、結合在秘密結社的儀式中并有神話做背景的反王朝意圖，那么，民間佛教宗派難道就一定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嗎？禁欲式的攝生法和虔誦佛經，不是也可以作為掩飾得很深的政治意圖的掩護物嗎？

白蓮教信條的復雜性確實能起到巧于解釋的作用。摩尼教與彌勒佛的混合信仰中有一種啟示性的說教，在社會和政治狀況處于最惡劣的時候它能起到它的歷史作用。救世主的降臨，不管是摩尼教的明王還是“未來佛”（彌勒佛），都能夠預示一切世俗制度將有變化，從而在分散的信徒集會組織之中點燃武裝暴動之火。深深地融合在白蓮教觀點和教義中的這些千年太平盛世的預言，能夠在經濟極端貧困和政治極端壓制的時候起到號召公開叛亂的作用。

看來這時白蓮教已擴大它的隊伍了，這些新參加進來的人擁護千年太平的幻想，但不一定學什么禁欲的攝生法，也不一定具有原來集會組織中的那種虔誠的獻身精神。與此同時，巡方領袖如劉之協等在地區分散的地方組織中促進了較大的團結。個別集會組織現在在會員之間發展更大程度的互相依賴——包括用軍事化方式進行共同防御，借以應付日益惡化的社會狀況。[[71]](#_71_Jian_Ling_Mu_Zhong_Zheng_De)

但集會組織內部的發展并不能充分說明白蓮教運動終將顯示出來的軍事能力。只有把信仰向外面傳布出去并與慣于暴力方式的集團建立聯系，才能爆發大規模叛亂。白蓮教現在與之結盟的那些軍事化的集團（鈴木中正稱它們為“老百姓中間的軍人集團”）必須同白蓮教教派本身區別開來。雖然邊境地區的武裝匪幫也信奉白蓮教的某些宗教信仰，但這些集團卻有另外的傳統，即精于老百姓當中細心訓練和傳授的“武術”，它包括為了自衛而操練的徒手拳術和棍棒對打的技術。正是這樣一些集團，而不是個人主義的、以祈禱為能事的、以期望超度為宗旨的一般白蓮教教派，形成了叛亂的軍事骨干。雖然對“軍人集團”與宗教教派之間的主要聯系尚待提出有效的證明文獻，但大致上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即這種聯系一旦形成，就成了白蓮教和其他類似的叛亂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就白蓮教來說，“軍人集團”的主要組成成分是“啯嚕”股匪，它們的起源可以相當肯定地追溯到乾隆初期。“啯嚕”在三省邊區的森林里過著軍事化的股匪生活，但在某種程度上仍和農民社會維持著正常的關系。在特定的情況下，他們與村寨中的自衛隊（“團”）的領導形成了互利關系，也與基層地方政府中的衙役和保甲長形成了互利關系。這種武裝的黑手黨掠奪地方社會而不需要進行戰斗。由于“啯嚕”被認為在叛亂時期在白蓮教中起過重要的作用，所以應該有理由假定，他們早已與地方上的宗教教派建立了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頗像南方三合會傳統的“堂匪”，后者也包括武裝的小集團，這些小集團是和現存社會單元中的生活及活動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的。

與“啯嚕”緊密聯結在一起（或許形成他們的一部分）的是私鹽販子和詐騙犯，國家對這些人曾經采取過武力鎮壓措施。私鹽問題特別重要，因為它是19世紀華北發生的許多叛亂（包括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捻軍大叛亂）的根源。促使陶澍等省級官員之關心改革官鹽制度，其部分原因就是出于私鹽問題所產生的社會動亂。當鴉片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變成最有價值的走私物品時，這種動亂形式也出現在南方諸省。

在評價白蓮教教派本身與整個白蓮教叛亂的關系時，重要的是要看到在官方估計的叛亂者人數表面下的東西。實際上形成信教者內層圈子一部分的叛亂者所占的比例，一定比人們想象的要小得多。許多與白蓮教毫不相干的地方農民起事，也由于清代行政法律的特點把它們錯劃了類別。例如當某官員的官署被叛亂分子奪占，如果這事件是由于他們自己的吏治不當引起的，他應受嚴厲處分；但如果能證明這些叛亂分子屬于“邪教”，那他就只是丟官了事。官員的報告有假，自然是不足為奇的。據一位御史在1800年估計，由真正教徒組成的白蓮教軍隊不會超過全部人數的10%。[[72]](#_72_Luo_Zhen_Yu____Huang_Qing_Zo)

雖然清軍在1793年在保衛西藏藩屬的好大喜功的戰役中打敗了尼泊爾的廓爾喀人，這曾使北京感到高興，但它此后不久在中國本部的表現卻顯示了清代軍事已把鋒芒喪失到什么程度。政府把討伐苗叛的領導權最初交給了滿人福康安，此人與乾隆帝有姻親關系，也是和珅的密切伙伴。和珅的弟弟和琳也參與了他的討伐。當時的非官方記載指責他們說，他們生前就把軍事撥款用來肥了官吏們的私囊，并且讓高級指揮官在戰場上過舒適生活。他們掩蓋盜用公款的手法是一味樂觀地謊傳捷報。征苗之役的性質很容易做到避免戰斗和謊報斬獲數量，后來的討伐白蓮教之役也是這樣。漢人和苗人正規軍用傳統戰術打擊游擊隊，即主要用追捕游擊隊首領的辦法來搞搜索和殲滅行動。平民傷亡過多和農民村莊被毀，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代價。鄉村被破壞的慘狀與有城墻的城鎮的命運形成鮮明的對照，因為大部分城鎮從未被叛軍占領，也沒有被長期圍困過。將軍們在叛軍進攻時寧愿撤退到這些設防地區，聽任叛亂分子隨意劫掠鄉村，而且常常不許農民進城來避難。因此，鄉村——它們保護帶兵統領們免得因丟棄城鎮給叛軍而遭受嚴厲懲治——便成了代城鎮受難的替身。[[73]](#_73_Shi_Ye_Ren_Yi____Lun_Bai_Lia)

在歷次戰斗中被殺的“敵人”的組成成分從來是不清楚的。對這些戰役的指揮進行批評的官員們報告說，大部分死者不是叛亂分子，而是被裹脅來作戰的農民（“脅民”），他們或者是被暴力驅使而來，或者是出于私利來的；而且在事實上，他們在戰場上的對手往往不是官方的正規軍，而是地方的鄉勇。

福康安與和琳都在1796年歿于戰陣，比和珅早死三年。次年，征苗的將軍們開始轉移到湖北前線來打白蓮教造反者，在苗區留下了約2萬官軍。[[74]](#_74_Meng_Sen____Qing_Dai_Shi)1800年以前官方在這兩條戰線上恢復秩序的努力不斷遭到失敗，這顯然是與戰場上的官吏當初給皇帝謊奏勝利消息（他們的繼任者對這種謊報不敢指斥其非）有關，也與嘉慶帝因他的父親還活著而一般地不能乾綱獨斷有關。盡管和珅在軍隊中的兩個心腹已死，上面兩個因素似乎反過來說明了他的影響是廣泛存在的。

現在得讓地方官吏自己執行鎮壓措施了。他們借鑒明代以來的一項行政傳統，在戰略村（“寨”）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地方控制系統。他們把老百姓和谷物都集中在寨子里，不讓這些人和物資敵。隨著最著名的戰略村戰略家龔景瀚最后把它定性，人們把這種行動稱為“堅壁清野”。寨的組織以現存的保甲制度為基礎，用來補充以“團”這種編制為基礎的新的鄉勇征募制度。龔景瀚等官員在舉辦民團時依靠的是地方名流，在這些人中已有許多人在舉兵保衛自己的家鄉了。所用的辦法是給這些地方領袖加官晉爵，把他們拴在官方的責任制度上。新任命的兩位討伐白蓮教戰役的指揮官明亮和德楞泰于1797年正式向清帝提出了這個辦法。他們建議，在叛亂時期應建造小型的地方性堡寨給農民提供庇護所。他們認為，這樣會鼓勵縣官們組織他們自己的防御，不用求助于中央的軍事力量了。它也會保衛農民，使他們不致被迫加入叛匪。清帝駁斥了這一建議，嚴詞指斥了倡議者，并且重申他贊成現行辦法，即繼續追捕叛亂領袖。[[75]](#_75_Tong_Shang_Shu__Di_301__302Y)

直到兩年以后，即在和珅死后不久，上述方案由勒保等人再次提出時才被采納，后來它成為勝利地打敗白蓮教叛亂的基礎。[[76]](#_76___Shi_Zhao_Sheng_Xun____Juan)清帝這個180度大轉變的決定是否可以歸因于和珅的廢黜？當然，新政策會威脅到以中央政府為中心的那個軍事庇護制網絡結構。它意味著要分散決策和征兵的權力，減少對中央調撥的軍需和資財的依賴。反之，之所以需要實行這樣的分權，直接的原因似乎是中央集權的軍事機構已沒有能力打一場游擊戰爭了。雖然和珅的當權放慢了采納這個政策的速度，但“堅壁清野”策略卻是另外一個例子，它說明有關方面在大力尋求各種辦法以解決那些舊式官僚組織不再能解決的問題。

在采用這一策略的動機中有一個復雜的因素，這就是官方記載中的“脅民”的顯著作用。所謂農民非甘心情愿地被脅迫參加叛亂的概念，不符合當時同樣被人經常提到的“官逼民反”的事實。白蓮教蔓延的速度之快和范圍之廣都表明，它的根子是在復雜的社會問題中，和珅的影響不過是這些問題的一種表現而已。

雖然政府最后鎮壓叛亂的成功，應大部分歸功于地方控制的加緊，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應該歸因于正規軍的能力有了明顯的——雖然是短暫的——恢復。在白蓮教叛亂地區，支撐政府權力的是不惜耗資很大而直接從滿洲調來的大約七千名壯健的八旗兵，以及從貴州和云南開進來的、比較起來尚未腐化的綠營兵。像額勒登保、明亮和德楞泰這些決心很大的八旗將軍們著手使他們的部隊逐漸具備有紀律的外貌。但盡管作了這些努力，他們仍感到需要雇用地方雇傭兵（“鄉勇”）以補充正規軍之不足。這些雇傭軍中有些人是冷酷無情的亡命之徒，他們經常被清政府用來做攻打白蓮教的先鋒。

清軍毫不留情的攻擊漸漸地改變了戰役的特點。被迫從他們的基地和堡壘中逃出來的、被打散了的白蓮教軍隊，現在在四省的部分地區被追擊。由于戰略村策略日益擴展，他們經常逃竄并且與地方社會斷絕了聯系，因而被追捕，被殲滅。有一股一度數逾10萬人的叛軍，在1805年基本上被消滅了。如果有人愿意大膽地把白蓮教和兩代人以后的叛亂的戰略作一個比較的話，他會主要地想到，人口稠密的河谷和盆地地區的農村社會還有殘留的穩定性。正統名流人士的權力在這里還是至高無上的。雖然叛軍能夠在三省交界山區的不穩定村社中找到立腳點，但他們不能動員低地社會的財富和人力，因此從未得到向舊制度進行勝利的挑戰的勢頭。

但是，從長遠看，白蓮教叛亂給了清王朝一個破壞性的打擊。第一，它表明，如果沒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體系以及雇傭兵的合作，正規軍已不可能鎮壓國內的叛亂。雇傭兵歸根到底是個權宜之計，既花錢，又危險。約1萬人在叛亂之后被并入了正規綠營，但事實證明他們動輒嘩變，不可駕馭。因此不是鴉片戰爭，而是白蓮教，使人們看出清朝軍事力量已不可逆轉地下降了。第二，10年斗爭的破費對帝國的國庫是毀滅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約7800萬兩因鎮壓叛亂而消耗凈盡，鎮壓叛亂耗資達1.2億兩。

白蓮教的幽靈也沒有被弄得絕跡于大地。它的分散的細胞組織使它擁有很大的死灰復燃的力量。1813年，白蓮教的一個支派叫天理教的，在林清和李文成領導之下，在山東、河南和直隸舉行了一次短暫而猛烈的暴動。它的一個小分隊還事實上滲進了北京的皇宮。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豫皖邊境不斷地卷起了白蓮教起事，它們通常與地方股匪和私鹽販子配合行動。白蓮教的種子在整個華北和華中遍地開花，其中有八卦教、義和拳、虎尾鞭，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地方教派。他們無休無止的叛亂和政府決不心慈手軟的鎮壓，成了19世紀上半葉地方史中的主題。

## 中央的軟弱與學術界的新趨勢

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官場的腐化風氣彌漫一時，這是由作為清政府的特點而被精心制造出來的庇護制所培育和維護著的。有人敏銳地意識到需要實行改革，改革問題也一再拿出來考察，使之在整個官僚界展開辯論。朝廷里表示熱烈擁護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省級官員中主張改革的有阮元、賀長齡和陶澍。但是在整個這一時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為代表的僵硬態度與在各省進行形形色色試驗性改革的事業形成了對比，因而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改革只是由各省領導自己資助和鼓勵的。

嘉慶帝在即位伊始就發布了要進行改革的詔旨。結果怎樣呢？皇帝顯然低估了和珅時期滋長起來的腐敗情況的深度。其次，嘉慶帝始終是在乾隆朝傳下來的老年顧問們的指導下進行統治的，這些人和他一樣先入為主地看待和珅問題，即滿足于首犯既經去職就可以安然無事。這些顧問中的最后一人是董誥，他死于道光帝繼位之前不到兩年時間的1818年。

新皇帝1820年登極的時候，他馬上把北京的顯宦曹振鏞（1755—1835年）倚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親密顧問，身兼內閣和軍機處的首腦二職。沒有人指責過曹振鏞有貪污腐化情形。他被描寫為一個儉樸的、嚴于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點是突出地表現為無懈可擊的完人：他是一位堅決遵循傳統和慣例的儒者。有一件涉及他對官僚政治的影響但不甚可信的材料，記載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書言事的內容。據說曹振鏞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為官員們每天進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苦；因為官員們認為他們的職責就是要把問題條陳上來，不管有事無事都得這樣做。但也不要給上條陳者警戒或給予處分，因為那樣做就等于忽視直率的批評，而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應采取的態度。因此，應該讓他們相信，他們的申訴已達宸聽，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們申訴的數量應有所減少。曹振鏞的解決辦法很簡單。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折中書寫和行文的錯誤，然后懲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這種辦法，他就能夠顯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奏折中的細節，同時又能嚴懲那些庸人自擾的人，而對所請示的問題則可以輕輕帶過。[[77]](#_77_Zhe_Jian_Yi_Shi_Zai_Qiu_Kuan)

不管這個辦法究竟是否提出過或實行過，但它清楚地表達了道光時代官僚政治的特征。上條陳的人被引導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內容了。給皇帝上書言事時敷衍塞責和因襲時尚的奏疏數量過大，而這些弊端正是嘉慶帝曾經對之激烈地作過斗爭的。曹振鏞的學究氣據說曾在會試的程式規格中占統治地位，結果是創造性讓位于庸腐，有新義的文章被奚落。[[78]](#_78_Ju_Shuo__Cao_Zhen_Yong_Ying)

一位批評18世紀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說，如果和珅時期發展起來的庇護制網絡結構不完全摧毀，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員上臺時還會借尸還魂。[[79]](#_79_Jian_Hong_Liang_Ji___Juan_Sh)這一預言不幸而言中，因為道光時代又興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珅的官員，這就是滿洲旗人、標準的官僚穆彰阿（1782—1856年）。他很像他前面的和珅，據說他也有意安插私人，使一大批親信官僚支持他的個人利益；他在1835年取代曹振鏞，當上了內閣兼軍機處的頭頭。[[80]](#_80_Xiao_Yi_Shan____Qing_Dai_Ton)

但是，官僚的腐敗在和珅時期和在穆彰阿時期也有重要不同之點。道光時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國國庫的白銀儲備已經枯竭，從18世紀初期的6000萬兩下降到19世紀50年代的800萬兩。[[81]](#_81_He_Bing_Di____Zhong_Guo_Ren)帝國軍隊的力量已被侵蝕。皇帝的統治已經失去了17和18世紀時期的雄偉氣魄。皇權的式微隱約地表現在那些想實行變革的省級官員取得了主動權，但它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才公開暴露出來。

省級領導官員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通過讀經來振興道德和文化。陶澍想對正常的官僚行政試行制度上的改革。與被認為是曹振鏞所扶植的官僚迂腐氣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道光時期知識分子風氣大開，風氣之所以開通，部分原因是在一個被中央的派系紛爭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為的政府中有了這樣一批人，以及他們作為省級官員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動權。

在18世紀的學術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經驗主義研究學派和漢學學派。不是18世紀的一切學者都搞考據，也不是一切學者都限于研究漢人對古代經典的注疏。但是，知識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學者的聲譽確實有取決于這種風靡一時的學風的傾向。到19世紀初，已開始看到這種經院哲學——它確實是當時所代表的輿論——正在衰敗下來。因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舉辦像乾隆時代《四庫全書》這樣大部頭叢書的編纂，已不再從全國各地征召學者匯集北京搞標準化的學術工作了。此外，地區的文學和哲學流派已開始對考據的迂腐氣持有異議。這時的制度問題和社會問題為創造一個有學術生氣的新時期提供了推動力。

雖然19世紀初期的大部分學者繼續在研究古代經籍，但這時期新的學術潮流在于反對18世紀經院哲學的兩個方面。第一，折中主義的儒家思想家批評漢學拋棄了宋代哲學，一味專注于東漢時代寫出的注疏。第二，另外一些19世紀的批評家堅持，18世紀學者所主張的“實用之學”或“實學”不僅無用，而且也沒有責任感，因為它轉移了學術界的注意力，使他們不能真正致力于為社會和政府服務。雖然后來的學者們在談到康熙、乾隆時代的文字檢查制度和清洗時，曾經把18世紀學術的缺點歸罪于滿人的壓迫，但19世紀初期的這些批評考據的學者卻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們的研究和著作都是要為加強和復興清帝國尋找道路。這些批評家及其對經世致用之道的關心代表了學術界的新方向。

與此同時，占支配地位的“考證”正統學術也已經因有組織的反對思潮的興起而有所沖淡。桐城文學派和常州今文學派兩者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考證中那種狹隘的文字訓詁和詞源學的興趣的不滿。清初學者因反對明末學術風氣而曾經強烈譴責過的抽象思想和哲學論述，現在又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這反映在他們著重抓經典和文學著作中的“大義”或“義法”這一點上。同樣地，替明代學風抹黑的傾向有了緩和，這表現在又恢復了研究宋代哲學家的“理學”的興趣。在18世紀末年的諸位大師如阮元、莊存與和姚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著哲學上的折中主義。[[82]](#_82_Jian_Zhang_Hao___Liang_Qi_Ch)

伴隨著這些學術界變化的還有社會與政治的變化，后者既改變了學者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改變了學者對于行政問題的想法。不僅學者們發現更難于得到政府的位置，并且18世紀最后25年的政府職務也不像從前那么吸引人了。和珅時期腐化的后果在地方上能最明顯地感覺到，因為州、縣長官在這里承擔了收稅和維持秩序的最后責任。因上級壓力造成的盜用公款、繁雜的訴訟問題，以及個人對鎮壓叛亂所負的責任——這就使得許多學者不愿負起這一切義務來換取官職上的特權。相反地，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在各省高級官員的私人班子（“幕府”）中擔任助手（“幕友”）。

“幕府”是明末的一種制度，在清代變得重要起來了。[[83]](#_83_Mou_Quan_Ji____Qing_Dai_Mu_F)組成它的“幕友”都是些法律、財政和文字方面的專家，他們被省一級官僚雇傭為非官方的顧問。“幕友”由他們的東家官員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隨東家的調動而去新任所。隨著官員在省一級或地方一級職責的加重，“幕友”的規模和人數也跟著增加。到18世紀末，這些助手的總人數估計已達7500人。[[84]](#_84_Wa_Te____Zhong_Hua_Di_Guo_Mo)雖然沒有可靠的調查統計數字，但可以假定他們的人數在19世紀繼續有所增長，這部分的是由于當時的行政危機，由于國內秩序混亂和西方的入侵，由于太平軍叛亂時期及其以后的時期省一級政府承擔了新增加的財政、軍事與商業責任之后，不得不對地方官員提出過多的要求而造成的。關于這些年代“幕友”在制定政策中的決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現在魏源及其同時代的包世臣這樣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們在鹽務、漕運、邊疆防務、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過并提出了改革方案。他們工作的重要性不僅可以從他們興趣的廣泛上看出來，也可以從他們活動的范圍中看出來。

## 魏源——經世致用論與今文經學研究的范例

把魏源（1794—1856年）僅僅看作一個“幕友”，那當然會小看了他。把他在19世紀早期思想界的影響比做更早時期顧炎武或戴震對思想界的影響，是不無道理的。[[85]](#_85_Dui_Wei_Yuan_Zai_Xue_Shu_Jie)事實上令人感興趣的是，可以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19世紀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他這個人不僅是一位經世致用論作者和今文學的擁護者，而且也是他當時社會所面臨的變化的一面鏡子。

魏源出生于湖南，在22歲去北京以前在那里就是一位優秀的學者。16年以后，即1831年，他移居揚州，他在這里安家一直到死。他的師友中有一個著名的湖南士大夫集團（包括賀長齡與陶澍）和一個出類拔萃的北京官員與知識分子集團（包括林則徐、龔自珍、劉逢祿），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在居省一級官職時也聘用了他。魏源的學術事業按常規開始于搞經學研究。他最初感興趣的是理學，但在他32歲的時候，即1824年發生漕運危機的那一年，他成了一位經世致用論的專家，并上書詳細地提出了主張采用海運的批評性建議。他的這一建議是應當時的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請寫的；賀長齡同一年又委托他編輯了一部關于經世致用的文集。這個編輯計劃于次年完成，此書定名為《皇朝經世文編》，是一部從清代作者中廣泛挑選而成的文章匯編。[[86]](#_86_Guan_Yu___Huang_Zhao_Jing_Sh)

《皇朝經世文編》與后來他寫的西方地理學的研究《海國圖志》（見第五章）一起，是魏源兩部最膾炙人口的著作。《皇朝經世文編》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的影響，而且是因為他給“經世致用”下了一個含義廣泛的定義。這部書分為八個部分，頭兩部分是關于學術和中國政體性質的理論部分，然后才開始論述制度和行政方面的專題。這些下余部分是按政府六部的權限分類的。對《皇朝經世文編》內容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它大部分是集中在財政（特別是漕運）、公共工程和軍事行政方面。[[87]](#_87_Lun_Na_De____19Shi_Ji_Chu_Qi)但是，論述經典研究和政治理論的開頭幾部分也不是不重要的，因為他闡述了實際的經世致用怎樣能與傳統的學術興趣協調一致。這些部分和《文編》的主體都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皇朝經世文編》刊行之后的30年，魏源寫出了范圍非常廣泛的關于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種建議，在建議中他利用了竭盡全力挑選來的官方檔案和私人收藏。1831年，他應邀前往揚州，為計劃改革淮北鹽務的陶澍當顧問。在這幾年的某個時候他開始起草一部完成于1842年——即南京條約訂立的那一年——的著作。這部書題名為《圣武記》，敘述了清代從開國起至道光朝的主要軍事戰役。和《皇朝經世文編》一樣，這部編年史也是兼以私人和官方著作為基礎的。魏源寫《圣武記》的目的不僅在于描述事件。魏源在批判地使用私人資料來核實官方檔案的準確性時，以及他在序言及全書最后的時論文章的言論中，都分析了清代政治體制中的問題，特別是清代軍事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很足以說明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的原因。

魏源按照傳統的方式把中國易受外部覬覦的脆弱性與內部弱點聯系起來看。他特別關心充實軍事人才的問題，這是由于漢人只偏重文職，而種族界限又把清代軍事組織分成了兩半之故。魏源一方面用歷史觀點提出他的論據，一方面批駁中國文化中被人們廣泛接受的準則，他堅決認為中國可以變得富強起來，但應該采用新政策以改善士兵——特別是軍官——的素質，可以像西方那樣建造和部署常備海軍，可以穩定貨幣制度并消滅巨大的國庫赤字。這些政策包括對軍職人員施以專門訓練，給予優厚薪餉和特殊社會待遇，以及對各地區實行靈活變通的征募辦法（這最后一點是想利用某些地區應考武舉人數不均的情況）。魏源還要求仔細地檢查軍事花名冊，以確保防止開小差和虛報名額等情況，因為這兩者是軍事行政中貪污受賄的大財源。魏源在他的財政改革建議中主張擴大和改進本國的銀礦，作為減少中國對外國通貨供應的依賴和對付在鴉片貿易中使中國白銀枯竭的最好辦法。他還敦促在使用國庫資金方面實行更負責的會計制度，削減開支，終止作為表示皇恩浩蕩傳統姿態的定期減免稅收的慣例。在他以低沉和輕蔑的語氣提及某些清代前輩人的著作時，他并沒有因考慮到形成他們興趣的原先那些意識形態因素和政治因素而原諒他們。對他來說，這些人對外國愚昧無知，對中國本部以外地區的戰略地理特點絲毫不感興趣，這不僅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輕薄可哂的。在他看來，同樣不負責任的態度是，官方對軍事戰役的敘述往往有低估或避而不談清帝國戰敗的傾向。

魏源對今文經學感興趣也反映了他對“無用的”煩瑣哲學興味索然，雖然他那個時代的今文學與漢學考據主流的相同之點多于與烏托邦式及彌賽亞式支流的相同之點（后者與后來康有為的今文學運動有聯系）。[[88]](#_88_Dui_19Shi_Ji_Chu_De_Jin_Wen)和其他一切時代一樣，魏源時代的經學研究既是學術論說的手段，也是政治斗爭和派系斗爭的手段。這樣，今文學就變成了攻擊東漢煩瑣哲學的武器，同時也成了推動學術新方向的媒介。上一世紀的經驗主義的研究運動深深地受到所謂漢學學派奠基人惠棟（1697—1758年）的思想的影響。惠棟反對宋代理學教義，主張恢復標準的漢代人的注疏作為經典研究中正統解說的本源來代替它。雖然很少有人像惠棟那樣死板地只專心致力于漢學，但他的影響確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東漢注疏家鄭玄等人的哲學和學術上，集中在他們曾經注釋過而流傳下來的經籍的文本上。

這種標準的經文是多種經籍文本的綜合，包括被稱為“古文”和“今文”者在內，這兩個術語是指正文最初所用的書法體裁而言的。“古文”在這里意指周代用的書法；“今文”意指較近時——即漢代——用的書法。今文經是憑記憶以及根據經過漢初諸帝指定的學者在宮廷里討論過的標準化的解釋傳抄下來的。口頭傳述下來的抄本在當時被認為是必要的，因為所有經籍據說都已在秦代被毀。到西漢末年的時候出現了一批經書，是用先秦的古文字書寫的，它一度被歡呼為真正的經文，并且最后被合并成為標準的正統經文。后來，大部分西漢今文，包括三家《詩經》在內，都廢而不用，而且在往后的朝代中都已失傳了。

直到宋代才對古文的真實性引起了懷疑，直到閻若璩（1636—1704年）在17世紀開始對《書經》（《尚書》）作了系統的詞源學分析，才證明古文經的許多部分其實是贗品。[[89]](#_89_Yan_Ruo_Qu_Jue_Bu_Shi_Huai_Y)到18世紀末年，閻若璩所發起的文字考訂工作和對古文經的真實性日益增長的關心，便推動了江蘇常州小學運動的興起：這小學運動聲稱對今文經特別感興趣。它們中間只有《春秋·公羊傳》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因此，《公羊傳》成了今文學者研究的焦點。常州學派的奠基人莊存與便是一個對漢學感到失望的人。他寧可采取折中主義的態度，即有選擇地采納了宋代哲學家的著作與西漢及東漢兩代的注疏。他的學生們——特別是劉逢祿（1776—1829年）——后來變得對《公羊傳》很感興趣，認為它是對西漢哲學和歷史解釋的一部權威的和正統的說明。劉逢祿和他的同伙把他們認為是以微言大義和道義觀點來看待《公羊傳》中的歷史材料（在《公羊傳》里，“所不書多于所書”）這一研究方法，同東漢注疏家專心致力于名詞術語和定義的研究方法作了對比。在他們看來，東漢學術界只注意事件（“事”），西漢注疏家則企圖解釋事件的意義（“義”）。

在劉逢祿的影響下，魏源很注意西漢哲學，特別是董仲舒的著作。由此導致他批判地分析了《詩經》和《書經》的本文，寫了兩部題名為《詩古微》和《書古微》的書。在這兩部書中他企圖恢復自西漢以后已經湮沒無聞或晦澀難解的“古代微言大義”（“古微”）之說。這兩部書在體例上都是遵循經驗主義的研究傳統，艱苦地對本文和注疏作逐字逐句的比較分析。但是它們作為校勘學著作的聲望受到了損害，因為事實是，魏源研究東漢今文的大部分材料都必然地受到了第二手史料的限制。因此這兩本著作可以作為證據，證明它們揭示魏源本人的歷史觀多于揭示他的西漢前輩的歷史觀。他認為對這一有關經書的論戰值得進行詳細而刻苦的研究，這反映了以經書解釋當世政治及學術的重要性是持久的。毫無疑問，魏源把今文學看作是對18世紀漢學的攻擊。與此同時，他繼續認為經書仍是指導政治行動的極則。如果沒有經典做最后依據，他就無法確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堅定地認為，歷史上變化無端和獨特的形勢所產生的決定性的意義，都必須在經書中找到理論上的根據。

魏源認為歷史情況常變，認為必須調整舊制度以適應每個時代新的需要，這種概念通常與今文學研究的興趣有關，雖然它至少早在宋代就已有了歷史先例。魏源和另一位今文學家龔自珍一樣，創造了一個三個時代（“三世”）往復循環的變化的理論：這三世就是太古、中古和末世。他本人親身經歷的事件就使他相信，另一個“末世”正迫在眉睫，但是他認為，明智的盡進忠言和開明的領導能夠和過去一樣加速下一個“太古”時期的到來。[[90]](#_90_Jian_Mi_Qie_Er___Gai_Ge_Zhu)

魏源并不苛責滿人應對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負責。相反地，在他看來，清代統治者已經成功地消除了使明朝大受其禍的那些主要弊端。在一篇雄辯的分析文章中，魏源贊揚清政府廢除了它的前朝的通病：主要是宦官的跋扈和重稅的壓迫。清朝君主很“重民食”，不僅一再豁免了賦稅，而且自從乾隆以后沒有使用強迫勞動來經營河道總督所轄的工程。邊境地區人民長期安堵。到處呈現出和平與有秩序的氣象，“民生其間，耳不聞苛政，目不見鋒鏑”。在朝廷里，官員們可以慷慨陳詞而無需害怕受到懲治。所以魏源總結說，總之，清政府“豈獨高出明代萬萬”。在乾隆的文字獄、長期而骯臟的和珅丑聞以及對國內叛亂屢屢進行腐敗而殘酷的鎮壓之后，人們不禁奇怪他竟會如此令人作嘔地歌功頌德。但是，按照中華帝國末年的標準來看，魏源完全可能認為，清代的政治成就在鞏固王朝和緊縮財政方面標志著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盡管有了這些成就，魏源接著寫道，“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備之外”。這些災禍包括漕運管理的不善和黃河由于無法控制的泥沙而反復出現洪水。“無一歲不籌河費，此前代之所無也”。通向文官的道路是“困于需滯”，軍事部隊的預算則又“絀于度支”。與外國的接觸更帶來了苦難：“夷煙蔓宇內，貨幣漏海外，漕鹺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無也。”

因此在魏源看來，晚清的問題不是起源于無能的和含有惡意的統治（按照“節用愛民”的觀點來說，清代可以比做眾所周知的“三代”），而是起源于中國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形勢，特別是外國的商業與軍事勢力出現在沿海，從而產生了貨幣與軍事危機；還起源于無法控制的黃河，它的災難性泥沙（雖然魏源沒有指出這一點）是上游山坡植被不佳產生的水土流失的惡果——這也是中國人口壓力而產生的災難性副產品。

魏源的這些話的含義是要使人確信，如果能發現合適的人才并使用他們，這些新問題也是能夠解決的。面對著這些挑戰，魏源認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國文人的精力盡“出于無用之途”。科舉考試只強調語言學和詞源學，對官員們則只用毫無意義的尺度來考核：對于翰林只考察他們是否“書藝工敏”，對于行政官員只考察他們“胥吏案例”的本事。魏源關于改革的呼吁是寫得用心良苦的，他著重指出了按照一切傳統標準來看應算作是清王朝作出的主要功績，指出了挑戰的史無前例的性質以及制度上反映的不充分的狀況。他響亮地提出要用經世致用的態度來實行改革，即通過對新問題作出新反應來加強國家，但一切要在不偏離忠君原則的范圍內進行。[[91]](#_91_Wei_Yuan____Ming_Dai_Shi_Bin)

## 保衛邊疆是關心的新焦點

19世紀初年像魏源那樣的知識分子都關心邊疆保衛的問題，這也有18世紀經驗的堅實基礎。《皇朝經世文編》的大部分材料，事實上是取材于清代在軍事上長期卷入西北邊遠地區和亞洲腹地的事勢，在這方面，作為清代軍事戰役編年史家的魏源本人便是一位專家。但是，在魏源那一代人的邊疆研究中似乎有某些特點。魏源本人深信，晚清的“盛世”（這是他的委婉提法）正在于把邊疆的危險置之腦后，因此需要提醒它。[[92]](#_92_He_Chang_Ling____Huang_Zhao)在他寫作的時候，突厥斯坦已經因和卓（一些神圣家族的頭目）所領導的叛亂（見本書第七章）而陷于混亂，這場叛亂從1825年延續到1828年，它可能推動了邊疆研究。但是現在魏源和他的朋友龔自珍（他的文章在《皇朝經世文編》的邊疆部分是最大的一組）所提倡的解決辦法，完全超出了關于戰略地理的傳統討論范圍。他們兩人都主張通過從人口稠密的內地省份移民的辦法來發展東突厥斯坦（即今天的新疆地區）。龔自珍提出了一個強迫移民并把這些西部地區變成普通行省的龐大計劃，這個計劃實際上是關心減輕中國內部的人口壓力重于注意邊疆的保衛。[[93]](#_93_Gong_Zi_Zhen____Xi_Yu_Zhi_Xi)

對亞洲腹地邊疆研究興趣的高漲之所以以北京為中心，是徐松的著作在北京推動起來的：徐松是一位研究邊疆地理的多產作家，他本人曾在伊犁地區生活過和旅行過。徐松的小集團中有張穆，此人是魏源很了解的一位學者，他關于蒙古部落地區的系統書目后來被譽為是結合了漢學經驗主義者的縝密品質與經世致用論作者的實用精神這兩種優點。[[94]](#_94_Zhang_Mu____Meng_Gu_You_Mu_J)北京的這個集團同以程恩澤為核心的一個集團關系極為密切；程恩澤這位命官因他在教育和科舉制度中的操守和他曾做過皇家師傅而受到尊重。程恩澤具有多方面的經驗主義學識，因而使他能夠預言清代社會所面臨的迫切災禍。程恩澤小集團成員的明顯特點是，他們都認為清朝在迅速衰落，因而對他們同時代人的懶散和不切實際感到不能容忍。程恩澤在他的周圍聚集了一批興趣各異的學者，其中包括特別是對亞洲腹地的邊疆地理作出經驗主義研究和對海上諸國作出開拓工作的學者們。也正是在這個小集團內，劉逢祿、魏源和龔自珍等人發表了今文學派最早的一些理論，從而在漢學擁護者和宋學擁護者的鴻溝之間搭上了橋梁。[[95]](#_95_Chu_Jin__Hua_Ming_____Dao_Gu)

通過個人之間和同鄉之間的關系，這些北京學者必然在朝廷形成了政治聯盟。程恩澤是安徽省歙縣人，這使他成了曹振鏞的同鄉，而曹振鏞是認識程恩澤的父親的。程恩澤和他的小集團——包括張穆在內——跟祁寯藻有密切關系；祁寯藻后來做了軍機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對穆彰阿的方針。林則徐以及龔自珍都有反對過穆彰阿的經歷。這些關系的特點及其對朝廷制定政策的影響，尚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96]](#_96_Xuan_Nan_Shi_She_De_Zuo_Yong)

國家的軍事防御以及為此目的而進行的實際學術活動，也受到出生于另一地點——內地西南土著邊區——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勵。湖南學者嚴如熤（1759—1826年）只取得“優貢生”的中等功名，但變成了19世紀初年經世致用論最有影響的積極分子之一，而且還是一位鎮壓白蓮教的領袖。他之進入仕途是通過1800年的一次殿試，他在這次殿試中長篇大論地批評了征剿白蓮教的正統軍事戰略，主張應改用地方民團和土地分配政策，這與最后被采納的戰略村辦法相似。他原來是當教書先生出身，后來竟能在他家鄉——湖南西部的溆浦——的群山中與叛亂的苗民作戰。[[97]](#_97_Guan_Yu_Yan_Ru_Yi_Ping_Miao)他除了對軍事學有興趣之外，還是精通那個地區的地理和人種學的專家。他寫的鎮壓苗民的著作中包含有關于苗民生活的詳細材料，這本書的特點是他肯深入鉆研表面現象以下的東西，并且具體地描述了那些根本不相同的部落地區的文化。其他經世致用論的學者在研究西洋蠻夷的時候，都只能緩慢地達到這樣圓熟老到的程度。在他本人后來做了平定南海海盜的顧問之后，又對沿海的防御表示關心。他的《洋防輯要》的編纂顯然要比魏源的《皇朝經世文編》早幾年。此書敘述了全中國海岸的戰略地理，主要取材于顧炎武、清初的地理學家顧祖禹和明代的軍事組織專家戚繼光（后者的著作經常被后來19世紀的官員們所引用）等人的著作。

從他們各自的觀點來看，論述亞洲腹地邊疆和國內邊境的著作之所以紛紛出現，是因為他們重又相信學術可為政治所用。這兩方面的研究都吸收了戰略地理研究的長期傳統，這種傳統現在又因人們意識到清朝的軟弱而重新活躍起來。這種戰略關心也許不可避免地會轉到探討海洋邊疆的新問題上來，就像魏源不久以后要做的那樣。他后來在這個轉變中得到下面事實的幫助，即經世致用之術摒棄了價值論，贊成實效論，后者在對付那些討厭的、不論來自何方的蠻夷的文化時是一種防止利權外溢而不可或缺的東西。

嚴如熤就學于長沙的主要學校——岳麓書院。這個書院和它的姊妹學校城南書院一起，在形成關心公共行政的風氣方面——這是19世紀湖南名流的特點——似乎起過強烈的作用。從乾隆末年起到整個19世紀40年代止，岳麓書院的頭頭都是一些有堅實的政府工作經驗的人。羅典（1718—1808年）做過御史，并且是一位特別有成就的學政。他是著名的八股文訓練專家，本質上是一位使用標準的漢學考據技巧以追求經籍真理的人。后來岳麓書院得到袁名曜（1801年進士）來主持院務，此人是一位戰略地理學專家，也是嚴如熤和陶澍兩人的好朋友。袁名耀在北京服官時曾為清帝職掌過起居注，所以他有別人沒有的機會來觀察最上層政治的事件。

袁名曜的繼任者歐陽厚均（1799年進士）曾在戶部任職15年，因在公共行政方面具有非凡的知識而受到尊敬。他在岳麓書院掌教27年，據說門墻弟子逾3000人。雖然我們不知道該校的課程表，但至少很清楚的是，它的山長們不可能是宋學或漢學某一學派的教條主義者，他們都通曉國家的實際事務。[[98]](#_98___Chang_Sha_Xian_Zhi____Juan)

確實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認為，在19世紀的頭幾十年有一種新精神在長沙運行著。湖南的漢學—煩瑣哲學的權威從來沒有像長江下游諸省那樣大，因為正是在湖南，王夫之的能動主義和不可調和的道德觀的榜樣自從19世紀以來就一直流傳不息。正像嚴如熤主張通過邊疆的應用研究為實用之學開創了局面那樣，長沙士大夫唐鑒（1778—1861年）變成了恢復宋人倫理哲學的精神領袖。唐鑒是魏源的庇護人賀長齡的朋友，宣揚對程朱哲學應采取一種嚴格而且有些狹隘的尊敬態度，從而使得嚴密和井然有序的心意訓練能集中地致良知于倫理的教誨上面。但是，唐鑒的一生也是重在行動；他以一位精明能干的官員見稱于時，并舉例指出朱熹學說中的兩面性，即一方面是自我修養，與此相平衡的另一方面是有朝氣的學習和為國效勞的精神。這種清教主義的尋根究底的精神，與嚴如熤的行動主義和實用之學合在一起，變成了唐鑒最著名的學生曾國藩的思想的基礎；后者在1850年以后成了清王朝危難時期忠君勢力的領袖。

1820年阮元在廣州創立的學海堂，是這時期另一重要的地方學術中心。阮元是嘉慶新政中的一名省級新官員。他認為自己是一位學者和文學倡導人，其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像他的保薦人的兄弟朱珪所倡導的18世紀的學風。而且阮元也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員，求才若渴。他在朝廷里有影響，而他的聲譽使他在為官的各任所贏得了信任。1799年以后他擔任過好多省級職務，他在其中的兩個任命上創辦了兩個成為馳名的教育中心的書院：一為杭州的話經精舍（1801年），一即學海堂。

阮元對教育的看法足以說明這個時期學術風氣的轉變。各班級都規定必須熟習漢代注疏的詞源學和語言學研究，以便掌握經典著作。重點是放在“實學”上，以及搜討事實材料和努力把經籍的原則應用在當代的問題等方面。地方的學術傳統有所恢復，并得到重新研究。詁經精舍和學海堂兩者不同之處只是一在時間上，即前者早于后者20年；一在地理上，即杭州是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廣州則是南中國邊疆上的一個貿易港口和省會。另外，還有不相同的是兩處書院開辦時的主講人不一樣。1801年任杭州學監的是王昶與孫星衍，他們都不是本地人，都是進士，是既在朝廷又在省里服過官的官場老手。他們兩人都長年在北京，在收藏歷史檔案的機構和四庫全書館工作過，也都是全國知名的學者。

20年后廣州的書院的八位主講就缺少這樣舉世矚目的盛譽了。八個人中只有兩人是進士出身，七人是廣州本地人。只有一個人曾任過高于地方教育職位的官職，而且他還是一位漢軍旗人，部分仕途在武職。一句話，他們并不是那些因躋身于全國知名的士大夫集團而出名的人們。他們的經歷是在地方的政治和學術上。例如熊景星是一位詩人，他只是個舉人，沒有能夠在考試制度中獲得更大的功名。他不滿意于學官之職，認為這是使他屈了才；他也騎馬射箭和打拳，因為他認為多數讀書人太文弱。他的同事林伯桐也是一位舉人，曾做過學官和廣州地區官宦之家的塾師。1810年關于鎮壓廣東海岸海盜的建議是他應總督之命寫的，為此他被授予了榮譽稱號。林伯桐是一位哲學家和軍事戰略家，他是主張對漢學和宋代理學取折中態度的第一批廣州學者之一。

教師中的第三位名叫曾釗，只是一位拔貢生，也只是在地方教育崗位上工作。他最初被阮元聘為課子的西席。后來他來學海堂教書，1841年被任命為廣州總督顧問，謀劃城防以反對英國人。鴉片戰爭之后不久，曾釗上了一個關于城防的十點條陳。他曾與林伯桐及學海堂最初八主講的另一位吳蘭修一起，協助梁廷楠編撰廣東海防地理志。梁廷楠本人后來也在學海堂任教。徐榮為八名主講人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他是駐廣州正黃旗的漢人。他在1836年離開書院教職以后才考中了進士。他是廣東一位著名詩人的學生，他不僅因善于寫詩聞名，也以寫了不少高質量的征剿海盜的軍事論文而聞名。[[99]](#_99_Guan_Yu_Xue_Hai_Tang__Jian_R)

這些軍事戰略家，又是詩人，又是學者，并且在一個邊疆商業城市教書，他們組成的這樣一個小小的飛地式的集團，很難說是中國學術社會中的典型。但是，他們確是代表了他們那個時代中國所發生的某些變化。中國東南部財富的中心，在19世紀初年開始從作為鹽商領地的揚州轉移到了作為公行的天下的廣州。危機的中心快要從亞洲腹地的邊疆，即野蠻的游牧民族的家鄉，轉移到東南沿海，即外國入侵者的勢力范圍。廣州頓時變得重要起來，因為它不僅是中央政府——特別是內務府——的財源，也是中國戰略防御的焦點。

19世紀初年通常被人們拿來與后來的事件作比較，即拿來與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鴉片戰爭和太平軍叛亂那些事件作比較。但是，如果拿它與前面的事件作比較，那就可從18世紀末總的發展背景中更正確地了解19世紀初期。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會更尖銳地看出我們對許多重要問題的理解有局限性；例如其中就有如何使傳統的學術適應實際治理國家的方法問題。

這個時期積累了豐富的“非官方的”和非正史的史料，它們大部分還沒有被人利用，但卻清楚地指出了人們能怎樣更好地理解中國政治中的強烈的個人關系。制定政策的動機并不是僅僅出于制度上和行政上的考慮，這是不足為奇的。我們沒有能夠吃透這方面的問題，這反映了我們不能充分掌握傳統時代晚期政府的組織和運行的情況。

人們對中國這個時期的政體的標準看法顯然缺少多元主義的理解。個人集團的利益很少被認識，也很少被記載下來；派系斗爭一直被忽視，只是到現在才受到治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們的注意。19世紀初的制度上和行政上的困難卻有文獻記載，使我們能夠研討在此以前的背景下派系和利害不同的集團的作用。像漢人官員中開始發展的排滿思想，朝廷里的官員和省一級官員之間的裂痕，以及各級政府庇護網絡結構的作用等問題，這些都是需要進行研究的。這種研究無疑會使我們修改我們持有的中國士大夫制度是鐵板一塊的觀點。

在對這個時期所作的研究中，清王朝的衰落問題不僅一再展現在我們面前，也一再浮現在我們所接觸到的史料中。對清王朝衰落的歷史過程的意識和認為1775—1780年是清代歷史走下坡路的轉折點這一普遍情緒，在19世紀初年官吏們和學者們所寫的政治與社會評論中比比皆是。可是，他們想改變這一趨勢的努力并沒有取得勢頭，即沒有取得重振國威的自覺性。企圖改變現存制度或措施的人們沒有組成一個改革黨，他們甚至沒有以改革者自居。他們的努力是一星半點的，而且局限在有限的范圍內。他們的成就只是曇花一現，如果說曾經取得過什么成就的話。

當時人士往往用“公”與“私”的兩分法來解釋他們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在他們看來，政府所管的公共利益領域本身正在受私人利益的侵蝕而縮小范圍。這些私人利益包括像庇護制網絡結構、私鹽販子和下級官吏書役這樣一些顯而易見的集團，它們掌管國家的公共財源（稅收、水利工程、糧食和食鹽分配體系等），并把它們變成了為自己牟私利的手段。但是，這種化公為私的后果看來比這些觀察者們認識到的更要深刻。學者們現在不受公家雇用，轉而受雇于私人之門。運河體系現在不靠征募，而是雇用私人勞工了。在士兵花名冊上，越來越多的雇傭兵代替了無能的世襲兵士。收稅官從私商那里購買糧米；漕運官員向私營發貨人租賃船只。

換句話說，在要跨入近代的時候，商業化和貪污腐敗、日益加劇的社會復雜性以及頹廢墮落等，都是正在改變中國社會及其內部權力分配的力量。由于君主沒有能力捍衛自己的統治使之免遭私人利益集團的侵害，中央政府本身在支配和規定公共利益范圍時所能起的作用便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損害。

（張書生 譯）

[[1]](#_1_2)我們兩位作者應該特別感謝哥倫比亞大學的波拉切克教授，他對這一章書的寫成給予了很多幫助，特別是他允許我們使用了他研究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新成果。

[[2]](#_2_2)《大清仁宗實錄》卷38，第7—8、16—17頁；卷40，第10—12頁。

[[3]](#_3_2)見洪亮吉的一封長信《卷施閣文集甲集》，補遺十，載《洪北江先生遺集》卷1。又見張鵬展御史的奏折，載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卷20，第10—11頁。

[[4]](#_4_2)何炳棣：《中國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第64、278、282頁。

[[5]](#_5_2)珀金斯曾經研究了人口的增長對食品生產的關系，見《1368—1968年中國的農業發展》，特別參看它的第2—4章。又見前引何炳棣《人口研究》，第137—168頁。

[[6]](#_6_2)鈴木中正發展了這一論點，見他著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7]](#_7_2)關于功名名額的變動，見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第179—181、190頁。關于童生問題，見羅振玉編《皇清奏議·補遺》卷3，第4頁；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第46頁。

[[8]](#_8_2)羅振玉編：《皇清奏議·補遺》卷2，第14—15頁。關于基層官僚機關中冗員的例子，可見李汝昭《鏡山野史》，載向達等編《太平天國》第3冊，第15頁。

[[9]](#_9_2)瓦特：《中華帝國末年的縣官》，第174頁。

[[10]](#_10_2)羅振玉編：《皇清奏議·補遺》卷4，第9—10頁。

[[11]](#_11_2)宮崎市定：《清代的胥吏與幕友》，載《東洋史研究》卷16第4期（1958年3月），第1—28頁。

[[12]](#_12_2)何炳棣：《清代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性》，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6第2期（1967年2月），第194頁。

[[13]](#_13_2)低級功名（如監生以及某些貢生）可以捐納，所以取得這些功名以及其下的生員功名的人數就浮動不定。但舉人和進士功名不許捐買，它們的員額在1702年后即被凍結。見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平裝本1964年版），第187—188、190頁。

[[14]](#_14_2)關于健訟者，見賀長齡《經世文編》卷46（1898年版），第9頁；卷94，第5—6頁。19世紀50年代的湖南巡撫駱秉章使用了“刁衿劣監”一詞，并且估計一個縣就有幾十個這樣的人。駱秉章：《駱文忠公奏議》，第1451頁。

[[15]](#_15_2)王云五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第1冊，第62—64頁（1822年一位御史的奏折）。

[[16]](#_16_1)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第155—156頁。

[[17]](#_17_1)1733年上諭，載同上書，第132頁。

[[18]](#_18_1)傅路特：《乾隆時期的文字獄》（紐約1966年重印版），第47—49、61頁。

[[19]](#_19_1)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第217—219頁。關于當時人的觀點，例如可看阮葵生《茶余客話》卷2，第61頁；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第18卷。

[[20]](#_20_1)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第242頁。關于書院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見孟森《清史講義》，第390—391頁。

[[21]](#_21_1)關于任命制度，見瓦特《中華帝國末年的縣官》，第51—55頁。關于薦舉制度，見呂元聰《清代初年的翰林院》（倫敦大學博士論文，1968年），第206—207、212—213頁。要得到薦舉有時得付錢；梅茨格：《清代官僚政治的內部組織》，第323—324頁。

[[22]](#_22_1)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6，第6頁；徐珂編：《清稗類鈔》卷7（《師友錄》）第65號，第8—10頁。

[[23]](#_23_1)《大清仁宗實錄》卷37，第27頁。

[[24]](#_24_1)梁章鉅編：《樞垣記略》卷14，第9—10頁。

[[25]](#_25_1)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史》卷193，第2934—2935頁。

[[26]](#_26_1)關于這些變化的引人入勝的討論見于昭梿的《嘯亭雜錄》卷10，第33—36頁。

[[27]](#_27_1)《大清仁宗實錄》卷37，第22頁。

[[28]](#_28_1)昭梿：《嘯亭雜錄》卷1，第23頁。

[[29]](#_29_1)凱斯勒：《清代省一級領導班子的種族成分》，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8第3期（1969年5月），第499頁。

[[30]](#_30_1)昭梿：《嘯亭雜錄》卷10，第36—39頁。

[[31]](#_31_1)這一研究是哥倫比亞大學波拉切克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波拉切克先生的著作可能根本地改變時下對于19世紀初期政治的觀點。

[[32]](#_32_1)停止各省進貢的上諭，見于《大清仁宗實錄》卷37，第45—46頁。一位御史對于緊縮開支措施的持久效果的關心，見羅振玉編《皇清奏議·補遺》卷3，第16—17頁。

[[33]](#_33_1)見曹宗儒《總管內務府考略》，載《文獻論叢》，第112—114頁；裘匡廬編：《清代軼聞》卷7，第70頁。

[[34]](#_34_1)關于漕米制度的組織，見星斌夫《大運河：中國的漕運》，第165—179頁。又見欣頓《清代的漕運制度》，載《遠東季刊》卷11第3期（1952年5月），第339—354頁；以及山口迪子《清代的漕運和船商》，載《東洋史研究》卷17第2期（1958年9月），第56—59頁。

[[35]](#_35_1)關于浮費問題，見星斌夫《大運河：中國的漕運》，第185—188、223—224頁。關于無地世襲船戶的問題，見孫玉庭1817年奏折，載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46，第11頁。

[[36]](#_36_1)星斌夫：《大運河：中國的漕運》，第178頁。

[[37]](#_37_1)孟森：《清代史》，第334頁；山口迪子：《清代的漕運和船商》，第59頁。

[[38]](#_38_1)星斌夫：《大運河：中國的漕運》，第223—224頁；席裕福編：《皇朝政典類纂》卷49，第3頁。

[[39]](#_39_1)星斌夫：《大運河：中國的漕運》，第164頁；席裕福編：《皇朝政典類纂》卷48，第4—5頁。

[[40]](#_40_1)關于漕運機構強加給地方政府的負擔，參見欣頓《清代的漕運制度》，第349、351頁；又見星斌夫《大運河：中國的漕運》，第165、190—191頁。

[[41]](#_41_1)星斌夫：《清末河運向海運的轉移》，載《東洋史論叢：和闐清博士古稀紀念會編》，第809—810頁。又見孟森《清代史》，第338頁。

[[42]](#_42_1)包括英和建議在內的許多開海路的建議，可見之于賀長齡的《經世文編》第48卷。又見孟森的《清代史》，第338—339頁；星斌夫：《清末河運向海運的轉移》，載同上注，第809—810頁。

[[43]](#_43_1)張哲郎：《清代的漕運》，第56—57頁。

[[44]](#_44_1)山口迪子：《清代的漕運和船商》，載《東洋史研究》卷17第2期，第59、70頁（注14）。

[[45]](#_45_1)梅茨格：《1740—1840年的兩淮鹽務專賣》，載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第32—33頁。

[[46]](#_46_1)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48，第22頁。

[[47]](#_47_1)關于這次危機的記述，見格羅斯的未發表的論文《賀長齡與1825年關于皇糧運輸的辯論》，芝加哥大學歷史系，1970年。詳細情節可見于各有關官員的傳記。見清史館編《清史列傳》卷34，第9—13頁；卷35，第51—54頁。又見星斌夫《大運河：中國的漕運》，第179頁；張哲郎：《清代的漕運》，第55—60頁。

[[48]](#_48_1)孟森：《清代史》，第339頁。

[[49]](#_49_1)星斌夫：《清末河運向海運的轉移》，載《東洋史論叢：和闐博士古稀紀念會編》，第181—182頁。

[[50]](#_50_1)欣頓：《經由運河的漕運》，載《中國論文集》第4期（1950年4月），第33—37頁。

[[51]](#_51_1)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史》卷193，第2946—2948頁。

[[52]](#_52_1)梅茨格：《陶澍對淮北鹽務專賣的改革》，載《中國論文集》第16期（1962年12月），第1—39頁。陶澍作為糧鹽二政的改革者所起的作用，曾在魏源的一篇墓志銘中受到熱烈的贊揚，見魏源的文集《古微堂外集》（1878年版）卷4，第13—15頁。

[[53]](#_53_1)梅茨格：《兩淮鹽務專賣》，第42頁。

[[54]](#_54_1)英文著作中關于內務府的最詳細的研究是托伯特的《對清代內務府組織及其主要職能的研究》（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1973年），特別是見第148—149、195—200頁；關于內務府在鹽政方面的作用，見第115—118頁。

[[55]](#_55_1)關于走私鹽，見佐伯富《清代鹽政的研究》，第157—178頁。

[[56]](#_56_1)胡昌度：《清代的河政》，載《遠東季刊》卷14第4期（1955年4月），第505—513頁。又見孟森《清代史》第330頁；肖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90—892頁；昭梿：《嘯亭雜錄》卷7，第29—30頁；席裕福編：《皇朝政典類纂》卷45，第7—9頁。

[[57]](#_57_1)這樣的記述見于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56—58頁；此件也重印在其他非官方材料中。見裘匡廬《清代軼聞》卷7，第54—56頁；以及見于歐陽紹熙編《清譚》卷5，第11—12頁。

[[58]](#_58_1)鈴木中正：《清末的財政和官僚的性格》，載《近代中國研究》卷2，第201頁。賀長齡：《耐庵詩文存》卷6（信函），第1—3頁。

[[59]](#_59_1)羅振玉：《皇清奏議·補遺》卷2，第116頁。

[[60]](#_60_1)鈴木中正：《清末的財政和官僚的性格》，載《近代中國研究》卷2，第249—250頁。

[[61]](#_61_1)夏鼐：《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載《清華學報》卷10第2期（1935年），特別見第410—412頁。強購谷物一事的討論見于1800年一位御史的奏疏中，見羅振玉《皇清奏議》卷3，第5、27頁。關于操縱減免谷物的折算比價問題，可看王云五《四朝奏議》第1冊，第45—46頁。

[[62]](#_62_1)關于乾隆時期的價格上漲問題，見王業鍵《數世紀的價格波動與中國的農民經濟，1644—1935年》（亞洲研究協會年會散發的論文，1973年）關于清代價格一般上漲的材料選集，見南開大學歷史系編《清實錄經濟資料輯要》，第410—433頁。又見馮桂芬《顯志堂稿》卷9，第3—4頁。

[[63]](#_63_1)彭澤益：《鴉片戰后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系》，載《歷史研究》卷6（1961年），第49頁。又見王業鍵《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第59—61頁。關于貨幣混亂對19世紀50年代湖南稅制的影響，可看駱秉章《奏議》，第1450—1455頁。關于謊報“天災”一點，可看馮桂芬《顯志堂稿》卷9，第3—4頁。

[[64]](#_64_1)橫山英：《太平天國前的抗糧運動》，載《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卷7（1955年），第311—349頁；李汝昭：《鏡山野史》，載向達等編《太平天國》卷3，第15—19頁；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98—99頁；佐佐木正哉：《咸豐二年鄞縣的抗糧暴動》，載《近代中國研究》卷5（1963年），第185—299頁。

[[65]](#_65_1)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98—99頁。

[[66]](#_66_1)關于苗亂的起因，可看 鄂輝等《欽定平苗紀略》卷1（1797年版），第1—3、8—9頁。這部官方文獻史書中的上諭最足以說明問題。另見馬少僑《清代苗民起義》，第34—51頁。

[[67]](#_67_1)傅鼎：《治苗》，載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88，第2—3頁；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第4500—4502頁；羅振玉：《皇清奏議·補遺》卷1，第7—11頁；王云五：《四朝奏議》卷1，第2頁；馬少僑：《清代苗民起義》，第59—69頁。

[[68]](#_68_1)關于紅巾軍叛亂，寫得很好的一篇著作是小韋克曼的《1800—1856年廣東的秘密會社》，載謝諾編《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29—47頁。關于三合會影響的增長和性質，見謝興堯《太平天國前后廣西的反清運動》；鐘文典：《太平軍在永安》，第159—165頁。

[[69]](#_69_1)奧弗邁耶的《中國民間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學未發表的博士論文，1971年）是對白蓮教傳統重新評價的一篇重要論著。鈴木中正的《中國的革命和宗教》則是論述中國傳統整個叛亂題材的主要著作。又可參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70]](#_70_1)奧弗邁耶的《中國民間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學未發表的博士論文，1971年）是對白蓮教傳統重新評價的一篇重要論著。鈴木中正的《中國的革命和宗教》則是論述中國傳統整個叛亂題材的主要著作。又可參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71]](#_71_1)見鈴木中正的《中國的革命和宗教》一書。他在研究明清白蓮教叛亂的基礎上，發揮了這一帶有普遍性的模式。特別可看第117—119、205—220頁。

[[72]](#_72_1)羅振玉：《皇清奏議·補遺》卷2，第1—2頁。

[[73]](#_73_1)矢野仁一：《論白蓮教叛亂》，載羽田享編《內藤博士還歷祝賀支那學論叢》，第726頁。

[[74]](#_74_1)孟森：《清代史》，第288頁。

[[75]](#_75_1)同上書，第301—302頁。

[[76]](#_76_1)《十朝圣訓》卷13第18章，第8頁。

[[77]](#_77_1)這件逸事載裘匡廬的《清代軼聞》中的《名人逸事（上）》，第8—10頁。關于曹振鏞的性格，見姚永樸《舊聞隨筆》卷1，第10頁。關于曹振鏞的傳記，見恒慕義編《清代名人傳》，第739—740頁。

[[78]](#_78_1)據說，曹振鏞應對著名的舉子俞正燮在1833年會試中的落選負責。這一事件記載在俞正燮的傳記中，傳記收在他的文集《癸巳類稿》中，載《安徽叢書》卷7，第9—18冊。

[[79]](#_79_1)見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10，補遺，第8頁，載《洪北江先生遺集》卷1。

[[80]](#_80_1)蕭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87頁。穆彰阿的禁臠是通商口岸的關稅收入（1842年以后）和河道總督的稅收。據說他控制了翰林院所有外放的差事。在朝廷里，他被公認為是王鼎（1842年死）及其繼任者祁寯藻這兩位軍機大臣的政敵。見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63頁；又見歐陽紹熙《清譚》卷5，第12—13頁。

[[81]](#_81_1)何炳棣：《中國人口的研究》，第216頁。

[[82]](#_82_1)見張灝《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14—20頁。

[[83]](#_83_1)繆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長原因》，載《思與言》卷5第3期（1967年9月）。又見瓦特《中華帝國末年的縣官》，第143—144頁；弗爾索姆：《晚清時期的“幕府”制度》，第41—47頁；以及波特《曾國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23—24頁。

[[84]](#_84_1)瓦特：《中華帝國末年的縣官》，第56、266頁（注48）。

[[85]](#_85_1)對魏源在學術界和政府中的作用敘述得極好的，是齊思和的《魏源與晚清學風》，載《燕京學報》卷39（1950年12月），第177—226頁。

[[86]](#_86_1)關于《皇朝經世文編》的內容，在英文中也有兩篇短評，分別由小韋克曼與米切爾寫成，載美國出版的《清史問題》卷1第10期（1969年2月），第8—22頁；卷2第3期（1970年7月），第40—46頁。

[[87]](#_87_1)倫納德：《19世紀初期中國經世致用論者的改革》（未發表的論文，1974年），第4—8頁。

[[88]](#_88_1)對19世紀初的今文學仍有待于全面的研究。小韋克曼的《歷史與意志》中有一章專門作了論述，它試圖把這時期今文學派的主要發言人合在一起以簡要地說明今文學運動的歷史，見第101—114頁。敘述今文學論戰的一本標準歷史書是周予同的《經今古文學》。

[[89]](#_89_1)閻若璩絕不是懷疑現存《書經》真實性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個通過系統的正文分析，而不是靠訴諸意識形態的理由來懷疑古經文文本的人。見戴君仁《閻毛古文尚書公案》。

[[90]](#_90_1)見米切爾《改革主義的極限：魏源對西方入侵的反應》，載《近代亞洲研究》卷6（1972年），第180—181頁。

[[91]](#_91_1)魏源：《明代食兵二政錄敘》，載《古微堂外集》卷3，第4頁。

[[92]](#_92)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80，第2頁。

[[93]](#_93)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載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81，第6—9頁；魏源：《答人問西北邊域書》，載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80，第1—2頁。

[[94]](#_94)張穆：《蒙古游牧記》，有祁寯藻1859年的序言。見商務印書館版（長沙，1938年）第1—2頁。此書在張穆死后由與長沙的經世致用論集團有密切關系的一位學者何紹基完成。

[[95]](#_95)楚金（化名）：《道光學術》，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卷1，第345頁。

[[96]](#_96)宣南詩社的作用是這種政治聯盟的焦點，這個問題在波拉切克即將發表的關于嘉慶道光時代的政治的博士論文中有所討論。關于程恩澤，見楚金的《道光學術》一書，以及程氏的墓志銘。墓志銘刊印在程恩澤的全集《程侍郎遺集》中，載《叢書集成》卷96第2212號，第5—7頁。

[[97]](#_97)關于嚴如熤平苗的活動，見魏源的《圣武記》（有1842年敘）卷7，第32—33頁。關于他的傳記，見清史館編《清史列傳》卷75，第45頁；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史》，第4502頁。

[[98]](#_98)《長沙縣志》卷11第32頁及以后諸頁。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征》卷90，第40—42頁；卷132，第43頁；卷138，第35—36頁。

[[99]](#_99)關于學海堂，見容肇祖《學海堂考》，載《嶺南學報》卷3第4期（1934年6月），第1—147頁；以及林伯桐與陳澧編《學海堂志》。關于詁經精舍，見阮元所編《詁經精舍文集》中阮元的序，載《叢書集成》卷81，第1834—1838頁。關于王昶和孫星衍的傳記，見恒慕義編《清代名人傳》，第805—807、675—677頁；又見第510—511頁上林伯桐的傳記。其他人的傳記，見清史館《清史列傳》卷72，第61頁（吳蘭修）；卷69，第49—50頁（曾釗）；以及卷73，第52頁（熊景星和徐榮）。

# 第四章 廣州貿易和鴉片戰爭

## 廣州貿易的特點

從1760年到1834年，中國對歐貿易所遵循的廣州制度，其實質是等級服從：首先，外商服從持特許證的中國壟斷商，后者總稱為“公行”；其次，公行成員服從清廷委任的廣州海關監督。在政治、法律方面，權力是按此等級向下行使的。清帝國的廣州官員，不僅海關監督，而且廣東省巡撫和兩廣總督都向公行成員發號施令，對不服從者可以監禁或懲處；他們通常不與駐廣州英國東印度公司監理委員會進行任何直接接觸，而寧愿通過行商向該委員會傳達命令。

但在經濟方面，力量的分布比較平均，因為廣州貿易制度所依據的正統儒家學說是與該制度有關各方的實際利益相抵觸的。中國在傳統上謀求對外關系的穩定，只準許納貢的外國人或被限制在邊界貨物集散地的外國商人——如在恰克圖（買賣城）的俄國人和1760年以后在廣州的歐洲人——進行有限貿易，廣州制度就是作為這種措施的體現而產生的。按照清朝政策的公開表示，商業利益服從國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甚至清朝歷代皇帝都把廣州貿易視為個人利益的重要來源。海關監督被外國人誤認為是戶部的代表，實際上，他由內務府授權，負責把廣州每年海關稅收多達85.5萬兩的現銀輸入統治者的私囊。[[1]](#_1_Zhang_De_Chang____Qing_Zhao_N)海關監督功績之大小，視其滿足皇帝私人定額的能力而定，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使廣州貿易保持開放。凡是預示有使港口關閉危險的國際事件，都會危及海關監督的財政稅收。同樣，行商如果因遭到擔負不起的官方苛索而破產，也會妨害海關監督獲得最大利益，因為只有公行擁有足以資助廣州貿易的商業資本。

公行的資本來自向壟斷貿易組織——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出售茶葉和紡織品所賺得的利益。東印度公司購買這些貨物的部分貨款是用輸入布匹等物償付的。但這些進口貨的價值一年平均只有350萬元，而東印度公司每年從中國輸出的中國貨物約值700萬元。這350萬元差額原來由東印度公司帶到中國的美洲銀幣補償。1805年以后，它停止向廣州輸入白銀，因為它的償付已能夠依靠“散商”，后者把機器、印度棉花和來自東南亞的舶來品出售給廣州的零售商。中國政府禁止散商把現金利潤輸出廣州，所以他們干脆把白銀直接交給東印度公司，以換取可在倫敦或印度兌現的匯票。當然，東印度公司利用這筆白銀繼續購買大量茶葉在英國出售。有三種發展情況改變了這幾方面經濟利益的平衡體系：清朝海關監督日益貪污腐化；英—中壟斷商的信用日趨不穩定；鴉片的自由貿易的興起。

## 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

主管對外關系的中國官員雖然從貿易獲得了利益，但表面上卻矢口否認他們有任何貪圖私利的動機。歷朝清帝也假裝不關心貿易收入，實際上卻強迫海關監督為他們弄到這筆收入。皇帝私人之所得就是帝國公益之所失。因為海關監督為了向皇帝上繳關“余”，常常不能完成向戶部交納規定的關稅定額。到18世紀末，這種營私舞弊行為惡性發展，每個海關監督在三年任期內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盡量飽其私囊。一個“廣州利益集團”形成了，它逐漸把從貿易吮吸來的款項變成了與外商或公行有關聯的所有大、小官吏的資財。

行商為了保護他們自己，于1775年建立一種秘密基金（即后來東印度公司所稱的“公所基金”，公所即行會，具體稱公行），公所的每個成員要把他貿易利潤的1/10交作基金，在必要時用來應付官吏的勒索。到1780年公所基金始公開并正式規定向外國進口貨征收3%的規禮，這是一筆附加稅，名義上是要保證行商能償還外商的欠款。

公所基金的設立，開始了廣州貿易的最后一個重要階段（1780—1833年）。公所基金本身是保護行商的一種方法，它之所以成為定規，是因為可以用它來對付散商早期在壟斷范圍外投資的增加。但是公所基金的運用，卻是1796年以后席卷中國的社會混亂的標志。在乾隆時代的最后幾年，出現了傳統王朝衰敗的最初跡象：幾袋珍珠就可買一高級爵位；軍隊虛報名額；地方稅款被侵吞。中原地區的大多數農民在連遭水澇災荒之后，又經白蓮教叛亂（1795—1803年發生在四川和湖北交界地區）的喪亂。這一叛亂在1802年以三合會起事的形式擴展到廣東，并成為海盜襲擊沿海一帶。廣東海盜因有在恢復東京阮朝斗爭中失敗的冒險家紛紛加入而人數激增，他們從1804—1809年實際上包圍了珠江三角洲。[[2]](#_2_Xiao_Wei_Ke_Man____1839__1861)清帝試圖以傳統方式緩和社會混亂和減輕饑荒，同時為鎮壓叛亂而開銷一筆必需的非常軍費，于是要求官吏和富商“捐”款。事實上，對于每一級官職都干脆定有捐款數額，各商會也有定額。公行的負擔是從公所基金開支的。

例如，在1807年，公所向皇帝納“貢”銀5.5萬兩；為帝國的軍事行動捐銀6.1666萬兩；為黃河水災善后和鎮壓沿海海盜捐銀12.75萬兩；向戶部官員饋銀5400兩；為購置鐘表和打簧貨（即八音盒和機械玩具，當時這些東西是“官吏向其京城上司行賄的公認的手段”）[[3]](#_3_Ma_Shi____Dong_Yin_Du_Gong_Si)付銀20萬兩。行商確切付出了多少款項已無從知悉，但東印度公司經查明者，在1807年和1813年之間從公所基金中至少公開支出了總額498.8萬兩銀子。這些款額并沒有對公行中較富有的潘喜官等成員起到任何保護作用。有些個人捐款一次高達10萬兩，也是向個別人士征收的。

## 英—中壟斷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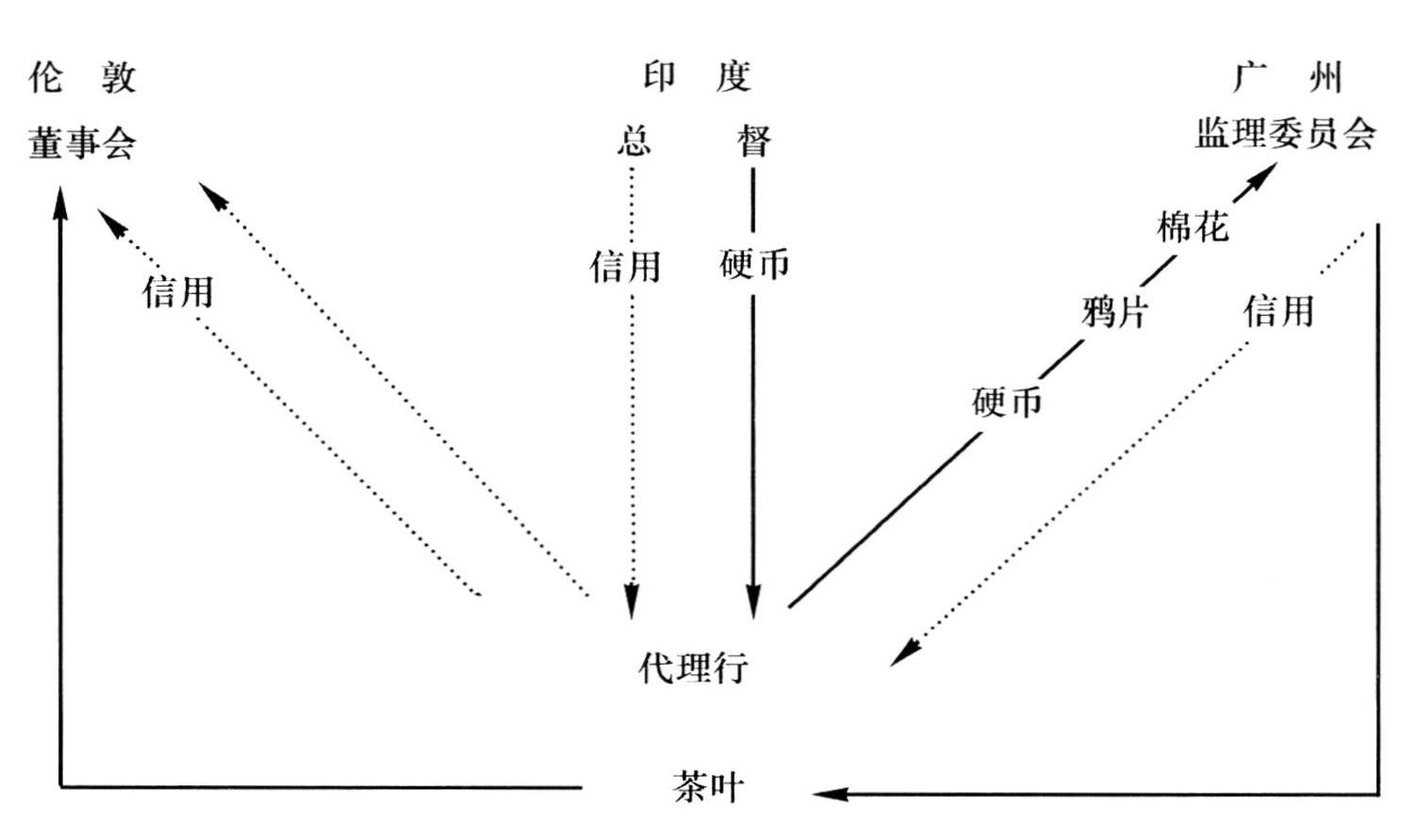
所有這些捐輸增加了行商信用的不穩定性，因而東印度公司的預付款越來越成為這個壟斷貿易機制的續命湯。每年要把下一年茶葉合同的50%的貨款和絲合同的90%的貨款預付給廣州的經紀人。他們為了預先保證下一年合同的下余貨款部分，就把這筆預付款的一部分轉交茶葉批發商或絲批發商，所以每個行商都是負債者。如果開始謠傳某個經紀人無力償付債務，他只要從英商得到更多的錢以表明英商信任他的可靠性，便可保持內地茶商和絲商對他的信任。但是從英商得錢愈多就意味著預付款額愈高，預付款額愈高也就意味著在下一年度合同中要給此行商以更大份額。該行商在得到這個份額后，也必須相應地接受更多的英國毛織品。于是，這位經紀人必須設法把不愿要的毛織品委托廣州紡織商行拋售。這樣也就進一步擴大了他的賒欠，進而增加了他的不穩定性，致使他年復一年地硬拴在東印度公司身上。到1783年，東印度公司在貿易上的勢力已是如此強大，以致它的監理委員會認為，即使海關監督也不能建立一個價格聯盟來與它相抗衡。[[4]](#_4_Ma_Shi____Dong_Yin_Du_Gong_Si)當然，這種情況絲毫不能削弱海關監督勒索行商錢財的權力，因為一種新的英—中壟斷制度已經建立起來。這時東印度公司已把大量資金提供給某個商人，以致它簡直經受不住使他遭到破產的風險，否則它就會失去獲得它的“副保”的一切希望（“副保”，即該商人已抵押給東印度公司以后幾年的茶葉貿易）。從此，該公司的預付款辦法把它的命運緊緊地和這些商人聯系起來，使得海關監督不再能——或者說不再需要——出賣專賣權。相反，他把經紀人作為英商的代理人使用，因為他知道東印度公司會間接地替他們交納罰款和關稅。

盡管監理委員會非常急切地想恢復瀕于絕境的行商以保持茶源暢通，可是東印度公司從茶葉貿易本身賺來的錢很少，雖說到19世紀30年代，英國政府從茶葉稅中得到了歲入的10%。東印度公司的收益卻沒有那么多。在1780年和1790年間，對印、中兩國的貿易的全部利潤稍許不足200萬英鎊，只折合原來股本額的5%。這當然不包括使東印度公司成為其財源的許多有關人士的額外所得：此種所得即東印度公司商船上的大班和船員的私人貿易，支付給有權利以高價向公司出讓“世襲船底”——或稱運輸權——的某些家庭的款項，等等。但無論如何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貿易從未中斷，因為該公司統治了印度，而中國則是實現匯劃印度歲入結余的理想的中介國家（這些余款必須用于償還2800萬英鎊的債款，是東印度公司為支付主要用于征服印度的花費而在倫敦借支的）。

匯劃機關當時是代理行。東印度公司為使自己的職員不控制散商對印貿易，于1787年建立了代理制度。1832年，有人對代理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代理行主要由紳士組成，他們過去都在政界或軍界供職。他們覺得按習慣自己更適于經商，于是得到退職許可后便從事代辦業和商業。他們為公司服務積蓄了資金。他們把這筆資金或者借給別人或者直接用于商業，實際上，與其說他們是資本的擁有者，毋寧說他們是資本的分配者。他們在通常的貿易過程中，以及通過借貸之間的利息差額和通過收取傭金，來獲得利潤。[[5]](#_5_Bu_La_Ken_Xian_Sheng_Zai_Xia)

到1790年，在加爾各答已有15家控制印度國內“港腳商”的散商商號；這時，“港腳商”也已向東擴展到海峽和中國。為了滿足貿易需要，商號建立了銀行和保險公司，為外商投資者辦理業務，匯寄私人資金，資助靛青種植，等等。匯運歐洲染料工業使用的靛青是一種主要的匯寄形式，不過這種匯運經常受到擁有和管理東印度公司船只的“航運界”收取高昂運費的妨礙。1801年，靛青售價暴跌，許多代理行開始著重依靠向廣州運送棉花和鴉片的生意。



與中國的三角貿易

東印度公司壟斷了中國的茶葉收購，因此，港腳商（即在印度得到該公司許可而由散商經營的商號）從印度運往中國的商品不得不在中國統統換為低價貨如糖或者中國白銅（即鋅，有時是鋅與鉛、銅的合金），或者只換成硬幣。因此，需要大量銀行業務來結算利潤。有三種辦法可以使東印度公司用這些巨額收益獲得硬幣和增殖利潤，因為這時該公司在廣州維持這一貿易體制迫切需要巨額費用和預付款。第一，印度管轄區之一可以向某代理行預付盧比，該代理行即購印度棉花運往廣州出售以換取西班牙銀元，然后從中扣除港腳商人的利潤而將余款交東印度公司商館賬房。第二，駐廣州的商館可以接受某一港腳商人的硬幣而付給他可在倫敦或孟加拉兌現的匯票。最后在下列情況下信用可以在賬房中過戶：（1）如果東印度公司欠行商甲一筆預付款，（2）甲可以從港腳商人乙購買棉花和鴉片，（3）因此，甲能把他的東印度公司欠款過戶給乙，然后，（4）乙可利用由倫敦董事會承付的匯票將款匯往倫敦。

乍一看，港腳商人很像是中國明、清時代在國家各專賣事業之間鉆空子活動的那種商人。但實際上與中國那種商人不同，因為港腳商人是不可或缺的。出現港腳商人的最基本和最經常的原因很簡單，這就是英國人對茶葉的需要量很大，在歐洲卻找不到中國人會大量消耗的與此相當的制成品。結果，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制度本身不能為這種貿易提供資金。所以除了公司直接運輸茶葉外，其他一切交易都是通過其印度代辦所及其駐廣州代表——“英國散商”——進行的。

## 壟斷制的告終

隨著中、英兩國越來越疏遠，它們的貿易代表反而越來越近乎。到1810年，監理委員會和公行似已結為一體，成了一個統一的英—中行會。它們之間的競爭是不關重要的。的確，它們雙方都希望互相幫助以反對新來的英、美散商的侵犯；這些散商是在壟斷體制之外搞經商，因為他們認為壟斷制度已過時和礙手礙腳。

1785年第一只美國船到達廣州。獨立戰爭結束后美國私掠船失了業，安的列斯群島不向它們開放，塞勒姆、波士頓和紐約的船主如饑似渴地注視著中國貿易。美國的單桅小帆船和縱帆船從努特卡先是運來了人參，1787年后又從那里運來了毛皮。1806年以后，即當美國太平洋西北沿海的海豹和海獺被滅絕時，就從夏威夷和斐濟收運檀香木，到1830年這也被砍伐殆盡。繞道合恩角的美國人也開始在西班牙美洲諸港出售歐洲貨物以換取墨西哥鷹洋，然后將鷹洋運往中國以購買茶葉、絲和瓷器。這使廣州貿易一年又增加了二三百萬元的現銀，從而使美國和中國的貿易額有可能激增。美國的運費與東印度公司的相比是如此便宜，以致美國人在英國可以付了茶葉關稅后仍能以低于東印度公司的茶價出售。到1820年，廣州貿易除一小部分外，全部由東印度公司、港腳商人和美國人分別經營。

美國人自己并不愿步東印度公司之后塵，不愿付給行商以抬高了的價格去填充公所基金。相反，他們找的是非公行的商人，特別是尋找其行號麇集于廣州各商館周圍的店主。但在1818年曾發現一店主試圖自購生絲時，海關監督堅決主張：行商作為外國船只的保商，此后應當對非公行的經紀人作出擔保。這對公行和監理委員會有利，因為大多數店主必須因此遷回城內。10年以后，有個鹽商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外貿商行與美國人做生意，還得到了上述的那些店主的資助。當海關監督從該鹽商得到一筆特別豐厚的賄賂后似乎正要默許時，像17世紀的一些“特許權商人”那樣，東印度公司利用總督的干預破壞了這個聯合活動，監理委員會對中國官方干涉這次貿易的善意行動表示贊賞，但倫敦并不以為然。

英、中兩國的距離使董事會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使它的廣州貿易組織中國化。例如在1810年，董事們發現，已將350萬兩銀子預付給行商。監理委員會總是辯解說，這些預付款至少把下一年度的茶價降低了3.5%。當印度總督不得不用12.5%的利息借款時，倫敦詢問，為什么為了得到這樣微薄的收入就把那么多資金束縛在廣州呢？這個邏輯是不能駁倒的，到1818年，監理委員會最后承認，茶葉生意很穩定，已經不再需要預付款了。[[6]](#_6_Can_Kao_Luo_Si_Ji___Hua_Nan_D)經濟作物的種植已經推廣到福建、中原地區和廣東各地，愈來愈多的農民種植單一作物以滿足世界對茶葉的需要。結果，當行商簽訂了下一年度的合同時，廣州商館幾乎是若無其事地向行商停交硬幣。雖然仍用現銀付給經紀人以支付公所的各種款項，但在1825年3月監理委員會秘密會議以后，甚至連這一做法也停了下來。如果一個行商即將破產，最好的辦法是使他退出公行，自謀生計。舊的廣州壟斷制度正在日趨瓦解，因為港腳商把愈來愈多的資本引入廣州城而使行商能夠以較低的利率向私人放債戶借款。利率從年利20%降到了12%，因此東印度公司的人為的貸款方法就不再需要了。[[7]](#_7_Ma_Shi____Dong_Yin_Du_Gong_Si)這樣，英—中壟斷商之間長達百年的舊的貿易聯系未作重大的聲張就被切斷，結果這兩個法人很快就離異了。公行繼續寄希望于將來，但監理委員會發覺，公行作為一個有擔保能力的壟斷組織的時代已經過去，開始打退堂鼓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1813年7月13日，英國議會廢除了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貿易壟斷權，只允許它還保持20年的對華貿易壟斷權。在印度開放自由貿易后的繁榮時期，在加爾各答和孟買建立了數十個新代理行，其中有許多代理行向對華港腳貿易投資。駐廣州的英國散商多年來已經與正規商業沾上了邊，他們輸入倫敦的打簧貨、中東的沒藥、馬德拉斯的檀香木、馬來亞的玳瑁，等等。他們的大宗商品已經是印度原棉，與南京的棉花競爭，向華南的紡織業推銷。不久印度的繁榮時期結束。1827—1828年發生世界貿易蕭條，而且普魯士藍又在歐洲染料工廠中代替了靛青，結果幾乎毀滅了加爾各答的所有代理行。此外，廣州港腳行號的業主們（其中許多人是加爾各答商人的蘇格蘭籍親屬）發現，中國市場對他們自己貨物的需要量很低，也不穩定。從1819年起新加坡已經在迅疾地發展，致使海峽貿易的商品充斥于廣州市面。印度棉花曾經是港腳行號的主要靠山，但它不再能同南京棉花競爭，因為南京棉花現在不是經過陸路，而是用帆船南運廣東，從而減少了運費。甚至打簧貨也售不出去，因為廣州人已學會了仿制。雖然如此，港腳行號在廣州人經營的銀行業中仍起著重要作用，即使上述的特殊貿易失敗了也不會使它們破產。除前面談到的金銀財寶的運輸和從事金銀經紀業外，私人商行還新辦了數種新交換業務。例如，1826年以后銀元輸入額降低，原因是西班牙美洲的銀源枯竭，美國轉向國內投資。[[8]](#_8_Zhang_Rong_Yang____Dui_1784)因此，像維廉·查頓博士等商人開始鼓勵美國人在倫敦出售他們自己的美國棉以換取寄往廣州投資的拜令兄弟公司的匯票。接著查頓給出售棉花的美國人在廣州記上一筆應付款，然后把原來的匯票在倫敦兌現，這樣又向對華的私人投資者提供了一種匯劃方式。這種銀行業在19世紀20年代末的世界信貸危機中維持著港腳行號，但卻未向它們提供足夠利潤使其發財致富。只是廣州的私人商行開始直接向印度的第三大宗出口貨鴉片投資時，它才向港腳行號提供足以致富的利潤。

## 鴉片貿易

鴉片從唐代以來在中國就作為藥物使用。1620年，臺灣人開始把鴉片和煙草混合起來用作麻醉劑傳播到東南沿海。雖然在1729年時清政府禁止鴉片輸入，但葡萄牙人仍從印度港口如達曼和果阿（臥亞）將這種麻醉劑小量輸入中國。1773年，東印度公司決定在東印度建立一個它自己的鴉片壟斷組織，向印度農民提供款項，種植比葡萄牙人從西印度運來的白皮土（麻爾洼）質量更高的公班土（八達拿）。但到1796年，中國人被這種麻醉劑弄得十分苦惱，致使東印度公司決定不向中國直接輸入鴉片以免危及它的茶葉壟斷經營，而寧愿將鴉片在加爾各答拍賣給英國散商，然后由他們通過港腳貿易兜售給印度東部。因此，從1800—1818年，對中國的鴉片貿易都是通過澳門進行的，每年不超過4000箱（一箱約重140磅）。

但在1819年，這種麻醉劑貿易突然興旺起來。白皮土和公班土互相競爭，促使價格下降而擴大了消費量，結果又進一步增加了需要。有一個代理商寫道：“鴉片像黃金一樣，我可隨時賣出。”[[9]](#_9_Ge_Lin_Bao____Ya_Pian_Zhan_Zh)1820年，學識淵博的總督阮元取締了這種貿易。16個中國商人在澳門被捕，其中一人泄漏了全部底細，詳細交代了向高級官員行賄情況。在此后發生的一次丑聞中，歐洲人的走私制度又恢復了原狀，當時鴉片批發中心站被移到一個小島上，即葡萄牙人1517年曾首次登陸和位于虎門以外水域中的伶仃島。從1822—1830年，這個中心站的鴉片貿易又來了一個大躍進，貿易額每年高達18760箱。但其中許多鴉片是非公司所屬的白皮土，是由一些辛迪加在達曼購買的。為了試圖使印度中部地區的土著王公不將鴉片售給辛迪加，東印度公司終于在1831年同意收運輸費通過加爾各答轉運白皮土。鴉片這時從印度各地隨便流入廣州，到1836年，輸入總額達1800萬元，這使鴉片成為19世紀全世界最貴重的單項商品貿易。

這種麻醉劑雖然大量被卸到伶仃島的浮動躉船上，遠離中國官員的監督，但它必須經過廣州才能賣出。數十個中國批發商（窯口）在廣州從港腳行號辦事員處買得執照，然后在設防的躉船上用執照換鴉片，再用“扒龍”（即“快蟹”，是全副武裝的四十槳船，船上是一伙兇惡的疍家水手）把鴉片運走。這些船只或奪路而行，或行賄買路進入內河，駛抵由匪徒和三合會經管的陸路批發站。但即使如此有效的體系，也不能全部處理印度來的貨物。作為港腳貿易頭目的查頓博士一心想賺錢，于1832年決定派船北上，在福建和浙江沿海的小海灣直接從船上出售鴉片。這些全副武裝而豪華的沿海飛剪船就這樣開辟了新的市場，增加了新的癮君子，結果空前規模地擴大了這種麻醉劑的銷路。

在19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盈余2600萬元。從1828—1836年，從中國流出了3800萬元。使國際收支逆轉的正是鴉片煙，結果就資助了英國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動。1830年，東印度公司的總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400萬鎊得從印度運回英國。印度的這筆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變成鴉片在廣州賣掉，然后購買茶葉運到國內，這又為英國政府增加了330萬鎊關稅收入。在經過幾個世紀的貿易之后，西方終于發現中國會大量購買的東西了。正人君子們在想到這種產品的性質時也許會感到內疚，但這種麻醉劑不正是港腳貿易的重要商品嗎？港腳貿易不又是那個時代每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評價很高的那些價值——自助、自由貿易、商業主動性——的縮影嗎？因此，心有內疚者被忽視，正人君子被藐視，懷疑主義者被嘲笑。如果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自由貿易者認為應更多地歸功于他們。曼徹斯特如日方升，港腳商對監理委員會幾乎視為當然的限制感到惱怒。查頓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英國的大人先生們除去對于茶葉和從茶葉得來的稅收而外，再也不想到有關中國的事情，只要安安靜靜得到這兩樣，任何屈辱都甘心忍受。”[[10]](#_10_Ge_Lin_Bao____Ya_Pian_Zhan_Z)但這個時代已經過去，難道不是嗎？1833年，即經過了四年的請愿、公眾演說、群眾集會和院外活動，自由貿易者看到，通過議會終于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中國這時也對英國的自由貿易實行開放。

事情難道不是這樣嗎？爭取自由貿易的戰斗在英國國內已獲勝利，而廣州仍在實行限制。這個城市仍拒外商于城墻之外，使外商受該城官員的轄制。一出廣州城，就是四億人口的中國國內大市場。曼徹斯特的制造商們互相議論說，只要想到這件事：如果每個中國人的襯衣下擺長一英寸，我們的工廠就得忙上數十年！只要能夠打開這個壁壘就好了。只要英國能找到一個安全港口，能奪得一個島嶼并將它變成一個受英國保護的弊絕風清的貨物集散地，那就好了。駐廣州的英國散商1830年12月在呈遞下院的請愿書中辯解說，對華貿易是世界上潛力最大的貿易。現在該是把對華貿易置于“一個永恒的、體面的基礎之上”的時候了。馬嘎爾尼于1793年和阿美士德于1816年出使中國的失敗，“也許能有力地提醒貴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國都是不會有什么收獲的”。[[11]](#_11_Ge_Lin_Bao____Ya_Pian_Zhan_Z)甚至東印度公司監理委員會在收拾行裝準備撤走時已經開始感覺到，作為外交的姊妹的戰爭，就是對人們的問題的回答。西方的和中國的壟斷者都遭受了百年以上的痛苦，但現在那個時代已經過去。監理委員會宣稱，戰爭能輕易地打贏，并且會“把我們的交往置于合理的基礎上”。因為“中國人民決不想損害同英國的關系……敵對心理只不過產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12]](#_12_Ma_Shi____Dong_Yin_Du_Gong_S)。大班們想起他們曾經享受過的巨大利益時充分相信，備受官員壓迫和海關監督征稅之苦的普通中國人，一定會贊成中國國內商人數百年來未能實現的愿望：摧毀官僚制度對商業的限制，即使這意味著訴諸武力也在所不惜。

如果英國人比較認真地省察一下自己的動機，就會認識到他們對中國人的誤解是多么嚴重。自從葡萄牙人擁有第一批商船之日起，歐洲商人就被利潤、宗教信仰和國家榮譽所激勵。過去重商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攜手并進的。而現在，隨著帝國主義在19世紀成為一種學說，它把這兩者空前緊密地結合了起來。貿易總是隨著國旗而來。可是誰都會想到，當國旗最終真的到達廣東時，廣州人可能考慮國家的安危勝過考慮貿易的利益。

鴉片戰爭（1839—1842年）前夕，清朝的對外政策以三個長時期以來遵循的假定為依據：即中國在戰爭中占優勢；它善于使外來民族“開化”；它有貴重商品可使外國人接受納貢地位。這三個假定在當時都錯了，而且最后一個假定到1839年尤其過時得厲害，因為它只適用于工業時代以前的商業往來的情況。那時外商來華只是為了購買中國貨物。而此時西方制造商開始來尋找中國市場了。曼徹斯特商會在1836年2月交給外交大臣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廣州提供了年達300萬鎊印度商品的出路，“這使我們的印度臣民能夠大大增加對我們制成品的消費量”。[[13]](#_13_Ge_Lin_Bao____Ya_Pian_Zhan_Z)英國人要扭轉一千年來歐洲和東亞之間的供求關系，他們想的比實際做到的更多，但是堅決要求取消中國為防止西方商業入侵而設立的壁壘，這呼聲中還悅耳動聽地夾雜著19世紀輝格黨自由主義與曼徹斯特企業的共同要求，這就是不久人們所說的“自由貿易”。“自由貿易”的代言人，如主張侵華的一些時文小冊子作者和院外活動者，完全反映了這個時代的民族主義，他們異口同聲地要求貿易特權和平等的外交往來。

## 律勞卑事件

1833年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的法案，也規定要委任英國駐廣州商務監督。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勛爵提名蘇格蘭貴族、海軍軍官和養羊業主威廉·約翰·律勞卑擔任此職。律勞卑是一個存心善良的人，但不熟悉中國國情，他被派往澳門時帶著前后自相矛盾的訓令，即反映了他的上司不愿意在戰爭（它會破壞現存貿易）和消極服從（它會加強清王朝的壟斷制度和單一港口貿易政策）之間作出選擇。一方面律勞卑被告知，他不得損害英國與中國的現存關系；但巴麥尊接著又簡直像是事后諸葛亮地補充說：“閣下到廣州后應立即以公函通知總督。”[[14]](#_14_Ma_Shi____Zhong_Hua_Di_Guo_D)數十年來，廣州貿易章程一直禁止中國官員和外國人直接交往。現在巴麥尊隨便宣布一項中國肯定會反對的新倡議，但又沒有打算用武力支持這個要求。律勞卑尚未悟出此中奧妙，他于1834年7月25日到廣州以后就發出了這樣一封公函。這公函立刻遭到拒絕，兩廣總督盧坤命令他立刻返回澳門。律勞卑拒不返澳，于是盧坤中斷了貿易。在律勞卑逗留廣州期間，總督命令封閉商館，斷絕供應。接著律勞卑違背巴麥尊的命令，指揮兩艘軍艦一直打入珠江，同時派軍艦去印度接兵。與此同時，盧坤封鎖了珠江，集合68只戰船，并經道光帝敕準用武力對付。律勞卑雖因患瘧而身體虛弱，但仍頂住封港令和封鎖達17日之久。當他最后失去他本國商人的支持時便改弦易轍，黯然回到澳門，10月11日即病死于此地。

律勞卑事件有兩個重要后果。它使清朝官員相信，一經大膽地封鎖商館，英商就是些孤立無告的人質；它也使律勞卑的繼任者認識到，沒有應急的戰爭計劃就向廣州貿易制度挑戰，是一件蠢事。第二任商務總監德庇時先生稟告巴麥尊，在未得到下一步訓令以前，他將保持“絕對沉默的態度”。[[15]](#_15_Tong_Shang_Shu__Di_166Ye)但這種沉默的政策并沒有使駐廣州的港腳商感到高興；他們對德庇時的優柔寡斷進行了三個月吹毛求疵的批評，之后德庇時就辭職了。他的繼任者在1835年和1836年一直安靜地工作，等待訓令，但訓令從未到來。他只有一個想法：保持貿易暢通，即使這意味著接受所有的貿易限制也行。

有勢力的自由貿易院外集團所要求的是多得多的東西。自從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以后，貿易按銀元價值雖已經增長，那主要是因為廣州物價飛漲。[[16]](#_16_Mei___Ying_Liang_Guo_Chuan_Z)英商當時非常艱窘，降價出賣了馬薩諸塞州洛維爾工廠，更不用說必須付出越來越高的價錢購買中國貨了。這種通貨膨脹是西方貿易弱點的象征，因為廢除英國壟斷權實際上意味著有效的法人的討價還價的力量和信用手段的終結，這兩者原來都能使商品保持低價。而且自由商人很快發現，行商為了獲得現款，把英國布匹暗中貼本7%出售。這清楚地警告信用危機迫在眉睫（如1836年的破產事件），同時它也顯示了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的另一個后果。這里不再有一個由英國公司代表組成的單獨團體來關心保護每個行商免受海關監督的橫征暴斂了。因此，自由貿易拆去了中國商業活動的一個重要支柱，從而使廣州貿易制度出現了極大混亂。實際上，一方實行放任主義，需要另一方相應地取消各種限制，才能恢復貿易職能的平衡關系。

這個道理是明白了，但港腳商人主要認為，市場當時對他們是關閉的，他們成了贓官任意敲詐的犧牲品，律勞卑和英國國旗受到了侮辱。當然，這最后一點是他們在政治運動和請愿書中利用來使其同胞確信他們的斗爭是正義的。《廣州紀事報》首先發出了刺耳的主戰言論；到1835年，馬地臣把這些議論帶回了英國。開始，他沒有得到當時威靈頓公爵領導下的外交部的同情。但輝格黨人很快重掌政權，馬地臣發現巴麥尊勛爵比較愿意傾聽他的意見。這位新任外交大臣雖然不得不對付曼徹斯特及利物浦的廠主們，但采取更加強硬對華政策的想法顯然適合他自己那種愛炫耀的情緒。他并未天真地相信可以將這個政策強加給英國公眾，除非中國人提供一個開戰的借口，因為英國公眾根據福音的領導已經感到販賣鴉片是犯罪的。然而他能夠采納稍為強硬的政策，于是他聽從船長義律（他在皇家海軍服過役，此時在澳門擔任第二商務監督）的建議，執行一種既不像律勞卑那樣執拗又不像德庇時那樣被動的政策。1836年6月15日，巴麥尊提名義律為商務監督。6個月后，委任令到達澳門。[[17]](#_17_Cong_Guang_Zhou_Dao_Lun_Dun)

有些幸運的人常常相信，即使最困難的問題也可得到“合理”解決，義律就是這樣一個人。但不幸的是，他雖有這種樂觀主義，卻沒有輔之以對細節的關心，也沒有成功的外交活動在解決微妙問題時經常需要的那種耐心。他奉命要像律勞卑那樣停止使用稟帖方式；但因盧坤的總督職務已被顯然具有更多妥協思想的鄧廷楨所接替，所以義律認為，為了實現交往，值得按中國規則辦事。他呈上了一份畢恭畢敬的“稟帖”，鄧廷楨才承認他為商務監督，允許他進入廣州。義律在受到巴麥尊斥責以前一直得意洋洋。這位外交大臣正確指出，這種外交禮儀的實質就是貢使制度，所以堅決不許利用稟帖謀取兩國政府的交往。鄧廷楨也自然不肯紆尊降貴。他上奏道光皇帝時說：“唯若聽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敵體于天朝。”[[18]](#_18_Guo_Bin_Jia____Di_Yi_Ci_Ying)

義律希望用軍事手段打破僵局。海軍少將馬他侖并未接到確切的訓令就于1838年7月率印度艦隊中的兩艘英國戰艦到達。義律期待會出現某些跡象以證實他的希望，即這次顯示力量的小行動將會使中國轉變態度。鄧廷楨當然被馬他侖的到來所震驚；當一次小事件發生之時，他就默許他的一位水師管帶去向這位英國艦隊海軍少將正式道歉。義律對道歉感到滿意，于是英國戰艦于10月初返回印度。

義律這時認為他已有了一些成績，但誰也沒有受騙。中國人認為他們已揭穿了英國人的虛張聲勢，而港腳商卻知道，只是艦隊的訪問絕不會引起他們所希望的戰爭。早在1835年他們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只要能從對華貿易得到源源不斷的稅收，就不會發動戰爭。但是如果鴉片（英—中—印貿易的貨幣催化劑）減少，巴麥尊勢必會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決定。因此，主動權操在中國當局手中，而中國當局早已開始比較強有力地來打擊鴉片販運了。

## 關于鴉片問題的爭論

到1836年，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1820噸。吸煙成癮者似乎與日俱增。煙癮的程度如何從來沒有精確估計，因為一個吸煙人每日平均用多少鴉片沒有可靠數字。1836年，外國人估計約有1250萬吸煙者。1881年，赫德爵士作過一次比較認真的核查，他提出吸鴉片者的人數是200萬，即約占全國人口的0.65%。大多數當時人士認為這個數字太低。喬納森·斯賓士經過認真的研究，認為吸煙人占總人口10%是19世紀80年代后期的合理數字，也許3%—5%的人煙癮很大，因此提出1890年癮君子人數是1500萬。[[19]](#_19_Si_Bin_Shi____Qing_Dai_Xi_Sh)

可以上溯到1820年，外事專家包世臣曾宣稱，蘇州有10萬名癮君子。1838年，林則徐堅持說，用洋藥者至少占中國人口的1%。但是比這些學者引用的數字更重要的是，到處出現了吸煙的情景。在通都大邑和貿易大道上，在人煙稠密的河流三角洲，吸煙現象不能忽視。因為吸煙所費不貲，它需要余暇時間和額外收入。因此，吸煙人往往是富有的紳士、中央政府的官員（有人說吸煙者占五分之一）、衙門胥吏（林則徐估計占五分之四）和士兵。朝廷一想到整個政府官員因吸煙而腐敗時感到震驚，對于銀錠外流量與日俱增的經濟后果也感到驚恐。粗略地說，中國采用的是復本位幣制，即1000文銅錢依法應兌換銀1兩；但銀價在逐漸增長，所以到1838年，大約1650文銅錢換銀1兩。因為土地稅一般用銅錢交納，但要用銀兩計算和上解給中央政府，因此，農民必須繳納愈來愈高的賦稅，而國家收入則毫未增加。

兌換率的這種變化還有純屬國內的原因。例如，云南銅礦開采產量下降，迫使政府鑄造更便宜的銅錢。銅錢質量變劣及其相應的貶值，要求有更多的現錢，所以在19世紀開頭30年，每年鑄造的貨幣多達18世紀初的8倍。按格雷欣法則，銀因此在流通領域內消失，這就增加了對銀的需要，從而也提高了銀的價值。[[20]](#_20_Fei_Zheng_Qing____Zhong_Guo)縱然銅錢本身的貶值完全說明了銅錢交換價值的損失的原因，但清朝官員仍把價值差額完全歸咎于鴉片貿易對中國所造成的白銀收支逆差。這種經濟方面的擔心還夾雜著其他一些論證。例如，鴉片被視為外夷侵略的一個幫兇，是使人民意志消沉、“道德淪喪的毒藥”。像“邪教”一樣，鴉片破壞了中國固有的——即使人區別于禽獸、使中國人區別于外夷的——社會關系（倫理）。如果人民因吸煙而不斷深深陷入頹廢消沉之中，御史袁玉麟在1836年論證說：“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約其仆，師不能訓其弟……是絕民命而傷元氣也。”[[21]](#_21_Guo_Bin_Jia____Di_Yi_Ci_Ying)

此外，洋藥貿易使官員和暴徒發生聯系，從而敗壞了公職。廣東情況特別是這樣，所以該省早在1826年就已建立了一支專門捕捉鴉片走私船的巡邏船隊。沒有過多久，這些巡邏船便讓走私船“快蟹”每月交納3.6萬銀兩而允許它們從身邊悄悄通過。因此巡邏船于1832年被撤銷，五年之后，即當鄧廷楨想盡辦法要消滅走私時，又被恢復。麻煩的是這些海上巡邏船吸引住了一心想牟取暴利的所有貪贓枉法的官員。甚至水師提督韓肇慶也要為抽取傭金而轉運鴉片。廣州的大商號也被牽連在內。這些商號唯恐洋藥危及它們的合法生意，確實設法不使自己過深地卷入洋藥貿易，但最后對此也滿不在乎了。許多商人都從事這種貿易，例如福建批發商、廣州布販、山西銀行家等，所有這些人在官方看來都是一丘之貉。

在公開記錄的下面尚潛藏著迄今并無文件可考的懷疑，即最初得到對西方貿易壟斷事業支持的廣州實業界，逐漸依賴鴉片；后來由于宮廷吮吸鴉片利潤，它進而使北京也依賴鴉片了。貪污腐化和高尚的道德原則常常共存于世界上的一些權力中心，因而這樣來聯系似乎是可信的。嘉慶年間（1796—1821年），廣州每年應交皇室的關稅余額為85.5萬兩銀子，此款比帝國境內21個海關征稅的全部余額（銀226.1萬兩）的三分之一還多。因此人們可以推測，廣州有這么多官員都能得到利益，那么海關監督勢必要上解一份給朝廷分享。[[22]](#_22_Zhang_De_Chang____Qing_Zhao)此外，從清代貿易初期開始，中國東南地區的商人就已經和沿海罪犯緊密勾結在一起。這種勾結隨著廣州貿易制度的日趨穩定曾經有所減弱。現在它又在重整旗鼓，使得被派去治理這個地區的清朝官員比以往更加確信，有個完整的當地“叛國者”組織在幫助外夷腐蝕中國。

鴉片煙在18世紀沒有獲得有效的禁止。1820年道光帝登極時被這種違法行為所震驚。他的憤怒影響到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后者曾把鴉片走私販從澳門驅逐到伶仃島。但在19世紀整個20年代，關于洋藥泛濫的報告不斷傳來；北京本地也公開出售，山西省有煙館，上海附近有走私買賣，甚至安徽各地山上也遍種著紅罌粟花。到1830年，道光帝也得知江南銀價上漲，第二年他下詔逮捕走私販以制止從廣州輸入鴉片，并命令恢復保甲制度和獎勵告密，以制止國內種植鴉片。[[23]](#_23___Qing_Shi_Lu_Jing_Ji_Zi_Lia)這兩個措施都未能減弱暴利的吸引力，到1836年事情已很清楚了，“嚴厲”執行現行法律并不能遏止洋藥的傳播。因此，在那年5月17日，北京的一位官員許乃濟大膽地建議說，禁止不是辦法。姑且不論道德問題，可是銀塊外流卻是實際問題，而這只有對鴉片貿易實行解禁并采取易貨交易才能預防。清帝立刻要求其他高級官員討論這個問題，他靜默地傾聽他們的辯論，不表態；以后這場辯論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進行了兩年之久。

第一個是解禁問題。當時有兩種意見。解禁派辯解說，“空想的”實施禁令是不切實際的，除非皇帝愿意實行恐怖統治。繼續不斷的禁止只能使官員貪污腐化。最好的辦法是把握現實，用易貨交易的辦法獲得洋藥，然后把它置于海關監督的壟斷控制之下。這樣，國家收入就會大量增加。這最后一點的確打動了道光帝的心，因為他是一位著名的主張節儉的人；但他又很自覺地模仿歷史上的英明君主，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負的道德義務。因此，他更容易接受道德派的反對意見，即違法不是廢除法律的理由。世道可能是惡劣的，但這更是大膽恢復道德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鴉片被解禁，人們都要吸煙。

道光帝同意道德派的意見，下令駐廣州官員要更積極地執行反對中國人走私和販賣的法律。這次禁煙運動的成績超出了北京的意料。到1837年1月，廣東按察使王青蓮四處查封煙店，使鴉片貿易幾乎銷聲匿跡，在這整個一年里有2000個販煙者被捕。事實上，港腳商人掌握的洋藥確實供過于求，因此價格暴跌。雖然有一個外商因走私而被驅逐出境，但是這里的外國人仍然認為，中國人對此反正不會十分認真，并且會認識到實行解禁在財政上是正確的。特別是他們仍然蠻有理由地認為可以免于逮捕。雖然豁免權是個關鍵問題，但由于道光帝對從廣州呈遞的樂觀奏折產生了可以理解的懷疑，又由于他渴望這個問題獲得最終和徹底的解決，所以免于逮捕的范圍完全改變了。1838年6月2日，北京的另一位官員黃爵滋要求道光帝下令對煙民判以死刑，這引起了第二階段的鴉片辯論，即辯論如何根除鴉片的方法。到這時為止，只有販賣和種植鴉片者才受懲罰。黃爵滋爭辯說，這還不夠。只要有需要，寡廉鮮恥之徒就會竭力去迎合它。因此，一定要杜絕對鴉片的需要，即使它意味著千千萬萬的人死去也在所不惜。

這時，沈陽的韃靼族將軍（滿洲將軍）寶興向道德派提出了質問。他問道，你如何斷定誰是吸煙者呢？從這樣一條法律獲得好處的只是衙役和胥吏，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條法律勒索不幸的無辜者，或是利用它來報復宿怨。這樣做不行，要打擊的仍應是煙販和走私者，因為他們是問題的關鍵。應當認真地執行現行法律即可，而不必另外頒布新的嚴刑峻法。這是個合理的勸告，但是道光帝知道，自從1820年以來走私者本已被逮捕，但洋藥仍然源源流入中國。空談執行法律很容易，但另外還必須制定確切的執行方法。另一方面，道德派的意見的確是激進派的意見，因為這些意見意味著國家對社會的最下層給予干預。這不但有些法家味道，而且還意味著把一件強有力的武器交給了不可能指望他們善于使用它的下級官員。難道那時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個合理解決的辦法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1838年7月10日聽到了另一個人的言論，此人就是湖廣總督林則徐。林則徐出身于福州一個家道中落的望族，這時他已有了出色的仕宦經歷。1804年，他19歲中舉。后來任巡撫佐幕五年，接著在京任三年多翰林院庶吉士。此后，由于朝廷賞識他做事有魄力，他的升遷較常格稍快：他歷任學政、（江南道）監察御史、（浙江省）道員、（浙江）鹽運使、（江蘇）按察使、（江寧）布政使、（河東）河道總督等職，直到尚在比較年輕的47歲時已升任為巡撫。五年之內他又晉升為總督。他的經歷清白無瑕。在1838年林則徐還沒有和西方打交道的經驗，他有著一個從未犯過嚴重錯誤的人的強烈信心。他為人處世很講道德，有強烈責任感。這部分是因為他受了當時與他過從甚密的清帝國一些最嚴肅的知識分子的激勵。在京城，他和著名政治理論家魏源及其他一些深受儒家“今文”學派影響的學者組織過一個學社。

今文學派可以上溯到漢代（漢代人對當時尚存的儒家著作的可靠性進行過激烈的爭論）。有一學派堅持說，用“今文”書寫的經籍是經文的真文。另一派學者則相信，從孔子出生地附近一堵墻內發現的用“古”文書寫的著作才是可靠的經文。后一學派最終占了上風，部分原因是因為今文學家支持《春秋公羊傳》，此書對儒家思想比那更為世俗的《左傳》作了更多空想化的解釋。這場爭論到公元第三世紀才平息下來，它對于發展儒家思想起過重要的作用，宛如阿里烏斯教派異端之于中世紀天主教教義那樣重要。今文學家對經典的注釋一直被禁止，直到18世紀訓詁學家莊存與才恢復了這項工作。莊存與的一個嫡傳弟子名龔自珍，后者在鴉片戰爭時期繼續闡發今文學派的學說；龔自珍是林則徐的摯友，也是該進步文社中的成員之一，這些學者在當時開始意識到正統的程朱理學對清帝國是一種致命的壓力。振奮精神需要道義上有所作為，但這種作為不是宋代玄學的“空洞”說教，也不是清代漢學枯燥的訓詁，而是倫常日用的治平之術。對這個道理的認識，最初并不是很清楚的，只是在19世紀90年代康有為才大膽表達出來。這就要求人們擔負起重任，并且還要順應正在變化中的時代。今文學家從經典中找到了“合時”一詞作為根據，這個概念在經典著作中屢見不鮮，足以使人們相信他們的這個理論是可靠的，因為連孔子本人也認為人們只應在現代意義上利用古代事例。過去的范例不應盲從和附和，而應酌加修改，使其適合當前用途，此即“托古改制”。

林則徐認為，這個見解能使人們很容易地懂得利用西學和西方武器來保衛中國文化。但是今文學派著作中充滿著神秘主義和道德主義的微妙混合物，這一點對他的影響尤其深。如果“君子”能正確地領會天意，他就能及時地召喚天道的宏偉力量來顯示奇跡。總之，圣賢乃是代表上天的。因此我們在魏源著作中可以讀到這樣一段話：

竹萌能破堅土不旬日而等身，荷蕖生水中一晝夜可長數寸，皆以中虛也。故虛空之力能持天載地。土讓水，水讓火，火讓風，愈虛則力愈大。人之學虛空者如之何？……一陰一陽者天之道，而圣人常扶陽以抑陰。一治一亂者天之道，而圣人必撥亂以反正。何其與天道相左哉？[[24]](#_24_Wei_Yuan____Gu_Wei_Tang_Nei)

人們的世俗的思與行之間總是脫節的，在思辨中的與在寫例行奏疏時的同一位哲學家也往往言行不一。但林則徐比大多數人更好地通過了這一關。就他那個時代的人而言，他把這兩方面結合得最好，他后來相信這樣一個信念：在與英國作戰時期上天是站在他一邊的；正像在此前幾個月那樣，他用這種同樣的道德熱情使道光帝轉變態度，接受了他的禁煙方案。

到1838年，道光帝對官員們的優柔寡斷感到憤怒，對鴉片辯論未獲結論感到灰心。他所希望的是對問題的正反意見作出清醒的判斷，然后采取決定性行動，而林則徐7月10日的奏章正中他的下懷，因為林則徐開門見山地談到這場辯論的主旨。一方面，他完全同意寶興的意見。死刑是對吸煙者非常嚴酷的懲罰。但洋藥對于國家強盛畢竟是非常有害的。因為煙民是道德病態的人，因破壞法律而處決他是不對的。但是用死刑威脅他，恫嚇他除去這種惡習是對的。“夫鴉片非難于革癮，而難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休心之法？”[[25]](#_25_Guo_Bin_Jia____Di_Yi_Ci_Ying)在此之前，誰也沒有討論過煙癮的心理學，也沒有討論過戒煙問題。林則徐卻強調了這兩點。例如，他認為，雖可以用槍決相威脅，但吸煙之輩陷溺已深，會因戒煙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煙癮必須由國家幫助來戒絕。須開設戒煙院，從死刑的公布到實施以一年為期，其中又分為四個階段，愈到后來的階段加罪愈嚴。同時，在南方應加強反對煙販的斗爭。因為癮君子雖說到處都有，但關鍵仍在廣州。對廣州外籍走私販的處理應與本國走私販相同。他們畢竟是罪惡的淵藪。現在已不是用溫和手段對待他們的時候了，要把他們真正置于中國法律的管制之下。

這個包括多方面的綱領性文件有希望使禁煙奏效，因此林則徐立即奉召進京。他在京師受到不尋常的禮遇，他私人被道光帝召見竟達19次。1838年12月31日，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有一道上諭說明了道光帝授予這項非常任命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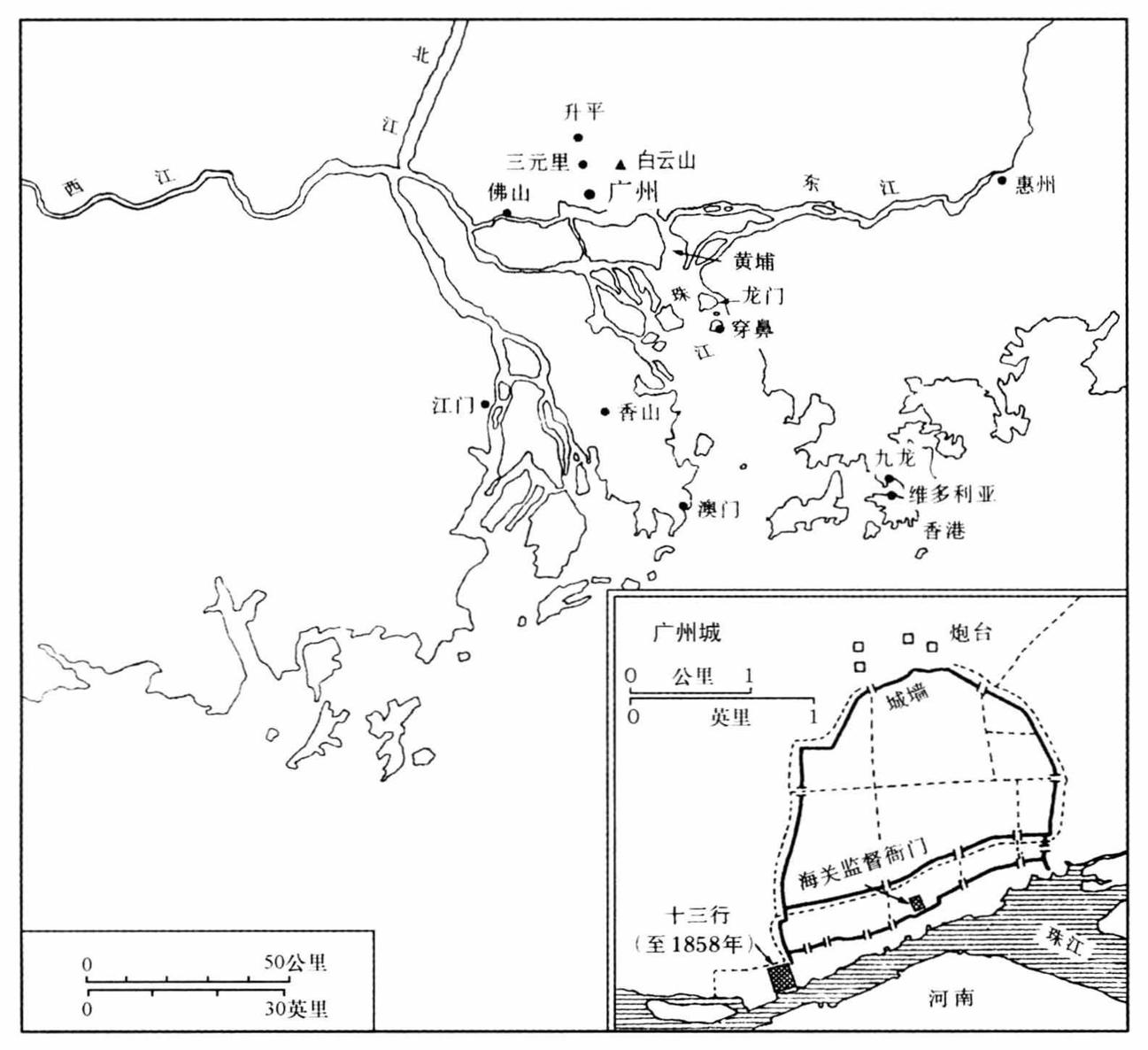
昨經降旨，特派湖廣總督林則徐馳赴粵省，查辦海口事件，并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該省水師，兼歸節制。林則徐到粵后，自必遵旨竭力查辦，以清弊源。唯該省窯口快蟹，或以開設煙館，販賣吸食，種種弊竇，必應隨地隨時，凈絕根株。[[26]](#_26___Chou_Ban_Yi_Wu_Shi_Mo__Dao)

這幾點訓令是果斷徹底的。其意義可看作是，如有必要，準許林則徐使中國采取軍事行動。毫無疑問，道光帝和林則徐討論過這種可能性，不過他們不習慣于用“開戰”這個概念，即現代意義上的正式宣戰。他們認為英國人桀驁不馴，林則徐這次南行就是要駕馭和平息他們。如果形勢需要，他可以動用武力，但這不是他所希望的。他在1839年9月向道光帝陳奏說：“鴉片必須清源，而邊釁亦不容輕啟。”[[27]](#_27_Guo_Bin_Jia____Di_Yi_Ci_Ying)避免危機的可靠辦法是靈活地兼用胡蘿卜和大棒，即“恩威并用”。正像林則徐對鴉片煙癮所做的分析那樣，這也有賴于應用心理學原則。正確地顯示一下清帝國無可比擬的道德力量，可以懾服外夷。從這兩方面看來，道光帝認為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威力在于確信可利用心理手段發動一場道德勸誡運動來禁絕鴉片。究竟如何才能不折不扣地做到這點，道光帝并不清楚。他贊同林則徐，也贊成這個措施，但其功過則將一如其他欽差大臣一樣，而由他的成敗來決定。禁煙必將成功，林則徐對此是毫不懷疑的。他為人剛直不阿，做事堅決果斷，這易于使英國人懾服，正像容易使本國鴉片商畏懼一樣。“戰爭”從來沒有成為考慮的問題。

## 廣州查封鴉片

林則徐還未到達廣州，就下令逮捕17名廣州犯法者和調查卷入鴉片販運的衙門屬員。像大多數高級官員一樣，這位欽差大臣深信，廣州是貪污犯罪的淵藪。行商比起大多數人來，只不過是略較富有的走私販。因此他辭別京師經過60天快馬加鞭的行程駐節到越華書院后，就直接向當地士大夫求助，請他們在他打算進行的這場堅決反對該城所有敲詐勒索行為的斗爭中給予協助。從他來到廣州直到任職結束，他一直毫不躊躇地利用廣州紳士設法禁絕吸食鴉片。這種做法有危險，因為準許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擁有逮捕權的禁煙會，這就意味著把大量權力交給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現了許多錯捕案件和麻煩事故；如鄰居之間公報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為了報復族間血仇的宿怨或者爭奪財產權而中傷與自己相敵對的家族。所有這些，林則徐在其著名的7月奏折中已有預見，但他在當時解釋說，為了治愈一種危險得多的社會病癥，這是不可避免而必須忍受的流弊。可是他似乎沒有認識到，這種流弊在不知不覺間破壞了縣官和村鎮名流在廣東農村中的權力平衡，因為后者現在開始自己執行治安權。在19世紀50年代以前紳士私人盜用司法權和軍權的現象還不明顯，但到那時，要使他們放棄非分之權則為時已晚了。但是，盡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熱的行動，林欽差鏟除鴉片惡習的計劃并未成功。的確，隨著他的禁煙計劃在下一階段——打擊外國煙販——碰了壁，他打擊本國煙民的行動也就馬上失卻憑借了。

林則徐最初切斷洋藥輸入的努力表現在以下兩個決定中：第一，利用具有保商（實際上是本國人質）資格的行商“控制”外商；第二，找出并扣留英國方面搞鴉片交易的幕后關鍵人物。這樣，林則徐就把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沖突搞成了個人之間的沖突。1839年3月18日，他采取的第一個步驟是通知行商，要他們三日內說服外商向中國政府交出鴉片存貨，并具甘結答應永遠不再經營洋藥。否則，一兩個行商將被正法，余者將統統喪失其財產。這是歐洲人所熟悉的一套手法，他們輕蔑地懷疑行商在搞兩面派。最后，當林則徐確實認真照章辦事時，外商答應象征性地交出1056箱鴉片。但林則徐現在開始相信，他所追查的這個關鍵性鴉片供應者是顛地，他是第二家最大港腳公司的經理，也是英國商會會長。因此，3月22日，林則徐發布一項逮捕顛地的命令，并捉拿兩名中國商人作為人質，如果顛地不自動向地方當局投案，則將人質斬首以代替顛地。



地圖7 19世紀珠江三角洲和江口

這些消息很快傳到住在澳門的義律，他立刻作出最壞的估計。他認為如果說這不是戰爭，“至少也是戰爭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前奏”。[[28]](#_28_Zhang_Xin_Bao____Qin_Cha_Da)義律命令將他手下可動用的兵船開往香港準備應戰，并于3月23日在一小隊護衛保護下離開澳門，于第二天耀武揚威地來到廣州商館，正好趕上接受律勞卑過去所受的懲罰：中國人停止貿易，商館受到勞工的抵制和封鎖；結果使350名外商在以后47天中處于奴隸狀態。義律雖然勇氣十足，但現在已經處于絕望境地。他的壓倒一切的考慮就是挽救他所屬那些人的生命，因為不難料想，封鎖了商館周圍交通線的數千中國軍隊正準備屠殺他們，而他卻一籌莫展，因為他的船和為數不多的軍隊鞭長莫及。因此當3月26日林則徐說明只要他得到他所需要的鴉片就將釋放英國人時，義律才完全放心。翌日，他命令所有港腳商人將所存洋藥交給他。商人們聞之欣喜。因為煙販被捕之后，前此五個月內還沒有在廣州出售過一箱鴉片。由于義律答應女王陛下政府會交付鴉片損失（后來，巴麥尊對此大為惱怒），所以英商向他保證交出甚至比存貨更多的鴉片，計20283箱，價值900萬元。到5月5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已開始燒毀這批存貨中的一部分；他確信英商很誠實，便解除了封鎖，并允許他們自愿離開廣州。

## 走向戰爭

林則徐因獲得成功而興高采烈。外夷則心膽俱喪，再次表示馴服。他把外夷順服的每個表現都上奏給皇帝。當林則徐坐在車蓋下監督每日在放滿石灰的海水池中燒毀大量洋藥的工作時，他注視著每個好奇的外國人。外國人脫一下帽子，沮喪地搖一搖頭，都被當作“心悅誠服”的毋庸置疑的證明。像誤入歧途的中國農民叛亂者一樣，這些外夷也將會服服帖帖地遵從這位剛毅而公正的欽命大員。

但是，這些馴服表現必須變為更加明確的保證，為此，林則徐最相信具結。外商具結后，如再走私，即予正法。換句話說，具結的目的就是置外夷于公認的中國司法管轄之下。但在這同時，巴麥尊的對外政策則堅決主張，一個英國人無論何時何地可以指望本國政府的保護，不受外國專橫武斷的起訴。因此，這個問題就是治外法權問題。林則徐本人知道此事后質問義律：“汝何以貴國之法加于天朝？”[[29]](#_29_Zhang_Xin_Bao____Qin_Cha_Da)但對每個英商來說，他們不敢具結的原因與其說是抽象的裁判權原則，不如說是真正害怕個人會被捕。由于港腳商人不敢屈從，他們就不敢留在廣州，唯恐林則徐突然決定再次封鎖他們。因此，義律要求澳門提供避難所。葡萄牙總督并不有愛于英國人，也不愿意和欽差大臣林則徐發生糾紛；但他最后還是向義律爭生存的爭辯讓了步。到7月4日，全體英商遷到澳門。林則徐最初對此并不感到驚愕。貿易總是會使他們回來的，那時他們將不得不具甘結。正在這時，他反復整理他的書籍，吟詩寫字，逐日寫日記。1839年7月12日的日記寫道：“忽晴忽雨。和嶰筠制軍詩。聞尖沙嘴夷船水手有毆傷華民身死之事，擬委員往辦。”[[30]](#_30_Wei_Li____Zhong_Guo_Ren_Yan)這一簡略記載說明發生了林維喜被殺案件。

五天以前，一群英國水兵在一個稱為尖沙嘴的小村酗酒行樂，在那里劫掠一個廟宇，并用棍棒毆打幾個中國農民。有一個名叫林維喜的農民因胸部受重傷于第二天死去。犯罪一方應受懲治，但他是被哪個水手殺死的呢？是應作殺人罪還是作誤殺罪起訴？關于個人責任的問題使英國人感到煩惱；但林則徐堅持他的論點，他對義律說：“若殺人可不抵命，誰不效尤？倘此后英夷毆死英夷，或他國毆死英夷，抑或華民毆死英夷，試問義律將要兇手抵命耶？抑也可以不抵命？……查義律既系職官，自有此案之后，兩次親赴尖沙嘴，查訊多日，若尚不知誰為兇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為職官？”[[31]](#_31_Tong_Shang_Shu__Di_61__62Ye)按照中國行政官員的標準，義律顯然不夠格，不過他至少是在盡責保護皇家海軍的現役士兵。事實上，他完全是按先例行事的。林維喜兇殺案件只不過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在刑事裁判權問題上不斷發生沖突的另一個例子罷了。

與當時西方的觀點相反，中國法律是非常合乎人道的。預謀殺人犯處以斬首，殺人犯處以絞刑，誤殺罪需給予賠償，自衛殺人者則不予追究。但是在一次鬧事中發生的人命案究竟是殺人罪還是誤殺罪，歐洲要員和中國當局之間對此很難取得一致意見。中國人通常堅持是殺人罪。順便說一句，在19世紀初，在英國偷一個先令以上就處以死刑。[[32]](#_32_Can_Kan_Lan_De_Er__Ai_De_Hua)但從歐洲人的標準看，中國人對罪的解釋常常不免于主觀臆斷。例如，在1784年，在港腳船休斯夫人號旁放禮炮時，偶爾炸死一個旁觀的中國人。不可能說是哪個炮手的罪過，但中國人一定要捉拿罪犯，使犯下罪行不致不受懲處。在中國人看來，行為遠比動機重要，正像糾正冤案要比懲罰制造冤案者更加重要一樣。像《復仇法》中所說的“以命償命”的原則那樣，這就是希望用罪犯的生命抵償被害者受損害的靈魂，來恢復正義世界的道德平衡。因此，當休斯夫人號的大班不能交出犯罪炮手時，便把他作為“替身”抓了起來。最后，有個不幸的炮手被交給中國人正了法。1821年，同一類的事情又發生在美國船上的一名無意中犯罪的意大利船員泰拉諾瓦身上，所以到19世紀30年代，西方人決定不向中國地方當局交人，除非此人已經受到本國人民的審判，并明白無誤地證明他確已犯了殺人罪。

林維喜案件不僅象征著治外法權爭端，而且成了1839年那個炎熱夏天加劇緊張形勢的主要刺激因素，當時英國人和中國人在澳門關卡兩邊互相猜疑地看著對方。結果，英國人沒有交出兇手，于是林則徐開始擔心，認為只要英國人安然留在澳門，他們總是要在這個問題和具結問題上繼續反對他。因此，他于8月15日采取了進一步抵制商館的措施，切斷了對澳門的農產品給養，同時向附近城市香山又增派2000名軍隊。于是，葡萄牙人很快屈服，命令英國人離開澳門；8月24日，義律和他的同胞登船渡過海灣在香港附近海面拋錨。這時林則徐認為，他可以順利地利用清初的海禁措施。8月27日，他奏陳皇帝說：“毫無疑者，雖其船內糗糧不乏，而所嗜之肥濃燔炙，日久必缺于供。且洋面不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33]](#_33_Wei_Li____Zhong_Guo_Ren_Yan)為了不使英國人登陸獲得食物，水師和重新招募的水勇封鎖了沿海交通線。由于供應減少，義律變得不顧一切了。9月4日，他率領一個小船隊來到九龍，告訴當地的清朝船隊管帶，如果30分鐘內不提供食物，他將擊沉他的船隊。當時限一過，便開炮擊潰了中國船隊。

這仍是第一次不宣而戰的炮擊，但當義律在等候英國的訓令時，這次炮擊并沒有弄得林則徐遲疑不決。不僅這次交火詳情不明，而且這位中國欽差大臣還確信，有少數英商為了恢復商業的目的會甘愿具結。義律本人從一開始就認為，對英商來說，僅僅治外法權原則似乎并不比他們的利潤更重要；特別是如果他們的競爭者美國商人得到了他們一年一次的茶葉合同時情況就更是如此。因此他請求美商，為了他們與英商將來的共同利益，希望他們與英商一起離開廣州。而領導北美商人的福布斯回答說：“我來中國不是為了療養和尋歡作樂，只要能賣出一碼布或者購進一磅茶葉我就要堅守崗位……我們美國公民沒有女王來擔保補償我們的損失。”[[34]](#_34_Zhang_Xin_Bao____Qin_Cha_Da)英商剛離開廣州，美商立刻就大發橫財。未曾染指于鴉片的英商從香港停泊地聽到此消息后，開始對義律的封港感到不安，最后，九龍事件剛剛發生之后，擔麻士葛號逃出英國船隊，該船承銷人簽具了一項鴉片甘結。不久，從爪哇運米至此的皇家薩克遜號也起而效尤。

在林則徐看來，這清楚表明，保護這種不正當鴉片利益的只是義律一人。所以林則徐散發了致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一封公開信，從道義上懇求她制止鴉片貿易，并且相信英國政府是受了義律的欺騙并被引入了歧途。[[35]](#_35_Si_Hu_Ying_Guo_Nu_Wang_Bing)現在，正像他所預言的那樣，其他未參與走私但又貪圖利潤的英商，是會回到廣州服從官方控制的。殺人案雖仍未解決，但只要派水師提督關天培的水勇登上停泊于香港的某只商船，隨便捉拿一個外國人作為人質來代替被義律包庇的真正罪犯，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結案。當關天培的由29艘清帝國戰船組成的船隊開始集合和準備襲擊虎門通道附近的穿鼻時，義律認為它們正在準備攻擊在他旗幟之下的五十多只商船。因此他于1839年11月3日駛船逆流而上，想驅散中國船隊。正當兩路戰船進入對抗狀態時，皇家薩克遜號的水手們無意中恰于此時駛往廣州。為了加強封港，英國兵船窩拉疑號立即對著這只商船頭部發出一發炮彈。水師提督關天培即予干預，甚至也許是為了保護皇家薩克遜號，這時義律的炮口便轉向了中國船只。經過短時間和毀滅性阻擊，四只中國船被擊毀，關天培的船隊被驅散而駛離戰場；這樣就結束了后來所稱的穿鼻戰役。

但是，中、英兩國任何一方都仍未正式宣戰。道光帝雖獲悉發生過這次海戰，但并不知道打了敗仗，所以他認為，無需為追究殺害農民林維喜的兇手和鴉片具結之事而再事爭論了。相反，現在應是停止和所有這些討厭的英國人打交道并把他們永遠趕出中國的時候了。毫無疑問，這是能夠輕易做到的，因為他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向他解釋說，外夷戰船太大，不能駛入中國江河，而且他們的士兵不能上岸作戰。“且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36]](#_36_Guo_Bin_Jia____Di_Yi_Ci_Ying)

實際上，英國人占絕對優勢。他們的印度基地可以提供現成的軍隊和軍需，在中國海岸上，他們擁有像吃水淺的鐵甲輪船復仇女神號那些在當時是最新式的武器，這種炮艦能夠很容易地把炮口轉向河流上游的城鎮。他們的野戰炮射擊準確，火力猛烈，殺傷力強。步兵的滑膛燧發槍本來就比中國的火繩槍有效得多，何況這時又正被有擊發裝置的滑膛槍所代替。甚至他們的戰術也較好。中國人只擅長圍攻戰，他們堅守沿岸固定的要塞陣地，炮口固定在朝向敵人從正面發動主攻的方向。但是英軍在海軍炮火支援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以經過訓練的、準確的密集隊形從側翼攻擊，以便奪取炮臺或者突破敵方陣線。

與此相對照，清帝國的軍隊都不滿員，訓練極差。軍隊是從滿、漢、蒙二十四旗中抽調來的，他們都是些懶散的駐防部隊，駐扎在全國各地的戰略要地，統率者都是滿族將領（韃靼將領）。同時綠營漢軍（從組織上說，這支軍隊是從17世紀征服大部分中國的陜西和奉天部隊演變而來）雖然分為陸軍和水師，由各省統帥指揮，但實際上沒有十足的兵力。花名冊上凈是弄虛作假；為了應付點卯，就匆忙地招募市場的苦力；也舉行定期軍訓，但重在觀瞻而不講究實際，注意搞戲劇舞蹈的劍術程式動作。每當發動大戰役時，原由互相猜忌的各地指揮官分別統率而互不配合的部隊必須置于一個統帥統一指揮之下，而這位統帥常常是對他所領導軍隊的特點竟是毫無所知的非軍人。在實際戰斗中，隊伍很可能不是開小差就是劫掠農村，結果使本國人而不是使敵人害怕他們。

在這次戰爭期間，為了補救這些弱點曾作過各種嘗試。一個辦法是招募鄉勇。林則徐特別強調在廣東招募鄉勇，因為他深信，這些鄉勇單憑其一股“熱情”幾乎可以打敗一切敵人。[[37]](#_37___Lin_Wen_Zhong_Gong_Quan_Ji)為了節約軍費開支，道光帝在1840年把招募鄉勇的任務擴大到其他沿海省份；但許多非正規軍是原先的匪徒、鹽販或者利用自己的軍銜魚肉本地農村的強盜。另一個辦法是采用道家法術和中國寺院的拳術，以改善軍隊在西方炮艦和大炮面前軟弱無力的狀態。例如，武術教師們宣稱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呆上10個小時，因而便雇用他們藏在河底去英國船底下鑿洞。[[38]](#_38_Guan_Yu_Mou_Xie__Wu_Shu__Ji)有少數中國人還拼命鉆研特殊方法，甚至試圖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戰術。林則徐從歐洲人那里購來數百支槍和一條用于軍事訓練的外國船。他還使人翻譯西方的新聞報道以推測敵人意圖。[[39]](#_39_Can_Kan_Qi_Si_He_Deng_Bian)但是當時的大部分官員卻自覺地認為，這種做法是對中國至高無上的文化的可恥背叛。

當清朝對鴉片戰爭的最初槍聲尚無痛切之感時，危機消息已傳到英國。義律早在他的公文報告中竭力使倫敦確信，采取“緊急有力措施”[[40]](#_40_Zhang_Xin_Bao____Qin_Cha_Da)以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和迫使林則徐一派下臺的時機已到。英國商務監督的意見則與義律相對立，他確信支持這次危機的只是欽差大臣林則徐一人。義律錯誤地認為，如果能依靠民眾的支持來炫耀一下軍事力量，就可使北京不信任林則徐，從而隨著他的撤換就可達成諒解。但是巴麥尊的打算還遠不止此。輝格黨中的“前進派”不斷提高調門。廣州最富有的商人維廉·查頓博士已在1839年1月回到倫敦，及時利用了這次因沒收鴉片問題所引起的爭論。他作為一個受兩萬元戰爭基金補貼的商人代表團的頭目，支持展開了一場巧妙的散發時文小冊子的宣傳戰，把“包圍商館”事件描繪為另一個加爾各答軍牢，是對維多利亞的圣經——即女王陛下的旗幟——的不可容忍的侮辱。他在聯合英國中部三百家紡織商行要求巴麥尊干預廣州事務方面也起了作用。查頓在10月26日私下會見巴麥尊時對他所希望的干預要達到的程度概述如下：封鎖中國港口以索取賠款；簽訂公平的貿易協定；開放四個新港口；占領香港等幾個島嶼。就在這天，巴麥尊已不必再要人們去催他了。因為在八天以前他已傳消息給義律說，遠征軍在明年3月就可到達中國以封鎖廣州和位于北京南面的北河。因此，查頓的建議受到歡迎。的確，從那時起，巴麥尊經常請求該豪商的倫敦分行提供情報；后來策劃以長江為界分中國為兩半的策略也同樣受到了鼓勵。在以后四個月中這些計劃不斷予以充實，直到1840年2月20日為止，那時巴麥尊正式委派了兩個人全權領導這次遠征，即義律及其堂兄弟商船隊長懿律。他們受命要為商館被圍事索取“賠償”；為鴉片損失獲得賠款；索還所有行商的債務；撤銷公行；賠償整個遠征行動的花費；要求割讓一島嶼以保證英商的安全。為了迫使中國人答應所有這些要求，中國各主要港口應予封鎖，占領杭州海灣外寧波附近的舟山作為保證。

議會尚未作正式磋商。因此在1840年4月7日，反對黨托利黨人指出，這場不義戰爭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現任顧問們引起的。內閣中一位最年輕的閣員，也是倫敦社會的一個紅人托馬斯·巴賓頓·馬可黎替輝格黨作了答辯。他向議員們宣稱，被封鎖在廣州的英國人是：

屬于一個不習慣于接受失敗、屈服或恥辱的國家；他們屬于一個必將強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數量令人震驚的賠款的國家；他們屬于能使阿爾及利亞的貝依在其受辱的領事面前賠禮道歉的國家；他們屬于為普拉塞原野軍牢的受害者報了仇的國家；他們屬于自從偉大護國公發誓要使英國人享有從前羅馬公民所享有的同樣聲譽以來一直沒有衰敗過的國家。他們知道，他們雖然被敵人包圍，被汪洋大海和大陸隔絕而孤立無援，但誰也不能損害他們的一根毫毛而逍遙法外。[[41]](#_41_He_Er_Te____Zai_Zhong_Guo_Ji)

總之，他表達了一句拉丁格言的思想，即我是羅馬公民！對此，另一位年輕而大有前途的托利黨人格蘭斯頓做了如下回答：

我不知道而且也沒有讀到過，在起因上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不義的戰爭，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想使我國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站在對面的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談起在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來。那面國旗的升起是為了保護臭名遠揚的走私貿易；假如這面國旗從未在中國沿海升起過，而現在升起來了，那么，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從那里撤回來。[[42]](#_42_Tong_Shang_Shu__Di_99__100Ye)

但是，巴麥尊否認他的政府支持這種不法的鴉片貿易，以此手法巧妙地轉移議會辯論的中心。他堅持說，他們所希望要做的一切只是為了保證將來貿易的安全和英國公民的安全。應該記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英國已經受到了侮辱。這樣，托利黨的反戰決議案只以五票之差被否決，但這并不足以安慰相距半個地球之遠的清朝。

## 戰爭的第一階段

正式鴉片戰爭的第一階段是從1840年6月開始一直延續到1841年1月。英國的策略是明確的：繞過廣州向北行進，占領舟山島，然后駛向天津附近的北河口，遞送巴麥尊致清帝的照會。到6月21日，16艘英國戰艦、4艘武裝汽艇和28艘載有4000英軍的運輸艦集合在澳門沿海以外。一小部分兵力留在后邊封鎖廣州，其余兵力立即開赴浙江。大部分廣州人認為，英國人已經被欽差大臣林則徐新建的海岸炮臺嚇跑了，但是在7月5日英國艦隊在舟山島海外重新出現。一開始，當地下級官員以為這些船只是來通商的，所以該小港的居民想到會大獲其利而非常高興。[[43]](#_43_Qi_Si_He____Ya_Pian_Zhan_Zhe)接著英國海軍司令官伯麥爵士卻要求這個城市投降。當中國總兵拒絕投降時，舟山就遭到9分鐘的炮擊。然后英國軍隊登陸，通過被摧毀的建筑物和尸體，沒有受到任何反抗就掠奪并占據了這座城市。

巴麥尊原來希望以攻占舟山使中國人震驚而立刻投降。事實并非如此。由于舟山戍軍是被英國海軍大炮擊潰的，所以這個島的失陷并未能消除關于英國人不能登陸作戰的荒誕想法。此外，很多人最初以為，舟山失陷嚴格說來只是把附近的寧波開放給英國人通商的計劃的一部分；因為在戰爭的這一階段上，英國人仍被僅僅看作是海盜貿易者，而未被嚴重地看作潛在的征服者。然而，這種安全感一俟英國艦隊駛向北河口時就消失了。8月9日，軍機處接到關于英國船只沿海岸線北駛的報告時，陷入一片混亂。道光帝與其滿族近臣開始感到英國人甚至可能想攻占北京城池。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使他們從能打擊首都的距離處撤退。因此在8月30日，當英國人就要強行通過守衛北河口的大沽炮臺時，一位名叫琦善的使節同意在岸上接待英國全權大使并開始舉行談判。

決定進行談判，與其說這是結束了林則徐的“懾服”外夷的政策，不如說是否定了林則徐本人。巴麥尊的信如此怒火中燒地攻擊了這位欽差大臣，致使朝廷認為，只要把林則徐撤職就會使英國人感到完全滿意。這并非是難以作出的決定，因為清帝本人也認為林則徐做事魯莽滅裂而大為惱火。他不是在需要堅決性這一點上與林則徐有分歧；他所不滿意的是，盡管林則徐反復樂觀地預言英國人不會或不能打仗，可是南方局勢突然惡化到使這位欽差大臣失去了控制。使清帝心煩的并不是“戰爭”，而是“叛亂性”的敵對行為從一個省竟然轉移到了帝國的心臟。這時清帝希望知道，林則徐答應迅速而妥善地解決鴉片問題的種種諾言究竟何在？

汝言外而斷絕通商，并未斷絕，內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凈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44]](#_44_Wei_Li____Zhong_Guo_Ren_Yan)

林則徐試圖把戰爭的罪責推卸給義律。他指出這位英國商務總監犯了罪，承認做了丟臉的事而自動交出鴉片，可是他又欺騙自己的政府，說鴉片是被非法沒收的。（后來清帝令琦善調查此一辯解之詞，琦善否定了它。）戰爭是事件的必然結局，而且現在戰端終于來臨，那便要由他林則徐來負全部責任了。他所請求的就是任命他去收復舟山，把英國人趕出去，不惜任何代價來對付外夷。因為在他看來“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45]](#_45_Tong_Shang_Shu__Di_120Ye___Y)也許清帝可能私下同意這種估計，[[46]](#_46_Lin_Chong_Yong____Lin_Ze_Xu)但是，他不再認為林則徐可稱此職。無論如何，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國人要求撤這位欽差大臣的職。因此在9月4日清帝下詔道：

上年，欽差大臣未能仰體大皇帝至正之意，措置失當。現已逐細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47]](#_47_Guo_Bin_Jia____Di_Yi_Ci_Ying)

林則徐直到1841年5月3日才離廣州受審。7月1日他被判決充軍到地近中亞的俄國邊境的伊犁。然而，在1845年，他又被召回授予要職；此后效忠清帝達五年之久才病逝。

任何一個處在林則徐地位的官員都會同樣地遭到失敗和受到處分。在這些年間，對欽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體現著清帝的這樣一個決心：在不損害他自己所提條件的情況下保持和平與秩序。因此，鴉片戰爭的歷史就是這種決心受到英國人反復打擊的過程。最后，清帝的這個愿望終將破滅，但是在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員面臨著一種矛盾的要求：既要講和，又不許讓步。這就是林則徐進退維谷的處境及其繼任者的悲劇之所在。

被選出來代替林則徐的琦善是博爾濟吉特氏族的一位侯爵，他擔任著令人羨慕的直隸總督之職，而且是中國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學者，也是一位知名的善于斤斤計較的官員；向北京轉呈巴麥尊的照會的就是他。到這時清帝才不得不承認英國人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不滿應歸之于他們受到的那種待遇，不應歸之于與他們的關系的性質本身。歸根到底，他們的基本要求是完全辦不到的。割讓一個島嶼嗎？那是荒唐的。要開放幾個新港口嗎？那是違反“日制”的。要償還行商欠債嗎？政府并未挪用商業款項。賠償鴉片價款嗎？它本來就是違禁品。由于沒有先例，清帝也就不能與這些前所未聞的敵人進行談判。反之，他反復強調說，當務之急是排除這場危險，使夷兵返回廣東。這就只有靠琦善的伶牙俐齒來誘使英國人回到南方去之一法了。

琦善本人的確也意識到帝國面臨種種危險，因此一再試圖使清帝了解，從18世紀以來外夷問題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但他只是有了表面的認識。他看到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熟悉本國歷史的學者們為之痛心的外患頻仍的漫長時期；但是他又認為，必須以某種方式迫使英國人重新回到一種稍微新穎而又是按常規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目前，他不能輕率地作出清帝禁止作出的讓步，但至少他必須想出權宜之策來使英軍離開天津。琦善十分坦率地向軍機處說明，要做到這點就得用“綏撫”之法，即變相的納貢方法，它實際上變成了以后十年中對外夷實行“羈縻”政策的第一步。由于這政策強調要用靈活的阿諛逢迎辭令來密切與外夷談判者的個人關系，進而產生一種個人義務，所以這種做法也是中國社會習慣的一種表現形式，即依靠私人之間的感情來緩和政治集團之間或者經濟集團之間的對立的原則沖突。這種政策一般被認為是琦善施用于英國人，又被后來的外交政策專家耆英所充分發展。它在這兩種情況下只能成功地拖延因雙方目的不同而形成的沖突的最后解決；因為英國使者以一種被出賣的憤懣心情得悉，這些阿諛奉承的中國外交官員們一方面佯稱是他們的朋友，另一方面卻又向北京陳情說，要克服對那些必須打交道的性格粗野而形體污穢的外國人的自然憎惡心理實在很困難，這時就使英國人更加感到不愉快了。但這個辦法暫時還行得通。1840年9月17日，琦善可以把英國戰艦將回廣州并將在那里完成談判的事上奏朝廷了。清帝對這消息感到高興，派琦善本人從陸路南下妥善辦理此事。他的足智多謀獲得了成功，致使人們感到，與英國人打交道只用智謀就綽綽有余了。

義律和豁律從琦善的和藹可親的態度推測到清帝的意旨，他們相信林則徐的“主戰派”已被比較理智的人們組成的“主和派”所取而代之。但他們并沒有充分地認識到，北方的壓力一減輕，清帝的驚恐心就會減退，朝廷中的好戰分子就會更加大膽。因此，由義律在12月（他這時是唯一的全權大使）倡議的廣州談判會議向琦善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在北京，一些年輕性急的御史和幾位年長的保守官員仍然堅決主張把這些英國人消滅掉。最糟糕的是，有少數幾個人背地里暗示琦善本人是一個姑息分子，他受外國人的蒙蔽或者甚至被他們腐化了。可是，英國人在廣州以其全部軍事優勢施加壓力以取得具體讓步，其中最危險的一條就是準備讓英國人占領香港。因此琦善首先是試圖使北京認識，廣州的軍事防御已經危險到了毫無希望的地步。當時他作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估計。他認為交一筆賠款和新開放一個像廈門那樣的港口給歐洲人通商，以此作為交換條件，他最后可以不交出香港，甚而可以從英國人手里收回舟山。他通過強調不把中國領土交給外國人的重要性的辦法，希望他的君主相信僅在商業上和錢財上作點讓步姿態是無傷大局的。然而甚至在他得到北京消息之前（這兩個城市之間的通訊要花一個月時間），英國人已經十分明確地表示他們堅持無論如何要占據香港。義律認為需要使琦善明白他軍事上的軟弱無力，竟在1841年1月7日命令英軍占領了虎門炮臺。這時琦善才絕望地認識到，只有虎門要塞才能把英國人與廣州隔開。為了避免他認為可能發生的一場屠殺，他無可奈何地于1841年1月20日同意了穿鼻草約。英國人在這項協議中提出的條件是割讓香港；賠款600萬元；兩國官員在平等的基礎上直接交往，并且開放廣州貿易。義律因勝利而興高采烈。在他看來，中英關系問題沒有過多地流血就已得到完全的解決。然而他的勝利感還是為時過早了一些。當這個草約最后報請審批時，結果兩國政府都不愿意接受。

早在1月初，道光帝已經感到英國人“反復鴟張，恐難理喻”。[[48]](#_48_Guo_Bin_Jia____Di_Yi_Ci_Ying)甚至你如此彬彬有禮地對待過這些粗野的人，他們還是要繼續進行海盜式的征服，而且甚至敢于進攻廣東的要塞。因此，中國人打定主意在談判中用無休止的辯論拖住對方，從而給南方的官軍以重新武裝的時間，以便最后征服外夷。1月6日，道光帝命令鄰近省份的四千援軍開赴廣州；并于1月30日派遣了他的堂兄弟奕山率領一支靖逆軍去消滅敵人。在琦善同意英國人占領香港兩天之后，他收到了這個決定，這使琦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發狂地要加以制止。首先，他設法說服駐廣州的大部分官員和他共同簽署一份送呈北京的奏折，說廣州差一點被英軍所占領。用陳舊大炮設防的要塞建筑在一些島上，很容易從背面受敵。自吹自擂的“水勇”（林則徐招募）不是暈船就是必須得些彩頭錢才去打仗；而城市里漢奸又多如牛毛。按照穿鼻草約的條款，義律畢竟已同意退還舟山及虎門炮臺，因而此時他們將有一個較長的喘息時間來準備清帝要求的“靖逆”工作。但是琦善在那時失去了他的最主要同僚之一的支持。當廣州人中間謠傳欽差大臣用香港做交易而收了一大筆賄賂時，廣東省巡撫怡良向京師奏報了琦善背著他秘密割讓香港之事。清帝2月26日看到奏章時勃然大怒。他遂下詔道：“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49]](#_49_Guo_Bin_Jia____Di_Yi_Ci_Ying)于是草約被否決（雖然此時英國人實際上已占據了香港），琦善的大量財產被沒收。3月13日，琦善戴著鐐銬離開了廣州。

當巴麥尊接到送回倫敦的穿鼻草約副本時，斷定義律把他的訓令完全置之不顧。義律既占領了舟山，他已經有條件定出自己的條款，但他卻用這個重要基地換來了那個干燥多石的島嶼香港。那時22歲的維多利亞女皇在她致姻親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的信中說：“中國的事件很使我們懊惱，巴麥尊極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義律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奇怪的舉動，我們所要求的一切或許已經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巴麥尊給他的訓令，卻嘗試著去取得他能夠得到的最低的條件。”[[50]](#_50_Yin_Zi_Ma_Shi___Zhong_Hua_Di)

此后，義律被一位做事沉著、52歲的愛爾蘭人璞鼎查爵士所代替，后者曾在信德當過幾年政治代表。他從巴麥尊得到的訓令[[51]](#_51_1841Nian_9Yue_8Ri_Pi_Er_Nei)非常明確。他在占領舟山并且絕對確信與他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有進行談判的全權以后，他即著手爭取得到以下的讓步：賠償鴉片價款618.9616萬元；收回行商欠債300萬元；付遠征軍費用約250萬元；至少開放四個新港口；保持香港，以及割讓更多供免稅卸貨的島嶼；每個條約港口均開設英國領事館；取消公行；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話，“為了中國政府本身的利益”而解禁鴉片。[[52]](#_52_Zhe_Xie_Xun_Ling_Wan_Quan_Xi)

## 贖回廣州

璞鼎查雖于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達香港。在這段時間，義律面臨奉清帝詔令集結于廣州的軍隊。琦善已由三位官員集體接替：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滿洲貴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齡完全耳聾的漢族將軍楊芳，后者因在喀什噶爾擒獲張格爾而聞名。整個二月份，軍隊源源進入廣州。他們重新建設防守陣地；設置水路障礙；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廣州士紳也被鼓勵對他們的城市進行愛國主義的防御。然而第一個到廣州的楊芳幾乎立刻看到軍事形勢已毫無希望：中國海軍實際上已經崩潰；新城的城墻正在倒塌；佛山鑄造廠新鑄造的五噸重的大炮沒有架設起來；軍隊也不可靠。

所有這些行動使義律認為，穿鼻草約并沒有受到尊重。他再次沿河而上；在擊毀沿途一些炮臺之后于3月2日到達廣州。于是中國代表不得不再次提出舉行談判，俾使廣州脫離英國大炮的威脅。楊芳沒有別的選擇，只得同意重新開放貿易；雖然如此，他在呈送北京的奏章中對這個協議未敢明言，只是暗示了一下。4月14日，三人中的另外兩個好戰分子到來，致使這種暫時的休戰也不能維持下去了。當奕山和隆文開始準備火木排并武裝更多的地方兵勇時，楊芳不得不跟著干。于是，義律再次看到休戰受到了威脅，并要求中國方面停止這些準備，但沒有得到答復。可是就在他采取行動之前，1841年5月21日奕山終于發動了一場殲滅戰，他放出燃燒著的木排，順江而下沖向停在黃浦江上的英國艦隊。在隨之發生的戰斗中，中國戰艦被擊毀71只，岸上的炮臺失守60座。然后在復仇女神號保護下，運兵船沿城行駛送部隊登陸；英軍占據了廣州舊城外北面的高地。省城正位于這些高地之下，從而有完全聽任英軍野戰炮轟擊的危險。在那時，中國人已多次違背諾言，英國陸軍少將郭富認為他們應該馬上前進占領該城。但義律仍然相信他們會得到“未受冒犯的百姓”在感情上的支持，希望使廣州免于一場屠殺。[[53]](#_53_1841Nian_11Yue_18Ri_Yi_Lu_Ch)這位全權大使當然占了上風。5月27日簽訂了一項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三位中國欽差大臣及一切外省軍隊都同意退出這個城市，并答應在一周之內交出600萬元的“贖金”以使廣州免遭破壞。當這個協定付諸執行時，英國人回到他們的船上，等候璞鼎查的到來。

5月份對廣州的進攻，對英國人來說并沒有直接的軍事意義，但對中國人來說就帶來了嚴重的后果。首先，隨著這次襲擊（其中有掠奪和混亂），平日無賴的本地盜匪和三角洲的海盜變得比以前更加膽大妄為了。[[54]](#_54_Can_Jian___Chou_Bei_Yi_Wu_Sh)兩廣的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兩省之間的丘陵邊境——幾乎迅速被匪幫占據。所以從1841年至1850年社會秩序日益混亂，這實際上觸發了太平軍叛亂。[[55]](#_55_Xiao_Wei_Ke_Man____1839__186)其次，產生了一種深深影響到中國后來與西方關系的排外傳統。當廣州北邊的英軍和印度軍等待中國當局來履行贖買協定的條款時，他們在三元里集鎮上和集鎮附近掠奪了幾處廟宇和強奸了幾名婦女。這些具體的刺激，再加上廣大人民群眾對戰爭的焦慮，促使對外國人的比較溫和的那一套陳舊看法變成了恐外的種族主義情緒。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后兩天，當地紳士召集了大約兩萬名義憤填膺的農民，試圖用鋤頭、鎬、鐵頭梭鏢和大刀去屠殺這些外國兵。在嚴重的起義發生之前，廣州知府命令鄉紳領袖們遵守停戰協定，解散他們的非正規軍。鄉勇們滿懷憤怒地撤退了，他們相信，如果不是官方干涉，他們能夠擊敗敵人。后來的民間傳說和官方報告對這個信念又添枝加葉，以致使很多中國人認為，如果允許三元里鄉勇去打仗的話，他們的國家確實會打贏這次戰爭。因為義律威脅著要炮擊廣州，廣州知府這時解散他們是當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歡呼為救星，反而被稱作是一個“賣國”的怯懦官僚。總之，求助無門的官員們這時正普遍成為替外夷的勝利承擔過失的替罪羊。

在19世紀60年代后期，當排外運動擴展到北方時，同樣的事件接二連三地不斷發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識到停泊在他衙門的窗外河流上的歐洲炮艦會勒索多大的代價，可是紳士們卻同時在街頭張貼聲明，聲討地方官“背信棄義”地保護外國傳教士使之免于“正義”的暴民的報復。后來，這類事件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即地方官員個人已不再受到斥責，而累及朝廷來遭受非難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滿潛意識，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滿清“異族”王室為了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們自己，正在向外夷讓步，姑息養奸。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元里事件是一長串群眾騷亂事件中的第一件，這種騷亂最終形成了共和革命運動中的反滿民族主義。

## 戰爭的最后階段

璞鼎查于1841年8月10日到達香港，他在此指揮著一支取道印度洋和新加坡而來的遠征軍，到戰爭結束時，這支遠征軍將包括25艘正規軍艦，14艘汽輪，9艘給養船和載有1萬名步兵的運兵船。他立刻帶領第一批共2000名士兵和一部分艦隊向北駛到福建省的重要港口廈門。該地區的指揮官顏伯燾[[56]](#_56_Ci_Chu_Ying_Wen_Wu_Zuo_Yen_P)理應奮起應戰，因為他已經說服清帝為那里的防務花費了200萬銀兩。他有50艘大戰船，3個“堅不可摧的”堡壘和9000步兵，據估計，只要英軍一靠近，就可以把他們打垮。當這支遠征艦隊于8月26日停泊在廈門口外時，海軍司令巴爾克確實發現這個城堡的防護墻非常堅固，炮彈不能穿透，但是中國炮手的協同炮擊時間不足以阻止登陸部隊奪取炮臺。該城本身坐落在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隘口的后面，但顏伯燾卻未想到予以設防。相反，英國人悄悄偷越過那里，并且很快就占據了城周圍的高地。第二天，他們開進了城內。英軍僅死兩名，傷15名。

英艦隊留下了一支軍隊就地戍守，然后就繼續駛向巴麥尊打算優先奪取的目標——舟山。郭富將軍在這里倍加小心，因為中國人在穿鼻草約訂立之后收回此島時曾又大事加固工事。可是在他第一次偵察后的第三天，即10月1日，他仍然攻占了這個城市。雖然郭富在攻擊中受了傷，但只有兩名英兵被打死。為了完全控制這一段浙江海岸，此時只需占領附近港口寧波就可達到目的。英軍在攻占河口上的據點鎮海要塞之后，于10月13日向寧波推進。負責浙江省軍事行動的欽差大臣裕謙不久就接到消息說，寧波的大炮曾打得發燙，他的軍隊未戰而潰。大約正在裕謙打算自殺的時候，皇家愛爾蘭衛隊的樂隊正在寧波的寬闊城墻上奏著英國國歌《上帝救助吾國女王！》的曲子。在這年冬季，英軍在這里進行休整時，這個舒適的港口城市當時就成了遠征軍的大本營。這時，璞鼎查的計劃（它受到查頓情報的鼓舞）是要求把戰艦開往長江而把中國切為兩半，并在運河穿過長江之處封鎖對京師的糧運。由于他的大部分兵力都被牽制在守衛已攻占的四個城市上，他就決定等到春末夏初從印度得到增援部隊時再作計議。這給了中國人發動春季反攻的時間。

清帝曾經斷定，寧波的陷落說起來或許并非不幸之事。夷兵目前已經陷入陸上作戰，而陸戰正是中國的長處，大批帝國軍隊在浙江發動有組織的戰斗也許能一舉把他們消滅干凈。由于他的許多官員向他隱瞞了他們的失敗（例如顏伯燾聲稱已收復廈門），因此他覺得挑選一個他能信任的指揮官是絕對必要的。所以他選擇了他的堂兄弟奕經為統帥，此人是一位卓越的書法家，善寫文章，但是他的軍事經歷主要限于主管御花園和獵苑，以及指揮北京的禁軍。奕經的特長是善于制定計劃和搞準備工作，對這些事他干得很熱心。他剛到蘇州，就著手把他指揮的1.2萬名正規軍和3.3萬名鄉勇統一組織起來。由于他要依靠當地知名人士來獲得地方上的情報，他在大本營外設置一個木箱，鼓勵紳士投進名刺，并獻計獻策。許多熱情而無經驗的青年士子因時值危機而輟學應征；每個官員都爭先恐后要求有權使用親隨和享受其他官品津貼。因此，這種指揮系統是極不明確的，這特別是由于從幾個省調集來的正規部隊都拒絕接受其他帶兵官命令的情況造成的。人們只看到軍隊打著鮮明的三角旗，穿著繡花戰袍，手執金光閃閃的武器，而忽視了后面隱藏著的分裂情況。這些士子興致勃勃，在軍營里舉辦了許多茶會、筵宴和詩社文會。勝利好像是沒有問題了。事實上，在軍隊實際進入戰斗之前的一個月，一位有名望的畫家以北宋美麗而色彩鮮艷的院體畫法描繪了一幅凱歌高奏的戰斗圖畫。奕經本人甚至舉行過一次作文比賽，這使他忙了好幾天以決定哪一篇宣布即將來臨的勝利的文告寫得最好。他最后選定了一篇，其中虛構了交戰情況和對每個帶兵官怎樣傳令嘉獎。不錯，清帝的這位堂兄弟的確對開戰的黃道吉日問題有些關心，但當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廟中求簽抽到了一張虎形簽時，這個問題便非常順利地被解決了。因此很顯然，攻擊的時間應該是1842年3月10日凌晨3時至5時，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時；而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時期。于是在戰斗前夕，大多數部隊拖著沉重艱難的步伐，越過泥濘的道路和溝渠而進入了陣地；又因道路泥濘，運糧困難，軍隊曾多日斷糧。士兵體力消耗殆盡，又受雨淋又挨饑餓，他們就是這樣準備進攻的。

進攻分作三路。原來的戰斗計劃（包括某些新增援的兵力）是要求3.6萬人打進寧波的西門和南門，1.5萬人奪取鎮海，還有1萬水兵乘戰船和漁船渡海收復舟山。實際上，全部兵力的60%被派作總部的護衛兵，奕經就留下他自己部下的3000名后備軍保衛他在紹興（著名的釀酒之城）的指揮部。其余的后備軍處于寧波與鎮海之間一座橋上由奕經的參謀長掌握。這樣，實際上真正用于進攻每個城市的人數約只4000人，而且當時甚至沒有一個人想去打頭陣。由于這種畏葸膽怯，對寧波進行主攻的任務就落到700名四川兵身上了。他們奉命直到最后一刻才開槍，以保證攻其無備，但是他們的帶兵官剛學會講一點官話，使他們以為他們根本不應帶槍。因此，這些金川土著只帶著長刀溜溜達達地走進了英國工兵的布雷區和皇家愛爾蘭兵的榴彈炮射程之內。當英軍開火時，其他沒有經驗的中國部隊被推向四川兵的后面，致使數千人擁擠在西門，死傷枕藉，那里的幾條大街上血流成河。英國人把一排排驚慌失措的清軍步兵掃射倒地。這是自從圍攻巴達霍斯以來他們所見到的最恐怖的大屠殺，為此，英國人也感到惡心。

與此同時，在鎮海的中國軍隊的作戰就好得多。如果奕經把他的后備軍也投進去，他們甚至可以奪回這個城市。但是，由于無須指出的那種帶諷刺意味的癖好，他的指揮那些后備軍的參謀長躺在駝峰橋上的轎子中大吸其鴉片，而且正當需要他的兵力的時候，他已陷入一種麻醉狀態。他的軍官和士兵剛聽到炮聲就逃跑了。這樣只剩下攻舟山一路的水兵了，他們之中許多人生來就沒有乘過海船。他們剛一離開港口，大部分人就暈船，而帶兵官因害怕遇到英軍，后來20多天里就在沿海來回行駛，定期呈交假戰報。就這樣結束了中國人在這場戰爭中的最后進攻，從而也葬送了締結一項體面和約的任何實際的希望。此后盡管有過一些英勇的戰斗，但清朝對璞鼎查所長期規劃的長江戰役將只能完全處于防御地位了。

長江戰役從1842年5月7日持續到8月20日，它以一面倒的形勢在全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那里的數百萬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養著這個帝國最富裕的學術精華階層）展開。5月18日，乍浦和在那里的滿洲旗軍駐防地被攻占。未設防的上海在6月19日發現已經被放棄。7月20日，長江的險要重地和滿洲防軍駐地鎮江也被攻占。運河因此被封鎖，帝國被切成兩半，曾經做過明朝的都城和統治象征的南京也暴露于英軍的面前。

外國人所到之處，盡是一片驚慌和混亂。郭富將軍極力試圖制止他的士兵任意奸淫擄掠。據中文史料記載，有些印度掠奪者被他們的將官槍斃了。英國人確曾搞過一種征集糧秣的制度，它給捐獻糧秣者獎一塊小牌子釘在門上，作為此戶免受掠奪的保證。但這措施又往往不起作用。[[57]](#_57_Can_Kan_Qi_Si_He_Deng_Bian)軍隊不斷為所欲為，掠奪城市住宅，征召船夫苦力，酒后污辱當地婦女。更為惡劣的是隨營的中國侍從和長江三角洲上的無賴，他們尾隨英軍進入被征服的城市，把住戶搶掠一空，然后繼之以放火焚燒。很多城市居民預料到這種情況而事先逃往鄉下，使守軍在城里闐寂無人的市場上無法弄到給養。士兵們既沒有食物，又被洋鬼子有魔法的傳言弄得士氣低落，于是開始猜測在他們中間有“漢奸”。

因為在傳統的中國軍事歷史中，要攻陷一座設防的城市的標準方法之一就是向“內應”行賄或進行說服，使他們從城內打開城門。由于很多官員已上奏清帝，把許多失敗（像寧波的失陷）完全歸咎于“奸細”，因此滿洲的將軍們就傾向于相信英軍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縱隊。這種把外國人與漢奸聯系起來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貿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傳下來的軍事傳說只是加強了這種信念：歐洲人有籠絡中國同伙的特殊有效辦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鴉片上癮。確實有足夠的證據使滿洲官員們相信，漢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潛在的反抗者。賤民，即清代社會的下層人民，一般都要依附于清政權以外的任何有政治權威或軍事權威的人或組織。另外，通過沿海貿易和鴉片交易，港口城市的種種罪犯、小商人和秘密會社成員都成了與西方人士有密切關系的人。這種情況在19世紀50年代中葉廣州附近的紅巾起義中表現得相當明顯。[[58]](#_58_Xiao_Wei_Ke_Man____1800__185)所以當璞鼎查派波美拉尼亞的傳教士郭施拉作被占領的舟山的地方官時，這個城內的每個不法之徒都抓住這個機會來利用與這個地區的任何權勢集團（如紳士社團、衙門吏役和現有的各種股匪）[[59]](#_59_Jian_Qi_Si_He_Deng_Bian___Ya)毫無聯系的這位新保護者。舉例來說，郭施拉的捕快頭目便是一個劣跡昭彰的操淫業的人，他利用他的新職務向富戶勒索保護費。

這類消息被夸張成為不脛而走的謠言。在整個長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細，如船夫、私鹽販子、土匪、市場惡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帶兵官們開始分了一半力量來清查潛在的背叛者，這就對清朝的防務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最糟糕的是鎮江的一位韃靼族將軍，他確信，在英國人從前面進攻時，該城的漢奸一定會從后面襲擊滿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見形跡可疑的人就抓起來，此后它的居民一看到滿洲士兵走近時就驚恐地逃走。顯然，有些士兵一見有逃跑者就把他們殺死，用他們的尸體去領賞。這樣的恐怖統治籠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國人的炮聲就被一些居民誤認為是中國當局在下令屠城。

盡管滿洲人驚慌失措，可是在實際戰斗中他們的抵抗是很頑強的。在乍浦，英軍對1700名滿洲守軍的士氣感到驚訝，對他們面對失敗所表現出的拉其普特武士式的反應感到震驚。在乍浦和鎮江（那里有1600名旗人），滿洲士兵殺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們遭受蹂躪，而他們自己寧可在營房自縊也不愿投降。郭富將軍在放出惡臭的死尸堆中寫道：“我從內心深處厭惡戰爭。”[[60]](#_60_He_Er_Te____Zai_Zhong_Guo_Ji)

## 中國戰敗：南京條約

春季反攻的失敗引起了清廷內部一場重大的政策辯論。辯論的結果，反對過林則徐政策的官員或者從貶黜中被召回，或者被任命擔任與外交事務有直接關系的高級職務。年邁的宗人伊里布曾與琦善一起被貶黜，這時又被派往浙江。有影響的穆彰阿這時實際上是宰相，被派往天津。而在反對派方面，在朝廷中曾經是林則徐主要支持者的王鼎，于6月份身故，而且據說他是自盡而死的。但清帝還不能使自己完全改變態度。自幼由師傅們灌輸給他的一切教誨，他對列祖列宗的政策的全部理解，朝廷中“忠義”之士對他的一切忠告——所有這些形成了一個簡單的原則：“明”君不會屈服于武力。姑息政策就是對帝國和皇室放棄了道德上的責任。歷朝歷代的歷史證明，與反叛者調和最后總是導致如下的結果：不是被征服，就是使民間對統治家族掌握王位的權力失去信任。明朝就是這樣覆滅的，因此這也正是道光帝所害怕的：如果他失職，他的王朝也會滅亡。帝國政策的這個原則雖然并未因鴉片戰爭而有所改變，但是它已摻雜了其他成分；因為當時已到了這樣的時刻，即只要有可能，就應解除顧慮，出于權宜之計而與西方搞一些臨時的妥協。因此當時所強調的，就是屈服或者是不屈服的立刻抉擇。由于花費了許多精力反復爭論這個問題，關于講和的條件幾乎沒有受到注意。

雖然如此，失敗是難以承認的。例如，在局勢的變化中找希望，或者甚至在絕望中找出解決辦法，這總是有可能的。在乍浦失陷后，一位好戰的年輕御史蘇廷魁奏報說，英軍剛在印度被尼泊爾人打敗。[[61]](#_61_Guan_Yu_Su_Ting_Kui_De_Chuan)因此，清帝一度想利用這個機會收復香港。后來隨著長江戰役的發展，他逐漸感到，即使戰死也比向這種赤裸裸的軍事力量屈膝好。此后他雖然讓穆彰阿和伊里布等宗人擔任了更重要的職務，但仍然夢想按照他自己的要求獲得軍事上的勝利。

這種既想戰又想和的矛盾心理，表現在那個低沉的春天他所作的兩件反其道而行之的任命上。一方面，奕經仍坐鎮浙江，繼續沿海的作戰，而耆英則于4月7日被任命為欽差大臣，也在同一地區進行和談。耆英系出皇族，是皇帝的親信，在北京曾擔任過很多高級職務，輕易地增加了他原已巨大的家私。耆英是個老于世故而風度嫻雅的人物，所以人們期待他會在這樣棘手的外交任務上取得成功。然而，他面臨兩種障礙。首先，朝廷上還存在一種要求全勝的強烈意見。他必須避免琦善的悲慘下場，不能離北京的意見走得太遠。其次，他必須設法與璞鼎查接觸，后者當時正在迅速地溯江而上。當耆英聽到上海陷落的消息就立即奔向那里；但是遠征軍部隊已經向前迅猛推進。最后，在6月28日，他的一個代表想安排與英國翻譯官馬禮遜對話。馬禮遜再一次向他說明，璞鼎查不愿會見耆英和伊里布，因為他不相信他們有真正的全權。除非有明確的詔旨證明他們有充分的權力談判和約，否則他是不會滿意的。

耆英奏稱這名外夷倨傲不恭，這使清帝勃然大怒。清帝有好幾天好像要確實不顧長江地帶毫無希望的形勢而決定把這場戰爭繼續下去。最后使權宜之策似乎比較成為入耳之言的是耆英下的保證：即使南京即將失守，征服者也并不想在政治上進行統治。僅僅為了貿易權而冒著丟失大清帝國的危險，究竟是否值得？姑息政策在道義上是令人討厭的，但是如后來耆英所說的：“伏思臣等此次酌辦夷務，勢出萬難，策居最下。但計事之利害，不復顧理之是非。”[[62]](#_62_Guo_Bin_Jia____Di_Yi_Ci_Ying)

這個論點起了作用。到7月15日，道光帝的思想已有所變化；到7月26日，當鎮江守軍潰散的消息在北京被證實后，他授予耆英商談和約的全權。耆英有了這個保證，急忙趕去防止英軍當時就要向南京發動的進攻。英軍尚等在南京城外，聽到清帝國正在集結增援部隊準備和他們作戰，于是對這位使節懇請英軍少安毋躁的要求失去了信任。8月11日黎明攻擊快要開始時，一批喘息未定的使節來到河岸的遠征軍營房。他們宣布，耆英馬上就來進行談判。要英軍先不要開火，中國會同意他們的條款的。

1842年夏末在南京舉行的談判中，清朝的談判者耆英、伊里布和當地總督牛鑒實質上是英國侵略者和北京朝廷之間的調停人。他們的任務是減輕雙方的恐懼和維護雙方的自尊心以促進和諧。耆英必須首先和他的兩個各有其幕僚和利害關系的同僚保持協調。他的主要問題是尋找能夠與英國翻譯官小馬禮遜（第一個來華的新教傳教士的兒子）和郭施拉對話的使節。他派遣過三次使節：第一次派去的僅僅是幾個送信人，這些中國軍方人員在以前曾送過信，是英軍認識的人。為了開始談判，第二次派遣出的使節是伊里布的侍從名叫張喜。此人是伊里布的私人代表，在1840—1841年早些時候的幾次談判中已經為英國人所熟悉，而且實質上是一個能想方設法引英方人士講話和揣測他們意圖的談判者。在這一點上他是做到了的，他先與小馬禮遜互致寒暄，然后在談話中也以威脅對付威嚇。據張喜日記所記，小馬禮遜威嚇說，如有必要，英軍將長驅直入，溯江而上；張喜則針鋒相對地說，如有必要，清帝將武裝民眾并號召農村起來反對他們，使之感到“草木皆兵”。[[63]](#_63_Deng_Si_Yu____Zhang_Xi_Yu_Na)當然，哪一方對這些行動也都沒打算認真去做。

英方要求中方派出的談判者是能夠認真作出諾言的人。這個要求最后得到了滿足：中方派出了能夠擬訂細節問題的高級官員，這就使雙方的主要談判者最后能夠會面和達成協議。為了使談判順利進行，清朝的談判者覺得穿戴比他們實際品級更高的頂戴要更好一些。英方很容易識別出他們頂戴的品級，但無法核對他們頂戴的合法性。在南京的清朝使者們不得不也同樣弄虛作假欺騙他們在北京的上司。他們為逾越敵對雙方之間文化上的鴻溝，確實絞盡了腦汁。

因此，他們首先只向皇帝稟奏了英國人先前提出而由清帝已經表示某種同意或要進行考慮的要求，如賠款，建立平等的外交關系，在五口和香港通商。稍后，他們又上奏說英國人要求取消公行、訂立關稅條約和在各港口設立領事。1842年8月29日當他們在璞鼎查所乘的英艦康沃利斯號上簽訂南京條約時，他們仍然沒有得到清帝對開放福州以及容許外國人在新開商埠長期居住的默許。正像我們將要看到的，結果有十年時間在福州確實沒有對外貿易；而在廣州，直到1858年才獲得進城的權利，當然更談不上居住權了。另外，英國人簽字的條約是用中文寫的，文中提到雙方時都同樣地抬頭書寫，以示英、中兩國處于平等地位。但是這些表示平等的格式并未表現在送交北京的條約文本中。實際上，清帝曾命令他在南京的奴才們在英國全部艦隊撤離之前不要會見英國人，但是他的談判者們主要關切的是使條約得以簽訂，從而使英艦隊真正撤走。在這點上他們最后是成功了的，但這要到在南京舉行了關于條約體制未來形式的談判之后一個月才能實現。在實際安排執行對外貿易和對外交往的新規章方面有許多事要做，所以雙方談判人員都同意要制定出關稅和貿易章節的細則，以便在日后的補充條約中把它們肯定下來。

因此，南京條約僅僅是一個初步的文件，它只闡明了一些據以建立新貿易制度的原則。它的主要條款如下：（1）2100萬元賠款分期付清；（2）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港為通商口岸；（3）在品級對等的官員之間平等往來；（4）在各通商口岸建立英國領事館；（5）廢除公行壟斷；（6）對英商進出口貨物一律秉公征稅；（7）割讓香港為英國領地。中國的大門終于被打開了，但是談判者們還必須商定一些英國人能夠據以進入中國的條款。

（郝鎮華 劉坤一 譯）

[[1]](#_1_3)張德昌：《清朝內務府的經濟作用》，載美國《亞洲研究雜志》第31卷第2期（1972年2月），第258頁；托伯特：《對清代內務府組織及其主要職能的研究》（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3年），第110—112頁。

[[2]](#_2_3)小韋克曼：《1839—1861年中國南方的社會騷亂》，第23—24頁；傅樂淑：《中西關系文件匯編（1644—1820年）》，第598頁。

[[3]](#_3_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3，第155頁。

[[4]](#_4_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2，第9頁。

[[5]](#_5_3)布拉肯先生在下院特別委員會上的證詞，1832年3月24日。引自辛哈《歐洲人在印度的初期銀行業務》。又可參考克令《印度代辦制度的起源》，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6 第1期（1966年11月）；特里帕西：《1793—1833年孟加拉管轄區的貿易和金融》；巴蘇：《亞洲商人和西方貿易：對1800—1840年加爾各答和廣州的比較研究》（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第209—250頁。

[[6]](#_6_3)參考羅斯基《華南的農業變化和農民經濟》，第215—216頁。

[[7]](#_7_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4，第257頁。

[[8]](#_8_3)張榮洋：《對1784—1834年中國貿易和財政的再評價》，載《商業史》卷7第1期（1965年1月），第41頁。

[[9]](#_9_3)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118頁。

[[10]](#_10_3)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177頁。

[[11]](#_11_3)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178頁。

[[12]](#_12_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4，第316—317頁。

[[13]](#_13_3)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194—195頁。

[[14]](#_14_3)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卷1，中文版，第139頁。

[[15]](#_15_3)同上書，第166頁。

[[16]](#_16_2)美、英兩國船只從1832—1837年運來的全部進口貨的價值增長64%，價值3770萬元。在這同一基礎上，出口貨增長79%，價值3490萬元。絲價增長將近25%；茶價增長55%。

[[17]](#_17_2)從廣州到倫敦的函件來回需時約8個月。1841年以后汽輪和從亞歷山大到蘇伊士的“陸”路被啟用，單程只需時兩三個月。

[[18]](#_18_2)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第234—235頁。

[[19]](#_19_2)斯賓士：《清代吸食鴉片概況》，載小韋克曼、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和控制》。

[[20]](#_20_2)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第77頁；弗蘭克·金：《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第140—143頁。

[[21]](#_21_2)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第213頁。

[[22]](#_22_2)張德昌：《清朝內務府的經濟作用》，第258頁。

[[23]](#_23_2)《清實錄經濟資料輯要》，第533頁。這里有關于鴉片辯論的奏文和詔令，第527—533頁；更加完備的材料具見于蔣廷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卷1，第24—36頁。張馨保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爭》一書對這個問題作了很好的批判性研究。

[[24]](#_24_2)魏源：《古微堂內集》卷2，第6頁。

[[25]](#_25_2)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第220頁。

[[26]](#_26_2)《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第17頁。

[[27]](#_27_2)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第250—251頁。也參看張馨保《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爭》，第140頁。

[[28]](#_28_2)張馨保：《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爭》，第162頁。費伊的《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一書（第142—179頁）就外國人團體對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反應作了生動描述。

[[29]](#_29_2)張馨保：《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爭》，第182頁。

[[30]](#_30_2)韋利：《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第55頁。

[[31]](#_31_2)同上書，第61—62頁。

[[32]](#_32_2)參看蘭德爾·埃德華茲準備中的哈佛大學博士論文。

[[33]](#_33_2)韋利：《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第64頁。

[[34]](#_34_2)張馨保：《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爭》，第206頁。

[[35]](#_35_2)似乎英國女王并未收到過什么信件。參看張馨保《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爭》，第135頁；又可看鄧嗣禹和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24—27頁。

[[36]](#_36_2)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第251頁。

[[37]](#_37_2)《林文忠公全集》卷1，第3頁。關于贊揚鄉勇的詩，參看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

[[38]](#_38_2)關于某些“武術”及其可能的軍事用途的討論，參看《林文忠公全集》卷1，第22頁。

[[39]](#_39_2)參看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2冊，第365—543頁。

[[40]](#_40_2)張馨保：《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爭》，第190頁。

[[41]](#_41_2)賀爾特：《在中國進行的鴉片戰爭》，第98—99頁。

[[42]](#_42_2)同上書，第99—100頁。

[[43]](#_43_2)齊思和：《鴉片戰爭》第4冊，第630頁。

[[44]](#_44_2)韋利：《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第117頁。

[[45]](#_45_2)同上書，第120頁。又見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第266—268頁。

[[46]](#_46_2)林崇墉：《林則徐傳》，第443頁。

[[47]](#_47_2)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第259—260頁。

[[48]](#_48_2)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第272頁。

[[49]](#_49_2)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第284頁。

[[50]](#_50_2)引自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中文版，卷1，第307頁。

[[51]](#_51_2)1841年9月8日皮爾內閣當選就職時，雖然巴麥尊已被阿伯丁勛爵所代替，但巴麥尊的訓令繼續有效。阿伯丁比巴麥尊謹慎得多，但是他這時已來不及改變已制定的政策。巴麥尊在這一年又回到了白廳。

[[52]](#_52_2)這些訓令完全寫在馬士著《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英文版附錄K中，卷1，第655—699頁。

[[53]](#_53_2)1841年11月18日義律呈阿伯丁伯爵公函，外交部檔案17/46；義律致郭富公函，包括3頁，見于1841年5月21日和24日的公函，外交部檔案17/46，倫敦檔案局。

[[54]](#_54_2)參見《籌備夷務始末·道光朝》卷29，第23頁。

[[55]](#_55_2)小韋克曼：《1839—1861年中國南方的社會騷亂》，第117—131頁。

[[56]](#_56_2)此處英文誤作Yen Po-shou（顏伯壽），下同。——譯者

[[57]](#_57_2)參看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3冊，第129頁及以后諸頁。韋利的《鴉片戰爭》一書中（第186—196頁）也有一部分這種記載的譯文。

[[58]](#_58_2)小韋克曼：《1800—1856年廣東的秘密會社》，載謝諾編《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29—47頁。

[[59]](#_59_2)見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3冊，第427頁。這種情況絕不僅限于19世紀。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青、紅幫與法租界的法國警長具有同樣的關系。

[[60]](#_60_2)賀爾特：《在中國進行的鴉片戰爭》，第147頁。

[[61]](#_61_2)關于蘇廷魁的傳記，參看張其昀等編《清史》，第4589—4590頁。蘇廷魁的奏章可能指的是1842年1月英國人指揮下的1.6萬名士兵從阿富汗撤退時遭到屠殺的事件。

[[62]](#_62_2)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第298頁。

[[63]](#_63_2)鄧嗣禹：《張喜與南京條約》，散見于第39頁及其他頁中。這部詳細的日記是中國方面在中外談判中現存的少數內部材料之一。

# 第五章 條約制度的形成

## 條約制度的透視

不平等條約開始于中國普通民眾尚未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時代。19世紀中葉的幾十年內，他們仍然受著傳統儒家思想的熏陶：即政治是皇帝及其官僚們的事，而且要地方名流的支持。在這種古老的秩序下，現代的民族主義絕少有所表露。相反，清政權所關心的主要是維護中國地主—文人學者統治階級對它的忠誠，并借此以鎮壓一切可能在農村平民中掀起的騷動及反清叛亂。在這種背景下，平息沿海英國人的滋事，起初只被當作一個次要的小問題。19世紀30年代最后幾年里，清政府的打算也只不過是要制止英—印—中鴉片貿易的禍害而已。

鴉片貿易經常取得設在印度的英政府鴉片制造業的供應，它持續到1917年為止，達一百多年之久。這種近代史上延續最久的有組織的國際性的犯罪活動，為早期英國對中國的侵略輸了血。為了進行第一次鴉片戰爭，一些鴉片商大亨不僅幫助巴麥尊制定計劃和戰略，而且提供必須的物質援助：把鴉片貿易船只租給艦隊使用；鴉片貿易船只的船長給他們當領航員，而其他職員則充當翻譯；自始至終給了殷勤的招待，并出謀劃策和提供最新情報；用販賣鴉片得來的白銀換取在倫敦兌換的匯票，以支付陸海軍的軍費。既然鴉片能夠在中國迅速找到吸食者，它就同樣能夠迅速在中國找到零售商，因此，英國、印度、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販毒商只需將鴉片運到中國，其余的事自然會由中國人去包辦，不用英國政府插手。

英政府要求簽訂條約只具有一般性的目的，即廢除納貢制結構。1842年南京條約取消了只準在廣州進行中外貿易和由廣州特許的公行壟斷商來進行中外貿易的限制，從而開始了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印度鴉片和外國侵略已經開始搗毀中國排他性的藩籬。中國的戰敗使煙毒進一步泛濫，而取得戰爭勝利的英國人則試圖建立中外交往的新制度。這一點，他們在后來的20年內辦到了，其間他們與清廷及其地方官吏有時一致行動，有時則發生沖突，而與法國人、美國人、俄國人的關系也是如此。從1842—1844年至1858—1860年這段時期，這些新制度的發展集中體現在初期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上。

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這20年構成了中國對外關系新秩序的第一階段。從西方的觀點看來，那是這種條約制度結構得以逐漸形成的初創階段。后來的幾個階段是使條約制度在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中變為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從今天中國人的觀點來看：條約是帝國主義入侵的工具。在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下一個30年中，通商口岸成了中外共管、文化混雜的中心城市：它們對整個中國有著日益擴大的影響。在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的第三個30年中，主要通過商埠向外擴散的外國影響像滾滾洪流，它大大加速了中國傳統的國家政體及社會制度的解體和改組。在這一時期，通商口岸內出現了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的萌芽。外國人在中國國內的活動達到了高潮。最后，在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的第四個30年中，條約制度先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的侵略所取代，接著又被共產黨領導的一個新時代的革命秩序所代替。在這風云多變的一個世紀中，條約制度就經歷了這么幾個階段。

因此，條約制度這個近代中國的插曲是出現在“王朝虛位”的一個世紀中：這時清王朝中央權力衰落，政治動亂接踵而來，最后，一個嶄新的中央集權在根本不同的一種黨的專政制度下逐漸建立起來。這個重建中央集權的過程最后與城鄉民眾的政治活動相結合，也與為發展經濟而廣泛應用現代技術的活動結合了起來。從大處看，條約制度興衰的一百年來，經歷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開始及其高潮，也經歷了中國人民對侵略不斷增強革命反抗的各個階段。中國的主權在條約中不斷受到損害；隨著民族主義和革命的興起，主權漸漸地又得到了維護。雖然通商口岸在開始時只是沿海貿易及對外交往的邊緣地帶的中心，可是在挑戰與應戰的過程中它們成了斗爭的主要焦點。因此，必須把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條約制度形成的時期，看成是外國對中國生活施加錯綜復雜和驚人影響的起始階段，盡管這一有著外國影響、特權、控制和最終是掠奪的時代，在中國人民的歷史長河中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今天研究19世紀中葉中西關系史的學者們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必須如實地對當時中國被迫與之打交道的“西方”進行考察。當時的西方仍然是以農業為主，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在工業、交通運輸、文教、醫療衛生和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程度等方面都是“不發達的”。舉例說，英國在19世紀中葉有2200萬人口；但是它的政府及社會生活卻依然被500個貴族家族所控制，它們占有將近一半的土地，而其余的大部分土地卻為大約1300個紳士及占有土地的平民所有。盡管有1832年的議會改革法案，當時的英國仍然是一個由富有的貴族統治的國家：他們巧妙地把新興的工商業領袖吸引了過來，同時，迅速增加的人口卻不斷地擴大著農場和新城市貧民窟里無土地和無選舉權的貧民隊伍。

19世紀中葉中國的內部叛亂與騷動，似乎與當時英國在煤、鐵、紡織品生產及鐵路方面的發展進步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然而，以安居樂業這句俗話來衡量，叛亂前的中國民眾跟進入城市與工廠生活的英國民眾相比，差距也許并沒有一般人想象的那樣大。4億中國人和2200萬英國人之間的真正差別，第一在于他們的統治階級行動的動機不同，其次在于他們所掌握的力量不同。

英國侵略中國的動機和力量都來自英屬印度。駐中國的主要代理行就是開辦已久的一些東印度代理行的分支機構；后者于1813年印度貿易對它們開放以后，在倫敦、孟買和加爾各答都分設了機構。在香港的英國商界領袖們——查頓、馬地臣、顛地等——都具有上述背景，并且同作為其客戶分布于其他英國貿易中心的親友們（很多是蘇格蘭人）進行業務往來。這種中間商不僅參與銀行業、保險業和船運業，而且它早在爭取英國廢除1846年谷物法及1849年航海法取得勝利以前二三十年，就開始發行自己的自由報刊和宣揚自由貿易思想了。[[1]](#_1_Ge_Lin_Bao____Ya_Pian_Zhan_Zh)散商的思想是貪得無厭和肆無忌憚的，并且有宗教信念做護符。（一位鴉片船長在日記中寫道：“12月2日。忙于迅速交貨。沒有時間讀《圣經》。”[[2]](#_2_Fei_Zheng_Qing____Zhong_Guo_Y)）

英國在中國的軍事力量，從一開始便是英印聯合的軍事力量。[[3]](#_3_Fei_Yi____1840__1842Nian_De_Y)1839—1842年對阿富汗的戰爭使對華戰爭顯得遜色。1845—1848年對錫克教徒的戰爭繼續擴大了英國在印度的統治。1841年來中國以前，璞鼎查爵士由于他在信德省（1843年被合并）作出的成績而被授予男爵封號。總之，到了英國人對中國使用武力時，他們的作風和價值準則早就因在印度的成功經驗而已經形成。這些人到中國來時是統治階級的紳士名流，有優越感，很自信，往往不可一世，完全相信力量的秘訣就是樹立威望，即使他們享有這樣的聲譽：他們擁有力量，并能在必要時使用這種力量。他們也習慣于同當地貴族打交道，并在其中物色合作者以發展他們的貿易。

19世紀中葉的幾十年內，英國對華政策主要為巴麥尊勛爵所左右：從1830年到1865年的36年里，有2/3的時間他或是擔任外相，或是擔任首相職務。[[4]](#_4_Ba_Mai_Zun_Yu_1830Nian_11Yue)他的卓越能力不僅貢獻給了英國的國家利益，也貢獻給了中產階級自由派的憲政事業。他利用同歐洲的協作，使奧斯曼帝國免遭俄國擴張勢力的威脅。雖然中國問題還不是他主要考慮的中心問題，但他的對華政策也有著同樣的傾向——即為英國公民要求憲法規定的權利，必要時得訴諸武力；或者和其他列強采取一致行動來謀求這種權利；一貫地“堅信正義是在他那一邊”。[[5]](#_5_Wei_Bo_Si_Te_Jue_Shi____Ba_Ma)

從英國人的自信心這個角度來說，在中國訂立新的條約制度，其意圖一方面是為了維護英國全球商業擴張的既得利益，一方面也是為了表現這種擴張的理想。具體地說，英國的目的在于為英屬印度、中國、英國本土之間的三角貿易提供保證和機會，也就是說，要保障印度鴉片在中國的市場以及中國茶絲對倫敦的供應。英國締約者的直覺要求是為貿易（他們相信貿易有助于向一切民族傳播現代的文明）尋求法制（他們感到法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行之四海而皆有效）的保障。因而最初的條約主要是以給商人授予特許權的形式出現的。

其中有些權利是在歐洲國際制度的范圍內正常地給予外國締約國的國民的，如“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安全”的互惠權利（《南京條約》第一條）；又如英國臣民在中國五個通商口岸有權“帶同所屬家眷寄居”，以及擁有在各該地貿易通商“無礙”之權（第二條）。這些居住和貿易的個人權利在19世紀的主權國家之間通常是得到認可的；就是在中國，過去許多世紀的對外交往中，一般也是容許這樣做的，只是沒有在條約中詳細地規定下來而已。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已經規定過旅行與貿易的互惠權利（第五條）。但最后在1727年簽訂的恰克圖條約（第四條）關于商業問題的條款中，卻規定商隊須在嚴格的控制和管理下到北京或兩個邊境商業中心進行貿易；這倒頗像1842年以前在廣州實行的貿易制度。[[6]](#_6_Sai_Bu_Si_De___Ye_Su_Hui_Shi)

英國新獲得的大部分條約權利把自由貿易的理想應用到了中國沿海：即英國商人應能進入自由市場，“勿論與何商貿易，均聽其便”，而反對跟官辦貿易壟斷機構打交道（《南京條約》第五條）；英國商人“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由部頒發曉示”，以便按例交納（第十條）。[[7]](#_7_Nan_Jing_Tiao_Yue_De_Zhong)為了在中國沿海口岸的活動中實現這些目標，英國人堅持搞許多附加條款，它們合起來就構成了對英國臣民的領事裁判制度（治外法權），而且它是以海軍炮艦為后盾的。這樣，一種新的外國人的社會權力結構就逐漸在中國沿海找到立足之地，并且日益膨脹起來。

英國在華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英國人同清朝官吏之間默契的利益一致。他們每一方都代表一種征服者的力量，都懂得用道德信仰兼管理技巧來統治其被征服者。清政權的思想體系，即威嚴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維護統治者至高無上的精神威望。因此條約的簽訂就是英國和滿清這兩個貴族帝國的代表之間在爭端中的權宜妥協措施。在這一方面，璞鼎查與耆英是心照不宣的。

耆英在廣州談判時提出的妥協綱領，其后臺就是京師的滿族大員、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1782—1856年），此人于19世紀30年代即已成為道光帝的首輔大臣（見第三章）。他們同年歲，十分親密。穆彰阿幾乎掌握著北京的一切有權有利的職位。他反對林則徐根除鴉片的政策，支持同族旗人琦善和耆英的妥協活動。同他們一樣，他對各省的情況，即對中國的實情，幾乎毫不了解，只是兩眼死死地盯著清王朝的利益。對付中國邊境的非漢族人民，自清王朝建立以來就已成為滿族的專長，直到19世紀40年代，還是如此。大陸邊境部落的酋長被納入中國大陸的權力結構之中，同樣，英國人則被納入了中國海疆的權力結構。然而英國勢力在以后的擴張，則非他們的始料所及了。

## 1842—1844年條約的締結

在南京條約以后為制定1842—1843年英國條約制度的細則而進行的幾次談判中，雙方在南京達成的最初協議的基礎上各有截然不同的打算。清方談判者原來擔心英國人會有領土要求，后來才確信英方正如所聲稱的那樣只尋求貿易，而不是領土。因此，中國便打算利用貿易方面的讓步去安撫英國人，但對他們的活動則根據條約而予以嚴格的限制，這樣就能通過物質誘導來控制住他們。這里應用的就是一種精心策劃而經常用來對付亞洲腹地夷狄的“羈縻”政策。它包括兩個方面：（1）在商業和私人交往方面讓步，用貿易特權和友誼去收買外國的好戰分子；（2）乞靈于文明的等級制禮貌行為以及中國的整個文化優越感來設置各種限制，所以條約一經訂立，也能被用來限制對方。

在采取這些旨在軟化好戰的外國人的傳統策略時，清朝對西方的政策是否重新作了什么考慮呢？朝廷里的文獻記錄幾乎沒有提供什么新東西。然而，在一心謀求妥協的清朝官僚集團之外，許多有志之士卻作出了反應。最著名的是魏源，一位志在使舊的管理制度仍能發揮效用的改革家。魏源早年就有謀求改革漕運和鹽務等要害部門的經驗（見第三章）。此時他把注意力轉到了外部世界的問題上來。

魏源利用友人林則徐于1841年年中贈送給他的翻譯過來的資料，把新舊材料組織起來編成《海國圖志》一書。他描繪了歐洲的貿易和軍港向東方所進行的擴張，及其對中國的東南亞屬國的顛覆性影響。這便導致了中國沿海的動亂。對付之方應當是以歐洲人制歐洲人，并且使亞洲國家奮起抵抗他們。中國應當采用西方武器和訓練以自衛，并建立自己的海軍力量。魏源的這部著作完成于鴉片戰爭剛結束時，此書及其記述清朝武功的姊妹篇《圣武記》，盡管不乏以訛傳訛之處，卻仍然不失為對國際貿易和西方炮艦所帶來的問題癥結進行多方面的探討的首次嘗試。[[8]](#_8_Guan_Yu__Ji_Mi__Wen_Ti__Jian)魏源雖然對1852年最后一版《海國圖志》作了增訂，但他對國外世界的廣闊探討，很快就被湮沒無聞。實行改革以幫助中國對付西方的進攻，已讓位于清廷在此伏彼起的叛亂中一心掙扎求存所作的努力了。

因此，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后的10年中，清方談判者天天使出了他們整套的傳統策略伎倆來虛與委蛇，而極少有任何新穎的奇謀妙算。他們試圖在外交禮節和名詞術語方面使其外國對手處于下風：譬如說，會談只許在貨棧那種令人感到屈辱的環境中進行，或者只許同低級官員進行。當被迫作出讓步時，也只能把它當作仁政，而不承認外國人的權利。清帝的代表們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不可能采取會引起民眾公開反對的行動，這點印度的統治者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在開始時卻利用了私情交往。

處理從1842—1848年新條約關系的宗人耆英，用古代《孫子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精神來執行他的任務。在那個時代，這條金科玉律是人們的口頭禪。如耆英所言：“制夷之法，必須先知其性……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無寸鐵，僅止以一皮襖蓋于虎首，則虎即生擒矣……今若深知其性，即可以懾其心膽。”[[9]](#_9_1842Nian_5Yue_19Ri_Shou_Dao_D)可惜耆英運用這一戰略時卻是片面的。他不去研究介紹英國商業擴張的文章，反而先試圖用交情來籠絡英國頭目。在他與璞鼎查的書信往返中，尤其是在他于1843年6月對香港的史無前例的五天訪問中，這位欽差大臣真是極盡討好巴結之能事。他裝出一副與亨利爵士十分友善的姿態，在書信里把后者稱為他的“因地密特朋友”（即英語intimate）。他甚至表示想收璞鼎查的大兒子為養子，且與璞鼎查交換老婆的相片（耆英后來向清帝表白，說什么“英夷重女而輕男”）。其馴夷手腕在他對這位英國全權大使的告別信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聽起來頗像一封情書，他說：

一年多來我倆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對方都是一心為國的：既不為私利之動機所驅使，亦不被欺詐之盤算所左右，在商談和處理事務中，彼此心心相印，我們之間無事不可相商；將來人們會說，我們身雖為二，心實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覿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惻！[[10]](#_10_Qi_Ying_Zhi_Pu_Ding_Cha_Han)

滿族顯貴的這種表演，體現了個人外交的悠久傳統：軍事上軟弱而文化上優越的中國統治階級常常采用此法以同化和軟化入侵的蠻夷。假若璞鼎查是蒙古人，耆英的舉動就不會那么使他驚訝，因為這些舉動只不過是中國古代外交紀錄的重現而已。舉例說，漢朝對入侵匈奴的妥協，采用的就是和親政策。中國每年給匈奴定額饋贈（另給其酋長婚配一名中國公主），使之保證停止對中國邊境的侵犯。和親就是“中國歷史上‘不平等條約’的另一種形式”，當中國軍事上軟弱時它就一再出現。當漢朝成功地把和親政策轉變為完全的納貢制度時，“就向匈奴要來一位王子作為人質，以保證其馴服”。[[11]](#_11_Jian_Yu_Ying_Shi___Han_Dai_D)耆英（英國的公文中寫作Keying）自己沒有兒子，建議收養璞鼎查的兒子，并帶他到北京去。當他得知這孩子先要在英國完成學業時，他答道：“很好！從今天起，他就是我的養子弗里德里奇·耆英·璞鼎查了！”[[12]](#_12_Pu_Ding_Cha_Xin_Han_Di_74Hao)

英國在1842—1843年談判中的目的比較簡單具體，但影響卻深遠：即依靠條約法規使各種權利成為制度，使其總的來說有利于英國在貿易及交往方面的發展。正像查頓所申說的那樣，他們最直接關心的就是通商的機會。條約稅則實際上是由英國的與廣州的有關人士議定的。伍崇曜代表中國方面，馬地臣則率領致力于廢除舊制的英商代表團。然而，他們都不十分了解行商以前實際上交付的貿易稅。關稅率實際上是查頓過去的一位代理商（羅伯聃）在廣州同海關監督等人討價還價制定出來的。新稅則的稅率用幾乎任何標準來衡量，都可以說是低的，且不具保護性，因為不論進、出口稅都仍按中國的舊規矩征收。主要的變革并不在于帝國的舊稅率方面，而是在于要努力掃除深深植根于廣州貿易制度中的撈外快和收小費等一整套敲詐勒索制度。當涉及內陸轉口稅（指外國貨物從口岸起運至內陸市場后所應征收的那些稅）時，條約規定此類稅額“只可按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某分”，可是由于缺乏情報資料，這種百分率在條約條款中最后仍付闕如。不出所料，英國人根本不能杜絕在商埠以外對他們的貨物隨地課稅。“自由貿易”還是無法強加給中華帝國。

取代廣州海關制度的一些新規定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制定了出來，并與稅則一道于1843年7月22日頒布：英國船只將把它們的執照委托英國領事保存，這樣一來，英領事實際上將取代以前對在廣州的每條船只負責的那種公行“保商”的地位。中國政府將不再對中國商人的債務擔當責任。同時英國政府規定，英國領事對所有英國人有審判權。這樣便正式制定了治外法權原則，而它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侵犯中國在廣州的刑事審判權的。

中英附粘和約是在1843年10月8日由璞鼎查和耆英在虎門簽署的。它把英國的貿易限制在五個通商口岸內，允許外商在那些地方居留，但限制到五個口岸之外的地方去旅行。附約規定了香港與廣州之間的地方貿易，允許在所有的商埠內停泊軍艦，認可領事協助稽私，承認治外法權和引渡刑事犯。它還包括一項最惠國待遇條款，即此后凡與其他列強訂立之條約，英國將援例享有同等利益。雖然如此，附約后來在中、英文本之間顯示有幾處歧異，這部分原因是由于英方譯員小馬禮遜死后無恰當的接替人所致。[[13]](#_13_Zhong_Guo_Hai_Guan_Chu_Ban_D)

英國的目的是想利用其陸海軍力量來鞏固已經獲取的通商機會。關于這種努力是怎樣受到限制的，從香港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英國人希望把這個現在已經屬于英帝國的島嶼變成他們存放貨物的倉庫，從這里他們可以進入中國全部沿海地區。為此目的，他們想把中國的沙船貿易吸引到他們這個新的島嶼港口方面來，因此試圖把這一點寫入附粘和約。然而，在條約的中文文本中卻明白無誤地寫道：香港乃外國領土，所有去該地的中國商船必須從中國五個通商口岸的中國海關取得通航證。中國當局用拒發通航證的辦法就能夠窒息這種合法的貿易，而且他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對中國方面這種不合作的態度，英國人的對策是通過由香港英國當局發放航行許可證，來保護居留在那里的英國國民的船只。這是一種新策略，它的本意是為了保護往來于廣州、香港、澳門之間載運旅客和雜貨的小船。英國人單方面推廣了這種做法，很快讓那些在香港注冊而往來于中國所有沿海地區的中國船只和外國船只使用他們的旗幟。

南京條約和虎門附約沒有提到的主要問題是鴉片。英國政府爭辯說，鴉片貿易既然明顯地不能為中國所禁絕，那么，上策便是使它合法化，并對它征稅來達到管理它的目的。對此，道光帝當然從內心里不能同意。鴉片因此在初期的幾件條約中始終沒有被提及，而這項貿易卻在條約規定的范圍之外，根據一套非正式的規定得以恢復進行。早在條約規定的商埠開放以前很久，那些新口岸外就有武裝的鴉片“接受船”（浮動的毒品貨棧）停泊在沿海鴉片站旁邊，鴉片站的貿易已成為既成事實。到1843年4月，上海官員們“業已在吳淞附近指定了一個停泊地……生意十分興隆，許多清朝的低級官吏也參觀過這些船只”[[14]](#_14_Pu_Ding_Cha_Xin_Han__Di_40Ha)。然而璞鼎查于1842年11月曾經下令，英國人在這些港口正式開放和建立領事館之前，禁止在那里進行貿易。在仍被占據的舟山島上一位英國高級海軍軍官就曾指出，鴉片商人“迄今已被允許在該島與澳門之間的沿海一帶航行，而無需辦理港口過境手續，也未曾受到任何盤問……只要他們不靠近尚未開禁的五個口岸即可”。[[15]](#_15_Chuan_Chang_Huo_Pu_1843Nian)可是，當這位軍官于1843年4月發現他們出現在尚未正式開放貿易的上海口外時，便命令他們在24小時內離開。

這件事給觀察兩國事件的人提供了一個可資教訓的實例。璞鼎查斥責海軍這種頭腦刻板的舉動。那位軍官受到譴責并被撤職，而與他認真合作的那位上海道臺也得到了同樣的下場。此后英國海軍就對鴉片貿易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到了1845年，就有80艘裝運鴉片的快船往來于香港。此時馬地臣指示他那為首的鴉片船長說，不要夸耀對海軍的“勝利”，而是“要盡力討好清朝官吏，如果他們要求我們從一個停泊處開到另一個停泊處，我們就要照辦，并且不要太靠近他們的城市。鴉片貿易現在在英國很不得人心，因此得保持沉默，盡量避人耳目，為此目的，不論怎樣小心都不為過分”。[[16]](#_16_Ma_Di_Chen_Yu_1843Nian_4Yue)

結果，英國對華的商業入侵從此便是合法貿易與非法鴉片貿易雙管齊下地進行。合法貿易是在新開辟的五個條約口岸進行。鴉片貿易使在這些港口之外的沿海一帶的接收站多了一倍，那里通常都停泊著二三十只鴉片接收船。到1860年為止，鴉片貿易額翻了一番，每年進口由3萬箱增至6萬箱。然而鴉片商人卻受到璞鼎查的警告，不許到上海以北的地方去，這顯然是與大鴉片商行非正式協商的結果，還可能同清朝當局通過氣。這樣一來，中國沿海的法制就弄得肢體不全。尤其糟糕的是，英國——還有美國——為了同中國發展貿易，就繼續靠向中國輸出鴉片，作為籌措購買茶絲出口貨資金的主要手段。

## 條約口岸的開放

口岸在新的條約制度下只是逐漸開放的——廣州開放于1843年7月27日；廈門于11月2日；上海于11月17日；寧波于1844年1月1日；福州于1844年6月。另外，7月3日和10月24日分別同美國和法國簽訂的條約，只不過是給條約制度錦上添花而已。

顧盛代表美國人方面，試圖以要挾北上來得到他要簽訂的條約；他話音未落就在廣州獲得了他所謀求的條約。他沒有別的事能插得上手，但他是一位精明的律師，便更明確地琢磨出了幾條治外法權條款，另外又加進了幾條有助于使缺乏像香港那種基地的美國人也能參加中國沿海貿易的條款。在這些新開的港口，美國人采用一種省錢的變通辦法，即由商人臨時擔任領事，但這種做法對英國想讓領事來執行條約規定的努力幾乎沒有什么幫助。[[17]](#_17_Guan_Yu_Fan_Yi_De_Wen_Jian)

在法國方面，拉萼尼代表主要致力于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并要求清帝國政府能給予宗教自由。耆英的第一著棋是利用曠日持久的談判以達阻止拉萼尼北上北京的目的。同時耆英也看出，這位法國使者要求的讓步要比英國人和美國人已經得到的還要多。在最后同意給基督教以寬容的時候（這意味著取消雍正帝的禁令），耆英含著眼淚告訴這位法國人說：“你勸我作出的這種讓步……也許要以我的生命為代價……你有義務拯救我……幫助我。”耆英于是企圖只限定在各口岸傳教，但最后沒有成功。[[18]](#_18_Ge_Luo_Shi__A_Xiao_Fu____Qi)1844年與1846年的上諭重新允許中國人信奉羅馬天主教，并且恢復了在雍正時代查抄的某些教堂。基督教新教獲得了同等的許可權利，但是教士不得離開條約口岸去內地旅行。法國人接著在廣州和上海設領事。由于貿易發展很慢，上海領事孟體尼便致力于維護他職務的尊嚴及法蘭西的利益。

耆英和美、法打交道的政策是這樣的：“一視同仁”，讓這兩國都能通過最惠國條款得到和英國同等的權利，不使他們因為享受到了同等特權而感謝英國。他這個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想離間法、美同英國的關系，以期將來能利用法、美來反對英國。他也認為仍要把廣州繼續作為中國外交的接觸點。

和這種外交相輔而行的是清朝重建沿海軍事的綱領，其中包括海軍的訓練、火器的使用以及建造新的炮臺和要塞。但是，以林則徐為代表的想獲得西方武器的勢頭逐漸減弱，這是因為耆英的安撫政策看來還頗著成效。因此不需要花大氣力去重新建設中國的軍事力量了。[[19]](#_19_Guan_Yu_Zhe_Ci_Liu_Chan_De_H)

為了在新口岸與外國人打交道，耆英的首要任務是物色和任命一批可靠而又有才干的官吏，這些人要既能博得朝廷和外國人的信任，同時又能忠于自己和與地方勢力合作共事。他首先起用的是在南京當過他的助手的那些屬員。他在廣州談判時最得力的助手是黃恩彤，此人是中方參加附粘和約談判的主要人物，他曾通過正常仕途升任南京鹽運使，并于1842年為南京按察使和代理布政使；1845年他出任廣東巡撫。[[20]](#_20_Chen_Qiao____Huang_En_Tong_Y)其他一些南京隨員則被派往上海、寧波任道臺。在廈門的新式人物是福建省布政使徐繼畬（后來任巡撫），此人是個學者，那時開始根據西方資料編輯一部附有44張西式地圖的新的世界地理書《瀛環志略》。徐繼畬是1826年的進士，在翰林院工作過10年，深受安撫政策的主要擬訂者穆彰阿的賞識。他在戰爭時期是福建省的一名道臺，后來于1842年春被任命為廣州按察使，在廣州他與同窗黃恩彤（也是1826年進士）共事過一段時間。徐繼畬于1843年調回福建，因此利用與領事及傳教士正式接觸的機會而獲得了許多有關外部世界的知識。雖然他這本1848年編成的書較之魏源的《海國圖志》更為簡明和精確，但它在19世紀60年代才流行起來；那時作者于退隱中被重新起用而進入了北京新設立的總理衙門。[[21]](#_21_De_Lei_Ke____Xu_Ji_Yu_Ji_Qi)

這些人因為與外國人辦交涉的特殊才能而被選用，他們在通商口岸處于調解人的地位，就像參加南京談判的清方談判者那樣。他們是兩姑之間難為婦，要冒著很大的風險和外國人打交道，所以多次為此最后吃了苦頭。像后來西方的“中國通”一樣，這些深諳夷情的人確是一些能夠對外國文化中的民俗學進行考察和挖掘的人才。中國人對“蠻夷之性”的看法是以亞洲腹地的長期經驗為背景的，他們認為：蠻夷天性難測，也的確“莫可測其高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蠻夷貪婪成性，無往而不牟利，另一方面，蠻夷也確是天性狡詐，沒有按文明之道待人接物的修養。他們真是“犬羊之性”。英國人強調貿易，這表明他們極盡本末倒置之能事——“蓋夷人重商而輕官，凡欲舉事，必先謀之眾商”。這是因為整個英國“均賴眾商貿易以為生。上下交征利，不求物質所得者蓋寡”。[[22]](#_22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這種粗鄙顯示出他們道德低下，但同時也暴露出英人可以受羈縻的弱點。第一批條約就這樣被理性化為實現羈縻的手段。雖然英國人的貿易利益在條約口岸日見鞏固，但這種利益仍可看成是隨時可能喪失的東西，因此只要中國施加足夠的壓力就可使外國人就范——這是一種多么十全十美的理論！但可惜中國缺少必要的實力基礎。

在新口岸馴服外國入侵者似乎較為可行，因為中國這個萬方共主之國還沒有在精神上被擊敗。這些化外蠻夷在清朝官方文件中依舊有時被稱為“英逆”，即他們是以北京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成員，卻又是這個世界秩序的破壞者。他們進一步訴諸暴力將是“犯順”。[[23]](#_23_Li_Ru_Jian_Qi_Ying_Dui_Di_Fa)條約口岸制度首先確實不是強加給中國的，而是實際上一開始就在這里成長起來的。新條約的規定中關于通商口岸有居留和貿易區域、有領事裁判權以及最惠國的條款等等，這些都是中國傳統的繼續，作為制度，它們并沒有與舊習慣發生抵觸。何況在19世紀40年代當港口剛開放時，朝貢使節繼續來到北京：朝鮮每年一次；琉球前后來了七次；越南和暹羅各來了三次。所有朝貢的禮儀及其記載都詳盡無遺地保留了下來，其中包括蒙古和亞洲腹地的其他王公貴族通過理藩院所表示的臣服之誠在內。今天回顧起來，鴉片戰爭也許可以看作是一場災禍；但當時卻不是如此記載的。當1844年一個法國人留在琉球，1847年一個行醫的英國傳教士在那里定居的時候，琉球國王就抱怨起來，清帝對此作了訓示，他說道：“佛英二國，不應擾我屬國”，“若不為之弭止驚擾，殊無撫馭外藩之意。”[[24]](#_24_Fei_Zheng_Qing____Zhong_Guo)然而北京現在已沒有力量維護這種古老的觀念了。這些話仍被繼續記載下來，但它們的功效卻已成了過往煙云。

## 通商口岸的外僑團體

在外國人眼里，條約口岸在新的邊疆地區——不是未開發的邊疆，而是人煙稠密的文明邊疆——形成了一個單獨的和日益擴大的社會。前幾代的西方貿易商已把這些港口選定為打進中國商業渠道的潛在地點。廈門與寧波在16世紀已為葡萄牙人所熟悉。然而到了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廣州和上海卻是主要的口岸，而位于這兩地之間的另外三個地方不過是前哨地點而已。在訂約后的頭10年中，廈門的外僑約在25人左右，福州和寧波各有12人左右。分散在港口外的鴉片接受站的人數就更不多了。早就建立起來的貿易中心廣州大約有300個外僑，但是廣州是兩廣的首府，那里住有許多官吏和世家大族，它是政府威信和地方愛國主義的象征，抗御外人和防守本地的能力比上海要大得多。外國勢力增長的真正中心是在長江口上。上海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已有12個商行和100名左右的外國人。到50年代中期則發展到了70個商行和三百多名外國居民（不計家眷），并有8個領事館和36名新教傳教士。[[25]](#_25_Mei_Ye_Deng_Bian____Zhong_Gu)

在各個口岸，外國僑民團體集中于前灘或沿江馬路一帶，裝載的貨物由此轉卸到外國商行所在地段內的貨棧。每個外僑團體都設在中國本地城市外圍的背水之處，使之能從水上獲得援助，也能對陸地作某些防御。英國領事們早就要求有權在有城墻的城市里所租借的領事館建筑物上升起國旗，而且除廣州外，其他各地都達到了這個目的。但在廈門，外國居留地實際上是設在海港內的鼓浪嶼；在福州是設在閩江上的中州島上；在寧波則是設在城關一條小河的對岸上。當外國人在上海城關以北黃浦江岸定居時，他們住在兩條支流之間，而在靠內陸的一側的邊緣，他們又開鑿了另一條被稱為洋涇浜的小河。

19世紀中葉，在中國條約口岸總計大約有500名外國人，他們的工作主要在將近200個商行里（其中既有從事本地各種業務的商行，也有從事國際貿易的商行）。男人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女人。其中半數來自英倫三島，另外1/4來自印度（包括印度祆教徒），總計這些外國人中來自英帝國者達3/4。美國人數目上少些，然而他們的航運業僅次于英國，他們在上海的貿易量幾乎達到一半。1849年6月航海法的廢除，使美國船只可以直接把貨物運到英國，或者在英國各殖民地之間運貨，因此到1850年1月1日以后，美國快船就在茶葉輸往倫敦的業務方面同英國展開了競爭。

基督教傳教士團體在數量上只是中國這個舞臺上的配角，但它們對外國僑民團體的貢獻，無論在精神或知識方面，都是不可忽視的。受到法國鼓勵的天主教傳教士，穩步地、靜悄悄地在內地主要中心恢復了他們的位置，甚至還發展了他們的宗教信徒。1839年在中國就有將近30名天主教傳教士，其中一半屬于遣使會修士，一半屬于巴黎外方傳教會：這30人差不多都是法國人。10人在澳門，此地是訓練、供應和聯絡的主要基地。10人在四川，3人在江西，3人在湖北，其余的則在福建和蒙古，與當地教徒相處在一起。像某些新教教徒一樣，他們偶爾也乘鴉片船在沿海通行。到1845年，在中國有76名歐洲天主教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在上海再次活躍起來。[[26]](#_26_Fei_Yi____Ya_Pian_Zhan_Zheng)但直到1839年，第一批新教徒還只有12名教士，在鴉片戰爭后仍舊被限制在條約口岸內。同穿著漢服、過著中國式生活而深入到中國內地的天主教神甫相比，這批典型的新教教徒帶有家眷，并保持著許多西方生活方式。天主教會由于在中國具有勸人信教的長期經驗，所以已經學會了許多中國方式。同時它也比新教更加專心致志于拯救靈魂，建立信徒之家和宗教社團，不大注意行醫和教育，以之作為勸人改奉基督教的手段。保持更多個人主義色彩的新教徒帶來了更多的物質文化，也與外僑團體保持更密切的聯系。這到頭來使他們對中國的傳統更具破壞性。

條約口岸的居留地是外部世界伸向中國沿海邊疆的據點，它們依靠的交通幾乎就像當時美國西部邊區村落依賴小馬快遞郵車和商隊小道那樣。不過中國沿海交通幾乎全部靠海運。由英國經跨越蘇伊士地峽的這條“陸路”的郵件要花兩三個月時間，但比起從大西洋岸本國繞過好望角或合恩角的四個月航程則縮短了一個月。“半島和東方輪運公司”的明輪輪船不久又縮短了這段航程。輪船郵件從1845年開始運送到香港，1850年開始運到上海。然而，當時是快速輪船的偉大時代；在中國沿海的那些鴉片快船經常定期地向鴉片接受站供貨，這時它們既載運郵件，也載運旅客到條約口岸，更不用說載運香港來的新聞報紙，以及1850年以后載運上海出版的《北華捷報》了。居住在小一些的條約口岸的外僑，覺得鴉片船船長真是他們兌換錢票的最好中介人。

已經用武力打開中國門戶的英國政府，是創立條約口岸結構的積極參與者。然而中英貿易有它自身的推動力，每一港口的英國領事都感到自己趕不上新的商業發展形勢。根據條約，他們擔負著正式的領導職務，但是以西方的貿易和文明（兩者被認為是不能區分的）的名義向中國的舊制度發動進攻的，實際上是商人和領事人員的聯合行動。

領導英國商界的是怡和洋行與寶順洋行這兩個互相競爭的商號，它們的鴉片船船長曾在19世紀40年代攜手合作，由兩家共同把持販毒的壟斷權。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美國波士頓的旗昌洋行。這三家公司不論在鴉片貿易方面或合法的條約港口貿易方面都從事著范圍廣泛的活動：它們發展自己的快船船隊和銀行及保險業務，也發展堆棧甚至船塢等大的港口設備。這種生產能力及其資本積累很快就使得它們在當地向不動產和消費品工業方面進行投資。

在國際貿易方面，一些小商行的經營范圍就不那么廣。這些在中國的代理行給它們的國外委托商提供市場情報，以尋求對船貨投資的風險資本（即投入資本），在這項業務中，代理行只通過向客戶收取托運的往來貨物的傭金獲利。委托商本人和代理商的贏利不僅取決于中國和國外市場的可能性及所有競爭者的反應，也取決于兌換率的漲落，最主要的是金、銀之間兌換率的漲落，而且在中國還特別涉及各種各樣的計算單位。數量少而幣值過高的在西班牙美洲通用的銀洋1853年在廣州為墨西哥銀元所取代；1857年，上海商人又完全放棄了鑄幣而采用上海銀兩制——一種用銀錠付款的計算單位。[[27]](#_27_Luo_Ke_Wu_De____1858__1862Ni)兌換業務只有在外國人同中國人的密切合作下才能進行。

怡和洋行里不僅分設常駐股東的“高級餐廳”及英籍職員與助手的“低級餐廳”，而且還有中國買辦、錢幣兌換人及許多傭人的辦公室及住處。該洋行的各部門經營茶、絲、紡織品或中國出口雜項。總而言之，一個大的貿易商行足以使英國領事館在職員人數與建筑物的規模上大為遜色。這些洋行是支配的因素。它們深信自己就在從事條約口岸的一切活動。

外籍代辦（即商行頭目）完全依靠他們的中國買辦。廣州的買辦執行新開口岸外商營業中屬于中國方面的業務，這是因為他們一方面熟悉茶和鴉片行情，而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能夠按必要的中國方式互相擔保。在中國人看來，買辦便是主要的貿易者。他們按照與外國商號簽訂的合同可以雇用自己的職員，與中國內地來的商人打交道，獲取市場情報，辦理兌換業務，負責管理全體中國職員及棧房貨物，甚至代表外國商行同中國關卡打交道。這樣，買辦不僅是外國人在中國這塊地方的代理人，而且也是典型的經紀人，他們能夠作為獨立的貿易者來發展自己的業務。他們的利潤和投資遲早會使他們作為新型的中國商人而踏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因為他們在條約口岸外國勢力的全面保護下是能夠興旺發達的。雖然廣州行商的某些職能已被英國領事接管而為本國船只和國民作擔保，但主要的貿易職能卻落入了買辦之手（他們經管外國商行在當地的大部分業務往來）。[[28]](#_28_Hao_Yan_Ping____19Shi_Ji_Zho)

英國領事館的領事、副領事和一兩個助手或翻譯，基本上來自英國的殷實人家，領事館負有監督和懲戒的職責。根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它的全部工作幾乎都是為了促進商業。領事要規定負責引導船只進出港口的領航員應得的報酬。他要接受和保管船只的執照，并向中國海關報告船只的到達。然后在船只離開時交還執照。領事也要檢查進口貨物，聽取關于課收稅額方面的申訴。他要和中國當局合作確定鑄幣的標準，還要保管一套在領事館應用的度量衡標準器件。他要負責簽發船只之間貨物轉駁的證件。他的職責還包括管理口岸的英國水手，聽取人們對中國和英國臣民的控訴；而且他可以獨自對英國罪犯進行懲處。他有同中國當局合作的其他各種義務，例如執行口岸限制事項；監督土地與房屋的租用；防止走私；引渡犯人；一般地說要在中、英兩國國民之間做調解人。由于同中國政府的一切接觸都要使用中文——包括口頭的和書面的，所以領事就依靠英國譯員充當左右手。像威妥瑪、巴夏禮、李泰國、赫德、麥都思和密迪樂等精干有力的人物，都是循此途徑晉升起來的。

美國是任命商人做領事，因此使英國人在外僑團體中穩占優勢地位，因為商人領事會有直接的利害沖突。在中國人眼里，商人領事就像是買了個幾品頂戴的舊行商一樣，不免對之又慕又恨。因為盡管他們有官員身份，但骨子里仍然是商人；有的英國商人也是這樣：他們通常取得領事身份，代表著那些同中國訂了條約但卻沒有派出領事的西班牙、秘魯、荷蘭、普魯士等國。

條約制度靠武力建立起來，也只有用炮艦外交去維持。這也可以說成是某國使用海軍力量作為威脅手段去支持條約權利中的所謂合法要求的伎倆。這一伎倆典型地表現在1848年上海青浦事件中。青浦位于以上海市為中心的允許外國人活動的半徑范圍之內，有三個傳教士訪問了這個小城。他們受到糧運船民的襲擊，只是由地方官出面才被營救出來。英國領事阿禮國要求賠禮道歉，但中國當局對附近1.3萬多名運貢米去北京的漕糧船民是否要采取行動表現得猶豫不決。英領事于是停付條約規定的貿易稅，還把他唯一的一艘裝有十門炮的皇家海軍方帆雙桅船調來以阻止1400只裝有稻米準備離開碼頭的民船啟運，并要求在48小時內逮捕10名為首的肇事者。阿禮國接著派遣剛好乘一艘炮艦到達的巴夏禮越過當地道臺直接向南京總督要求賠禮道歉。結果總督把這個道臺免職，并對幾個肇事者給以在外國人居留地戴上刑枷一個月的處分。這種對甚至在數量上大大占優勢的群眾使用武力的大膽果斷的行動受到外僑團體的全力支持，雖然此舉在香港和倫敦并不怎么受到贊賞。但阿禮國卻頑強地表示，這是保護在華英國人的唯一辦法，而且以后幾代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也基本上同意他的觀點。[[29]](#_29_Ma_Shi____Zhong_Hua_Di_Guo_D)

炮艦外交揭露了關于中西交往中誰說了算這個反復未決的斗爭。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場最廣義的文化沖突。英國希望的不是把中國當作殖民地來統治，而是要中國按照英國方式在法治精神下進行國際交往和自由貿易，因為這將為英國的商業利潤打開門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在中國古老的社會中進行一場革命，而這一點當然要遭到堅決的反對。

## 英國與廣州的對峙

19世紀中葉英國的高壓政治使治域廣袤但力量不足的清政府威信降低，并危及它的權威。1841年5月的三元里事件（見第四章）就是一個前兆：清官吏對外國入侵者表面上的安撫進一步喚起了排外情緒，并且動搖了老百姓對清皇朝是受命于天的默認。因此在整個19世紀40年代，廣州的清帝國官吏，不得不在英國人及紳士領導的民眾之間左右討好。

在戰爭時期，特別是三元里事件剛剛過去時，紳士和村民聯合建立了民團局來維護地方團練。為此目的，他們在廣州北面組織了一個總局以協調已經在鄰近市鎮（包括八十多個村莊）建立起來的十幾個團練的行動。這個新成立的局（叫昇平社學）經官方承認，湊集了大量的資金，募集了好幾千鄉勇。[[30]](#_30_Ku_En____Zhong_Hua_Di_Guo_Ho)這種由紳士領導的鄉村武裝，對于不可抗御的英國人似乎構成了一個堅強的壁壘。

在廣州的300名左右外國人依舊被限制在號稱十三行的老區長達800英尺的濱江地段以內，那里有約4英畝空地。想到別處去租賃房屋的嘗試，通常總是要碰釘子的。他們可以在河上劃船，但是稠密的人口往往使他們感到窒息。所以英國人下鄉有著很實際的目的，即為了鍛煉、娛樂和體育運動，特別是想獵捕野禽。但由此而招惹的事件不久就滿載在名為《在中國受到的侮辱》這本英國藍皮書中。

既然在朝貢時代斷然拒絕外國人進入廣州城內，那么在1842年以后維持這種禁令，就成了廣州人反抗的標志了。雙方都不斷地扔石頭、毆打和騷亂，在這當中，廣州人的高傲和敵意常常不亞于英國人的魯莽和傲慢。1847年4月，英國公使德庇時爵士終于再一次訴諸炮艦外交，把英國的戰船從香港調來進攻虎門炮臺。36小時內，英武裝力量打啞了清朝827門大炮，進入廣州，占領了十三行。然而他們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乃是耆英同意廣州城門兩年后向他們開放。“德庇時的進犯廣州”就這樣不了了之。8個月以后，6名在民團區域郊游的英國人被殺。耆英立即派兵占領那個村莊，懲辦了兇手。然而他不斷想通過維護英國人享有和平交往的條約權利去安撫英國人的努力，使他似乎成了廣州的撫夷派，而北京卻有理由害怕這種安撫會失去民心。因此耆英于1848年上半年被召回，其繼任者為漢人徐廣縉，徐奉行的是依靠民眾排外情緒的政策。

1849年初當英國人再次要求進入廣州時，徐廣縉在全城及鄉下動員民兵搞自衛，這種高昂的反抗外國人的民氣受到清帝的嘉許。由于巴麥尊沒有做好發動第二次戰爭的準備，英帝國后退了下來。總督徐廣縉與那位表面上氣壯如虎的巡撫葉名琛受到清帝的器重和士紳們的贊揚：英國人十余年來“蹂躪我邊境，追捕我男婦”……若非這些官吏體恤人民，“鼓其勇氣，使之眾志成城，則似此一舉，實不可得”。[[31]](#_31_Xiao_Wei_Ke_Man____1839__186)結果便形成了僵持局面。在19世紀50年代，條約雖已簽訂，但在廣州依舊未生效力。西方的貿易，像以往一個多世紀一樣，繼續在英國人和廣州人之間敵意尚未消除的情況下進行，何況此時一場大規模的起義又已在內地爆發起來。所以新的中外關系的結構是無法在這種舊背景下創立的。

## 中國沿海的騷亂

隨著英國人的新權力在中國沿海邊境的確立，引起了人心向背的變化：一方面是對清政府日益疏遠，一方面出現對外國人效忠的跡象。廣州商人和仆役實際上參與西方擴張的活動，助長了這一人心轉變的過程。當怡和、寶順和旗昌等洋行在通商口岸擴大合法貿易并在口岸外的輪泊處發展鴉片貿易時，他們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從南方招募來的中國幫手。廣州和福建商人也獨立自主地遷往上海，從事合法的與非法的貿易。

這些隨著西方貿易的擴張而遷來的廣州人，不僅語言和風俗習慣不同于長江三角洲，帶有那種異域情調，而且許多人是對外貿易中日益成長的下層社會里的不務正業者和詐騙者。從廈門來的廣州人和福建人，他們出過洋，因為曾是香港、新加坡、馬榔嶼或馬來亞等地的居民而取得了英國國籍，他們也可以要求領事裁判權的保護。這就形成一整個介乎東、西方之間的中國人階層，他們能夠隨時要求外國保護，拒絕接受中國管轄，雖然中國的習俗則堅持各地的中國人都是清帝國的臣民。這樣一來，外國庇護下的廣州人和廈門人便成了中國沿海一帶的特權人物：他們擁有外國武器和與外國人的關系，中國官吏要對他們進行高壓就得三思而行。早期在廈門領事館注冊的英國居民中，大多是華裔及新加坡、馬六甲或檳榔嶼人。這些英籍中國人一旦穿上西服，通常都被認為是受到外國保護的。他們只需簡單地換上西服就儼然有權要求不受清政府的管理，而一旦改著中裝，又可以融合在本地人中間。

但是，利用英國的掩護進行違法活動，只是更大規模的潮流——華南持不同政見組織——的先兆；這種組織首先在貿易路線上，后來在居民當中滋生起來。人口和貿易的增長使政府的管理鞭長莫及，秘密會社遂能迎合那些從事合法貿易的客商之間與日俱增的互助互衛的需要，同時也迎合了鴉片走私商及分享他們利益的衙門吏胥、船戶和盜匪之間的需要。

華南秘密會社一般是三合會或洪門（見第三章）的分支。三合會各會堂大多是獨立的，不受中樞的控制，而且只在他們愿意時才進行合作。但他們的秘密兄弟關系彼此間有一種秘密的語言、口令和暗號，會員即使互不相識，也可憑著這些辦法了解對方的身份：這一切對從事不可告人的生意而到處漂泊的人是特別有用的。松散的三合會網絡組織沒有中樞頭目，肯定是無法對抗政府的，但政府也無法消滅它。它作為地方犯罪的媒介物而滋長起來。[[32]](#_32_Xiao_Wei_Ke_Man____1800__185)

就這樣，在西方商業擴張的半陰影里，一種不法的中國社會成分開始沿著貿易的道路發展壯大起來。三合會會徒成批擁向香港，英國人想在那里把他們管起來。在中國的海域內所樹立的一種以英國海軍為代表的新權威企圖建立一套新的法律統治，但它不可避免地會同時給不法分子提供掩護。舉例來說，就是這些促進了鴉片貿易的廣州人和廈門人，也幫助了苦力買賣的發展。非洲的販奴貿易已被禁止；但新的種植園仍舊需要廉價勞力。結果是產生一種新行業，它用外國船只從廈門、汕頭、廣州或澳門將契約華工運往馬來亞、蘇門答臘或爪哇以及秘魯或古巴等地，為開辟種植園提供勞動力。這一勾當是由廈門的德滴等肆無忌憚的英國商人們推動的；德滴作為英國臣民而享有治外法權的保護，而且他還是荷蘭與西班牙兩國的領事，所以又獲得了豁免權與權勢。

海盜活動這時也隨著沿海貿易的增長而趨于猖獗。到1850年，廈門領事估計，至少有3000名中國海盜活躍在福建沿海。英國炮艦正式進行巡航，追捕海盜，把一批批罪犯帶到通商口岸交給中國地方官。在四年內，英國船只捕獲了大約139只海盜船，并得到英國政府付給的獎金：即對7000名左右被殺或被捕的海盜按每個人頭付獎金20鎊。這種活動只部分地在公海上進行。它也是英國權力代替中國權力的一種表現。但是追捕海盜遇到了真假難分的困難。因為中國漁船隊開始武裝自己以抗御海盜活動，何況有些武裝船只既可充漁民，也可充海盜的角色。

作為抗御海盜活動的保護者而發展起來的護航隊，也變成了一種生意。獲得香港所發英國通航證的武裝船只，開始訂立保護中國漁船隊和貿易船只的合同。例如，105噸的斯派克號雙桅縱帆船，長70英尺，寬19英尺，深8英尺，上有一層甲板和兩根桅桿，它配備著9門炮、23支毛瑟槍、5支手槍、10把彎刀、4支長矛和5根梭鏢，并有11名水手。此船歸寧波的威廉·戴維森所有，懸掛英國旗，帶著由香港總督簽發的有效期為一年的通航證。船長、大副和炮手是英國人，但大多數水手是馬尼拉人。“斯派克”號不怕中國船只，可以為所欲為，但是它不得不依賴中國人去分辨海盜與合法漁民。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中國人的糾紛之中，使英國旗幟被私人目的所利用，但船長、大副和炮手對此并不一定反感。[[33]](#_33_Fei_Zheng_Qing____Zhong_Guo)

不久，英國私人的護航業務碰到了其他外國人——澳門的葡萄牙人——的競爭。到19世紀中葉，后者的十二三艘武裝洋式中國船（有著歐洲式的船身和中國式的帆），不顧澳門葡萄牙人的限制，聚集于寧波江口大肆敲詐勒索。19世紀50年代初，由于臭名昭著的布興有（阿帕克）率領二十幾艘船只組成的廣州海盜船隊在寧波港外停泊，本來在護航業務上就已經相當劇烈的英、葡競爭被弄得更加復雜化了。雖然用慣常的收買辦法把布興有設法安插到了清帝國的水師里去，但他繼續在護航事務中進行訛詐。不幸，中國地方當局未能使這些廣東海盜與葡萄牙人互相火并而同歸于盡，局勢依然沒有被控制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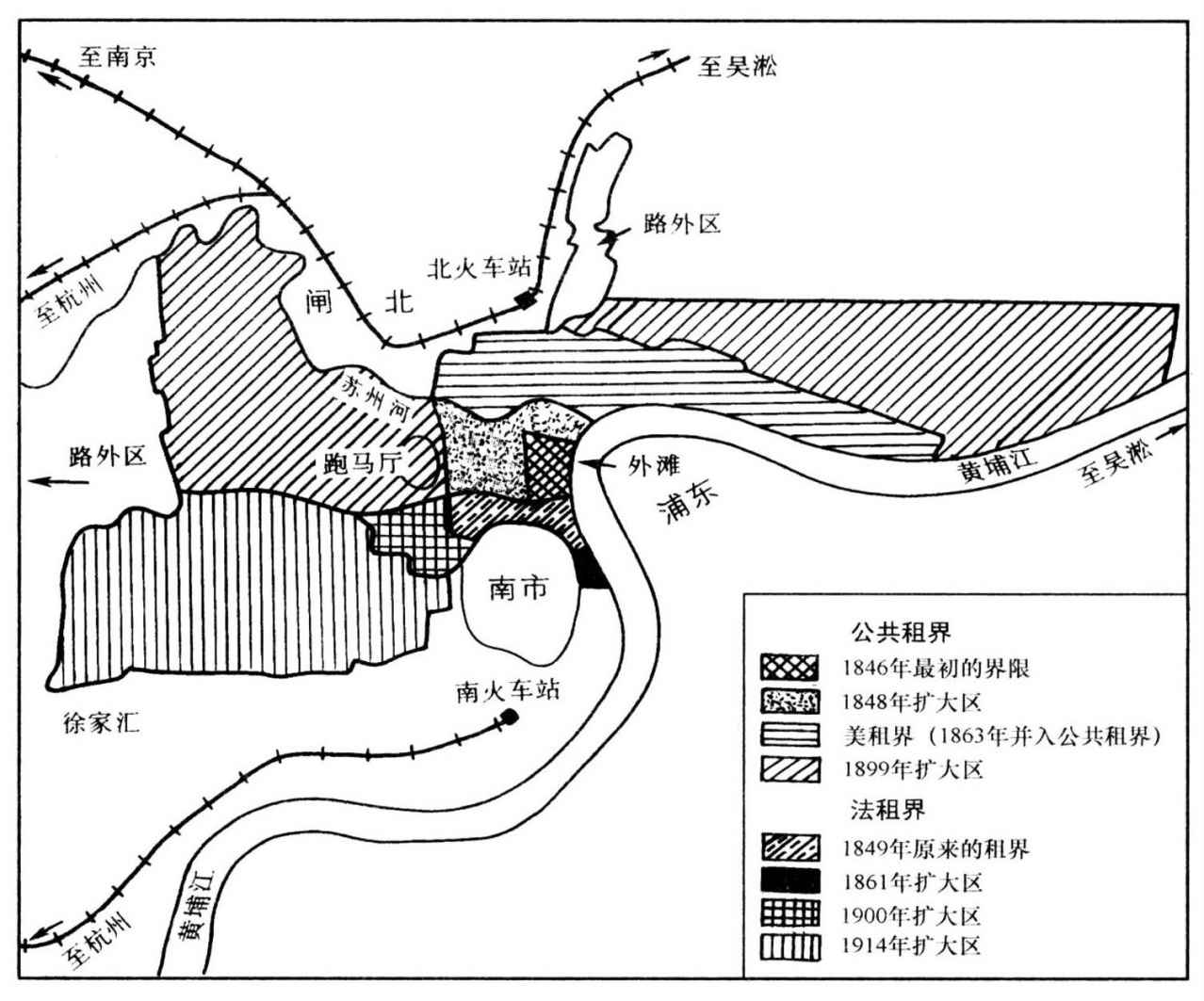
在這種背景下，再加上鴉片貿易非法地日益擴張，以及苦力買賣、海盜活動和護航工作等原因，新的條約制度精心哺育的西方對華合法貿易，受到了貪污和混亂局勢的威脅。在那么多越軌不法事情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實行條約稅則就越來越行不通了。一個肆無忌憚的外國商人既可以用威脅來恫嚇中國的海關稅收人員，又可以接著用利誘以達到互利的目的——這樣干有何不可呢？不能指望中國海關放棄它們一貫撈外快的常規，也不能指望它們執行外國制度去管理他們無法控制的外國人。然而在條約稅則日趨無法貫徹的時候，依賴條約稅則的大商行的貿易利益也就變得更加重要起來。上海成為新的發展中心地點，外國的侵略和中國的軟弱在這種發展中結合起來，創造了新的中外條約口岸制度。

## 上海的興起

上海由一個小縣城的地位迅速崛起而為中國的大都市，這是由幾個因素湊合起來的結果。當然，有一個是地理因素。上海瀕臨一條寬闊的河流，距該河流入長江的江口處約十余英里。它提供了種種港口設施，有一個安全港，由于有通向內地的河道，與內地的交道也相當方便。它位于兩條貿易航道的交叉點：一條是溯江而上直達四川，一條是沿中國海岸從廣州直到滿洲。從國際上說，它是航運的樞紐，從廣州、天津和日本循海路到這里都很方便。它既是巨大的長江流域和華中區貿易的集中地，又是整個東亞的分配要地。從地方上說，上海之所以能夠興起，是由于肥沃的糧倉長江三角洲生產了過剩的糧食；北京的糧食供應就是從長江三角洲通過大運河或繞山東海角北運的。這個全中國最富饒的區域有能力供養一個大都會。[[34]](#_34_Mo_Fei____Zuo_Wei_Jin_Dai_Zh)

19世紀50年代初上海變成一個關鍵地點，中西關系新的力量對比在這里允許英國建立了優勢地位。英國對上海興起的貢獻首先是皇家海軍作出的，它保障了中國和外國財產的安全；其次是英國商人作出的，他們自己賺錢，也給中國幫手和商人提供了同樣的機會。英國領事賦予這些起作用的勢力以合乎法理的和制度的形式。其實，英國領事不過是先作出了這種貢獻而已，幫助他們的有美國和法國的領事，更不用說還有美國和別國的商人了。中國人作出貢獻的則有以下幾種人：中國商人，他們吸引了整個富饒的長江三角洲的地主豪紳的資本；中國的叛亂分子，他們制造了當前的騷亂問題從而引起了外國的干涉；還有那些唯利是圖、投機鉆營的清朝官吏，這些人名義上代表著一個軟弱得不能控制他們的政府。

上海自元朝以來就已經是一個縣城。1871年的縣志就記載，1813年全縣人口約逾50萬，1852年還要多一點。[[35]](#_35___Tong_Zhi_Shang_Hai_Xian_Zh)外國居留地開始開辟于城墻北面一段地區，在城墻同蘇州河（中國人叫吳淞江）及較寬的黃浦江匯合處之間（見地圖8）。早年外國領事和蘇松太道臺之間的有關安排都是很不正規的。不像后來別的口岸的安排那樣，上海的領事們都沒有從清政權那里正式獲得租讓給他們政府的租借區；對于這種租借區，領事們是可以轉手再租給外國國民的。（譬如天津后來辟有八個租界，漢口有五個租界。）上海的情況則不同，雖然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開頭都要求各有各的地區，可是早期的上海租地章程規定，外國人不得購買土地，但可允許他們直接同中國的土地所有者洽商永久租借事項，并通過他們的領事向清當局申報，然后從道臺那里取得租地權。雖然法國居留區被人們稱為“法租界”，并且由法國領事當局進行管理，但這是一點一點地拼湊而成，而不是一開始就作為一個單獨的租界存在的。同時，占優勢的英國人本著自由貿易的精神，在原來138英畝的英國居留地內歡迎任何國家的國民及其領事入境居住，因此它便逐漸擴展成為一個在整個條約制度下列強領事團共管下的國際自治區。由此產生的公共租界是一種獨特的制度，它最后變成了對支配此地的英國人所特有的實用主義精神的頌歌；但是，它形成的過程卻經歷了20年的醞釀期。[[36]](#_36_Fei_Ta_Mu____Fei_Ta_Mu_Dui_S)



地圖8 上海的成長

從1843—1853年在這些小居留區內，除中國雇員仆役或服務行業外，一般不讓中國人居住。中國居民在1853年初估計僅500人，但到3月太平軍占領南京時出現了大批難民。幾千名無家可歸的中國人立即在外灘露宿或住進碼頭邊的小船上；席棚、店鋪和廉價住宅組成的新街道弄堂如雨后春筍那樣涌現，以容納這些人；于是外國居留地很快變成了一個中外雜居的城市。逃避太平軍的難民不僅包括平民百姓，也包括有錢有地位的地主和商人家庭。在以后10年中，被迫離開家鄉的紳士加入到上海社會中來，從而加速了長江下游的地主家庭與外國的接觸和貿易往來。這樣，在西方商人和中國統治階級分子之間便出現了某種利害與共的關系。在上海租有土地的西方人，現在通過把土地轉租給不動產經營者和建筑業者而獲利。到1854年年中，在150棟外僑宅第之外增加了大約8000所中國住戶。

這種中國人大大超過西方居民的中外雜居情況，并沒有使上海居留地退還給中國人來管理。相反，上海舊城于1853年9月7日被粵、閩小刀會起義者攻占以后，外國居留地更加成為難民棲身之所。直到17個月以后，即到1855年2月法國軍隊與清軍把造反者趕出時為止的這段時期，上海的外國居留區始終被騷動和叛亂所包圍。[[37]](#_37___Shang_Hai_Xiao_Dao_Hui_Qi)各國領事雖然堅持中立立場，但他們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承擔地方政府的責任，其中包括涉及中國居民的審判事務。他們對較小罪行處以適當的罰款或收監，比較嚴重一些的案件就移交給中國當局。這時的道臺是廣東人吳健彰：此人原在公行中吳爽官的商行里做過事，捐了官，但繼續在商業上與旗昌洋行的金能亨等人保持聯系。1853年9月7日吳健彰被他的美國朋友救出縣城；此后他繼續和他們合作。一種新的中外利害與共的關系在上海與日俱長起來。除鴉片而外，從西方的進口都減少了，而茶葉，特別是絲的出口，卻由于太平軍破壞了中國國內的需求以及破壞了輸往廣州的路線反而有所增長。

這一切使得當地的中國人甘愿默認外國居留地的自治權，而且還出力幫忙保衛它。這種中外之間的共同利害關系就是上海能成功地取得獨立地位的秘密所在。到1854年，建立新秩序的要素已紛紛出現，而且逐漸形成了一些新制度。

這一套混合的新制度中的一個內容就是海關雇用外國稅務司的原則；根據這條原則，清朝海關雇用外國人做中國的公務員，并監督外國商人遵守稅則和貿易規定。這一大發明當然是長期發展的產物。在1842年以后的時期英國領事在最初階段曾試圖監督英商交納條約稅則規定的關稅。但是這一“領事為了緝私而進行干預”的做法立即引起商人的一片喧囂，因為商人發覺他們可以通過威嚇或利誘中國海關收稅人員的辦法，使雙方在關稅稅額上私下成交，互相得利。用這種辦法“詐騙皇帝”的關稅收入，使守法的外國商人很惱火，認為這是不公平的競爭，但事實證明不可能有什么妙計使中國海關變得清廉，特別是在不誠實的外國人可以用武力相要挾，而善良的中國關員卻缺乏武力的時候更是如此。到1850年，英國政府完全被合法貿易中的中外偷漏關稅的行徑所挫。平等執行條約稅則這一條約制度的基石正趨于崩潰。

在50年代初的第二階段中，上海的英國領事阿禮國企圖用拒付關稅的辦法威逼中國海關，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只能傷害條約制度。第三階段開始于1853年9月7日小刀會的起義，這時海關處于停頓狀態。阿禮國要他的商人用期票繳納根據條約規定應付的稅款，以使貿易能繼續進行。當兼管關稅的吳道臺征得清帝的支持要求納稅的時候，阿禮國領事的這種出具期票的“臨時制度”最后不得不予以廢棄。但是中國政府還不能在上海對外國貿易重新征收有利可圖的關稅，所以吳健彰開始在領事耳目以外的內地對外國貨物課稅。如果長此以往，這種做法就會破壞條約口岸制度。

與此同時，即到了1854年4月，圍攻城內叛亂分子的清軍已開始搶劫和威脅縣城以北外國居留區的外國人。清政府當局無法控制他們。4月4日，阿禮國領事和他的美、法同事一起拼湊了一支由400名水兵和商人志愿兵組成的混合部隊，以四門大炮出擊，在那次所謂“泥灘戰斗”中肅清了居留區的西界。不像廣州的商行區那樣，這里的西方人是能夠控制上海的局面的。

由于美國新監督官麥蓮（在與省當局的談判中他曾與英國人密切合作過）的到來，在軍事—商業領域內也出現了政治家人物。1854年7月12日，上海英、美、法三國領事經與吳健彰談判，終于就建立一種新的制度達成協議。作為關稅監督官，吳健彰負責雇用由領事提名的外國稅務司，使之規定外國商人的納稅額，和過去一樣，它由中國海關銀行接收。作為給他的一種甜頭，吳健彰可以指望從“臨時制度”時期以來所積累起來的關稅期票中收到大約120萬銀兩或39.1萬鎊稅款。（后來經過許多法律交涉，美國的關稅只付了1/3，即118125兩，而英國則分文未付。）最后由于所有這些機緣的湊合，出現了一個又公正可靠、又有效率的海關。從此，外國領事有了法律之治，中國政府也因此獲得貿易稅收。雖然1854年的協定給予領事以關稅控制權，但是英國政府不愿承擔這一責任。不久雙方一致議定，外國稅務司雖然是外國國民，但只替中國皇帝效力。[[38]](#_38_Lai_Te____He_De_Yu_Zhong_Guo)這種新規章所以能在上海實現，部分的是因為在當時萬分危急的境況下，中國當局的代表是一位詭計多端的人物，他成長于廣州的商場上，而不是在正統儒教的熏陶下教養起來的。

第二個改革之所以需要，是由于大量難民流入城鎮，給市政管理帶來了危機。隨著中國貧富不等的人的住宅大量興建，所有城市的弊病以及海員港口所特有的罪惡活動也變本加厲起來。防火防病和維持市民秩序等，沒有一樣不變成了迫切的任務，所以各國領事在1854年7月與吳道臺就制定一項《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取得了一致意見。在早期協定的基礎上，新章程規定領事每年應召集土地出租人開會，討論的事項有：修筑道路、碼頭和橋梁；對這些建筑進行維修和打掃；提供適當的照明設備和排水系統；另外，還要建立一支警察隊伍。年會還受權對土地和房屋課稅，對上岸貨物征收碼頭稅。負責此事的委員會被授予法律職能，即要對違反規定的行為提出起訴和對每年賬目提出報告。這樣就創建了一個貿易商的共和國，它有權在外國領事根據條約進行管轄的規定下進行征稅和警察治安活動，同時還取得了中國政府的默認。當清朝官吏軟弱無能而地方勢力尚未鞏固的時候，在上海的放肆的外國人便得以建立了這一套新制度。

在1854年以后繼續騷動的10年中，中國資本被吸引到了中西商業合作的新中心上海。從廣州來的買辦商人立即遇到附近的寧波（它是個較古老的商業中心，曾經是同日本貿易的中古式的入口港，并且那時還控制著由杭州灣到滿洲的大部分沿海貿易）銀行商號的競爭。山西票號是在地區間（特別是在華北）的資金匯兌方面同官場進行密切的合作；寧波錢莊則不同，它們是在長江下游與沿海及外國貿易發生關系而起家的。它們由早期兌換銀錢的店鋪發展起來，發行可以兌換銅幣或銀兩的匯票，并創辦了信貸，以此來促進貿易。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寧波錢莊通過發展過戶制度而滿足了信貸需要；憑過戶制度，商人在他們的錢莊存折中登記下彼此之間的每日交易，然后由錢莊每晚進行核算，使交易能得到結算和轉賬，這便替信用證券創立了一個粗具雛形的票據交換所。

寧波銀行家早在19世紀初就已在上海貿易中嶄露頭角，后來開始在上海銀行界起顯著作用。當條約口岸的開辟促進了沿海和國際貿易的時候，上海茶、絲貿易的地方金融家大多是寧波人，他們能夠依靠寧波地區舊式商業家族積累起來的資金。鴉片貿易發展了期票和銀行匯票的使用，而太平軍叛亂對長江下游貿易的破壞又給予寧波—上海銀行家們以更多的機會。在條約口岸有自己銀行的外國商人感到必須與本地錢莊合作，以便利用它們的票據交換所組織。而與外國的這種聯系，反過來又有助于使中國錢莊能對政府的控制保持相對的獨立性。[[39]](#_39_Qiong_Si____Ning_Bo_De_Jin_R)

## 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

對比西方在廣州和上海的經驗，有助于說明19世紀中葉外國在中國的作用。在這個時候，清朝主要關心的是叛軍勢力蔓延，而叛亂正顯示了中國政治經濟中根深蒂固的弊病。庫恩先生將在第六章中指出，舊秩序由于結構和環境的多種缺陷而受到損害，受過儒家洗禮的文人學者統治階級終于以不可忽視的活力和獨創性來對待這些弊端。在19世紀50年代，許多主要省份都處于內戰和混亂狀態時，沿海的西方商人、傳教士和軍隊相對地說似乎只屬于邊疆偏僻地方的問題。外國人在火力方面無敵而人數甚少，他們雖然可以打到廣州，甚至最后打到天津和北京，但是他們不能取代中國人口，也不能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來統治中國人。一句話，像從前蒙古和滿族入侵者一樣，英國人也能打入中國的民族混雜的統治階級權力結構之中，甚至到時候還可以在帝國政府中起作用。但是他們只有在中國人的幫助下，只有與統治制度互相適應，而且只有在中國民眾沒有被現代民族主義感情動員起來反抗他們的時候，才能這樣做。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可能迫使清朝給予外國人以條約特權和在中國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從而延長并改造了帝國的政體。但是在1860年之前，北京仍在嚴陣以待，頑固地進行排外。就在清朝全力對叛亂進行鎮壓的同時，西方入侵者仍被視為需要清除凈盡的累贅。

咸豐帝即位于1850年3月，時年19歲，他不久便被災難所壓倒，因此看來他不是一位明智而堅強的領導者。他對外部世界極端無知，徐廣縉（當時是負責對外關系的廣州欽差大臣和總督）煽起民眾的排外情緒使英國人不能入城的成就，深深地打動了他。1850年3月，英國人因徐廣縉違反條約而在天津給穆彰阿和耆英（負責簽訂1842—1844年條約的兩位主要官員）遞交了抗議書。這位年輕皇帝的反應是，以屈服于英國人的罪名斥責和貶抑他父親所信任的這些官員。此后，他支持徐廣縉及其親密同僚廣東巡撫葉名琛的不同西方使節交往的政策。同時他命令上海、南京和天津當局把一切外事活動移交給廣州欽差大臣。北京的這條強硬路線，使巴麥尊于1851年曾考慮過采取武力報復，但是他于12月被免去外相職務，而他在倫敦的繼任者卻并不那么感到需要卷入中英斗爭中去。

1858—1860年英、法聯軍遠征中國之役，是由于1854年雙方共同努力謀求修改條約的談判遇挫而引起的。促使采取這一外交上的努力有以下幾個因素：英國想尋求機會與南京太平軍叛軍進行貿易的希望遭到破滅；1854年和1855年英法在對俄國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實行外交合作和軍事上無暇他顧；美國公使（麥蓮）來到中國，他較他的前任更少懷疑英國人的出爾反爾而愿意與英法兩國共事合作。總的說來，到1854年，外國輿論已經認為不能從太平軍的勝利中撈到什么油水，而英國政府也已決定采取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在法、美兩國同意下，三強企圖通過修改條約來增進它們在中國的利益。結果三國公使于1854年5月到11月之間紛紛在福州、上海，最后在天津，從多方面提出申訴或建議，企圖勸服當時的廣州總督葉名琛。這些努力有助于達成上述上海的地方協定，然而它們在與北京朝廷打交道時卻無效果。1855年2月巴麥尊出任首相以后，在中國的英國活動分子越來越不安分了。[[40]](#_40_Ke_Si_Ding____1833__1860Nian)

葉名琛當時因為要對付廣州周圍的叛亂而陷于困境。他頑固地拒絕英國人進城的要求，所以他在西方的記述中成了一個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詞，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當鄰近的江西、湖南甚至珠江三角洲都被起義所震撼的時候，他在廣州10年的真正功績卻是維護住了清帝國對那里的軍事控制。太平軍于1852年由廣西向長江北進，部分原因也是葉名琛保住了廣東。然而太平軍的榜樣在廣東也引起了一系列叛亂。葉名琛通過向紳士課稅來籌措民團經費以對付這些叛亂，這正反映了廣州地區當時的困難局勢。華南的叛亂促使福建的茶和安徽、江蘇的絲改經較短的路線運至上海，因此，在翻越梅嶺和別的關隘而至廣州的舊運輸線上謀生的船民和碼頭搬運工都被迫失業。和三合會有聯系的秘密會社，像1853年占領過廈門和上海城的小刀會，現在有了用武之地。1854年期間，廣州地區被卷入“紅巾”之亂的漩渦中。廣州城只是由于農村民團局（這是添加在地方宗族結構之上的組織，所以在提供救濟、控制物價和鼓勵生產的同時，還能庇護和組織人民）的效忠才免遭掠奪。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紳士領導之下完成的，原則上要由朝廷批準，實際上總督批準即可。葉名琛在堅持科舉考試，獎勵有功的紳士，處分那些為非作歹的人方面似乎都是公正而有力的。但是一旦“紅巾”被鎮壓，幾萬人便在1855年被處決，廣州的紳士仍舊在地方重新保持權力地位，他們能夠用貿易稅捐支持他們的鄉勇和民團，而農民則比過去更加貧困，經官方批準并由紳士領導的民團已與由紳士資助的鄉勇（他們的所作所為經常無異于老百姓的敵人）合流。[[41]](#_41_Xiao_Wei_Ke_Man____1839__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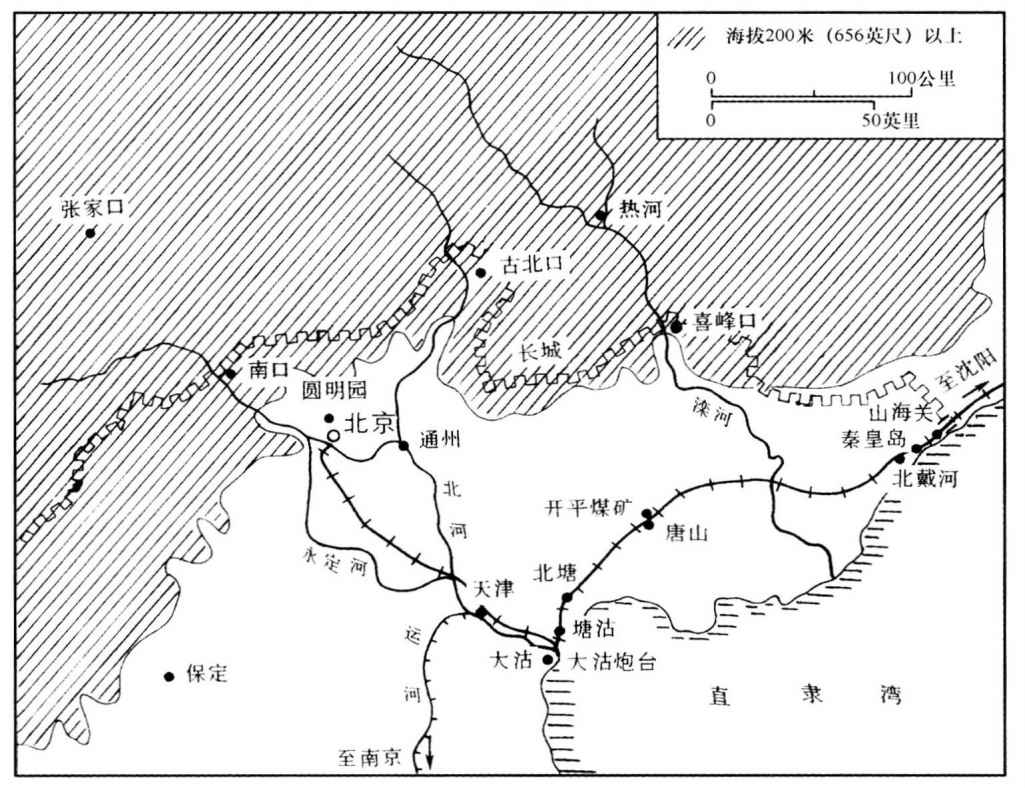
成為1856年10月開戰理由的“亞羅”號事件，便顯示了正在成為中英關系典型的亦中亦英的特征。這種船有外國的船身和中國的裝配。船主是中國人，但他住在香港。船長（甘納迪）是英國人，12個水手全是中國人。“亞羅”號曾在香港登記，但已超過這一年的有效期11天，而根據殖民地條例，它有權在回返香港以前懸掛英國旗。但事實上“亞羅”號不管是否打了英國旗，它當時已參與了海盜活動。葉名琛聲稱他的捕快在扣押船上水手時捕獲了一個惡名昭彰的海盜，這種海盜他曾處決過數以百計。當時巴夏禮領事剛從英國回來，英國的巴麥尊已經同意必須對清政府“提高嗓門”，并且要求中國對即使是最小的侮辱也要立即賠禮道歉。巴夏禮領事有香港總督、當時的自由派領袖包令爵士（他初到中國時曾做過廣州領事）做靠山。包令把自己對自由貿易的熱情同巴夏禮堅決無情的炮艦外交的信念結合了起來。

1856年10月，英國海軍再度攻占虎門炮臺，一直打到十三行。他們用一門大炮每隔十分鐘向葉名琛衙門轟擊一次，他們轟垮了城墻后派遣一支突擊隊沖入衙門，到處耀武揚威地展示其火力威力。然而葉名琛蔑視他們，拒絕同他們談判。后來人們用一副聯語來嘲弄他在這次危機中表現的死頑固態度：“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42]](#_42_Yin_Zi_Du_Lian_Zhe__Jian_Hen)；可是，鑒于他有他的政績，這卻不是持平之論。

政治上的互不妥協此時導致僵局。1856年10月，葉名琛關閉了廣州的海關，貿易陷于停頓。12月，十三行被焚毀。1857年2月末，英國議會辯論包令在廣州的行動。格蘭斯頓和狄斯累里贏得一項不利于政府的動議，但在其后的普選中巴麥尊獲得大多數選票，這似乎表明人們支持對中國作進一步的脅迫行動。然而當年6月派往中國的遠征軍在途中不得不回頭去幫助鎮壓印度的兵變，所以進攻廣州的行動推遲到1857年12月。那時，法國也因中國不公正地判處了一名神甫（馬賴，1856年2月在廣西）的死刑而參加了這次報復。

英法聯軍終于到來，他們總數約5700人。12月28日，他們炮擊廣州城，接著登上城墻，并繞城墻而進。1858年1月4日，他們甚至派遣幾個小隊穿城而過去捕捉巡撫和總督。他們把頑固的葉名琛用船送到加爾各答，葉即在次年死在那里。他們把曾在廣東供職二十多年的蒙古人，即那個謹慎而無傾向性的巡撫柏貴，當作現代第一批傀儡行政官員之一安置在他的衙門里。利用柏貴的名義，一個由能講漢語的委員巴夏禮理所當然地占支配地位的聯合委員會統治廣州達三年半之久，直到1861年10月為止。這個聯合管理機構于1858年2月重新開放關閉了17個月的港口貿易。它派出由中國警察和外國海軍陸戰隊共同組成的巡邏隊，沿街維持城內秩序，而中國人的法律訴訟和別的日常行政事務則繼續由巡撫衙門處理。柏貴的布告由巴夏禮在幕后審查。

北京把這場災難歸咎于葉名琛。朝廷也大體知道巡撫柏貴是受外國控制的，但沒有撤免他或替換他，雖然也派遣了其他官員試圖收復廣州。北京以一種愚不可及的樂觀心理希望廣州鄉村民團能把入侵的外國人趕走，因此新任總督黃宗漢就采取中間立場，想憑借民眾難以和解的反抗精神去限制外國人的要求。這是中國人應用人民主權的方式，即任何政體都要順乎民心，合乎天命。像那些好戰派說的：“國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43]](#_43_Zhu_Feng_Biao_Deng_Ren_De_Zo)要激起由紳士領導的民眾的排外情緒是不難的，但要脅迫入侵者卻是另外一回事。為此目的，清政府需要一如既往地顯示自己軍事上的威力，但這一點已辦不到了。廣東民團局暗中受到鼓勵，終于在1858年7月21日進攻廣州城，但結果還是被英國炮兵擊退。同時主和派在北京已占了優勢，在那里天津條約已被接受（詳下）。



地圖9 19世紀中葉北京、天津地區

沒有得到朝廷進一步的支持，民團運動面臨著聯軍巡邏隊的威脅。到1858年底，巡邏隊越來越深入到廣州周圍的鄉村，旌甲鮮明地穿越村鎮，以炫耀新政權的威風。1859年1月，當700名英海軍陸戰隊員接近民團總部，最后受到炮火攻擊時，英國人派出1300百名步兵和6艘炮艦，在三天戰斗中占領并燒毀了該總部和總部所在的村莊。民團的貢獻開始變得無足輕重了。廣州民眾曾經以排外怒火長期阻止這些陌生人進城，現在開始習慣于英國人和法國人來維持秩序了。紳士領導的民團運動在鄉村也漸趨消亡。由于沒有別的辦法對付這些蠻夷，這里也像在上海一樣，蠻夷們被接納加入地方政權機構之中。

## 1858年的和解

在廣州贏得了對意志力考驗的勝利以后，英法聯軍花了兩年時間使北京就范。向遠征軍供給糧食，意味著要與英、美商號訂立業務契約。它們的代辦為軍事指揮官和外交使節大開筵宴，傳教士也為他們效勞。商人和士兵、政治家和傳教士，共同形成了一個代表他們的文明的西方社會。

聯軍開始從上海北上，盡管北京照例要他們返回廣州。1858年4月，他們用帆船和十幾艘汽輪炮艦裝載幾千名步兵，到達天津下游河口的大沽港外。他們沒有宣戰；只要求談判。特別是額爾金要求清朝談判者像他從英國君主那里獲得“全權”那樣有權。對中國來說，這種意見是奇特的，而且清帝就近在咫尺，所以它也是不合邏輯的；然而它卻是額爾金為取得具有約束力的協定而采取的雄心勃勃活動的一部分。為了支持這個努力，他的炮艦沖破水上障礙攻占了大沽炮臺，在天津登陸。在那里，清朝全權大臣在幾經抗議之后終于在1858年6月與英、法、俄、美簽訂了新條約。俄、美兩國公使作為非武裝的中立觀察員乘坐自己的船只到來，他們也在這樣的條約中幾乎獲得了聯軍通過戰爭取得的所有特權。

英國在天津的主要談判者（與威妥瑪在一起）是年輕的翻譯官李泰國；他是廣州首任領事的兒子，從1855年年中以來，已是上海海關主要的外國稅務司，現在是從中國的這一職位上被“借用”來協助額爾金進行談判的。[[44]](#_44_Ge_Er_Sen_De___Li_Tai_Guo_Yu)當年老的大員耆英受朝廷派遣想背城借一地再次對英國人施展其魅力時，26歲的李泰國便向耆英引用了廣州衙門繳獲到的耆英奏疏中的話，即他曾把蠻夷描繪得多么蠢笨；耆英因此也聞之愧赧。這也有損于朝廷的面子，因而經過審訊，清帝賜耆英自縊而死。

額爾金勛爵要求在北京派駐英國使節，以便越過廣州當局而直接迫使清政府履行條約，以此不僅當作促進貿易的手段，也作為約束英國臣民的手段。他在中國痛恨的是那些“出于最自私的目的而把這一古老文明踐踏在腳下”的人。后來他寫道：“我已經在我的同胞那里看到了比我過去生活中所看到的更多的、使我厭惡的東西。”他認為，英國的外交已經獲得了條約的特權，現在必須制止對它們的濫用。英國人在中國負有義務的這種觀點，更使他有力地堅持在北京有一駐節公使的主張。這是他自己（也是李泰國）的看法。那時在天津的倫敦使節和別國使節都希望解決非經常性地拜會北京的問題；對此清廷也同意，但條件是要按照朝貢使節的章程辦事。[[45]](#_45_Guan_Yu_E_Er_Jin_Kong_Zhi_Zh)

在北京常駐公使的爭論，引起了主戰派文官向清帝痛切陳詞的熱潮。為了維護各君主之間的平等地位，駐節公使勢必要動搖朝貢制度，破壞中國的體制。在6月23日的御前會議上，那些閉目塞聽的主戰派，在面臨聯合軍事力量的事實下卻仍然指責條約中關于駐節公使的條款。但是為了阻止聯軍進攻北京，這項條款已經包括在清方談判者6月26日在天津簽字但尚未經清帝批準的中英天津條約中；清帝是在7月3日批準條約全文的。

清帝的敕令剛批準天津條約全文，外國軍隊和外國官員馬上撤走，甚至比1842年從南京離開時還要快。額爾金勛爵便航行去日本開創英日關系。新的稅則和通商章程于10月底在上海談判（11月8日簽字），中國方面參加談判的包括廣州商人兼官員伍崇曜和潘仕成，以及上海道臺薛煥和總督何桂清（他名義上在南京，實際上在常州）。在中國的談判者當中，這些人既代表廣州沿襲下來的對外貿易的利益，也表現了長江下游官員們對想用關稅收入作為抗擊太平軍軍費的迫切心情。

與這些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咸豐帝現在提出了一個“秘密計劃”，其想法十分天真。他認為貪婪的英國人會放棄條約中關于駐節公使、內地貿易、內地旅游以及提供賠償等要求的條款，以換取清政府取消英國同中國貿易的全部關稅。咸豐帝后來不得不放棄了這種頭腦簡單的想法，但這表明清廷對正在中英關系方面起作用的利害關系是多么無知。1859年1月，何桂清受命為兼管西方關系的欽差大臣：朝廷簡單地把這個做法看成是以上海代替廣州的措施，而拒絕何桂清提出的關于新的崗位應當是專職外交職務的意見。天津條約的主要談判者桂良（1785—1862年）這時在上海說服了額爾金：把英國要求在北京設駐節公使一事應視作可此可彼而不是非此不可者。作為報償，他同意不等互換條約批準書便讓英國人勘察長江。因此，在1858年最后幾個星期中，額爾金與李泰國等人，帶了五艘戰艦，溯江而上航行600英里，通過鎮江、南京、安慶、九江而達漢口，以便選擇最好的新貿易口岸。這次突然勘察，自然引起了各該地抗擊太平軍的清朝官員的驚慌。（天津條約曾經規定，在簽字一年后開放鎮江通商，但在平定太平軍以前不開放其他商埠。）額爾金在議定上海稅則的同時安排長江勘察這一絕招，使人不難看出英中在貿易擴張方面的共同利益具有多么大的力量。

1858年，增進和擴大外國特權的特許狀在天津和上海形成了文字，這主要又是英國的創造。它索取賠款總數1600萬兩；增辟了約三倍的條約口岸；確認外國參與中國沿海和河岸運輸業的罕見權利；允許外國人持有護照在中國內地旅行；在叛亂被鎮壓之后立即開放長江漢口以下的部分（如上述）；規定5%的從價關稅（以別種方式計算者例外）和單一的、稅率為從價關稅一半的子口稅；力主把統一的海關外國稅務司職權擴大到所有條約口岸；最后，還要使鴉片貿易合法化。鴉片貿易在動亂中穩步增長到了這種程度：外國和中國的鴉片進口商聯合要求條約口岸的保護，而中國地方當局現在也對鴉片課以明文規定的進口稅。

這些新條約專門規定了其他許多條款，經驗證明這些都是在中國進行對外貿易活動時值得爭取的東西。但最重要的是，這些條款表明，外國商人及其政府和各條約口岸的清朝官吏之間的利益相通已發展到多深多遠的程度。這種共同利益集中體現在鎮壓叛亂和制定擴大貿易方針的方面，這將給外國商人帶來利潤，給中國當局開辟財源，使清王朝得以掙扎求存。

在英國方面，額爾金勛爵在1858年的談判中發覺他自己被夾在兩個利益集團之間：一方是沙文主義者，即一心想擴張貿易的條約口岸商人；另一方是英國外交官及香港官員和各領事館的官員，他們希望建立一種可行的貿易特權體制，不要做得太過分，以免使中國政府接受不了，或者接受以后而不能維系于不墜。由于外國稅務司作為開辟財源和調停外國商人同中國稅收人員之間的爭執的一個中間環節，已證明它自有其價值，所以它就成為談判者雙方都能接受的東西了。

## 清帝國政體和貿易擴張的對峙

額爾金在1858年所要求的實質上是兩件事：中國市場應該向西方商業開放得更寬些；中國政府應該進入現代的國家體制。在天津修改條約時，他的主要目的是獲得公使在北京的居留權，或至少讓外國公使不定期地訪問北京，以便用外交壓力來維護一整套條約權利。英國人相信，只要在北京有一名公使，便能繞過廣州的排外情緒，從中央獲得清帝的保證，使各省的英國商人和傳教士所希求的貿易、旅行以及交往的權利得以兌現（后來一些外交官承認，他們曾過高地估計了清帝對各省的權力）。由于英國公使提出在北京不行叩頭禮，這個要求便暗示清帝高于所有外國統治者這一陳腐觀念的結束。然而英國人并不想削弱中國政府，他們只要能夠獲得貿易的機會和建立一種現代模式的關系就行了。英國不要求領土控制，并且反對出現瓜分和肢解中國邊沿地區的前景（這一前景在俄國于19世紀40和50年代沿黑龍江進至濱海省以及進入中亞的行動中已可預卜）。

在中國方面，清廷于1858年面臨著致命的國內叛亂危機：它嚴重到如此程度，以致到1860年8月清廷不得不授予漢族人曾國藩以廣泛的軍事財政大權，以指揮全部力量去消滅長江下游心臟地帶的太平軍。北京默認1858年英法提出的要求，這必須從他們優先考慮國內事件這個角度去理解。1861年1月有人在回顧中曾概括說，對北京來說，太平軍和捻軍是心腹之害，蠶食中國領土的俄國是肘腋之憂，而以暴力要求貿易的英國只不過是“肢體之患”。[[46]](#_46_Gong_Qin_Wang_Deng_Ren_De_Zo)英法一旦顯示了他們的軍事優勢，則除了答應他們的條約外是別無其他真正的代替辦法去安撫他們的。

然而清帝國的傳統不能輕易地被放棄，特別是不能被定期來京向皇帝進諫的滿洲王公的非正式會議輕易地加以改變。整個朝廷曾經完全跟著19世紀50年代初高漲的排外情緒和不談判政策走。只有當聯軍從廣州開進天津時，意見才分成死硬派和務實派。一般說來，不當權而又無知的、專以上疏為能事的官員是最狂熱的主戰派，而少數不得不參加談判的不幸者則是最懂得外國火力并每每愿意以審慎行事相勸告的人。

特別是南京總督何桂清比較深知上海的西方人，他懂得英國人只有商業野心，并主張同他們達成協議，以取得他們的幫助去反對太平軍。像條約時期以前的“廣州幫”一樣，這時中國方面又出現了一個“上海幫”。它以關心貿易的上海道臺吳健彰和四川人薛煥（此人從1849年起在上海擔任過要職，從1858年起又在江蘇省一級擔任過要職）為代表。這種新型的重商主義官吏如果不是機會主義分子，也是務實派，他們發現自己同雄心勃勃的英國行政官員如年輕的李泰國有一致的利害關系；李泰國這時已變成了東西方之間的調停人。李泰國作為一個在上海能說中國話的外國稅務司，已經與中國地方官員發展了廣泛的交往。他不但給他們帶來日益增加的關稅收入，也向他們提供關于整個外國問題的情報和意見。雖然西方商人指責他傲慢自大，有些領事把他當成角逐地位的對手而憎恨他，但英國當局卻器重他對中國地方事務的知識，并且支持把外國稅務司的職權擴大到所有商埠的意見。李泰國實際上已經同薛煥制定出1858年的新貿易章程：新章程恰好在長江下游各省因打太平軍而迫切需要軍費時帶來了增加國家稅收的希望。因此，每當戰爭的命運使主戰派的希望受到挫折時，條約口岸各省的清朝官吏則隨時準備以各種理由支持清廷的和平政策。

妥協政策首先受到那些必須辦夷務的人的支持。曾經在四個地方擔任過總督職務并且最有經驗的滿族老官員桂良（1785—1862年）就是天津條約的主要簽字人。清軍的天津統帥僧格林沁是清廷的一位高級蒙古族心腹大臣，他曾經提出的關于聯軍軍事力量的報告是完全合乎實情的。在京都，咸豐帝的兄弟、后來外國人稱為恭親王的奕，也終于成為現實論者的領袖，出來反對大多數的親王。但是，一旦天津條約被接受以及隨著聯軍于1858年夏撤退而放松了壓力，主戰派又重新抬頭了。

這時在北京爭論的主要癥結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系的問題，在廣州爭了那么久的也是這個問題。清廷雖然深感外國力量之強大，但它只能設想外國公使應按朝貢使節的舊規矩前來北京：即作為中國政府的客人三五年來一次，穿中國服裝，通過驛站，由中國官吏護送。稍稍超出這個規定，就會被認為有損于國家體制。由于帝國的統治如此其甚地依靠它的威信，而失掉這種威信就會嚴重削弱它在中國政治和社會中的權力基礎。就是遲至1859年3月，清帝仍舊作出這樣的規定：來北京的夷使所率扈從不能超過10人，這些人不得攜帶武器，也不得在北京坐轎或擺列儀仗隊。[[47]](#_47_Guan_Yu_Qing_Zhao_Zai_Zheng)

到1859年年中，北京的這種不妥協精神同廣州和上海正在進行的切合實際的中外合作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距離。就像以后在1900年的情況一樣，條約制度繼續在外國海軍支配下的商業中心施行，而在清帝國的政治思想中心北京卻受到強烈的反對。廣州民團驅逐夷人的運動的失敗，使受命收復廣州的欽差大臣黃宗漢于1859年5月被召回。也在5月份，傀儡巡撫柏貴去世，穩健派勞崇光正式被任命為廣州巡撫和代理總督；勞崇光在謀求中國利益的同時，又能和聯合委員會合作。

中外合作是適應當時情況的所需，它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勞崇光聯合巴夏禮和那時已是廣州領事的阿禮國共同試圖控制苦力買賣的行動。到1859年，這種買賣的禍害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英國關心的是把合同工運到像英屬西印度那樣的殖民地區去勞動而從中獲利，因此它在19世紀50年代采取了雙重政策：一是促使中國放寬移民禁令，二是定出規章以減輕隨之而來的禍害。但那時在廣州的中國人販子，為了把勞工賣給外國的苦力販運者，竟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苦力家屋門外捉人。正義的中國群眾處死了一些拐騙者，中國官吏也處決了一批。然而存在著當地的失業和貧困以及海外的需要和機會，這些因素匯合起來使移民繼續進行不輟。問題是如何規定一些手續并進行審查，以便使合法的移民在沒有拐騙和脅迫的情況下得以進行下去。

為了這個目的，總督勞崇光實際上已使移民在地方上合法化了，結果是，英、中兩國官吏聯合監督移民所（奴隸收容所）的批準和審查工作，并規定在他們在場的情況下自由簽訂合同。可是廣州的這個制度，受到了澳門及其他不在勞崇光或巴夏禮控制下的沿海地方的洋人和華人的蔑視；因為在沿海地方，接收船像以前從事鴉片進口貿易那樣從事“豬仔”（即人口）的出口貿易。[[48]](#_48_Ai_Li_Ke____1847__1878Nian_Q)對中外合搞的這種公害進行控制的企圖，又給中、英兩國地方當局創造了另一種共同的利害關系。

同時，在上海負責處理與訂約列強關系的欽差大臣何桂清，繼續在制定將予擴大的條約制度的細則。為此目的，他曾經歡迎把李泰國從額爾金的班子中抽回來，他向北京解釋說，李泰國反對走私非常積極，因此作為稅務司而很得罪了一些人；他與額爾金曾沆瀣一氣，并且在天津談判中“大肆猖獗，獻媚于夷首”；但是，“迫回上海，則馴服如昨，為我所用”。[[49]](#_49_He_Gui_Qing_Zou_Zhe__1858Nia)何桂清被任命處理對外的關系，這也使上海的那些注重貿易的官員有了權力。上海道臺吳煦于2月指示李泰國，以三年薪金為擔保雇用外國關稅人員。1859年5月23日，欽差大臣何桂清終于任命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去執行通商章程第十條中“各口劃一辦理”的規定，一被任命的關務人員應該對英國或其他政府保持完全獨立的地位。李泰國曾經充當翻譯陪同額爾金于1858年底上溯長江，也到過南方商討關于在其他口岸設立外國稅務司的問題。1859年5月，廣州海關監督恒祺也要求在那里設外國稅務司。他曾經得到上海道臺吳健彰及其繼任人員吳煦的指導。結果，李泰國把上海的章程帶到廣州，見到勞崇光和恒祺，并且使廣州海關從1859年10月24日起采用上海的章程。12月，清帝接受勞崇光作出的結論，即因為面對著中外串通一氣的事實，要想對廣州貿易課稅，“唯有仿照上海辦法，用外國人，治外國人”。同時廣州領事阿禮國也把一名年輕的翻譯赫德，從聯合委員會調回領事館（1860年6月30日，赫德辭去英國職務，在廣州海關為李泰國效勞）。[[50]](#_50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這一切都是在1859年6月大沽事件爆發以前發生的。中國的外交關系此時正在兩條軌道上進行。

1859年6月，當條約批準書準備在北京互換時，在天津下游大沽的北河口發生了意外沖突，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訊不完備所致。僧格林沁已經用外國大炮加強了大沽的防衛，并且預料外國使節將取道北塘路線北上。但是英、法兩國公使指示要進入大沽，當這一要求被拒絕時，他們試圖使用武力來達到目的。由于準備不充分，加上登陸部隊不久就陷入河邊淺灘泥潭里，英國死傷432人，損失4艘炮艦。英國公使卜魯斯（額爾金的弟弟）后來承認，在他帶往北京去要求批準的條約中所規定的去北京的權利，還沒有合法的根據。看來，和以往一樣，真正的問題仍舊是一場意志力的考驗。

大沽的意外勝利使北京的主戰派重又抬頭。1859年8月天津條約被廢除，目的在于避免四件仍是最感惡心的事，即外國在北京常駐外交代表；開放長江貿易；外國人在內地旅行；以及賠款。這些內容在美國的條約中是沒有的。美國公使（華若翰）已經于1859年8月16日在北京交換了條約批準書；他是以朝貢的方式，乘坐輕便馬車，帶著很少隨從取道北塘來到北京的。清朝要求英、法援例而行。

在倫敦，大沽的慘敗使議會懷疑是否需要派出駐節公使前往北京；但是魯塞爾的政府力主設置駐節公使的絕對必要性。大沽事件使英國的強硬路線得勢。額爾金前此曾因為以最少的流血打開了中國門戶而在倫敦受到盛大接待；這時他不得不回來認真執行這條強硬路線。英、法對大沽失敗作出的反應是在1860年夏派遣一支更大的遠征部隊去華北：60多艘法國船只載運6300名法國士兵，143艘英國運輸船載運10500名士兵，再加上從香港下層社會征召的由2500人組成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廣州苦力隊。聯軍全權大使額爾金勛爵和葛羅男爵拒絕在上海進行任何談判。他們的200艘船只集合在天津口外沿海一帶。8月1日，聯軍沒有遇到抵抗便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陸。他們從這里很快就攻陷了嚴密設防的大沽炮臺，并于8月25日開始進入天津。

## 1860年的和解

額爾金現在依靠巴夏禮充當他的主要翻譯和代表，正如他在1858年曾經依靠李泰國扮演一個桀 驁 不馴的蠻夷的角色一樣。善于從事持久談判的桂良和其他北京使臣來到天津議和，但清廷一如既往力圖頑固地維護朝貢制度的基本規定，提出外國使節（即使他帶有400名警衛）也必須由清政府護送至京，并按照清廷制度給他們安排住宿和供應。在談判的同時，聯軍拒絕停止進軍，也拒絕考慮任何條件，直到他們到達北京以東十幾英里外的運河終點通州為止。在通州，代替桂良在9月17日同巴夏禮進行談判的滿族親王（怡親王載垣）發現，聯軍要求清帝接見，以便交換條約批準書。此時聯軍也發覺，僧格林沁的部隊已經準備了一次伏擊，因此就向他們發動進攻。這樣，9月18日談判破裂。巴夏禮及其一行（25名英國人和13名法國人）一同被扣留，并銬押收監。9月21日，聯軍部隊再一次打敗清軍，逼近北京。第二天，清帝逃出長城前往熱河，留下他的兄弟恭親王來收拾殘局。

巴夏禮被扣押三個星期，受到壓力，但實際上并未受到拷問，而額爾金和葛羅卻迫于形勢，在等待天津運來彈藥。因為現年32歲的巴夏禮有兩年半時間曾經是廣州政府里的首要洋人，所以北京的頑固抵抗者自然要把他視為有權勢的頭子而奇貨可居。他們派遣早年在廣州和巴夏禮同事的海關監督恒祺每天對他進行勸說。遠在熱河的清帝下令要處決人質，但在這一緊要關頭恒祺卻把巴夏禮和其他12個人統予釋放。其余的人被處死，于是額爾金和葛羅決定親自對清帝進行示威性的懲罰：他們燒毀了已被外國軍隊搶掠一空的北京城西北的離宮圓明園。

1860年秋季，北京經歷了一場外交上的紛亂。這時法國和英國在歐洲的對抗很激烈。渴望建立一個帝國的法國人已在越南獲得了立足點，它在中國又儼然充當著羅馬天主教的護法神。[[51]](#_51_Qia_Di____Fa_Di_Guo_Zhu_Yi_Z)同時，狡猾的俄國外交人員為了自身的利益，兩面討好，又替入侵的聯軍獻計，又替中國衛國者出謀劃策。俄國在北京的東正教傳教士團給了俄國外交人員一個左右逢源的好辦法，使之試圖在敵對雙方之間進行調解，或假裝調解的樣子，同時爭取清廷承認他們自己對東北領土的要求（見第七章）。按照列強在中國大魚吃小魚的次序，美國人幾乎要屈居末位（他們曾于1859年以一種不光彩的方式交換了條約批準書），而以承擔主要負擔的英國人居首位，并由他們定調子。

恭親王奕（1833—1898年），是和他的異母兄長咸豐帝在一塊兒長大的，原來激烈主戰；這時在贊同與入侵者和解時卻發覺自己在朝廷中屬于少數派。對京城以外的事缺乏經驗的27歲的奕，這時不得不著手處理王朝的命運了。在有經驗的滿族人，尤其是桂良和恒祺的指點下，他進行北京條約的談判，此約確認1858年的條約文件，并且增加了賠款和將香港的九龍半島割讓給英國的內容。冬季來臨，供應短少，額爾金和葛羅迫于形勢而撤軍。1860年11月，北京條約簽字不久，英法聯軍便離開北京，只在天津留下了一支警衛部隊。英國外交從此便致力于支持由恭親王為首的對外和平妥協派。英國人已經避免了一次封鎖：這種封鎖本來會給在南方與他們十分順利交往的商人階級帶來損害的。現在他們力求加強已經和他們簽約的北京掌權者的地位。這樣，另一個中外聯合而治的創始期便得到了鞏固。

朝新秩序的最后轉變，在第二年也未能實現。咸豐帝拒絕回北京，從而回避了對居住在那里的外國公使的覲見與叩頭的問題。1861年8月，咸豐帝去世。在熱河的幾位親王領袖作為新立幼主的贊襄政務大臣而掌握了大權。但在11月，兩位皇太后在一次政變中和恭親王合作，逮捕了諸攝政王，并處死了幾個主要政敵（見第九章）。這樣，一個新的領導班子控制了朝廷。它這時才著手同在北京的新的外國公使以及同在華中對太平軍作戰的部隊新統帥打交道。入侵者受到撫慰，但清朝的生存命運仍然取決于能否鎮壓這場大叛亂。

進一步的研究會表明，19世紀50年代末中國對外關系中的主要事件應該是中外貿易團體的建立，但它在引人注目的炮艦、士兵和外交人員這一調兵遣將事實的掩蓋下竟未被注意。即使在這個戰爭和不安定的時期，貿易量和貿易值仍有所增加（雖然增加得不穩定），但能夠為共同目的合作共事的人員，在兩方面都出現了：中國方面出現了商人、買辦和條約口岸的官員；外國方面出現了商人、領事和傳教士。這樣，受過英國教育的廣東人唐景星就在1857—1861年間做了上海海關的翻譯和首席秘書（唐景星后來是查頓的主要買辦和李鴻章所創官辦的輪船局的負責人）。1857年起任上海道臺的薛煥，在1860—1862年是江蘇巡撫和欽差大臣，1863—1867年又在北京總理衙門任職。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

用炮艦外交，即用陸軍和海軍的高壓手段開創的不平等條約制度，使訂約列強在中國獲得大量特權。這種特權到1860年被確立，即訂約列強國民的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外國對條約口岸租界的管理權；外國軍艦在中國水域航行和外國軍隊在中國土地上駐扎的權利；外國在中國沿海貿易中的航運權及內陸航行權；受條約限制的關稅稅率等等。在以后年代中增加的外國權利和特權，又進一步縮小了中國主權的范圍。[[52]](#_52_Guan_Yu_Bu_Ping_Deng_Tiao_Yu)優越的外國力量——一般地包括商業、財政、軍事、工業和技術等方面——將帶著破壞性的力量日益加緊向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進行沖擊。

在回顧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時，我們可以看到清朝的幾個虛弱方面：第一，與西方列強相對抗的清朝的軍事力量和行政能力在內亂激烈的時期漸趨崩潰。內亂的確引起了外患。第二，根本弱點是思想和體制方面的，也就是對外國的現實一貫無知，并且存心不去考慮這一現實。最彰明較著的證明就是他們愚不可及地主張，清帝國的政體應高于所有外國的君主。北京拒絕以平等態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時才在不平等條款的基礎上被巧取豪奪。

必須把1860年以后的條約制度視為中國政體的一個特殊部分，中國的主權在這里不是被消滅，而是被訂約列強的主權所掩蓋或取代。在整個中國內地，政治經濟的傳統部分很少有直接的變化。同樣地，在對鄰近國家的關系方面，朝貢使節繼續前來北京，好像什么也沒有發生似的。從1860—1894年，朝鮮向中國朝貢的年份有25年，琉球8年，安南（越南）5年，尼泊爾4次，緬甸1次。但與此同時，在沿海和上溯通航河流凡受到現代影響而發達起來的地帶，尤其是在條約口岸，一種新的混合政體已經形成。炮艦在條約口岸和水路航線上代表著外國的權力。外國軍事力量在中國的增長，后來也促使清朝逐漸采用西方武器裝備它的軍事力量，并且最后裝備汽輪而形成了一支海軍。然而這一切已經為時太晚，不能拒外國人于國門之外了。

在經濟方面，混合的中外秩序最初主要限于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合作的對外貿易方面。當然，在對新興的口岸城市的管理方面，還有一個外國領事的因素在起作用。既然英國駐北京的公使和駐條約口岸的領事就近掌握有皇家海軍的炮艦，他們此時已是中國權力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在總稅務司監管下的中國海關既同中國又同外國有關方面進行密切的合作，就完全是可行的了。回顧一下利用非中國人來管理中國對外貿易的這些豐富的歷史先例是有必要的。譬如說，蒙古人征服南宋以后，斡脫，即中亞穆斯林商人的行會，在“與蒙古貴族的合伙關系”中行使承包租稅的特權；到13世紀80年代末他們開始“在海上商業方面……起領導作用”。[[53]](#_53_Shu_Man____Yuan_Dai_De_Jing)1860年以后，商埠中的稅務司既是中國海關監督的行政上的同事，又是外國領事的社會上的同仁。赫德在北京是總理衙門的雇員和總理衙門首腦恭親王的顧問，同時又是英國公使的同胞和親密顧問。

## 條約制度的實施

作為滿族談判者在1860年秋末同英國人打交道時，年輕的恭親王及其年老的同事桂良與文祥開始理解怎樣才能在內憂外患的困境下保存王朝的利益。當聯軍從華北撤退時，英國獲準開始在長江的鎮江到漢口一段進行貿易，而無須根據條約的規定，要等到平定叛亂以后。這種超越條約范圍的讓步，是幾種不同的動機湊合成的：即這樣做，額爾金勛爵和他的弟弟英國新任公使卜魯斯爵士能夠滿足上海商人進入中國廣大內地市場的要求；抗擊太平軍的各省當局能夠指望在上海對長江貿易課稅而增加稅收，而清廷的想法正如恭親王所說：英國人“不但不慮其為害，轉可以為我所用”。[[54]](#_54___Qing_Dai_Chou_Bei_Yi_Wu_Sh)威妥瑪推測北京的想法是，由于英國的貿易特權已為北京所認可，太平軍對貿易的課稅就會遭到反對，這就會引起太平軍與英國的對抗。

在北京的允許下，由巴夏禮及艦隊司令賀布率領十艘海軍艦只，由海關發給通航證，于1861年2、3月間沿長江上溯，以安排英國同鎮江、九江和漢口等口岸的貿易事宜。然而武器是嚴格控制的。南京太平軍也同意讓英國在長江貿易。在上海或鎮江征收新開放的長江貿易稅。但長江貿易立刻增加了關稅管理的問題。英、美商人已獲得領事館的特許，讓租來運輸茶葉到長江下游的中國船懸掛他們的旗幟。這一促進合法貿易的讓步，立即被肆無忌憚的外國走私者所利用，他們“懸掛英國旗以逃避本地關卡課稅……又偽裝本地船只以逃避海關課稅”。[[55]](#_55_Di_An____Zhong_Guo_Yu_Ying_G)

卜魯斯和恭親王得到赫德的幫助，于1861年年中商定了新的貿易章程，使英國在內河的貿易得到促進，而私運和販賣違禁品給叛軍的弊病卻受到了限制。恭親王上奏給清帝說：“此中撮合之處，則赫德為力居多。赫德雖系外國人，察其性情，尚屬馴順，語言亦多近理。且貪戀總稅務司薪俸甚巨，是以尚肯從中出力。”[[56]](#_56___Qing_Dai_Chou_Bei_Yi_Wu_Sh)

從這時起，英國的那些敢作敢為的商人同英國政府之間就經常發生政策爭論。額爾金勛爵在1858年曾從香港檔案中清查出1852年米切爾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認為，中國商業的自給自足性質使商人在華大量銷售商品的希望完全成為幻想。但是隨著貿易中的一切障礙都已排除，額爾金勛爵預言道：“掌握機器制造法的西方，將把地球上最齊全最費工的制成品提供給這一民族。”[[57]](#_57_Pei_Er_Ke_Wei_Ci____Zhong_Gu)但是，希望不應當太高。英國人和清朝方面都有得與之作斗爭的極端分子，并力圖要他們就范。英國官員的主要問題是去安撫那些援引自由貿易原則以支持它們用一切手段（合法的與非法的）去剝削中國市場的商行。同時，清政府也不得不一方面同要求把英國人趕出去的愛國的或排外的紳士作斗爭，一方面要與形形色色的唯利是圖的漢奸、商人和鴉片走私者作斗爭。

到19世紀60年代初，條約制度的潛在力量日趨明顯：外國人控制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匯兌；外國的土地出租者在貿易中心（如正在成長為中國主要城市的天津、漢口及廣州、上海等地）占有不動產；代表進步技術的最新式的外國輪船速度更快，防衛海盜襲擊的能力更大，提供的保險措施更可靠，它們同中國沿海和內河水域的舢板船展開了競爭；獲得免納厘金稅的過境通行證的外國商人成為內地中國商人的庇護人；條約稅則嚴格限制中國課加外國貿易的稅額，而新的海關將保證競爭的平等地位，并提供現代港口和航運設備，以及貿易統計數字和對某些爭執的調停；同時，由于汽船的速度增加了，電報和海底電纜由歐洲逐漸推廣到遠東，這些因素把中國貿易更加徹底地納入世界市場，并受到世界市場變化波動的影響。在中國的外國人有人身與財產的治外法權的保護，所以在1860年以后，他們作為清帝國的多種族統治階級的一部分而能夠維持并擴大其作用。其結果與其說是用殖民地方式對中國進行剝削（它著重對原料和利潤的榨取以及為西方官員提供職位），毋寧說是有特權的外國人參與了使中國人生活西方化的嘗試。這至少會產生與經濟效果同樣重要的心理反作用。由于保守的清朝官員和紳士的失職，在中國國門以內的外國人在某些情況下是能夠或希望能夠成為這個國家的“現代化的促進者”的。[[58]](#_58_Guan_Yu_He_De_De_Nu_Li__Jian)

（龍小同 譯）

[[1]](#_1_4)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6章。

[[2]](#_2_4)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第69頁，引用了怡和洋行的檔案。

[[3]](#_3_4)費伊：《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第3頁；比欽：《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第132頁。

[[4]](#_4_4)巴麥尊于1830年11月至1834年12月、1835年4月至1841年9月、1846年7月至1851年12月任外相；1855年2月至1858年2月、1859年6月至1865年10月任首相。

[[5]](#_5_4)韋伯斯特爵士：《巴麥尊在1830—1841年的外交政策》，第792頁。書中對英國的對華政策尚未從它的全球戰略角度來加以研究。

[[6]](#_6_4)塞布斯的《耶穌會士與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第154、285頁）引用了富克斯的材料；曼考爾：《1728年以前俄中兩國的外交關系》，第252頁。

[[7]](#_7_4)南京條約的中、英文本，在這幾點上的內容實質上是一致的。見中國海關所編《中外條約協定匯編》。

[[8]](#_8_4)關于“羈縻”問題，見楊聯升的文章，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31—33頁。關于魏源，見倫納德和米切爾的文章，載《現代亞洲研究》6.2（1972年4月），第151—204頁；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

[[9]](#_9_4)1842年5月19日收到的耆英的奏折，載《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47，第22、23—24頁；參閱《孫子·謀攻》。

[[10]](#_10_4)耆英致璞鼎查函，璞鼎查信函，1843年第142號，外交部檔案17/70。

[[11]](#_11_4)見余英時《漢代的貿易與擴張》，第10、43頁。

[[12]](#_12_4)璞鼎查信函第74號，1843年7月5日；第85號，7月19日，外交部檔案，17/63；又見璞鼎查信函，第142號，1843年，外交部檔案，17/70。以上引自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第1冊，第111—112頁。

[[13]](#_13_4)中國海關出版的英文本與中文本之附加條約（見上面注7——[參見此處](#_7_Nan_Jing_Tiao_Yue_De_Zhong)），“與英國公使館保存的原文核對過”（第17頁）。海關出版的這一中文本與得到北京御批的摘要（《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69，第27—34頁，1843年11月15日的奏折與諭旨）對照起來，有許多歧異之處。見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第125頁。

[[14]](#_14_4)璞鼎查信函，第40號，1843年4月29日所引一位“與貿易毫無瓜葛”的通訊員的話，外交部檔案，17/67。

[[15]](#_15_4)船長霍普1843年4月21日于哈丁頓寄阿伯丁的信，外交部8月12日檔案，17/75。

[[16]](#_16_3)馬地臣于1843年4月22日給麥克米尼斯船長的信，中國沿海書信集22/4/43，怡和洋行檔案，劍橋；又見歐文的《英國在中國和印度的鴉片政策》及斯賓士的《清代吸食鴉片概況》，載小韋克曼和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和統制》。

[[17]](#_17_3)關于翻譯的文件，見斯威舍《1841—1861年中美關系研究》。關于顧盛的談判，見古利克：《伯駕與中國的開放》第8章；丁名楠等：《第一次鴉片戰爭》，載《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Ⅰ（1954年7月），第114—142頁，特別是第143—146頁。

[[18]](#_18_3)格羅士-阿肖夫：《耆英和拉萼尼的談判》，第74頁。確切的報道見魏景星（音）的《1842—1846年法國在中國的傳教政策》，第305頁。

[[19]](#_19_3)關于這次流產的海軍改革，見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第2章；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第16—38頁。

[[20]](#_20_3)陳鍫：《黃恩彤與鴉片戰后外交》，載《史學年報》卷3第2期（1940年12月）。

[[21]](#_21_3)德雷克：《徐繼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學》。

[[22]](#_22_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第24頁。

[[23]](#_23_3)例如見耆英對地方官吏下達的求和之札，1842年5月20日，文件145，載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史料匯編》。

[[24]](#_24_3)費正清：《中國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條約制度》，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67頁。

[[25]](#_25_3)梅耶等編：《中國和日本的通商口岸》，第364頁。關于早期的通商口岸，見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以及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關于全面的數字，見嚴中平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41—48（商埠、第49—56頁（租界）。

[[26]](#_26_3)費伊：《鴉片戰爭時期的法國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載《現代亞洲研究》卷42（1970年），第115—128頁。又費伊《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第8章，第23頁。

[[27]](#_27_3)洛克伍德：《1858—1862年的赫得公司》。關于通商口岸的通貨，見弗克蘭·金《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

[[28]](#_28_3)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橋梁》，第51頁等處。

[[29]](#_29_3)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卷1，第392—393頁，摘自英國藍皮書《在中國受到的侮辱》。

[[30]](#_30_3)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71—76頁。

[[31]](#_31_3)小韋克曼：《1839—1861年中國南方的社會騷亂》，第104頁引用了1849年5月11日散發的一份中文揭帖。中國官員與接連幾任英國公使的通訊往來以及他們對廣州紳士及民眾的告示，已由佐佐木正哉從英國檔案中編輯成《鴉片戰爭后的中英抗爭資料匯編》。

[[32]](#_32_3)小韋克曼：《1800—1856年廣東的秘密會社》，載謝諾編《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850年》，第28—47頁。倫敦檔案局的中國文件，已由佐佐木正哉發表在《清末的秘密結社資料匯編》一書內。

[[33]](#_33_3)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第338—346頁；第17—18章中所有有關部分。

[[34]](#_34_3)墨菲：《作為近代中國鎖鑰的上海》。陳德昌在《歷史研究》1957年第1期第58頁中提出，早在13世紀，上海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港口。

[[35]](#_35_3)《同治上海縣志，1871年》卷5，第9頁。關于從1190年建縣以來上海縣的發展，參看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卷1，第53頁及有關部分。

[[36]](#_36_3)費塔姆：《費塔姆對上海工部局的報告》摘要，第2章。

[[37]](#_37_3)《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收有《北華捷報》及其他西方記載的大量譯文。

[[38]](#_38_3)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91—110頁；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第431—461頁。

[[39]](#_39_3)瓊斯：《寧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錢莊》，載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第47—77頁。

[[40]](#_40_3)科斯丁：《1833—1860年的英國與中國》，第114頁及以下各頁，第180頁及以下各頁；格雷戈里：《英國與太平軍》第1—4章。

[[41]](#_41_3)小韋克曼：《1839—1861年中國南方的社會騷亂》第13—15章；J.Y.W.黃的《1807—1819年葉名琛的政治經歷》（1971年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博士論文）引用了1858年繳獲的廣州督署檔案，現存倫敦檔案局，外交部檔案第682號；又可看黃的《兩廣總督葉名琛》一書，劍橋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

[[42]](#_42_3)引自杜聯哲，見恒慕義編《清代名人傳》，第905頁。關于“亞羅”號，見J.Y.黃《亞羅號事件的再評價》，載《現代亞洲研究》。8.3（1974年），第373—389頁；J.Y.黃：《巴夏禮與中國的亞羅號戰爭》，同上書，9.3（1975年），第303—320頁。

[[43]](#_43_3)朱鳳標等人的奏疏，1858年6月30日，《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27，第31頁。

[[44]](#_44_3)格爾森的《李泰國與中英關系》一書引用了李泰國、額爾金勛爵與卜魯斯爵士的文件。

[[45]](#_45_3)關于額爾金控制中國通的斗爭，見徐中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1880年》第5章。關于引述語，見沃龍德《額爾金伯爵的書信與日記》，第212—223、252—253頁。

[[46]](#_46_3)恭親王等人的奏折，1861年1月13日收文，載《清代籌備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1，第18頁及以下各頁，部分翻譯見鄧嗣禹和費正清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48頁。

[[47]](#_47_3)關于清朝在政策上的考慮，見徐中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第6—7章；以及坂野正高《總理衙門的起源》，第29—30頁。

[[48]](#_48_3)艾里克：《1847—1878年清朝對苦力買賣的政策》（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71年），第110—161頁。

[[49]](#_49_3)何桂清奏折，1858年10月5日收文，載《清代籌備夷務始末·咸豐朝》卷30，第44頁及以下各頁；斯威舍：《1841—1851年中美關系研究》，第522頁。

[[50]](#_50_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45，第37頁，1859年12月2日收文的奏折。到10月，恒祺邀請赫德去做廣州的副稅務司，見廣州類39函件Ⅰ，外交部檔案，682/1785。李泰國被任命為總稅務司是由恭親王根據清帝1861年1月的御批追認的。

[[51]](#_51_3)卡迪：《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

[[52]](#_52_3)關于不平等條約的不同界說，見邱宏達《中國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對不平等條約看法的比較》，載J.A.科恩編《中國對國際法的實踐》。

[[53]](#_53_3)舒曼：《元代的經濟結構》，第4、224頁。

[[54]](#_54_3)《清代籌備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0，第5頁。迪安：《中國與英國：1860—1864年的商業外交》。

[[55]](#_55_3)迪安：《中國與英國的商業外交》，第54頁。

[[56]](#_56_3)《清代籌備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9，第21頁。關于赫德作為清朝官員的最早中文通訊（其文風華贍，但尚屬準確），見上海道臺吳煦的文件《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第204頁。

[[57]](#_57_3)佩爾科維茨：《中國通和外交部》，第18頁，這里引用了額爾金在上海的講話，載外交部檔案17/287。

[[58]](#_58_3)關于赫德的努力，見費正清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1868—1907年的中國海關》。關于條約港口的許多雄圖大計在后來受挫的情況，見墨菲《西方外來者在印度和中國的經歷》。

# 第六章 太平軍叛亂

## 起因和發展

太平軍叛亂（1851—1864年）在許多方面是中國前近代史與近代史之間的轉折期。它在國內引起的人類巨大災難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條約關系形成的背景，并且和條約制度本身一起宣告著中國的傳統制度崩潰在即。叛亂的某些原因是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的，另一些原因則出自清代特有的一些問題。社會嚴重的不公正，帝國和地方行政當局的衰敗以及官僚政治道德的淪喪，所有這些都是歷次王朝危機共有的問題。而人口劇增和人口大量內部遷移，則是清代特有的問題。從18世紀以后出現的社會混亂和國內民族間的相互沖突中已可見到這些問題的后果。此外，與外國接觸本身還提供了一種新的歷史催化劑，那就是強烈地沖擊著中國現存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的外來宗教。統治階層應付這種沖擊的方式決定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社會環境。

### 社會背景

19世紀40年代充斥于廣西省的社會混亂，部分地肇端于與外國接觸所產生的破壞性后果，部分地為該地區獨有的社會復雜性所使然。從1795—1809年，南方和東南沿海一直飽受海盜之患，有些海盜是安南（越南）的沒落君主們糾集的。在廣西，那些海盜與三合會建立了陸上聯系（見第三章），這樣便形成了一種無法無天的復雜形勢。此后不久，當毒品買賣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開始興盛時，中國南方的社會下層又競相從事更有利可圖的鴉片銷售業。鴉片戰爭后的十年間，鄰省廣東出現了新的社會失調。由于上海的開放使廣州北上的傳統貿易路線改了道，因此數以千計的人喪失了生計。被雇來跟英國作戰的鄉勇突然被遣散，許多人只得落草為寇。最后，一幫幫冥頑不馴的海盜迫于英國海軍勢力而由沿海地區流竄到內地。到了40年代中期，這幾種來源的非法之徒中的許多人，在三合會領導下設法西進至廣西。他們在廣西的河網上建立了新住所，并作為“艇匪”將一種新的暴力成分帶到了早已動蕩不寧的社會環境中來。

第三章已經論述，由于秘密結社和教派的活動與國內民族間的不和牽扯在一起，故那個環境正變得愈來愈有爆炸性。這是一個不祥之兆，因為它意味著那些被遺棄的社會集團現在接觸到了許多復雜的新思想，使他們的生存斗爭獲得了政治的內容。這種新形勢首先在少數民族雜居的湘桂交界地區初現端倪。1836年湖南南部的新寧、武崗地區由于爆發了藍正樽（瑤族的部落民，也是新近由四川遷來的白蓮教信徒的首領）領導的叛亂而陷于騷亂。藍正樽的起事遭到了鎮壓，但他這教派幸存了下來，后來在另一位瑤族領袖雷再浩領導下又東山再起。雷再浩的集團更龐雜，除藍的老幫伙外，還包括三合會的骨干（鐵板），此外又越過廣西邊界與漢人三合會建立了聯系。雷再浩的反叛發生在1847年，從而表明三合會對少數民族的滲透是相當成功的。[[1]](#_1___Xin_Ning_Xian_Zhi____Juan_1)

雷再浩的起事這一次是遭到了地方紳耆領導的民團的殘酷鎮壓。然而邊界地區的叛亂之火還在燃燒。1849年發生的饑荒使暴力行為再度爆發，而這次是由雷再浩的老三合會信徒、一個名叫李源發的人領導的。李源發本人似乎是漢人，但他沒有忘記運動最初是在窮苦無告的少數民族地區起事的。在對新寧進行了徒勞無功的圍攻后，他和同伙開始了一場穿過湘、黔、桂所轄13個縣的遠征，試圖發動窮苦的漢人和土著居民。新寧叛亂這出悲劇以李源發的最后受挫告終。但少數民族集團中教派活動的形式不久重又出現，這次采取的形式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種中西合璧的新的教派傳統被傳到了外來的客家人之中，客家人語言獨特，是一個少數民族的支派。

長年不斷的盜匪活動以及客家人和本地人的村社之間愈演愈烈的仇殺，結果使廣西社會在40年代后期很快趨向軍事化。形形色色的武裝集團在農村到處出現。除流動性匪股以外，地方三合會分會（堂）也自行武裝起來搞小搶小掠和進行自衛。鄉紳們確信他們不能指望從貪污無能的官方得到援助，于是便建立了地方防御聯合組織（團），由它們來領導村社事務和動員民團。某些被稱為團的民團本身與非法之徒毫無區別，一樣趁機走私和攔路行劫。因此在地方上，堂和團是難兄難弟的組織形式，并不總是涇渭分明的。對客家人來說，所有這些對手都是敵對分子。由于植根于客家人中的一個新的教派——拜上帝會——的活動，這種緊張局勢日益加劇，因為這個教派激烈反對偶像，這在某些嗅覺敏銳的鄉紳看來，它顯然離經叛道，很危險。

廣西農村的分裂就發生在那些越來越束手無策的官僚的眼皮底下，他們竟力圖采取不介入態度，規避風險。由于深信紳團與拜上帝會之間的敵對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南方省份的種族仇殺，所以他們下達了一道命令，一律禁止械斗。有關盜匪的活動被報了案，但不是充耳不聞，就是在盜匪遠走高飛以后很安全的時候才去進行調查。1850年，被激怒的廣西鄉紳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北京，爭取到了官方對他們自己的地方防衛努力的有限支持。這樣一來，廣西的廣大農村地區便聽任自流，完全不受官方的控制了。無論是征集賦稅還是維持秩序，地方衙門對這兩項主要任務都無法有效地執行。以強凌弱，肆無忌憚，太平天國叛亂就是從這個亂世中出現的。

### 洪秀全的夢幻和金田起義

有清一代這一最大的叛亂，雖然久已孕育于時代的社會危機之中，卻是由它的創始人早期經歷中的一些離奇而偶然的事件發動起來的。洪秀全（1814—1864年）出生于廣州北面約30公里的花縣，是一個小自耕農的兒子，他的客家人祖輩是18世紀從廣東東部移居這里的。洪秀全勤奮好學，胸有大志，1827年第一次參加在廣州舉行的科舉考試，時年14歲。但像大多數同考的士子一樣，他也沒有取得生員身份。1836年，再次應試時又名落孫山。就在第二次在廣州應試時，他邂逅遇到了一位外國傳教士（可能是美國人史第芬）在傳布福音，還得到了共有九本的一套小書，題名為《勸世良言》。這部著作不僅對他的未來，而且對他的國家的未來，也起了決定性作用。

這小冊子的作者梁阿發（1789—1855年）是廣州人，受教育不多但生性熱情，他在當印刷所的雕刻工時結識過廣州英國長老會傳教士馬禮遜。1815年梁阿發隨馬禮遜的同事米憐赴馬六甲，米憐后來就在那里創辦了英華書院。在馬六甲期間，梁阿發在宗教上的那種永不寧靜的沖動一度使他轉信佛教，在一位云南和尚的指點下研究佛理。但由于米憐的再三勸誘，他逐漸改信了原教旨主義福音派的新教，受洗后當上了傳教士和布道師。他的《勸世良言》發表于1832年，同時在廣州和馬六甲印行。[[2]](#_2_Guan_Yu_Hong_Xiu_Quan_De_Zao)

就我們所知，梁阿發的這本小冊子是洪秀全宗教夢幻的唯一文字根源，而且很可能是他在1847年得到圣經譯本以前的唯一來源。因而它的內容對太平天國叛亂的歷史特別重要。這部著作在撰述上很沒有條理，大段大段引文取自馬禮遜和米憐的圣經譯本（用的是晦澀費解的古文），中間又插入梁阿發用白話文寫的許多注釋性說教。由于不怎么注意先知傳說和福音故事按年代順序排列的結構，因此這本圣經題材的介紹雜亂無章。材料主要取自使徒書，其次有舊約的先知書、《創世記》和四福音書。把天父耶和華的性格描寫得很突出，但耶穌的性格卻大大地被輕視了。這部著作用刻板的原教旨主義詞句精心地勾畫了諸如上帝的全能、罪惡和偶像崇拜的墮落，以及在靈魂得救或罰入地獄之間進行可怖的選擇等等教義。

在福音的外觀下，梁阿發的《勸世良言》含有許多嚴肅的政治寓意。首先它一再暗示，由于長期的道德衰退過程，整個中國社會正瀕臨災難的邊緣，對一個19世紀30年代的中國讀者來說，它明確無誤地示意，王朝的興衰周期正處于最低點。其次更令人感興趣的是，這部著作多次把天國和塵世王國加以混淆。例如《圣經》上的“天國”一詞被說成既是有福者的死后歸宿，又是信徒在世上的聚會處。在這整部書中，《圣經》題材前后錯亂，使人感到救世主的降臨與其說僅僅是過去某個時刻發生過的一次歷史事件，倒不如說是一種可能多次出現的、上天啟示的人間危機。

這本書對洪秀全的影響雖然是突然的震動，但直到很久以后才發生作用。他在得到這本書以后顯然只匆匆一瞥就放到了一邊。一年后（1837年）他在廣州第三次考試時所遭到的失敗使他精疲力竭，頹喪至極。當轎子把他從廣州抬到家里后，他向雙親傾訴了負疚之感和自愧無用的心情。而后就一連多日神志昏迷，臥床不起：他夢見自己升入天國，在那里脫胎換骨，得到了凈化和再生。一位年高德劭、蓄著金色胡須的人交給他幾面王旗和一柄劍，要他起誓鏟除一切惡魔，以便使世界重新回到純粹的教義上來。洪秀全陶醉在至高無上的正義和所向無敵的力量的幻想之中，怒不可遏地冥游了宇宙，按照指示降妖斬魔。陪他在夢中搜索的有時是一位中年人，他認為那是他的兄長。當幻覺最后消失后，他似乎又恢復了與外面世界的聯系，但在性格上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而且能完完全全記得自己的夢境。軟弱無能和自愧無用之感經過他的幻覺明顯地變成了相反的方面：相信自己無所不能和圣潔無瑕。因而人們普遍擔心他還沒有從迷惘中完全清醒過來。

這一強烈的內心感受演化成對外界首尾連貫的見解，其過程是很緩慢的。洪秀全在他發病以后的六年里繼續在他習慣了的幻境中活動，雖然已經明顯地擺脫了早先折磨過他、使他癱瘓的內在緊張感。誠然，我們發現他在1843年又參加了廣州考試。可是這一次科場失敗，只使他痛恨那個欺騙了他的制度而未使他自怨自艾。當時他懷著憤懣的心情返回鄉里，很顯然他已下定決心不再去應試了。[[3]](#_3_Mei_You_Shi_Yao_Zheng_Ju_Zhi)

新近發生的鴉片戰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洪秀全的政治傾向，這尚不能確切言之。如果說中英沖突對他沒有影響，那才是不尋常的，因為當時的廣東民怨沸騰，對清廷的輕蔑之情隨處可見。只在洪秀全故鄉的縣境之外，就蓬勃興起過抗英的民兵運動（見第四章），它的領袖們蔑視滿人在外夷面前的軟弱無力。不過對洪秀全的看法更有決定性影響的還是他本人想參加第四次應試之后不久重新發現了他發病前一直束之高閣的梁阿發的那本小冊子。代替那些象征性幻覺的是梁阿發書中所提供的一整套世界觀和救世的使命。洪秀全現在皈依了基督教，其方式不同尋常：他把這本書看作是上帝對他本人的直接召喚。他現在按照基督教的教義來領悟自己的夢幻：年高德劭、蓄著金黃色胡須的人是天父耶和華；中年人是耶穌；他本人是上帝的次子而被授予神圣的使命，務使世界重新尊崇上帝。

可是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假定，《勸世良言》的政治寓意對洪秀全沒有任何直接的影響。其實洪秀全在40年代的著作便清楚表明，他已經認定自己的任務就是要使中國人民皈依基督教，這是只有通過靈魂的革命而非任何世俗制度的力量才會發生的事件。此外，洪秀全顯然還認為，調和基督教與儒家傳統是完成改宗基督教的最好的辦法。他在40年代中期撰述的一些小冊子里闡發的基督徒品性，差不多全是崇拜上帝，不事偶像崇拜，生活嚴謹等內容。他譴責淫逸放蕩、忤逆不孝、殺人賭博等惡行，所有這些都是盡人皆知的儒家倫理主義所攻擊的目標。他在一篇長詩里用“誠”來稱頌品行“端正”；“誠”是一個儒家詞語，有正統、正直等含義。雖然上述作品都帶有某種基督教啟示錄的色調，但與儒家傳統的空想主義還是相當契合的。和梁阿發不一樣，洪秀全在求取功名時受過標準的文字訓練；同時他還沒有從把自己看成是高度正統文明的承受者這一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識框框中完全超脫出來。一直到洪秀全的啟示在遭到敵視的廣西客家村社中確實地被實踐之后，他才給他的幻想賦予政治意義，并且增添了《勸世良言》中的反叛色彩。[[4]](#_4_Ci_Chu_Ti_Ji_De_Zuo_Pin_Jian)

洪秀全現在已成了一名狂熱的信徒，他的異端言行不久使他丟掉了塾師飯碗。他這時西行前往廣西山村作布道旅行，有已改宗基督教的同窗學友和遠親馮云山結伴而行。1844年年中，洪秀全和馮云山到達廣西南部的貴縣地區，卜居在客家的親戚家中；他們在這里想方設法傳播新信仰。那年九月，洪秀全決定回故鄉去，以便不再給他的主人們添麻煩。馮云山陪他一起走，但命運卻把他引到了相鄰的桂平縣，在紫荊山附近的客家人中間定居下來。他在那里一住幾年，到1850年時，山區的許多客家村社都皈依了基督教。

馮云山的非凡組織才干在村社嚴重不和的廣西那些山區地方，找到了用武之地。那里的社會是高度軍事化的：部分原因是那個地區民族復雜（那里有許多地道的土著集團）；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腐敗；部分原因也是客家人從廣東東部遷來時就帶來的村社之間械斗的傳統。民團成為村寨生活的必要部分和正常現象。在本地人和客家人的爭斗中，客家人有幾種不利的情況。他們缺少本地財主們擁有的共同的家族結構，因為武裝力量要靠它才能穩定地維持下去。另外，他們還可能因分散居住（無核心可集結）而遭殃，這決定于他們的經濟地位，因他們都定居在邊沿地帶的分散的小塊土地上。在19世紀40年代的世代械斗期間，那些貧窮而無力防御的客家村社往往被迫離鄉背井。雖然居住方式和財產都對他們的敵人有利，但共同的語言使各階級的客家人在面臨危機時得以團結起來組成一支可觀的武裝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意識形態和方言使散居和無防御的客家人能夠應付40年代后期的挑戰，這時村社間的緊張關系已到一觸即發的地步。[[5]](#_5___Xun_Zhou_Fu_Zhi____Juan_4_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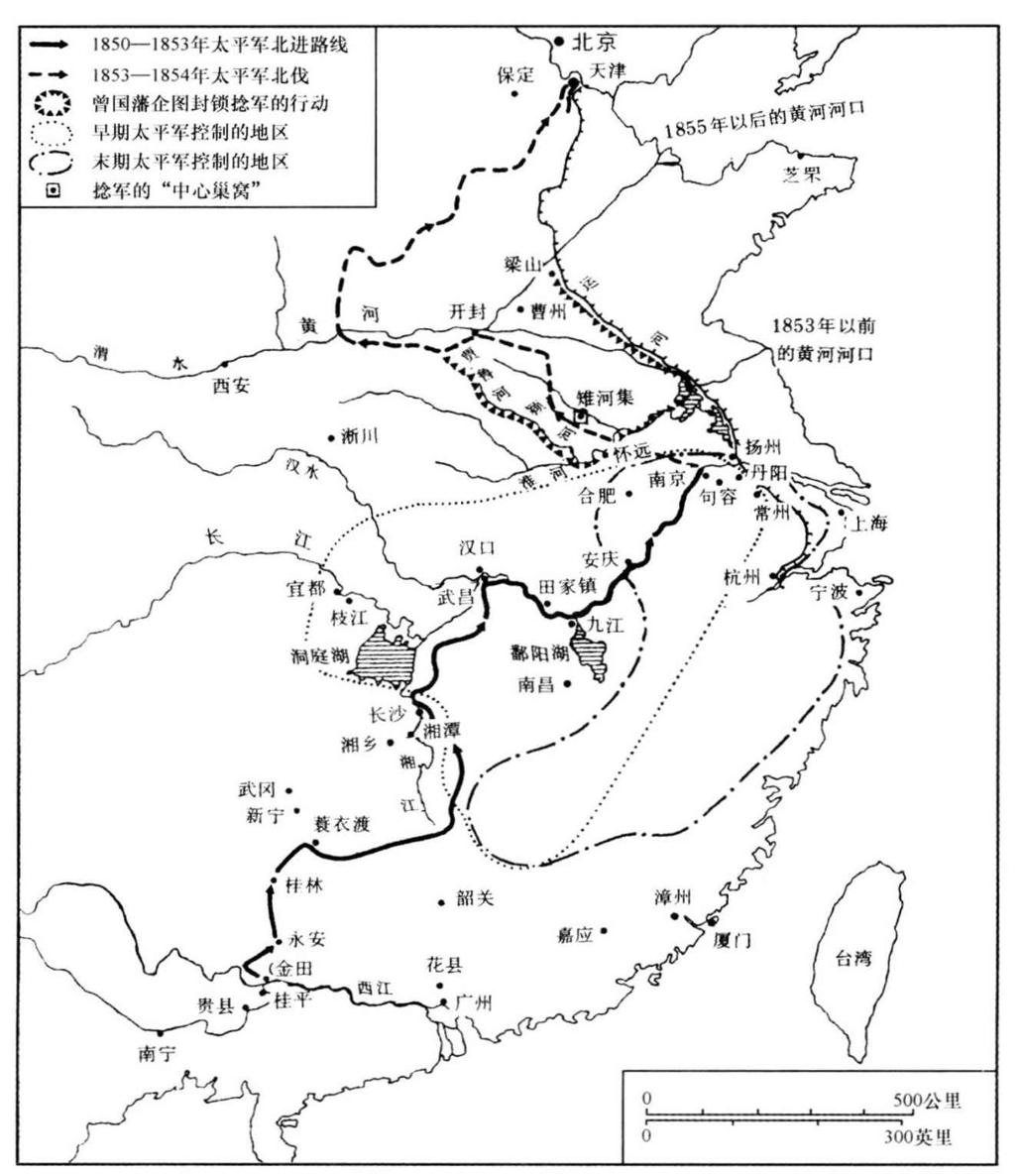
馮云山將他的信徒編入一個由各地方集會會堂組成的多村聯結體系中，這些會堂一起構成了總部設在紫荊山、分會遍布許多縣的拜上帝會。拜上帝會是針對擁有共同家族和設防村落的本地人的嚴密編制而創建的。它在某些方面與具有地方分會網的傳統秘密會社頗為相似。拜上帝會的某些組織方式確實很像三合會的組織方式。但它的成員卻幾乎不可能像三合會那樣適應當地的社會。拜上帝會成員信奉的外來教義和它的刻板的二元論（在靈魂得救和罰入地獄之間作出抉擇），都反映了他們自己在兩極分化的社會環境里所處的不見容的地位。洪秀全原來并不準備接受的梁阿發小冊子中所闡發的那些富有啟示性的政治含義，此時因信念有機地與社會現實聯系在一起，便被提到了首位。

洪秀全自己這時回到了廣東，正潛心于研究和寫作。1847年他到廣州去求教于美國浸禮會傳教士羅孝全，在后者的幫助下他對圣經作了幾個月的研究，可能用的是麥都思和郭施拉譯述的新版本（比梁阿發用過的那個馬禮遜和米憐的老譯本要清楚一些）。洪秀全由于生計依然無著，不久便離開廣州又回到了廣西。雖然他可能帶回了圣經，但我們懷疑他對自己不久要領導的革命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然而他于1847年秋到達廣西時，卻發現那里的形勢與三年前已大不相同。馮云山憑著他的組織才能，已經在幾十個縣創建了拜上帝會的“分會”。這個日益壯大的組織的總部就設在紫荊山下的金田村。

這個組織迫于形勢而暫時失去了它的創立者。馮云山被當地的一個民兵頭目捉去，被加上了煽動叛亂的罪名，結果被逐往廣東。洪秀全前往廣東上訪，親自在總督面前為馮云山翻案。兩人終于在故鄉花縣相會，盤桓了數月，一直到1849年夏天才返回廣西。這是太平軍發展中一個有重要影響的插曲。拜上帝會在它的宗教領袖和世俗領袖暫付闕如的情況下產生了一些新首領。其中權力最大的是燒炭工楊秀清，他沒有受過教育，秉性復雜，野心勃勃，早就在紫荊山地區稱霸一方。此外還有窮苦農民肖朝貴，楊秀清的主要副手；韋昌輝，一個與法律發生沖突的富家子弟；以及石達開，出身于殷實的農戶，本人受過教育。楊秀清和肖朝貴特別將洪秀全幻覺中的含義加以發展，確立了他們自己作為耶和華和耶穌的代言人的地位。此時客家人村社已經形成了極度的宗教狂熱，這種狂熱很容易被他們的首領們利用來為政治權力服務。運動現在有了一幫首領，這些人雖則仍然憑借洪秀全首倡的靈感，但也培植了他們各自的獨立權勢。由此看來，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中這種致命的分裂的特點，是一直可以追溯到它的兩個創始人在發展的關鍵時刻不在現場這一事實上來的。

接著是拜上帝會的信徒愈益好戰的時期。打砸偶像和勸誘改宗的行動，使客家的村社與其鄰村之間的緊張關系更形加劇。在國內混亂和經濟災難中，拜上帝會信徒著手組織了許多軍事分隊實行戒備，因而它們同廣西農村的其他武裝集團的沖突愈演愈烈。在1849年至1850年饑饉的形勢下，由緊張狀態經常演成公開戰爭。拜上帝會的領袖越來越清楚，在廣西環境下已不可能僥幸求存，也許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他們下定決心造反。當軍事組織在1850年向前發展的時候，處于主要軍政長官地位的馮云山已開始退居楊秀清之后，后者這時無論在宗教權力還是世俗權力方面都是炙手可熱的大人物。楊秀清具有杰出的軍事才能，這對于運動是極為有用的。但他殘忍無情，野心勃勃，果然不出數年就使運動瀕于毀滅。

1850年7月，金田的領袖們召集全廣西南部的拜上帝會的會眾，于是客家人村社從許多地區開始集中。他們賣光了財產，拋棄了家園，把身家性命和一切財物統統都交給了“團營”。許多人早就被編入已在指揮系統中各就各位的那些地方領袖控制的軍事組織里。金田大會參加者的成分除農民而外還包括農村工人的隊伍，如燒炭工和失業礦工，這些人早已建立了自己的拜上帝會。一些著名的三合會首領試圖加入，但只有海盜羅大綱甘心順從拜上帝會制定的嚴明紀律和清教徒式的法規。其他人很快都退出了；這是太平軍在與傳統的異教團體合作過程中所經歷的一系列困難中的一個很說明問題的插曲。雖然太平軍能夠不時在共同仇滿的基礎上把三合會團體吸收進來，然而這兩個運動卻從未合并成為一支聯合的革命力量。



地圖10 太平天國和捻軍的叛亂

強大的金田團營（約有2萬余人）與政府發生直接沖突是勢所難免的。在打了幾次勝仗后，1851年11月11日洪秀全38歲生日這一天，拜上帝會的領袖們宣布成立太平天國。雖然它只是粗具輪廓，但政權終于從洪秀全的救世主幻覺中脫胎而出，并且它聲稱要君臨整個中華帝國。

### 進軍南京

太平軍隨即向中國的經濟中心地帶——長江下游的富庶省份——發動了北伐。與清軍發生的多次沖突并非每戰必勝。叛軍遭到了嚴重損失，有時無法攻克那些用城墻固守的戰略城市。但是清軍七零八落，組織松散，已不能改變反叛者的戰略宏圖了。

清軍的最初反應是又晚又不夠的。雖然廣西的混亂至少在一年前就已卓然可見，但朝廷直到1850年10月才任命一名欽差大員去統轄平叛活動。此人就是林則徐，他作為一位最可能力挽狂瀾的官員，終于從鴉片戰爭后遭到的貶黜中東山再起。由于年邁染病，林則徐在赴任途中死去。這一任務后來由精力和才干都遠遜于他的另外幾任欽差大員接手，但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與麇集在廣西的那幫烏合之眾的地方軍隊和雇傭軍協調一致。當叛軍從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被圍困在永安這座廣西小城時，如果有杰出的將領，是本來可以在那里給太平軍以致命一擊的。但是清軍方面意見分歧而優柔寡斷，使他們得以突破包圍，繼而揮戈北上直趨廣西省會桂林（對桂林的圍攻沒有成功）。他們在向東北方面奔赴湖南邊界時，遭到了紳士軍事家江忠源指揮的雇傭兵的伏擊（1852年6月10日），幾乎全軍覆沒，太平軍運動的杰出政治組織家馮云山就是在這次遭遇戰中戰死的。然而他們的敵手缺乏協調，再次使叛軍贏得了喘息機會，東逃入湘。1852年夏，叛軍在湖南民眾中大肆招兵買馬，吸收了許多三合會成員入伍。進入湖南使他們一步登天，離開了廣西的水系，進入了長江的河網。

在向南京進軍期間，太平軍從一個相對狹小的省區叛亂轉變成了席卷廣大華中地區財富和兵源的聲勢浩大的運動。1852年9月當太平軍圍攻湖南省會長沙時，它的隊伍已壯大到12萬人左右。對長沙的圍攻突然停了下來，太平軍又涌向湖北省會武昌，把它洗劫一空又棄城而去；在這個過程中叛軍人數已增至50萬。太平軍分水陸兩路順流而下，沿江的許多城鎮隨占隨棄。1853年3月19日，他們破城而入占領了南京，把它改名為“天京”。稍后不久鎮江這個重鎮（英國占據該城是1842年它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因素）也告陷落。據當時一份情報估計，南京和鎮江的失陷使200萬以上人口落入太平軍組織之手。[[6]](#_6_Guan_Yu_Tai_Ping_Jun_De_Ren_S)凡此種種都是19世紀40年代抗稅運動的騷亂中即已初現端倪的華中貧困和社會分化造成的必然結果。

太平軍從金田發難到定都天京所經歷的兩年半時間，可以同以色列人出埃及或中國共產黨人的“延安時期”相比：因為在這期間太平軍的主要品質及其許多獨特制度都已出現。早在金田時期就產生了一種幾乎完全是軍事性質的官制。等級和職能部分取法于《周禮》：此書內容是周初之后的古人聲稱對周初政治組織的描述，它在許多不同歷史時期還有不同的名稱，以及某些見解新穎的發揮。永安被圍時，在這種早期的軍事組織中又增添了一種比較合理的政治組織形式。主要首領（以前叫“帥”）現時稱“王”，一共有四個方面的王和一名“翼王”。洪秀全本人享有“天王”這個元首稱號。

洪秀全的身份當時還不明確。他在精神上為諸王之首，這可以從他的崇高稱號看出；他還規定他只能稱為“主”，而“上”是為天父和耶穌預備的。領袖集團后來搞成了稱兄道弟的幫伙，洪秀全的運動創始人地位勢必有所削弱。此外，新的安排還確認了楊秀清和肖朝貴的支配地位：他們不時地降神，以傳達神意，使他們的軍政權力披著宗教的外衣。楊和肖分別被封為顯赫的“東王”和“西王”，楊還被確認為總制諸王軍隊的最高統帥。[[7]](#_7___Tian_Ming_Zhao_Zhi_Shu)

在永安被圍時期，太平軍就向中國人民發出了造反的果敢號召。另外還正式制定了他們自己的歷法（這是合法政權的傳統特權），發布了一系列檄文以宣布新秩序的降臨，并歷數滿人的罪孽。他們的叛亂被宣稱為反對外來壓迫者的民族起義。這是在篡奪統治的中國的“傳統敵人”北方蠻族面前爭取民族尊嚴：它們把一個殘酷而腐敗的政府強加于中國，并以異族的陋俗玷辱了它的文明。人們不禁要問，太平軍是否為了渴求民眾的支持，才用在傳統上更能為國民所接受的呼吁來掩飾他們的宗教啟示。只要檢視1852—1853年的這些文獻，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雖然宗教內容與強烈色彩的種族主義夾雜在一起，但是卻不想去掩飾這種內容。洪秀全被描述成直接受天命（即上帝）的皇朝創始人，而滿人則是怪異惡魔的化身：僭越悖理，惡貫滿盈。基督教的主旨是用毫不含混的詞句揭示的。太平軍當時正在尋求廣泛的支持，但并不以他們的神圣使命為代價。雖然文獻暗示他們愿意在當前接受與他們有著共同民族目標的人們的效勞，但太平軍公開宣稱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在塵世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天國。[[8]](#_8___Ban_Xing_Zhao_Shu_____Jian)不過，永安時期的文獻在政治與末世學之間并沒有成功地作出令人信服的綜合。確實，未入會的人一定很難理解太平天國綱領中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成分之間的邏輯聯系。作為腦力勞動的產物來說，太平軍的宗教啟示顯然沒有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們在進軍途中所提出的許多價值準則都在南京城垣內這個太平軍社會里付諸實行，這里是太平軍十分嚴酷的制度能夠加以實現的唯一所在。在這里，生活的方式部分地取決于軍事考慮，部分地決定于運動早期僵硬刻板的清教主義特征。太平軍保持著原教旨主義的良好作風，嚴禁吸食鴉片，不準飲酒抽煙。男子和婦女被嚴格地分開，即使夫妻之間發生性關系也要處死。許多婦女被編入軍事單位，各有戰斗崗位。不過1855年以后便廢止了兩性隔離辦法；它顯然有礙士氣，特別是因為它從未被最上層領導所遵守。但是他們對傳統家庭制度的某些成分還是抱著鄙視的態度，特別是地位低下的婦女被命令不得纏足，并使她們有機會去擔任某種官職。禁止纏足是廣西客家人文化的一個貢獻。客家人是不興纏足的。

太平軍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在早期行軍途中決定的，那時政治權力與宗教熱忱有著不解之緣。這種政教的結合不可避免地形成武斷專橫的政治作風，即主要的決定都被宣布為上帝直接干預的結果，而由楊秀清和肖朝貴在關鍵時刻以降神方式傳達出來。楊秀清的作風左右了太平天國早年的君主政體，并確實是使它招致中國上層分子物議的許多因素中的一個。

太平軍的社會啟示對農民施加的影響，看來很可能遠比漢族主義或宗教熱忱的影響為大。它的社會經濟思想提供了這樣一個范例，表明一種外來教義可以怎樣在東道國文化中變得親如一家并在它里面繁衍滋生。洪秀全早年在梁阿發影響下撰述的作品都顯示著基督教概念的明顯痕跡，即人們在上帝面前最終是平等的，他們在塵世上應得的各種賞罰應當反映這一事實。根據一切所有權只屬于上帝的前提，自利、私有權概念以及世界資源的開發都要受到譴責。這樣一些概念在中國的烏托邦思想中找到了共鳴。洪秀全的早期作品不僅討論了人對上帝應當履行的一般義務，而且討論了超出地域與家族界限的人與人的相互義務。像其他許多對中國社會制度的批評家那樣，他不厭其煩地引述了《禮記》中孔子歌頌古人“大同”思想的那句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9]](#_9___Tai_Ping_Zhao_Shu_____Di_92)同樣地，上帝之道實行之時，也將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取消人們之間的界限這一中國烏托邦思想的老生常談，以人們在至尊上帝之下應該情同手足的詞句被不斷地重復著。

但是這種博愛關系的幻想并不是太平軍社會啟示的唯一內容。除此而外還有更為露骨的平均傾向，它直接肇源于中國農村的社會苦難。這種傾向與古典著作中令人向往的烏托邦主義不相容，反而在粗暴不敬的中國匪盜中引起反響，因為他們在貧富兩極中找到了造反的充足理由。19世紀40年代后期橫行廣西河網上的海盜張嘉祥（后來投靠清朝）因下列詩句贏得了交口稱贊：

上等的人欠我錢，

中等的人得覺眠，

下等的人跟我去，

好過租牛耕瘦田！[[10]](#_10_Yin_Zi_Luo_Er_Gang___Tai_Pin)

太平軍竭力按嚴格的軍紀來約束自己隊伍里的純盜匪活動。雖然這一類村俗之見在太平軍的正式社會學說中不占什么地位，但對叛亂蔓延到華中省份時它所發布的莊重得多的聲明，則顯然成了強烈的弦外之音。很清楚，太平軍號召力之所以不斷增長，根源不僅在于他們公開宣稱的對滿漢官僚的憎恨，而且在于民眾對富豪權貴普遍抱有敵意。據一本紳士日記所載失陷后的南京城周圍的情況，憎恨官吏和僧恨地主在促使民眾支持太平軍上的作用是大致相當的。[[11]](#_11_Li_Wen_Zhi_Bian____Zhong_Guo)在財富和權力隨時隨處都被視為相互奧援的制度中，太平軍的啟示方式足以吸引一支巨大的窮人武裝追隨其后。

太平軍的理想社會在《天朝田畝制度》（顯然寫于向南京進軍期間）里有所闡述。家庭還是基本的組織單位：25家為一兩，由一名兩司馬統領，這就是地方社會的基本單位。但土地按人口加以分配，所有的成年人（包括婦女）都平等地領受到生產所得。土地及其所有的成果都是國家財產，更確切地說，是由國家來管理和分配的上帝的財產。每25家組成的一兩要建立一個國庫，除維持家庭生計的必需品（可能是按規定的數目）外，一切財富都歸國庫所有。太平軍一再申明，平等而充裕地享有上帝的物質賞賜是這個制度的經濟目標。為此目的，必要的條件是廢除土地私有權和由國家來控制勞動力。理論上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因此也可酌情準許將人力從勞動力不足地區輸送出去。毫無疑問，這文件之所以鼓舞人民，是因為人民希望一勞永逸地消滅清朝農村社會無情的經濟競爭和剝削，而代之以真正的公有制秩序。不過，在這個秩序中也有唐初“均田制”（它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勞動力的有效配置來增加政府歲入）的統制經濟的痕跡。透過太平天國社會理論的表面，就不難看出這個神權國家的利益何在了。[[12]](#_12___Tian_Zhao_Tian_Mu_Zhi_Du)

《天朝田畝制度》里有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就是沒有一處提到定期重分土地的思想。從制度的邏輯及其歷史舉例來看，重新分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可是，以表面上許諾永恒的私有權的辦法來吸引農民的支持，這種政治上的誘惑力之強烈也非太平天國的領導所能抗拒的。由此看來，太平天國土地綱領必然對貧苦農民和無地勞動者有著廣泛的吸引力。綱領中的統制經濟的調子完全符合用嚴重官僚化的方式解決經濟問題的中國傳統。總的說來，早期太平軍教義中的平等主義社會使命至少跟它的種族排滿主義一樣有吸引力。事實上，對那些自認為是在權利和財富盤根錯節的制度下成了犧牲品的人們來說，反清使命和反地主使命是難以區別的。

按照《天朝田畝制度》所宣布的目標，太平軍運動確實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在這場革命中經濟競爭被完全消滅；家庭被剝奪了它在經濟和社會上的重要作用；國家獲得了一種新的合法性和更廣泛的權力。然而甚至在最初那些有希望的年代中都有跡象表明，太平軍制度不可能在長時期內制止私人財富的積累和特權的膨脹。雖然運動的基本教義包含大量有吸引力的社會空想主義，但從叛亂伊始就明顯地見到令人不安的相反傾向。永安頒布的禁止豪奢的法令直接表明已經出現了一個生活汰侈的新特權階級，他們的個人生活不受那些要求普通士兵遵奉的清規戒律的約束。華貴的服飾、成群的妻妾和精美的飲食都被認為是最上層領導集團的特權。這些法令不過是對高級官員在叛亂后期非正式享有的私人積累和奢華普遍開禁的先兆。

從叛亂伊始就植根于太平軍制度之中的寡頭統治的傾向加強了等級制和特權，因為被選定的人們負責指導著蕓蕓眾生的命運。“老哥們”至上的地位受到嚴密的維護，這信條后來發展成優先擢升廣西人的普遍形式，并在運動發展后仍保持未變。這種寡頭政治和等級制傾向，使人們對太平軍最后能否在中國進行一場徹底的和持久的社會革命深表懷疑。太平軍的平均主義并不是建立在任何可能長期維護它的首尾一貫的社會學說之上。它以一種絕對的超人思想作為基礎，根據這種思想，一切合法權利都是全能的天父賜給他在塵世王國所選定的代理人的。

由于情況發生在西方列強正加緊對中國入侵之時，太平軍叛亂勢必發生固有傳統與外來鼓動孰重孰輕的問題。人們可能馬上認為，本國的反抗傳統已充分表現在它的思想和制度中了。這個君主制度的外部結構、官僚組織和土地制度體現了許多取自本國文化的空想內容。太平軍的宗教經文中可以發現民間的佛、道兩教的一些殘余，而它的種族主義用語又不少是因襲了過去的種族運動。如果考察一下當時的反清背景，那么太平軍的獨特之處就一眼可以看出。按三合會傳統結成的秘密會社，看來既不能對清政府又不能對傳統的社會準則提出令人信服的挑戰。白蓮教的末世說對合理的世俗權力組織也無濟于事。抗稅運動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缺乏一種明晰的理論作為反抗的依據。少數民族的起義在意識形態方面缺乏一種可以溝通他們與漢族農民之間的鴻溝的號召力。但是最后出現了在客家人組織的拜上帝會中所體現的少數民族集團的異己感與高度的思想自覺的有效結合。不注入洪秀全從廣東帶來的新信仰，很難想象客家人能夠動員起來。這種信仰將客家人的斗爭升華到有深遠影響的新水平上：即這是一場得救者與被詛咒者之間的戰斗。他們可以在一種包羅萬象的宇宙論的基礎上，以自己的滿腔義憤向以清政府為代表的文化進行挑戰。此外，神旨顯靈的方式則可能使領導權集中，其程度雖則還不完善，但比白蓮教或三合會的成就有效得多。洪秀全移植來的教義使中國社會郁積的種種不滿得以具體化，并且使因循守舊的中國農村文化中影響頗大的空想主義增加了生氣。

占領南京和建立天京，標志著叛亂在性質和命運上的變化。太平軍現在從一支左奔右突的軍隊變成了試圖從一個固定的基地控制其版圖和交通線的區域性政權。在內部幾經爭論才做出在南京安營而不全軍向北京挺進的決定。這決策可能反映了這樣一個前提（據說向楊秀清力陳此策的是一名老水手），即南京位于清帝國的經濟中心地帶，有水上運輸可供利用。南京曾為明初的故都，它作為政府所在地這一傳統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為一項政治決策，定居南京卻可能是一個重大錯誤。向北京進軍現在委托給了一支兵員不足和給養很差的北伐軍，它打到天津郊區便裹足不前了；1855年春，它的殘部被最后肅清。清政權幸存了下來，盡管它的軍隊已經七零八落，國庫已經耗盡，而大部分稅源又被叛軍控制在手。但是，清政權還有一個要反叛者現在認真加以對付的法寶，那就是有很大一部分上層正統人士對外來教義和新制度抱有不可調和的敵意，這種敵意現在是可以被用來為滿族君主制度服務的。

## 舊制度的保護者

### 對正統反對派的改組

我們對清朝后期一些杰出人物的看法感到模糊不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存在著使19世紀通商口岸的觀察者們感到茫然的無能和腐敗，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整個階層以及他們為之效力的國家在20世紀初年就滑向了覆滅這一事實。盡管如此，歷史記載表明上層人物的士氣和活力在19世紀初期都有所復興，這使得有可能對19世紀中葉的叛亂進行有效的鎮壓。這種新出現的復蘇氣象早在白蓮教反叛時期便已見端倪：內患使某些文化人士在震驚之余重新關心起國內的一些行政問題。在龔景瀚和嚴如熤等專事鎮壓叛亂的人身上可以看到注重實際學問的經世致用學派的早期范例；在道光統治時期及其以后，這個學派掀起了一股日益擴大的有益于行政管理技術的浪潮。

對實際事務的再度關心可能部分要歸因于嘉慶帝：他對士人的壓制不如他的父親。但學術界已有若干傾向使杰出之士能在政府事務中發揮更大的首創精神，這種關心實際的研究與18世紀后期宋朝倫理哲學的復興不無關系，它由力圖通過一種質樸無華的“古”文體來修身養性的桐城學派這一文學運動所倡導。對修齊治平以及人性所本的基本原理等問題的關心在18世紀經院哲學全盛時期曾經變得不時興，但這種關心現在又起而對官僚政治的道德敗壞進行某種程度的對抗。在19世紀初期還出現了“今文”學派，即含蓄地懷疑經典學問的一個學派，其領導人對典籍所作的非正統解釋使他們傾向于主張制度的改革。凡此種種傾向都導致一種務實的、折中的和力行的觀點，它在19世紀中葉對鞏固現存社會秩序和敉平叛亂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風氣最盛的是湖南。湖南的經世致用派受到了湖南前輩學者—官僚關心實事的影響，其中以人種史學者及軍事行政官員嚴如熤和理學復興者唐鑒的影響為尤著（見第三章）。委托魏源編纂《皇朝經世文編》的就是唐鑒的朋友和有權勢的湖南官僚賀長齡，此書于1827年刊行。賀長齡和另一位湖南人陶澍都是最著名的省級官員，他們在危機四伏的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曾試圖在行政管理上推行一些實際改革。這幾位官員猶如19世紀初期官僚政治黑屏幕上的幾個光明小點，格外引人注目。不過后來成為19世紀一系列叛亂的復仇之神的，乃是下一代湖南學者兼活動家，即道光時期高官顯宦的門生弟子和親族。像左宗棠、胡林翼和曾國藩等人不僅由戚誼友情密切聯系著，而且在學術上都承受陶澍和賀長齡的影響。

作為抗擊叛亂的杰出之士的領袖曾國藩（1811—1872年）出身于一個地主家庭，它在教育和社會上雖有抱負，但還不屬于縉紳門第。曾國藩受教于私塾和著名的長沙岳麓書院——經世派的一個中心。他在1838年進士及第后進了翰林院，然后出任過幾個部的行政職務，最后升任吏部侍郎。這樣，到19世紀中葉他就在京官的上層站穩了腳。

對曾國藩這位年輕官員發生重要影響的是唐鑒的程朱理學的復興傾向、經世派的務實精神以及桐城學派提倡嚴謹文風的原則。在當時士林的爭論中，曾國藩傾向于折中主義，即將考據與對道德復興的關心調和起來。不過整個而言，曾國藩的性格和見解受唐鑒和蒙古學者倭仁（后來領導守舊派反對初期的一些維新嘗試，死于1871年）的拘謹陰沉的作風熏陶最深。他是一位活動家，但非常保守，這種氣質恰好碰到了傳統的中國遭逢內外激烈挑戰的歷史時刻。它非常適合于堅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線，因為它使曾國藩及其追隨者在面對他們的千秋大業時能接受鍛煉，變成剛腸硬漢。然而可以理解的是，這種氣質則頗不宜于完成在中國發現它正處于新歷史階段時要進行妥協讓步這一理智的任務。雖然他們反對貪污腐化、追名逐利和迂腐的學究氣，但這些程朱道學家的政治見解卻是由狹隘的清教主義（他們原來以此陶冶自己的個性）形成的。在曾國藩身上，新道學產生了一種家長式的、但仍是有說服力的權力主義。而在倭仁身上，新道學則產生了一種頑固抵制創新的態度，特別是對任何帶有西方影響的創新抵制得很厲害。

然而湖南理學復興派的影響并不全是保守性質的。湖南幫里另一些人例如左宗棠（1812—1885年）這類活動家，當他們一旦了解現代技術對維護中國生存有重要意義時，他們便終于變得關心這種技術的應用了。而且這種新道學與有潛在激進思想的今文學派有聯系。賀長齡曾委托當時最有朝氣的才智之士魏源（1794—1856年）編纂《經世文編》；魏源之愿意正視晚清的各種史無前例的新問題并提出解決它們的新辦法，同他贊成今文學以及與最有創造力的今文學者龔自珍私交頗深不能沒有關系。因此，這場在19世紀中葉的叛亂中支持傳統秩序的運動，也對早期中國的現代化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道光末年，曾國藩已經成了北京城一位有影響的導師。他作為青年有為之士的座師和恩主這個角色，證明對他后來的軍事領袖生涯是必不可少的。他的門生越來越多，其一為湖南舉人江忠源，此人后來成了正統上層人物中投筆從戎的前驅者。江忠源出生于村寨設防的新寧邊區，如前所述，白蓮教和三合會活動在那里的合流正在威脅著現存地方秩序。1844年江忠源從京師回到新寧，馬上組織了由本族人士領導的地方民團來應付這個挑戰。地方上其他世家大族的頭面人物也紛紛起而效法。

新寧發生的這些情況只是南方正在進行的總過程的一部分：上層人物都試圖建立地方民團來保全身家性命。民團的典型形式是幾個村寨結為一體，以村社頭頭的個人相互關系作為紐帶。民團的首領通常要負責征集名目繁多的額外稅收和維持地方治安。防御事務和民團的費用由“捐”（非正式稅的一種）來提供。只要民團保持非職業性及其領導聽從官管，它們就可受到官方理論的認可。當然，就其為官方所認可的形式來說，這種“團練”與兩代人以前抗擊白蓮教的行政官員所創制的、以保甲制為基礎的地方官辦體制并無二致。但時世艱危往往導致民團更大程度的職業化及其首領更大程度的獨立性。只是由于鄉紳和官僚制度的利益在根本上一致，才使無政府狀態得以避免。像江忠源這樣的上層名流，他有社會的顯赫地位和與官方的關系，是可以調整民團與地方當局的關系的，因而民團頭目們的權力一般都能及時得到地方行政當局的承認，被視為合法。

就江忠源來說，他同時擁有與官方的關系和作為地方領神的地位，這使他佼佼然與眾不同，使他成了19世紀中葉及以后的紳士軍事家。由江忠源的團練發展起來的民團在擊敗雷再浩和李沅發的叛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851年江忠源本人成了新受命鎮壓太平軍的欽差大員賽尚阿的入幕之賓。不久他便認識到靠現有的清軍擊敗叛亂是毫無希望的，于是征召了一支由新寧人組成的精兵開赴廣西。這支軍隊不久發展到1000人左右，證明很有戰斗力，激勵他們的是靠賞賜錢財和擄掠，也靠親族關系和士兵對紳士恩主的矢效忠誠。江忠源在叛亂蔓延時出征過北方，太平軍早期在蓑衣渡遭到的挫敗就是他一手造成的，此役幾乎使叛軍全軍覆沒。江忠源開始他的軍事生涯完全是為了應付地方上的威脅，而現在他堅決投身于規模更大的抗擊太平軍的戰斗了。

當江忠源通過他在當地的社會地位致力于軍事活動時，另一湖南人胡林翼（1812—1861年）則以貴州一知府的身份同時從事軍事活動。胡林翼在貴州征募了一支人數不多但經過精選的雇傭兵跟當地叛亂者作戰。即使他為貴州的各種起事所緊逼，他也念念不忘故鄉湖南發生的事件。有一次太平軍從廣西越過邊界，胡林翼決定參加對他們的戰斗。由于胡林翼有許多機會目睹清帝國軍隊的無能，他長期以來一直認為需要動員一支新式軍隊，寧重軍隊的質量和紀律，可以犧牲數量。胡林翼一旦有了這樣一支軍隊，便熱切地響應他的老上司、湖廣總督吳文镕的號召于1854年初向東開拔，趕赴前線。吳文镕的另一個門生曾國藩此時也已完全投身于新式軍事事業中去了。[[13]](#_13_Guan_Yu_Zheng_Tong_Fan_Dui_P)

### 湘軍的發展

1852年7月曾國藩要求在督察江西鄉試結束后的回返途中，獲準巡訪故里湘鄉。這次巡訪計劃已久，現因太平軍侵入湖南而更加迫切。此時曾國藩一心惦念的事情顯然就是巡視自己家鄉的地方防務；但一次次事件很快就使他卷進了全省、而后是全國范圍的事務。他的假期批準得比預期的要快，因為在南方的路上他獲悉母親亡故，于是他直接回里服喪。在湘鄉，他發現已有強有力的地方防御措施，以生員王鑫和王的老師羅澤南（1808—1856年）為首的地方名流在太平軍北伐時期已動員了數支鄉勇，這時正伺機要遠出迎戰。曾國藩本人此時已受命負責軍事，因為朝廷在1852年12月任命他為“團練大臣”以協助湖南巡撫。當然，朝廷并不想授權搞什么新的軍事計劃，而只想通過一名受到信任的京官對已在進行之中的地方軍事化加強控制而已。不久在其他省份也頒布了同樣的任命。

不過曾國藩知道團練完全不足以應付太平軍的挑戰，他稍事猶豫便決定以新辦法來利用現有資源。他把湘鄉雇傭兵召到長沙，交由羅澤南統領，作為湖南省職業軍的核心。不久，湖南其他地方的隊伍（包括江忠源的新寧軍）也并入湘鄉軍。曾國藩決定任命江忠源為整個軍隊的戰地統領，但江忠源的隊伍在組織上有若干缺陷，這很快使曾國藩認識到只能由他本人直接指揮。曾國藩的進展十分緩慢，因為他首先要將湖南境內的地方叛變者肅清，建立一個地方控制和團練兵員補給的體系，而后才能把他的軍隊投入大規模的戰斗。直到1853年夏，湘軍的幾支大部隊才出現在湖南，同太平軍交鋒。

湘軍的興起代表著非正規的組織形式的出現，它隱隱地含有對清帝國權力的高度顛覆性，不過由于它仍以正統觀念為掩飾，所以還能夠與清朝的既成秩序和平共處。湘軍的一些組織原理導源于戚繼光（1528—1587年）的軍事著作；這位將軍在明朝正規軍事系統以外另行創建了一支私人的“戚家軍”，同日本海盜及其在沿海省份的土著幫兇作戰。羅澤南和王鑫在湘鄉本地訓練鄉勇時，都襲用了戚繼光的某些思想。戚的著作被19世紀初期的經世派廣為傳布。雖然湘軍后來比戚家軍大得多（后者開始只有3000人），但在編制和訓練上曾國藩都采用了戚繼光的模式。其一，有一個明確規定的指揮體系（戚繼光稱之為“束伍”）。其中處于關鍵地位的為營官，領650人（500名士兵和150名役）；營官上面為統領，控制二至十幾個營。營官對他的五名哨長負有完全的責任，每名哨長監管100人。整個隊伍實際上都靠私人關系維系。營官自選哨長，哨長自選什長，什長則按慣例憑私人關系招募10人供他差遣。營官在正常情況下也隸屬于某一個統領。曾國藩規定每次任命一名新營官時，該營所屬官兵都要更換，重新挑選。這種私人聯系使湘軍取得了綠營軍及其雇傭附屬軍所缺少的聚合力。曾國藩的新軍并沒有完全超出舊體制的范圍，因為從一開始他就奏請給湘軍軍官授予綠營軍銜。不過他在培植其軍隊的官兵之間個人相互義務時，著重利用既存的同族和同鄉關系，這在綠營軍上下級官員之間是不予鼓勵的。

湘軍的體制是與清朝軍事體制的官僚政治原則格格不入的，因為個人關系被后者認為是個威脅。但是，這種關系非常適合于把一支支由紳士領導的非正規隊伍變成中央指揮的部隊。曾國藩清醒地意識到這項新軍事計劃潛在的沖突，盡力消釋皇上的疑慮。湘勇最初是曾國藩運用團練大臣不明確的權力動員起來的。建立一支職業戰斗部隊當然不會按官方的團練規格去做，因為后者強調的是一種低水準的軍事化，所以官方的方案迅速被棄置一旁。曾國藩很注意安撫滿人的感情，他把一位地方的在旗官員塔齊布安置在一個重要的指揮崗位上。但是歸根到底，清帝之所以能夠接受曾國藩的新軍事組織，原因在于他本人是一個受到信任的京官以及他在京師廣為結識的各種關系。在以后10年期間，曾國藩能夠指望取得像文慶和肅順一類滿族大員的支持，因為他們懂得要使王朝幸存，需要把一些非正式權力授予地方的漢族軍事首腦。這些滿族權貴的支持抵消了寯藻（1793—1866年）等漢族在朝官貴的敵意；祁寯藻是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的繼任者，他認為這種地方軍事權力是危險的，不能予以接受。

在以后幾年，這支軍隊在營以上又精心建置了分統、統領和大帥，分別由曾國藩信任的助手任職，他們多數是取得低級文官功名的人。這一新編制的軍事價值姑置不論，曾國藩的新軍制表明它對清帝國的未來具有重大政治意義。曾國藩的私人幕僚和將官班底成了輸送行政干才的溫床。其中涌現出許多第一流的地方官員，他們將在19世紀的后來年代里控制中國的軍政大權。早年，曾的官員隊伍主要從文士中遴選，這種做法符合治軍原則中的理學色彩。但到50年代中期，出身微賤而不通文墨的人也可以致身于掌握軍事大權。這些人憑才干和兇狠而受到賞識，所以湘軍雖則在思想上的信仰日趨淡薄，但它的力量卻有了驚人的增長。

湘軍的兵力最后擴大到13.2萬人，其中包括騎兵和輔助的水師。按當時的標準衡量這個規模不算很大，但足以說明曾國藩強調質量甚于數量。湘軍對兵員的征募、訓練和紀律以及按儒教治軍等細節的高度重視，使它獨具特色，不同一般。它的薪餉之高也是個特色。一個普通士兵的薪餉竟為綠營軍最高級別士兵的兩倍左右。至于高級官員，由于希望減少貪污和維持斗志，就更不吝惜恩賞了。

曾國藩要承擔這樣的巨額薪餉，是需要有充足而固定的財政支持的。他和他的助手為軍用籌款而使用的辦法，對清朝度支的演變產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20世紀。曾國藩的基本辦法是留下比中央財會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資源。這就是說，第一，設置一些不受戶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歲入項目；第二，他的部屬一旦就任高級地方官，便將歲入權集于巡撫和總督之手，避開戶部的干預。[[14]](#_14_Guan_Yu_Xiang_Jun__Jian_Luo)

早期在財政上實施的權宜措施是賣官鬻爵。監生以及各式名譽學銜證書，由京城發給省級政府發放。1853年冬，湖南巡撫駱秉章把這樣一批證書直接轉讓給湘軍總部。出售官銜所得是曾國藩早期主要經費來源。不過當軍隊擴大以后它的作用馬上被厘金（從字面看厘金值千稅一，只表示很小的數額）這種商稅所壓倒，它是對存貨、運輸途中的貨物或產地的茶葉等產品按價征取。厘金最初由御史雷以諴于1853年下半年在揚州一帶實行，目的在于為長江以北的清軍提供經費，后來證明行之有效，很快就為各省所采用。稅率在各地有很大差異，多數省份在2%—10%之間。到19世紀50年代后期，對這筆收入頗豐的稅源的征收和支付權力顯然主要落到了各省當局手里。雖然全部征收應向北京呈報，中央政府的某些固定支出實際上要由厘金歲入償付，但地方軍事化的龐大需求還是使大部分呈報的歲入（未經呈報的數目就更不用說了）不受北京的控制。[[15]](#_15_Luo_Yu_Dong____Zhong_Guo_Li)

曾國藩很快就抓住新稅所提供的機會。1856年，他與湖南巡撫駱秉章達成協議：湖南的大部分厘金被指定作湘軍經費之用。1860年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后，他為整個江西厘金另外開辟了一個不受省布政使控制的特別官署，這樣便繞過了正式的財政機構。從這時起，連湘軍的下級統領都獲準建立自己的厘金局，以仰賴其收入。在50 和60年代初，厘金局搞得有些政出多門，受益者不僅有湘軍，還有鄉紳控制的地方非正規軍。

由厘金可見一般的行政上的分權化，也表現在曾國藩采取的其他一些財政措施上。他從一開始就力圖把地方固定收入改作其軍隊之用。但朝廷不能強迫各省巡撫把資金改撥給曾國藩。他只有同駱秉章和胡林翼這些對他抱同情態度的地方當局私下商議，才能分潤固定稅收。這類私人協議成了國家財政機制的一個常規；只有在進行了非正式協商以后，才能向北京要求轉撥資金歸己使用。曾國藩一旦本人出任高級地方官，他就進一步推動由地方控制各種固定歲入的趨勢。其做法如下：（1）把歲入權集中到省巡撫衙門；（2）向北京謊報收支。曾國藩鼓勵他的追隨者隱匿大部分地方固定歲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內戰順利進行下去。

由此可見，地方軍事化的需求引起了中國財政管理結構一系列重要的和持久的變化，其中包括農業稅向商業稅的局部轉變，以及北京某些財權分給了各省的主管。對清朝財政制度的進一步破壞，是由中央政府為了極力應付軍事費用而采取通貨膨脹的政策造成的。1853年起，北京采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例如發行劣質銅錢、鐵錢和紙鈔。雖然上述權宜之計暫時緩和了政府的短缺，卻在人民中間造成了空前浩劫，進一步削弱了國民經濟并加深了民眾對清政府的不信任。[[16]](#_16_Chen_Zhi_Rang____Xian_Feng_S)

應該指出，漢族文人名士領導的新式軍隊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清朝正規軍事體制已被取而代之。到1860年為止，曾國藩的湘軍與龐大的旗兵和綠營軍一直鼎立地并存著。雖然后者多數統馭失當，但仍能牽制一部分太平軍，其力量不容忽視。駐扎在南京城外的“江南大營”，由清朝正規軍和勇軍組成，它在朝廷看來仍然是最重要的軍事力量。在1860年以前，它的統帥在整個戰局中擁有舉足輕重的權力，到了1860年，它最后聲威掃地地被消滅了。到那時為止，曾國藩本人的官階一直較低，難以左右清廷的軍事決策。1860年以前，湘軍應被看成是清軍的重要補充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它還應被看成是未來的制度變更的基礎。

## 內訌與衰落

### 太平天國統治的特征

1854年初，曾國藩的軍隊在長江中游地區與太平軍迎面相撞。太平軍曾經發起過一次聲勢浩大的西征，成功地攻占了南京上游的大部分沿江重要城市。由于北伐失敗，湖北、安徽、江西和江蘇等省這時成了太平天國軍事行動的廣闊戰場。叛軍的戰略意圖是確保南京的水道交通和占據它周圍的農業地區。幾支湘軍在湘潭的關鍵之戰（1854年5月1日）中擊退了太平軍對湖南的入侵，而曾國藩的水師則揚帆前進，向太平軍控制的江河湖泊發出挑戰。但太平軍才干出眾的翼王石達開在水陸兩路都曾多次重創曾國藩，使反叛者于1856年中在軍事上處于極盛時期。太平軍在長江流域占據了西起武昌東到鎮江一線近300英里的許多戰略城市，他們對水道的控制由于曾國藩的大部分船隊在鄱陽湖被圍而更有了保障。石達開的軍團征服了江西大部分富庶的府縣。太平天國最后一次軍事勝仗的消息是1856年6月在南京城外對清軍的大捷，清軍統帥向榮就在是役之后不久死去。

作為一個新皇朝，太平天國在鞏固其統治的過程中遇到了難題。在對儒教的既成體制進行了殊死的挑戰以后，它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各級社會機構。它在宣傳激進的空想主義社會綱領以后，此時不得不使理論迎合現實。1856年是太平軍勝利與危機紛呈的一年，它所特有的一些制度即于這一年誕生。

太平天國官僚政治的特征體現在兩個相互抵觸的原則中：一方面全部重要職位都由廣西幫控制，另一方面通過傳統的科舉制度廣泛尋求新興文士的支持。太平天國的文官考試在定都南京后即行開始，在整個統治期間未曾中斷。考試形式在許多方面與清制相同，定期在地方和京城舉行考試。但是內容包括基督教的主旨和對太平軍領袖的頌詞；此外，考試的社會基礎比較廣泛。投考者的背景完全無需考慮，這表明太平天國渴求才智之士以及他們在放寬參與政治生活方面所作的努力。考試似乎相當容易被通過。1854年在湖北省舉行的一次考試中，投考者不到1000人竟出了八百多名舉人，同年在安徽的考試中，僅一個縣就出了30名舉人[[17]](#_17_Li_Chun____Tai_Ping_Tian_Guo)。

盡管太平天國明顯的大力爭取正統的優秀人物，然而應試的文士還是寥寥無幾。投考者的社會出身似乎很龐雜，有以前的僧侶、占卜者和其他一些從事為新政權所取締的“迷信”職業的文人。太平軍占領區的文人經常被責成參加考試，違者處死，但他們的熱情一直不高。偶爾被迫的應試學子寧可在試卷寫上嬉笑怒罵之詞而以身殉[舊傳統]。一個仍未解決的問題是，考試制度對確立太平天國官僚政治的實際貢獻究竟如何。不過有證據表明，重武輕文，戰略形勢變幻不定，以及太平軍歷來對鄉土和宗教資格的重視：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文官考試沒有起過重大作用。不過，在作為宣傳手段和正統的象征方面，太平天國的考試制度是不應被忽視的。

太平天國的官制本身由王、侯兩級世襲貴族以及十一個等級的官員構成。在這十一個等級中，前六等官職名稱可在歷代王朝的歷史中找到，雖則它們一般表示等級而非具體職能。后五等則與軍事指揮或地方政府的某些較為具體的職能有關。由于在太平天國的空想模式《周禮》中不存在文、武之分，因而任何一級官員都既可被委任為文官，也可去充任軍隊指揮。在這種等級森嚴的統治集團內，實際權力中心是各個王的行政幕僚班子。每個王都在其隨從人員中設置一個機要機構，內分六個傳統的施政部門（相當于“六部”）。不過，由于東王楊秀清僭取了總理軍政兩方面的權力，他的機要班子到1856年在整個太平天國官僚體制中曾經起著中樞協調的作用，所以各王自立班子的情況并沒有引起行政上的完全混亂。

太平天國的地方政府建制仍以清朝舊時的府縣區劃為基礎，而在縣以下則以《天朝田畝制度》為基礎，即規定以25家為一“兩”到13156家為一“軍”，各單位等級森然。府縣官員的職能與他們所取代的清朝官員的職能相似。至于太平天國縣級以下編制的實際情況，其材料是零散的，也往往自相矛盾。但是有兩種需要考慮的情況，都表明太平天國地方控制的脆弱性。第一，太平天國制度具有與清制相同的缺陷，即正規地方官員稀稀拉拉地分散在各地。跟清制一樣，朝廷命官僅到縣一級，縣以下的所有職位都由當地提名地方人士充任。因此對太平天國的社會改組如此重要的地方政府基層結構，便由一些往往充其量僅對政權綱領承擔有限義務的人去填補。與此有關，第二個缺陷是太平軍發現，很難把他們那些人為的、不可勝數的小部門強加于原有的地方組織身上，而且往往發現只不過給現存結構（例如傳統的“鄉”、現存的“保甲”或“里甲”一類居民單位）換個新名稱而已。這意味著在太平軍占領區，這些單位的頭頭有時就是在舊政權下把持村社事務的那些人，因此很難出現一種或者有利于鞏固地方控制，或者有利于真正改造地方社會的形勢。

太平天國在征服地區實施的土地政策，總的表明了對農村的控制是脆弱無力的。應當認為，這是急需財政收入，缺乏可靠骨干從而必須使農村社會關系基本不受擾亂的結果。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是需要時間和安全保證的，這兩者太平天國從來都不具備，所以一旦實行，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產和歲入的暫時下降。我們已經談過，《天朝田畝制度》干脆刪除了定期重分土地的規定，這樣就暗示了已經重新分配的土地可以成為耕作者的財產。實際上，太平天國的土地綱領既不是國家所有制的綱領，也不是耕者有其田的綱領。雖然中國的歷史學家對這一點仍有很多爭論，但大量的證據表明，在太平天國占領的大部分地區，地主和佃戶的關系始終存在。盡管與地主和解的趨勢在運動后來年代中才似乎更為明顯，但是有跡象表明它在此以前也是存在的。如果說在某些地區太平天國曾試圖把所有權授予佃戶，那么，主要的考慮似乎也是出于在地主逃走之后向原佃戶征稅的需要。太平天國的賦稅手續很快發展起來，不再實行通常作為他們侵入一個地區的標志的那一套沒收和勒索的粗暴做法，除了稅額稍輕以外，田賦制度經過系統化，與清制區別不大。

一般說來，在太平天國控制的那些未受戰爭嚴重破壞的地區，農民的狀況是有所改善的。叛軍的存在似乎堅定了佃戶抵制苛租的決心，有時地主也只好滿足于部分的收入。1860年以后在長江下游的某些地區，向佃農征課各種直接稅與一項官方的減租綱領同時并行。這便是另一種與地主分享農村剩余產品的形式。[[18]](#_18_Li_Chun____Tai_Ping_Tian_Guo)太平天國占領區的經濟，無論是商業或是農業部門，租稅負擔一般都比舊政權時要輕。太平天國的商業稅不像無處不施行的厘金稅那樣泛濫成災，而且顯然條文比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

### 太平軍中央的分裂及其領導的恢復

1856年發生的震撼太平天國的那場災難，既不是它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某些缺陷造成的，也不是由于它的敵對力量所致，而要歸咎于他們自己中央領導方面的動蕩不定。如前所述，這種動蕩性在運動最初年代中就已經孕育于太平軍的制度之中。政權要繼續存在下去，就需要有一種在共同事業中形成的兄弟情誼，以剎住諸王之間的不和。但是兄弟情誼不久都被東王楊秀清的無情野心所毀。1853年在定都天京時，他那已經巨大的權勢由于馮云山和肖朝貴都在戰斗中死去而更形膨脹。楊秀清在行政地位上的加強是在損害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和秦日綱（1854年封王）以至洪秀全本人的利益的情況下取得的，洪秀全本人也往往跟其他人一道蒙受楊秀清的羞辱和威嚇。洪秀全智慮逐漸衰退的狀況最終使他事實上不能再積極參與行政決策。楊秀清馬上以新的精神權威自認，宣稱他是圣靈的化身，地位甚至在上帝次子之上。許多歷史家都鄙棄楊秀清為毫無信仰可言的陰謀家，認定他個人的宗教主張（反之，洪秀全則有至誠的信念）只是一些詭計而已。楊秀清是不是邪惡的陰謀家暫且不論，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如果沒有楊秀清的卓越行政才干和集權本能，太平軍運動決不會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楊秀清的垮臺看來是他試圖取代洪秀全本人以篡奪最高權力的行動促成的。1856年8月，當楊秀清逼洪秀全封他為“萬歲”（這是迄今為止僅為洪本人保留的一項帝王特權）時，洪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天王于是把韋昌輝和石達開秘密召回天京，降詔要殺死楊秀清；這個行動也許是韋昌輝、石達開和秦日綱蓄謀已久的。韋昌輝當時正在江西作戰，距離最近，他率領幾千精兵迅疾返回南京。韋昌輝出身于富有的地主家庭，對自己長期蒙受像楊秀清這樣一個出身貧窮的勞工的迫害可能倍加惱恨。9月1日夜間他迅猛出擊，把楊秀清殺死，并下令屠殺楊的隨從人員，據說約屠殺了2萬人。屠殺在南京蔓延了將近兩周，其規模顯然遠遠超出了洪秀全的預料。當石達開在約十天以后到達南京時也為之震驚，力勸韋昌輝住手。韋昌輝這時已經殺紅了眼，竟懷疑石達開同情東王集團。石達開十分謹慎地逃離天京，重返他的前線部隊，韋昌輝因此也殺害了他的全家。石達開帶領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向南京進發，想來報仇。這時洪秀全也感到韋昌輝的權勢咄咄逼人，像楊秀清以前那樣又成了一個潛在的威脅。洪獲悉石達開受到太平軍全軍的普遍支持，便于11月中旬調集了他的軍隊把韋昌輝及其同伙200多人殺掉。在這個屠場上，貪欲和偏執狂使太平軍運動原來理想的任何殘跡都已澌滅無余。

還有一個令人痛心的損失，那就是失去了一度集于中央的權威。幸存下來的領袖沒有人能行使位極人臣的東王有過的權力。石達開被洪秀全召回南京主管行政，他發現自己處處受到一個由洪氏兄弟和佞臣蒙得恩結成的宮廷集團的掣肘。六個月后石達開出走，領著自己的隊伍開赴西南長期單獨作戰，沒有再加入太平軍運動了。清朝的保皇派馬上對太平天國的分崩離析加以利用。1856年12月，胡林翼的軍隊把太平軍逐出武昌。1857年下半年曾國藩奪走了太平天國在江西征服的大部分土地。這樣便使太平軍在長江上的要沖安慶受到威脅。自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國在軍事上的頹勢終以戰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軍重建其對南京的包圍圈而達于頂點。

盡管太平軍的中央已陷入混亂，但這運動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1858年下半年太平天國在軍事上主要靠陳玉成和李秀成（此二人出身于廣西最貧苦的農民階層，又都從叛軍的各軍階上緩緩晉升上來）的努力而取得了轉機。作為最高統帥，這兩位才華卓越的軍事家于1857年逐漸恢復了攻勢，并成功地使江北的清軍處于一片混亂之中。1858年9月他們在淮北三河鎮重創湘軍，11月又在南京對岸的浦口擊潰了清朝的正規軍。由于這兩次打擊，太平天國解除了安慶的壓力，并重開了天京往北的交通。

太平天國復原的第二個因素在于天王的堂弟洪仁玕（1822—1864年）的個人集權得到了有限的和暫時的恢復。洪仁玕是受洪秀全影響的第一批改宗者之一（他跟洪秀全一樣，也是因科場失意而成為村學塾師），自1852年以來他一直未曾介入運動。在香港期間跟他相過從的，最初有新教傳教士瑞典人韓山文，后來有包括蘇格蘭漢學家理雅各在內的倫敦會的一些成員。他除神學以外，還探討了西方的科學和政治經濟學，這些研究不僅使他成為太平軍人物中受教育最廣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國最早介紹西方文化的人士之一。1859年4月當他最后安全抵達南京時，受到了天王熱情的歡迎，并被擢升為最高行政長官，受封為“干王”。

洪仁玕在1859年發表的《資政新篇》中概括地提出了強化中央集權、采用西方技術以使中國經濟和交通現代化以及發展與西方列強友好關系的政策。洪仁玕所提出的開設現代銀行、頒發專利權、建造鐵路和輪船以及發展采礦業等項建議表明，他對西方力量所在的若干因素抱著全心全意的、雖然認識很不全面的贊賞態度。這些建議是太平天國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轉變。洪仁玕在另一部著作里提出要在太平天國考試制度方面實行一些重大改革，目的在于倡導一種更注重實用的文風并促使文武結合。新型的太平軍的杰出之士應當是，文“可兼武，韜略載在詩書”，武“可兼文，干戈化為禮讓”。[[19]](#_19___Qin_Ding_Shi_Jie_Tiao_Li)此外，洪仁玕孜孜不倦地爭取中國正統的優秀之士來效忠，根據傳統的種族理由重新向他們發出呼吁。

到1860年中期，太平天國在江北的軍事勝利雖然解除了清朝對它的一些戰略要地的壓力，但它并沒有建立起可靠的經濟基礎。更重要的是它未能占領湘軍在長江中游的防區。在安徽新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是政治上不甚可靠的捻軍（他們不久又投靠了清朝），這也使太平天國不能長期依靠此地，把它當成作戰基地。不過江南大營于1860年5月的再次被摧毀，大大振作了太平軍的士氣，于是洪仁玕便策劃了一次規模很大的戰役以征服長江三角洲地區。有了長江三角洲作為經濟基地，就可以再度攻占遠至武昌和漢口的長江中游地區。洪仁玕認為，據有長江下游城鎮的另外一些好處是，太平軍將有機會使用西方的輪船，派它們到上游去打仗。

在東面發動的這次新戰役很快就初戰告捷。守衛句容、丹陽和常州的清朝正規軍一片混亂，倉皇潰退。6月2日，李秀成的軍隊進入蘇州，這里是江蘇東部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又是通向沿海城鎮的門戶。整個這一地區的太平軍將領們為了長期占領，他們勵精圖治，竭力穩定地方經濟和控制農村。他們奉行的政策是盡量不打亂地方社會組織，以期確保各種資源能夠源源不絕地流入太平天國的國庫。這時的急務只是想把清軍趕出沿海城鎮。除了想張羅輪船以便溯江而上去作戰的計劃以外，沒有證據表明，洪仁玕和其他太平天國首領都已認識到上海作為外貿收入的來源所具有的長期價值。但必須把上海視為在長江三角洲進行較大規模戰役的一部分，于是洪仁玕著手鋪平與外國列強交往的道路。可是，洪仁玕為爭取外國支持或中立所作的種種努力是建筑在天真的樂觀主義上面的，以為西方會把太平軍看作是進步的基督教同道而報以同情；這些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因為西方列強根本無意同叛亂者合作，它們更感興趣的毋寧是看到清帝國的力量在長江下游各省份復興起來。

### 曾國藩出任統帥

19世紀60年代初在保皇派將領系統中發生了一些對清朝的勝利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事件。“江南大營”的再次瓦解（1860年5月）不僅使清朝的最高將領張國梁與和春身死，兩江總督何桂清被廢黜，而且使南京以東的清朝正規軍遭到覆滅。在此以后帝國的方針發生了重大改變，曾國藩被授予整個戰役的領導權，因為舍此而外已別無其他選擇。于是曾國藩于1860年6月8日被任命為代理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擁有指揮長江下游地區軍事的最高權限。曾國藩在他首次擔任的這個封疆大吏職位上，終于能夠使他的軍隊與更充裕的經費，以及與一員高級總督所擁有的巨大權威結合了起來。

對清政府來說，把個人軍權與地方省份的正規權力這樣結合起來，乃是驚人之舉。在這方面50年代已有過一些先例，即曾國藩的幾名部屬已經擔任了巡撫或代理巡撫，例如安徽的江忠源和后來的李孟群；廣西的劉長佑；湖北的胡林翼。但是曾國藩新任的這個地位顯赫的兩江總督則明顯地集中了軍政大權于一身，權勢更大。這是內戰的一個轉折點，就許多方面說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正是滿族君主政體與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的這個強大的保守聯盟，才使王朝得以茍延到20世紀，并對整個共和時期中國政治生活的機制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除了使湘軍的財政基礎和政治基礎得到鞏固以外，曾國藩在1860年的擢升最后還為保皇派提供了健全的戰略領導。曾國藩持有與太平天國相同的看法，也認為天京安危系于從南京至漢口之間的江面，而控制這段長江的關鍵則是安慶（自1853年以來一直在太平軍控制之下，它是皖北具有戰略意義的沿江口岸）。在曾國藩的堅持下，1859年后期朝廷已經認識到收復安慶的重要性，于是曾國藩馬上按部就班地進行收復該地的行動，他把這一戰斗托付給他的兄弟曾國荃去指揮。1861年9月5日經過激烈戰斗后安慶被攻陷，平民大批遭到殺戮。這樣便為打敗叛軍奠定了戰略基礎。

曾國藩按湘軍形式創建了由他先前的幕僚率領的新軍，是這個時期發生的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事件。構成他本人力量的因素就是這樣傳到下一代紳士軍事家之手的。曾首先看中了他的門生李鴻章（1823—1901年）。李鴻章是一個有能力的進士，抱負很大，頗具才干，其父與曾國藩有同學之誼。李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一個官宦之家，從1853—1857年之間他帶領一支勇軍守衛鄉里，從而開始了自己的軍事生涯。安徽上層人士整軍經武的行動開始原是針對豫皖邊界的捻軍叛亂的，太平軍的猛攻則加快了這一行動。李鴻章的作用似乎可與湖南的王鑫和羅澤南相比擬：他根據團練名冊征募人員并將他們編入正式作戰部隊。李不久辭去直接的軍隊指揮職務，轉到福濟（任安徽巡撫，是江忠源的后繼者）手下任幕僚。在安徽過了六年，后來李鴻章決定與其兄李瀚章一起去投靠老師曾國藩。1859年1月，他到達曾國藩設在江西的行轅。

曾國藩認為李鴻章擔任幕職是大材小用，于是設法委以實職，使之獨立指揮軍隊。曾國藩和胡林翼久已留意安徽淮陽一帶是軍旅的來源，曾國藩多次想安排李鴻章編練一支該地區的軍隊。1861年時機終于來到，當時有一名上海流亡紳士代表從上海圍城中來到曾國藩設在新近收復的安慶大營請求援助。李鴻章便馬上開始招募軍隊。他的新軍從團練中征召，又得到一些勇軍的補充，后者已經組成并由于有了能征善戰的湖南人組成的八個營而使戰斗力得到了加強。1862年4月，富裕的上海紳士把一個向外商租來的船隊派到安慶。李的軍隊隨即被運往下游去占領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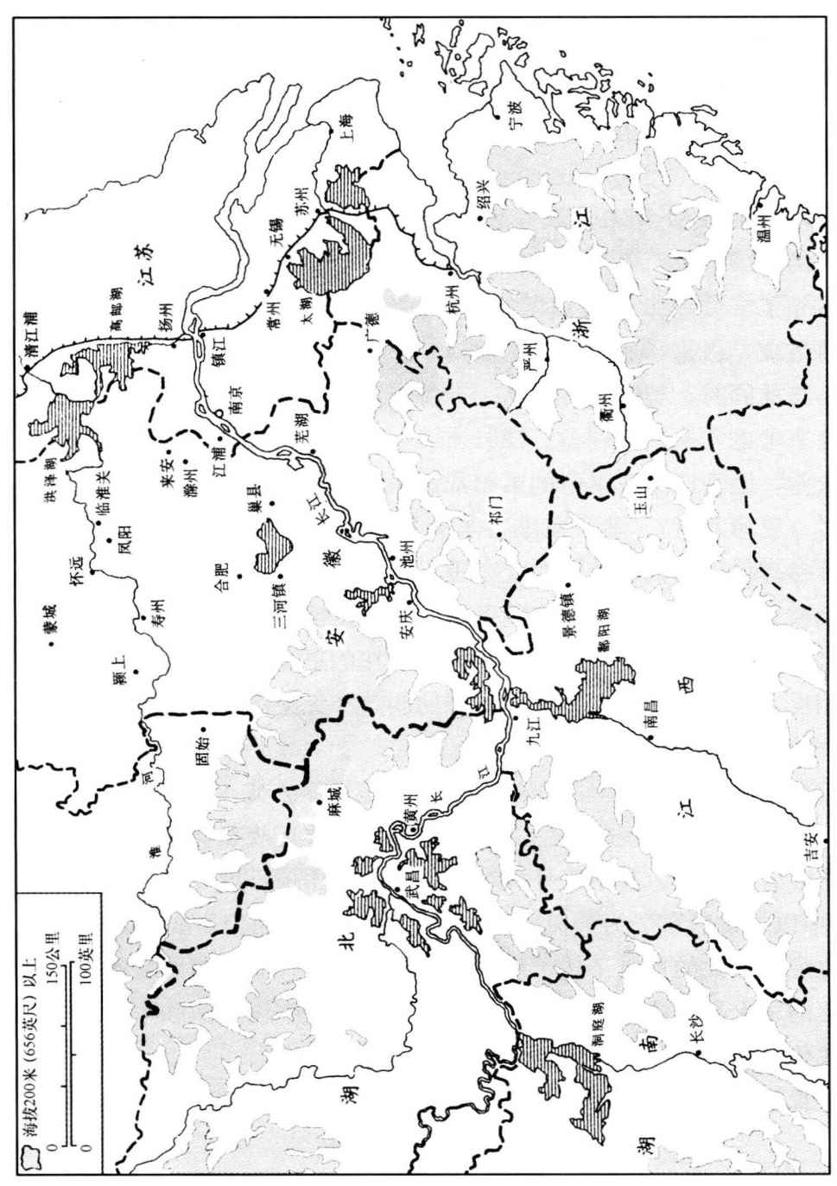
曾國藩之所以決心創建新軍，部分是由于他認識到湘軍業已過了它的極盛時期。它的實力已經由于大部分有才干的將領（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和1861年9月死亡的胡林翼）相繼死去而遭到削弱；自三河鎮之役受挫以來士氣問題一直令人頭痛；在湖南征募新兵又日漸困難：凡此種種都使湘軍前途未卜，難以為繼。除此以外，曾國藩還急于通過擴大軍政權力結合這種新形式來利用他新近獲得的政治權力。就在李鴻章于1861年后期著手募軍之后不久，曾國藩決定薦舉他為江蘇巡撫，而在他抵達上海時被授予此職。在此以前，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受命節制南線，并奉令用湖南勇軍收復浙江。左宗棠是一位干練的湖南學者，在曾國藩和其他官員手下任過行政官員。1862年1月左宗棠被任命為浙江巡撫。

促使曾國藩決定把他的權力擴展到上海地區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他擔心外國軍隊在江蘇內地建立軍事基地，因為長時間來在上海逃難的社會名流一直在尋求它們的干預。曾國藩對外國的介入是否有用深表懷疑，他確信利用西方的辦法并非雇用外國軍隊，而是創辦中國的兵工廠來制造西式武器彈藥。

### 外國的介入

西方在50年代初期曾對太平天國抱有超然的、有時甚至抱有溫和希望的看法，但到此時這些看法都已化為烏有。到1860年時，叛軍主要被看做是對外國貿易的一種威脅。在中國市場上利益最大的英國，它的官方政策是堅持在內戰中嚴守中立，僅僅要求各通商口岸不受騷擾。但是英國領事和武官的一些文書函件則表現了對太平天國日益增加的敵對看法，它們強調“暴亂的破壞性質以及……它所據以存在的那些褻瀆神靈和傷風敗俗的特征”。[[20]](#_20_Bu_Lu_Si_De_Wen_Shu__Yin_Zi)英國擔心的并不是太平軍會對外國貿易甚至外國的條約權利采取敵視態度，它是擔心他們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政府，那就會使農村和商業陷入混亂。雖然英國各級行政官員都曾設想過干涉叛軍，但它的官方政策始終限于保護英國在貿易港口的利益，實際上僅限于決心保衛上海。法國得出了相同的結論（1855年法國的干涉曾幫助清軍從小刀會手中奪回上海）。因此李秀成于1860年8月19日和20日向上海的推進（這次嘗試只有3000人參加）被英、法軍隊所擊退。令人好笑的是，這次干涉恰恰發生在英、法另一支軍隊正在北方猛攻大沽炮臺的時候（見第五章）。

在1860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條約之后，英國決定暫不介入中國的內部沖突。太平天國被看作長江中游地區事實上存在的政權。1861年2月海軍少將何伯領導了一次對南京的考察，謀求達成一項穩定的諒解，使英國得以安全進行貿易，英國則以保證中立作回報。李秀成在南京接見了英國人（洪仁玕此時已被解除外事職務），甚至答應當年內不對上海發動進攻。太平軍將不進入上海周圍30英里之內。英國繼續在內戰中依法嚴守中立。但是到了1861年夏，駐北京公使卜魯斯則明顯地倒向了清朝。西方僑民社會對“瀆神”的太平軍基督教抱有日益增長的反感，而太平天國反對鴉片貿易的無情事實，也必然影響了英國的態度。1861年6月卜魯斯采納了赫德提出的建議，即由李泰國出面代表清政府購置一支海軍艦隊。10月份，即在曾國藩收復安慶后一個多月，卜魯斯應允了恭親王的請求：即長江上的外國船只不得在通商口岸附近以外任何地點停泊，以使太平軍難于得到外國船只提供的武器和物資。不過，卜魯斯無意讓英國干涉中國內戰，倫敦則更無此意圖。在12月，只有法國一艘和英國兩艘炮艦停泊在寧波港。駐扎在上海的外國軍隊，英國僅700人，法國僅500人。[[21]](#_21_Ge_Lei_Ge_Li____Ying_Guo_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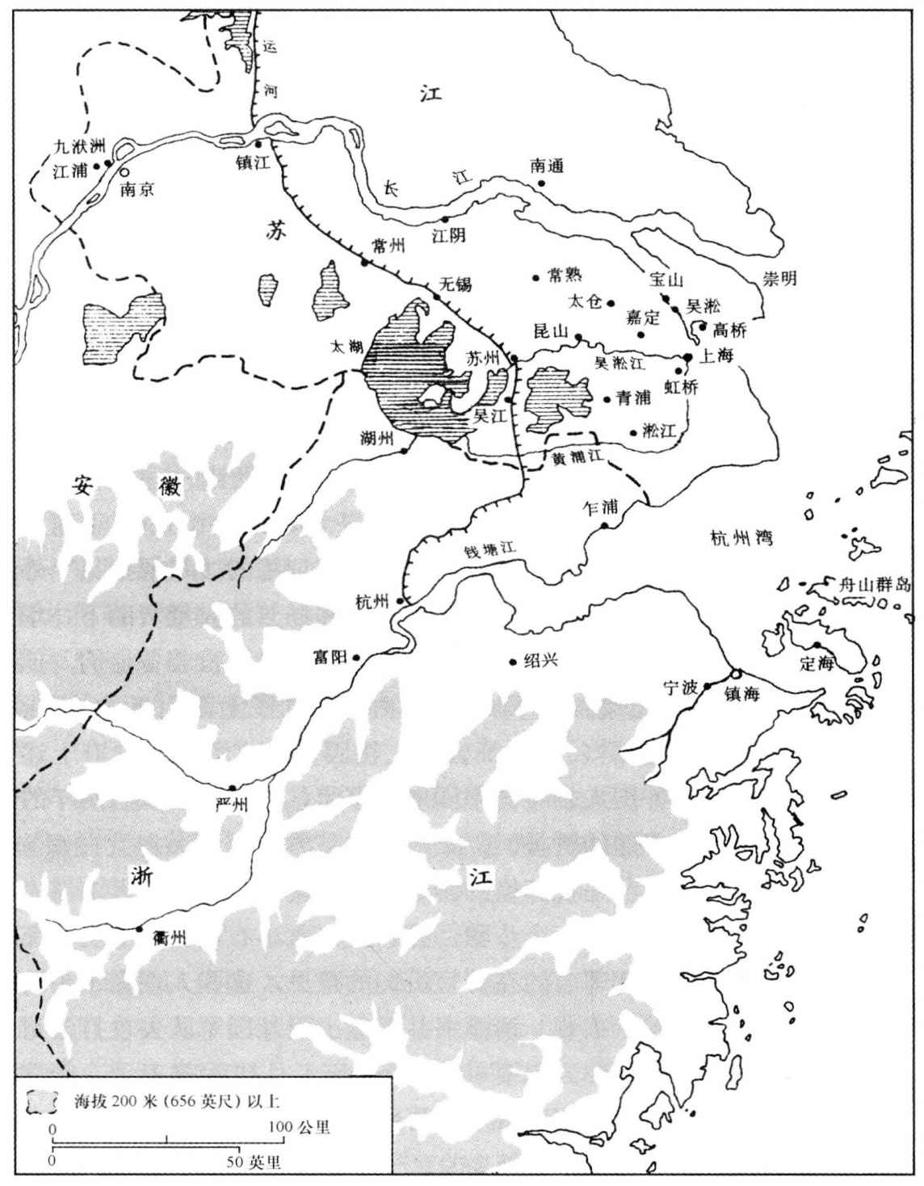


地圖11 太平天國和帝國主義者的斗爭

可是到1861年末，雙方都解除了各自的約束。太平軍迫于西線危急的軍事形勢，不得不鞏固它在沿海的地位，遂于1861年12月9日占領了寧波，29日占領了杭州。1862年1月李秀成對上海地區發起總進攻，占據了通往該城的河道。

與此同時，英國人開始從一個可以復興的和更為牢固的清政權的角度來考慮它未來的利益。1861年11月清廷發生的政變使英國萌生了希望，因為已故咸豐帝的弟弟恭親王在這次政變中成了清帝國的決策者（見第八章）。恭親王準備與新條約相依為命，英國公使卜魯斯則準備提供一切機會讓他照此辦理。此后，英國對太平軍進行的干涉應當被視為卜魯斯為穩定中英關系而作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沒有證據表明，英國害怕太平軍會成為一個潛在的更強大更排外的政府。恰恰相反，倒是太平軍那些不出所料的弱點和無紀律才促使英國反對他們，轉而支持清政府。

外國參與反太平軍戰斗的方式有下述幾種：英、法軍隊直接進行干涉；為清軍提供現代化的武器和訓練；為非正規雇傭軍分隊提供外籍軍官。無疑地，其中以外國軍隊的直接作用最不重要。雇傭軍分隊（其中以“常勝軍”為最突出）在江蘇對清朝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但歷史意義最大的莫過于提供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因為武器裝備與隨之產生的軍火制造業，其進步的技術可用來促進中國軍隊和軍事工業的現代化。[[22]](#_22_Yi_Xia_You_Guan_Wai_Guo_De_J)



地圖12 長江三角洲

長江下游地區的官紳長久以來一直在謀求西方對叛亂者的干涉。上海道臺吳煦（他的功名是捐來的）早在1853年便看出外國支持的潛在價值，此后他一直汲汲于謀求得到這種支持。1860年兼任江蘇布政使時，吳煦不僅本人熱衷于與買辦商人合股進行私人商業投資，而且還擅長通過商業行會征收厘金。巡撫薛煥手下有約4萬名綠營軍和鄉勇，但成分復雜，未經訓練，紀律很差。早在1860年5月，吳煦便著手征集一支規模不大的“夷勇”。在那個廣有資財的同胞和商業合伙人楊芳（此人是浙江銀行家，曾當過怡和洋行的買辦）的建議下，吳煦得到了華爾（1831—1862年）的效勞；華爾曾在中國輪船上任過職，在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度過童年后一直在海上和陸上從事冒險生涯。華爾膽大勇敢，性情急躁，但又胸無城府，一任楊芳擺布（他最后跟楊芳的女兒結了婚）。他和幾名高加索同伙領著200名菲律賓士兵于1860年7月攻陷了位于上海西北（應為西南——譯者）的一個重要小鎮松江，但不出一個月它又淪于叛軍之手。1861年他和其他官佐們（主要是美國人）在他們業已著手訓練的“馬尼拉兵”外又開始了對幾百名中國士兵的訓練。在吳煦和楊芳的大量資助下，華爾按照“英國方式”操練他的士兵并用精良的連發快槍裝備他們。他們的兵力到1862年已增加到3000人。由于參加了上海附近的戰斗，它被官方封為“常勝軍”，以象征吉祥。正因為這支混合部隊有上述來歷——基本上是外國人領導的中國雇傭軍團，所以它在以后兩年的江蘇戰役中贏得了普遍的贊譽。

不過在吳煦和江蘇巡撫薛煥的心目中，常勝軍僅僅是為謀求洋人直接援助所作的努力的第一個步驟。薛、吳二人小心翼翼地聽從了那些在上海避難的紳士和著名的在野官員們的意見，這些人現在領頭請求皇上“借”洋人軍隊助剿。請愿書甚至提出引外國軍隊去攻打蘇州和南京。紳士領袖們聲稱，巴夏禮在1862年1月初就曾表示，倘蒙皇上和卜魯斯批準，英國軍隊將不僅幫助防守上海，而且愿意長驅直入，幫助收復寧波、蘇州，甚至南京。[[23]](#_23_Yin_Zi_Wang_Er_Min___Huai_Ju)薛煥起初故作不應，保持觀望，只是等到有相當多的卸任高級官員簽名于請愿書上后才上奏清帝，贊助“借兵助剿”的請求。關于進攻蘇州和南京的建議也包括在內。同時經薛煥批準，吳云（蘇州前任知府）和應寶時（吳煦的副手）于1月13日建立了一個“中外會防局”，為期待已久的聯合作戰籌集經費。2月初發布的兩道詔令準許薛煥的建議只適用于上海：“上海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為保衛。”[[24]](#_24___Chou_Bei_Yi_Wu_Shi_Mo__Ton)至于把外國援助擴大到蘇州和南京的想法，則被提交曾國藩征求他的意見。

1862年1月13日當太平軍被發現沿吳淞江堤岸行軍時，英法軍隊僅從船上朝他們開炮而已。但是到了2月21日，海軍中將何伯便親自帶領遠征隊向上海東北10英里太平軍所占據的高橋發動了攻擊。何伯的炮兵得到了350名英軍和60名法軍的支援，還有600名華爾的士兵充作散兵和突擊隊。接著在整個4月里，對上海附近的幾個市鎮采取了類似的行動；但它們并不總是成功的，因為有些到手的市鎮防衛不當，很快便又被太平軍奪了回去。只是在2月22日何伯才致函卜魯斯要求批準肅清上海周圍30英里以內的叛亂者。直到4月12日才得到卜魯斯的批準，約在同時，士迪佛立將軍帶了約1800名英軍從天津抵達這里。2月25日北京向華爾的中西聯合勇軍表示祝賀，同時上諭批準了薛煥的建議：授予華爾以四等軍銜和花翎頂戴。5月1日至18日，英國、法國和華爾的聯軍乘坐英國炮艦往返于廣闊的內河水網，攻陷了30英里內的主要市鎮。對每個攻克的市鎮的大擄掠所得，都是按事先商定的協議進行“公平分配”。防務主要由華爾的士兵擔負，頗能勝任，只有兩個地方由英法軍隊自己擔任過。

上海得以免除太平軍的威脅，應當歸因于歐洲人在1862年5月下旬主動干涉的結果。然而自此以后，承擔主要防衛任務的是新開到的李鴻章軍隊。李鴻章和他的6500名士兵是在4月份從安慶分乘上海紳士向一家英國商號租來的七艘輪船順江而下，抵達這里的。李鴻章將他的行轅設在上海的縣城，他從一開始就決定，他的軍隊將不作為英、法的附庸來打仗，而要謀求自強，不與洋人相混。[[25]](#_25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

太平軍此時動員了約5萬軍隊向上海發起大規模進攻。英、法軍隊鑒于自己人數很少，便撤走了位于30英里圈內的嘉定的駐防士兵。華爾防守的松江也危在旦夕。士迪佛立將軍緊急要求倫敦從印度派遣大量援軍，這個想法一旦實現，很可能使歐洲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大增。但這樣的增援被認為是多余的，因為事實幾乎立即證明李鴻章和他的軍隊能夠應付局勢。當忠王的大軍于6月初從西面進攻上海時，淮軍在以6月17日虹橋之役達到最高潮的一系列戰斗中擊敗了他們。忠王看出上海不能很快被攻下，決定折回蘇州基地，并在那里著手策劃一次解救南京（它此時正受到曾國荃軍隊的威脅）的遠征。在別的將領指揮下幾支太平軍大軍繼續進逼上海，但它們也被受到華爾的分隊援助的淮軍所擊敗。李鴻章的軍隊于1862年8月底收復了除嘉定以外的上海周圍30英里以內的所有市鎮（嘉定于10月由中西聯軍收復，這是英法軍隊在太平天國戰爭中的最后一次攻勢）。

李鴻章確信只有通過獨立的活動，才能使淮軍獲得建立真正的區域性軍事霸權所必需的實力和經驗。他同樣也懷疑西方在軍事訓練方面的作用。1862年7月，當中央政府制定出由西方軍官訓練中國軍隊的試行方案時，李鴻章要求總理衙門不要贊助這種權宜之計，因為他擔心“歐洲人會逐漸蠶食對清軍的控制權”。[[26]](#_26_Jian_Di_An___Han_Kou_Ying_Zu)關于中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員抵制外國直接介入中國內戰，以倒霉的“李泰國—阿思本艦隊”事件表現得最為清楚，我們將在第九章予以論及，茲不贅。

### 太平天國的失敗

保皇派于1861年9月攻陷安慶，這非常鮮明地標志著太平天國西線作戰中（它曾經是洪仁玕在1860年制定的宏偉戰略的一部分）的失敗。對太平天國的地位來說，西線戰役在某些方面比東進更為重要，它的失敗部分是由于叛軍將領之間缺乏配合所致。李秀成（他曾因指揮才干于1859年受封為“忠王”）這時更多地關注他自己在長江下游的權勢基地，而不是戰略全局。這次指揮上的不統一，僅僅是太平軍在楊秀清死后企圖重建中央統一領導而遭到失敗的一個方面。洪仁玕一直不穩固的地位，也由于天王當時已不問政事甚或神志失常而更有所削弱。在戰地將領的妒忌和朝臣的誣陷下，他于1861年初被剝奪了總理朝政的職權。嫉妒和野心也使太平軍的權貴變了質，因為為了滿足軍事將領的欲求，冊封了許許多多“王”，而其中某些人不過是很勉強地投身于這場運動的。雖然個別叛軍隊伍仍保持著令人可畏的兵力，但安慶的失守和中央控制的瓦解業已鑄成太平天國覆滅的局面。

太平天國的覆滅最后是由曾國荃對南京的圍攻，以及李鴻章對沿海地區和左宗棠對浙江省進行的清剿來完成的。李鴻章從東面橫貫江蘇發動的強攻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它反映了這位精明而善于應變的首領力求控制上海及其鄰近地區的商業財富，因為這是財富和權力的新的源泉。作為中外貿易的新中心，上海因人口急劇增長，并有資財雄厚的流亡紳士階層以及與內地商業的多方面聯系，所以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軍事基地。李鴻章剛就任江蘇巡撫，便立即著手控制關稅收入和江蘇厘金。這兩項貿易稅，尤其是江蘇厘金，確實是他以后幾年軍事行動的財政支柱。李鴻章經過無情的官場斗爭后贏得了對這些財源的控制權，到了1862年下半年，他不僅能夠維持他自己迅速擴大的淮軍，而且能夠為曾國藩那支因欠餉而日漸不滿的軍隊提供大量的經費。

當1863年李鴻章的軍隊節節擊破堅守在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城鎮中的太平軍時，他的軍隊已經超過了5萬人，這就為中國武裝力量具有重大意義的第一次現代化創造了條件。李鴻章與他的作風守舊的老師曾國藩頗不相同：曾國藩不讓他的湘軍采用外國裝備，而李鴻章則敏銳地認識到他控制上海時在技術上得到的意外收獲。他不僅從西方購買了大量來復槍輕武器和西式野戰炮，而且雇用英、法兩國軍官來訓練他的軍隊使用這些武器。到1864年春，李鴻章的軍隊已裝備了約1.5萬支步槍。為了供應這支軍隊所需的彈藥，還要進行另一項改革：李鴻章從1863年起在上海、蘇州，最后還在南京迅速建起了生產現代軍火的兵工廠。為鎮壓國內叛亂而在軍事現代化方面所進行的這種種早期的冒有風險的事業，展示了清朝統治最后幾十年的態勢。把現代化裝備用于正統的軍隊，這意味著在未來50年內能夠相當成功地維持國內的秩序，盡管在這個時期中國尚不能建立一支抗御外國侵略的武裝力量。

常勝軍自1860年建立以來，雖然有過連續幾次領導危機，卻安然無恙地維持了下來。它的第一任統領華爾與支持他的中國商人及清朝當局的關系搞得不錯。為了顯示和加強他作為中國軍事制度的助手的作用，華爾被授予了中國綠營軍的管帶官階。1862年9月華爾受傷致死。他的繼任人是另一個美國人白齊文，此人桀驁難馴，很少順從中國方面的意圖。他被解職以后，常勝軍改由英國皇家工兵少校戈登（英國駐上海指揮官士迪佛立將軍的密友和親戚）指揮。他收到了倫敦發來的要他接受中國人指揮的明確指令。上海的英國當局起初不同意擴大分遣隊的作戰范圍，后來才作了妥協，這樣分遣隊的作戰范圍就從最初防衛上海地區擴大到協同李鴻章的軍隊到西線攻打太平軍的據點。在這些戰役中，戈登的炸炮和突擊隊證明確是清軍手中的得力武器。在整個1863年中，常勝軍都在戰場上為攻取叛軍在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據守的城鎮而沖鋒陷陣。在常熟、太倉和昆山取得的重大勝利使清軍空前地逼近了該地區的行政和經濟中心蘇州。1863年12月5日蘇州的陷落（部分得力于守城者有人變節）確是叛軍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戈登作戰有兩個特點特別值得一提：由于應用了英國按優惠條款提供的現代火炮，在根本上改變了迄今為止內戰所特有的古老攻堅方式。許多曾經庇護過太平天國文職政府并成為軍事防衛的支撐點的城市，它們的墻垣不再能安全無虞了。其次，李鴻章在江蘇東部戰場上的勝利，牽制了太平軍防御天京的力量（當時它正處在曾國荃的圍攻下），從而加速了太平軍運動的最后失敗。

太平軍在都城被圍和他們長江下游的經濟基地業已喪失的情況下，仍狂熱地進行了最后的殊死戰。1864年7月19日曾國荃破城而入，大肆屠殺南京居民，并縱火焚燒了這座城市。據說約有10萬人在最后的這場浩劫中喪生。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就病歿了。其余的領導人被窮追不舍，直到捕獲處死為止。逃出來的少數小股部隊被趕到廣東，第二年也在那里被消滅了。唯一幸存的力量是遵王賴文光的軍隊：他這時招募了許多被清朝殘酷的“剿捻”戰爭弄得無家可歸的安徽難民，并按太平軍方式對他們加以組織和進行教育，誓死要繼續進行斗爭。賴文光和捻軍的結盟使太平軍的這支殘部一直延續到1868年。不過作為一個政體和宗教團體，這個運動在1864年就被有效地撲滅了。應當認為，勝利者一心一意搞橫暴行為，它不僅毀滅了太平軍的軍政機構，而且使太平軍的傳統本身也實際上在劍與火中煙消云散了。

當考察太平軍失敗的原因時，我們立刻會遇到的困難是，不能完全用純軍事方面的理由來解釋。叛亂在最后三年出現火力方面的差距，但僅歸因于這個因素，還不能令人滿意。太平軍不乏新式武器。眾所周知，李秀成到1862年已經通過西方商人和投機家弄到了幾千支步槍。然而太平軍在戰略上的敗局卻早在1861年隨著西征最后失敗就已命定地形成，這時甚至李鴻章的淮軍尚未建成。同樣，也不能把外國軍事力量的介入看成是決定性的因素。其中領導集團的分裂比這些原因都重要：洪秀全在政治上的無能意味著一元化的集權只能通過他的親信之間的競爭才會出現。不過即使根據太平天國內部虛弱這一說法仍不能充分解釋，何以清王朝的保守派人士在如此可怕的挑戰面前而仍能重新控制國內局勢。答案只有通過我們重新估價太平軍運動的內部特點以及它與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才能找到。為此目的，我們將太平軍與捻軍這支大約同時在北方和中部各省活動的叛亂隊伍作一番比較，可能不無益處。

## 捻軍的組織特點：一個比較

捻軍在1853年以前的歷史不大為人所知。然而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它是由白蓮教叛亂的殘余人員發起的，但嚴格地說又不是裔出白蓮教派的一個組織。捻軍運動的中心地帶是淮北地區，即淮河以北的安徽、河南、江蘇的交界地區。這是一個飽受旱澇之苦的旱地耕作區，在白蓮教起事時，這里的窮人為饑餓所迫大批加入了清朝倉促組成的勇營。當這些人最后被遣散回鄉時，他們既不指望可以找到農業生計，又不甘心聽任命運擺布。他們便與那些幸存的反叛者為伍，在當地干起了盜匪營生。[[27]](#_27_Fang_Yu_Lan____Xing_Lie_Ri_J)

這個構成早期捻軍運動的基礎的社會變化過程，今天仍然是關于19世紀歷史的研究中空白最多的一個領域。現有資料表明，至少有這樣兩個過程應當加以考慮：（1）“捻”這個詞在意義上的變化，即它如何從一個表示土匪組織俗稱的普通名詞，變成了一個表示認識其集團身份的特殊組織的專用名詞。（2）流竄于交界地區的非法之徒為把他們的影響逐漸擴大到淮北平原的定居社會所采取的步驟。

當時任御史的陶澍在他的一份重要奏折中揭示了捻軍運動在1814年——即白蓮教叛亂被鎮壓下去之后十年——所表現的形式。白蓮教的那些四處星散的余眾在河南和安徽交界的統治薄弱地區結成了有組織的幫伙。他們利用地方官員的怠惰和玩忽職守，得以自由無阻地跨省越界，躲避追捕。這幫全副武裝的盜匪以劫掠、勒索和販運私鹽為生，其行蹤所至已遠遠超出了定居社會的范圍。這種結幫的成員名稱各異，或稱“劍客”，或稱“紅胡子”（這或許因面部涂抹偽裝顏色而得名，或許來自劇目中粗暴強橫人物的傳統化裝）。一個幾十人或上百人的幫伙通常被稱作“捻子”或“捻”。[[28]](#_28_Tao_Shu____Tiao_Chen_Ji_Bu_W)

不過，上述地區這些非法之徒的性質正在迅速演變。到1814年這一演變過程已經開始，即捻子不再是那些走投無路、一無所有的人們一種單純的組合，它已經變成定居社會中有錢有勢人家的工具。捻子有許多同當地社會緊密聯系的方式。頭目們在集鎮開設賭場，把無業游民和亡命之徒集合在周圍。捻子給村社造成的恐怖致使許多家庭以向其頭目宣誓效忠的方式來尋求保護。一個旁觀者寫道：“族有捻，族幸；家有捻，家安。”[[29]](#_29_Fang_Yu_Lan____Xing_Lie_Ri_J)到了19世紀20年代，捻子的下層社會已牢固地植根于當地的宗族制度之中，同時又靠宗族中有財勢的族長們向下延續并向外傳布擴散。[[30]](#_30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私鹽販子們也有一種傾向，想尋求安全的寄身之所。因為私鹽販子的頭頭們不免常被官方追捕者和敵對者帶來的致命危險所困擾，他們便在村落中定居下來，四周筑以土墻，全副武裝，謹防任何不速之客來犯。[[31]](#_31_Bao_Shi_Chen____Huai_Yan_San)

很清楚，到了19世紀中葉，分散的捻子業已與淮北地區許多村社的經濟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了。可能整個整個村落都要以劫掠為生。一個捻子頭目帶領村民四出搶劫，然后滿載財物歸來，掠奪物的一半歸首領所有，余下的一半則由追隨者去平分。這樣“捻”就有了兩個含義：一是指全副武裝的盜匪，一是指以村社為基地的半武裝團體。因而它們與南方下層社會中的“堂”和“股”頗相類似。地方上“捻”的頭領與廣西三合會的“米飯主”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地方上有財勢的人物，都通過提供另一種經濟地位和新的社團結合形式，把那些靠正當職業無以為生的人聚集到自己周圍。

一個令人費解的重要問題始終存在，即捻子是否能夠在總的方面被看成白蓮教的一個分支。通常靠援引陶澍一類官員的敘述來證明捻是白蓮教的分支；陶澍認為“紅胡子”就是先前“漏網”的白蓮教叛亂者。[[32]](#_32_Tao_Shu____Tiao_Chen_Ji_Bu_H)不過一直搞不清楚的是，白蓮軍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實際是白蓮教教徒。白蓮教在三省邊界地區的定居集團和本地非法暴徒中曾廣泛招募教徒，因此大致上可以說，這樣招來的許多人與白蓮教教義及其組織僅保持一種松散的聯系。如果確系如此，那么白蓮軍的殘余必定相當龐雜。如果再加上捻子還包括原來反白蓮教的兵勇的資料時，那就很容易看出，白蓮教派自身對早年的捻子必然只起過有限的作用。這一推測有1822年的一項記載可為佐證：它說在豫皖地區的朱鳳閣叛亂中，官員們能夠清楚地把白蓮教徒與捻匪區分開來。[[33]](#_33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在1853年以前的時期，白蓮教特有的調和各派教義的宗教和它的啟示性的政治路線似乎是捻軍所完全不具備的。鑒于捻軍運動的人社會出身大不相同，我們有充分根據假定捻子和白蓮教教徒之間有些交叉情況；但是嚴格說來，把捻子稱作白蓮教教徒則是錯誤的。19世紀50年代以前實際上只存在個別小股的相當松散的結合，通常稱之為“捻”，他們的頭子的世界觀是世俗的，他們對共同的出身和共同的命運的認識，如果說有的話，也只是很模糊的。

捻子中聯合的最初跡象以及最初萌發共同的政治覺悟是在50年代初期的危急年代中出現的。并且就在這時或稍前不久，它們才有了“捻”這一人所共知的專用名稱。1851年開始了黃河改道這一悲劇性過程，它從山東半島南端改到北端，還有殃及淮北廣大地區的一連串水災。雖然直到1855年8月才發生大決堤使河水向東北橫溢，但從1851年起饑饉和破產已年年出現。那些年經濟上的絕望加劇了村社之間世仇械斗的地方性隱患，這個情況對我們了解捻軍運動的性質是相當重要的。像南方的三合會那樣，捻子也帶頭在村寨設防以反對鄰近的村落，使自己也能在當時社會生態學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他們作為地方防御領導者所起的作用在1853年初變得更重要了，因為太平軍這時正進抵長江流域，促使了安徽農村軍事化的普遍實現。另外，促使軍事化過程的是淮北村寨擁有許多非法火器，這使地方官員一直皺眉不已。[[34]](#_34_Tao_Shu____Chou_Kuan_Chi_Jia)現在政府出于防御太平軍的需要，對這一軍事化行動加以鼓勵，從而剛好擴大了捻子的社會基礎，因為需要捻股首領們負責幾十個村寨的防務。捻的村社組織很難同正統的“團”區分開來，因而這兩種組織必須看成同一種類型：許多村落各各筑有堅固的圍墻，在共同防御圈內有義務彼此相助，并由鄉勇把守。稱作“團”的這種組織，有許多實際上都由捻領導，或者后來聽命于他們。仍受正統紳士控制的“團”越來越少，而在淮北地區作戰的官軍則普遍陷于懷有敵意而組織完善的民眾的包圍之中。

雖則捻子的村社基礎在不斷鞏固，但他們把一股股武裝捻子合并起來的過程則是緩慢的，并且是趑趄不前的。繼許多地方領袖斷斷續續作了一些嘗試之后，終于在1852年由18名首領帶領人馬匯集在張樂行的麾下；張樂行是雉河集（現安徽渦陽）上一名一字不識但頗有勢力的地主兼私鹽販子。這個集團在政府軍的攻擊下不久便陷于瓦解，張樂行本人則被地方知府任命為“民團首領”。不過他在名義上歸順政府為時很短暫，在1855年末到1856年初他就跟他的同伙著手把分散的捻股集結成一個新式組織。在兩個小紳士的提議下，張被任命為所有捻子的首腦，擁有“盟主”的稱號。捻子戰士被松散地編成五個“旗”，每旗約2萬人，成為小股捻子的聯盟。在后來年代里，由于一些新的反叛集團的形成并被吸收入股，“旗”的數目增至12個或者更多。首領們各自保留了先前的許多自主權，因而張樂行不像是那種權力業已集中的軍隊的領袖。不過這種原始的組織結構卻容許捻股在廣泛范圍內進行合作，以致在隨后的年月里竟使戰斗席卷了八個省份。

捻子的活動方式是有季節性地搞軍事活動。捻旗依靠像張樂行在雉河集設防的那種地方軍事基地，每逢春秋季節都要外出到周圍一帶進行搶劫，然后按時返回家鄉。他們花很大力量來保衛鄉里和建立捻軍在鄰近地區的新分支組織的中心。這意味著許多捻子過著兩重生活：既與村寨有緊密聯系，又與他們的軍事組織有緊密聯系。不過另外一些人，例如無家可歸的饑民和流浪的私鹽販，在加入捻軍隊伍后則必須完全而長期地過軍事化生活。

至此，捻軍運動不僅體現了更緊密結合的組織，而且還有更明確的象征性的內容。它的領導集團為了樹立能吸引普遍支持的形象，用折中主義態度搬用了白蓮教的口頭傳說和太平軍的各種象征。張樂行接受了“大漢明命王”的稱號，這個稱號不僅是對滿族王朝的挑戰，而且間接地表明它承襲了白蓮教所崇奉的摩尼教信仰。這可能是為了鞏固與各地白蓮教信徒的關系所采取的一種策略，因為許多白蓮教信徒這時已是捻旗的成員了。雖則有人認為捻旗本身的形式可能是從“八卦教”（白蓮教的一個派別）的一套做法中借用來的，不過其實際淵源仍未弄清楚。然而有一點已很清楚，那就是在1856年以后的幾年中，捻軍吸收了象征異端傳統——其中也包括白蓮教傳統——的非常明顯的內容。但這是否能夠表明捻軍此時已在事實上作為白蓮教的一個分支出現，仍是大可懷疑的。甚至在捻軍的現階段，最好把他們理解為從黑手黨那樣的地方下層社會生長出來的組織：它在重建和擴充過程中，發現上策莫過于從一應俱全的傳統異端庫藏中擇取各式各樣的象征性內容來加以發揚。

政府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幾次剿捻之戰，由于內部領導意見分歧和無能而受到挫敗。像袁甲三這種墨守成規和貪污腐敗的官員，無論在聚殲捻軍或在重建對捻軍根據地的控制等方面，都毫無進展。叛亂者的騎兵到1858年已增加到2萬多匹馬，他們證明甚至比驍勇剽悍的蒙古王公僧格林沁還厲害；1860年僧格林沁的北方騎兵襲擊了這個地區。作為一名統帥，僧格林沁證明是一個失敗者，主要原因是他不能與其漢族同胞一起共事。雖然他于1863年對捻軍據點發動猛攻時收復過雉河集并把張樂行捕獲處死，但死者的侄子張宗禹仍保持了捻軍的實力，捻軍在他的領導下于1865年包圍并殺死了僧格林沁。對北京來說，失去這位統帥是堪與1860年江南大營被殲相比的重大損失。情形也跟1860年相仿佛，朝廷轉而求助于新軍。最后擊敗捻軍的幾次戰役所依恃的并非騎兵的突襲，而是穩扎穩打的合圍；這一戰略就是太平天國的征服者曾國藩提出來的，他于1865年出任剿捻統帥（見第八章）。

作為一場叛亂，捻軍在政治上對清朝的威脅比太平軍要小得多；然而它們在某些方面卻更持久，更不容易被鎮壓。其持久性主要應歸因于它們與地方社會制度有內在聯系。捻軍的基礎是血親關系的紐帶和村社之間慣有的協作方式，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不能被看作是對帝國正統性的有力挑戰，只不過是對帝國權力的局部抵制。他們肯定不是對正統價值體系的威脅。確實，他們的社會基礎是因襲傳統的，與其政治傾向的模糊不謀而合。這樣，捻軍便能輕易地與其他叛亂集團合作，但不對任何人承擔義務。與太平軍不同，捻軍與周圍社會的地方非法之徒和叛亂集團融洽相處。他們同幅匪、宋景詩指揮的黑旗軍、白蓮教以及敵對的團練組織，能夠在特定的基礎上互相影響，從中受益。捻軍與太平軍曾達成一系列協議，這些協議有理由使太平軍為之后悔。捻軍首領李昭壽于1858年曾帶領他的大部隊馳援安徽的太平軍，但太平軍卻不能向他們進行紀律和信仰的灌輸。李昭壽本人不久還倒向了清朝。捻軍反抗的漫無目的性，確實可以從其首領們反復無常的行動中看出，同一個人往往反復變節多次。生員苗沛霖是土豪，他對雙方都叛賣，他的長期經歷只有按照兩淮地區內戰中普遍存在的朦朧的價值準則才可以理解（關于捻軍運動及其結局，更詳盡的闡述見第九章）。

## 太平軍叛亂的透視

捻軍牢固地植根在農業社會中，受到傳統觀點的限制。太平軍則不是這樣的。首先，這一事實很重要，即太平軍的宗教從未成為民眾文化的組成部分。客家人改信基督教和使用暴力打出老家，其間僅隔六七年時間。太平軍運動與白蓮教和三合會傳統有這種顯著的差別，這可以部分地解釋它不僅作為一個世俗制度，甚至作為一個信仰結構，為什么會如此有效地被消滅。在確定太平軍運動的真實性質時，觀念形態和社會兩方面的因素起了主要的和互為補充的作用。由于客家人毗鄰西方入侵地點，他們的村社通過洪秀全能夠接觸到一種對中國傳統的價值準則從根本上起瓦解作用的教義。此外，這個教義體現了一種不妥協的二元論和一種救贖上帝選出的黎民的啟示性諾言。同樣地，在社會方面這一教義被注入種族分化的環境之中。壁壘森嚴的客家人抱有煢煢孑立、非我族類的感覺，這完全反映在此時牢牢地支配著他們的信仰上面。

然而客家人仍然是漢族血統，因此可以有說服力地向漢民族發出驅逐異族壓迫者的號召。太平天國神權政治的總號召描繪了一個被壓迫的少數派最后得救的圖景。但是關于救世主的宣傳和教義的排他性，在中國傳統這個背景中是有些實際困難的。首先，它們妨礙了太平軍與其他叛亂集團的合作。他們所崇奉的純粹主義和奧秘的思想體系不利于太平軍同那些無論怎樣反滿，但仍然立足于傳統信念和傳統組織形式的團體去結成聯盟。太平軍與三合會和捻軍的關系反映了這種困難。盡管太平軍與它們偶爾也進行過合作，結果都沒有形成長期的聯盟。在19世紀中葉，農業中國形形色色的叛亂連綿不絕，沸反盈天。它們僅能進行一定的戰術合作，這一事實使它們很容易遭到鎮壓。其次，太平軍摒棄傳統的社會價值準則和制度，這個事實使他們更難于把勢力伸展到所占城鎮以外的農村內地。對太平軍來說，城市是清帝國正統性的象征，也是使他們那些獨特的制度能得到培育的溫床。農村組織的各種固有形式更容易被正統的上層人士所利用，他們通過自己的地方團練竟然成功地對太平軍占據的一些中心城市以外許多縣的農村保持著控制。因此，太平軍和它力圖加以統治的農村社會之間存在著文化上的鴻溝，這鴻溝往往與城鄉之間的鴻溝互為表里；這是一種文化分裂的難以理解的怪事，隨著西方勢力侵入通商口岸，中國以后的幾代人都將深受這種文化分裂之苦。

可是，恰恰是太平軍的這些缺陷向人們顯示了它的偉大的歷史意義。太平軍比同時代任何其他叛亂都更加專心致志地直接對付他們的時代危機，并提出了解決危機的具體辦法。太平天國關于新的所有制、新的地方控制結構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嶄新關系的見解，就是針對清帝國后期那些令人矚目的問題作出來的真正的反應。由于太平軍的這一特有的現象以及太平軍產生的背景，要把19世紀的中國社會史只歸之為王朝衰亡史這一習見的類型，恐怕是很困難的吧。

（厲以平 譯）

[[1]](#_1_5)《新寧縣志》卷16，1893年版，第6—9頁。關于三合會與瑤人的早期關系，見魏源的《圣武記》（卷7，第41—45頁）與徐珂的《清稗類鈔》（卷66，第10—11頁）關于1832年湘南瑤人叛亂的記述，但這兩條記載互有出入。

[[2]](#_2_5)關于洪秀全的早期生平，見邁克爾和張仲禮合編《太平軍叛亂的歷史與文獻》；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第1—22頁。關于梁阿發，見1965年臺灣復制版《勸世良言》的鄧嗣禹的導言，第1—24頁。我的分析即以此版為據。

[[3]](#_3_5)沒有什么證據支持簡又文的下述論斷（簡著《太平天國全史》，第41頁）：洪秀全此時已決心要消滅清政權。據認為洪在歸途中所寫的一首詩雖暗含他有重大的政治抱負，但這詩的時期不能確定。

[[4]](#_4_5)此處提及的作品見《太平詔書》（1852年發表但包括了一些被認為是1844—1846年所寫的材料），載于向達等人編的《太平天國》第1冊，第87—98頁；英譯文載邁克爾和張仲禮合編的《太平軍叛亂的歷史與文獻》。

[[5]](#_5_5)《潯州府志》卷4，1874年版，第14頁。邁隆·科恩在《作為中國東南地區社會文化變種的客家方言》一文中對客家人的居住類型和種族沖突作了重要的分析，此文載《民族歷史學雜志》15.3（1968年）。

[[6]](#_6_5)關于太平軍的人數，見張德堅《賊情匯纂》（其部分內容始于1854年），這篇材料轉載于向達編《太平天國》。

[[7]](#_7_5)《天命詔旨書》，見向達編《太平天國》。

[[8]](#_8_5)《頒行詔書》，見向達編《太平天國》。

[[9]](#_9_5)《太平詔書》，第92頁。

[[10]](#_10_5)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第45頁。

[[11]](#_11_5)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冊，第125頁引汪士鐸《乙丙日記》。

[[12]](#_12_5)《天朝田畝制度》，載向達編《太平天國》第1冊，第321—326頁。

[[13]](#_13_5)關于正統反對派的改組，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569—592頁（論唐鑒部分）；沈陳漢音（音）：《曾國藩在北京》，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7第1期（1967年11月）；何貽焜：《曾國藩評傳》，第25—30頁；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35—148頁。

[[14]](#_14_5)關于湘軍，見羅爾綱《湘軍新志》，第67、97—112頁；肖一山：《清代通史》卷3，第411—415頁；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第1039—1080頁；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05—135頁。

[[15]](#_15_5)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61—62、222—229頁。

[[16]](#_16_4)陳志讓：《咸豐時代的通貨膨脹》，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卷21（1958年）。

[[17]](#_17_4)酈純：《太平天國制度初探》，第472頁。

[[18]](#_18_4)酈純：《太平天國制度初探》，第65、94—98、338—383頁；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第655—669頁；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第119—121頁。

[[19]](#_19_4)《欽定士階條例》，載肖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第937—938頁。

[[20]](#_20_4)卜魯斯的文書，引自格雷戈里《英國與太平軍》，第99頁。

[[21]](#_21_4)格雷戈里：《英國與太平軍》，第118頁。

[[22]](#_22_4)以下有關外國的介入問題，大部論述得到劉廣京教授的幫助，謹此致謝。

[[23]](#_23_4)引自王爾敏《淮軍志》，第55頁所引。

[[24]](#_24_4)《籌備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第3頁。

[[25]](#_25_4)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15—16頁。

[[26]](#_26_4)見迪安《漢口英租界的建立》，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卷32（1972年），第95—96頁。

[[27]](#_27_4)方玉瀾：《星烈日記匯要》，見范文瀾編《捻軍》第一冊，第309—314頁；江地：《初期捻軍史論叢》，第1—38頁；鄧嗣禹：《捻軍及其游擊戰》，第46—76頁。

[[28]](#_28_4)陶澍：《條陳緝捕皖豫等省紅胡匪徒折子》，載聶崇岐編《捻軍資料別集》，第5—9頁。

[[29]](#_29_4)方玉瀾：《星烈日記匯要》，第310頁。

[[30]](#_30_4)《大清宣宗實錄》卷41，第7頁。

[[31]](#_31_4)包世臣：《淮鹽三策》，載《皇朝經世文編》卷49，第4頁。

[[32]](#_32_4)陶澍：《條陳緝捕紅胡匪徒折子》，載聶崇岐編《捻軍資料別集》，第6頁；黃鈞宰：《金壺七墨》，第337頁。

[[33]](#_33_4)《大清宣宗實錄》卷41，第7頁。

[[34]](#_34_4)陶澍：《籌款飭繳兇器折子》，載聶崇岐編《捻軍資料別集》，第18頁。

# 第七章 中俄關系，1800—1862年

## 擴大商業的努力歸于失敗

俄國是在亞洲腹地進行活動的唯一的歐洲大國，它在滿洲這個天地里占有一種特殊地位。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曾經規定過一條大致的邊界，并且在清帝國和莫斯科帝國之間確立了平等的原則。1727年的三項初步協定和恰克圖條約，曾使邊界線向西延伸，并規定蒙古北部邊境上的恰克圖和尼布楚附近滿洲邊境上的粗魯海圖[[1]](#_1___E_Zhong_Tiao_Yue_Hui_Ji__16)為俄國人進行貿易的地點。清帝國的商人和俄國商人可以在這兩個地方進行免稅的貿易，不過粗魯海圖并未能發展成為一個商業中心，所以所有合法的私人商業，實際上都是在恰克圖進行的。總之，自18世紀20年代以來，俄國便擁有一個雙方按平等原則交往的從事中俄私人貿易的市場。這種條件是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國沿海取得而未能如愿以償的。

除了恰克圖的貿易外，俄國還可以每三年派一個商隊前往北京，不過條件是該商隊的領隊得履行中國方面的朝貢禮節，而俄方則獲準在北京保持一個東正教傳教士團。除了這些特許權外，清政府不讓所有俄國人入中華帝國之境。

俄國官方的商隊并不是有足夠的利益可圖的。走私的皮毛充斥于北京的市場。俄國的出口貨物繞過恰克圖前來蒙古的庫倫和滿洲的嫩江，而中國的貨物則繞過恰克圖運往伊爾庫茨克。自1755年以后，俄國政府不再派遣國家的商隊前往北京。在1768年，恰克圖條約的一條修改條款重申了在恰克圖和粗魯海圖進行的免稅貿易，并試圖改善有關邊境事務的管理。但是困難依然無法克服，于是清政府便不時中斷貿易，其中時間最長的一次發生在1785—1792年。但是，即使在恰克圖關閉期間，中俄貿易仍然通過定期集市繼續進行。在18世紀的絕大部分時期中以伊爾比特的集市最為重要，它在該世紀的最后25年中遇到了馬卡爾耶夫集市（它在1816年的一次火災后遷到了下諾夫哥羅德）的競爭。運往這些地方的貨物，有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沃洛格達運來的毛皮；有從莫斯科和雅羅斯拉夫里運來的棉布；也有從伏爾加河各城市運來的皮革。俄國商人將這些貨物售與西伯利亞和中亞的商人，然后換回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出產的貨物。

1792年，清俄雙方談判再開恰克圖的貿易，同意各自根據本國法律懲處非法越境的人犯，從而清除了一系列枝節問題的麻煩。但是，為了報答這次貿易的重新開放，俄方政府必須忍受清帝國的恩賜的口吻，這種恩賜的態度，在1792年的恰克圖市約中有所反映，雖然反映得相當隱晦。造成清朝與俄國之間關系惡化的復雜情況依然未變，原因是自從17和18世紀以來，清王朝進行的征服在某種程度上使俄國吃了虧，因為征服減少了俄方的貿易，并在游牧民的心目中確立了清王朝的主導地位。到18世紀90年代俄方還多了一層擔心，這就是英國人在中國所取得的商業成就有可能損害恰克圖的貿易。

大約在19世紀初期，歐洲俄國對茶葉的需求日益增長（與此同時，英國人在廣州也需求這種商品），這也促進了在恰克圖用俄國毛皮交換中國棉花和絲綢的交易。不久，茶葉的出口額便達到了中國對俄總出口額的40%。其他的中國出口貨物有球狀煙草（此物在西伯利亞特別行銷）、草藥、香料、大黃以及品種繁多的各項奢侈品和工業制品，如瓷器、金屬制品和玻璃制品。這種貿易恐怕只是以物易物，不過，盡管清朝作了許多限制，仍然有相當數量的白銀通過恰克圖流出了中國。

1800年，俄國政府試圖靠加強官方控制和公布一套《對恰克圖關卡和貿易合伙人的指令》的辦法，從恰克圖的邊境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好處。此辦法企圖劃一價格、調整關稅和取締外國的競爭。歐洲和美洲的商人被禁止在恰克圖的俄國一側進行貿易，可是外國的制造商們仍然在市場上占有很大的比重，只有1812年是例外，當時拿破侖侵入了俄國。從1800—1824年是恰克圖貿易的高峰年代，商業總額增加了將近90%，即貿易額從8383846盧布增加到了15960000盧布。[[2]](#_2_Si_La_De_Ke_Fu_Si_Ji____1917N)

到1800年時，在新疆西北邊境，固勒扎和塔爾巴哈臺也進行非法的中俄貿易。由于俄國商人對在伊犁和塔爾巴哈臺唯一享有貿易權利的哈薩克人的貿易額一直在擴大，清政府于1768年曾規定哈薩克人除牲畜外，不得運進其他任何貨物，以此來限制他們攜帶俄國貨物。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哈薩克人的貿易項目又逐漸繁多起來，同時隨著違反商業規定的事件日益增加，政府當局便另謀別法來對付這種情況。俄羅斯帝國的商人們開始自己來做生意了。最初來到這里的只有韃靼人和西伯利亞的穆斯林。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塔什干人也參加了貿易，他們每次用兩三匹馬把小批貨物偷運到伊犁和塔爾巴哈臺，并且充當哈薩克蘇丹的代理人。開始時，新疆地方當局故作不知，但是過了不多時間便開始向這種商業征稅。清政府并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它一直嚴密監視著俄方的活動。例如它竟然發現俄方在納倫河地區內設置了邊境哨所。清當局對此提出抗議，后來清政府和俄方官員在1794年幾經交涉，俄國人才將幾個最易引起反感的哨所拆毀。

1797年，俄國政府命令該國官員沿額爾齊斯河加速發展與新疆之間的貿易（雖然這樣做是違反恰克圖條約的），而同時固勒扎和塔爾巴哈臺的貿易仍在不斷發展。中國的漢族商人和清朝的官吏貪婪地購買俄國人的棉布、鐘表、刀和其他雜貨，而其中的筒風琴在當時被當作奇珍而大受歡迎。清朝的臣民愿意出俄國人視為荒唐的高價，用磚茶和錦緞（特別是受到高度贊賞的和闐彩色棉織物）以及條文規定不準出口的白銀來交換這些俄國貨物。清朝的商人欣然同意賒欠，于是俄國的韃靼人便發了財，新疆也就成了“冒險家的不折不扣的加利福尼亞州”。雖然出身于歐俄的貿易家也不時來到新疆邊界上，但是，當時因在固勒扎和塔爾巴哈臺做大生意而聞名的只有一個人，他名叫桑尼科夫，一位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商人。

在進入19世紀的前后，還有其他一些信基督教的商人和旅行家也來到了新疆。其中人數最多的是亞美尼亞人。來自伊斯坦布爾的兩位阿達拉修教派的教士在葉爾羌、和闐和阿克蘇曾經商多年而未受限制，而設在喀什噶爾的亞美尼亞人的商會甚至還有它們自己的教堂。來自第比利斯的一位格魯吉亞人名叫拉費爾·達尼別加什維里曾游歷了拉達克、葉爾羌、阿克蘇、吐魯番和準噶爾，而且大約就在這時，一位德國軍官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人們只叫他喬治·呂德維希·封——則游歷了帕米爾諸國、浩罕、哈薩克草原、喀什噶爾和葉爾羌。印度的貿易者在新疆經商顯然是不受干預的。

從18世紀70年代或比這還早的時候起，主要是由衛拉特蒙古人運來的俄國貨就打進了西藏。在班禪喇嘛贈送給英屬東印度公司的禮物中就包括“打著沙皇雙頭鷹金印的俄國皮革”，而早在19世紀初便傳說亞洲的俄國商人在西藏和中亞細亞出售法國布匹。確實，當時俄國在亞洲的政策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要通過新疆和西藏發展對印度和中國的貿易。為此，俄國政府便于1803年設立了布赫塔爾馬關卡，1804年又由西伯利亞當局派遣一個商隊前往固勒扎和阿克蘇，領隊是一位名叫別茲諾西科夫的翻譯官，此人當時假裝做哈薩克蘇丹的代理人來從事收集情報工作。1805年，在普加喬夫暴亂中被俘的韃靼人加貝杜拉（烏拜德·阿拉）·阿米羅夫在游歷了布哈拉和印度以后回到了俄國，這使俄國人對遙遠的亞洲貿易的興趣又增添了知識和熱情。[[3]](#_3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因此就更可以理解，為什么英國人對印度的滲透會“引起圣彼得堡一陣忙亂”，而需要在外交事務委員會中設立一個“特別司”來處理有關亞洲各民族的事務了。

在18世紀最后30年期間，俄國人的商業興趣在北太平洋大為擴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獵捕者追尋日益減少的皮毛來源造成的。在1799年，俄國政府成立了俄美貿易公司，這是“俄國歷史中第一個由沙皇批準的股份有限公司”。[[4]](#_4_Fa_Wu_Si_Te____1727__1805Nian)但公司如果要變得有利可圖，它必須設法供應它的前沿分站，擴大皮毛市場，并遏制外國的競爭。因此，圣彼得堡開始又注意黑龍江，使之可能成為一條把貨物從中西伯利亞運往太平洋的路線。

對推銷該公司的皮毛來說，中國似乎是最理想的市場；但在中國，西歐——特別是美國——的商人保持著競爭的優勢，因為他們可以在五個月內就把皮毛從西北美洲運至廣州。俄美貿易公司的皮毛運往恰克圖不但開銷驚人和曠日持久（從阿拉斯加運出皮毛需時兩年多），而且俄國人在阿拉斯加和堪察加的分站對給養的需要非常迫切，所以公司的外國競爭者可以在業務上扼其咽喉，即把給養售給公司各分站來換取皮毛，然后運往廣州銷售。因此，俄美貿易公司如要取得成就，也許甚至可以說，如要取得生存，就取決于它是否像歐洲人和美國人那樣能爭取清朝同意俄國人通過海路與中國進行貿易。

根據這個邏輯，圣彼得堡在1803年知照北京說，沙皇希望派一名使節前往中國。同年，又派出“納杰日達”號和“涅瓦”號兩艘輪船在封·克魯森斯騰的率領下從喀瑯施塔得駛出作環球航行。封·克魯森斯騰乘“納杰日達”號，與他同行的是宮廷大臣和俄美公司的董事列贊諾夫。后者此行的目的是說服日本人同意俄國人來進行貿易。但列贊諾夫的使命完全失敗。日本人拒絕在江戶接待他，退還了他的禮物，并在打發“納杰日達”號離開時命令俄國船只不準再來日本。于是列贊諾夫單獨回國，而封·克魯森斯騰乘“納杰日達”號載運堪察加的皮毛駛向廣州，以期與“涅瓦”號在1805年后期會合。

與此同時，理藩院卻答復說，清帝愿意接納一名俄國使節。于是圣彼得堡派戈洛夫金伯爵去試探清朝對俄國人所提一連串迫切要求的反應。戈洛夫金想說服北京向俄國人開放整個俄—清邊界以進行貿易，把俄國在固勒扎和塔爾巴哈臺的貿易合法化，并同意把貿易擴大到額爾齊斯河和布赫塔爾馬河匯合處。此外，他還企圖使俄國獲準在中國內地不受限制地進行商隊貿易和取得在南京的貿易壟斷權。另外還有許多其他要求，如通過西藏與印度貿易；俄國的監督官有權陪同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人到拉薩朝圣；在黑龍江航行；在黑龍江河口建立倉庫；廣州對俄國船只開放（首先從“納杰日達”號和“涅瓦”號開始）。根據俄國樞密院后來送交理藩院的一份說明，戈洛夫金應在“納杰日達”號和“涅瓦”號駛抵廣州前到達北京并正式宣布它們之到達廣州，同時解釋它們在廣州進行貿易的理由。

但是清朝的朝貢禮儀這一棘手問題，特別是叩頭的問題，在戈洛夫金到達清朝京城前就破壞了他的使命。俄國派往北京的使節一直行清廷要求其屬國履行的三跪九叩首之禮。但在1793年，馬戛爾尼勛爵作為俄國主要商業敵國的大使已經拒絕行叩頭禮，可是清帝仍予召見。當時這個英國人在北京要求取得與俄國人享有的相似的貿易權利（每三年來一次朝貢商隊），而清帝的答復是，俄國人的貿易僅限于恰克圖，英國人的貿易就應同樣限制在廣州。

到戈洛夫金出使時期，清政府當然會擔心：給一個歐洲強國以特許權，其他歐洲列強會起而效尤。自馬戛爾尼事件以后，清王朝比過去更熱衷于堅持合乎體統的朝貢儀式，特別堅持叩頭的禮節。另一方面，戈洛夫金知道馬戛爾尼拒絕行叩頭禮后，很可能下決心盡量不使自己降低身份。在俄國使節到達北京前，清當局要他在張家口對披掛著黃綢的代表清帝的象征物叩頭，以此來考驗他。戈洛夫金拒絕照辦。清政府堅持這一要求。戈洛夫金也寸步不讓，因此他除了回俄國外就無事可做。此事發生后，理藩院和樞密院之間互相不愉快地交換了幾次照會。

就在1805年末期間，封·克魯森斯騰的兩艘船只未經通知就抵達廣州，它們在那里順利地進行了貿易，但在它們離開后，清政府著重重申，它要把非納貢性的中俄商業限制在恰克圖的以物易物貿易范圍內。[[5]](#_5_Cai_Liao_Zai_Fu_Le_Shu_De___Z)封·克魯森斯騰回到俄國后，又重復了1787年和1797年早期探險者的荒謬的主張，即庫頁島是一個半島，黑龍江河口被泥沙淤塞，船只已不能通航。這種錯誤看法受到封·克魯森斯騰這樣一個權威人士的支持，就推遲了俄國向黑龍江地區的推進幾乎達半個世紀之久。[[6]](#_6_Si_La_De_Ke_Fu_Si_Ji____1917N)

戈洛夫金出使的失敗，使俄國只有靠兩條在18世紀爭取到的非納貢性途徑與中國接觸：一條是在北京的傳教士團，一條是恰克圖的市場。沿邊境一帶的非法貿易增加了，但恰克圖的貿易根據1800年的《指令》中關于禁止用現金或用賒欠交易的規定照舊進行。當然，也有違反這項規定的情況，但俄國政府對違禁者嚴予懲處，所以一般說來，中俄商業在1854年前還是限制在以物易物的基礎上，到了這一年恰克圖當局才準許俄國商人以金、銀購買中國貨物。1855年，俄國政府仍希望擴大俄國對華的合法貿易，因而進一步放松了恰克圖的各項規定。其直接后果是，恰克圖的商業交易多少增加了，但也造成了俄國的收支不平衡，俄國在恰克圖的出口繼續下降。

如果不提俄國通向中國的另一條非納貢性途徑——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那就對19世紀的中俄關系不會有完整的記述。清政府在1683—1685年把所有逃亡到清帝國的莫斯科人和哥薩克人組織起來，并把有些俘虜編進一個滿洲鑲黃旗旗兵的獨立分隊后，曾準許俄國每十年依次派一批東正教教士和學生來到北京，他們于1716年在北京居住，后來又建立了自己的教堂。俄國這批18世紀的傳教士團以懶散、酗酒和放蕩而最為著名，但歷史文獻可能過于強調了這些消極面，因為正是通過這些傳教士團的學者，才奠定了俄國的中國學基礎，并使俄國政府掌握了有關中國的大部分知識。

到19世紀初，這個傳教士團已有一所寄宿處（只供傳教士團本身使用）、尼古爾斯基教堂、一所學習漢文和滿文的學校和一所學習俄文的滿人學校。[[7]](#_7_Wei_De_Mo____18Shi_Ji_E_Guo_D)已有八屆傳教士團在清朝京師駐扎過。第八屆傳教士團除兩名成員外，其余都已死亡，因此亞歷山大一世在1806年派出由夏真特神甫比丘林指導的第九屆傳教士團。[[8]](#_8_Kui_Si_Te_De_De___1857__1860N)比丘林與他的前人一樣，在北京時相當放蕩。有一次，理藩院召集了第九屆傳教士團全體，指責他們的不道德行為。但比丘林卻獲得了扎實的中文知識，并有一批中文藏書。在他的領導下，第九屆傳教士團奠定了俄國的中國學基礎，并且逐步收集了有關中國本土、滿洲、蒙古和西藏等地的材料。第十屆傳教士團出了達尼伊爾·西維洛夫，他在1837年在喀山大學設立第一個中文講座；還有O.P.沃伊采霍夫斯基，此人是第十屆傳教士團中的醫生，后來接替西維洛夫的講座。1830年，J.E.科瓦列夫斯基（O.M.科伐列夫斯基）送第十一屆傳教士團來北京，次年回國時為喀山大學帶回了一批中文、滿文和藏文圖書，他編的三卷本蒙文詞典仍是蒙文詞典學方面的杰作。后來擔任該傳教士團臨時團長和大司祭的圣僧阿瓦庫姆·切斯諾伊在1841年回俄國后，就成為外交部亞洲司（1819年設立）的顧問。

第十二屆傳教士團出了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的俄國的中國學家，此人名魏西里夫，他曾是西維洛夫的學生，從中國回國后就成了中文和滿文教授（代替沃伊采霍夫斯基），后來在1855年成了圣彼得堡大學的第一個中文教授。[[9]](#_9_Chuan_Ji_Zai___E_Guo_Dong_Fan)第十二屆傳教士團另一名成員，即鮑乃迪大司祭（N.N.卡法羅夫）也成了一名有成就的中國學家。他發明了一套俄文拼寫中文的體系，并且發表了許多有關中國主題的重要文章，同時在政治方面也為俄國政府收集過情報。他之經常在北京，已成為19世紀50年代后期有特殊意義的事，因為那時俄國正在與中國商談條約和劃分黑龍江和濱海的領土。從1850年起，每屆傳教士團的駐期從10年縮短為5年，這樣就可使更多的俄國學生能在北京取得第一手的經驗。

中亞貿易和固勒扎條約，1851年[[10]](#_10_Ji_Yi_Li_Ta_Er_Ba_Ha_Tai_Ton)

盡管戈洛夫金的出使失敗了，西伯利亞的官員仍設法想在恰克圖以外擴大俄國的對華貿易。最初，他們只謹慎地鼓勵在沿額爾齊斯河一帶進行非法的交易和從穆爾塔德·法伊德·阿丁（此人1807年在新疆進行貿易）等俄國的韃靼人那里收集情報。但到1810年，中俄的商業在布赫塔爾馬已經激增，連中國的漢族商人也偷偷地到那里做生意，因此西伯利亞當局勸一個名叫奈爾平的商人派一支偵察性商隊前往塔爾巴哈臺和固勒扎，商隊由像往常那樣充當哈薩克蘇丹代理人的譯員普京采夫率領。由這次遠征得悉，在清朝官員中也有希望使俄國和新疆貿易合法化的人。

在1810—1825年期間，許多商隊從俄國到過六城地區，商隊中有一些神秘人物，如打扮成亞美尼亞人的格魯吉亞貴族馬達托夫，打扮成安集延人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佩連科夫，以及一個打扮成布爾加爾人的名叫伊薩耶夫的人。西伯利亞當局說服兩名塔什干的和喀山的穆斯林商人組成一支商隊去調查在阿克蘇貿易的可能，在1813年又派出了一支配備有譯員布賓諾夫的商隊。這支商隊帶了價值32.1萬盧布的商品離開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行進途中得到柯勒克孜人的合作，穿過柯勒克孜領土沿一條新路線來到阿克蘇和喀什噶爾。他們于次年帶回大黃、茶葉、棉織品和錦緞，商品總值達100萬盧布。這在俄國官員的心目中，樹立了新疆貿易有利可圖的想法。

佩連科夫和另一個名叫波波夫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在19世紀第一個25年中與新疆進行了大量貿易，穆爾塔德·法伊德·阿丁就是作為波波夫的代理人而在1821—1824年與一支商隊去喀什噶爾的，他在那里為西西伯利亞軍區進行偵察。在這些韃靼商人的勸告下，有些柯勒克孜的酋長派代表去西伯利亞當局討論歸順俄國事宜。他們受到熱烈的接待。[[11]](#_11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

國際政治日益與俄國對中亞貿易的努力糾纏在一起。最令人注意的“土著”政治代理人是喀布爾的一個名叫阿哈瑪迪（梅第·拉斐羅夫）的猶太商人，他在幼年是克什米爾的一個孤兒，后被撫養成為什葉派穆斯林，后又在俄國轉信希臘東正教。1813年，西伯利亞當局派阿哈瑪迪與一支商隊從塞米巴拉金斯克出發前往六城和拉達克。在列城，阿哈瑪迪向該城高級行政長官阿克巴·馬赫默德汗遞交一封要求建立友好關系的信，后者答應保護俄國貿易，并寫了回信，表示愿意與俄國建立關系。

在1821年，俄國人又派遣阿哈瑪迪在回程中遞信給旁遮普的土王倫吉特·辛格，要求建立友好關系，此信是奉沙皇亞歷山大之命寫的，由涅瑟爾羅德伯爵簽署。阿哈瑪迪在前往克什米爾途中，又在葉爾羌改變了他的宗教信仰，成了一個遜尼派穆斯林，據說他還“向喀什噶爾的穆罕默德信徒們保證，任何企圖擺脫中國人控制的行動都能得到俄國的支持，甚至邀請該土邦的繼承人訪問圣彼得堡，答應后者可帶一支軍隊回來，以收復其祖先的土地”。但當阿哈瑪迪越過喀喇昆侖山時，他因身體暴腫而死去。柯勒克孜部落的人掠奪了他的商隊，俄國政府在1823年才知道他的命運。阿哈瑪迪出使的消息也使英國人對俄國在印度邊境的野心警惕起來，英國人同時還聽到俄國人和浩罕統治者之間有一項協議，其中有這樣的內容：浩罕統治者“在俄中商隊從俄國邊境至喀什噶爾的途中穿越其領土時，將提供安全護送隊”。[[12]](#_12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

在19世紀20年代，英國和俄國相互日益關注對方在新疆和西藏的活動。在開始時，俄國官員對他們在亞洲腹地的貿易地位具有信心。俄國的海豹皮、皮毛、綠絲絨、金銀色繡花線、布爾加爾皮革、鍬、鋤、圓木、塊糖、海貍皮和阿斯特拉罕細平布行銷遠至和闐的市場。但當外國的競爭似乎要危及俄國的恰克圖貿易結構時，圣彼得堡政府的官員們開始大聲疾呼，擔心英國人會“竊取”俄國的亞洲貿易。布哈拉的商人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報告說，英國的暗探已經到喀布爾和“布哈利亞”，已經用賒銷方式推銷貨物，已經把禮物贈給那里的統治者們，并且留下了武器，其中還有火藥武器。俄國人愈加擔心了。清政府的憂慮也日益增加。[[13]](#_13_Nie_Se_Er_Luo_De_Zhi_Qia_Pu)

隨著1825年張格爾圣戰的爆發，北京采取了各種措施，為的是把英國人和俄國人排除于帝國的亞洲腹地邊境之外。但新疆地方當局并不禁止穆斯林商人運進俄國貨，甚至還準許扮成穆斯林的俄國人通過。而一些歐洲部分俄國人如鄂木斯克團軍醫齊別爾什坦（1825年）和有經驗的布賓諾夫（1829年）都設法進入新疆。韃靼的代理人如穆罕默德·亞吉布·詹庫羅夫和特羅伊茨克商人阿卜達爾·瓦利·阿卜杜爾·瓦加波夫·（阿卜達爾·瓦哈布）阿布-巴基羅夫（他在19世紀40年代到過準噶爾）繼續直接和間接地向西伯利亞軍區提供最新情報，就像阿布德·拉赫曼·依善等穆斯林那樣。依善在1833年提供了一份關于從阿姆利則出發至克什米爾、喀布爾、西部中亞和六城的旅行報告。

穿越新疆邊境的中俄貿易開始發展了。首先增長的是中國的茶葉出口。1825年，有60普特22芬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1芬特等于409.5克）的茶葉通過了塞米巴拉金斯克關卡。到1835年，數量增至909普特51芬特。大黃和硇砂也是重要的貿易商品。從俄國進口的貨物中，金屬器皿數量也有增長。俄國的平紋布、黑貂皮和仿制錦緞遠銷至西藏的羌塘和拉薩，通常從俄國邊境來的商隊往南遠至庫車和阿克蘇，攜帶的貨物有平紋布、錦緞、銅、鋼、皮毛和金幣銀幣，從而使阿克蘇在19世紀30年代成為“交換中國和俄國韃靼利亞產品的一個重要大商業中心”。參加俄國和新疆貿易的浩罕人和其他中亞人與日俱增，因此從布哈拉和浩罕運往俄國的大部分出口貨中就有了中國的產品，而俄國的紡織品也經過安集延行銷至葉爾羌。甚至連有些中國商人也不甘落后，他們顯然避開了清朝的邊哨。參加下諾夫哥羅德的集市貿易。[[14]](#_14_Ku_Zi_Nie_Zuo_Fu____19Shi_Ji)

一般說來，大約到1830年，清朝商人用白銀購買俄國貨物相當普遍，但此后的貿易即變成以物易物，到19世紀40年代，俄國商人開始用白銀和黃金購買中國貨，并利用中國人的信貸。在1835—1840年期間，只有586普特25芬特的白銀從準噶爾經塞米巴拉金斯克關卡流出。白銀似乎已成為支付鴉片的唯一手段。但這些銀子的大部分立刻又流回新疆。到19世紀30年代，小量鴉片煙已從塞米巴拉金斯克滲入準噶爾，但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圣彼得堡禁止向中國輸出鴉片以期打擊英國的地位，并在1841年將這項措施知照北京。俄國的鴉片貿易是少量的，所以容易放棄，但俄國禁令的有效程度如何，則不能肯定。這項貿易在19世紀40年代甚至還有所發展，因為有一個目擊者約在1850年報告說，來自俄國的韃靼商人正在新疆出售鴉片，換取同樣重量的白銀。“在商隊到達固勒扎和楚呼楚（塔城）時，中國人會見了他們。中國人用白銀把貨全部買下并把鴉片偷運入城。然后這個商人與攜帶器皿和元寶的商隊不受檢查地進了城。”[[15]](#_15_Si_La_De_Ke_Fu_Si_Ji____Shan)到19世紀中葉，鴉片通過中亞還運進了準噶爾。

當然，整個俄國與新疆的貿易按官方規定是違反清朝法律和恰克圖條約的。但是到了19世紀30年代，俄國已經如此強有力地控制著哈薩克人，以致清朝與哈薩克人貿易壟斷的門面再也不能掩蓋中國漢人和俄國人之間互相經商這一事實了。因此，北京政府先在塔爾巴哈臺，然后于1845年又在伊犁，把中國漢人與“哈薩克人”（包括俄國韃靼人，形形色色的中亞人以及穿著穆斯林服裝的歐洲部分俄國人）的貿易加以合法化，放棄了官辦的壟斷貿易性質。但是清當局還是保留了比私商優先購買哈薩克牲畜的權利，此外，清朝又征收了高得不合理的稅額，對俄國貨征收8%的營業稅，對國外運進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的商品征5%的進口稅。

特別在19世紀40年代，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的貿易量和貿易值都增長了，在1840年交易總額為36.73盧布，到1851年增至83.45盧布。俄國方面當時有兩個最重要的商人，一個是波波夫的合股人薩姆索諾夫，一個是原來的塔什干商人，名叫伊布拉金·阿米羅夫，兩人都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薩姆索諾夫每年向伊犁出口的總值約2萬盧布，而阿米羅夫每年運往塔爾巴哈臺的貨物約值1.5萬盧布。其他許多商人的生意也獲得利潤，但即使到19世紀40年代末，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的總貿易量仍然只有恰克圖中俄貿易量的6%。在19世紀40年代，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的非法貿易也像恰克圖貿易一樣，主要是以俄國的紡織品交換中國的茶葉（大部分中國茶葉運往俄屬亞洲腹地和伏爾加區）。通過新疆向俄國出口的茶葉，其總值在1842—1851年這段時期幾乎增長了10倍。

1845年，俄國外交部本身決定直接調查穿越新疆邊境的中俄貿易的遠景，因此它派亞洲司副司長柳比莫夫（偽裝成商人，化名為霍羅舍夫）到塔爾巴哈臺和伊犁。一定是因為柳比莫夫又捏造了一個合法的理由，說他是哈薩克人的穆斯林代理人，清當局才讓他入了境。他注意到英國貨在那里占著優勢，而這些貨物卻不是來自印度，而是來自中國沿海。但他又發現，只要以條約使那里的貿易合法化，俄國在新疆的貿易是有巨大潛力的。他建議，俄國必須急起直追，因為英國棉布進口量日增。因此在1847年，駐北京傳教士團的大司祭波利卡普奉俄國政府之命要求清政府把俄國在伊犁、塔爾巴哈臺和喀什噶爾的貿易合法化。在恰克圖的中國茶商擔心新疆的中俄合法貿易會損害他們在恰克圖的營業，于是說服清政府拒絕了這一要求。[[16]](#_16_Ku_Zi_Nie_Zuo_Fu____Jing_Ji)但俄國人并不消極等待，他們已經開始建筑一條從奧倫堡通向伊犁的道路，所以在1848年和1850年再次提出申請，要求把他們在新疆的貿易合法化。

如果清朝拒絕把俄國在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的貿易合法化，這項貿易無論如何也一定會繼續下去。何況對清朝法律的公開違抗就會使清帝國對新疆北部的控制瀕于瓦解，就會引起其他國家注意到清帝國在其亞洲腹地邊境的弱點。另一方面，如果清朝把那里的貿易合法化，當局就能對它進行管理，可以重申清王朝的權威。因此，清朝同意了俄國的請求。

1851年8月6日（俄歷7月25日）科凡勒夫斯基代表俄國，奕山代表中國，簽訂了固勒扎（伊犁）條約，條約規定開放伊犁和塔爾巴哈臺免稅進行中俄貿易，準許俄國人在兩城市建立倉庫、住宅和各建一處公墓，并同意俄商在俄國領事管轄下每年留居八個半月（春、夏、秋三季）以銷售其商品。如果一個商人不能在規定期間售完其貨物，可以留至銷完貨物時為止，然后由領事將他遣送回俄國，但清朝對這種商人不派兵護送，除非他隨行時帶有至少10頭駱駝馱運的貨物。條約規定俄商進入清境得出示俄國當局頒發的執照，這樣就加強了俄國政府對本國商人的控制。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的俄商只有從領事那里取得執照，才能離開市場和不再受領事的監督。兩國都禁止商人使用賒欠方式貿易。

固勒扎條約使中國邊境市場的傳統稍微現代化了，外來人可以在貿易季節來到這些市場，但不得長期居留。駐扎俄國領事的措施是一個創舉，但他對俄國臣民的管制則不是新措施；而禁止信用交易之舉也不是獨出心裁，在沿海條約之前，這種方式在廣州已不斷遭到禁止，雖然沒有收效。總之，固勒扎條約無疑因有了南京條約的先例而便利其簽訂，但其條款仍是按照邊境控制的老傳統擬訂的。

準噶爾遠離中國本土的商品制造中心，相對地說，離俄國較近。因此，俄國人迅速發展了他們在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的貿易，并于1852年在這兩個地方建立了倉庫。他們在1854年建設了維爾內城（今阿拉木圖）這一俄國與新疆貿易的重要樞紐。由于圣彼得堡禁止鴉片、黃金、白銀、鈔票、火藥武器、火藥和伏特加酒向中國出口，所以主要以俄國的牲畜、紡織品、金屬器具、珠寶、皮革和皮毛去換取中國的土布和茶葉。從伊犁和塔爾巴哈臺向俄國的出口貨中，在19世紀50年代上半期，90%以上是茶葉，主要是供俄屬亞洲居民飲用的廉價磚茶。通過新疆邊境向俄國出口的其他中國貨有紡織品和粗毛織品，有趣的是，還有阿爾泰山區的皮毛。

俄國人的日益增多，可不是準噶爾的每個人都能接受的，因為在1855年，由于一些不能確切說明的原因，有幾百名“游民”掠奪并焚毀了塔爾巴哈臺的俄國倉庫。新疆當局被認為是破壞倉庫的縱容者。俄國在塔爾巴哈臺的貿易因而中斷，在伊犁的貿易也有所減少。俄國人要求賠償損失，于是在1856年派了一名信基督教的哈薩克軍官瓦里哈諾夫前往伊犁，談判重開俄國貿易之事。貿易隨即恢復，但賠償問題仍懸而未決，于是就暫時放到正在中國沿海進行的中俄條約談判中去考慮。但清朝最終被迫承認他們負有責任。根據1858年9月9日（俄歷8月28日）中、俄在塔爾巴哈臺（楚呼楚）締結的議定賠償條約的條件，清朝同意重建俄國的倉庫，以550箱茶葉（價值30.5萬盧布）賠償俄國的損失。[[17]](#_17_Na_Luo_Qi_Ni_Ci_Ji____Zhi_Mi)

俄國政府對固勒扎條約真正感到失望的只有一件事，這就是清政府不愿意開放喀什噶爾給俄國進行貿易。據說，俄國政府自喀德琳二世執政（1762—1796年）以來，“經常注意與喀什噶爾建立政治的和商業的關系”，[[18]](#_18_Su_Huo_Zha_Ni_Te_Zhi_Xi_Xi_B)但六城地區一直被叛亂所困擾，所以清朝不愿意俄國人在那里擴大他們的影響。但1854年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又給俄國想與喀什噶爾建立貿易關系的愿望增添了新的因素，因為戰爭加劇了英俄的對抗。由于英國人日益發展的海上貿易，特別是在茶葉方面，所以俄國更加希望能夠掌握大陸商業的競爭優勢。圣彼得堡尤其擔心英國的貿易會從印度通過新疆滲入中國本土的心臟地區。1854年俄國人加強了他們對俄清邊境地區的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的控制，同時勘探了清朝的邊境和記下了通向喀什噶爾的商隊路線。1855年，那個在19世紀40年代為西伯利亞當局考察準噶爾形勢的詹庫洛夫啟程進入六城地區和浩罕。

1858年俄國人把瓦里哈諾夫派回新疆，這一次他偽裝成商人前往喀什噶爾。他成功地留在那里幾乎達半年之久（1858年10月至1859年3月中旬），同時又成功地訪問了葉爾羌。回國后，他在1861年發表了一篇內容廣泛而詳盡的報道《關于六城的情況》[[19]](#_19_Shou_Yu_Wa_Li_Ha_Nuo_Fu_De)，從而為俄國研究東突厥斯坦的學術奠定了基礎。現在的哈薩克科學院歷史、考古和人種學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表示對他的紀念。

到1860年締結中俄北京條約時，喀什噶爾最后被開放與俄國通商。克里米亞戰爭已經結束，但英俄的對抗卻有增無已。

## 東北滿洲的喪失

清王朝繼續半心半意地決定保持滿洲邊境的滿族特點，但漢族移民仍不斷涌進（吉林的人口在1800—1850年期間翻了一番）。因此政府考慮到滿洲的資源，就制定了一項滿洲移民政策。在1812年，決定把貧困的滿洲旗人重新從北京移回吉林和黑龍江南部的軍墾區。1842年，政府開始貫徹這一決定，專門為滿洲移民準備了耕地，并準許他們免稅五年。不管從哪一方面說，這一措施對加強邊境的滿族特點都無效果。漢人移民開墾著土地。漢族商人到處經商，有的經過批準，有的則沒有。一些創業者在那里從事鴉片貿易和興辦像堡壘那樣堅固的高粱釀酒廠等事業，給19世紀的滿洲提供了尋歡作樂的機會。快到該世紀下半期時，漢族的紳士階級開始在滿洲邊境社會發展起來。[[20]](#_20_Luo_Bo_Te__Li____Qing_Dai_Li)

漢人大批涌進吉林和黑龍江，他們在未設防的領土上定居下來，他們買進了旗人和分散的部落民的可耕地，他們與土著競相狩獵和捕魚，他們也大力發展貿易——所有這些情況到了19世紀第二個25年時造成了本地滿洲居民的負債和貧困。即使如此，邊境的中國化在速度和廣度上都不足以免使最北部的部落區和濱海領土落入俄國人之手。在19世紀中期，仍只有分散的清朝臣民居住在黑龍江右岸，居住在左岸的人數則更少。[[21]](#_21_La_Wen_Si_Tan____E_Guo_Ren_Z)

在整個18世紀中，俄國已經穩步地加強了它在西伯利亞東部的地位。俄國的探險家們在1737年和1738年已經對黑龍江進行了兩次勘探。西伯利亞史學者繆勒曾在1741年建議，利用黑龍江航線作為向堪察加提供給養的手段是可取的。5年以后，白令的助手奇里科夫曾力促在黑龍江河口建立一個港口。1753年伊爾庫次克行政長官米亞特列夫重申了上述兩個建議的內容。喀德琳二世認為獲取黑龍江的想法很吸引人，但是1787年和1797年的兩次海上航行則引起了一種錯誤的意見，即黑龍江的河口是不能通航的。在19世紀初期，另外兩個俄國人曾調查了直至阿爾巴津的河流區，俄美貿易公司也表示了它對黑龍江潛力的興趣，[[22]](#_22_La_Wen_Si_Tan____E_Guo_Ren_Z)但是戈洛夫金的出使沒有取得通航權，而封·克魯森斯騰的航行又進一步證實了黑龍江不能通行的錯誤觀念。

可能在1819年又有人提出了黑龍江的問題，當時俄國政府又派季姆科夫斯基護送第十屆傳教士團前往北京。季姆科夫斯基想去購買地圖和地圖說明，“以便更好地執行我國政府的意圖”。季姆科夫斯基所發表的記載中只提到與理藩院的一些次要談判，但他的職責之一可能是了解取得黑龍江通航權的可能性。[[23]](#_23_Ji_Mu_Ke_Fu_Si_Ji____E_Guo_S)根據俄國在1824年和1825年與英國和美國簽訂的條約，俄國人必須斷然放棄在北美進一步南下擴張。因此，圣彼得堡開始以更大的興趣注意黑龍江以北的清朝領土，于是在1832年，拉季任斯基上校奉命去確定哥爾比察河下游邊界標界的確切位置。1840年，俄國外交部試圖通過在北京的傳教士團與清朝談判黑龍江的問題，但是北京則堅持尼布楚條約已經了結此事的立場。

吉林和黑龍江的將軍很少注意滿洲邊地的發展事務，而清廷的政策依然反對漢人前來移居，這使得滿洲北部基本上無人守護。只有日本政府注意到了俄國在東西伯利亞行動的必然后果，因為它早在1809年已派一個名叫間宮林藏的代理人去確定俄國人不但在庫頁島，而且在黑龍江流域的影響和滲透的程度。[[24]](#_24_Jian_Gong_Lin_Cang____Jian_G)

橫跨西伯利亞的大陸運輸所花的費用和時間，使俄國的恰克圖貿易在與西歐及美國向廣州的海運進行競爭時處于不利地位，但俄國政府由于相信黑龍江不通海，所以很少去注意改進與中國的商業關系。但南京條約改變了俄國政府的態度，因為歐美的競爭者這時可以比過去更迅速更廉價地運載他們的貨物，而且做生意也方便得多了。相反，在恰克圖搞貿易則既慢且費。在19世紀的第二個25年期間，恰克圖的貿易總額大致保持穩定，每年約一千三四百萬盧布，但俄國人的利潤卻受到了大陸遠程運輸費用的限制。例如，在19世紀40年代，從恰克圖通過陸路運往莫斯科，每普特茶葉運費達6盧布或更多一些，而它從廣州運往倫敦的海運運費只相當于30—40戈比。結果，歐洲貨和美國貨逐漸在恰克圖市場上銷聲匿跡。中國與歐俄之間橫穿大陸的貿易也受到了損失。中國在恰克圖的最大宗出口貨是茶葉。中國進口的俄國毛織品和棉織品的數量日增，因為這些商品甚至在華南也容易找到市場。另一方面，中國進口皮毛的數量卻下降了。由于運費的關系，恰克圖貿易愈來愈限制在中國和俄屬西伯利亞之間的交易方面。[[25]](#_25_Si_La_De_Ke_Fu_Si_Ji____Shan)

對于西伯利亞來說，對華貿易的潛力似乎特別重要。西伯利亞日益增長的人口和日益擴大的經濟，需要發展相應的對外貿易來推動該地區的開發，而發展西伯利亞貿易和工業潛力的關鍵就是黑龍江。俄羅斯帝國科學院的封·米登道夫在1844年勘探了黑龍江流域。1846年，俄國人偷偷地偵察了黑龍江河口，但沒有結果；1847年俄國政府又直接與清廷接觸，要求再增加三個貿易地。清廷拒絕這一要求，同時又輕率地重申它的舊政策，即反對漢人移居北滿。

到1847—1851年期間，由于俄國制品幾乎有一半要向中國出口，所以圣彼得堡必須認真對待對華貿易。1848年，俄國政府試圖再以俄美貿易公司的一艘輪船“孟什科夫公爵”號在中國沿海試一下運氣，它載運皮毛駛進上海，要求準許貿易。清政府拒絕了它，并打發它離去。兩年以后，它又來上海，重提同樣的要求，仍遭拒絕。但1853年另一艘俄國輪船訪問上海時做成了一筆生意，以阿拉斯加皮毛換取給養和茶葉。[[26]](#_26_Tong_Shang_Shu__Di_266__282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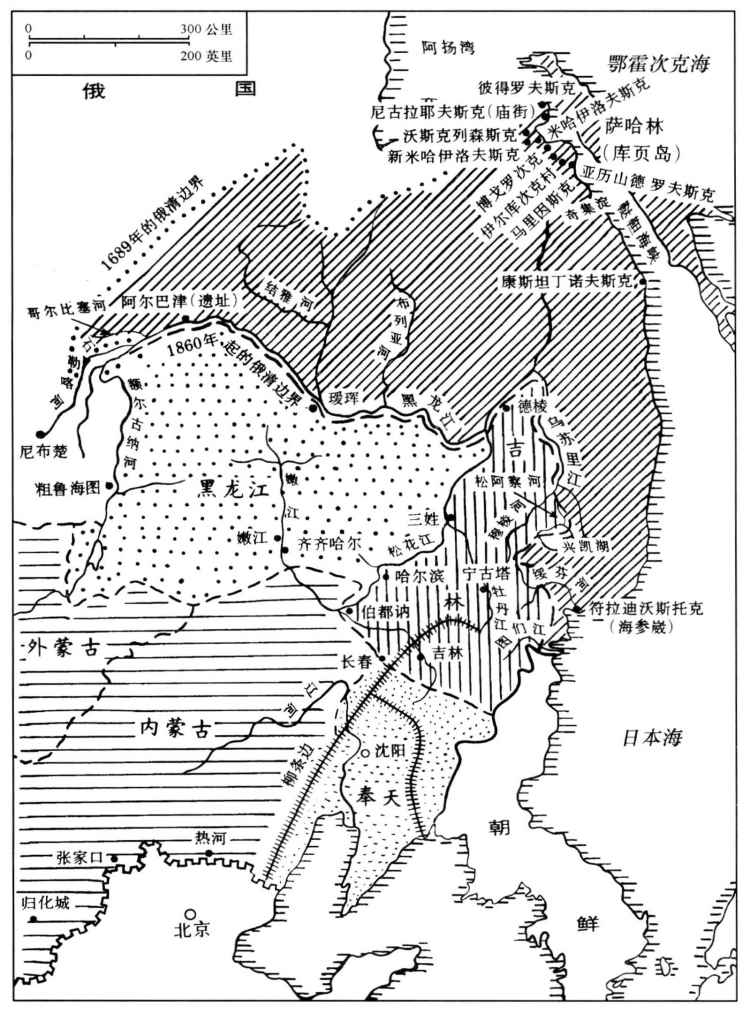
在此期間，積極肯干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進一步推動了對黑龍江的勘探工作，他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西伯利亞的經濟發展，一方面是為了軍事的安全，因為他和與他抱同樣想法的人都關心俄屬遠東在英國駐太平洋海軍艦隊面前所處的脆弱的地位。兩個英國人希爾和奧斯汀在1846年和1848年的出現更增加了穆拉維約夫的擔心，這兩個人表面上是進行地質研究和尋找與考察隊一起失蹤的弗蘭克林船長。當穆拉維約夫獲悉奧斯汀打算乘木筏沿黑龍江而下時，就把他逮捕并帶回伊爾庫次克。1849年穆拉維約夫派涅維爾斯科伊去勘察庫頁島北部和調查海峽以及黑龍江三角洲和河口的情況。涅維爾斯科伊確認黑龍江可以通航，并且證實庫頁島不是半島，而是一個島。他在黑龍江一帶沒有看到清軍，斷定清政府在這一地區沒有行使權力。他推測，黑龍江下游的居民甚至不認為自己是清朝的屬民，因而他認為他們對清朝實際上是抱敵視態度的。[[27]](#_27_Si_La_De_Ke_Fu_Si_Ji____Shan)英、法和美國的船只出沒于堪察加附近和鄂霍次克海的景象，進一步提高了俄國人進入黑龍江的興趣。穆拉維約夫爭辯說，“誰掌握了黑龍江河口，誰將占有西伯利亞，至少可以遠至貝加爾湖”。同時他還警告說，如果英國人奪取了黑龍江河口和庫頁島，俄國就將失去整個東西伯利亞。[[28]](#_28_Na_Luo_Qi_Ni_Ci_Ji____Zhi_Mi)以涅瑟爾羅德和財政大臣弗隆欽科為主的其他意見則反對穆拉維約夫的勸告，因為擔心在遠東的努力將會分散俄國在歐洲的精力，但最后穆拉維約夫的論據占了上風。在1850年，由涅維爾斯科伊率領的第二個勘察隊奉命非常謹慎地（因為事為清廷所關心）設立了兩個冬季哨所，一為黑龍江河口以北的彼得羅夫斯克，一為在上游相距不遠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廟街），后者的設立顯然是違反尼布楚條約的。俄國的軍旗升起來了。

涅維爾斯科伊的行動引起了圣彼得堡政府官員的強烈不滿，但是狡猾地以他的名字命名為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沙皇最后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聲稱，“俄國旗幟一旦在何地升起，就不準落下”。[[29]](#_29_Luo_Ban_Nuo_Fu__Luo_Si_Tuo_F)于是俄國政府宣布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俄美貿易公司的一個貿易站，在那里移居了一小批俄國移民并建造了碉堡。俄國外交部希望使俄國的海軍地位合法化，它向理藩院遞交一份照會說外國船只威脅著黑龍江河口，因此建議對它實行共同防衛。但理藩院對俄國的照會置之不理。[[30]](#_30_Kui_Si_Te_De____E_Guo_Zai_Do)

到1853年，在鄂霍次克海沿海不遠的美國捕鯨船增加了俄國人的憂慮；當人們知道倍理“打開”日本閉關鎖國的狀態時，就更認識到遠東的戰略重要性了。俄國的代理人已經廣泛地勘探了黑龍江以北的領土，因此，俄國政府決定說服清帝國讓與從布列亞河至黑龍江河口的地區。因此，它向北京遞交一份照會，要求重新劃分邊界，但同時又承認尼布楚條約依然生效。清廷同意之后于次年春天派了一個代表團與俄國人談判。俄國于是從庫頁島越過韃靼海峽在滿洲沿海的亞歷山德羅夫斯克和康斯坦丁諾夫斯克建立了哨所，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廟街）上游150英里的馬里因斯克也建立了哨所，以此加強它的地位；同時又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它開放南京條約的口岸讓俄國貿易。海軍中將普提雅廷伯爵在前往日本的途中駛進了上海，次年又在上海作短期逗留，這使清當局對俄國人的用心感到憂慮。

出國去歐洲的穆拉維約夫在1854年回俄國，此時俄國正與英法進行克里米亞戰爭，所以英法對俄屬遠東的真正威脅是存在的。總督得知劃定中俄的滿洲邊界之事時很生氣，立刻加以制止，這樣就更使北京對俄國的意圖困惑不解。鑒于英國擁有威脅俄屬遠東沿海的占壓倒優勢的海軍力量，穆拉維約夫說服沙皇尼古拉一世采取一項積極的政策。穆拉維約夫爭辯說，如果俄國不采取行動，英國人可能奪取庫頁島或黑龍江下游。他還得到俄國在北京傳教士團的大司祭鮑乃迪（N.N.卡法羅夫）的支持，后者告訴他：在北京，實際上已經在議論把黑龍江北岸讓給俄國的可能性，其理由是“黑龍江諸地……根據傳統的權利更應屬于俄國，而不屬于滿洲人”[[31]](#_31___Zhu_Bei_Jing_Chuan_Jiao_Sh)。因此俄國政府得到鼓舞，相信清朝可能不會反對俄國使用黑龍江，因為這樣將會保護黑龍江免遭英國等外國的侵犯。在同一年，即1854年，穆拉維約夫派一支軍事遠征軍沿黑龍江而下以防衛庫頁島和黑龍江三角洲，同時知照理藩院說，由于俄國與英法正在交戰，他正派一支遠征隊去保護黑龍江和沿海區，使之免遭敵人的攻擊。

在以往，黑龍江和吉林兩地的清朝守軍都大大超過了1萬人，但隨著太平軍叛亂的爆發，清政府抽調這里大部分守軍去與叛軍作戰，結果，在黑龍江下游和滿洲其他地方的軍事力量十分薄弱，已經無力阻止穆拉維約夫為所欲為了。在璦琿的守軍只有1000人左右，裝備極差。“他們大部分拿一根頂端涂黑了的桿子以表示是長矛；少數人持有火繩槍，絕大部分人肩上掛著弓和箭筒。”還有“幾門大炮裝在做工很粗糙、樣子又難看的大車上”。[[32]](#_32_La_Wen_Si_Tan____E_Guo_Ren_Z)



地圖13 19世紀的滿洲

理藩院對穆拉維約夫的照會未予置復，于是俄國的遠征軍通行無阻地沿黑龍江而下。但是最后，清政府開始獲悉俄國人已在黑龍江下游定居。事已如此，北京對采取什么行動路線依然遲疑不決，黑龍江的韃靼將軍上奏說，阻止俄國吞并的唯一辦法就是讓漢人移民來填補空曠的黑龍江地區，但這份奏折未收效。

英國和法國在1854年對位于堪察加東南海岸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發起牽制性攻擊，在1855年一支英法聯合艦隊兩次企圖在阿揚灣登陸，從而證實了穆拉維約夫的警告。在德卡斯特里斯灣，俄國守軍阻止了一次同樣的企圖，但英法聯合艦隊給阿拉斯加的俄國定居點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失，英法軍艦攻擊了俄美貿易公司的雙桅船“鄂霍次克”號，迫使該船的水手把它鑿沉。俄國人把自己的一支小艦隊藏在黑龍江的三角灣內才使之幸存下來。同時，正在黑龍江區加固俄國新要塞的穆拉維約夫通知清廷說，俄國已經擊退了英法艦隊的炮擊，正計劃派第二支遠征軍至黑龍江更下游地方以阻擊英法的第二次進攻。他為了言之有據，聲稱英國人正在廣州和其他地方供給太平軍以武器彈藥。使北京政府震驚的是，這一情報與關于英法聯軍正在積極支持叛亂者的其他報告不謀而合。

可是北京仍對穆拉維約夫的遠征軍提出抗議，并且想到了尼布楚條約，所以強調必須劃定邊界。但是國內叛亂運動正方興未艾，虛弱的滿洲八旗軍已無力抗御穆拉維約夫的遠征軍了。因此，穆拉維約夫率領的俄國遠征軍沿黑龍江順流而下。在薩哈連烏拉河屯（璦琿），清當局甚至通過提供給養、馬匹和向導的方式來幫助俄軍調動，并且不受任何報酬，因為在黑龍江是禁止與外國人做交易的。但是清當局確實接受了禮品，清朝將軍富勒洪阿在直接與穆拉維約夫會面時通知后者，今后俄國遠征軍如無清帝明確的批準，將不得通過。富勒洪阿在向上級報告時，假裝他已堅決拒絕與俄國人合作。[[33]](#_33_Si_La_De_Ke_Fu_Si_Ji____Shan)在馬里因斯克，清朝談判劃界的代表團會見了穆拉維約夫，對他所提的要求大感吃驚，這些要求是：割讓黑龍江的左岸給俄國；俄國人保留一切新殖民地；在黑龍江航行；把受影響的清朝北滿臣民移往清境的其他地區。清朝談判者提醒穆拉維約夫說，俄國政府1853年的照會已經承認黑龍江兩岸為清帝國領土，當然，他們還必須把整個問題向北京匯報。

穆拉維約夫在1855年春夏兩季開始向黑龍江北岸殖民，建立了伊爾庫次克村、博戈羅次克、米哈伊洛夫斯克、新米哈伊洛夫斯克、沃斯克列森斯克和一個在馬里因斯克對面島嶼上的哥薩克村，然后上溯黑龍江轉回圣彼得堡，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那里授予他與清政府談判和再率領一支軍事遠征軍沿黑龍江而下的全權。[[34]](#_34_Kui_Si_Te_De____E_Guo_Zai_Do)

太平軍叛亂不但抽空了滿洲邊境的旗兵，因而削弱了清帝國與俄國人談判時的討價還價地位；而且叛亂還弄得省庫空虛，使政府放松了對吉林和黑龍江漢人活動的各種限制，造成邊境盜匪猖獗，社會秩序瓦解。政府因缺乏兵員，不得不停止旗兵每年的狩獵活動。政府入不敷出，不能再供養其滿洲旗人，并且很快就拖欠了軍餉。

特別在滿洲，清廷已取消只有滿人和蒙古人才能擔任滿洲邊境將軍的規定，并且在1853年任命了一名漢族旗人任吉林將軍。政府還改組了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的財政。在此以前，中央政府幾乎要負擔吉林省4/5和黑龍江全部的行政費用。中央政府已不可能再負擔這樣的支出了；因此戶部將貼補吉林和黑龍江的責任分攤給其他各省。這項措施收效不很大，因為負分攤之責的各省經常不能完成任務，結果滿洲邊境諸省開始自己發展財源，它們征收新稅，開發官辦屯田和軍墾以支付各項費用，還特設了一種“隨缺地”以補旗兵每年收入的不足。

清政府在1853年停止發許可證給挖人參的漢人，使人參的收益可用作軍餉，但是它隨即準許漢人的私營企業壟斷金銀礦的開采權，而由官府征稅。政府早在1815年以同樣方式準許采煤，沒有發生過麻煩；但是圍繞開采貴金屬——特別是黃金——所出現的情況就不同了。在開采黃金的礦工中出現了那么多亡命之徒，以致政府最后不得不再次取締對黃金的開采。[[35]](#_35_Luo_Bo_Te__Li____Qing_Dai_Li)

這些措施遠不能創造一個安全的滿洲邊境，甚至也不能作一次強大的武力炫耀，足以使穆拉維約夫猶豫不決，使清朝贏得時間。清政府顯然把征剿漢人的內地看得比防衛滿洲邊境更重要。另立王朝的太平天國叛亂無疑具體化了滿洲人的傳統恐懼，即漢人可能有朝一日會把他們推翻和趕出中國；但滿洲人所處的地位與處于叛亂時期的任何王朝是一樣的，并且作出了任何漢族王朝都會作出的選擇。中國本土這時是滿清的心腹之地，所以在必要時，以犧牲邊緣地區為宜。

1856年，當穆拉維約夫的第三支遠征軍沿黑龍江順流而下時，滿洲當局除了掩蓋真實情況外，別無其他選擇。從此，俄國人以保護該地區不受英法的攻擊為借口在那里隨意出沒，其實在穆拉維約夫的遠征軍被派出之前，1856年的巴黎會議已經結束了克里米亞戰爭。俄國移民建立了許多新城鎮，開發了一些大林區作為耕地。也是在1856年，圣彼得堡政府沒有通知中國就單方面設立東西伯利亞的濱海省，來管理俄國在堪察加、庫頁島（根據1855年下田的俄日條約，該島在俄日之間仍未“劃分”）以及黑龍江河口所占有的土地。新省份的首府是尼古拉耶夫斯克。

正當清政府繼續追求把漢人移民排除在北滿以外這一目光短淺的目標時，俄國政府則把俄國移民移居到這個地區，這樣，到19世紀50年代末，北黑龍江流域和濱海的領土上已經大部分是俄國人了。根據俄國的官方材料，這些地區的總人口約為2.4萬人——黑龍江區為8370人，濱海區為15594人。其中6349人為俄國人；在黑龍江區者為2950人，在濱海地區者為3399人。中國人只有約2400人——約1500人在黑龍江區（主要在黑龍江—結雅河流域），約900人在濱海區。到1858年，有4艘俄國輪船往返于黑龍江水域，同年俄國海軍又從喀瑯施塔得增派了7艘。在蒙古和滿洲接壤的俄國邊境，駐有1.6萬名俄國軍隊，配備著40門大炮。[[36]](#_36_Su_Lian_Guo_Jia_Zhong_Yang_L)另一方面，黑龍江的旗兵一直沒有超過幾千人。例如，璦琿“有能容納幾千名士兵的造得很好的營房，但沒有看到一名士兵——甚至崗亭也是空的”。[[37]](#_37_Ke_Lin_Si____Xi_Bo_Li_Ya_Zhi)

克里米亞戰爭的結束，使俄、英、法三國都騰出了手來重新在中國展開活動。不久，英國和法國政府開始計劃向清帝國提出要求，以爭取修改條約和同意讓歐洲商人按照歐洲的傳統做法在中國沿海經商。英國人和法國人還向俄國政府建議，俄國應對它們的要求予以合作，但圣彼得堡拒絕了這一建議，反而宣稱它對清帝國既不使用武力，也不進行恫嚇。可是圣彼得堡明白，俄國可以利用英法侵略的事實來為自己取得英、法可能獲取的一切貿易權利，同時還可以重新劃定在滿洲的中俄邊界。俄國政府打算通過外交手段達到這些目的，于是派普提雅廷從陸路來中國，試圖在北京進行談判，但清當局先在恰克圖，然后又在天津拒絕他入境。但普提雅廷不為困難所阻，他訪問了日本，在長崎和函館為俄國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然后乘船前往香港與西方盟國會合。他與美國使節一樣表現得不那么好戰，是戰爭中的中立觀察者，但卻像交戰國那樣提出簽訂條約的要求。普提雅廷背著西方盟國，又另附一份照會，要求把黑龍江左岸和烏蘇里江右岸劃作邊界，還暗示它的要求得到了歐洲列強的支持。[[38]](#_38_Kui_Si_Te_De____E_Guo_Zai_Do)俄國的這份照會是裝在像美國裝照會那樣的封套中送交清當局的。

在1858年天津談判期間，關于黑龍江和濱海領土的要求，手段高明的普提雅廷想方設法把其他三國使節完全蒙在鼓里。而清當局希望使西方人互相對立，就分別與他們談判，這樣無意中方便了普提雅廷的計謀。結果，他們給了普提雅廷充當調解人這一角色的機會。

在此期間，穆拉維約夫通過大司祭鮑乃迪通知清帝，聲稱他這時是唯一負責黑龍江問題的人，普提雅廷的新職務只是協助調解中國和西方盟國之間的爭端。清帝由于不知道英、法聯軍對俄國的領土要求毫不知情，并且急于使有關這些要求的談判得不到他所認為的英、法炮艦的支持，就委派奕山會見穆拉維約夫和解決邊界問題，這個奕山曾在1851年談判過固勒扎條約，這時是黑龍江將軍。

1858年5月23日（俄歷11日）奕山和穆拉維約夫的談判剛在璦琿進行，后者就提出如下要求：取得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居住在這些地方的清朝臣民重新移居；俄國人在邊境河流航行和貿易不受限制（但歐洲人則不可以不受限制）。奕山不同意，他堅持住在北岸的清朝臣民有永遠在那里居住的權利，并且繼續受清朝的管轄。穆拉維約夫在這一點上作了讓步，但他不愿意再事拖延，而以軍事行動相威脅。

形勢對奕山來說是絕望的。俄國人已完全掌握了黑龍江的北岸。當時半個中國爆發了叛亂，廣州和大沽炮臺又被英法聯軍所攻占，據說他們正在幫助太平軍，而且此時又直接威脅著北京，因此奕山不敢承擔引起另一場戰爭之責。此外，奕山和北京的官員都不知道俄國人要求的領土有多大，興安嶺離烏蘇里江有多遠，尚有哪些內容在尼布楚條約中尚未確定。清帝曾要過這些問題的答案，但報告到后來才上達，而且里面的措辭非常含糊。在1858年，在清朝看來，東北滿洲的價值無非是一塊供應宮廷皮毛的狩獵禁地罷了。

奕山同意了穆拉維約夫的要求，在1858年5月28日（俄歷16日）簽訂了璦琿條約，條約有滿、蒙、俄三種文本。烏蘇里江以東的濱海領土依然歸俄、清共有，直到兩個帝國能夠劃分一條邊界為止。黑龍江左岸的清朝居民將留居原地（主要在結雅河以南），“歸滿清政府管轄”。奕山在呈遞給清帝的奏折中，把條約看作是一項批準俄國人移民和貿易的臨時權宜之計，并不是割讓清帝國的領土。北京顯然也是這樣理解的。由于清帝仍感到英法聯軍在支持俄國的要求，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在6月14日（俄歷2日）同意了這個條約，并且請俄國政府試圖說服英法兩國降低它們的要求。7月20日（俄歷8日）奕山為了穩妥起見，又促使穆拉維約夫簽訂一份正式的附加協定，重申北岸的清朝臣民將不遷移。

同時，普提雅廷在鮑乃迪的出謀劃策下已在天津進行談判，企圖迫使清廷割讓黑龍江領土，并提出由俄國供應步槍、大炮和軍事教官作為報償。他向英、法、美三國隱瞞領土要求所取得的成就簡直可以說是不同凡響的。有一次，清政府的談判者明確地向美國人提起過俄國人的這些要求，并請美國代表列衛廉向普提雅廷說情，但列衛廉多少有點同情俄國在東亞的擴張，所以沒有充分重視中國人告訴他的事。列衛廉從沒有料到普提雅廷竟會在他鼻子底下為黑龍江領土的要求施加壓力，所以他從未對英國人和法國人提出過清方談判者提出的請求。后來，清方代表把普提雅廷希望確定俄國邊界之事告訴了英國的譯員李泰國，并說普提雅廷希望此事在黑龍江進行，甚至希望在天津不要提起此事，但李泰國似乎還沒有懂得普提雅廷到底在干什么。

如果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天津已知道俄國正在要求領土和黑龍江的航行權的話，他們也會要求同樣的最惠國待遇來加強清方的地位。普提雅廷知道這一點，并且他比其西方同事更了解中國人的辦事方式，因此這時完全改變了腔調，降低了他對黑龍江的要求，并協助清方去抵制英國人。1858年6月13日（俄歷1日）他簽訂的中俄天津條約規定，要為互相來往提供方便，開辟條約口岸供俄國人貿易，并且訂定“中國和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條約沒有提到黑龍江。普提雅廷不知道早在兩個星期前簽訂的璦琿條約已經確定了大部分東部的中俄邊界。[[39]](#_39_Si_La_De_Ke_Fu_Si_Ji____Shan)根據天津條約，普提雅廷實現了促使戈洛夫金在1805年出使的大部分目的。俄國這時在中國沿海有了商業特權，以此可以抵消西歐和美國的海運在與俄國的西伯利亞貿易競爭時所占的優勢。

6月15日（俄歷3日），清政府要求普提雅廷向其他列強就它們所提的要求替清王朝說情。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很自然的選擇，因為滿洲人感到他們直接了解俄國人，而清廷上層有關西歐人的情報在經華南的漢族官僚之手時已被歪曲；對于這些官僚，北京政府正漸趨懷疑。普提雅廷也確實向其他列強說了情（這是為了加強俄國在中國的地位），但他沒有告訴清方他是在說情。他在敦促英法聯軍降低其要求時的主要論點是，各地叛亂正方興未艾，歐洲人的壓力可能會使王朝垮臺。當然，俄國并不希望英國能達到進入中國所有主要河流的要求，因為這樣就會把黑龍江也包括在內，而外國外交人員駐在北京也會加強英國對清政府的影響而不利于俄國。可是額爾金仍堅持要求在北京駐外交官和在內地貿易，并且揚言要進攻，通過這種威脅，他在6月26日訂立了他所要求的天津條約。普提雅廷繼續活動，當他聽到英國的新政府已經指令額爾金不要進攻北京或把清王朝搞垮時，他立即勸清廷廢除對英條約中兩條有爭議的條款，并重新提出俄方以前提過的關于給中國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議。清廷接受了武器，并且還同意接納少數教官來教授使用武器和重新設計沿海的炮臺。

為了批準璦琿條約和天津條約，俄國外交部派了一名參贊前往北京，此人是丕亞羅幅斯奇，他曾在璦琿擔任過穆拉雅約夫的滿文譯員，但外交部沒有任命他為大使，而讓他擔任傳教士團的團長，地位高于鮑乃迪，結果丕亞羅幅斯奇發現談判非常困難。俄國政府感到緊迫，需要在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來到北京批準他們的條約之前趕快劃定最東部的俄清邊界，于是任命年輕的伊格納捷耶夫伯爵為駐北京的“政治代表”以接替丕亞羅幅斯奇。伊格納捷耶夫于3月份經陸路啟程來華。

在此期間，穆拉維約夫已經在烏蘇里江進行勘察和移民。關于這件事的報告紛至沓來，使北京政府大為震驚，于是它開始更加深入地考慮俄國的問題了。理藩院立刻寫信給俄國，聲稱清帝樂于接受船運的槍支，但要求在庫倫卸貨。清廷可能想補救他們的沿海防御。在與穆拉維約夫和丕亞羅幅斯奇談判時，清政府批準了天津條約，但又對穆拉維約夫侵犯烏蘇里江畔清方領土的行動提出抗議。但當北京最后弄清楚了俄國人不但要繼續在黑龍江航行，而且要隨心所欲地上溯松花江，還要滲入烏蘇里江流域時，就決定不批準璦琿條約。另一項關于不準外國的外交使節根據平等原則駐于北京的決定，觸發了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的敵對行動，當時僧格林沁的軍隊擊沉了四艘英國炮艦。這使那些誤認為俄國人也參與了大沽口攻擊的北京決策者們又鼓起勇氣來反對俄國的要求。兩天以后，伊格納捷耶夫抵達北京接替丕亞羅幅斯奇，但未能取得任何進展，雖然他的地位較高。

因大沽事件而滿懷信心的清帝在滿洲問題上轉而采取了強硬路線，他免去奕山之職，想試一試新的途徑來加強王朝的地位。但老一套的思想方法仍禁止漢人向那里移民，卻不知移民正是可能挽救烏蘇里江以東土地的一個行動。當黑龍江和吉林當局提議把漢族農民移居到寧古塔、三姓、綏芬河和烏蘇里江等地區以阻止俄國進一步滲透時，政府斷然加以拒絕。它只是決定動員人參挖掘者和當地的部落民來防衛濱海地區，并知照穆拉維約夫，它將堅持尼布楚條約劃定的邊界。穆拉維約夫沒有為其所動，彼得堡則通知他，如果必要，可使用軍隊占領整個烏蘇里江和濱海地區。[[40]](#_40_Kui_Si_Te_De____E_Guo_Zai_Do)

當伊格納捷耶夫停止了在北京的談判，奉圣彼得堡之命與在上海的英、法、美三國的使節會合時，他希望學普提雅廷的手法行事。但這時英國人知道了璦琿條約，并懷疑僧格林沁在大沽的勝利有俄國人起過的作用。伊格納捷耶夫的策略是試圖說服英法聯軍，聲稱只有把清政府痛擊一頓才能迫使它屈服。做到了這一步，他就要向清方毛遂自薦地充當調解人，然后以英、法的炮艦要挾中國來獲得俄國所希望的各種特許權。為了這一目的，他與俄國傳教士團通信，從它那里得到消息，然后把這些關于北京形勢的第一手知識告訴額爾金和葛羅，以減輕他們的疑心。通過他的內線情報，伊格納捷耶夫首先知道清帝與他的大部分宮廷官員已經逃往熱河。他把這些消息告訴了額爾金和葛羅，因而深得他們的信任，以致連他們從圓明園中繳獲的涉及俄國的外交文件也轉給了他，這對伊格納捷耶夫來說是一筆財富，因為四箱外交文件道出了丕亞羅幅斯奇在璦琿條約和天津條約以外所提的全部額外條件。英國人在讓出文件時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內容。

當英法聯軍仍在北京城外時，伊格納捷耶夫卻進了城，住在傳教士團的所在地。在這里，心急如焚的清當局立刻請他替中國進行調停。他答應調停，但條件是恭親王應送他一份請他調停的書面請求，對他無所隱瞞，以及答應他前一年提出的一切要求。恭親王只能照辦。10月18日（俄歷6日），恭親王送給伊格納捷耶夫一份請他調停的書面請求。

這位俄國外交家事實上很少出力幫助英法聯軍去獲取它們的條約，也不去幫助清廷降低聯軍提出的要求。但就在額爾金和葛羅的鼻尖底下，伊格納捷耶夫卻從恭親王那里索取到了他所要求的特許權，因為恭親王相信了他的話，即額爾金和葛羅是支持俄國的要求的。當聯軍在11月6日撤走時，伊格納捷耶夫甚至還威脅著要把英法軍隊召回。總之，伊格納捷耶夫基本上做了普提雅廷曾經做過的事。在中國國內發生叛亂時，他憑借英法軍事進攻的明顯支持而參加到談判中來，使自己充當調解人，卻迫使清政府割讓俄軍已經大部分占領的滿洲領土，不讓其英、法共同談判者知道這些要求，并且使清方代表相信聯軍的戰艦和軍隊支持他的領土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恭親王也從伊格納捷耶夫那里取得了幾點讓步。伊格納捷耶夫同意作出讓步的是，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清朝臣民繼續在原地生活，照常漁獵，但他們不是像璦琿條約所規定的那樣處于清政府的管轄之下。

中俄北京條約在1860年11月14日（俄歷2日）簽訂，它給了俄國在璦琿條約中尋求的東西，批準并擴大了天津條約，而且把從滿洲至新疆的整個清帝國北部邊疆向俄國的政治和商務勢力開放。經一致同意，清、俄兩國的特派邊境大員將在1861年4月份開始劃定滿洲的新邊界，但新疆的劃界日期則有待進一步確定。該條約準許沿整個滿洲的中俄邊界可以不受限制地進行免稅的物物交易。在喀什噶爾，初步準許俄國人進行貿易，其條件與在伊犁和塔爾巴哈臺者同。俄國可以在庫倫和喀什噶爾設立領事館，它們有充分的外交平等權和對俄國臣民的治外法權。清帝國在俄國也具有同樣的特權。有關邊境事務的通信聯系可在恰克圖同庫倫的當局之間以及在阿穆爾區和濱海省的軍事總督同黑龍江將軍和吉林將軍之間進行，雙方通信都根據平等的原則；如遇重大事務，東西伯利亞總督可直接遞文給清朝軍機處或理藩院。最后，在這些有關中俄陸地共同邊境的領土、外交和商務協定中，不適用中國與其他海上強國簽訂的條約中的最惠國條款。恭親王和伊格納捷耶夫同一天在條約議定書上簽了字，以表示清帝批準了條約和伊格納捷耶夫對條約的承認。

清帝國喪失了最東北的廣袤而寶貴的土地，因為清政府沒有看到這些土地的價值，并且依然堅持把漢人限制在中國本土這一過時的政策。但這是一個寶貴的教訓。一個愈來愈著眼于全中國的清政府汲取了這個教訓，于是大開方便之門，讓漢族移民進入帝國的其他邊境。以后的中國亞洲腹地的歷史是一個漢族移居、中國化以及原來的非中國人的社會并入大中國的歷史。

即使面對著這樣的損失，仍不應否認清政府的成就。盡管有著國內的叛亂和歐洲人的壓力，清王朝仍得以幸存，它的制度也只作了最小限度的改變而延續了下來。根據清政府所能調動的力量來看，很難想象要它做出更多的成績來。

1861年，清、俄兩國的邊界大臣根據他們的調查，交換了邊界的地圖和詳細說明。他們在1861年6月28日（俄歷16日）簽訂了勘分東界約記，使這些地圖和說明書成了正式文件，約記便成為中俄北京條約的附件（與俄國接壤的新疆邊界到1864年塔城議定書——勘分西北界約記——簽訂時才確定）。有一段時間，俄國政府中的有些部門還有人大講要進一步在滿洲和蒙古取得領土的好處，但在7月11日（俄歷6月29日），政府最后拒絕了這些建議，理由是英、法似將奪取可能會威脅俄羅斯帝國的朝鮮和其他地區，作為對俄國任何進一步擴張的反應。俄國政府通知駐中國的公使、駐庫倫的領事和東西伯利亞的總督，萬一清王朝垮臺，“我們的行動方針將是促使蒙古和滿洲的獨立”。[[41]](#_41_Na_Luo_Qi_Ni_Ci_Ji____Lie_Qi)類似這種有關蒙古、滿洲和新疆的政策已經成了伊格納捷耶夫訓令內容的一部分，但俄國人同英、法、美三國人士一樣，寧愿維持清王朝的現狀。

俄國還堅持重訂邊境貿易的規定。清政府同意做徹底的審查，因而在1862年3月4日（俄歷2月20日），恭親王和俄國公使巴留捷克上尉簽訂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條。1862年的通商章程建立了一項制度，即對從恰克圖至天津的俄國商隊和在蒙古邊沿地方經商的俄國商人，由俄國當局頒發證書，而由清當局予以認可，從陸路運進的俄國貨的稅比經海路進口的歐洲貨的稅低1/3。

1862年解決的最后一個問題是關于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議，以前普提雅廷向中國提出此議時原是為了對付英、法兩國，后來重新提出的目的就轉為鎮壓中國的反叛者了。1858年，普提雅廷曾命令鮑乃迪提議給清廷2萬支步槍、20門大炮和若干名教官。但清方已對俄國的建議——特別是提供教官的建議——產生懷疑，所以在接受武器和教官時顯得如此猶豫不定，以致俄國政府雖然決定派幾名教官和運1萬支步槍經蒙古到清帝國，還決定通過海路秘密運來50門大炮，可是自己的軍隊也需要武器的穆拉維約夫卻竟然在1859年把整個載運物資截留在西伯利亞。1860年，在北京舉行的中俄北京條約批準儀式上，伊格納捷耶夫再次提出俄國供應武器的建議，甚至還答應提供俄國海軍支援去鎮壓太平軍。后一建議沒有結果，但運送武器的建議雖幾經周折（其中還包括曾國藩提出過反對意見），最后仍被批準；1862年夏，2000支步槍和6門大炮終于運到。但當幾名俄國教官在恰克圖附近開始訓練清軍使用這些武器時，英國公使對清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迫使它在同年把他們遣送回國。俄國政府推遲運送它所答應提供的武器的剩余部分，直到它對中俄陸路貿易的新稅率感到滿意時為止；最后，由英國人訓練的神機營在1865年使用這些武器來保衛北京和鎮壓滿洲的盜匪。

在俄國，還醞釀著一些計劃，要俄國參加英法聯軍支持清王朝的鎮壓太平軍的干涉行動，來抵消英、法在華勢力的增長。但俄國與英國沖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俄國還面臨波蘭的叛亂。因此從長期利益考慮，決定以不動用俄國艦隊為上策。俄國沒有干涉。

到1860年，偷越俄國歐洲邊境從海上進入俄國的走私茶葉數雖已經增至其進口茶葉總量的1/3。由于簽訂了北京條約，俄國政府就把海上茶葉貿易合法化，但降低了恰克圖的茶葉稅，這樣就使海上進口的茶葉的稅率比較高一些。此后，俄國與中國的海上貿易大幅度增長，茶葉則是主要的進口貨。俄國船只從廣州和上海載運茶葉和其他中國器物至敖德薩，這種做法有損于恰克圖的貿易。即使以中國國內的運輸費用而言，采用這條路線也是比較合算的，因為從茶園運茶葉至沿海口岸只要約20天時間，每普特的運輸費用只要1盧布32戈比，而運經恰克圖則需三個多月，運費則高達每普特10盧布。[[42]](#_42_Na_Luo_Qi_Ni_Ci_Ji____Lie_Qi)

但是就貿易總額而言，恰克圖的中俄邊境貿易在整個19世紀中仍高居首位。從長遠觀點看，新疆的那條路線證明是比較漫長和花錢的，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上日益發展但尚無章法可循的中俄貿易——直到19世紀90年代在文獻中才有統計材料——的重要性似乎依然比較有限。總的來說，在中俄貿易方面中國是順差。俄國人購買茶葉和數量越來越多的生絲。他們以自己所有的貨物（主要是紡織品）進行交換，差額以黃金白銀支付。在中國，英國的毛織品壓倒了俄國的布匹。

（楊品泉 譯）

[[1]](#_1_6)《俄中條約匯集，1689—1881年》（俄文版），第87頁。

[[2]](#_2_6)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的商業經濟關系史》，第197—198頁。

[[3]](#_3_6)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145—147、381頁；拉費爾·達尼別加什維里：《達尼別加什維里旅行記》，馬魯阿什維里編；法烏斯特：《1727—1805年俄國的對華貿易及其背景》，第325—326頁注115；坎曼：《不列顛打通西藏的最初嘗試》，第30頁；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第51頁注2；涅波爾辛：《俄國的中亞貿易概述》，載《俄國皇家地理學會論叢》10（1855年），第354—373頁。

[[4]](#_4_6)法烏斯特：《1727—1805年俄國的對華貿易及其背景》，第318頁。

[[5]](#_5_6)材料載傅樂淑的《中西關系文件匯編（1644—1820年）》第1冊，第361—367頁及第2冊，第599—602頁，這些材料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點。

[[6]](#_6_6)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的商業經濟關系史》，第182頁。

[[7]](#_7_6)威德默：《18世紀俄國的在華傳教士團》，第19—20、88頁。

[[8]](#_8_6)奎斯特德的《1857—1860年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10頁注3說，亞歷山大在派出比丘林之前，曾利用三名耶穌會傳教士在北京為他收集情報。

[[9]](#_9_6)傳記載《俄國東方學史概論》第2集，第232—340頁（詳見1977年俄文版斯卡奇科夫的《俄國的中國學史概論》，此書已譯成中文，正聯系出版事宜，希望不久可與讀者見面——中文版編者）。

[[10]](#_10_6)即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譯者

[[11]](#_11_6)瓦里哈諾夫：《全集》第1冊，第602、673頁；第3冊，第294—298、425、513、585頁。

[[12]](#_12_6)瓦里哈諾夫：《全集》第1冊，第553頁；第2冊，第419—420頁。穆爾克羅夫特、特雷貝克：《1819—1825年在印度斯坦喜馬拉雅山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記》第1冊，第383—392頁。

[[13]](#_13_6)涅瑟爾羅德致卡普采維奇函，載瓦里哈諾夫的《全集》第3冊，第428頁；財政部致西西伯利亞總督函，載瓦里哈諾夫的《全集》第3冊，第295頁；穆爾克羅夫特：《旅行記》第1冊，第372頁。

[[14]](#_14_6)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112頁（我無法自己去查閱澤姆良尼津的文章）；戴維斯編：《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第65—66、68頁；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第4卷第48期（1835年12月），第656、658頁；沃森：《中亞浩罕（古費爾干納）的烏茲別克地區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第3卷，第32期（1834年8月），第377頁；麥庫洛克編：《商業航海詞典》，第597頁。中國人也提供了材料，如《中國人馬天時（音）提供的一條自吐魯番至喀什噶爾的路線》，載《俄羅斯檔案》第10期（1914年）。

[[15]](#_15_6)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12—215頁；阿特金森：《黑龍江上下游地區游記以及俄國人在印度和中國邊境區的收獲》，第159頁（所引段落）；庫茲涅佐夫：《經濟政策》，第159頁（材料來自澤姆良尼津）；納羅契尼茨基：《1860—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13—114頁。

[[16]](#_16_5)庫茲涅佐夫：《經濟政策》，第114—116頁。

[[17]](#_17_5)納羅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31頁；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30—233、270—274頁；奎斯特德：《擴張》，第111頁。

[[18]](#_18_5)蘇霍扎尼特致西西伯利亞總督函，載馬爾古蘭《瓦里哈諾夫的生平事跡》，此文收于瓦里哈諾夫的《全集》第1冊，第63頁。

[[19]](#_19_5)收于瓦里哈諾夫的《全集》第2冊，第265—412頁。

[[20]](#_20_5)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第39、83、97頁。

[[21]](#_21_5)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第100—101頁和第202頁以后；弗拉基米爾：《太平洋上的俄國和西伯利亞鐵路》，第196頁；科林斯：《1856—1857年沿黑龍江直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亞之行》（查理·維維爾編），第204頁以后。

[[22]](#_22_5)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第68—69、113—114頁；弗拉基米爾：《太平洋上的俄國和西伯利亞鐵路》，第168頁。

[[23]](#_23_5)季姆科夫斯基：《俄國使團經蒙古至華旅行記》（封·克拉普羅斯編）第1冊，第324頁；加帕諾維奇：《俄國在黑龍江的擴張》，載《中國雜志》第15卷第4期（1931年10月），第179頁。

[[24]](#_24_5)間宮林藏：《間宮林藏的黑龍江探險——東韃靼紀行》，特別是第108—109頁。又見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10—111頁。

[[25]](#_25_5)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05—210頁。

[[26]](#_26_5)同上書，第266、282頁注26。

[[27]](#_27_5)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02頁。

[[28]](#_28_5)納羅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頁。

[[29]](#_29_5)羅班諾夫-羅斯托夫斯基：《俄國與亞洲》，第138頁。

[[30]](#_30_5)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31—34、37頁；又見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第26頁。

[[31]](#_31_5)《駐北京傳教士團團長鮑乃迪與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的通信》，載《俄國檔案》第10期（1914年），第177頁。

[[32]](#_32_5)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第119頁。

[[33]](#_33_5)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21頁；巴爾蘇科夫：《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第2冊，第131頁；參閱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55—56頁。

[[34]](#_34_5)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39—54、57頁。

[[35]](#_35_4)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第37—38、76、89、91、133頁。

[[36]](#_36_4)蘇聯國家中央歷史檔案館，1265全宗，第二卷，第178宗，第40張（引自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關系經濟史》，第222頁）。另有較高的數字，見拉文斯坦的《俄國人在黑龍江》（第141、145頁）以及弗拉基米爾的《太平洋上的俄國》（第253—254頁）。又見納羅契尼茨基的《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12頁以及巴爾蘇科夫的《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第2冊，第154—155頁）。整個滿洲的人口數1842年被確定為1665542人，1864年增到2187286人。見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第6頁。

[[37]](#_37_4)科林斯：《西伯利亞之行》，第230頁。

[[38]](#_38_4)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96—99頁；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第58—62頁。

[[39]](#_39_4)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38頁。

[[40]](#_40_4)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217頁。

[[41]](#_41_4)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24—125頁。

[[42]](#_42_4)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32頁；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68頁。

# 第八章 清朝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

歷史學家傾向于把19世紀清帝國的歷史看成一個衰落時期。歐洲人取得了租界和疆土。叛亂損害了內部的安寧。但是在19世紀清帝國和中國還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說清帝國這時在衰落中，中國和漢人以及他們的文化和力量，則正開始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擴展時期。中國已經同化了它的滿洲統治者。為了戰勝叛亂以求存，王朝被迫打破滿洲旗人的軍事壟斷權，并把軍隊交由漢人指揮。

在亞洲腹地，19世紀上半期可以看到的是清朝統治的全盛時期。在這里帝國鞏固了它早些時候的軍事成果，只有在六城地區才靠再三使用武力來取得這些成果。中國本部的人口壓力和漢人的貿易主動性沖擊著清王朝的使中國和亞洲腹地隔離的政策。這種沖擊是漢人力量增長的表現。政府在18世紀首先就青海和準噶爾的移民問題作了官方的特殊規定。它又逐漸地放松了對蒙古和滿洲邊境的封閉。隔離政策越來越受到攻擊。經世致用論的學者龔自珍和魏源兩人要求充分利用新疆來為中國的無地漢人提供土地。越來越多的漢人擁向清朝的亞洲腹地，甚至進入像黑龍江和六城地區這樣嚴密封閉的地區。唯獨西藏中部對于中國移民來說是遙遠的和沒有誘惑力的，所以在逐漸增長的中國化和漢人移民的浪潮面前仍然未受影響。

衰落也是有的，但不是表現在中國人的活力方面，而是在亞洲腹地各族人民的政治命運方面。在蒙古，漢人的滲入使許多蒙古人貧困化。對六城地區的穆斯林來說，清朝在19世紀的統治意味著異教徒的統治，意味著戰爭以及成千上萬的喀什噶爾人離開家鄉遷徙到費爾干納盆地和塔什干。在另一方面，對西藏人來說，清朝的影響看來較為溫和。真正的威脅來自印度。拉薩選擇了求庇于清帝龍袍后面的策略。

由于第七章敘述了到1860年為止的滿洲的歷史，現在這一章將只敘述蒙古、新疆和西藏。

## 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會

蒙古僧侶制度的發展和漢人影響的滲入在內蒙要比外蒙更快些。清朝在內蒙的統治比在戈壁以北更為嚴密，但是在這兩個地區清朝的官員們都越來越多地掌握了一度是蒙古人行使的行政權力。在內蒙，寺院更加集中，游牧民和中國的經濟有較密切的聯系。但是同樣的趨勢在外蒙也可看到。正如19世紀和20世紀初蒙古歷史中許多重大發展一樣，內蒙古開辟了道路，外蒙跟著走。

內、外蒙古繼續為清朝軍隊提供騎兵。然而，清朝未使外蒙參與19世紀清帝國的戰爭，但內蒙則參加了中國本土反對歐洲人的斗爭。例如土默特的王公旺欽巴拉（1795—1847年），既是一個作家，又是兩個著名文學家古拉蘭薩（1820—1851年）和尹湛納希（1837—1892年）的父親，他曾在1841年的鴉片戰爭中戰斗過。科爾沁王公僧格林沁參加過1853—1855年對太平天國的戰斗，1858—1860年對英法聯軍的戰斗，1860年對北京周圍盜匪的戰斗，以及對捻軍叛亂的戰斗，直至1865年被殺死為止。

在19世紀，王朝已經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們。甚至人口實際上也在衰減，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侶制度和性病。藏醫用汞來治療蒙古人中間的性病，但是這種疾病仍然蔓延并繼續造成損失。[[1]](#_1_Shu_Er_Man____Da_Lai_La_Ma_Sh)肺結核也很猖獗。

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變成了漢人的利益。占統治地位的滿人的觀點變得更像漢人，清王朝放棄了原先阻止漢人商業進入草原和在草原移民定居的企圖。中國商人在蒙古進行貿易仍需得到許可，但這并不是想要限制漢人在游牧民中間的商業活動，而是為了提高賦稅收入，主要是用它來維持王朝的蒙古行政機構。應該說漢人的經濟滲入對王朝有利，因為它使蒙古人與帝國的其余部分更緊密地聯系起來了。與漢人商號關系日益緊密的清朝官吏，堅定地支持中國人的貿易活動。事實上，人們對漢族商人的不滿情緒也時有爆發，如1829年在庫倫舉行的寺院舞蹈儀式上喇嘛們就毆打了若干漢人觀眾。

對于旗里的王公、寺院和漢族債主強加的苛征暴斂，普通蒙古人是很少能幸免于此厄的。無力滿足這種要求的人們只好逃走，而且這樣的人在整個19世紀日益增多，但是他們的王公仍然普遍地向旗內臣民索債。旗的當局抓住這種逃亡者時就對他們施以重罰。例如有一次，69個欠債未清的人被帶枷在旗內各帳篷之間周游示眾達兩年之久。由于枷太寬而不能通過帳篷的門，所以犯人只好在嚴冬的露天中過夜。[[2]](#_2_Bao_Deng____Meng_Gu_Jin_Dai_S)同樣地，寺院對那些未能交足份額的沙比們也給予殘酷的體罰。負債的逃亡者、無法在寺院生活下去的僧侶，以及其牲畜在奄奄待斃中的牧民，只能以搶劫為生（在19世紀無法無天的行為變本加厲），或是到日益發展的商業—寺院—戍軍中心去打短工以勉維生計。在這些初期的城市中心，特別是內蒙古的邊境城鎮，以及同樣也在庫倫、額爾德尼召、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和恰克圖，窮困的蒙古人變成一種半罪犯性質的勞動階級，他們以原始的技藝勞動，或以干粗活、賣淫、乞討和劫掠為生。

在寺院中，高級喇嘛和普通僧侶間有巨大的差別。所有參加法事活動的僧侶都接受一份寺院的給養，每個僧侶份額的大小取決于他在寺院教階中的地位。在整個19世紀高級僧侶和低級僧侶的份額之間的差異越來越懸殊，低級僧侶們經常發現他們靠份額難以活下去。如果他們接受寺院外的活計，他們就不能在寺院做佛事，從而往往完全失去他們的寺院份額。為了活下去，他們乞討、偷竊或者轉回家鄉，由家庭養活他們。

大多數蒙古人留在旗內繼續做牧民過活，他們發現自己完全受旗的王公們擺布。普通牧民很少采取行動來對抗沉重的賦稅，但在非常的場合也有時向盟當局提出申述（蒙語稱為扎魯忽），雖然這種申述的提出按規定說是觸犯法律的。偶爾也會發生盟當局迫使一個旗的王公退還非法勒索所得的情況，但即使如此，原告們通常也總不免要受懲罰，因為臣民是不許背離他們旗的王公首腦的。因此，原告們總是竭力隱瞞扎魯忽組織者和起草者的名姓（他們主要是最底層的、通常又是十分貧困的蒙古貴族，也有來自喇嘛的行列者）。許多申訴書的文本流傳下來，成了一種研究19世紀蒙古社會經濟狀況的最重要的資料[[3]](#_3_Na_Sang_Ba_Er_Ji_Ri_Deng_Bian)。特別有趣的是在車臣汗部都嘎爾蘇木布勒旗中從1824年持續到1844年的一場爭論。扎薩克都嗄爾蘇木布勒從他的臣民那里征取巨額租稅，因此他的臣民反抗，直到盟當局最后裁決反對他為止。然而與此同時，申訴書的組織者們也受到了嚴厲的懲罰。[[4]](#_4_Jian_Na_Zha_Ge_Duo_Er_Ji___Ma)

臣民和他們的王公打官司的案件中最不尋常的是發生在車臣汗部的反對托克托呼圖魯一事。此人是一個有才能的王公，號稱“恐怖脫王”，他是被廢黜的車臣汗桑齋多爾濟的孫子。托克托呼圖魯的知識和文化水準遠在19世紀一般蒙古人之上，他懂得漢文、滿文和藏文，曾幾次到中國和西藏旅行。1821年，他把全旗臣民應該向他交納的所有貢賦改用銀兩交納，在以后的年代中他試圖在該旗搞改良維新。他設立農場以產品供應他的屬民并向其他旗出賣剩余物品。他發展狩獵、漁撈，收集野生植物和蘑菇，以降低使畜群減少的肉類消費。為了治病，他在自己的領地上開發礦泉。他移入漢族工匠來經營紡織工場并訓練蒙古人。他開采金礦、鹽和堿。在教育方面，他開辦學校，為他所在旗的不論貴族和平民的所有孩子們提供義務教育，并親自準備教學材料。他給樂師和演員實行專門的訓練。他為自己的大多數牧民搜集了關于畜牧業和游牧生活的技術知識，編印成書，加以散發。

當托克托呼圖魯的利益和喇嘛寺廟沖突時，他碰到了麻煩。在1837年他搞了一個計劃，想將包括1000名僧侶的11個地方寺院合并成旗的一個單一寺廟，并且要開辦一個磚廠來為新廟宇、同時也為他自己的一座王府制作磚瓦。但是，習慣于地方寺廟的牧民們不希望廢棄它們。下層僧侶中的許多人為了謀生而住在寺外，也害怕托克托呼圖魯的合并計劃將會把他們都撤換掉。高級喇嘛認為搬進一座中心寺廟，將會削弱他們作為地區首腦的權力和特權。但是托克托呼圖魯毫不動搖，他繼續進行改造中心寺廟的計劃。

就在那一年，喇嘛們和托克托呼圖魯所在旗的許多世俗人士向旗政府請愿，要求取消他的合并決定，于是一場漫長的爭論從1837年延續到1842年。形勢一直惡化到在托克托呼圖魯的士兵與抗議者之間爆發了戰斗。在新寺院中發生一場示威運動，僧侶們叫喊：“讓我們回家！”托克托呼圖魯不得不把糾紛提交給盟當局。事件一拖再拖。此事被提交給庫倫的辦事大臣衙門；辦事大臣又將它退回到盟里。大膽的抗議者向盟當局提出了一份申訴書，開列了托克托呼圖魯的四十條罪狀。當局的反應是逮捕了呈遞稟帖的人們。

盟當局也不高興托克托呼圖魯的合并計劃。清朝的政策通常是阻止蒙古的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相結合的，但是托克托呼圖魯顯然想要將他所在旗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的權力全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然而對于當局來說，人民的騷亂比起托克托呼圖魯奪取更大權力的企圖是更不合心意的。因此，它增加了對抗議者的壓力，迫使原告中一些人撤銷他們的名字，盟當局解決該案時偏袒托克托呼圖魯，然后把判決送往庫倫復審。庫倫辦事大臣支持盟的判決，嚴厲懲辦了抗議者，特別是為首的人，但是清朝當局也乘機使托克托呼圖魯安分守己：他們判處他以很輕的懲罰，解散了他合并起來的寺廟。[[5]](#_5___Man_Zhou_Tong_Zhi_Shi_Qi_Ka)然而，這并沒有能阻礙托克托呼圖魯在1859年成為盟長。

托克托呼圖魯的許多計劃在他的時代確是很先進的，但是他沒有什么理由能使他的臣民相信他們有分享他的計劃成果的任何希望。他的計劃是與他的人民的保守思想和控制著19世紀蒙古人心靈和理想的喇嘛寺院的力量相抵觸的。

19世紀蒙古地區游牧生活的衰落有好多征兆，如人口的普遍下降、因當喇嘛而使男性人口的減少、蒙古人對漢商債務的增加、清朝對王公們的控制、城市中心的成長以及普通牧民的貧困化，但最突出的征兆也許是草原上農業的擴大以及牧場越來越轉作農業用途。作為一項政策，清政府正式建立了漢族農業移民區，為它在蒙古領土上的駐軍和驛站種植糧食、飼料和谷物。這種移民區的規模有限，只占用小量牧場。但當18世紀時，人數日增的漢族移民開始非法遷入內蒙草原，他們從寺院和旗的王公那里租種土地，使蒙古牲畜的放牧地區慢慢地縮小了。總的說來，用這種方法轉讓牧場是非法的，但轉讓繼續進行無阻。漢族商人代王公們償付欠款以取得土地，并把這些土地租給漢族農民，這就進一步促進了這一逐漸進行的土地轉讓過程。這是違反清朝法律的，但到了1791年，在內蒙東部郭爾羅斯前旗的漢族移民是如此之多，致使扎薩克向清朝政府請求將已經居住在那里的大量山東和直隸農民的地位合法化。在1799年，政府設廳管理在吉林當局管轄下的移民，從而最后接受了既成的事實。1802年，置廳助理官員負責郭爾羅斯境內漢族移民事宜，1810年也以同樣理由在伯都訥指派了廳的官員。

到1852年，漢商已深深滲入內蒙地區，蒙古人已債臺高筑，無法清償。寺院接管了大量牧地，寺院、商人和扎薩克們將許多放牧地區出租給漢人作為耕地。人民對于沉重的租稅、漢族移民、牧場的縮減、債務和王公們的濫用權力等等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高。也許是由于太平軍起義的刺激，鄂爾多斯烏審旗持不同政見的蒙古人組成了一種叫做多歸輪（圈子）的新型蒙古秘密團體，來表示他們反對不幸的處境。圈的思想作為一種基層反對運動立刻擴展到其他旗中。如同上述札魯忽文書一樣，圈子的成員也起草了一份申訴書，他們按圓圈形狀簽名，使之好像沒有人是出頭人物。這一次的領導似乎主要又是來自貧困的小貴族和下層喇嘛。在運動發展的早期階段，它的目標只針對漢商和漢族移民以及剝削臣民的各旗王公。在蒙古地區針對王朝的反清情緒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

在事實的壓力下，清朝對蒙古地區的漢族移民事業逐漸采取更為贊同的態度。1860年正當王朝將它在北滿的無移民的領土拋棄給俄國時，它正式把蒙古最東部的位于哈爾濱附近的邊境開放給漢族移民。

牧場轉變為耕地的經濟后果仍難確定，但是，特別是在內蒙，牧地縮減得如此之多，致使蒙古傳統的游牧生活發生了真正的變化。在從前，沒有足夠牧場的蒙古人暗地里前往鄰近各旗的牧場；沒有足夠牲畜的蒙古人依靠一種游牧放債制度生活，即讓貧民為富人放牧牲畜。[[6]](#_6_Na_Zha_Ge_Duo_Er_Ji____Meng_G)但是現在當蒙古游牧經濟衰落的時候，不但漢族移民，而且完全不再能以牧人身份富裕起來的貧困蒙古人，都開始在草原上從事耕作，從他們所在旗的王公那里或從漢商地主那里租種耕地；漢商地主是以抵債方式獲得農業用的土地的。事實上當19世紀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農是蒙古人。和普遍的誤解相反，農業在蒙古地區已經存在好幾個世紀，而在19世紀它的重要性已顯著增加，特別在內蒙更是如此。關于蒙古的農業所知不多，但有些蒙古人在這方面顯然取得了良好的成績，看起來至少在外蒙，農民負擔的賦稅要比牧人少，因此農業生產有時可以得到相當的利潤。[[7]](#_7_Bao_Deng____Meng_Gu_Jin_Dai_S)但并非普遍如此，因為在1861年，內蒙東南的土默特西旗有數千名貧困的蒙、漢農民聯合起義，反對蒙古扎薩克和漢族地主憑借出租土地而強加于他們的沉重的租稅和苛刻的條件。起義是夭折了，但它說明了19世紀60年代開始時內蒙農業人口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對拼命增稅的扎薩克們和貪婪的耕地出租者的不滿程度。

盡管有這一切苦難，在某種程度上無疑的也正是由于這些苦難，19世紀的蒙古人創作了若干優美的文學作品。當然，由于文盲占人口絕大多數，因而最流行的藝術形式是由行吟詩人和說書藝人所作的說唱。特別受到賞識的是所謂“云游僧”故事（badarchin—u—üliger），它是清代由云游僧人講述而在蒙古地區發展起來的一種文學形式。從中能夠看出蒙古人對草原生活衰落狀況的不滿。在性質上相類似的是膾炙人口的、多少有點俠義小說味道的關于傳奇式蒙古民間英雄巴蘭先格額的故事，他愚弄僧侶、扎薩克和漢商們。最有趣的是關于生活的“訓誡”詩，近似蒙古傳統的格言詩，起自19世紀。在這同一時期，追求幸運的“祈禱文”、贊詞和挽歌（直譯為“詞”）仍然都在流行。這些形式和蒙古的英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格薩爾汗傳”），是常被背誦或大聲朗讀的，它們也仍然是蒙古口頭文學的一部分。

19世紀為識字的蒙古人創造了許多用蒙文和藏文寫的歷史作品，以及相當多的語言學著作，這是16、17和18世紀將佛教經典譯成蒙文的巨大努力的結果。至于純文藝，蒙古讀者欣賞僧侶阿格旺·哈依杜白（1779—1838年）的小說，其中有些故事公開嘲弄和抨擊那些濫用特權和不守清規的寺院成員。胡力沁·山達哈（1825—1860年）寫詩，特別是挽歌，他不是簡單地從蒙古過去的英雄傳說或從豐富的佛教傳統文學中，而是從牧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題材。

還有許多其他作家，但是19世紀上半期最不尋常的作家也許是丹津饒結（1803—1856年），他出生在內蒙，但卻成為外蒙紅教的諾顏呼圖克圖五世。丹津饒結用蒙、藏兩種文字寫作，贏得了詩人的聲譽，他的若干詩歌一直流傳到20世紀而不衰。他的作品主題經常反映對蒙古社會和經濟衰落的不滿，在暴露蒙古僧、俗領袖之間的對立方面是引人入勝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音樂劇《月亮杜鵑》，開始作于1831年。至少早在18世紀，基于西藏原型的半宗教性“歌劇”已在蒙古寺院演出，它取材于印度—西藏的佛教文學，但是《月亮杜鵑》體現了一種新的發展，它是大家知道的第一部蒙古世俗戲劇。戲劇逐步普及，世俗的演員反復為世俗觀眾演出戲劇，為蒙古地區20世紀發展起來的世俗劇院打下了基礎。[[8]](#_8_Mi_Ha_Yi_Luo_Fu____Meng_Gu_We)

19世紀蒙古的小說又因為廣泛流傳著許多西藏故事的蒙文譯文而受人注意，如“潘查丹特爾”故事，但是蒙文譯文常常有很大的變化。然而，這時期蒙古文學中更為重要的外來成分是中國的小說，包括故事和所謂“章回小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譯成了蒙文；似乎早在19世紀初蒙古人就已讀到了幾乎所有重要中國小說的蒙文譯本。《紅樓夢》、《金瓶梅》、《西游記》和《三國演義》特別流行。中國文學的影響是特別顯著的，例如，在前面已提到的旺欽巴拉之子尹湛納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在為捍衛清朝而參加鴉片戰爭之前，旺欽巴拉已經開始寫作一部蒙古全盛時代的歷史，他選擇了中國章回小說的體裁作為寫作形式，但是他在1847年死去，這部著作未能完成。尹湛納希寫作了兩部蒙古章回小說，他的人物和背景都來自《紅樓夢》，隨后續寫他父親的歷史章回小說，他像一個漢族學者那樣隱居在自己的領地里完成了它，忠實地保持了中國章回小說的敘事形式。這部著作名為《青史演義》，直到20世紀才出版。[[9]](#_9_Hai_Xi_Ge____Meng_Gu_Wen_Xue)

由于生活條件的惡化，在蒙古，俗人與喇嘛教會之間的對抗增加了。這種在內蒙特別強烈的情緒，可以在尹湛納希的兄弟古拉蘭薩的作品中看到：后者是一個扎薩克，同時又是一個文學家，他挖苦喇嘛以引起世俗讀者的反宗教興趣。在19世紀的更晚時期，一種更深刻的不滿蒙古社會秩序的情緒在鄂爾多斯詩人賀什格巴圖（1849—1916年，此人最初在旗里當法官，但曾一度與多歸輪運動有關系）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現。

建筑學雖然在本質上和古老的游牧環境不相干，它在17和18世紀卻因普遍建造寺廟而得到推動。蒙古人最初從他們日益相適應的定居社會學習樣式，所以他們建造的寺院不是西藏式的，就是中國式的。在18世紀，混合類型的寺廟開始出現，它們是將西藏的和中國的樣式或多或少地結合起來，再依據本地圓形蒙古氈帳的樣子建造起來的。在這些合璧式的建筑實例中間，最杰出的是聳立有彌勒佛巨大雕像的西藏—蒙古型寺院。第一個這種寺院是19世紀初在庫倫建造的。有一種用藏文和蒙文寫成的著作（有印刷的書籍和手稿兩類）流傳下來，它們描述了蒙古寺廟的簡史并概括了蒙古建筑工程學的原理。[[10]](#_10_Xie_Bie_Di_Er_Ni_Ke_Fu____Me)裝飾藝術在19世紀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絕大部分宗教繪畫和雕刻等藝術的觀念和手法基本上仍是模仿性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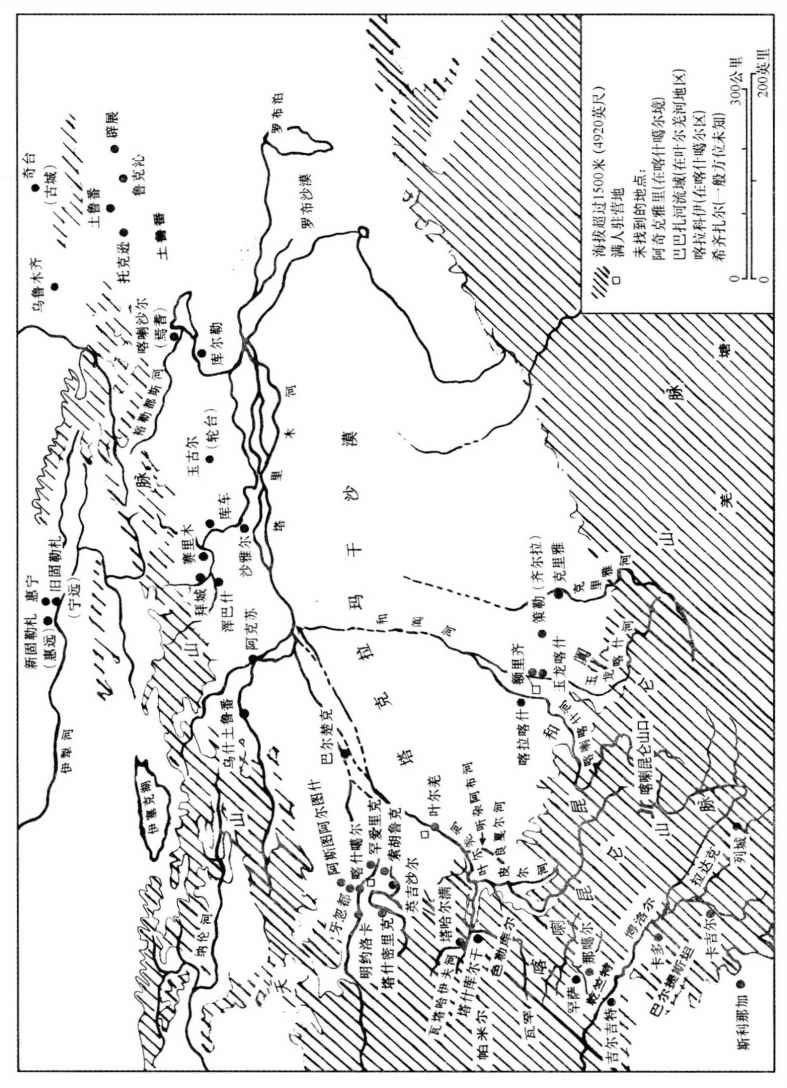
19世紀蒙古地區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是處于外來影響的支配之下，只有某些本民族的文學著作是例外。

## 新疆：瑪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在1820年，主張經世致用的學者龔自珍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主張將新疆改設行省，另一篇則要求結束廣州的貿易。[[11]](#_11___Xi_Yu_Zhi_Xing_Sheng_Yi)新疆和廣東是清朝臣民經常和外國人進行貿易的地方，這兩個地區的相似之處在20年后變得更顯而易見了，因為那時政府把六城地區的教訓應用到了它與英國在中國沿海的爭端上。

### 張格爾的圣戰（1820—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年）

1817年，浩罕汗反復提出在喀什噶爾享受貿易特權的要求，并以要放出和卓們相威脅。清朝的答復是停止對他的茶、錢賞賜，并撤銷他派遣使節到北京的有利可圖的特權。浩罕于是派遣兩名使節提出一個折中方案：浩罕派遣兩名沒有司法權限的代表駐在喀什噶爾，簡稱為“阿克沙哈勒”（直譯為“灰白胡子”，即長者）。清朝再次拒絕，打發使節們回去，并對他們的貨物足額征稅；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和巴布頂，放出了宣稱要發起一場圣戰的張格爾。張格爾召集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組成的數百人的軍隊，打回他祖先的“六城”地區。



地圖14 19世紀的六城地區

清朝的軍隊很快擊潰了入侵者，張格爾逃回浩罕時只剩下二三十人，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瑪赫杜姆的事業仍然活在人們心里。當浩罕在1821年再次和喀什噶爾交涉，試圖再次取得1809年的免稅常規時，清政府恢復了汗國的貿易和進貢權利，但不許免稅，并且仍然拒絕一名浩罕使節留駐在清領土內的要求。然而，就在這一年，浩罕的統治者死了，張格爾逃進了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領土上。于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了達成互利協定的機會。1824年，和卓開始以一支有數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隊伍騷擾清朝邊境。這時否認了對張格爾的一切責任的浩罕，在1825年又一次試圖為他的商人取得免交關稅的特權，但沒有成功。但收獲是可觀的，因為根據一份俄國的報道，每天有100—200頭駱駝從中國本部馱來貨物。[[12]](#_12___Ka_Shi_Ge_Er_Zhuang_Kuang)

如果不是一個清朝官員的愚蠢，張格爾的圣戰也許已成泡影：這官員帶著200名騎兵在1825年攻打這個和卓時，沒有捉到他，反而屠殺了一處未設防營地的柯勒克孜婦孺。當這位柯勒克孜首領發現這一暴行后，他召集了2000名騎兵把清軍圍困在一處峪谷中，最后把他們全都殺死。張格爾的同盟者已經擊潰一支清軍的消息迅速傳遍塔里木盆地各城鎮。和卓自己“看到中國人已經多么不得人心”，就通知浩罕汗、烏臘提尤別的統治者、昆都士的首領、各支哈薩克的頭人以及柯勒克孜的首領們說，這是奪取六城地區的機會。張格爾逐漸召集起一支由喀什噶爾人、浩罕人、柯勒克孜人和哈薩克人組成的超過500人的軍隊；軍隊中還有哈爾查斯人（山區塔吉克人），他們的黑色服裝在西伯利亞引起了有歐洲人在和卓軍隊中戰斗的流言。[[13]](#_13_Wo_Sen____Zhong_Guo_Da_Da_Li)

1826年張格爾入侵，在進攻喀什噶爾之前先去牙忽都的阿法其陵墓祭掃，并在交戰中損失了400名士兵。當退入牙忽都時，侵略者被清帝國軍隊所包圍，但是用火繩槍武裝起來的張格爾軍隊突破了包圍，人民隨著這一勝利而紛紛起義，使和卓的隊伍擴大到大約一萬人。[[14]](#_14_Ceng_Wen_Wu____Zhong_Guo_Jin)參贊大臣慶祥在此期間組織了相應的抗御，但是圣戰的力量太強大了，清軍不得不在喀什噶爾城堡中設置防御，在那里慶祥處死了阿奇木伯克玉努思以及許多被認為同情侵略者的城市居民。[[15]](#_15_Wo_Sen____Zhong_Guo_Da_Da_Li)市場位于滿城外邊，這使張格爾能夠搶劫有助于他取得成功的貴重貨物，同時起事者發泄了他們對漢族商人的憤恨。

在此以前張格爾曾派遣一名使者去浩罕要求增援，將來以分享擄掠物為酬報（當時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16]](#_16_Ceng_Wen_Wu____Zhong_Guo_Jin)但把張格爾的軍隊看作“兵痞”的浩罕政府，寧愿自己主動參加這場沖突。總之，浩罕汗穆罕默德（舊譯“馬哈木”）阿里親自帶領一支8000—10000人的騎兵到來，張格爾騎在馬上和他相會，以表示和卓拒絕承認浩罕統治者是他的汗。根據一個史料記載，汗的軍隊“對在據點中的中國將軍發動突然襲擊”，并“殲滅了中國軍隊”。其他史料記載卻指出，當汗到達時張格爾自己已經控制了局勢；或者說，汗被告知，張格爾已安排了一個在宴會上殺死他的陰謀計劃。汗無法使張格爾“信賴”；而和卓又妒忌阿里并且“懷疑他不可靠”，就撤軍北去。汗對喀什噶爾城堡進行了幾次不成功的攻擊，試圖用火藥炸開城墻。但是守衛者用箭、滑膛槍、擲石器、大炮（？）和火油來回擊。這場屠殺的規模是如此之大，以致“地脈中沸騰著一條血的河流”。[[17]](#_17_Ceng_Wen_Wu____Zhong_Guo_Jin)經過12天的戰斗并失去他的1000名士兵之后，阿里汗灰心喪氣地撤走了。張格爾說服了一部分浩罕騎兵留下來參加他的隊伍。

10個星期以后，清朝駐軍耗盡了水和糧食；它的指揮者自殺，士兵們乘著夜色逃走，[[18]](#_18_Wo_Sen____Zhong_Guo_Da_Da_Li)但被追上和遭到屠殺，只有400名東干人或信伊斯蘭教的清兵除外。張格爾進入了喀什噶爾城。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的居民也叛亂了。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夷平了這些城市中的滿城，并且派遣使節將俘虜送到布哈拉、昆都士、巴爾赫、基發等地，在哈薩克人中間示眾，以炫耀勝利。

張格爾沒有再從浩罕那里取得援助，而東突厥斯坦人卻因和卓的事業而仍然深深地陷于分裂。黑山派出于反對他們的白山派敵手的目的依舊依附清朝。在某些地方白山派試圖促使黑山派轉變，[[19]](#_19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但是在別處，特別是在和田，他們用他們的轉為優越的地位來算老賬。因而，親清的阿克蘇的阿奇木伯克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亦即在18世紀曾幫助清朝征服六城地區的庫車鄂對的玄孫），就派遣密使到和田去散播不和。伊薩克本人是哈迪里亞派的信徒，沒有發現他與納赫什班迪教團的黑山派有什么聯系，[[20]](#_20_Wo_Sen____Zhong_Guo_Da__Da_L)但黑山派的伯克們響應伊薩克煽動，奪取了和闐的控制權并宣稱他們效忠于清帝國。由于大雪阻礙了滿洲人派兵來援，白山派的軍隊重新恢復了張格爾的權威，只有黑山派的和田伯克中一個名叫阿明的人帶著兩千名屬民逃到阿克蘇。張格爾在此期間編造了喀什噶爾的財產清冊，把沒收來的巨額公私財產的大部分當薪餉付給了他軍隊中的浩罕人。他搶掠了伯克們的家，“向富商大量敲詐勒索”，并“對人民實行暴虐統治”。他縱人大肆屠殺，甚至使得白山派的支持者都感到了失望。

1827年初，總數為2.2萬人的卷土重來的清軍，從阿克蘇出發攻打張格爾。荒涼的土地迫使他們差不多要攜帶人和牲畜所需的全部糧秣，才能勉強滿足軍隊的巨大的給養需要。張格爾逃往山區，他的士兵帶走了“巨大價值的資產”，這些都是清軍快到來時他們從六城地區居民那里搶來的東西。[[21]](#_21_Wo_Sen____Zhong_Guo_Da__Da_L)最富有和最重要的白山派同情者同他們一起遷居到浩罕領土內。當清軍8000人在帕米爾搜捕和卓未能得逞之后，政府轉而對那些和侵略者合作的人進行報復，并在喀什噶爾安排了一支8000人的駐軍，而把9000名軍隊撤回中國本土。一支穆斯林民兵也編成了。

清朝接著向所有鄰近的統治者發出牒文，要求引渡張格爾。穆罕默德阿里厚著臉皮接連派了兩個使者到喀什噶爾去，否認他曾援助過張格爾，并提出愿意派遣一支萬人的軍隊去捕捉他，假如北京愿意付出費用的話。清政府被激怒了，一度想要切斷六城地區的全部對外貿易。

當帝國軍隊前進時，清帝要求他的最高級官員考慮在西部六城地區廢除伯克官制，用一種像青海和東部康區那樣的土司制度來取代。伊犁將軍長齡提出這樣的建議：任命一個羈養在北京的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做喀什噶爾統治者，用以贏得人民的同情，并保護六城地區不受張格爾和浩罕的侵犯。武隆阿則主張一并放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而在它們的東面設置一道堅固的防線。由于這些建議被認為是失敗主義的和不能接受的，清帝委派直隸總督那彥成去管理六城地區，并頒布賞格，對凡能俘獲張格爾的人給予官爵和酬金。控制六城地區是很重要的。在發生麻煩的那一年，清當局曾發現一個名叫亞歷山大·加德納的英國人，他喬裝打扮，穿著土著服裝，從巴達赫尚通過葉爾羌進入拉達克。[[22]](#_22_A_Er_De____1865__1895Nian_Yi)

1828年，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派了一名間諜到山中散布清軍撤退的假消息，并收買了張格爾的柯勒克孜族岳父他依拉克，使和卓帶著500人回到了新疆。當和卓發覺到自己是受騙上當時他逃跑了，但這時害怕清朝報復的柯勒克孜人出賣了他，一個后來在鴉片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官員楊芳將他捕獲。張格爾的一部分追隨者逃掉了，其中有一大批刀朗人（即和卓的家奴——譯者）逃到了浩罕。另一些人逃到了拉達克，拉薩的駐藏大臣派遣特使到列城去要求引渡他們，拉達克王即予照辦。[[23]](#_23_Bi_De_Qi____1728__1959Nian_X)白山派認為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應對張格爾的被俘直接負責。作為獎賞，清朝指定他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民間將他依拉克出賣張格爾的故事編成了一首流行的突厥語歌謠。

北京極力把捕獲和卓看作一項光輝成就，同時卻掩飾只有少數兵力的張格爾卻能困擾帝國的軍隊逾七年之久的事實。討伐張格爾之役曾經需要調動3.6萬人的軍隊，花費了政府一千多萬兩銀子。[[24]](#_24_Wei_Yuan____Sheng_Wu_Ji____J)事實上許多人相信，張格爾“失敗的真正原因”完全不是清朝的軍事力量，而是在于東突厥斯坦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分裂。[[25]](#_25_Wo_Sen____Zhong_Guo_Da_Da_Li)清朝的將軍們向北京的清帝獻俘，政府將張格爾寸磔處死。長齡傳檄諭知柯勒克孜人和浩罕，要求引渡張格爾家族的全部成員。但是柯勒克孜人沒有照辦，浩罕則以伊斯蘭法律為由公開拒絕引渡（張格爾家族是伊斯蘭教祖的后裔）。

那彥成到達喀什噶爾以后提出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建議將犯叛亂罪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安集延人）的土地和財物加以沒收。這些土地每年可收糧5.6萬擔，他主張以3.8萬擔作駐軍餉項，其余1.8萬擔用來提高官員們的俸祿。

從國內觀點看，這些主張不管有多大價值，卻從未付諸實施，因為那彥成的對外事務的建議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簡言之，那彥成的建議是要完全停止對浩罕的貿易，直到汗國交出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為止。所有在六城地區居住不滿十年的浩罕人應予放逐，他們貯藏的大黃、茶葉和其他財物應予沒收。在六城地區居住10年以上的全部浩罕人應使之歸化；應與柯勒克孜人和解，以便使他們與瑪赫杜姆家族及浩罕人疏遠。“叛民”的妻子兒女應發配為奴和流放到烏魯木齊和伊犁等地。

清政府不但想用這些措施平息山區來的騷亂，還想使浩罕統治者安分守己。北京已經注意到，浩罕君主在18世紀之采用汗的稱號是一種僭越，特別因為在突厥語和滿洲語中，“汗”是清帝本人的稱號。因此，北京拒絕承認浩罕統治者為“汗”，繼續用早些時候的頭銜“伯克”來稱呼他。然而，浩罕的戰略位置促使清帝在藩國謁見時稱呼浩罕統治者為“吾兒”（在亞洲腹地的詞語中僅次于皇帝），而不是用“吾臣”，而在浩罕的信件中，統治者繼續稱自己為汗。此外，在喀什噶爾的每次朝見中，穆罕默德阿里的使節并未能履行規定的禮儀，也許更為過分的是，在正式文書中他的名字是用泥金書寫的。[[26]](#_26_Ku_Zi_Nie_Zuo_Fu____19Shi_Ji)

清朝政府立即贊同實施那彥成的建議。那彥成回到了北京。他的繼任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和葉爾羌辦事大臣壁昌在1828年著手行動：沒收安集延商人的大黃和茶葉，把他們從六城地區趕走。在準噶爾地區，官府也驅逐那些居住在伊犁的安集延商人。清朝重新建起各地的滿城，與回城離得較遠，但在英吉沙爾、葉爾羌及和闐，商業區仍舊留在城外。只有在喀什噶爾，清政府方將商業區安置在滿城之中。

非浩罕人為了商業事務可以照常入境，政府允許布哈拉人經由巴達赫尚和喀爾提錦來喀什噶爾，但是，當局對外國人課以重稅，以維護一種新的官鋪制度的利益。旨在開辟財源以供養新疆駐軍的官鋪是仿效政府壟斷對準噶爾地區的哈薩克人貿易的辦法建立起來的，它享有和所有外國人——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優先進行貿易的權利。但是，清朝給予柯勒克孜人一份從安集延人那里沒收的大黃和茶葉，用以保持他們的好感。一所官辦茶局（創始于1826年）于1828年在古城開始順利地向陜西私商運入準噶爾地區的各類茶葉征稅。然而到1829年末，官鋪在六城地區引起的不滿和困難多于收入，因此當局廢除了這些官鋪。

其他為駐軍而開辟財源的一些努力是采取了擴大和改良六城地區耕地的方式。張格爾的圣戰中斷了前此為東突厥斯坦日益增長的人口而開墾未經灌溉的土地（“死地”）的努力，1828年六城地區的嚴重糧荒使得大量建議涌向清帝面前。松筠主張在東突厥斯坦開展軍屯。長齡建議把所有從叛逆者那里沒收來的土地上的佃戶轉為國家農戶，使之為駐軍生產糧食。武隆阿和署理陜甘總督鄂山極力主張從中國內地招徠移民。雖則這一意見預示著將來的趨勢，但卻是同清朝將漢人和亞洲腹地居民加以分隔的長期實行的政策背道而馳的。因此，新疆當局不得不滿足于灌溉計劃、已增加的戶口登記數和稅收。但是，六城地區的人口因圣戰而減少了，這些措施是不夠的。

那彥成提出的停止和浩罕貿易的措施，從根本上打擊了汗國的財富和力量。浩罕已經獲得了對喀什噶爾的東西方商隊貿易的控制權，并以損害塔什干和突厥斯坦的城市而擴大了這種控制，它又一直在尋求柯勒克孜和哈薩克同準噶爾地區的商業貿易，還想控制印—俄貿易的東方路線。

“披巾和其他印度商品”、狐皮和羊羔皮有東、西兩種商路：一是經由西邊的一條迂回路線，通過喀布爾和巴爾赫到布哈拉，然后運到浩罕；[[27]](#_27_Wo_Sen____Wu_Zi_Bie_Ke_Di_Qu)一是由夏季線和冬季線這兩條東邊路線通過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市場，浩罕商人就在葉爾羌購買這些貨物。清政府是否曾經允許商隊享有通過帝國領土的特權，這還不清楚，但是政府完全了解汗國力圖壟斷新疆的對外貿易，所以為了防范這種企圖，它正式拒絕批準浩罕商隊經拉達克去印度。因此，浩罕商人只好在色勒庫爾和葉爾羌購買印度貨物，經過浩罕把它們運到俄國市場去出售。葉爾羌于是成了印俄貿易的一個中心。浩罕商人享受了能夠將他們購買的貨物經由自己的國土運到俄國的好處，但是汗國不能阻止非浩罕人在葉爾羌或色勒庫爾購買印度貨物，也不能阻攔這些貨物運往伊犁或塔爾巴哈臺再往前運到俄國領土去。

清朝的禁商政策甚至不許浩罕商品通過伊犁和塔爾巴哈臺，因而在浩罕引起物價飛漲，隨之而來的是兩年經濟困難。清政府對于浩罕高級官員的懇求書信無動于衷。但在此期間，浩罕把禁商看成是侵略六城地區和汗國加緊控制新疆貿易的一個機會。白山派在喀什噶爾的勢力仍是如此強大，浩罕的貿易又是如此重要，因而浩罕實際上在六城地區處于支配的地位。只要有瑪赫杜姆家族的侵略，人民中至少有些人必定會鬧事。“浩罕如狼，東突厥斯坦人如羊”。況且，在被驅逐和沒收財產的浩罕商人中間情緒激昂，特別是當柯勒克孜人帶著他們被沒收的大黃和茶葉出現在浩罕市場上時更是如此，而柯勒克孜人卻夸耀說，這些東西是“大清皇帝”送給他們的禮物。[[28]](#_28_Ceng_Wen_Wu____Zhong_Guo_Jin)

1830年秋天，浩罕汗帶著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也有一些安集延人、流浪的刀朗人和其他喀什噶爾亡命者組成的軍隊，侵入六城地區。然而，在跨過清朝邊境以前，在烏什地方，決定讓汗留在浩罕，[[29]](#_29_He_Han_Di____Sha_Bo_Lu_Xi_Sh)張格爾的大哥穆罕默德玉素普被指定為名義上的統帥。真正的指揮官是浩罕汗國的高級官員哈克·庫里明巴希，他是最高司令，第二把手是穆罕默德沙里夫阿塔利克。跨過邊境后侵略者分兵三支，幾乎同時包圍和攻打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葉爾羌三地。清朝駐喀什噶爾的戍軍本已縮減，現在又被攻其無備。玉素普進入了自己的原籍城市，指定了他自己的地方長官（阿奇木）。喀什噶爾地區的黑山派人民大批逃往阿克蘇（雖然他們中約1000人在喀什噶爾的滿城中避難），甚至白山派中的許多人也不愿響應侵略者要他們拿起武器的號召。但是，這次侵略并非搞復辟，其性質馬上變得很明顯，因為玉素普本人沒有行使什么領導權，而且一千多名浩罕商人跪在滿城外面向清當局申述說：侵略是由清政府不公正地處理無罪的商人引起的；他們要求恢復貿易和發還被沒收的財產。

在葉爾羌，壁昌在城內只帶有清兵五六百人，還有大約4500名本地民軍，但是他有較多的時間做防御準備。他很快把商人和小商販都搬入滿城，把市場的攤子和建筑物燒個干凈，什么也沒有給侵略者留下。在和葉爾羌地區伯克們慎重計議之后，壁昌派遣他的軍隊出外封鎖通向葉爾羌的主要戰略據點。他配置1000名本地民軍防守回城和滿城；他從所轄地區各個據點集結軍隊，同時又派出400名清軍在葉爾羌東門外把守。逼近葉爾羌的侵略軍大約有步、騎兵7000—10000人。[[30]](#_30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_1)清守軍用大炮轟擊他們，殺死了三百多人，侵略者終于撤走。在作第二次嘗試時他們再次被擊退，這時他們已經聽到清援兵正從阿克蘇開來的消息。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都撤退了，只留下刀朗人，他們試圖以玉素普的名義召集一支葉爾羌土著的軍隊。然而，葉爾羌主要是黑山派的地方，大多數居民寧可逃走也不愿參與白山派的事業。因此，刀朗人搶掠城鎮和鄉村，在糾集起一支千人的隊伍之后，對葉爾羌進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攻擊，但都被壁昌的軍隊擊退。

與此同時，在喀什噶爾的札隆阿卻無法迫使和卓停止圍攻。在喀什噶爾和英吉沙爾，如同在葉爾羌一樣，侵略者從未能攻克滿城，但是他們控制著這個地區的全部鄉村和城鎮。

突然傳來消息說浩罕和布哈拉之間出現了風波，還說浩罕國內需要軍隊。安集延人因此拋棄了玉素普而轉回浩罕，帶走了許多俘虜和戰利品。浩罕人將他們俘虜的“中國人”勒逼為奴隸，浩罕汗還將其中一些人作為禮物送給彼得堡的俄國沙皇。甚至在白山派勢力最大的喀什噶爾地區，浩罕的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所組成的軍隊貪婪成性，所以使得許多歷來和白山派聯合的人感到恐懼和痛苦，轉而和清朝當局合作。白山派的事業在六城地區已經大失民心，玉素普及其追隨者除了跟著撤退的安集延人翻越山嶺逃回浩罕之外是別無長策了。在清朝援兵從阿克蘇到達以前，大約有2萬名東突厥斯坦人逃往安集延和塔什干。[[31]](#_31_Wo_Sen____Wu_Zi_Bie_Ke_Di_Qu)玉素普繼續住在浩罕，直到1835年死去為止。[[32]](#_32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

浩罕已經達到了它的目的。六城地區是偏僻的，難于保衛的，而且依賴國外貿易。獨立的、靠近高大綿亙的山脈而又以它為屏障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區取得一種特殊地位，除非清朝讓步，它要無休止地進行騷擾。在1830年的侵略中清帝國失去了它討價還價的地位，同時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失去了六城地區人民的忠誠。只有浩罕得到了好處。

1831年，滿洲人揚言要組織一次懲罰性的遠征。據說這消息嚇得浩罕沿著邊境建造堡壘，還派使節去俄國請求軍事援助，俄國人聞訊甚至拒絕浩罕使節入境。[[33]](#_33_Ceng_Wen_Wu____Zhong_Guo_Jin)事實上，浩罕人建立了一些據點，但它這樣做的目的是擴張主義的，是為了控制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并向他們征稅。浩罕和俄羅斯帝國之間可能進行的任何商討看來不會是由于害怕中國而激起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區暴露了清朝的虛弱，因此，熟悉新疆情況的兵部尚書松筠建議，取消對浩罕停止貿易的禁令，允許東突厥斯坦當地人像以前那樣和安集延人通婚。他認為，只有當地人對他們的命運感到滿足，六城地區才能夠安寧。

當被任命為六城地區欽差大臣的長齡在1831年到達喀什噶爾時，署理阿奇木伯克作霍爾敦臺吉[[34]](#_34_Guan_Yu_Zhe_Ge_Ming_Zi__Jian)領著“兩萬大小不等的”喀什噶爾人對他郊迎十里，感謝皇恩浩蕩，誓不追隨叛亂者。長齡然后從清朝駐軍那里獲悉，浩罕接連派來三名使者說，“五年”的中斷貿易引起了困難，他們抱怨清政府的沒收和驅逐出境政策，并要求恢復貿易。長齡將此事向清帝報告，也許北京這才第一次充分感到那彥成的政策惹起了戰爭。

長齡留下浩罕使節一人，派遣作霍爾敦臺吉和其他二人回浩罕。作霍爾敦原是喀什噶爾征稅人，土魯番首任扎薩克額敏和卓的后裔。當張格爾發動圣戰時他離開六城地區曾前往浩罕、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和喀山旅行，經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回到新疆。在固勒扎他曾晉見伊犁將軍，聲稱曾被拐騙為俘虜，清朝于是指定他為喀什噶爾的土著幫辦大臣，然后任命他為阿奇木伯克。作霍爾敦的旅行使他通曉中亞的貿易活動。在和浩罕的談判上，長齡不可能派出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了。[[35]](#_35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

長齡在開始時曾直接堅持要浩罕交出1830年侵略的魁首，將全部戰俘放回本國，但是北京對于艱苦的談判沒有思想準備。甚至不等到汗國回答，皇帝已允許重開新疆與浩罕的貿易，豁免關稅，并且指示長齡放棄引渡要求和不再強要二萬東突厥斯坦流亡者回來，“以示大方”。[[36]](#_36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在1831年底，兩國之間的貿易恢復了。

確切地說，作霍爾敦在浩罕的談判看來未曾公開發表過。浩罕和六城地區當局交換了幾次書信，在1832年達成協議，清朝允許“旨在經商”的浩罕臣民“自由來往”于六城地區，并且允許“托缽僧”入境，但是與以前一樣，沒有北京明確的批準，不允許任何人進入中國本部，甚至對使節也是如此。政府用銀子賠償了浩罕商人被沒收的財產，對浩罕商人豁免關稅。作為報答，浩罕愿意將清朝的戰俘遣送回國，但不包括流亡者，同時汗國將阻止瑪赫杜姆家族入侵清朝的領土。長齡報告說，浩罕的統治者自愿抱經盟誓，“永遠翊戴”。清朝當局作為戒備，還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布哈拉艾米爾“請求幫助”，使之在浩罕汗國“侵犯時能幫忙維持中國西部邊境的和平”。但是布哈拉艾米爾“婉言謝絕了要進行任何干預”。[[37]](#_37_Wo_Sen____Wu_Zi_Bie_Ke_Di_Qu)

根據長齡的建議，清朝在1832年對所有各國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貿易的商人一律豁免關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38]](#_38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這是為了避免造成這樣的印象：曾經威嚇滿洲人的浩罕商人，現在是這個地方的主人；也為了禁止浩罕人利用一種關稅特權去壟斷貿易。

浩罕派來一名商人頭目，他將八十余名喀什噶爾戰俘釋放回國，并帶來一百余名安集延商人。新疆當局不許地方官員干涉浩罕與喀什噶爾的商業事務，并且命令喀什噶爾商人對“夷商頭目”公平定價。1832年末，清朝用銀兩賠償浩罕商人全部被沒收的茶葉，并且葉爾羌的參贊大臣花了一萬余兩銀子解決了浩罕人的土地要求，盡管外國人購買土地始終是不合法的。清朝根據那彥成的建議驅逐了居住在新疆不到10年的安集延人，付給賠償的土地就是屬于他們的。[[39]](#_39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

六城地區的騷亂已表明，清朝在塔里木盆地西端的駐軍遠遠不夠用。因此政府把參贊大臣衙門和塔里木盆地的統帥部從喀什噶爾遷到葉爾羌，這是六城地區的主要城市，它很漂亮，多舞女和樂師，一個訪問過葉爾羌和孟買兩處地方的浩罕人認為，葉爾羌可以和孟買媲美。它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在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巴爾楚克（即瑪喇巴什，它的戰略重要性終于得到了承認）與和闐地區之間相互援助。在1830年入侵期間壁昌將葉爾羌商民移入滿城，這一行動已被證明在阻遏侵略者方面是如此有效，因此某些人關于在六城地區商場周圍建立城堡的建議就被認為沒有必要了。

政府任命壁昌為葉爾羌的首任參贊大臣。在新疆南部防區的6000名士兵之外，清朝增加了3000名從伊犁來的騎兵和4000名從陜甘綠營調來的士兵，再把阿克蘇和烏什吐魯番每處1000名士兵計算在內，南部防區總兵力達1.5萬人。遲至1835年這些軍隊中沒有一個東干人，因為政府害怕一旦發生叛亂，作為穆斯林的東干人可能參加。[[40]](#_40_Wo_Sen____Wu_Zi_Bie_Ke_Ji_Ya)后來政府改變了關于這一政策的想法。為了應付增加軍隊后的費用和口糧，北京削減了各省綠營餉糧的2%，以便每年能多籌銀30余萬兩。

然而，政府認為各省的分攤只是權宜之計，它繼續努力從當地收入中尋求維持六城地區駐軍的辦法。為此目的，按照長齡的建議，北京中止了滿人的隔離亞洲腹地的長期實行的政策，遲至1831年已許可漢族平民由中國本部遷到六城地區。允許移民接受拋荒地和被沒收的土地，開墾死地，甚至也可當東突厥斯坦人農莊的佃戶。1832年出現了第一次移民浪潮，在喀什噶爾地區的喀拉科依和巴爾楚克附近建立了漢人居民點。北京一度仍為六城地區土著居民的態度感到憂慮，在1834年甚至撤銷原議，命令漢人居民點解散。但于明年在漢人移民尚未遷徙之前，政府又一次取消它的決定，恢復移民。

從1834年起，北京鼓勵窮人從中國本部向新疆遷移，特別是移到六城地區。漢族移民的核心開始形成。在19世紀30年代中期，僅葉爾羌就有200名定居的漢族商人，還有許多其他時來時去的人。那里有一個東干商人團體和一些漢人工匠。漢語現在和突厥語同樣“通行無阻”。[[41]](#_41___Zhong_Guo_Da_Da_Li_Ya_Yu_H)

### 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1835年）

浩罕努力要繼續控制新疆的對外貿易，這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汗國已經基本控制了從塔什干和突厥斯坦城市進入新疆北部的草原商隊的貿易，以及所有通過它自己領土的商務活動。仍在浩罕控制之外的有準噶爾人同俄羅斯帝國的交易，有從巴達赫尚到色勒庫爾的商隊貿易以及從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商隊貿易。“由于中國政府的猜忌”，浩罕“不能”通過清朝領土與印度“直接來往”。對于浩罕商人們來說，“通過西藏（拉達克）”去印度的道路是“被禁止的”。[[42]](#_42___Wu_Zi_Bie_Ke_Ji_Yao_____Di)

1833年，浩罕派了一名使節（額爾沁）“照料”貿易，并要求它有權在葉爾羌和其他城市任命自己的政治和商務代辦，授權他們向所有來到六城地區從事貿易的外國商人征收關稅。這等于要求壟斷貿易，所以北京不愿意答應。清帝以只恢復成例這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同意在葉爾羌和其他地方設立浩罕的商務代辦（商頭），但不準浩罕向其他國家的商人征稅。

在清朝的記載中，甚至使節本人也承認這個要求是愚蠢的。[[43]](#_43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但是浩罕的軍事擴張立刻促使北京采取一種較為和緩的方針。一支五百余名柯勒克孜人的浩罕軍隊侵入色勒庫爾地區；一名浩罕使節謁見伊犁將軍要求清朝把所有哈薩克人趕出卡倫，以便浩罕能向他們征稅；浩罕同時明確聲明它正在向帕米爾柯勒克孜人征稅。[[44]](#_44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這些柯勒克孜人的地位從來沒有明確規定過，但是他們和哈薩克人——其中某些人同時承認浩罕、俄國和清朝的權威——一起至少是被當作藩屬的。

浩罕要求驅逐哈薩克人一事，是對王朝在新疆統治他們的權力的公開挑戰。伊犁將軍拒絕將他們趕出卡倫之外以免使之落入浩罕稅收官之手。誠然，在清朝看來卡倫全然不是國境線，只不過是一條深入新疆邊境之內一百余英里的軍事防線。由于浩罕未能就范，北京就援引它不干涉尼泊爾內政的先例（1814—1816年），完全否認它對卡倫之外浩罕—哈薩克關系負有責任，并且警告說，它將不為那些逃避浩罕賦稅而進入卡倫之內的哈薩克人提供保護。對于那些在1832年和外國商人同樣得以豁免進口稅的柯勒克孜人，清政府也同樣對待。政府不打算保護柯勒克孜人使之不被帕米爾的浩罕所吞并，而1835年的中國—浩罕協定將立即給予浩罕向清朝國土上的柯勒克孜商人征稅的權力，從而使浩罕汗處于“對柯勒克孜人負責”的地位，還使他必然“將柯勒克孜人置于隸屬的地位”。[[45]](#_45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

色勒庫爾雖在卡倫之外，卻是葉爾羌地區的一部分，而且是和印度、阿富汗斯坦進行貿易的主要中心，浩罕通過占領色勒庫爾用軍事壓力來支持它提出的向六城地區外國商業征稅的要求。當浩罕軍隊進入色勒庫爾時，浩罕的使節已經出現在葉爾羌，因此談判立即重新開始了。幾個月以后，在1834年的夏天，浩罕從色勒庫爾撤退了。然而，浩罕這時向北京派了一位名叫愛連巴依的使臣（他后來被稱為愛連拍迪沙），重新提出汗國的要求，即在喀什噶爾派駐享有領事權和向六城地區所有外商征稅權力的代表。清朝的官方報道沒有提到任何要求，也沒有提到政府的最后的妥協。所有清朝的資料都說愛連巴依使團的前來是為了感謝清帝豁免浩罕貿易的關稅的，又說它釋放了若干戰俘回國，并在京師呈獻貢物和上了奏折。北京命令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加強防御工事，但是浩罕在帕米爾的力量不斷增加。汗國的軍隊在同一年占領了喀爾提錦。

按照清朝的記載，愛連巴依的第一個要求是浩罕應和那些有權每年入貢的六城地區的伯克們一樣，按照同樣的條件，一年一貢。其他被提到的要求是賠償、釋放戰俘回國和某些優惠條件。浩罕還要求清政府對六城地區外國商業豁免關稅的范圍擴大到包括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商人在內。浩罕使節主要和理藩院打交道，但是也到以前帝國在六城地區的欽差大臣長齡家中去看望。長齡拒絕了愛連巴依的禮物，只接受了一些葡萄，皇帝提醒他：“人臣義無外交。”[[46]](#_46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

在回答愛連巴依的請求時，清帝同意讓浩罕每年派遣商隊從喀什噶爾經過兩個月的旅程[[47]](#_47___Wu_Zi_Bie_Ke_Ji_Yao_____Di)來北京進貢。其他要求則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加以處理，但愛連巴依被告知：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在葉爾羌的貿易不關浩罕的事情。[[48]](#_48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使節在1835年回國。清朝的資料沒有敘述愛連巴依在離開之前已將1832年的諒解變成與清帝的直接協定，并加以擴大，迫使清帝承認浩罕派遣使節到北京來的真正的目標，即：

（1）浩罕有權在喀什噶爾派駐一名政治代表（即阿克沙哈勒），并在烏什土魯番、阿克蘇、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派駐商務代辦（也稱阿克沙哈勒），他們受喀什噶爾代表的管轄。

（2）這些阿克沙哈勒應有領事權力，對來到六城地區的外國人有行使司法和治安權限。

（3）阿克沙哈勒有權對外國人運入六城地區的全部貨物征收關稅。[[49]](#_49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一份浩罕的資料甚至主張要求更大的特權：“隸屬于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和烏什土魯番的商人們的扎卡特稅[天課]、察臺[蒙兀兒草原]的賦稅、伊犁地區的賦稅、莫臥里亞[準噶爾？]一直遠至希齊札爾地區的賦稅……都在穆罕默德阿里汗的權力控制之下。”[[50]](#_50___Ta_rikh_i_sihgari____Wu_Mi)清當局在六城地區對浩罕的這種讓步不包括克什米爾人（這個概念包括巴爾提人）、巴達赫尚人和那些在葉爾羌貿易的布哈拉人。這些人歸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管轄，不屬于浩罕阿克沙哈勒的權力范圍。[[51]](#_51_Ku_Zi_Nie_Zuo_Fu____19Shi_Ji)

清《實錄》沒有提及這些情況。事實上，清朝記載中唯一提示愛連巴依為之進行談判的要點的史料是葉爾羌參贊大臣的一件復奏，其中說，從1832年起，克什米爾人和巴達赫尚人一直與浩罕人享有同樣免稅的權利，因此愛連巴依的要求“實屬貪詐”。除了把它歸之于貪婪成性之外，關于浩罕不僅在清朝領土上征收關稅，而且要求把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的商人歸入汗國的阿克沙哈勒能向他們征稅的外國人之中，這件事在《實錄》中并沒有線索可尋。[[52]](#_52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

這是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它為以后西方與北京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鋪平了道路。清帝此時已經給予了全部治外法權，就像他不久就要在沿海給予貿易飛地以治外法權，和達賴喇嘛政府將在1856年對待西藏的尼泊爾那樣。只有這樣說才恰當：在中國穆斯林邊境上第一次正式承認了治外法權，因為商人自治在穆斯林中間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習慣。在宋代，福建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歸他們的頭人管轄。歐洲貿易列強之所以要在亞洲要求治外法權，部分原因是由于受到從君士坦丁堡奧斯曼政府那里獲得治外法權條款的鼓舞。在16世紀的卡利卡特，土耳其商人便有自己的頭人，甚至連當地的商人也都有他們自己的頭人，如同從開羅和紅海來的商人那樣。在卡利卡特又有一名高居于全部外國商人之上的頭人，他實際上管理和懲罰他們，不受政府法律的干涉。遠在十七八世紀荷蘭、英國和法國的航運業統治馬六甲以及亞洲最南部和東南亞諸港口以前，這些地方也盛行同樣的情況。[[53]](#_53_Pi_Er_Sen____Gu_Ji_La_Te_De)即使在六城地區，清帝對愛連巴依的讓步也許不過是對已成慣例的事態的一種官方認可而已。這樣做就簡化了有關北京對外貿易的行政和政治問題。

從中華帝國的觀點看來，天子對普天之下擁有最高權力，所以治外法權絲毫沒有損害清帝的主權。同樣地，浩罕在清帝國境內對其他外國人實行管轄，或是汗國有權向非浩罕人征稅，這也無損于清帝的主權，盡管這后兩種讓與（它們是清朝體制能夠容忍到什么程度的有趣標志）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浩罕取得的讓與權并不比俄國人已在恰克圖享受了一個多世紀的那些權利更大一些，浩罕并不堅持要求民族平等的原則。

中國與浩罕的1835年協定為六城地區的外國人貿易樹立了新的樣式。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們從浩罕統治者那里“承包”他們轄區的歲入，他們享有對汗國臣民的完全管轄權，并用有利于穆斯林的新稅率來取代舊關稅，但進口稅已普遍降低。原來牲畜按價征稅3.33%，絲織品和毛皮征稅5%，其他貨物也征3.33%，現在阿克沙哈勒們從穆斯林那里是按價征稅2.5%（這是伊斯蘭法典規定的稅率），從非穆斯林（“基督教徒”）那里征收5%。從六城地區向浩罕出口是免稅的。[[54]](#_54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柯勒克孜人像外國人一樣，向六城地區輸入的貨物要給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付稅2.5%。

在葉爾羌，清朝任命了其他兩個阿克沙哈勒，一個代表巴達赫尚的統治者，另一個代表克什米爾。巴達赫尚的阿克沙哈勒事實上按照承包賦稅的條件從巴達赫尚政府那里得到他的職位，就像他的同事從浩罕得到職位那樣。在扎巴德（巴達赫尚的首都）的商人們一年一度帶商隊來到葉爾羌，在那里他們用奴隸、寶石換取銀錠（元寶）以及茶葉。有些布哈拉人和其他民族也在葉爾羌冒充巴達赫尚人，于是便受他管轄并向他納稅。

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對于經過拉達克而來的商人有審判權和征稅權，他完全是清朝當局加封的，只在名義上代表克什米爾政府（臣屬于旁遮普的錫克王國）。實際上，他并不為克什米爾或拉達克政府征稅。清當局選擇了一個叫喀西姆阿里和卓的人擔任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他是一個在葉爾羌建立了長期商務聯系的阿姆利則商號的代理人。和克什米爾的貿易（首先去列城，然后到印度、旁遮普、巴爾提斯坦或克什米爾）是由馬幫運輸的，主要包括來自中國本部的銀子、小量金子、上好茶葉、絲、鋼鐵和藥材，以及從新疆或是經由新疆從俄國或西部中亞來的羊毛披巾、羔羊毛氈、絲、駝絨羽紗、羊皮、馬匹、綠松石、冰糖、皮靴、皮革、錦緞、天鵝絨、細平布、大麻汁和煙草。這些東西主要用來交換披巾、繡花制品、漂白布匹、鴉片和皮革。除由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管轄的以外，其他所有外國商人都歸浩罕阿克沙哈勒治理。

清朝官員繼續稱呼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為“安集延商務監督（胡岱達）”，將所有在六城地區的外國商人——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除外——稱為安集延人，以此來貶低對浩罕所作的讓與權，從而想給人們以沒有任何變化的印象。但是，僑居的安集延商人立刻達到數千人，喀什噶爾于是便和浩罕之間通過馬匹、騾子和駱駝增加了貿易，輸入布匹、鴉片和其他東西，輸出純銀、瓷器、箱茶和磚茶。在對外貿易中，清朝的臣民（其中多數大概是東突厥斯坦人）仍然遵從以前的進口稅率，即牲畜納5%，絲和毛皮納10%，其他貨物納5%。因此這個協定進一步不利于本地的進口商，六城地區的關稅衰落到實際上沒有歲入的地步。[[55]](#_55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

由于清朝在1832年已經停止了向外國商人征收關稅，政府以為這就解除了為在清朝境內的商路提供安全保證的責任。葉爾羌當局將他們的管轄區域收縮到以卡倫線為限（這遠在帝國境界之內），而將商路的安全推給浩罕、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統治者。“被錯誤地稱為柯勒克孜人”的乾竺特、什克南以及瓦罕的強盜們越入清境，開始出沒于喀喇昆侖山脈和葉爾羌河之間的地區，掠奪商隊，“綁架并販賣男人、婦女和兒童，用暴力劫取畜群”。甚至商人也變成了他們的犧牲品，強盜們將他們帶到巴達赫尚和西部中亞，賣作奴隸。作為對清朝終止治安力量的反應，浩罕和巴達赫尚政府對沿路他們自己的商隊提供保護，但無論是錫克人或是拉達克人，都沒有為列城—葉爾羌路線的清朝部分提供任何安全保護措施。[[56]](#_56_Dai_Wei_Si_Bian____Yin_Du_Ba)

雖然喀喇昆侖以東的盜匪活動遠在南邊，對于浩罕—喀什噶爾貿易活動并無多大影響，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汗仍乘機侵犯清朝在色勒庫爾的領土，將浩罕的勢力擴展到帕米爾。在張格爾圣戰失敗后不久，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已經請求新疆駐軍前來幫助抵抗由巴達赫尚、什克南、瓦罕和乾竺特政府屢次發動的奴役和掠奪的遠征。“突厥中國的中國政府”（英屬印度對新疆當局的一種稱呼）沒有采取行動，而且，在沿貿易路線的清朝治安力量中止以后，乾竺特、什克南和瓦罕的匪徒襲擊使得色勒庫爾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難以生活下去。色勒庫爾要求浩罕保護，結果穆罕默德阿里侵入色勒庫爾，勸誘塔哈爾滿和瓦塔哈伊夫河流域的塔吉克人和大多數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遷移到浩罕境內去。剩下的柯勒克孜人搬到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盆地。因此，色勒庫爾的大部分實際上變得渺無人煙了。

當1834年浩罕人從色勒庫爾撤走和中國—浩罕協定締結之后，新疆當局重申他們在那里的管轄權，但在1835年和1836年浩罕軍隊再次侵入色勒庫爾，帶有大炮和兩千名兵士。汗重新提出他有權向六城地區所有外國人征稅的要求，并試圖在色勒庫爾向來往于巴達赫尚和葉爾羌之間商路上的客商征收關稅。色勒庫爾采取武裝抵抗，北京命令六城地區當局警告浩罕說：皇上可能憤然再次斷絕貿易。但是將它的霸權擴展到帕米爾的浩罕，占領了色勒庫爾地區的“回莊十四處”的一半以上，并派遣武裝分隊進入達爾瓦斯、什克南、乾竺特和瓦罕。浩罕武裝繼續襲擊各處，但終于遭到奕山（他是皇帝的侄子，當時在六城地區協助政務）堅決領導下發起的反擊。

此后，新疆當局試圖把清朝對色勒庫爾的義務降到最低限度。色勒庫爾的首領事實上成為“一個獨立的君主”，但由于他沒有自己的軍隊，結果是通過與乾竺特和什克南的統治者聯姻的辦法來解除盜匪的襲擊。由于巴達赫尚對葉爾羌的貿易要經過色勒庫爾，所以巴達赫尚的統治者也沿著色勒庫爾道路給予某些援助。他是完全能夠這樣做的，因為什克南和瓦罕是他的屬地。色勒庫爾的首領“吞并了葉爾羌的皮爾河、良戛爾河、聽雜阿布爾河和巴巴扎河諸流域”。[[57]](#_57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

與此同時，浩罕允許防止將來對清朝邊境的侵犯。很可能，內部問題或布哈拉侵略的威脅迫使它擱置在色勒庫爾向外國人征稅的要求。但也可能是浩罕害怕把清朝逼得太甚，反而喪失了1831—1835年得到的利益。確實，汗國的恭順立即受到考驗，因為鴉片輸入新疆的數量激增，并且經過哈密及嘉峪關進入了中國本部。1839年，北京提出的禁毒措施也擴展到新疆。在烏魯木齊，當局逮捕了有關的商人和消費者。在六城地區，清朝立即沒收了克什米爾、巴達赫尚和印度（音底）商人的6萬兩鴉片。大多數鴉片是克什米爾人輸入到葉爾羌的。例如，1840年，當局僅從一個叫卡里姆·阿里的克什米爾人那里就沒收了9.79萬兩。但是，鴉片也經過浩罕運至喀什噶爾，大約也在此時，當局從喀什噶爾的外國商人手中沒收了2260兩，從和闐的安集延商人手中沒收了540兩以上。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對于此事是不會愉快的，但是汗國并未以中斷和好相威脅。[[58]](#_58_Ling_Mu_Zhong_Zheng____Wei_R)

清朝政府相信它的浩罕政策是成功的，甚至浩罕似乎也理解，“萬一將來在中國韃靼地區發生任何叛亂”，浩罕汗將有義務給清朝以援助。[[59]](#_59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在六城地區簽訂的這一“不平等條約”制度看來終于產生了清朝的政策制定者長期努力以求的安定局面。

回顧一下歷史就可以理解，清政府在19世紀30年代處理渴望貿易的浩罕人的成功的政策，為幾年以后清朝處理渴望貿易的英國人的問題樹立了一個最近時期的榜樣。與英國之間的敵對行動開始于1834年的虎門交火，在無結果地拖延了幾年之后（這與前幾年浩罕侵略六城地區和襲擊色勒庫爾的事件在新疆一拖幾年是極其相似的），北京撤換了海岸的軍事長官，指派奕山前去，使他能在多事的沿海運用他在新疆取得的經驗。政府還派楊芳作為奕山的助手：這個官員曾在1828年俘獲張格爾，并在1830年和1831年打浩罕的戰役中效過力。1843年署理兩江總督時受命開放上海的壁昌，就是1830年葉爾羌的保衛者。這樣的例子還有好幾起。

當實際的軍事考慮決定用談判解決問題時（如同1831年對付浩罕的戰略形勢那樣），清朝在1842—1844年對沿海貿易列強所給予的讓與權是可以拿來和1831—1835年對浩罕的讓與權相比的。它們有以下這些相似之處：

（1）治外法權，即外國有權指派領事管轄自己的公民。

（2）賠款，盡管鴉片貿易是非法的，仍用銀子償付了被沒收的鴉片。清廷曾用銀子付給浩罕人以補償他們非法獲得的土地。

（3）“公平正規”的關稅以及和海關的直接關系。1843年的稅則所作的讓與比起清朝對浩罕的讓與要適度得多，因為在六城地區清朝對所有外國商人一概免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浩罕并不需要去要求和征稅機關直接發生關系，因為在六城地區的外國商人一直直接和清朝稅務機關打交道。廢除外國商人進口貨物的關稅甚至使這種要求成為不必要的了。

（4）最惠國待遇。人們猜測，中國人過去的行為啟發了義律船長想獲得任何別國可能獲得的一切特權。[[60]](#_60_Zai_Fei_Zheng_Qing_De___Zhon)巴麥尊子爵已把這個想法作為璞鼎查在商談南京條約時的幾個選擇之一，后來最惠國條款即包含在1843年的虎門條約中。最惠國條款絕非承擔法律義務的一種讓步，它純粹是表示中國長期實行的“一視同仁”的政策：中國利用這一政策可以防止任何一個外國強國取得高居其他國家之上的領導地位。在清朝看來，和歐洲人訂立的協定，至少就最惠國條款而言，其與中國原則妥協的程度比北京在1835年給予浩罕的特殊地位與之妥協的妥協程度要小得多。

（5）廢除公行壟斷，以及允許中國臣民與外國商人之間有發生商業關系的權利。在六城地區，外國人一直直接和地方的商人做買賣，不受任何公行之類壟斷機構的牽制，他們也能雇用仆人、翻譯、買辦，租用房屋、營業處、貨棧等等。

在中國與西方協定中的其他條款還反映了沿岸貿易的特殊狀況。“中英兩國及其君主的地位絕對平等”，這個原則事實上并未被浩罕所堅持，因為在中亞主權國家之間，形式上的平等不是一種基本的條件。不過清朝也沒有強迫過浩罕使者履行藩屬進貢的全部禮儀，而且清帝國早已承認了與俄國平等的原則。

對照清朝在亞洲腹地的經驗，它在鴉片戰爭以后與西方海上列強達成的協定，有不同于通常所說的那種意義。最重要的是，清朝認為這些協定不是新的發明。英國的海軍力量在19世紀40年代為曠世所無，但是締結的條約不足以證明清朝已經認清了這個事實。常被征引的馬士的那本研究著作指出：“直至1839年為止，使西方國家聽從條件方可允許雙方關系存在的是中國；自從1860年以后，把和中國共同來往的條件強加于中國的卻是西方國家；這當中的20年是一個摩擦時期。”[[61]](#_61_Ma_Shi____Zhong_Hua_Di_Guo_D)考慮到清朝政府對小小的浩罕作出了重要的讓與，對馬士的觀察最可能的解釋是，在這20年中，中國仍未認識到它已相對地衰落下來。正如阿瑟·韋利所恰當地敘述的那樣：“滿洲是一個征服種族，所以很難接受這一事實：他們在200年前用來征服中國的武器，現在已經過時了。”[[62]](#_62_A_Se__Wei_Li____Zhong_Guo_Re)

在北京看來，1842—1844年條約的唯一真正新情況是把它們應用于中國本部。在亞洲腹地有共同邊境的兩個偉大的非漢人帝國的君主——滿洲人和莫斯科人——之間講求平等，是很容易做到的。治外法權在六城地區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臣屬于清朝的說突厥語的穆斯林在那里是和來自中亞西部說突厥語的教友同仁做買賣。但是，要在沿海一帶允許施行像國家平等這樣一種非中國的原則，確實將會引進一項中華帝國迄今僅限于在亞洲腹地推行的政策。在中國本部以內，這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清朝的邊疆政策作為整體來說并沒有被系統地作過任何研究，但是很清楚，在沿海政策與亞洲腹地政策之間是有相互聯系的，這種聯系比歷史學家迄今所揭示的要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松筠、楊芳、龔自珍、魏源等這些19世紀初的經世致用論學者兼改革家，都有研究新疆政策問題的初步經驗。

### 圣戰的繼續

以七和卓聞名的七個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著名成員住在浩罕領土上。他們是穆罕默德·玉素普之子卡塔汗和克希克汗、巴布頂之子倭里汗、張格爾之子布素魯汗、卡塔汗之子愛克木汗和阿希木汗，以及布素魯汗的一個堂兄弟，人稱鐵完庫里和卓。雖然卡塔汗和倭里汗是主要的領導者，但瑪赫杜姆家族的宗教繼承權似乎已從張格爾傳給他年輕的兒子布素魯汗。在19世紀30年代初經過印度去麥加途中的東突厥斯坦人報告說，在新疆的清朝統治日益喪失人心。這種情況顯然繼續存在，[[63]](#_63_Wo_Sen____Zhong_Guo_Da_Da_Li)但是只要浩罕為了享有它的貿易利益而要保持和平，那么七和卓是不能有所作為的。

在19世紀30年代后期，許多安集延商人居住在固勒扎，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開始被指派駐在伊犁。準噶爾當局不能獲得足夠的布來使官方的哈薩克貿易壟斷保持在一個滿意的水平上，于是便放寬限制，允許漢商參加更多品種的貨物的貿易，開始是在塔爾巴哈臺實行，后來在1845年時也在伊犁實行。準噶爾居民一直在某種程度上負擔著六城地區的軍費，在19世紀30年代又遭受嚴重的糧荒。因此，政府努力增加準噶爾的農田，并且著手實施各種增加那里收入的計劃。由于中國本部缺少土地和政府希望縮減因駐軍給養而輸到新疆的白銀數量，從前的障礙開始崩潰了。北京以越來越大的決心努力勸誘漢人移居新疆，耕種交納租稅的土地。1835年，政府答應漢商的要求，讓他們帶家屬定居在喀喇沙爾。

最初并沒有很多漢族移民被吸引到邊遠的六城地區來。他們就是到了那里，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漢族移民和當局之間發生了幾次事件。1837年，在喀什噶爾地區的清駐軍派出士兵燒毀了漢族移民房屋和搶劫他們少量財物。在巴爾楚克，移民的工作搞得如此之糟，以致在1838年移居者竟不顧軍隊的制止，棄地而逃。政府沒有錢為日益增加的移民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或提供種子、工具和耕畜，就向六城地區的伯克們要求私人捐助，而以給予擢升作為回報。在伊犁，布彥泰將軍委托因積極反對鴉片而被黜的林則徐在1844年整頓移民事宜。1845年，清朝中止了對新到六城地區的漢族移民豁免地稅的規定，提高了準噶爾地區移民的賦稅，而且傳令嘉獎林則徐，允許對那些為開墾新土地作出貢獻的失寵官員縮短流放期限。在1845—1848年之間，在六城地區（不包括喀喇沙爾地區）開墾了將近8萬英畝（約52.5萬畝）農田。其中四分之一是漢人完成的，其余則由東突厥斯坦人完成。[[64]](#_64_Ku_Zi_Nie_Zuo_Fu____19Shi_Ji)

1839年開始，政府還用漢族移民來補充六城地區的駐軍，允許以移民志愿者來補足缺員的部隊。由于士兵得隨時被征召作戰而使軍墾趨于衰落，1843年軍隊開始放棄農地，讓位給平民移民來耕種。在1845年以后，六城地區換防的士兵得到準許作為農民和他們的家屬一起留在那里，政府又命令所有獲赦而有家口的流犯都應送往六城地區從事農業。這些措施使減輕中國本部的人口壓力有了一些希望。它們加強了清朝在東突厥斯坦的存在；它們使六城地區更充分地和清帝國的其余部分融為一體。

一方面北京因從中國本部流出白銀支付駐軍的餉項而發愁，一方面還要為白銀從新疆流出國外而感到困擾，這種情況更由于在沿海償付鴉片的白銀損失而加重了。從伊犁和塔爾巴哈臺流出白銀的情況還不算嚴重，但是從六城地區外流的情況卻是嚴重的。張格爾的圣戰和1830年浩罕的入侵已經引起了物價暴漲。銅錢不足和大量清軍的來到（部分軍餉是用從中國各省撥來的白銀付給的）降低了白銀折換銅錢的比價。在1827年兌換比例已跌到每兩80蒲爾，[[65]](#_65_Cao_Zhen_Yong_Bian____Qin_Di)并且在準噶爾地區產生了影響。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外國人利用這種低價買了大量白銀運往國外。

當局試圖鑄造一種新的六城地區純銅蒲爾來對付通貨膨脹，它僅重1錢5分，但有“當十”字樣。他們把這種蒲爾的官價定為十個雜銅標準伊犁錢，并且允許新蒲爾與舊的同時流通。當局擅自決定一個新蒲爾可換兩個舊蒲爾，雖然價值五個伊犁錢的舊蒲爾每個重1錢2分，這樣折換是不成比例的。這種新貨幣有可能增加流通中的銅幣數額，使軍隊可以在軍餉上增加銅錢對銀的比例。從1838年起，阿克蘇的造幣廠甚至進一步降低了銅幣的重量，把鑄造的新蒲爾從1錢2分降到1錢。

到19世紀40年代，新增的鑄幣，再加上白銀普遍流出清帝國境外的情況，使下跌的銀價恢復了元氣。在1845年，兌換率提高到每兩白銀換400蒲爾。此后，新疆駐軍的餉項主要的是“出自地方收入中的地方貨幣”。在葉爾羌市場上，白銀從原來一錠（50兩）換三四百騰格（1.5萬—2萬蒲爾，約900—1200印度安納）漲到換1000騰格（5萬蒲爾，約3000安納）。[[66]](#_66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

清朝對六城地區的控制似乎比以前加強了，但是在中亞已開始感覺到英俄之間的對抗；1841年有謠言說，正在和中國以及阿富汗交戰的英國將一個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召到了喀布爾。東突厥斯坦人的憤怒情緒和圣戰精神在潛滋暗長。1845年，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英吉沙爾的郊外，一個名叫阿瓦斯的喀什噶爾鐵匠率領一支500人的造反隊伍在索胡魯克鬧事。漢族移民幫助恢復了秩序。布彥泰報告說，柯勒克孜人的襲擊是在阿克蘇、和闐、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等地有影響的阿訇們的鼓動下進行的，而在阿瓦斯暴動的后面有瑪赫杜姆家族，特別有布素魯汗在活動。在次年（當時有喀什噶爾發生饑荒的報告）所作的更為深入的調查斷定，七和卓并沒有和暴動發生關系。[[67]](#_67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

名義上由年輕的胡達雅爾汗統治、但是事實上因領導分裂而受到損害的浩罕，又故態復萌，在1846年派出一位使者重新提出了汗國的舊要求：向巴達赫尚人、克什米爾人和所有拉達克商人（推依博特——“西藏”）征稅，另外還要求向一個主要居住在清朝境內的柯勒克孜部落征收地租。此后不久，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了六城地區的卡倫，然后越帕米爾逃向什克南。什克南的統治者阿布都熱依木送來一封信，暗示那些人是一些身份不詳的和卓，大概是一些白山派。[[68]](#_68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北京還是不愿滿足浩罕的要求。于是，第二年即1847年（在這一年，最后一部分哈薩克大帳正式并入俄國），浩罕發動了白山派圣戰，卡塔汗和倭里汗領導了對六城地區的侵犯，名為七和卓之戰。一支由喀什噶爾和柯勒克孜逃亡者組成的浩罕軍隊襲擊在明約洛卡的清軍，迫使他們退回喀什噶爾。在那里，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煽動百姓向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打開回城，當時3000名清軍困守在滿城之內。倭里汗前往攻打英吉沙爾，但失敗了。謠言說，七和卓已和英國人取得諒解，[[69]](#_69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但是喀什噶爾人對張格爾的失敗以及1830年浩罕的搶掠記憶猶新。雖然有許多人參加了七和卓的軍隊，瑪赫杜姆家族的事業一般來說在人民中間的反應是冷淡的。

北京命令陜甘總督布彥泰克復失地，并以奕山為葉爾羌參贊大臣。奕山帶領數千軍隊由阿克蘇出發；一支3000人的援軍由甘肅進入新疆，戶部撥餉銀100萬兩。當奕山于秋天到達葉爾羌前，和卓們曾進攻過這個城市，但已被趕走而撤回到了喀什噶爾。奕山的優勢火力連戰皆捷。圍攻英吉沙爾的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甚至未及交戰就望風而逃，所有侵略者隨即放棄喀什噶爾而逃回浩罕，和以前一樣跟著一起逃走的有他們招募的喀什噶爾新兵和成群結隊的同情者及其家屬。

清帝國的軍隊再次進行了可怕的報復，但是豁免了喀什噶爾地區的賦稅。一支來自伊犁和烏魯木齊的2360人的軍隊加強了喀什噶爾的駐軍。樞紐之地巴爾楚克也是通往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與和闐各條道路的總匯，清朝在這里建造了一座新城（Yangi Shahr），與老回城分開，屯駐1.5萬至2萬名用步槍武裝起來的步兵。每當西部各地區需要軍事力量時，首先就從那里調派。由于入侵而加強了的東突厥斯坦人和漢族移民之間的敵意，暫時終止了向喀什噶爾地區阿奇克雅黑移民的努力，但是政府仍然實行它的移民政策。1848年初，懼怕失去貿易權利的浩罕，派來一名使者否認它對七和卓的入侵負有任何責任，并表示繼續對清朝皇帝“恭順”。北京除了接受這種辯解之外也別無良策，從而再次確認了浩罕的全部權利。[[70]](#_70_A_He_Mai_De__Sha____Lu_Xing)

清朝當局——特別是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阿奇木伯克們——與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之間仍“不相合”，后者將“他們所受虐待的怨言”傳回浩罕。在喀什噶爾東北約四十里的阿斯圖（下）阿爾圖什——也叫阿爾泰（金山）阿爾圖什——清朝的地位特別脆弱，因為存在著對官方的誅求的憤慨情緒。阿斯圖阿爾圖什也被認為是10世紀黑汗王朝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安葬地，歷來傳說把伊斯蘭教傳入東突厥斯坦的成就歸功于他，瑪赫杜姆家族則宣稱是他的后人。這個朝圣的重要地方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謝赫據說是六城地區僅次于阿奇木伯克的最富有的人，他也是白山派首要的宗教人物，因此浩罕能夠在他的幫助下搞一些活動。1852年，倭里汗、卡塔汗、克希克汗和鐵完庫里和卓帶了一支主要是柯勒克孜人的軍隊，襲擊阿斯圖阿爾圖什附近，進而侵犯烏什土魯番卡倫，一直到清軍把他們打跑為止。有一個時期當局拒絕恐嚇，封閉了喀什噶爾—浩罕的道路，停止了浩罕阿克沙哈勒向喀什噶爾外國商人征稅的權利。[[71]](#_71_Mu_Han_Mo_De__A_Ming_Suo_Shu)

在葉爾羌則籠罩著全然不同的氣氛，那里黑山派占上風，和討厭的對外關系沒有聯系的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商人支撐著該地區的經濟。印度北部的古拉布·辛格1842年對拉達克的統治建立以后，克什米爾的披巾商人告訴葉爾羌人如何清理粗羊毛，因此葉爾羌所產“土魯番的”（烏什土魯番的）和“庫車的”羊毛在質量方面與拉達克羊毛相等，或者超過了它。葉爾羌輸出的披巾羊毛由此增加了，它全部取道列城運往克什米爾。作為交換，鴉片輸入（清朝當局不再禁止）迅速增長，在19世紀40年代末期成為貿易的主要項目，總計每年至少1.6萬英鎊，價值達1.2萬英鎊。因為葉爾羌每年輸出到列城的貨物值1.8萬英鎊，并不足以抵補每年由列城輸入的價值2.1萬英鎊的貨物，所以葉爾羌商人要用白銀支付超過部分。和準噶爾地區對俄國的貿易正好相反，六城地區對印度的貿易出現了逆差。

然而，在七和卓之戰以后，收支差額開始改變了。白銀和其他中國本土出產的貨物原來是葉爾羌—列城—印度貿易的主要商品（茶、絲、寶石、黃金、基連和貴重藥材），現在不再大量運來六城地區。因而，在50年代葉爾羌向列城出口的貨物縮減了，輸出的大部分是六城地區的本地產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和大麻汁。

葉爾羌的對外商業開始衰落了。沿著商路的盜匪增加了。強盜們出沒于葉爾羌—列城的諸商路上和通往巴達赫尚的道路上。商隊開始武裝來往，但不時被100—250人組成的襲擊隊伍所擊敗。雖然貿易衰落，但據1853年訪問了葉爾羌三個月的英國代理人阿赫麥德· 沙·納赫什班迪·賽義德和卓說，“人民對他們的統治者是普遍滿足和中意的。在鄉下除了土地稅之外沒有其他賦稅，土地稅約當生產物的十分之一”。在滿城中大約有六七千清軍，但是他們“和農村中的百姓很少或沒有交往”。[[72]](#_72_Dai_Wei_Si____Yin_Du_Bao_Gao)

英國和古拉布·辛格（1846年印度政府立他為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大王）兩者現在都在探索增加他們對葉爾羌貿易的方法。古拉布·辛格作了一些“軟弱而無效的”努力想勸說葉爾羌的官員們給他以在實際和名義上管理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的權力，因為后者“不聽來自查謨的命令”。但是大王在六城地區的影響“不夠大，不足以使阿克沙哈勒免職而另委他人”。大約在1856年，古拉布·辛格又轉而直接求阿克沙哈勒本人，派了一名代表“去為他（大王）安排向列城商人征稅之事”，但是阿克沙哈勒卻答復說，古拉布·辛格必須首先為路途上商隊的安全提供保證。1857年古拉布·辛格死后，他的兒子蘭比爾·辛格派遣另一個代表前往葉爾羌繼續提出他父親的創議，但是清朝當局將代表阻攔在城外的一個卡倫上“達六月之久，以后又將他不體面地趕出葉爾羌”。[[73]](#_73_Dai_Wei_Si____Yin_Du_Bao_Gao)

英國人自己只限于收集情報，主要交由本地代理人去做。然而在1856年，兩個歐洲探險家封·什拉琴威特兩兄弟赫爾曼和羅伯特經過喀喇昆侖隘口進入和闐河流域，并由七名葉爾羌人陪同。這兩兄弟看到這些牧羊人是用俄國槍武裝起來的，就在到達距額里齊兩三天行程的地方后帶三名和闐人一起往回轉，因為他們擔心會與清朝邊境官員發生糾紛。什拉琴威特家的第三個兄弟阿道夫在次年進入六城地區，被當時暫時控制喀什噶爾的倭里汗下令殺死。

和平靜的葉爾羌相反，喀什噶爾和庫車兩地區的叛亂情緒在沸騰。1854年，一個叫沙木蒙的人宣稱他是張格爾之兄玉素普的后代，在喀什噶爾地區罕愛里克莊領導一次叛亂。在庫車，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居住在一個城子里，穆斯林勞動者對于官員的暴虐感到憤怒。[[74]](#_74_Chen_Qing_Long____Cong_1828N)帝國的代表在1855年未經任何審問或經他上司的同意便處死了大約30人。像阿斯圖阿爾圖什一樣，庫車也是一個朝圣要地，是阿勒沙德·阿丁（興旺時期約在1350年）的陵墓所在，阿勒沙德·阿丁曾使莫臥兒人改信伊斯蘭教，又是庫車和卓們的祖先，這是與瑪赫杜姆家族沒有關系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的一個單獨的分支。地方上針對清朝官吏的怨言加強了這些護守陵墓的庫車和卓們的政治上的潛勢力。

在同一年，一個名叫玉散霍卓依善（Husayn Khwāja Ishān，由此名字可知他是個宗教領袖）的浩罕人，前來煽動阿斯圖阿爾圖什銅礦工人的不滿情緒。當阿斯圖阿爾圖什的穆斯林捕獲13名潛入者并將他們遞交清朝駐軍時，他失敗了。緊接著倭里汗和鐵完庫里和卓派遣數百軍隊進入六城地區，但是清軍的槍聲迫使他們退了回去。[[75]](#_75_Zuo_Kou_Tou_Zai___Dong_Tu_Ju)

1857年，庫車居民心中郁積的憤怒引發了一場人民暴動。清朝迅速恢復了秩序，而浩罕（它的阿克沙哈勒仍和六城地區當局不和）利用這種不安的氣氛派倭里汗和鐵完庫里進入清朝邊境。入侵者和阿斯圖阿爾圖什的人民聯合在一起向喀什噶爾進軍。鐵完庫里利用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的不得人心，廣泛散布說：“以前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和其他人引誘鐵完庫里的叔父張格爾，使之被捕并處死。現在伊薩克的兒子愛瑪特和穆罕默德充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倭里汗是前來報仇的。”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們和貿易團體以及察爾虎特人集合起來支持入侵者。阿奇木伯克愛瑪特逃入滿城。葉爾羌參贊大臣慶英立即向伊犁、烏魯木齊和喀喇沙爾求助，親清朝的穆夫提們發出“法帖萬”（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見）說：可蘭經的法典（沙里阿特）要求穆斯林殺死或者活捉入侵者，他們要穆斯林一定不要和侵略者合作，以防喪失了信仰（伊瑪尼）。[[76]](#_76_Mu_Han_Mo_De__A_Ming_Suo_Shu)

在此期間倭里汗攻下英吉沙爾的回城，周圍地方的城鎮和鄉村就與入侵者共命運了。當倭里汗派遣大約7000人分兩路攻打葉爾羌時，慶英的士兵迫使和卓的西路縱隊撤退，但是東路縱隊卻對回城發起了突襲。在這時黑山派的徒眾遠多過白山派的信徒；另外納赫什班迪教團的另一支穆扎德派的地方領袖（一個名叫阿卜杜爾·拉赫曼·哈達拉特的人）也有很多追隨者。老百姓和克什米爾商人就協助駐軍抵抗入侵者，結果，倭里汗的軍隊未能得逞。

在戰爭中受害最大的也許要數東干人了，他們受到雙方的猜疑，因為他們中有許多人信奉另一種教派，即和卓穆罕默德·舍里甫·彼爾（死于1555—1556年或1566年，葬于葉爾羌）的烏瓦依什亞派，這一派最大的力量在伊犁的東干人和塔蘭奇人中間。例如，倭里汗的黨羽也把東干人以異教徒論處而殺害他們。從處理阿道夫·封·什拉琴威特四個伙伴的方式中還可以看出和卓的宗教政治傾向。葉爾羌的穆罕默德·阿明是一個東突厥斯坦人，他只不過被關了禁閉。克什米爾的穆斯林阿布杜拉是“一個印度人”，被賣給一個葉爾羌人為奴，價值25盧比。布哈拉猶太人摩拉達為了活命而改信了伊斯蘭教，并獲準與穆罕默德·阿明一起入獄，第四個伙伴是一個西藏人，因為屬于中國“種族”而被處決。[[77]](#_77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

不久清朝援兵從巴爾楚克前來迎擊侵略者，此時包圍葉爾羌的入侵軍已達數萬人。[[78]](#_78_Ceng_Wen_Wu____Zhong_Guo_Jin)清軍獲勝，打垮了侵略者，擊斃約700人。葉爾羌在被困約70天以后被解圍，英吉沙爾在被圍百余天后也得到解圍。在喀什噶爾，倭里汗的軍隊沒有交戰就逃走了。他的占領為時不到四個月。

清朝傳令嘉獎西迪克比（或伯克），此人是塔什密里克的土拉吉爾欽察部柯勒克孜阿奇木伯克的后代，因為他協助平定了騷亂，并對倭里汗的同情者進行了殘酷的報復。其余的人當中，當局處死了沙土克·布格拉汗陵墓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謝赫和他的長子。表面上是因為謝赫參與了暴動（他將女兒嫁給倭里汗），但是伯克們還要搶奪他的財產。他們沒收了他的財產。其他謝赫們開始生活得比較安分了。[[79]](#_79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由于和浩罕的貿易在戰爭期間已經中斷，這時伊犁將軍札拉芬泰也力主讓安集延商民遷到喀什噶爾城外為他們建造的特設市鎮上，就像在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為哈薩克貿易所作的措施那樣。但是，軍機處、戶部、兵部和理藩院甚至反對給浩罕人以這種小小的不便，因為害怕它會引起進一步的麻煩。

然而在慶英建議下，浩罕表面上被命令引渡倭里汗作為恢復貿易的一個條件。1858年浩罕答復說：“倭 里汗鬧事后，曾派人擋路，禁人附從。又將倭里汗拿禁。如準其通商，即將逆首罪名照經典自行懲辦。”[[80]](#_80___Qin_Ding_Ping_Ding_Xia_Gan)清政府承認它在新疆的地位軟弱，認為立即重開貿易乃屬穩妥之舉。因此，雖則安集延商人是1857年入侵的積極支持者，但他們未受損失。

安集延商民自身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事實上是自由的——階級。在1858—1859年，當新的浩罕阿克沙哈勒到達喀什噶爾時，約有6000名安集延人（不包括察爾虎特人）前來歡迎他。在喀什噶爾的外國人據說約占本地人口數的1/4，即約14.5萬人。其中甚至包括俄國韃靼人也被官方認為是安集延人，但他們在私下和“中國人”交往時并不隱瞞自己的血統。

喀什噶爾人移居西部中亞者也很多。在19世紀50年代有200多名瑪赫杜姆家族的成員住在浩罕和馬兒亦囊。大約有5萬戶喀什噶爾的移民被稱為塔合里克，住在安集延、沙里罕（新近由烏馬兒汗建立的，幾乎專供喀什噶爾移民居住）和卡拉蘇周圍的農村中，另有許多人住在城鎮里。在塔什干外面有另一移民地新城，大約住有5.6萬名喀什噶爾移民。幾乎所有這些白山派的移民都是一批接一批的逃亡者，即是從清朝統治之下和從對瑪赫杜姆家族的歷次入侵之后進行的報復之下逃出來的。[[81]](#_81_Wa_Li_Ha_Nuo_Fu____Quan_Ji)

1858年，一位新統治者馬爾拉汗在浩罕即位，1859年，他根據1835年中國—浩罕協定的規定派遣了汗國每年一度的貢使（從浩罕人的觀點來看，這是“禮尚往來”的活動[[82]](#_82_Wo_Sen____Wu_Zi_Bie_Ke_Ji_Ya)）。汗的主要目的是推卸他自己對入侵六城地區（這一侵略發生在他的前任胡達雅爾汗統治時期）的全部責任；所以使者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帶著馬爾拉汗的信，“責備”六城地區清朝當局“軟弱和怯懦得可笑，因為他們在現場可指揮大批中國軍隊，但竟被一個盜匪所嚇倒”，此盜匪即指倭里汗。

那一年，作為一種經濟措施，清朝停止從六城地區伯克們那里接收貢品。因而，當浩罕使者到達葉爾羌時，參贊大臣裕瑞“害怕這種來往的影響會傳到皇帝那里”，托辭不讓浩罕人前往京師。然而，使者決心要前往北京傳遞信件。參贊大臣因此“將整個使節團（包括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和24名同伴）送到靠近葉爾羌的古勒巴格（中國城），并在那里將他們暗害”。為了給他的行動辯護，裕瑞編造了一個故事，大意是說，浩罕使者在葉爾羌回城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毆打人民，強奸本地婦女，最后并侵犯參贊大臣的衙署。裕瑞宣稱，浩罕人在那里拔出武器，刺傷了13個中國士兵，而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和全部他的人在戰斗中被殺。浩罕終于向伊犁當局說明了事情的真相，后者向皇帝轉呈了此事，裕瑞即被撤職。

清《實錄》只記述了裕瑞所說的情節。如果沒有英國代理人葉爾羌人穆罕默德·阿明的報告的話，人們就會對清朝關于浩罕隨后派來一名使節為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不可理解的舉止道歉一事的記述信以為真了。[[83]](#_83_Mu_Han_Mo_De__A_Ming_Suo_Shu)

當浩罕的使者在葉爾羌被謀殺之后，浩罕和六城地區的貿易衰落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報告說，有軍隊在邊境外邊活動，而1860年在英吉沙爾地區，當局不得不驅散由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領導的一次示威，并把他關入獄中。1861年，在中國西北部穆斯林中間日益動蕩的背景下，圣戰的趨勢再次取得勢頭。米爾·阿赫麥德·謝赫的次子阿布都熱依木和布素魯汗的一個兒子發動了一次約有200名士兵的遠征隊進入喀什噶爾地區，然后倭里汗和阿布都熱依木又領導了一次兵力達三倍以上的入侵。清朝的火器和大炮占有優勢。清帝國的軍隊俘獲了阿布都熱依木，并殺死了400名白山派軍兵。但是倭里汗逃進了山中。

浩罕的野心和清朝的權威之間仍未取得平衡。圣戰仍然在繼續。六城地區是清帝國最虛弱的贅疣。它有一個動蕩的過去，還可以預言會有一個動蕩的將來。

## 西藏的隔絕和印度的壓力

1815—1862年這段時期實際決定了拉薩的哪些屬地將留在中國的勢力范圍之內，哪些屬地將落入英屬印度支配之下。英國的侵略性并不次于俄國，但是受到巨大的喜馬拉雅山脈的阻礙。

1792年并入清帝國這件事將西藏和英屬印度隔開，但是像俄國人在新疆一樣，英國也利用“本地的”代理人滲入尼泊爾、西藏以及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侖山的諸西藏屬國，為東印度公司尋找貿易的機會。這些最早的代理人中有一個名叫阿卜達哈迪汗的人，曾于1795年帶著印度和英國制品被東印度公司派到尼泊爾去，他提出的一份鼓舞人心的報告大大刺激了英國人對西藏貿易的興趣。

1810年，一個名叫吉爾曼的商人派遣另一個本地代理人到西藏的噶大克去，目的是得到披巾用羊毛的樣品，這種披巾羊毛是由列城商人壟斷的，并且是對19世紀大部分英—藏政治有相當影響的一項商品。披巾用羊[[84]](#_84_Ke_Shi_Mi_Er_Di_Qu_Chu_Chan)毛有兩種：一種用馴養的山羊毛，一種是更加珍貴的野山羊毛、野綿羊毛和其他動物的毛。雖則在拉達克出產小量披巾羊毛，但大部分是來自西藏的日土和羌塘。根據條約的要求，西藏的生產者只將羊毛運到列城，再由克什米爾和中亞的商人繼續全部轉運給在克什米爾的紡織業。破壞這一壟斷貿易便要以沒收論處，它的規章嚴厲到甚至把六城地區質優價廉的披巾用羊毛排擠出了列城市場。當拉達克政府聽說吉爾曼的努力后，它宣布凡是破壞壟斷的人此后都將處以死刑。

少數英國人親自暗地里探索貿易的機會。1811年，托馬斯·曼寧前往拉薩，甚至設法謁見了達賴喇嘛。威廉·穆爾克羅夫特和H.Y.赫希在1812年進入西藏，遠至噶大克，穆爾克羅夫特還派他的代理人米爾·伊沙塔拉去六城地區搜集有關貿易的情報。但是這些人只是作為個人獨自去的，因為印度政府雖則并不阻止這樣的探險，但它害怕觸犯清政府，所以拒絕給探險家們任何官方文書。但是由于1814—1816年英尼戰爭和英俄商業競爭的結果，英國官方的態度開始改變。因為受亞洲俄國商人已在西藏活動的謠言的刺激，英國挑選了庫茂恩和加瓦爾（菩提亞人在這兩個地方的北部邊緣居住）作為直接與西藏貿易的良好路線。[[85]](#_85_Mo_La_Jue_Shi_De_Mi_Xin__Yin)然后，在結束英尼戰爭的薩高利條約中，英屬印度并吞了庫茂恩，并且確定加瓦爾和西姆拉兩個山地國家作為印度的保護國。現在，英國的領土首次和清帝國的領土在西藏接壤。1816年東印度公司的韋布上尉和西藏官員之間在新邊境線上的接觸，增加了英國打破西藏孤立狀態的希望。

英國擊敗尼泊爾并在加德滿都重新派駐一名使節之事使北京放心不下，因為尼泊爾人在最后嘗試爭取清朝援助時，曾向清朝謊報說，英國人命令尼泊爾將它獻給清朝的貢賦轉交給印度政府，還要求自由通過尼泊爾領土去西藏。為此北京派了賽沖阿欽差大臣帶領一小支軍隊去西藏探聽究竟。賽沖阿了解到事實以后，拒絕支持尼泊爾，他只是希望印度政府“應考慮”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友好關系”，以從加德滿都撤回使節為宜。當英國人答復說，如果北京愿意派遣一位中國的使節到尼泊爾去防止英尼爭端發生，他們樂意照辦，這時賽沖阿卻將事情擱置下來，而在1817年回到了中國本部。[[86]](#_86_Luo_Si____Ni_Bo_Er__Qiu_Shen)

英尼戰爭的另一結果是英國與西藏的屬國錫金發生了接觸。1817年，英國簽署了英錫提塔利亞條約，將尼泊爾在1792年從錫金奪去的領土還給它，并且宣布對該國擁有最高權力，包括對錫金的外交關系負責。但是無論拉薩或是北京都拒絕承認提塔利亞條約的合法性。

英尼戰爭和英國宣布對錫金擁有最高權力，這成了西藏對外政策的一個轉折點。作為清朝屬地的西藏卻有自己的對外政策，這表明它是享有特殊地位的。西藏有它自己的藩屬，這些藩屬是中國政治勢力范圍的次要部分，但它們本身不是清朝的領土，甚至也不是清帝國形式上的屬國。在18世紀，拉薩政府對擴大與英國的接觸表現了一些興趣，班禪喇嘛通過詢問1774—1775年東印度公司的使節喬治·博格爾關于英俄關系的問題，已經有意地擴大了讓英國人觀察西藏的條件。在西藏并入清帝國后，英國人看來一定會先成為一股有希望抵消清朝影響的力量，但1817年以后，盡管漢族人數在青海和東部康區繼續增長，人們已經很清楚，清朝對拉薩的權力不大，它幾乎完全不干預西藏的內部事務。清帝扮演了佛教保護人的角色，他對寺院做一些布施，旨在維持現狀。寺院和世俗官員們從西藏作為清朝藩屬的地位中所得到的商業利益是巨大的，特別是在茶葉貿易方面。因此有理由認為，拉薩不想將一種遙遠的、松弛的與和諧的清朝統治去換取一種較近的、更有力的和文化上較少共同點的英國統治。

清朝對英國侵略尼泊爾和錫金的反應是如此消極，以致拉薩不敢指望清朝的保護。清駐軍的士氣低落，數量也太少，不足以應付嚴重的危機。滿族士兵已婚娶西藏婦女，她們靠丈夫的微薄薪餉很難生活，何況薪餉又不能經常送到駐軍手里，因此清朝駐藏官員不得不低聲下氣地向西藏政府尋求財政援助。士兵們被迫用其他工作收入來補充他們微薄的薪餉。西藏面對英國的影響只能自己保衛自己。西藏人封閉了錫金這條英國和駐藏大臣聯絡的路線。從1818年起，企圖經過蘇特里杰河流域或庫茂恩隘口進入西藏，已成為“正在山地休假或上班的英國官員們喜愛的運動”，但是西藏邊境官員有禮貌又堅定地封閉了他們的道路。[[87]](#_87_La_Mu____1767__1905Nian_Tong)拉薩開始編造清朝在西藏如何強大的神話，想用這種托詞說明，阻止英國直接與雪山之國交往的是清朝，而不是西藏自己。

印度政府決定實行一項謹慎的政策，這政策被諸如東印度公司的軍馬司主管人威廉·穆爾克羅夫特[[88]](#_88___Da_Qing_Xuan_Zong_Shi_Lu)這樣一些人視為過分膽小怕事的一種舉動。印度同中國一樣，好幾個世紀以來為繁殖馬匹問題感到苦惱，為了軍用他們也被迫輸入馬匹。因此穆爾克羅夫特終于得到印度政府的勉強允許，讓他越過喜馬拉雅山（由他自己負責和自費進行，沒有任何授權或政治任命）去尋求中亞的馬匹以供次大陸馴養之用。在印度的許多人對此行很感興趣，希望他能弄清楚英國在山那邊進行貿易的可能性，加爾各答的帕爾默公司和克魯坦登公司將價值約3000鎊的貨物委托他經管。

穆爾克羅夫特和喬治·特雷貝克于1819年出發，在1820年到達列城，發現拉達克的對外關系即將改變。直到1819年為止，拉達克是西藏的一個藩屬，但也向克什米爾的阿富汗人交納第二等貢賦，即給他們以用益權。從一種不嚴格的意義上說，拉達克甚至可以被理解為“名義上隸屬于中國”。[[89]](#_89_Wo_Sen____Zhong_Guo_Da__Da_L)然而在1810年，錫克人征服了克什米爾，并要求拉達克將克什米爾的用益權轉交給他們。但是在穆爾克羅夫特的煽動下，拉達克王轉而向英國人表示忠誠。印度政府怕觸怒錫克人，就申斥了穆爾克羅夫特，拒絕了拉達克的歸順，并將此事通知錫克政府。錫克人放下了心。拉達克承認錫克人享有用益權并開始向他們交付貢賦。但是拉薩則把穆爾克羅夫特的未經授權的努力看作英國擴張主義的更進一步的證據。

穆爾克羅夫特繼續留在拉達克直到1822年，他試圖通過代理人米爾·伊沙塔拉勸說葉爾羌當局允許他進入清朝領土。列城的一些貿易人士可能已被英國將通過列城到六城地區進行貿易的前景所吸引住。一個葉爾羌的忽禪商人為他在俄國時聽到的關于英國商人的敘述所打動，他幫助穆爾克羅夫特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另一個著名的納赫什班迪教團成員和卓沙尼牙孜在葉爾羌有許多支持者，他給予了穆爾克羅夫特必不可少的幫助和忠告。但是克什米爾人害怕東印度公司將會妨礙他們對披巾羊毛的壟斷，在葉爾羌有說服力地說明他們的立場，因此盡管穆爾克羅夫特聲稱曾有一個英國人已在大約二三十年前進入過葉爾羌，但清當局仍宣布英國無在六城地區進行貿易的先例，拒絕了他申請護照的要求。穆爾克羅夫特經過克什米爾和喀布爾前往中亞，1825年死在安德胡伊。[[90]](#_90_Mu_Er_Ke_Luo_Fu_Te____Zai_Yi)

雖然穆爾克羅夫特未能完成買馬使命，但他的努力大大刺激了英國的興趣。特別是他激起了英國的商業競爭感，因為他揭露了俄國代理人阿哈瑪迪（見第七章），他報告說俄國人每年參加噶大克的集市，他斷言，“相當大一部分”披巾貿易是“通過布哈拉和葉爾羌兩地而同俄國進行的”。[[91]](#_91_Mu_Er_Ke_Luo_Fu_Te____Lu_Xin)其他幾個歐洲人也從印度進入拉達克。穆爾克羅夫特曾在那里遇到匈牙利學者、偽裝成亞美尼亞人的亞歷山大·肖馬德科洛斯；1821年，亞歷山大·杰拉德上尉進入拉達克，想要西藏批準他訪問瑪那薩羅沃池[[92]](#_92_Ji_Gang_Di_Si_Shan_Fu_Jin_De)，但未獲成功。但是印度政府的態度是避免和西藏或清朝當局發生官方接觸，而英國人則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加入橫貫喜馬拉雅山的貿易，特別是披巾羊毛的貿易方面，庫茂恩和加瓦爾對此貿易似已打開了一條通路。

在錫克人征服克什米爾的后果中，有一次饑荒使許多克什米爾織工流亡到英國領土上，盡管仍有壟斷，小量披巾羊毛還是開始從西藏滲漏了出去。英國人想要擴大這種供應，并開辟從六城地區和西藏經過列城移往克什米爾的貿易。

西藏向拉達克輸出的商品包括西藏本地的產品和來自中國本部再加轉運的商品。由牦牛商隊從拉薩運到列城的中國轉口商品主要是磚茶（每塊重8磅），也有絲、絨、緞和銀元寶。西藏產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其次是羌塘綿羊、硼砂（銀匠和黃銅匠需要）、硫磺和黑鹽。西藏自列城的輸入品包括棉布、披巾、印花棉布、銅包的錫器皿、匙子、印度和歐洲的制造品、干果和谷物（這些東西主要來自旁遮普和克什米爾）。列城也和葉爾羌有相當可觀的貿易，在19世紀20年代雖然有拉達克的壟斷，但葉爾羌、和闐和大帳哈薩克人的披巾羊毛越來越大量地運到了列城市場上。披巾羊毛的價錢不斷上漲，到30年代，拉達克禁止從六城地區進口的禁令成了一紙空文。

英國努力擠入這種貿易，最初是成功的。拉達克的壟斷垮了。西藏的商隊開始到英屬印度的巴什哈爾去。但是英國并不是拉達克貿易的唯一覬覦者。1822年，錫克人把一個印度多格拉人古拉布·辛格提升為查謨王，1834年古拉布·辛格派遣他的將軍佐拉瓦爾·辛格帶著一萬名多格拉軍隊去征服拉達克。有個冒險家喬治·亨德森博士在多格拉人之前曾偶爾游歷列城，使拉達克人能夠詭稱，英國使節已經前來接受拉達克在十余年前通過穆爾克羅夫特即已提出的效忠。然而英國人相信多格拉人的侵略只會使更多的西藏羊毛轉到印度；因此他們揭穿了拉達克人的欺騙，再次使多格拉人安下心來。盡管冬季的條件有利于拉達克，但他們的過時的武器是不能和佐拉瓦爾·辛格的武器相匹敵的，后者在1836年曾對錫克人夸下海口說，如果錫克人“愿意下令征服中國國土，他能馬上點燃戰爭之火，向中國國王挑戰”。[[93]](#_93_Sohan_Lal_Suri__Umdat_at__ta)拉達克人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接連進行反抗，直到1840年在佐拉瓦爾·辛格征服了巴爾提斯坦以后，多格拉人才完全確立了他們對拉達克的統治。從理論上說，什么事情也沒有改變。多格拉是錫克王國的一個部分，后者在拉達克繼續保持名義上的用益權；而拉薩繼續收取拉達克的例行貢賦。但是錫克對查謨地區的統治充其量不過是有名無實的。[[94]](#_94_Can_Jian_Hu_Xi_Wang_Te__Xin)古拉布·辛格計劃恢復拉達克的貿易壟斷。他甚至用停止拉達克歷來向西藏一年一度的貿易使團提供慣例的膳宿和運輸的辦法，來向拉薩的傳統地位挑戰。

由于拉達克在混亂中，西藏商人日益避開列城，而把貨物輸出到巴什哈爾，這個地方變成了印度和西藏貿易的主要干線。結果，供應克什米爾織工的羊毛大減，以致幾乎危及該工業的生存。在此期間英屬印度自己橫貫喜馬拉雅的貿易多虧鴉片的輸出而擴大了，作為非交戰國的印度商人將鴉片運到列城，以便讓克什米爾人——甚至還有一些印度商人——再向葉爾羌輸出。大量來自旁遮普的鴉片，必然是完全通過錫克人和多格拉人之手的。小量鴉片是取道巴達赫尚到達葉爾羌的，也有一些由尼泊爾商人和在西藏冒充“尼泊爾人”的印度人經手，通過尼泊爾運到拉薩，在那里鴉片完全是供清朝軍政人員消費的，尼泊爾人和西藏人并不是使用者。

為了沿通過列城的傳統路線重新恢復西藏的披巾羊毛和茶的輸出，并進而控制這條路線，古拉布·辛格派遣佐拉瓦爾·辛格在1841年入侵西部西藏，堵塞了滲入英國領土的貿易的漏洞。英國人既擔心清朝將會因多格拉人的入侵而譴責他們，也害怕多格拉—尼泊爾人可能結盟（也許是因為清朝的慫恿）而反對他們，因為他們正在與阿富汗和中國交戰而騰不出手來。有了這些考慮，再加上他們想恢復西藏貿易的愿望，導致他們給錫克人送去一份最后通牒，命令多格拉人撤退。錫克人把這話傳給古拉布·辛格，但是在他能夠和他派往西藏的將軍聯系以前，西藏人在沒有從無能的清朝駐軍取得援助的情況下就打垮了幾乎被寒冬消滅的多格拉軍隊，并且殺了佐拉瓦爾·辛格。拉達克立刻發生了起義，西藏人于1842年侵入拉達克，重新確立了他們在那里自古以來的權力。但是古拉布·辛格趕派援軍而至。西藏人退卻了，比拉薩軍隊較為現代化的多格拉軍隊水淹靠近拉達克—西藏邊境的西藏人營地，弄潮了他們的火藥，使他們的槍毫無用處。多格拉人擊敗了西藏人，但是雙方都已筋疲力盡而準備和解。

1842年10月17日，多格拉人和西藏人在列城締結了和約，重新確立了拉達克對西藏披巾羊毛的壟斷，確認了傳統的（但仍未確立界碑的）拉達克—西藏疆界。多格拉人放棄所有對西藏的領土要求，西藏人承認多格拉人在拉達克的統治地位。多格拉人的印度教王國名義上仍然依附于錫克人，西藏是清朝的藩屬，但是西藏人和多格拉人實質上都作為主權國家行事而締結了一項國際協定。清朝無所作為，只是默認這一既成的事實。拉達克仍繼續派使團前往拉薩進貢；多格拉人恢復了對西藏每年派往列城的政府貿易代表團提供象征性的膳宿和運輸；西藏人則承認多格拉人擁有拉達克；列城對拉薩的貢賦減到了慣例水平；納貢是為了取得拉達克對西藏披巾羊毛貿易壟斷的確認。拉達克和巴爾提斯坦自此正式成為錫克王國的一部分。拉達克脫離了中國的政治勢力范圍，變成了印度次大陸的一部分。

所有這些事實，再加上清朝駐軍的可憐狀況，降低了清朝在拉薩眼中的威望。當白蓮教叛亂者1822年從四川侵入甘肅東部時，青海湟中地區的23個藏族部落拿起武器從和碩特部那里奪回了以前藏族在青海湖的牧地（和碩特部早在16世紀初就已經占有了這些牧地）。同年，長齡率領下的清軍獲得暫時勝利，但是藏人再次打破了和平。“一個漫長的破壞和屠殺的時期”跟著發生了，主要的煽動者之一是東科爾寺的文殊師利呼圖克圖。[[95]](#_95_Shi_La_Mu____Gan_Cang_Bian_J) 1829年，拉薩派遣它自己的軍隊去青海湖恢復秩序。1835—1838年西藏軍隊也和拒絕向達賴喇嘛政府納貢的波密統治者作戰，并取得勝利。西藏人驅逐多格拉人一事因此也必須通過其他西藏軍事行為的背景來觀察。

然而，由于害怕英國人，拉薩政府繼續加強清政權的保護假象。1830年，西藏人因發現一個帶著英文書信和地理情報筆記本的克什米爾代理商阿赫馬德·阿里而感到驚慌，這個人承認他是為印度政府來刺探情報的。此外，印度政府在1820年擊敗緬甸人時，強取了緬甸人在阿薩姆的有爭議的“權利”，其中包括與阿薩姆平原和西藏邊界地方的部落之間一系列模糊不清的關系。1835年英國曾迫使拉薩的藩屬錫金割讓大吉嶺，1841年他們開始吞并阿薩姆平原，但西藏的另一個藩屬不丹聲稱阿薩姆應該歸它所有。1844年，英國人迫使沿不丹東部邊界的西藏達旺地區的首領們放棄對卡里阿普拉沼澤地的權利，而他們每年則取得5000盧比的補償作為代價。其中只有500盧比交給達旺寺院（哲蚌寺的一所附屬寺院），其余部分都送往拉薩的哲蚌寺。換句話說，英國人承認他們是侵犯了拉薩的領地，從那時起直到1888年，當英國人完成了對阿薩姆—西藏邊境部落的吞并以后，他們繼續在門隅、珞瑜及下察隅等地蠶食西藏領土。由于拉薩和不丹的政府都懷疑錫金國王是英國人的爪牙，拉薩撤銷了他在西藏領土上的若干傳統的放牧權利，不丹人試圖暗殺他。

在這樣一種氣氛中，拉薩政府的官員們需要促使清政權作出有力的姿態就不足為奇了；因此，當1844年噶廈以及甘丹寺、哲蚌寺和班禪喇嘛聯合起來發起一場反對攝政策滿林的政變時，這幾方就要求北京干預。皇帝派遣因在鴉片戰爭中搞所謂“兩面派”而被充軍的琦善前去處理，當琦善到拉薩時，對攝政以拷問相威脅，除非他承認濫用權力。策滿林從1819年起攝政，謠傳說曾連續謀害了他照管下的三個達賴喇嘛。在琦善建議下，北京將攝政充軍到滿洲，但是拉薩的形勢是一觸即發，因為民眾意識到清朝控制的軟弱無能，對北京干涉和處理達賴喇嘛政府首腦一事深為不安。策滿林出身的色拉寺的僧侶們拿起武器反對清朝當局，痛打他們在攝政房子里發現的兩個噶廈成員，并釋放了囚禁中被罷黜的攝政。可是，攝政自信在北京能為自己辯白，就告訴他的支持者返回他們的寺院，但在北京他沒有能證明自己有理而被流放到黑龍江。至少在表面上，“帝國的權威仍是不得抗拒的，每個人必須對它服從。但這是最后一次了。”

當琦善試圖懲罰色拉寺的僧侶時，西藏政府立刻把此案從他手里拿了過去；在康區的一場辯論進一步證明了清朝在西藏的權威的表面性。1844年，察雅（乍丫）的兩個孿生活佛拒絕服從西藏第三大城察木多（昌都）的帕巴拉活佛的權威。爭吵在1846年演變成嚴重的武裝沖突，察木多活佛向清朝請求幫助，但在各地區首領中激起了反清情緒，其中一個首領由于對北京卷入拉薩的政變感到不滿，拒絕為前往西藏的清朝換防軍隊提供搬運夫役。只是當拉薩提高了察雅喇嘛的地位后才使爭吵停止，這就重新肯定了西藏人的權威，而且在實際上，獎勵了康區反清示威者的那些象征性的領袖人物。[[96]](#_96_Bi_De_Qi____Xi_Cang_De_Gui_Z)

1846年英國對西藏隔絕狀態重新施加壓力。英國制服了錫克人，使古拉布·辛格成為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大王，并承認他對拉達克的所有權，它行文給拉薩的辦事大臣宣布英國對多格拉王國的宗主權（特別是對拉達克披巾羊毛的壟斷權），鼓勵印度—西藏貿易，要求組成聯合的多格拉—英國—清朝邊界委員會來確定拉達克—西藏的邊界。信的內容還通過香港直接告知清政府。可是西藏政府不打算讓清朝與英國聯系，自己也不想在此活動中碰運氣。當拉薩在1846年從西藏驅逐遣使會的教士噶嗶和古伯察時，它不準讓他們取道印度離境。英國的邊界委員在1847年勘探了邊境地區，但是清朝的邊界委員一直沒有到來。

此外，拉薩有意堅持1842年的多格拉—西藏條約把西藏政府的貿易限制在拉達克一線，以免和英屬印度發生糾纏。這在最初能使古拉布·辛格為自己保留大部分披巾用羊毛，但是他的“災難性的捐稅”和他的官員們的瞎指揮，幾乎在1849年使克什米爾的紡織業陷于停頓。事實上，有如此多的披巾工人開始離開克什米爾，致使多格拉政府在1851年發布命令禁止他們移往國外。結果，雖則多格拉政府阻住了葉爾羌的“上好的”“土魯番”羊毛流入印度，但是羌塘的西藏披巾羊毛開始再一次供應生活在這一英國領土上的織工。[[97]](#_97_B_S_Xin_Ge____Cha_Mo_Zhi_Hu)

從菩提亞人的觀點看來，拉薩仍然保有特殊地位。西藏政府每年給錫金王一筆谷物、鹽和茶的津貼，以補償他在1849年因抵制英國侵略所造成的損失；1853年，西藏官員和拉達克官員們再次確定了拉達克在西藏的貿易壟斷權，并且締結了加強列城進貢使團和拉薩貿易使團每年交易的正式協定。不丹雖然是一個有獨立對外關系的完全主權國家，也每年派貢使到拉薩去。[[98]](#_98_La_Mu____Jin_Dai_Bu_Dan)在門隅、珞瑜和下察隅，效忠于拉薩和效忠于英國當局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在菩提亞人心目中仍是模糊不清的。雖然英國人已發覺他們的佛教山地諸國對雙方都表示忠誠，但宗教的和世俗的義務是如此緊密相連，除非他們直接同北京和拉薩就此事進行談判，就幾乎無法把這些義務弄清楚。

由于哲蚌寺和達旺主要頭人之間的爭端，英國與西藏的直接談判在拉薩的倡議下事實上確已進行，因為達旺主要頭人在1852年沒有將卡里阿普拉沼澤地的賠償中應給哲蚌寺的一份送給它，并且逃進了英國人境內。當拉薩派遣一支軍隊到印度邊境時，英國同意每年送償金給西藏，西藏則應以赦免叛變的頭人作為交換。但是英國人沒有能將1853年的談判擴展到其他問題上，也沒有提出要在將來進行其他直接接觸，而它和尼泊爾之間的糾紛立即強化了拉薩的孤立隔絕政策。

在1840年、1842年和1846年，尼泊爾曾請求北京給予支持以反對英國，但是北京執行的是它的“一視同仁”政策；所以當1846年拉納（昆瓦爾）家族的忠格·巴哈杜爾奪取了政權，他便轉而采取親英的政策，甚至撤銷了1847年尼泊爾每五年一次派往北京的貢使。然而在1852年他恢復了進貢使團，這個使團帶到中國的鴉片差不多價值30萬盧比，享受外交特權的免稅待遇。在使團于1854年轉回加德滿都時，帶回了太平軍起義的新聞，忠格·巴哈杜爾認為加強尼泊爾在西藏的特權的時機已經到來（更有利的是因為英國正專心致力于克里米亞戰爭）。在向北京提供反對太平軍起義的軍事援助遭到拒絕之后，尼泊爾于1855年侵入西藏，它的異想天開的借口是要從西藏人那里得到尼泊爾為準備援助清朝的軍隊而花費的費用。忠格·巴哈杜爾還責備西藏人破壞尼泊爾人的貿易權利，并提出了一系列過分的要求。沒有清朝援助的西藏人進行反擊，戰斗陷于僵持的困境。1856年締結了結束戰爭的塔帕塔利條約，它無疑和1835年的中國—浩罕協定很相似，它規定：免除關稅；在拉薩駐扎一位有治外法權的尼泊爾官員；特別是在尼泊爾人和所有其他居住在西藏的外國人之間發生爭執時有裁決權。尼泊爾人可以和西藏婦女結婚。與六城地區的察爾虎特人一樣，這樣的婚生男孩被認為是尼泊爾人，女孩則被認為是西藏人。拉薩同意每年付給尼泊爾貢賦1萬盧比。

西藏和多格拉人簽訂的條約已經有損于清朝的威望，但西藏—尼泊爾條約則使北京感到加倍丟了臉。在尼泊爾人的聲明中可以看到關于和平問題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他們說加德滿都只和西藏人爭吵，尼泊爾并不想反對清朝。但是條約中的稱謂敬語把尼泊爾王和清朝皇帝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為了挽回清帝的面子，原文被修改成為他將“像過去一樣受到尊敬（或尊重）”。又對條約措辭作了進一步修改，將尼泊爾為西藏防御提供軍事援助的“義務”限制在西藏受到除中國皇帝之外其他統治者的軍隊侵略時才適用，然后駐藏大臣才在條約上蓋了印。但是北京指令這位駐藏大臣對條約的不敬之詞假裝癡聾，以免有損“國體”。[[99]](#_99_Luo_Si____Ni_Bo_Er__Sheng_Cu)

西藏人再一次孤立無援地保衛自己的領土，但是，盡管清朝在這一過程中陷于某種困境，由于西藏人害怕英國人和尼泊爾人，他們還是繼續向北京當局表示忠誠的。1861年，拉薩加強了繼續托庇于清帝國的決心，因為在那一年英國侵略錫金，強迫簽訂了英國—錫金的通朗條約，使這個國家成為英國的保護國。但是無論拉薩或北京都沒有承認這個條約，在英國軍隊撤退后，錫金統治者繼續從拉薩接受封賞。[[100]](#_100_La_Mu____Zhong_Yin_Bian_Jin)

在1862年，拉達克、錫金和不丹仍然是西藏的藩屬，但是從喜馬拉雅山的另一邊看來，不丹是獨立的，拉達克和錫金由于條約規定是英屬印度的屬國。拉薩是清朝的一個藩屬，但也向尼泊爾進貢。尼泊爾是清朝的屬國，但在政治上與印度政府聯盟。在內部，西藏是安定的。青海湖的騷亂已在1854年被鎮壓下去。昌都地區一場把波密統治者牽連進去的嚴重混亂，已在1859年被制止。西藏的作家和畫家斷絕了外界影響而單純地仍按自己的傳統進行工作，繼續從事各種形式的文學、哲學注釋、校勘學和宗教畫。但在這些作品中很少有新鮮的或革新的內容。唯一值得注意的新成分是從中國本部來的，因為在19世紀漢族文化的影響增加了，并在西藏的圖畫、室內裝飾、服裝和烹飪中反映了出來。但是即使在這里，漢族文化的輸入成分只是影響了西藏的上層階級。[[101]](#_101_Si_Nei_Er_Ge_Luo_Fu___Li_Ji)對于最普通的平民來說，中國本部仍是遙遠的地方。

即使在它的全盛期，清朝在西藏的力量也絕未占壓倒的優勢。在19世紀60年代，西藏人出于自身的原因仍然寧愿加強清帝國的象征性權威，并使它看起來好像是名實相符的。

在19世紀開始的前六七十年中，清朝上述三個藩屬的歷史彼此之間大異其趣。蒙古地區在清朝統治下衰落了，但保持著安定。新疆雖然境遇較好，然而有叛亂。西藏的內部生活基本上仍未受清朝權力的影響。造成這些差異的根源在于這些地區的自然特征以及滿洲人在合并它們時本來目的的不同。

在蒙古地區，清朝的目標就是古代中國人的目的，即改造游牧民，使他們不能威脅中國。在這方面，滿洲人是成功的，但是蒙古人卻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從滿洲地區到準噶爾地區的蒙族人口都減少了，牲畜和領土也減少了。

在新疆，滿洲人只要求相安無事以及對清帝形式上的恭順。但這些是不可能達到的，因為東突厥斯坦人是一個遠伸到四面八方的廣大伊斯蘭文明的成員，而中國對這些地方全然沒有影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向清帝國的基礎——皇帝的最高權威——挑戰。清帝不是一個喇嘛教徒，卻能做喇嘛教的合法保護人而進行統治；但他不相信伊斯蘭教，就不能在穆斯林世界起這種作用了。好幾個世紀以來六城地區一直是“伊斯蘭之家”。它的居民負有進行圣戰的義務。由一個非伊斯蘭教信仰者來進行統治，只能暫時地被接受。接壤而非中國軍力所及的浩罕，甚至對短暫的和平相處也是一個障礙。為了它自己的商業利益，浩罕汗國使喀什噶爾保持一種連續動蕩不安的局勢。雖然張格爾的圣戰有大量自發的造反成分，但直到19世紀60年代以前，其他大多數騷亂基本上都是發端于浩罕。加之，六城地區的傳統領袖都是穆斯林。北京沒有能夠如同團結達賴喇嘛和蒙古諸汗那樣將他們并入清朝的體制。瑪赫杜姆家族出沒在帝國的邊境。即使作為納赫什班迪蘇菲派來說，他們的教義也是主張采取有力行動的。與此同時，別處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的領袖們也在從事圣戰，例如反對錫克人和印度的英國人，在高加索反對俄國人；而且他們在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奧斯曼帝國、西部中亞和阿富汗斯坦正迅速擴大政治影響。

在西藏，清帝的愿望是使自己成為黃教（蒙古人也屬于黃教）的保護人。西藏人對此是欣然從命的，因為在佛教徒看來，保護人是從屬于僧侶團體的，這樣一來，每一邊都可以把自己看成高于對方。和蒙古或新疆不同，西藏有它自己本地的中央政府。西藏的軍事力量沒有對中國構成威脅；因此滿洲人并未采取行動去削弱達賴喇嘛統治他的宗教國家的權力。正好相反，他們加強他的權力。在整個19世紀達賴喇嘛政府的力量增加了，北京支持拉薩去努力排斥外國影響和保持西藏與世隔絕的狀態。

物質利益在三個藩屬的政治行為中只起很小的作用。雖然真正受苦難的蒙古人也像東突厥斯坦人那樣生活在異族統治之下（他們只能把自己的不幸歸咎于此），但他們仍在等待運轉時來。六城地區的穆斯林是滋事之輩，但他們的叛亂似乎并不是由于任何相應的經濟衰落造成的。西藏的商業經濟和寺院在清朝統治下明顯地繁榮，但是沒有什么根據認為這是拉薩政府要堅定地依附清帝國的主要原因。

盡管清朝在亞洲腹地的權威是表面的，但對于保證來自中國本部的不斷增加的漢族移民——他們移住在內蒙、整個新疆及西藏東部邊緣——的安全來說，仍是足夠強大的。從整體來看，盡管有叛亂和歐洲人的侵略，以及滿洲人的命運日益不濟，但從18世紀90年代到19世紀60年代這段時間仍是清帝國力量的偉大時期。

（陳高華 譯）

[[1]](#_1_7)舒爾曼：《達賴喇嘛史》，第345—346頁。

[[2]](#_2_7)鮑登：《蒙古近代史》，第143頁。

[[3]](#_3_7)那桑巴爾吉日等編：《18世紀至20世紀初的人民申訴書》，見拉西頓杜格的英譯本。

[[4]](#_4_7)見那扎格多爾濟《滿洲統治時期的喀爾喀簡史》，第215—223頁；《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卷2，第256—261頁。

[[5]](#_5_7)《滿洲統治時期喀爾喀簡史》，第223—236頁；《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卷2，第261—270頁；鮑登：《蒙古近代史》，第179—183頁。

[[6]](#_6_7)納扎格多爾濟：《蒙古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第272—276頁。

[[7]](#_7_7)鮑登：《蒙古近代史》，第156—157頁。

[[8]](#_8_7)米哈伊洛夫：《蒙古文學遺產》，第74頁；海希格：《蒙古人及其偉大時代的佚文》，第247頁；海希格：《蒙古文學史》卷1，第63、215—217頁。

[[9]](#_9_7)海希格：《蒙古文學史》卷1，第278—290、307—323頁。

[[10]](#_10_7)謝別迪爾尼科夫：《蒙古建筑學》，第86頁；馬伊達爾：《蒙古的建筑學與城市建筑》，第8頁。

[[11]](#_11_7)《西域置行省議》，見王佩諍編《龔自珍全集》卷1，第105—111頁；以及《罷東南蕃舶議》（原文已佚，見王佩諍上引書，卷2，第643頁）。

[[12]](#_12_7)《喀什噶爾狀況》，蘇辛編（1827年），引自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426頁。

[[13]](#_13_7)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4.48（1835年12月），第660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19、647頁。

[[14]](#_14_7)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3頁。葉爾羌人瑪哈木·阿明說有12000人，見戴維斯編《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第363頁。

[[15]](#_15_7)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 闐 紀要》，第660頁。但需參照瑪哈木·阿明的“口頭消息”，見戴維斯編《印度報告》，第334、342頁。

[[16]](#_16_6)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3頁。

[[17]](#_17_6)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3頁；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0頁（說汗有“大約八千匹馬”）。沃森：《中亞浩罕的烏茲別克地區紀要》，《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3.32（1834年8月），第375頁；沃森：《浩罕的烏茲別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麥加朝圣記》，《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3.32（1834年8月），第381頁。和罕迪：《沙勃魯希史》，班圖索夫編，第115頁。作者將張格爾和他的兒子布素魯汗混淆了，日期也不正確，但是所述事實是可以清楚辨認的。參見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3頁。

[[18]](#_18_6)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0頁說張格爾強行攻取了該城寨。

[[19]](#_19_6)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63—365頁。

[[20]](#_20_6)沃森：《中國韃 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說，他稱之為庫拉塔克“部”的黑山派是卡達里斯人，伊薩克和卓（他準確無誤地以此名稱呼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是他們的首領。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不是瑪赫杜姆·依·阿扎姆的父系后裔。雙重關系當然也有可能，但沃森似乎可能將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和哈迪里亞派兩者同黑山派相混淆了，這是他的名字伊薩克（Ishāq）一字造成的。

[[21]](#_21_6)沃森：《中國韃 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瑪哈木·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2頁。

[[22]](#_22_6)阿爾德：《1865—1895年英屬印度的北部邊境》，第31頁；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3頁。

[[23]](#_23_6)彼得奇：《1728—1959年西藏的貴族和政府》，第145、162—163頁。

[[24]](#_24_6)魏源：《圣武記》卷4，第57頁；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7頁。

[[25]](#_25_6)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

[[26]](#_26_6)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126—127頁；弗萊徹：《1368—1884年的中國和中亞》，見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21—222、366頁注[111]及[112]。

[[27]](#_27_6)沃森：《烏孜別克地區紀要》，第376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426頁。

[[28]](#_28_6)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8頁。《大清宣宗實錄》卷183，第18頁（1831年3月2日）。

[[29]](#_29_6)和罕迪：《沙勃魯希史》，第117頁。

[[30]](#_30_6)《大清宣宗實錄》卷179，第17—19頁（1830年12月20日）；佐口透：《18至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77頁；參見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9頁。

[[31]](#_31_6)沃森：《烏茲別克地區紀要》，第374、376頁；《大清宣宗實錄》卷184，第38頁（1831年4月5日）。

[[32]](#_32_6)《大清宣宗實錄》卷283，第2頁（1836年6月14日）。他死的時間被記為陰歷六月。由于《實錄》記敘條目的時間是陰歷五月，故他死的時間不可能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參看佐口透《社會史研究》，第408頁，這里也說是1836年。

[[33]](#_33_6)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10頁。

[[34]](#_34_6)關于這個名字，見西蒙諾夫等編《蘇聯烏茲別克科學院東方文獻抄本匯編》7.25，第5014號。佐口透把Zuhur ad-Dīn Tājī寫作Zohr al-Dīn（《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86—492頁），這是不可能的。

[[35]](#_35_5)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326頁）聲稱清朝是要求和平的。沃森在《烏茲別克地區紀要》中說，作霍爾敦是作為“從北京派去的使節……談判和平”的，見第375頁。1835年的中國—浩罕協定的輪廓可能是在這一次擬定的。也見《大清宣宗實錄》卷195，第12、15—16頁（1831年9月28日）；卷197，第19頁（1831年11月3日）。

[[36]](#_36_5)《大清宣宗實錄》卷199，第18頁（1831年11月27日）。

[[37]](#_37_5)沃森：《烏茲別克地區紀要》，第376頁；《大清宣宗實錄》卷207，第26頁（1832年4月13日）；柏尼思：《布哈拉之行》卷2，第378頁。

[[38]](#_38_5)《大清宣宗實錄》卷209，第18頁（1832年5月11日）。參見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那里的“十二年”顯然是“二年”之誤。

[[39]](#_39_5)《大清宣宗實錄》卷214，第19頁（1832年7月18日）；卷215，第2—3頁（1832年7月27日）；卷260，第15頁（1834年12月15日）。

[[40]](#_40_5)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377頁（據說總共有2萬名步兵，其中1萬名駐在喀什噶爾）。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4—655頁。

[[41]](#_41_5)《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4頁；《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

[[42]](#_42_5)《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

[[43]](#_43_4)《大清宣宗實錄》卷235，第22頁（1833年6月2日）；卷238，第4頁（1833年7月20日）。

[[44]](#_44_4)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頁（此書將清朝政策的改變歸因于浩罕對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控制的擴大）；《大清宣宗實錄》卷261，第11頁（1835年1月1日）。

[[45]](#_45_4)《大清宣宗實錄》卷244，第18—19（1833年11月30日）、39—40頁（1833年12月9日）；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沃森：《麥加朝圣記》，第381頁。

[[46]](#_46_4)《大清宣宗實錄》卷262，第21（1835年2月15日）、24頁（1835年2月16日）；也見第27頁（1835年2月19日）。

[[47]](#_47_4)《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參見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旅行記》，他說在葉爾羌和北京之間正常的旅程是“六個月”。

[[48]](#_48_4)《大清宣宗實錄》卷254，第5—6頁（1834年8月9日）；卷257，第8—10頁（1834年10月22日）；卷260，第15—16頁（1834年12月15日）；卷261，第35—36頁（1835年1月21日）；卷262，第20—23頁（1835年2月15日）。

[[49]](#_49_4)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頁（將特許權的贏得特別歸功于愛連拍迪沙），第341、401頁；瑪哈木·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5頁（也提到愛連拍迪沙）；參看貝柳《喀什噶爾史》，載福賽思《1873年出使葉爾羌報告》，第185頁；還可參看和卓巴哈杜爾汗的報道，見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以及沃森的《朝圣記》，第381頁。

[[50]](#_50_4)《Ta’rikh-i sihgārī》，無名氏手稿，大英博物館東方8156號（完成于1874年），錯誤地把權力歸于阿卜杜拉·帕沙巴西，第8卷第9章。

[[51]](#_51_4)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6、9、136—139、174頁注[23]，這里對俄國過去作家的批評沒有考慮到1834—1835年事件。

[[52]](#_52_4)《大清宣宗實錄》卷265，第7頁（1835年5月5日）。佐口透：《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95—496頁。

[[53]](#_53_4)皮爾森：《古吉拉特的商人和統治者：對16世紀葡萄牙人的反應》，第17—18頁。

[[54]](#_54_4)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401、680頁。

[[55]](#_55_4)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1頁；也見曾問吾的《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12頁），他說商人是從安集延城來的；沃森：《中國韃 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8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57頁。但可參閱阿赫麥德·沙的另一種不同的說法，見《從克什米爾經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2頁。

[[56]](#_56_4)戴維斯編：《印度報告》附錄100，第29頁；附錄24，第193—196頁。穆罕默德·阿明：《東突厥斯坦史》，第346頁注。阿赫麥德·沙：《從克什米爾經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1頁。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7頁。

[[57]](#_57_4)《大清宣宗實錄》卷267，第19—20頁（1835年7月16日）；卷283，第2頁（1836年6月14日）；卷291，第25—27頁（1836年12月23日）；卷292，第3—5頁（1837年1月9日）。納里夫金：《浩罕王國史》，第164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12頁注，第326—334、345—348頁。他的報道和清朝有關色勒庫爾首領們的編年資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58]](#_58_4)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第222—223頁；《大清宣宗實錄》卷330，第29—30頁（1840年3月2日）。

[[59]](#_59_3)《大清宣宗實錄》卷293，第23—24頁（1837年3月2日）；卷298，第31—32頁（1837年7月30日）；卷301，第8—9頁（1837年8月5日）。沃森：《烏茲別克地區紀要》，第375頁。參看沃森《麥加朝圣記》，第381頁。

[[60]](#_60_3)在費正清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條約制度》（載他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60頁）中也清楚地談道：“最惠國條款發端于清帝國想對所有非中國人顯示一種高于他們的一視同仁的愿望。”

[[61]](#_61_3)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卷1，中譯本，第337頁。

[[62]](#_62_3)阿瑟·韋利：《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第185頁。馬木留克人有類似情況，參見戴維·阿亞倫《馬木留克王國的火藥與火藥武器：對中世紀社會的一個挑戰》。

[[63]](#_63_3)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2頁。

[[64]](#_64_2)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79—80頁。

[[65]](#_65_2)曹振鏞編：《欽定平安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38，第22頁；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149頁。

[[66]](#_66_2)《大清宣宗實錄》卷419，第19頁（1845年8月20日）。戴維斯：《印度報告》，附錄24，第191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第339頁。

[[67]](#_67_2)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415頁；卷3，第152頁。《大清宣宗實錄》，卷417，第2（1845年6月6日）、12—13（1845年6月13日）、21頁（1845年6月25日）；卷432，第22—23頁（1846年9月17日）。

[[68]](#_68_2)《大清宣宗實錄》卷428，第19頁（1846年5月18日）；卷432，第8—10頁（1846年9月1日）；卷433，第17—18頁（1846年10月13日）；卷434，第5頁（1846年10月26日）；卷436，第17—18頁（1847年1月9日）。

[[69]](#_69_2)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152頁。

[[70]](#_70_2)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7—348頁。《大清宣宗實錄》卷451，第20頁（1848年2月29日）；卷453，第7頁（1848年4月9日）。

[[71]](#_71_2)穆罕默德·阿明所述（有些歪曲），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9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5、670頁；阿赫麥姆·沙：《旅行記》，第349頁。

[[72]](#_72_2)戴維斯：《印度報告》，第66—67、69、190—192頁；坎寧漢：《從自然、統計和歷史角度看拉達克》，第245、253頁；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8—349頁。

[[73]](#_73_2)戴維斯：《印度報告》，第69、88、193—196頁。

[[74]](#_74_2)陳慶隆：《從1828年暴動到阿古柏時期的新疆史》，第39—40頁。陳在這篇博士論文中所寫的日期（1854年8月30日）系1854年10月21日之誤。奕等編：《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1896年序，卷1，第11頁），以及《大清文宗實錄》卷228，第22頁（1857年7月16日）。

[[75]](#_75_2)佐口透在《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16頁）中把玉散霍卓依善（Yu—san Huo—cho I—han）轉寫成“Yusan？ Khwāja I-shan”。這個名字的第一部分表示üsän，顯然是Husayn的突厥化，這可以從基比洛夫和宗伐佐所編《維吾爾文—俄文字典》（第287頁）得到證實。《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第3頁。

[[76]](#_76_2)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50頁；《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卷4，第13頁。喀西達關于倭里汗入侵的報道，見羅斯編譯《喀什噶爾的三份突厥文手稿》，第7、14頁；羽田明：《倭里汗之亂的一件史料》，載《冢本博士紀念論集》，第65頁。

[[77]](#_77_2)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1頁注3；赫爾曼·封·什拉琴威特—薩孔倫斯基：《印度和亞洲高原旅行記》卷4，第282頁。

[[78]](#_78_2)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15頁。這個數字似乎高了一些。

[[79]](#_79_2)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5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31頁。

[[80]](#_80_2)《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第24頁。《大清文宗實錄》卷267，第5頁（1858年11月18日）；卷247，第13頁（1858年4月16日）。

[[81]](#_81_2)瓦里哈諾夫：《全集》卷1，第394、602頁；卷2，第343—344、369頁。《烏茲別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史》卷1，第662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9、351頁。

[[82]](#_82_2)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

[[83]](#_83_2)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52頁（Abdul Kâim [‘Abdal-Qā’im]必然是‘Abd al-kārīm之誤。Qā’im不是真主的99個名字中的一個。清朝的資料是阿布都剴里木A-pu-tu-k’ai-li-mu）。參看佐口透《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25—526頁。佐口透的敘述是以清朝資料為依據的。

[[84]](#_84_2)克什米爾地區出產的披巾特別著名，它是用西藏和拉達克東部高山地區山羊的下腹部細毛制成的，三個織工編織一條普通披巾需時三個月，貴重的披巾需一年多時間。18世紀時，克什米爾披巾行銷印度、中亞、俄國、伊朗等地。19世紀中葉，遠銷歐洲國家。——譯者

[[85]](#_85_2)莫拉爵士的密信，引自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第51頁注2。

[[86]](#_86_2)羅斯：《尼泊爾：求生存的戰略》，第89—94頁。

[[87]](#_87_2)拉姆：《1767—1905年通向拉薩之路》，第62頁。

[[88]](#_88_2)《大清宣宗實錄》卷34譯為“木爾齊喇普”。——譯者

[[89]](#_89_2)沃森：《中國韃 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8頁。

[[90]](#_90_2)穆爾克羅夫特：《在印度斯坦喜馬拉雅山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記》卷1，第47—50頁；黎吉生：《西藏簡史》，第72頁；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第39頁，特別是注2；庫茲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175頁注28。參閱戴布斯《中國突厥斯坦的發現與探險史》，第31頁，他無批判地遵循古伯察的主張；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第203—212頁，他論證穆爾克羅夫特在十余年后死于西藏之說不可信。

[[91]](#_91_2)穆爾克羅夫特：《旅行記》卷2，第164頁。

[[92]](#_92_1)即岡底斯山附近的瑪法木錯湖。——譯者

[[93]](#_93_1)Sohan Lāl Sūrī，‘Umdat at—tawārīkh，引自B.S.辛格《查謨之狐》，第28頁；也見第204頁注39。關于征服，見鮑寧《對小西藏的征服》，載《伊斯蘭世界雜志》卷11，第6號（1910年6月），第207—231頁。

[[94]](#_94_1)參見胡希旺特·辛格《錫克人歷史》卷1，第279頁；卷2，第21頁。他提出克什米爾織工的困難和錫克人的積極性是多格拉人擴張的原因。

[[95]](#_95_1)施拉姆：《甘藏邊界的土族》第三部分。文殊師利呼圖克圖＝東科爾寺呼圖克圖＝察罕諾們汗。

[[96]](#_96_1)彼得奇：《西藏的貴族和政府》，第4頁；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80頁；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第332—342頁；舒爾曼：《達賴喇嘛史》，第354頁。

[[97]](#_97_1)B.S.辛格：《查謨之狐》，第160頁；戴維斯：《印度報告》，第52頁。

[[98]](#_98_1)拉姆：《近代不丹》，第52頁。

[[99]](#_99_1)羅斯：《尼泊爾：生存的戰略》，第115、117頁。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第329頁。

[[100]](#_100)拉姆：《中印邊境爭議的淵源》，第24頁。

[[101]](#_101)斯內爾格羅夫、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30—231頁。

# 第九章 清代的中興

## 清朝獲勝的原因

1864年7月當太平天國的首都南京最后被曾國藩的軍隊攻陷時，中國士大夫統治階級中的許多人已在私自慶幸，因為他們親眼看到了歷史中的罕見現象——一個統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后衰敗時仍能撲滅一次席卷全國的和難以對付的叛亂。這在傳統史學中被稱為中興，自古以來，這樣的事例不過犖犖數端而已。在19世紀60年代經常引用的這類事例中，有規模巨大的安祿山之亂被撲滅后肅宗在位時（756—772年）的唐代中興。

從歷史角度看，清代的中興也許甚至比唐代的中興更令人矚目。公元8世紀的帝國將領還遠沒有擺脫南北朝（317—589年）的軍事—貴族文化，但是清末的士大夫盡管身受一千多年越來越無價值的書本文化的影響，卻能消滅太平軍。另外，唐代的中興出現了實際上獨立的藩鎮，而清帝國政權卻能經過叛亂而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來：總督和巡撫在治理時雖然取得了較大的回旋余地，但是仍要繼續依靠皇帝的恩寵以保持祿位。唐肅宗曾從中亞的回鶻人那里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樣得益于西方“夷人”直接和間接的援助。唐朝雖然能指望用中國的優越文化去威懾甚至同化異族援助者，可是19世紀中國面臨越海而來的外國人，他們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擁有比中國自己的文明還要高明的物質文明。

任何中興的主要事件都是軍事性質的，即必須打敗叛亂者。

第六章曾經著重指出，清朝的勝利是由于：第一，中國的上層人士把王朝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他們能用自己組織起來的臨時武裝來維持地方秩序。

雖然團練和勇都是有用的，但由于有了一種新型的軍事組織才可能取得最后的勝利。這種新型組織就是勇營，它是帝國的半正規軍隊，在當時是一大創舉。[[1]](#_1_Wang_Er_Min____Qing_Dai_Yong)最早和最重要的這類軍隊雖然在湖南組成，都稱不上“地方軍隊”，因為它很快就被調出省外與太平軍作戰。湘軍的規模與勇的規模不同，后者一度發展到13.6萬人。雖然團練和勇的餉銀主要都由紳士籌措，但湘軍的餉銀則由帝國在省庫內撥付。曾國藩打算從湖南的上層人士那里籌款，但效果不大，于是就依靠帝國授權湖南、湖北、廣東等省撥付的餉銀，以及朝廷批準出售功名、官銜甚至官職的所得來資助他的大軍。他的經紀人跋涉數省以兜售北京為此目的而頒發的“執照”。[[2]](#_2_Ceng_Guo_Fan____Ceng_Wen_Zhen)曾國藩在建立他的軍事統一組織和訓練制度的同時，又成立了一個管理經費和給養的機構。杰出人物如羅澤南、胡林翼和劉蓉（1816—1873年）等人把謙恭的、但又義無反顧的儒家思想付諸實踐，從而使他們自己也具有曾國藩那種拯救王朝和拯救文明的堅定決心。

### 曾國藩：考驗中的儒家經世致用之學

曾國藩世界觀的哲學基礎是關于萬物各安其“分”的程朱學說。就人而言，每個人的“分位”存在于等級地位中，即存在于帝國制度和家庭內部的等級地位之中。曾國藩與桐城學派的學者一樣，也強調要關心人的福利，但仍認為“倫紀”甚至是一個更重大的問題。早在19世紀40年代的書信中，他就表示了他的看法，認為在人與人的各種關系中如果忽視了“殊”，“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3]](#_3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i)

曾國藩不但是一個虔誠的自我修養實踐家（如主張黎明即起，按時練字，熟讀經史和寫反省日記等），而且對行政問題也有廣泛的興趣。他對經世致用的態度主要是依賴“人治”而不是“法治”。就制度而言，他傾向于保存清朝政府的和社會的慣例，包括各種禮儀在內。他認為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實現賀長齡和魏源喜用的一句名言：“綜核名實。”不過，他又遵循桐城大師的主張，強調只有具有正統學識根底和有修養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內部的習俗，因而最大的需要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4]](#_4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i)他在一篇早期的著名文章《原才》中主張，只有“賢且智者”的出現，才能使急劇形成嚴重危機的世風日下的形勢得以扭轉，并認為只靠幾個視國家利益為自己利益的人的領導和榜樣，也能改造整個一代人的風氣和習俗。他不是沒有認識到制度的重要性。但他在翰林院進行的研究使他相信如秦蕙田（1702—1764年）所著的《五禮通考》那樣的綜合性著作，就足以指導行政實踐和社會實踐。他提出的唯一意見是增寫關于論述諸如鹽的專賣、河道管理和貨幣政策等事務的經濟這一節。[[5]](#_5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i)由于理學總是有“內”“外”——即本質和功能——之分，所以曾國藩認為，清朝的制度雖然在道德和禮儀這兩方面沒有缺點，但在實際執行方面能夠——而且應該——有所變通。他在1851年8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6]](#_6_Chen_Chen_Han_Yin__Yin_____18)

1853年1月曾國藩被任命為負責湖南省地方防務的欽命大臣后，他對文武官員的腐敗無能深為震驚和感到痛心。但他除了竭誠領導以外別無良策；曾國藩出于對理學的信仰，認為只有這樣的領導才能真正改變擺在王朝面前的命運。他說：“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于骨獄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7]](#_7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i)于是曾國藩決定應用其經世致用術的兩個方面，即又要注意人的道德品質，又要注意他們的組織能力。他在選用將領時特別強調候選人要具有“忠義樸誠之氣質”。他寧愿要學者來當將領，要求需用之人選必須具備“血性”和“廉明”的品質，這甚至比要求他們具備軍事經驗的心情更為強烈。他要農民出身的“淳樸”的人來當下級軍官和士兵[[8]](#_8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i)

為了管理他的陸軍及其附屬水師的糧餉，曾國藩經清帝的批準成立了一個官僚機構。雖然他在一開始沒有被封為欽差大臣，但他是領有欽命的。[[9]](#_9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i)這使他有足夠的權力，可以給官員頒發札委和授給他們委員的頭銜。曾國藩還在他的大本營中設立一個“參謀部”，即綠營的營務處。在湘軍進駐湖北然后又進駐江西后，不管曾國藩的大本營設在何處，都在附近城鎮設立糧臺，以監管船運糧食。此外，在前沿陣地還有管理餉銀和彈藥的機構。[[10]](#_10_Guan_Yu_Qi_Fen_Bu_Zhuang_Kua)

曾國藩非常注意被委托辦事的人的品質。他選拔一名對水戰有一定經驗的下級綠營軍官楊岳斌（1822—1890年）和與地方防務有過短期關系的生員彭玉麟（1816—1890年）來指揮他的水師。尤其是彭玉麟，他證明是一名勇猛、正直和謹慎的儒將，所以深合曾國藩的心意。曾國藩依靠他的一批私人幕友來為營務處、糧臺和各種特設的局辦事，這些人名義上是他的“食客”，并從他私人俸祿中支領酬金。曾國藩以善于把精干之士招進幕府和量才使用他們而著稱。他常常任命幕友至營務處或某個糧臺任職，這樣就把“食客”轉為有委員地位的政府官員并付給官俸。曾國藩的心目中也需要以不貪贓、有實際才能而為人稱道的“正人”來充當這樣的管理人員。但實際上，他傷感地發現，他不得不在湘軍和綠營將領中放寬他的品行標準。他只有對手下官兵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才能徹底維持湘軍的戰斗力。但對這些挽救其戰斗力的辦法，儒家的經世致用之學是難得給予承認的。

事實上，湘軍的戰斗力大大地被許多贊美它的編史者們夸大了。誠然，湘軍在1854年10月攻克武昌之舉，遏制了太平軍企圖鞏固沿江所有城市的戰略銳氣。而1854年12月在湖北邊緣的田家鎮擊潰龐大的太平軍水師的戰績也顯示了曾國藩水師的質量。但當曾國藩沿江而下遠征江西時，他被斷然阻擋住了。至少他的一半水師被圍在鄱陽湖達兩年多之久；而且盡管湘軍中最精銳的部隊回師防守，太平軍仍于1855年4月重新攻占了武昌。曾國藩仍繼續被圍在南昌，而由胡林翼（當時的湖北省代理巡撫，后來又實授巡撫）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內指揮大部分湘軍作戰。到1856年6月，當駐在南京以東并由向榮統率的江南大營崩潰時（見第六章），湘軍在江西和湖北同時也處于嚴重的危險之中。只是由于南京發生內訌而消除了太平軍施加的壓力，才得以避免一場災難。除了湘軍的水師以外，它的各支部隊當時大部分被打垮，雖然胡林翼成功地集結了他的兵力，而在1856年12月又攻占了武昌。

也出現了湘軍暫時恢復元氣的時期，它在兩三年內擴充到4萬人左右。它盡管遭到幾次慘敗，但到1859年中期仍能肅清江西和湖北的太平軍。軍隊的規模已經擴大，同時基本上還保持著它的組織形式，可是曾國藩卻不得不放棄他在選用軍官方面的原則。像羅澤南和李續賓那樣杰出的儒將已在戰斗中喪生。曾國藩和胡林翼所依賴的新將領再也不是能實際指揮戰斗的儒家人物了；剩下的幾個儒將馭將比帶兵更為內行。在營一級將領中，讀書人已不再占優勢。這時大部分指揮營的將領只勉強認識幾個字，但其中有些人甚至被擢升為統領。[[11]](#_11_Luo_Er_Gang____Xiang_Jun_Xin)經驗證明，執行前線任務需要讀書人所缺乏的精力，而在文盲和半文盲中，卻有具備卓越戰術才能的勇將。原為曾國藩水師下級軍官的鮑超，在1855年被胡林翼提為統領，帶領3000名新兵。據說他只會寫自己的名字。鮑超與其他兩名20多歲的年輕人畢金科和朱洪章就成了曾國藩最器重的統領。朱洪章自稱是一個在下令屠殺數以千計的敵軍時難得眨眼的人，在十三四歲時就放棄了讀書的機會，未滿20歲就參加了勇營。[[12]](#_12_Zhu_Hong_Zhang_De_Hui_Yi_Lu)

像鮑超和朱洪章等人雖然善于指揮作戰，但容易驕縱他們的官兵。湘軍的軍紀不斷敗壞。每當奪取一個城鎮，隨之而來的即使不是濫殺，也總是掠奪。1858年7月當曾國藩服父喪15個月后復任時，他發現湘軍的行為如此之壞，以致地方的團練也常與他們作戰。其弟曾國荃返任得更早，他從湖南帶來的2000名士兵在粗野的、但有作戰經驗的營級將領帶領下，1858年9月在江西吉安的一次重要戰役中贏得了勝利。但在勝利時，他的部隊變得那么難以駕馭，以致它不得不立即被解散而代之以新兵。1858年末三河鎮之役遭慘敗后（儒將李續賓和曾國藩另一個弟弟死于此時），湘軍又設法進入安徽。但此時曾國藩所率各營實際上大部分由新入伍的官兵組成，他們被像朱洪章那樣久經沙場的粗野將領所帶領。盡管曾國藩宣揚愛民（他在1858年末親自寫的軍歌以此為歌名），湘軍原來的良好風紀似乎再也沒有恢復過。

在此以前，曾國藩已經寫出他的主張，認為理想的軍事將領應“不汲汲于名利”。但到了1856年，他發現大部分湘軍軍官“皆不免稍肥私橐”。他所能做的就是但求身不茍取，“以此風示僚屬，即以此仰答圣主”。[[13]](#_13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到了1859年，曾國藩幾乎要把將官劃入衙門胥吏和差役這一類儒生認為不得不容忍的無德之人之列。他這時認為，中國古代的偉大而有德行的將領肯定已被歷史學家理想化了。根據他自己的經驗，像羅澤南和李續賓那樣非凡的儒將，“皆邂逅遇之，非求而得之也”。即使他的最優秀的將領，也只有在讓他們看到建議擢升其綠營軍階的奏折時，或者在他們預期掠奪戰利品的前景特別有利時，才肯賣命。他寫信給胡林翼表示了他的極端實用主義，當時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學“老僧不見不聞……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14]](#_14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這就是以我佛的智慧來補儒家經世致用之術的不足！

### 清帝國的政策：向同治時代過渡

從1859—1861年這三年，人們可以看到太平天國的興起，同時也看到清朝對歐洲人的政策從敵對轉向妥協，這部分是由于在隨著幼主登位而產生的權力斗爭中，宮廷決策人有了變動的緣故。

在向同治年間過渡的時期，任用漢人擔任省的要職這方面的政策可能沒有發生什么變化。清朝的統治者已經非常信任他們的受過嚴格教育的士大夫。據報道，咸豐帝在他深為尊敬的教師杜受田（1787—1852年）的推薦下，選擇了信仰理學的漢族詩人兼政治家祁寯藻（1793—1866年）擔任領班軍機大臣。[[15]](#_15_Xu_Shi_Chang____Qing_Ru_Xue)雖然祁寯藻在1855年退隱，但他的許多意氣相投的好友在京師仍身居高位。他在軍機處的繼承者文慶是一個頗有閱歷的滿人，此人自1853年以來一直擔任戶部尚書，并推薦過胡林翼為湖北省巡撫和駱秉章繼續擔任湖南省巡撫。1856年文慶去世以后，清帝愈加聽信肅順（1815？—1861年）之言，后者是平日陪侍清帝的最能干的宗人。肅順是清帝另一名寵愛的皇親端華的兄弟，他在1854年起開始被任命為御前侍衛和工部侍郎。他在擔任包括理藩院尚書在內的一系列要職后，在1858年末又任戶部尚書。肅順為人驕橫悠肆，但對漢族文人則頗具愛才好士之風，并且任用了郭嵩燾和王闿運等湖南才子當他的幕僚。曾國藩在1860年夏季被授予兩江總督之職，就是出于肅順的保舉。[[16]](#_16_Wu_Xiang_Xiang_De___Wan_Qing)

肅順一意孤行，急于想糾正政府中各種臭名遠揚的弊端。他與其說是一個儒家，不如說是一個法家；他的作風嚴厲。1858年后期，在北京發現了一起舉人考試賄賂案。清帝在肅順及其同僚的建議下，下詔把一名滿族高級主考官及六名被指控的同犯處以極刑。行刑后的八個月，即在1859年11月，肅順對發行鈔票的官辦銀行進行了調查，此舉再次震動了北京的官場。紙鈔與聲名狼藉的大額劣質咸豐銅錢，是清廷謀求解決其財政危機的無可奈何的辦法之一。肅順把數十名被控貪污的戶部胥吏連同許多經官方批準經營的銀行主關進獄中。他因此以勤奮和意志堅強著稱。但當時在北京的郭嵩燾后來指出，肅順的行動還算不上徹底的改革。他認為，清政府的主要缺點在于官場講究排場以及政府政策的顢頇。他斷言某些不法行為是難以避免的，這使人想起曾國藩議論他的將領的一些話來。他寫道：“顢頇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系人心之本，顢頇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17]](#_17_Wu_Xiang_Xiang____Wan_Qing_G)

肅順任理藩院尚書時，已經繼承了明清帝國的政策，即憑借天子的威嚴作為主要支柱，以確保中國對亞洲腹地各部族首領的控制。因此，要清帝與歐洲的蠻夷酋長平起平坐，這對他來說是特別難以忍受的。從所有跡象看，肅順是要求廢除1858年天津條約中某些條款和鼓勵僧格林沁加強大沽灣防務的那個非正式的王公集團的幕后策劃者（見第五章）。他在處理外交政策時，與他處理戶部的貪污胥吏一樣僵硬，這可從1859年7月，即僧格林沁在大沽炮轟英艦后一個月，他與俄國公使伊格納捷耶夫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拒絕割讓烏蘇里江以東的領土，而且還拒絕接受璦琿條約草約，該條約已在1858年由黑龍江的滿洲將軍談妥，并規定割讓黑龍江以北的土地。

當1860年8月僧格林沁的部隊被第二次英法遠征軍擊潰后，肅順及其同僚感到必須接受在北京開辟外國使館區的要求；但即使在面臨災難之時，他們對謁見清帝不行叩頭禮這一問題仍不肯讓步。于是下令對英法軍隊進行一場討伐性的戰爭。清帝國軍隊很快被聯軍的火力擊潰，但肅順這時與清帝正在前往熱河行宮的途中（從北京出發，路程一般為6天）。恭親王與唯一沒有隨駕離京的軍機大臣文祥則留下與歐洲人談判。

在熱河時，身為內務府大臣和戶部尚書的肅順取得了實權。雖然除了讓恭親王及其同僚開始履行1860年10月和11月簽訂的北京條約外別無選擇，但一切國內外政策的重大決定仍要在熱河的宮廷中作出。英軍和法軍撤離北京后，他們仍有約6000名留在大沽和天津。經過這場戰爭，北京的官員就這樣創立了中國與西方關系的新秩序，而滯留在長城以外熱河的朝廷則懷恨在心。隨著新條約的履行，熱河和北京之間的觀點分歧不斷擴大。

1861年1月，清帝批準新設處理西方關系的總理衙門，并于3月31日正式成立；兩星期后，英法兩國大使抵京駐扎。按照條約，雖然鎮江上游的九江和漢口要等太平軍被鎮壓后才得向外國船只開放，但恭親王為了使歐洲人在內戰時支持清廷，卻奉命于1860年12月將這三個商埠全部開放。顯然，太平軍和捻軍對王朝的威脅要比英國人和法國人更大；甚至俄國人也暫時得到了滿足。恭親王和文祥奉詔要發還原來天主教的財產，并要在新商埠開辟時在那里安排外國租界。為了執行1858年的中英通商章程，外國海關督辦管轄的范圍擴大到所有的商埠。1861年1月的上諭批準了江蘇巡撫兼代理通商大臣薛煥的建議，讓已在1858年被提名為海關總稅務司的李泰國正式就任。李泰國在當額爾金勛爵的翻譯時采用恫嚇策略，故清朝官員十分痛恨他，可是實際上李泰國是英國公使卜魯斯提名的，雖然1858年的通商章程已經規定外國政府不得干預稅務司的人選問題。恭親王和文祥認為任命李泰國是有利的，因為北京在1861年初又處于財政危機之中，戶部的庫銀已減少到30萬兩。雖然向外國船只征收的貿易稅的40%用作對英法的賠款，但人們仍然認為，歐洲人出于同樣的原因，也會力圖增加關稅收入，并且新財源將比中國各地關卡的預計收入更大，因為后者“往往以多報少，隱匿侵蝕……無從徹底清查”。[[18]](#_18___Qing_Dai_Chou_Bei_Yi_Wu_Sh)在1860年期間，李泰國已經在英國占領的廣州以及汕頭設立了新的海關。他不久以健康為理由請假回英國；臨時代理他的赫德（1835—1911年）繼續擬訂進一步的章程，并在其他商埠設立新海關。

咸豐帝不愿看到所有這些現實，特別不愿看到歐洲軍隊仍在天津留駐，所以他一再推遲返京日期。他再也不能回京了，因為他在1861年2月患了重病（可能是肺結核）。他在夏初時稍有好轉，但在8月20日病情突然惡化。在兩天后去世之前他一度蘇醒，但時間短得只能立下兩道遺詔：其一是立他的五歲獨子載淳為皇儲，另一紙是授權四位侍衛大臣（載垣、端華、肅順和景壽，都是宗人）和在熱河的四名軍機大臣“贊襄一切政務”。前四人所受的權力既不能被解釋為順治帝未成年時多爾袞的那種攝政，也不能說成是康熙帝未成年時鰲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輔政。（可以推測，這八人在怎樣抬高他們的作用這一點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見。肅順在他們之中最為機敏，但又是地位較低的宗人，決沒有資格當攝政。）然而這八人對自己作為“顧命之臣”的身份信心十足，以致他們以幼主的監護人自居，并且指望代他來作決定。

但并不是把權力全部授予他們。由于他們只受權“贊襄”，所以不能合法地啟用通常代替“朱批”的御璽。他們不得不求助于兩位皇太后的固有的權力，因為母后的地位能夠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璽。咸豐帝去世后留下了25歲的皇后鈕古祿氏，她為人隨和，沒有野心。但這時的天子載淳的生母卻是葉赫那拉氏，即后來的慈禧太后（1835—1908年）。按照規矩，8月22日的詔令晉封葉赫那拉以及位居其右的東宮鈕古祿為太后。八名咨詢大臣在謁見兩位太后時，提出此后他們起草的一切敕令和詔書，都要由兩位皇太后加蓋她們掌握的御璽來批準。但葉赫那拉過去曾為先帝整理過奏折，因而她們堅持要先看過一切草擬的敕令、詔書以及奏折，才能在任何文書上加蓋御璽；而且由咨詢大臣提名的高級官員任命事項，也必須要經過她們的批準。這八名咨詢大臣勉強同意了。但兩位皇太后并不公開上朝聽政，她們只召見這八個人。

這種做法并無錯誤，因為在此以前的清史中，從沒有皇太后上朝聽政之事。但在以前的朝代中都有很多這樣的先例，而且中國的傳統是可以援引的。北京的官員這時發起了一場運動，以使兩位皇太后實際執政，或者按照歷史上常見的做法實行“垂簾聽政”。[[19]](#_19_Yang_Lian_Sheng____Zhong_Hua)恭親王無疑是幕后人，他最后獲準前往熱河行宮。當時在熱河的軍機處的一名官員寫信聲稱，恭親王設法晉見了兩位太后，并緩和了她們對歐洲人的恐懼心理。[[20]](#_20_Gao_Lao____Qing_Gong_Mi_Shi)9月14日，即恭親王啟程回京后第三天，一名御史向熱河奏請兩宮“垂簾聽政”，另外應指定一二位親王來“輔弼政務”。八大臣大為激怒，就草詔譴責上奏折的御史，并且宣稱，在清代從未有太后垂簾聽政之例。葉赫那拉氏反對這份詔書，但拖延了一天半后仍同意在上面加蓋了御璽。

肅順及其同僚顯然認為他們立于不敗之地。于是他們宣布，護送先帝靈柩的皇族送殯隊伍于10月26日啟程赴京，新帝將于11月11日登基。肅順可能已與滿族將領勝保取得了秘密諒解，后者已于9月18日來到熱河，此行名義上是來祭奠清帝的。勝保是1860年夏在與捻軍交戰時奉召協助保衛北京抗擊英法聯軍的主要將領。他雖然被歐洲人打敗，但仍在北京周圍擁有重兵。很可能他在耍兩面手法，曾答應要支持八大臣；但時機一到，他就背叛了他們。

兩位皇太后陪同幼帝于11月1日回到北京。恭親王立刻被召見；兩位皇太后次日又召見恭親王、桂良、文祥和大學士周祖培，交給他們一份據說是醇親王奕譞（咸豐帝的異母兄弟，并娶了葉赫那拉氏的妹妹）起草的詔旨。詔書指責八大臣（特別是載垣、端華和肅順）僭竊帝權，欺騙先帝，并在外交政策方面提了錯誤的意見。據說召見正在進行時，應該陪同緩慢行進的靈車的載垣和端華突然出現，他們高呼“太后不應召見外臣！”但他們被恭親王的衛士拘捕。當晚，在離京不遠的送殯行列中的肅順也被醇親王率領的軍隊所捕。11月7日經兩位太后指令召開了京畿官員的會議（包括內閣和六部九寺的高級官員以及翰林和御史等），會上提出應把載垣、端華和肅順凌遲處死。次日，降旨譴責他們偽稱先帝任命他們為皇太子的咨詢大臣，肅順曾打算在兩宮之間搬弄是非，并且他有一次曾經自己坐上過御座。建議的處分隨即被減輕，載垣和端華被“賜死”，肅順被斬首——都立即執行。對其他五位大臣則建議充軍流放，但其中大部分人被減罪，只受到革職處分。

11月2日，即兩位皇太后回京后的次日，收到了兩起要求她們秉政的奏折。她們立即要原來斟酌八大臣罪行的那個集團來安排皇母的“垂簾聽政”。她們授予恭親王“議政王”這一顯赫稱號，使他在政體中有著突出的地位。這個稱號原來是在1622年由滿洲開國皇帝努爾哈赤封給身為八旗領袖而又是自己的兒子和宗人的，自乾隆（1736—1795年）以來還沒有被使用過。[[21]](#_21_Wu_Xiu_Liang____1693__1735Ni)這時又授予恭親王這一特殊榮譽，卻不去考慮原來的用法了。此外，恭親王又被任命為首席軍機大臣、內務府總管大臣和宗人府宗令。但葉赫那拉氏設法保持了皇太后對詔書和欽命的最后決定權。她們不但掌握御璽，而且還在幼帝面前召集所有文武大員聽政，也就是行使了攝政權。有關“垂簾聽政”的條例已在11月9日的詔令中做了規定。例如，甚至關于軍事的奏折，也必須先由太后們細讀后才交由議政王和其他軍機大臣酌辦。只有在召見中得到指示后，大臣才能起草清帝批示。當接受省職的官員按常規上朝見駕時，兩太后與幼帝一起坐朝，她們坐在幼帝寶座之后的八扇黃色薄紗屏風后面。

11月11日幼帝即位，改新年號為同治。漢學家兼外交家威妥瑪寫道，根據文祥的說法，同治是《書經》中的“同歸于治”之簡稱，從字面上看，它指的是政府和人民都希望“共同回到（或恢復到）井井有條的狀態”。兩宮于12月2日初次臨朝。一個在宏偉的金鑾寶殿內下跪的官員仰面看到幼主高高在上，坐在巨大的御座上，左側站著恭親王，右側是已成為御前大臣的醇親王。但特別令人生畏的卻是御座后面那扇幾乎是透明的黃色屏風。[[22]](#_22_Jian_Weng_Tong_He_Mu_Ji_De_J)

葉赫那拉氏在今后的47年中將成為中國的真正統治者。對清朝來說幸運的是，葉赫那拉氏在這場政變中的同謀恭親王開始在處理內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了較大的行動權。所有記載都說恭親王（1833—1898年）為人腐化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決定他職責范圍內的許多任命時接受賄賂。但是他年輕果斷，尤其樂于采納一個有真知灼見和忠于職守的滿族政治家文祥（1815—1876年）的意見。文祥是一個在滿洲的窮官宦之子，中過進士，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在工部開始他的仕途生涯。他辦事周密謹慎；他在1853年由于偶然的機遇，得以在負責北京軍事的一些王公麾下工作（當時正值太平軍北伐）。這種優點和經歷使他的才能得到幾名達官顯宦甚至肅順的賞識。他青云直上，不斷擢升，在1859年終于升為軍機大臣和戶部侍郎。1860年9月清帝離京時，他奉命擔任代理步軍統領，留守北京，并在和議中當了恭親王的助手。他證明是清朝新外交政策的真正制定者，而且西方官員把他描述為總理衙門中的“干員”。政變后，他又成為軍機處舉足輕重的人物。由于他善作妥協的才能，以及他的勤懇和正直，他不但不斷地幾乎受到恭親王的完全信賴，而且也得到慈禧的高度器重。

恭親王和文祥不得不去安撫京師官場中的一派官僚，他們雖然同意與卑鄙的歐洲人達成妥協，但仍繼續專門在政策和用人方面大唱道德高調。盡管對內戰爭和對外求和需要實用主義，但依然存在咸豐在位頭兩三年開始時的那種風氣——尊敬那些對宋代理學有特別造詣的官員。咸豐帝經他尊重的老師杜受田的推薦，把湖南的老年學者唐鑒（1778—1861年）召到北京：唐鑒因替那些忠實地遵循朱熹學說的清代學者辯護而聞名。后來，持同樣見解的兩名大學士翁心存（1791—1862年）和賈楨（1798—1874年）雖然沒有決策權，但在京畿官員甚至省級官員中仍有影響，因為他們常在會試中擔任考官，聲稱有許多及第的士子是他們的“門生”。由于兩位太后的權力要依靠儒家的“孝道”，所以她們在1861年至1862年特別容易同樣大唱咸豐初期的道德高調。政變后不久，蒙古血統的著名理學家倭仁幾乎立即被任命為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次年，他被提升為大學士，同時擔任清帝的老師。與倭仁同樣以程朱理學造詣著稱、并以個人道德楷模聞名的李棠階（1798—1865年），[[23]](#_23_Li_Tang_Jie____Li_Wen_Qing_G)也放棄了河南的隱居生活而擔任都察院的都御史和軍機大臣。

雖然新的同治統治至少需要正統的學說來裝飾門面，但恭親王和文祥最關心的卻是王朝面臨的軍事威脅。此時威脅與其說來自歐洲人，倒不如說來自太平軍和捻軍。早在1860年秋季與歐洲人議和時，他們已經在考慮（不過很謹慎地）在歐洲列強中是否有一兩個國家可能會幫助清廷與叛軍作戰。他們接受了伊格納捷耶夫關于向清廷提供步槍、大炮和教官的建議（第一次提于1858年），但條件是訓練不得在北京進行，而是把選好的旗人派往恰克圖受訓。他們對清廷是否也應采納伊格納捷耶夫建議派一支俄國小艦隊去協助攻打南京一事猶豫不決，但他們對此機會頗感興趣，因而建議清帝將此事交曾國藩及其他官員酌辦。但曾國藩等人反對此事；同時英國公使威妥瑪也警告恭親王和文祥，說任何派兵進入中國內地的歐洲強國可能再也不會撤走。不過此事提醒了這兩個滿族政治家可以用一支歸清廷擁有的西方造的炮艦艦隊去炮擊太平天國的京城。1861年6月，法國公使館又重提了在天津的一名法國海軍中校提出的建議，表示法國可以協助清廷購買這樣的艦隊。但恭親王和文祥沒有接受，反而采納了李泰國和赫德擬訂的有關英國炮艦的計劃。在卜魯斯知情的情況下，赫德向總理衙門提出，有12艘輪船，所費不到100萬兩銀子，可以通過對鴉片增收海關關稅和在銷售這種毒品時征收貨物稅的辦法來籌款購買。赫德還保證船只可由漢族甚至滿族海員來駕駛。[[24]](#_24_He_De_De_Zhong_Wen_Shen_Qing)1861年7月，熱河的清廷在批復總理衙門的勸說性的奏折時，批準了這個計劃。為了籌措足夠的創辦經費而拖延了一段時期以后，赫德在1862年初才寫信告訴李泰國進行購買艦隊的事情。這樣，就產生了在次年造成外交危機的著名的李泰國—阿思本小艦隊事件。

恭親王和文祥繼續對歐洲人采取安撫的姿態。新開辟商埠的地方官員可能會拒絕與西方人及其領事合作，但北京總是對他們施加壓力。[[25]](#_25_Di_An____Zhong_Guo_He_Ying_G)除了由江蘇巡撫當時兼任（后來由兩江總督兼任）的舊“通商大臣”外，又添了一名主管華北三個新商埠的新通商大臣。新大臣崇厚經清帝批準，安排士迪佛立將軍麾下的英國軍官對一些駐津軍隊以及由京來津的精選旗人進行訓練。在1862年，已有數百名旗人就這樣學會了使用西方小型武器，并在回京后不久就組成了一支由清帝直接控制的精銳部隊神機營的核心。文祥一度任負責該營的官員，后來又親任該營七統領之一。由于某種原因，神機營的規模一開始限制在6000名士兵以下，而天津的訓練計劃也只維持了四五年。

清廷必須確保歐洲人不去幫助太平軍，因此朝廷打算在貿易和傳教等爭議方面讓步。由于中國一方的堅持，天津條約在開辟牛莊和芝罘的條款中，已經禁止外國船只進行大豆和豆餅的貿易。因為這是江蘇和浙江出海帆船在東北的大宗貿易。但西方的船主及其代理人鬧著要參加這項貿易，于是在1862年1月總理衙門就順從了卜魯斯關于撤銷這一禁令的要求。此外，經過了幾次早期激烈的反教會暴亂后（包括1861年11月的貴州教案和1862年3月的江西教案），朝廷頒發了一份布告在全國廣為張貼，強烈呼吁要公平對待傳教士及皈依基督教的教徒（見第十一章）。可是在1862年夏遞交給法國公使的一份“保護教民章程”中，恭親王和文祥設法寫進了如下的條款，即應警告教會不得“干預地方公事”[[26]](#_26___Qing_Dai_Chou_Bei_Yi_Wu_Sh)——希望用這個辦法在條約的約束下盡量保持中國行政權力的完整。

### 外國武裝和太平軍的失敗

1862年淮軍的出現標志著曾國藩的軍事體系擴展到了上海地區。與湘軍相比，淮軍實力較強，這不但是由于淮軍官兵的質量較高，而且他們還擁有西方的槍械彈藥。在淮軍最初的13個營中，有8個營實際上是從湘軍調來的。調來的湘軍將領中有兩人證明是特別值得器重的，一個是程學啟，此人原為太平軍，在安慶投降了曾國荃，另一人是木匠出身的湖南人郭松林。已經證明是當時清朝最優秀將領之一的劉銘傳（1836—1896年），原來是個私鹽販子。他和其他淮軍將領曾經帶領的一批驍勇的士兵來自合肥附近多山的西鄉，那里是一個宗族觀念很強的地區。[[27]](#_27_Xiao_Ye_Xin_Er____Lun_Huai_J)李鴻章麾下更為粗鄙的將領證明比一些儒將更適應于使用西方武器。早在1862年6月，程學啟已經把他的一支部隊改建成擁有100支滑膛槍和步槍的“洋槍隊”。到9月份，淮軍至少已從洋行購進了1000件這類小型武器。但洋行不能迅速供應大炮。在1862年整整一年中，劉銘傳迫切地搜求西方大炮，但毫無所獲。但到了1863年中期當淮軍因從安徽征募士兵和吸收投降的太平軍而增加到4萬人時，它確已掌握了許多現代的大炮，還至少有1萬支步槍。劉銘傳還雇了幾名法國炮手，此外還有約20名西方人在淮軍“洋槍隊”中當教官。

雖然淮軍終于掌握了一些西方武器，但它在早期進攻敵人城鎮時得到的最大幫助卻是由常勝軍中外國軍隊操縱射擊的大炮（常勝軍中還有比淮軍射擊技術高明的中國步槍手）。雖然英國人在1862年5月后一般地說避免直接參戰，但他們找到了一個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就是身為清廷軍官而這時聽命于李鴻章的華爾。華爾雖然年輕魯莽，卻顯然具有聚集約140名外國軍官在一起共事的領導能力。海軍中將何伯一度對華爾懷有敵意，這時也給他提供包括攻城大炮在內的槍支彈藥。華爾用他與商人楊芳共有的汽輪運輸他的步槍手，此舉也有助于李鴻章在1862年7月和8月迅速取得勝利。李鴻章向曾國藩報告時寫道：“華爾打仗，實系奮勇，洋人利器，彼盡有之。”[[28]](#_28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

同時期，李鴻章已經接任了薛煥的職務，在1862年4月份任代理江蘇巡撫，12月任該省巡撫。在7月份，他從吳煦（在12月份前仍為布政使）那里接管了厘金稅。當清帝國的海關稅收用于維持保衛上海的英法軍隊和維持常勝軍時，李鴻章接管后增收的厘金稅收卻使擴充淮軍和支援曾國藩及曾國荃有了可能。與薛煥不同，他不主張鼓勵歐洲人擴大他們在戰爭中的作用。他知道上海的洋人中間討論的一項建議，即鄰近該商埠周圍的農村應歸外國租界當局管轄。李鴻章忠于清帝，同時對他稱之為“中國”或“中土”這一政體的尊嚴也非常敏感。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無論軍事如何緊急，鴻章卻未求他出隊幫助……既輸下氣，且張驕志。”[[29]](#_29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李鴻章最先使用了“自強”一詞。

李鴻章雖然希望避免歐洲人進一步插手戰爭，但仍很珍視常勝軍的援助；這支軍隊雖然由西方人率領，卻有效地置于中國人的指揮之下，這件事是值得詳細說明的。歷史上不乏“蠻夷將領”為中華帝國軍隊效勞的先例；以華爾為例，使他欣喜的不但是經濟的報酬，而且有綠營副將的軍銜，此事說明歐美的屬員是可以歸清廷節制的。華爾在1862年9月死后，準備讓其繼承者白齊文率領常勝軍進攻南京的計劃雖經曾國藩和清帝的批準，卻未能實現。因為白齊文與楊芳為了財政事務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對南京的遠征不得不取消，最后由戈登來率領這支華洋合璧的隊伍。李鴻章理解，這支隊伍的外國軍官絕不可能被中國人指揮。于是在1863年1月中旬，他與士迪佛立將軍取得一致意見，準備任命就要退出英軍現役的戈登為綠營的總兵和常勝軍的副管帶，與一名曾與華爾共過事的綠營將領共同指揮。李鴻章保證定期支付常勝軍官兵餉銀以及英國人供應彈藥的費用。但他堅持常勝軍應從4500人減至3000人，戈登應受李鴻章個人指揮。李鴻章答應英國人提出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如果調動常勝軍越出上海周圍30英里，要事先取得英國當局的同意。可是在2月份，當李鴻章要常勝軍去圍攻上海西北30英里以外的太倉時，他壓倒了士迪佛立的反對意見。戈登在1863年3月開始指揮常勝軍。雖然李鴻章立即要他進攻蘇州和更遠的地方，但英國人并沒有反對。

常勝軍的大部分軍官是習性粗暴的美國人，他們對戈登的約束，深為不滿。至少爆發過兩次嘩變，騷亂則是時有所聞。但戈登個人驍勇善戰，他給其部下的印象不亞于華爾，并且他還是一名杰出的戰術家。他接收了華爾的那艘淺水明輪鐵炮艦海生號（它船尾的轉動炮床上裝有能發射32磅炮彈的火炮），此外，他還有新式的英國大炮。從1863年1月起，淮軍就一直企圖解救在常熟被忠王部隊圍攻的太平軍降軍，常熟離蘇州北面僅30英里，是糧食供應的主要基地。直到4月份戈登帶了榴彈炮和科赫恩迫擊炮趕來時才解了圍。淮軍當時正在圍攻通往蘇州的戰略城市太倉。5月份，戈登乘海生號趕到，經過四小時的炮擊后轟開了太倉城墻，使程學啟的士兵占領了該城。所以李鴻章成為西方技術的堅定信仰者是不足為奇的。他得意洋洋地寫信給曾國藩說：“炮力所穿，無孔不入……西洋炸炮，戰守攻具，天下無敵。”[[30]](#_30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戈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回顧說，“人們原來期望不會有那么大的破壞”；但他認為他的戰斗會加速使蘇州投降，從而及早結束戰爭。[[31]](#_31_Yin_Zi_Shi_Mi_Si___Hua_Er)

“中國的戈登”之所以重要，不僅僅是體現在他身上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主義。他對鎮壓太平軍戰爭的重大貢獻在于，他的炮兵與李鴻章的淮軍一結合，就把忠王的大批部隊牽制在蘇州周圍，這些部隊本來可用來大舉進攻南京外面的曾國荃部隊的。

實際上，曾國荃的士兵差一點遭覆沒之禍。他率領了2萬名士兵已在1862年5月末來到離南京南面僅幾英里的突出地帶。但太平天國的京城由于其堅固的城墻和堡壘而無法攻破，又由于它周圍有河流山岡而難以使之孤立。忠王已于6月份撤離上海返回蘇州，準備在南京發起反攻。反攻在10月份開始，當時他帶大軍從蘇州趕到，后面又緊跟著來自浙江的軍隊。曾國荃的部隊由于遭到一場嚴重的瘟疫和不斷受到挫折而元氣大傷，到1863年1月已瀕于崩潰。但忠王因出于對蘇州地區的關心和對皖北糧食供應的需要，對這次反攻一直不能全神貫注。[[32]](#_32_Jian_You_Wen____Tai_Ping_Tia)他帶了餉銀和糧食在1863年7月中回到南京，并在一個多月內，以自己的“洋槍軍”不斷打敗曾國荃。但在9月中旬，他匆忙趕回蘇州，這次他留在那里直到11月末快要陷落之前。如果沒有戈登及他的大炮，淮軍不可能那么快威脅蘇州，因而忠王后來在著名的“自述”中不斷詳細談到“洋鬼子”大炮造成的可怕后果，這些話并非夸大之詞。[[33]](#_33_Li_Xiu_Cheng____Zhong_Wang_L)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湘軍和淮軍有了戈登的援助，竟使清朝不需要有損于本國主權完整的外國援助就能對抗太平軍。1862年和1863年春，隨著捻軍在山東和河南威脅的增長，清廷越來越急于要把太平軍趕快打敗。1862年6月，在卜魯斯的敦促下，總理衙門得到清帝的批準，讓英國人和法國人在上海訓練中國軍隊。7月，李鴻章勉強將薛煥的一千多名殘兵轉交英國人，另外交給法國人600名。李鴻章要求總理衙門不要擴大這類計劃，因為擔心歐洲人會逐漸侵犯清朝的權力。按照李鴻章的主意，11月份的一道諭旨要求這類計劃應著重“練將”，因為“統帶（華兵）不可久借外人”。[[34]](#_34___Hai_Fang_Dang__Gou_Mai_Chu)晚至1863年3月，士迪佛立將軍在安慶訪問曾國藩時，他建議把英國人在上海訓練中國軍隊的數目增至1萬人。士迪佛立盤算使用這1萬人配合李泰國正在裝備并預期在夏末到達的艦隊一起攻打南京。李泰國本人早在5月份就已返回，他與李鴻章商討財政問題時，透露有六百多名要為清廷效勞的英國官兵，將隨同八艘炮艦前來。李鴻章立刻注意到這與1862年初經曾國藩修正的赫德的最初建議有出入：原建議提出，這支艦隊將主要由湘軍水師駕駛，英國人只是提供訓練和援助。李鴻章警告總理衙門說，李泰國為人驕橫、險惡和狡詐。但問題在于北京是否迫不及待地要取得勝利，以致會聽任李泰國和士迪佛立為所欲為。

6月初，李泰國在北京拿出了他與已經脫離英國皇家海軍來指揮中國水師的阿思本海軍上校簽訂的一份契約，這使恭親王和文祥大吃一驚。根據契約規定，清帝的命令只有在“直接下達給李泰國”時，阿思本才服從，另外，李泰國“如對任何合理的命令不滿時，可以拒絕下達”。李泰國除了提出這份既成事實的契約外，還提出要求說，他身為海關總稅務司得親自接受海關關稅收入，這項稅款在此之前都是送交海關華人監督指定的“海關銀行”的；此外，他不但應負責從關稅收入分配經費給這支新艦隊，而且還應分配給一切外國人訓練的中國軍隊，包括戈登的隊伍在內。如果不能滿足這些條件，李泰國威脅著要撤走海關的一切外國工作人員。他在給總理衙門的要求中寫道：“為什么總稅務司要為地方官員征收關稅？”總理衙門行文通知李鴻章，認為李泰國的用意是“思借此一舉，將中國兵權利權全行移于外國”。[[35]](#_35___Hai_Fang_Dang__Gou_Mai_Chu)

李泰國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清廷與太平軍作戰的運氣大大好轉了。此外，他習慣于與何桂清和薛煥那些沒有骨氣的官員打交道，卻不了解已涌現出來的一批新型的地方行政官。曾國藩和李鴻章不但擁有精兵和具備進取的思想，并且還得到朝廷的信任。李泰國謀求取得卜魯斯的支持，因為后者認為如果能從地方拿走關稅收入和外國訓練的軍隊，清朝的中央政府定會從中得利。因此，卜魯斯在1863年6月16日向總理衙門建議：（1）“帝國政府應[通過李泰國]自己來掌握關稅收入”；（2）由戈登等英國軍官帶領的中國軍隊在與省撫共同作戰時，“不應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36]](#_36_Lai_Te____He_De_Yu_Zhong_Guo)卜魯斯的建議遭到恭親王的斷然拒絕，因此，這位公使就到蒙古去“游山玩水”，把談判之事交給李泰國和赫德自己去進行。在赫德的建議下，擬訂了一套章程，內容是任命阿思本為“幫同總統”，隸屬于曾國藩任命的中國水師總統麾下；兩名水師總統都歸曾、李二人管轄。這些規定得到清帝批準，但李鴻章抱怨說，如果艦隊由600名英國水手操縱，中國的管帶就不可能真正進行指揮。曾國藩也寫信給恭親王說，除非中國人能實際操縱艦只，否則就難以學會使用它們。但總理衙門對清廷的這種名義上的控制似乎已經滿足，雖然還不是心甘情愿的。它在8月份知照李鴻章道，除非在阿思本到達前能收復南京，否則“遲久不克，兵船必往，殊難諭禁”。既然諭旨已經規定艦隊歸曾、李二人指揮，因此總理衙門希望他們二人能設法進行控制，并從李泰國和阿思本手中收回原屬自己的權利。[[37]](#_37___Hai_Fang_Dang__Gou_Mai_Chu)

曾國藩和李鴻章也許將不得不設法滿足一下北京的心意，因為湘軍在以后許多個月中還不能收復南京。但阿思本在9月隨同艦只到達時，對自己只成為一名中國人的“幫同總統”大為不滿，而對究竟誰掌握實權則毫不考慮。在北京，他因受李泰國的煽動，采取了僵硬的立場。10月18日，阿思本限總理衙門在48小時內承認他與李泰國的契約，否則他將“立即解散艦隊”。到了20日，當總理衙門未予答復時，卜魯斯寫信給恭親王，說他得先請示倫敦，才能讓清政府接管艦隊——這樣就出現了使炮艦落入別人手中的可能。但文祥相信，真正不愿冒險看到艦隊落到太平軍之手的人卻是卜魯斯。于是他請美國公使蒲安臣設法調解，他宣稱清廷寧愿“退到長城以外”，也不愿接受阿思本的條件。[[38]](#_38_Lai_Te____He_De_Yu_Zhong_Guo_1)最后找到了解決辦法：艦只退回英國，在那里出售。總理衙門給李泰國和阿思本以豐厚的補償，但解除了李泰國海關總稅務司之職而讓赫德接替。中國海軍的現代化被推遲了，但也避免了外國人在中國軍事和財政方面施加更大的影響。

戈登不止一次要求其中國同僚程學啟不要處決投降的太平軍首領（他認為這是違反文明戰爭常規的行動），雖然這個要求屢次遭到拒絕，他仍繼續援助淮軍。有八名守衛蘇州但決定投降的太平軍首領被李鴻章處決，戈登認為這有損他的榮譽，因為他曾在一次私人會見中似已保證過他們的安全。他一怒之下幾乎要率兵去攻打李鴻章，但被赫德等人勸阻，他們說李鴻章沒有“事先策劃”此事，于是戈登又為李鴻章上陣作戰。[[39]](#_39_Ma_Shi____Zhong_Hua_Di_Guo_D)但是常勝軍內部的軍紀這時已經敗壞。它協助圍攻了幾個城市后（最后一次是在1864年5月圍攻常州），戈登和李鴻章一致同意予以解散。不久倫敦也送來了同樣內容的指令。戈登愉快地接受了綠營的提督軍銜，但他仍拒絕了清帝賞賜的1萬兩紋銀。

在此期間，1862年5月收復寧波的戰績是歐洲人和該商埠一個“夷人專家”雙方主動努力的結果。寧波道臺張景渠在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占該商埠時已經乘一艘法國船只逃往定海，據說還攜帶了大量海關庫銀。他組成一支300名士兵的小部隊，命名為“綠頭勇”（后又稱常安軍）。此外，在其麾下效勞的還有布興有，此人是著名的廣東海盜，已被提為綠營游擊，并指揮著80艘海盜船和大批“廣勇”。[[40]](#_40_Jian_You_Wen____Tai_Ping_Tia)5月10日英國皇家海軍的img樂德克上校宣稱外國船只遭到太平軍炮擊，于是就指揮得到兩艘法艦支援的四艘炮艦炮擊寧波，這時這支臨時由各方拼湊而成的軍隊就已準備投入行動。大約300名英軍和70名法軍將大炮架在城根；太平軍在猛烈的炮火下撤離該城。英法軍隊和中國的勇軍進了城門，為張景渠前道臺掠奪和占領該城；張景渠也立刻向商人募集捐款，以資助進一步的中西聯合作戰。

李鴻章奉清帝之命去援助浙江北部，派了數百名華爾的常勝軍去守衛寧波。img樂德克的軍官也著手訓練“綠頭勇”，這時它終于發展成有1000名士兵的隊伍。同時一名法國海軍上尉在寧波海關稅務司日意格的幫助下組成一支中國分隊，名叫“花頭勇”，又稱常捷軍，外國人則稱他們為“法華軍”。這支部隊很快就擴充到2000人，甚至一度到3000人。[[41]](#_41_Guo_Ting_Yi____Tai_Ping_Tian)到1862年12月末，這幾支部隊在海軍少尉德克碑指揮下夾攻制酒的紹興城，并于3月15日攻克。

左宗棠感到由歐洲人帶領中國軍隊很危險，因為他擔心會造成喧賓奪主的后果。[[42]](#_42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新任寧波道臺撥出關稅款項，但只計劃供給約2000名中國士兵和150名歐洲軍官之用。與華爾和戈登的軍隊一樣，許多外國軍官以及他們帶領的中國兵主要關心的卻是在攻占一座城鎮后怎樣擄掠財物。

左宗棠還是利用西方人以及他們訓練的華人作為自己部隊的助手。1863年夏，當德克碑難以從紹興紳士那里收回某些曾經保證給他的部隊提供的巨額“債款”時，杭州的富商兼銀行家胡光墉（1825—1885年）安排他與左宗棠進行了一次會晤。胡光墉自1862年以來就當了左宗棠的買辦，為他采購給養。胡光墉所做的這一安排是為了使德克碑不丟面子，而又能按左宗棠的條件來為他效勞。雖然左宗棠最后升為閩浙總督，32歲的德克碑還不過是一名綠營副將，但左宗棠仍免他行跪拜禮而與他握手。德克碑在第二次晉見時，則“薙去了連鬢胡子，以表示他不愿當夷人”。

在攻城時，德克碑的大炮與戈登的大炮一樣，是無價之寶（特別是在1864年3月31日收復杭州前三日把城墻轟開了一個約35英尺的關鍵性缺口時更為如此）。[[43]](#_43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德克碑得到御賜的1萬兩紋銀和提督軍銜回法國，以后由日意格接替他擔任法華軍分隊的指揮，但在1864年10月，他和左宗棠都同意將它解散。

強調西方對清廷征戰的援助并不是否認曾國藩所起的主要作用。總的戰略是曾國藩籌劃的，他個人指揮的軍隊守衛著從皖北到江西諸城市組成的一條漫長的弧形地帶，這對全力圍攻南京的后勤供應體系來說是極為重要的。湘軍中如朱品隆和唐義訓等將領在曾國藩的監督和鼓勵下取得的戰績，對穩定南京前線也是必不可少的。1863年6月，鮑超這名猛將橫掃南京對面的長江北岸，占領了毗鄰九洑洲（這是天京賴以從掛著外國旗幟做生意的許多帆船那里取得供應的來源地）的江浦。當6月30日占領九洑洲時，南京與它最大供應地之間的運輸線從此被切斷了。[[44]](#_44_Jian_You_Wen____Tai_Ping_Tia)這次立即向北京報告的勝利，可能促使總理衙門在李泰國—阿思本艦隊問題上采取堅定的政策。同時，李鴻章購買的汽輪也在把大批彈藥和步槍運給曾國荃。

在1864年7月南京失守后還幸存的太平軍將領中，除了參加捻軍的賴文光外，實力最強的要數李世賢和汪海洋；后者是安徽人，當時還只有30多歲，他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參加太平軍，一直在浙江作戰。李、汪二人分別經過江西進入福建。1864年10月，李世賢占領了福建沿海的漳州，并在那里雇了16名外國人幫助訓練他的部隊使用西方武器。李鴻章奉清帝之命派了8000名淮軍在郭松林率領下前往漳州，部隊中還有英國教官訓練的步槍手。左宗棠則在福建北部設立了大本營以監視其他太平軍的動向；他指令由福建的海關稅務司法國人美理登男爵訓練的中國軍隊協助進攻漳州，該地在1865年5月中旬被收復。[[45]](#_45_Jian_You_Wen____Tai_Ping_Tia)李世賢和汪海洋這時在廣東會師，但是出現了一場不幸的內訌，李世賢在8月份在汪海洋的教唆下被暗殺。汪海洋在1866年1月1日戰死。西方的武器顯然為叛亂的結束作出了貢獻。

## 長江下游的戰后問題

### 收入的窘困和文官政府

太平天國戰爭使士大夫制度的政府經歷了一場嚴厲的考驗。即使充分利用了帝王的權威，也不能確保軍事上的勝利。后來，隨著從造反者那里收復了城市及其周圍地區，就必須把民政恢復起來。復興的問題緊接著一次次的勝利而出現了。而儒家的經世致用之道再一次要經受考驗。歸根到底，在進入戰后時期的地區，行政的首要任務是哪些事情呢？究竟哪一方面更為緊迫——是帝國政府的安定的社會秩序和財政要務呢，還是迅速恢復農村的生活？假定少數幾個政治家懷有最善良的愿望，他們是否有可能改變太平天國叛亂前地方政治的習俗和制度？

曾國藩到達南京后只有8天，就已經決定解散他指揮的全部12萬名湘軍（但不包括左宗棠的部隊）。早在1864年8月14日，大約2.5萬名曾國荃最精銳的軍隊連同其將領一并退役，可能他們已經掠奪了足夠的財富，說什么也要解甲歸田了。[[46]](#_46_Luo_Er_Gang____Xiang_Jun_Xin)剩下的12萬人分期退役，大部分在1864—1865年進行，有的在1866年退役，因為還需要這些人來守衛安徽江西地區，以防止太平軍殘余死灰復燃。

從自己解散湘軍這一點來看，曾國藩顯示出他沒有追求個人權勢的野心。他還認為，李鴻章的淮軍和左宗棠的另一部分湘軍將有足夠的力量去對付仍在帝國其他地方肆虐的叛亂。但不管怎么說，曾國藩的決定是由于以下兩個痛苦的現實造成的：他的軍隊的軍紀進一步敗壞了，同時他發現非常難于及時籌措足夠的餉金按期發給軍隊。自他擔任兩江總督及欽差大臣以來，他有權處理大量財政收入。但他的支出卻增加得更快。在1862年，對駐安徽的湘軍餉銀的發放有時拖欠8個月；而在1863年末，駐南京地區軍隊的餉銀被拖欠了16個月。[[47]](#_47___Ceng_Guo_Fan_Wei_Kan_Xin_G)同時，許多已經取得綠營的總兵或提督軍銜的統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想“肥私囊”，而更糟糕的是，他們的軍隊正在變成老百姓的禍災。鮑超麾下經常打勝仗的軍隊更是臭名遠揚。即使像不識字的朱品隆和唐義訓等曾國藩的貼身將領，也樹立了很壞的榜樣。曾國藩獲悉朱、唐二人虛報他們所轄各營兵員名額，要對他們的部隊做徹底的核查，但卻找不到一名將領愿意出頭去干這種有損友情與面子的事。此外，將領們常常爭吵不休。朱品隆與唐義訓除了放任士兵肆意掠劫城鎮的店鋪住家外，還被發現犯有曾國藩認為是不可寬恕的罪過，即甚至在面臨全軍慘敗時也不互相支援。[[48]](#_48_Luo_Er_Gang____Xiang_Jun_Xin)對這類行為的失望心情以及南京發生的屠殺，使曾國藩對是否值得保持他的官兵隊伍產生了懷疑。

曾國藩保衛從皖北到江西這條漫長戰線的行動以及他指揮的圍攻南京之戰，使他的財源非常拮據。長江流域各省許多地方的農業已經遭到破壞，唯一大量而且可靠的收入是厘金稅——內地過境稅或貨物稅（見第六章）。湘軍將領偶爾也接管了民政并設立厘卡，不過地方官員一般禁止他們這樣做。但是考慮到征稅機構的“中飽”以及各省的財政需要，即使厘金稅也不是取之不盡的財源。胡林翼在1855年當了湖北省巡撫后，為了與貪污作斗爭，也學唐代政治家劉晏（715—780年）的著名稅收制的榜樣，只用文人當厘金稅的稅吏。1860年，曾國藩決定采納同樣的政策，委任紳士來當地方厘卡的稅吏。他希望在這一社會集團中，會有“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的人。[[49]](#_49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為了吸收這種理想的管理人員，他依靠他部下中表現出有能力和有主見的幕僚做基礎。例如，曾國藩特別信任李鴻章的哥哥、一名應試中選的貢生李瀚章（1821—1899年）。李瀚章早在1854年在湖南當了一名代理縣官以后，就為曾國藩效勞。他擔任過湘軍糧臺的主要官員，曾國藩贊他為人正直、靈活，辦事一貫謹慎。1860年6月，當曾國藩上疏清廷，要求把江西全省的厘金稅撥給湘軍時，他保舉李瀚章任省內兩大厘金局之一的負責官員，同時兼任江西南部的一個道臺。

但在1862年，原江西省的一名知府沈葆楨經曾國藩保舉被任命為該省巡撫，當時沈葆楨出于責任心，認為必須把江西省的防務需要放在更優先的地位。他不愿把該省厘金稅的全部收入移交給曾國藩，也不愿把那部分折征的漕糧所得提前分配給曾。曾國藩不得不求助于清帝，希望沈葆楨能撥更多的款。江西省雖然沒有滿足曾國藩的愿望，但從1860年中至1864年中確實為湘軍提供了850萬兩紋銀，此數大致相當于這四年曾國藩直接指揮的軍隊全部上報收入數的一半（也就是說，不包括胡林翼和左宗棠指揮的以及分配在廣西和貴州兩省服役的幾支軍隊的上報收入）。[[50]](#_50_Pang_Bai_Teng____Tai_Ping_Ju)江西提供的稅款對曾國藩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上海區的大部分厘金收入主要被李鴻章用作淮軍軍費。李鴻章除定期給曾國荃運送大批彈藥外，只能從他的厘金收入中每年約抽30萬兩紋銀給曾氏兄弟。

曾國藩的厘金稅制擴大到兩江轄境以外，1860年夏，他得到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同意，在長沙成立東征局。曾國藩的一位紳士出身的老友黃冕被任命主持局務。他在1855年曾協助制定湖南省的厘金稅制。東征局當時得到湖南巡撫的批準，對鹽、茶和其他主要商品增收厘金稅五成，特別用于曾國藩部隊的需要。此事于1861年1月上報清帝，從這時到1864年中期為止，這4年多中用于該省征募新兵的費用以及撥給曾國藩作軍餉的湖南厘金稅款共達200萬兩。1862年4月，清帝批準曾國藩的請求，把廣東省的厘金系統擴大供湘軍使用。于是在廣東北部的韶關和廣州設立新的厘金局，這兩個機構的辦事人員都從曾國藩的大本營中抽任。[[51]](#_51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這種跨省的措施只是因為曾國藩得到清帝的支持才得以實現。

但是曾國藩的厘金系統必然會碰到傳統的人員培訓和根深蒂固的陋習等方面的明顯缺陷。就像大部分將領重視軍銜和財富更甚于慎獨德行那樣，少數具有理財能力的文人也被發現缺乏獻身公益的精神。雖然曾國藩繼續對黃冕和李瀚章等人的廉潔深信不疑，但在1860年中期隨著他控制的厘金系統迅速擴大，他不得不把他了解的那些才干勝于清廉的人派進厘金局。早在1861年春，曾國藩手下的厘金稅吏及其將領的貪污已惡名遠播，曾國藩自認，胡林翼兩次寫信責備過他，說他“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正之氣”。曾國藩辯解的唯一理由是戰爭形勢緊急，而他能使用的只有這些人，別無其他選擇。1862年，左宗棠寫信給曾國藩說，不幸的是，他也發現那些能實干的人格外貪婪。曾國藩答復道：“鄙意好利尚有偏裨之才。惟沒干者，決當屏斥。”他哀嘆道，“為德為才，得一已難，兩者兼全，更不數覯”。[[52]](#_52_Yin_Zi_Qian_Mu___Zhong_Guo_J)

曾國藩認為，厘金稅之所以腐敗，并非全是他下屬的過錯。因為他的助手充其極只能在地方紳士中選用比較廉明的人，這些人不僅愿意屈尊俯就，而且還有足夠的才干設法征收大量稅款。李瀚章在江西的經驗使曾國藩相信，只有地方上那種追逐私利的小紳士才對經管厘金稅卡感興趣。曾國藩斷言，“江西厘務，立法不為不密；只因各卡賢員過少，遂覺前此之成法皆虛”。盡管他信仰程朱的道德學說，但到1863年時卻無可奈何地退而承認，在教育儒家君子時，應考慮到“利”。他痛感自北宋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儒生中鮮有談“利”之風。曾國藩發現自己與南宋的實用主義者葉適（1150—1223年）的觀點是一致的，后者寫道：“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于不講。”[[53]](#_53_He_Yi_Kun____Ceng_Guo_Fan_Pi)

曾國藩與歸他管轄的三省巡撫，有責任監督地方的吏治，包括征收田賦和司法行政，并且還要在經濟和道德風尚方面醫治地方上的戰爭創傷。在皖南曾國藩進行指揮的第一個大本營所在地，他發現城鄉都遭到徹底的破壞。“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在1860年夏，他感到應“一面治軍剿賊，一面擇吏安民，二者都不可偏重”。[[54]](#_54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可是軍情非常緊急，所以曾國藩必須更加全力以赴。雖然非常需要恢復被破壞地區的經濟，但也必須盡快恢復征收田賦，這不但是為了滿足軍事需要，也是為了使北京宮廷能取得它需要的經費。對一位欽命大員來說，國計畢竟與民生一樣重要。在繳稅方式方面，不應只由肩負厘金稅重擔的商人來表示臣民的忠君愛國之心，大小地主在一旦土地有收成時也應同樣報效。此外必須采取行動來加強正統的倫理教育以及文人的道德觀。應把謚號授予為王朝殉難的義士和為貞操殉節的烈女。

曾國藩認為在地方上實施良好的吏治的關鍵也在于“賢且智者”，這與他的信仰是一致的。雖然他不像胡林翼當過府縣的親民之官，卻沒有忽視下層衙門的根深蒂固的弊病。他也深知：地方縣官常常巧立名目征收苛雜；上面的省級官員又對縣官提出各種要求。但他認為，如果使賢明當道，這些陋習是可以改變的（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事）。曾國藩對胡林翼任湖北省巡撫時的政績非常贊賞。該省在1856—1857年肅清太平軍時，胡林翼獲敕讓他自己選用代理知縣補缺，而不是由北京朝廷按常規選任知縣。胡林翼在一封信中寫道：“辦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55]](#_55___Hu_Wen_Zhong_Gong_Yi_Ji)

從1857年起，對田賦和漕 糧（折征）的征收已在湖北省大部分地區恢復。胡林翼不斷寫信給州縣官員，告誡他們要按規定稅率公平地向所有地主征稅和貫徹“寄撫字于催科”這一傳統的格言。這種貌似矛盾的說法也可自圓其說：既然稅收為國家所必需，則在征收過程中只有盡可能做到公平合理，才能保護人民的福利。清廷自18世紀以來已經制定了較輕的土地稅稅率，但是浮收在這時常較正規的賦稅重得多。有些浮收，如火耗和某些與漕糧有關的征收，是得到清帝批準的，但有許多項目則為“規費”，它們從未被正式規定，但卻是包括縣衙門在內的地方各級官府的必要收入來源。有的浮收干脆被稱為“陋規”，它們有時尚可被辯解為官方支出的必要補充，但經常成了稅吏純粹為私利而進行的一種勒索。

胡林翼特別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有足夠權勢能把衙役拒之門外的所謂“大戶”通常能免繳浮收，甚至免繳正規的賦稅。大部分田賦實際上落到了“小戶”身上，這些通常是平民身份的小地主防止額外課稅的最好辦法是賄賂胥吏衙役以換取較輕的稅額，或者去尋求紳士（他們通常為了從中獲利，包攬了小土地主賦稅和浮收的繳納）的幫助。胡林翼把小戶的苦難主要歸之于衙門胥吏差役，這些人與權勢者相勾結，但對農民卻冷酷無情，恰似禽獸之于“周圍民居所在啄食之也”。他要縣令對違法衙役嚴懲不貸，直至將他們撤職或拘禁。但胡林翼也了解“陋規”常常是上面壓力的結果，這種壓力不但來自知縣，而且來自府道。他在1857年的奏折中寫道：“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他確實下令廢除了數十種長期在許多省成為定例的小額冗費。[[56]](#_56___Hu_Wen_Zhong_Gong_Yi_Ji)但胡林翼自己承認，湖北省的許多地方繼續在搞枉法徇私的活動。

曾國藩剛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幾乎就立刻物色能代署知縣的賢員，以便在安徽樹立清廉的榜樣。他請他的朋友們擇才，“唯須得極清廉極賢之州縣一二人，來此樹之風聲”。他因公務繁忙，無暇親自過問，就把選用皖南代理官員之事交由有舉人功名的學者和湘軍統領李元度去辦。他告誡李元度說，“與民更始，庶幾漸有轉機”。曾國藩在安徽巡撫翁同書的勉強合作下，還想更換皖北的大部分官員。他寫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縣，一一皆請公以夾袋中人才換之，俟當附片奏之。”鑒于還有戰爭的緊急任務，看來在曾國藩自己的幕府中被認為適合當地方官或可調任地方官的人為數甚少。

曾國藩顯然堅持他的“人存而后政舉”的信仰。[[57]](#_57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然而要舉者是何政？曾國藩似乎把重振儒家守則放在比復興經濟更優先的地位。他在1860年7月署理總督時就向兩江各省的官員和文人頒發文告，敦促官員要克勤克儉，并請紳士保舉有才之士為政府效勞。他強調地方官員的緊急任務是提供救濟，但不是給予農村居民，而是給落魄紳士和文人的家庭，特別是給予那些其家屬因戰爭死亡的人。曾國藩任總督后的第一個行動實際上就是設立忠義局。他請官員和文人向局提供殉國者的事跡，加以核實后上報清帝，以便能獲準立碑和祠祀。

曾國藩在1861年9月收復安慶后，確實與紳士們一起主辦過濟貧事業，給充斥在街頭的難民施舍錢糧。但同時又在附近確有收成的農村每畝地征錢400文，以應付緊急的軍需。他還優先重新開辦敬敷書院，這是為應鄉試的士子在安慶設立的學術機構。[[58]](#_58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

曾國藩這時向三種人發出一系列懇摯的勸誡，他們是州縣官員、委員（曾國藩稱之為“向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和紳士。[[59]](#_59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官員們應“以重農為第一要務”，這不僅是因為農民受害最深，更因為“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天下無了日矣”。地方官員應盡量減輕農民賦稅，減少徭役，幫助治水，甚至幫貧苦農民購買牲畜。州縣官應儉樸不肥家私；他們應停止向上司送禮，這樣就不需要再征收某些浮收了。州縣官應迅速公正地解決訴訟，不惜嚴懲“惡人”。他寫道，這是“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也”。但曾國藩沒有強調也要嚴懲衙門胥吏差役。他在談到他們時，只說州縣官自己應該“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以為其部屬樹立榜樣。

曾國藩對紳士，特別對那些組織地方團練并在開征維持它們的捐稅中從中漁利的人，責難最為嚴厲。雖然湘軍在早期已經吸收了一些團練，但他對它們是否有用則非常懷疑。他在1861年寫道：“弟在軍數年，一無所解，唯堅不信團練。聞人言團練大捷破賊者，則掩口而笑，掩耳而走耳。”他這時警告紳士，不論誰利用團練局向“愚懦”榨取錢財，將嚴懲不貸，“雖巨紳也屬可誅”。在當時的一封信中，曾國藩含糊地提出，“古來保甲之法”足以維持地方的治安。但沒有詳細談到怎樣恢復此法。[[60]](#_60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

雖然曾國藩了解中國農村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但因顯然全神貫注于軍事和財政問題，無力再兼顧吏治。他對“成法”堅信不疑。他希望任地方官的正人能“隨事納之準繩，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但他對他治下的新任州縣感到失望。他在1862年初寫信給安徽巡撫李續宜時承認，他選用的州縣官員“皆不愜物望”，而李巡撫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稱意之選”。曾國藩這時感到選用地方官的標準應予放寬：“中材”對事也許無大妨礙。他又準備了另一份候補官員的名單，要李續宜與他一起向清帝保舉，以接替一些在職官員。但新名單證明同樣令人失望。1863年夏初他向郭嵩 燾 承認，自他任總督以來，“吏治毫無起色，可愧之至”。他又告訴郭嵩燾，他已上疏要求16名新獲進士功名的人為江西的州縣官員。[[61]](#_61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顯然他又恢復了傳統的觀點，認為那些通過最高級科舉考試的人可能會成為最優秀的地方官。

### 農業稅的恢復

雖然曾國藩力圖繼續相信賢人的影響，但他偶爾也考慮到制度調整之事，即在受戰爭創傷的省份恢復征收田賦的同時，減收課稅和浮收。幸虧有佃農和自耕農等黎民的勤勞，所以有一些地方的農業恢復得比預料的要快。官紳進行了一定的幫助；已經知道他們分配過家具和紡織工具，甚至鼓勵從其他省份移民到被破壞的土地上重新安家。曾國藩估計，江西1862年的秋收可能達到正常年景的七成，而在安徽，大約不到五成。[[62]](#_62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清帝一般會批準一名總督如下的意見：在新收復區至少在一年內全部或部分免征田賦和漕糧。但北京要立刻在長江流域諸省恢復征收漕糧。雖然用船沿運河北運漕糧證實已行不通了，但朝廷希望至少把應繳的稻米折錢征收，以便在上海購米海運至天津。征收漕糧的需要自隋朝（589—618年）以來早有先例，可是因長江下游諸省本身緊急的軍事需要而受到了挑戰。不可能全部放棄征收農業稅。但對太平天國以前若干年的抗租暴動所留存的記憶，以及太平軍在一些地方的田賦問題上采取的開明態度，都表明必須減輕農民的負擔。[[63]](#_63_Xia_Ding____Tai_Ping_Tian_Gu)

在1855年至1863年期間，長江各省的官員對田賦問題考慮采取三種辦法。（1）由于農業稅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根據法定稅率征收的田賦和漕糧，而是所加的浮收，所以要減輕賦稅必然要涉及削減這些不合規定的浮收。北京預期收到的那部分賦稅不會受到影響，因為浮收除了少數事例外都由省的或地方的政府使用，并由地方官員及其下屬得益。（2）必須禁止區別對待大戶和小戶這種長期以來視為慣例但仍是不合法的偏袒，這不僅是為了公平，而且也為了安撫大部分納稅人。（3）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這兩處較小的地區深受戰爭之害，但每年負擔的漕糧份額卻特別重。自道光以來，這兩個地區的稅額實際上只上繳了一部分，清帝也不得不年復一年地批準免征。所以大量減輕這兩個地區分擔的稅額不會使北京真正受到損失。

省級官員按照這三種辦法主動采取了行動。在湖南，經左宗棠建議，巡撫駱秉章早在1855年初秋決定對田賦和“折征漕糧”作新的估算。新稅率各縣不同，是經過知縣和推選的地方紳士共同商定的。新統一規定的田賦稅率加上浮收約比原來總稅率低二成，而折征漕糧加上浮收不到原來的五成。為了能夠減低稅率，駱巡撫取消了許多歸地方各級官員所有的津貼。他還要縣令與德高望重的紳士討論節制包攬（即包征）之法。“許地方公正曉事士紳條陳積弊，設局稽查。”衙門的吏役以及衿棍從此不得包攬完納。[[64]](#_64_Luo_Bing_Zhang____Luo_Wen_Zh)從1855年起的幾年中，湖南每年征收田賦和漕糧的總收入（包括浮收在內），與戰前相較，據推測減少了四分之一。幸虧有了厘金稅，該省仍能支援曾國藩進行戰爭。

胡林翼在1857年秋季著手搞減稅，作為他整頓湖北省的活動的一部分。由于戰爭和洪水造成的破壞，他要求讓一批縣暫時免除田賦和漕糧的份額。但對33個應照常征繳漕糧的縣，他爭取清帝的批準進行一次大改革——大量削減極重的浮收和取消名義上有數十種他稱之為“浮費”的收入。這里面包括過去巡撫本人、布政使、督糧道以及府道都享受的津貼。他還認為，只有官僚機關和基層機關的弊病得到糾正，“刁紳劣監”才不會再要求分潤從包攬完納中取得的好處。這些無恥的權貴也真能以揭發縣衙腐敗為手段來進行威脅，從而迫使知縣及其下級默認他們包攬賦稅的做法。在太平軍叛亂之前，湖北省大戶用米繳納漕糧，小戶則按過高而不合理的米折銀和錢折銀的折算率繳現錢。現在所有的戶都按照以錢計算的統一稅率用現錢來繳納，但胡林翼卻不得不依靠知縣們來約束吏役以使新稅率真正得到貫徹。湖北省的督糧道及其助手到各個縣，先與知縣和地方“紳耆”協商，把每地米價和銀—錢折換率以及州縣衙門的財政需要等因素考慮在內，才能決定一項新的當地劃一稅率。大部分縣每擔米應繳的新稅率在銅錢四五千文之間，而在以前，各種稅款合計有時高達1.2萬甚至2萬文。

胡林翼完全相信這種“中飽”之款可以為政府所有或留在百姓手中。[[65]](#_65___Hu_Wen_Zhong_Gong_Yi_Ji)他有時采取有力措施來推行新規定。在1858年初，他解除了一名容許征收浮收的知州的職務。但看來他更多的只是嚴詞訓誡地方官員，要他們保持警惕和嚴懲違法的吏役。他說過一段有代表性的話：“州縣親民之官，一吏胥之不能制，即不免于率獸以食人，尚何能與民眾分憂耶？”在此期間，湖北的許多地方恢復了正規的田賦。胡林翼之信寫于他在1861年9月末死去之前不久，這說明“陋規”仍在該省地方行政中盛行。[[66]](#_66___Hu_Wen_Zhong_Gong_Yi_Ji)

1860年后期，曾國藩向江西當局建議，田賦和折征漕糧都應當在次年恢復。代理布政使李桓因此開始與地方官員協商；1861年9月，他起草的章程被曾國藩批準。該省與湖南湖北一樣，許多上級向縣攤派的費用都被取消了；但全省的田賦和漕糧卻被訂成統一的新劃一稅率，這又是與湖南湖北不同的。當曾國藩寫信給李桓和江西巡撫時正對胡林翼之死深為悲痛，他似乎已決定在江西省進行田賦改革。他希望新稅率會在百姓之間產生新的印象，從而使他們能“踴躍輸捐”。但他擔心由于這項計劃“不利于官”，官府會多方加以阻撓。他決心要彈劾那些“違抗新章”的州縣官員。[[67]](#_67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

雖然曾國藩作出這種告誡以紀念胡林翼，但江西省地方官員德才俱劣，所以他懷疑浮收是否真能大量削減。但在1862年，當為人非常謹慎負責的江西知縣丁日昌提出了減輕地方官員負擔的具體措施以答復曾國藩的問題時，曾十分高興。他與新任巡撫沈葆楨聯名上疏并得到清帝的批準，取消江西州縣虧空的高達二百余萬兩的巨額應繳稅款（此款的大部分事實上在出現虧空時每年已由江西省府向北京墊交）。曾國藩和沈葆楨還為該省在1861年遭太平軍侵襲的地區爭取到了削減田賦和漕糧的負擔。

盡管這些措施能使江西的知縣們辦事更加方便，但曾國藩發現在以后兩年中他們的負擔并未大大減輕，其中有些人為了完成任務還陷入困境。這部分是由于白銀貶值，而在1864年的規定中改銅錢為征稅單位前，白銀是江西省征收農業稅的法定通貨。1863年6月，曾國藩在描述江西局勢時說：“州縣之入款頓絀，而出款則不少減。牧令深以為不便，而紳民于大減之后仍爾催征不前。”[[68]](#_68_Wang_Ding_An____Qiu_Que_Zhai)1863年期間湘軍軍費增加，此事使曾國藩越加后悔不該把江西省田賦稅率定得偏低。

這時曾國藩考慮的一個重大問題是關于減少江蘇省漕糧份額（還有法定稅率）以及把一個浮收份額特重地區的負擔予以減輕的建議。他支持這個主張，不過鑒于最近江西省稅制改革的經驗，他對諸如浮收等有關問題仍然猶豫不決。

當淮軍在1863年春季已經鞏固了松江區并迫近太倉時，對許多達官顯紳來說，早就需要進行的財政改革的可能已經在望了。自從明初以來，蘇松太道分擔帝國漕糧數量之大很不成比例。這里面積約4000平方英里，在19世紀50年代人口大致為1000萬，分布于31個縣，它得天獨厚，盛產米棉，雖然它每年米的收成很可能超不過湖北湖南兩省中的同類地區。但在19世紀初期，根據漕糧稅制，蘇松太被規定要提供年征大米總數的32.7%，即全國法定總數520萬擔中的170萬擔。[[69]](#_69_Xin_Dun____Zhong_Guo_De_Cao)這種不正常的狀況是由于從南宋到明代這段時期中不幸的歷史發展變化造成的——向在國有土地上耕種的佃戶征收的租，在土地轉到私人手中時轉變成稅；明代開國皇帝根據租率向江南幾個府開征實物稅，但遭到那里激烈的頑抗。雖然向蘇松太開征以白銀繳納的稅在清初已經稍減，但漕糧份額的嚴重不公平的現象從沒有改正；它們的負擔至少是近鄰常州府的3倍，而后者也盛產大米，并且同樣靠近運河。從明代到清初，蘇松太道規定的漕糧份額甚至很少繳足一部分。只是從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20年代當長江流域特別繁榮時，它應繳的漕糧才相當及時地全部上繳了。但自從1833年的大水災和大饑荒以來，江蘇省不得不以天災和歉收為由，每年請求清帝部分豁免負擔的漕糧。

很明顯，到19世紀中期，這種稅制不能再長期推行了。這時，蘇松太道已成戰爭的關鍵地區，最后說服北京改變這種不現實的稅額的時機到來了。早在1863年2月，松江知府方傳書要求李鴻章奏請大量削減蘇松太的稅額。[[70]](#_70___Jiang_Su_Jian_Fu_Quan_An)蘇州人馮桂芬在1862年4月就進了李鴻章的幕府并且長期以來主張改革蘇松太的財政，他實際上一直就此事在給李鴻章出主意。減低過高的賦額顯然是可取的。各方許多人都表示支持。1863年6月，北京的兩名官員在同一星期奏請減賦，但回避了與漕糧一起開征的浮收（合法的和不合法的）這一有分歧的問題。這兩人就是潘祖蔭和丁壽昌，前者是蘇州人，任光祿寺卿，其祖父當過軍機大臣；后者是蘇北人，任御史之職。同時曾國藩和李鴻章就蘇松太負擔的份額問題于6月27日聯名上疏。新任江蘇省督糧道的郭嵩燾以及該省巡撫李鴻章本人都推測，清帝可能在太倉和蘇州尚待收復和需要民眾支持之時批準減賦，而不會拖到戰后的將來。

但在上海進行的討論實際上超出了負擔份額的問題。馮桂芬和郭嵩燾曾請教過的前蘇州知府吳云也強調同時減收浮收的必要性。浮收項目在蘇松太地區為數極多，其中既有為“耗米”和漕運征收的合法浮收，也有一些違法項目，它們或入衙門吏役（這些人負責征收漕米及其折征的現錢）之手，或入倉吏、船戶或旗丁等人的私囊。在大戶中較正派的人最多只繳納規定的浮收，那些狡猾的大戶則與衙役串通，使其地“注荒”而逃避一切完納（甚至連漕糧也不繳）。“以江蘇大戶之眾多，其力足以陵壓州縣，州縣不敢校也。一切浮費皆取給于小戶。”[[71]](#_71_Yin_Zi_Guo_Ting_Yi_Deng_Bian)

馮桂芬和吳云生動地描述了小戶的苦難。有些小戶認為明智之舉是向包攬稅賦的人——如衙役或“刁生劣監”——行賄，這些人能把小戶重新劃分為大戶，使他們免繳賦稅。“于是大戶日益增，小戶之困日益甚。”而孤立無援的農民土地所有者則倍蓰加算沉重的浮收，并以折磨和拷打迫使他們繳納。有人棄地外逃，有人則可能聚眾抗稅。

吳云和馮桂芬都認為這種局勢不能容忍，至于怎樣補救，兩人則不一其說。吳云認為，規定的沉重份額一旦被減輕，一切就會順利。在戰后的恢復時期，“每邑延請公正紳士出為襄理，官紳合力，可期弊絕風清”。換句話說，他希望派地方上流紳士中較正派的人來抵消“巨室土豪”和衙門吏役的影響。

馮桂芬則堅持，衙門吏役在浮收中有著巨大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們必然要進行勒索。他認為，實際從漕糧中貪污的所得，絕大部分落到了他們之手，其數十倍于州縣官員，三倍至五倍于地方紳士。他還堅持，只有清帝批準的浮收才應予保留；而如果漕米改由海運，連這些浮收也可以減輕。[[72]](#_72_Wu_Yun____Liang_Lei_Xuan_Chi)他為李鴻章和曾國藩起草的奏議的第一稿，強調了一切非法浮收應予取消，“大小戶名目”應予禁止。馮稿從李鴻章轉到曾國藩那里，但郭嵩燾私下警告曾總督說，要完全平均征稅可能是不切實際的。他很現實地承認了衙門吏役的實際存在，而清朝的官僚機器也正是靠了這些人的歪門邪道才得以維系于不墜。“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今將立法制，垂久遠，而必取州縣之吏，束縛之，困苦之，亦非與民求安之道也。”[[73]](#_73_Guo_Ting_Yi_Bian____Guo_Song)

曾國藩很快把郭嵩燾和馮桂芬二人的觀點加以折中，主張把主要力量放在減輕規定的賦額方面。曾國藩也持郭嵩燾的現實態度。他在6月2日復信郭嵩燾時提到了江西的經驗，那里由于大量減征浮收，致使“州縣窮苦異常，而民仍征輸不前”。經驗迫使曾國藩實際上放棄了桐城學派的基本信仰（即適當的領導和學者的努力可以移風易俗）。他這時承認，吏治中的一些傾向確實已不能糾正。他說：“大抵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辦事貴在因俗而立制。所謂‘除去泰甚’者耳。”[[74]](#_74_Tong_Shang_Shu__Di_247__248Y)曾國藩感到馮桂芬的奏稿“陳義過多”，其中建議裁減浮收一節“斷不可遽奏”。他勸李鴻章，即使蘇松太地區的浮收在將來得到核減，“浮收竟可不必入奏，不必出示”。他還建議各縣征收浮收可按該縣風俗人情而為之制。“大戶名目可革則革，辦法不必一律，減法不必一價，但使小戶實有所減而已。”[[75]](#_75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

曾國藩的這些折中說明了聯名奏議的最后內容。奏議的唯一提議是把蘇松太道的“浮賦”減到該道在19世紀50年代實際繳納漕米數量較大的七年的平均數字，即定額的一半左右。據說，核減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醫治松江和太倉的戰爭創傷和鼓勵民眾支持清廷即將進攻蘇州之戰。顯然出于馮桂芬的勸告，李鴻章決定在聯名奏議后加一“附片”，建議如果裁核蘇松太的賦額，還應“裁減陋規為禁止浮收之委”，同時還要“革除大小戶名目”。李鴻章與曾國藩還有不同之點，他建議設局來為蘇松太的漕糧定出適當的浮收額，由“紳衿平民一律完納”。[[76]](#_76___Li_Wen_Zhong_Gong_Quan_Ji)

使許多人驚奇的是，清帝分別在7月9日和18日兩道上諭中迅即批復。第一諭表達了對蘇松太納稅人的同情，下令永遠革除大小戶名目，并命曾、李二人考慮取消浮收、陋規和包戶的措施。第二諭是根據戶部對丁壽昌御史的答復作出的，它原則上同意（細則尚待擬訂）把蘇松太的漕糧份額在原來規定征收額基礎上減少三分之一，同意負擔份額較輕的常州和鎮江兩個府減少十分之一。把核減浙江省三個府過重的漕糧負擔之事交左宗棠辦理。清帝重申了他經常反復提起的格言，即財政政策應“上顧國家之本計，下憫百姓之余生”。[[77]](#_77___Jiang_Su_Jian_Fu_Quan_An)

不幸的是，進一步的斟酌引起了爭論，因而并沒有產生真正的改革。為蘇松太減賦而設立的局于1863年8月在上海成立，馮桂芬任委員。但江蘇省布政使兼該局的當然負責人劉郇膏卻反對徹底檢查戰前的稅制。劉郇膏是河南人，得過進士，曾在19世紀50年代連任蘇松太道三個縣的知縣，熟悉當地情況。他和馮桂芬都認為減賦三分之一為數太少。馮桂芬勸李鴻章再上奏本，要求把原來的漕糧份額再減一成。但劉郇膏出于某種原因，強烈地堅持應把以白銀繳納的規定的田賦減二成或二成五為宜。他雖然也要求減稅，但念念不忘的是減稅在衙門胥吏中是否行得通的問題。他堅持要保留官府簿冊上登記的五十多種土地的等級，簿冊上每種土地各載有一種稅率。馮、劉二人對浮收問題也有分歧。馮桂芬堅持，通過海船運輸的漕米數量必然越來越多。海運比腐敗的運河運輸的費用要低得多。當劉郇膏明顯地考慮到蘇松太州縣官員的利益而提議增加1000文“運輸津貼”的浮收和1000文“雜費”時，馮桂芬大為憤怒。他與幾個紳士朋友強烈地抗議，因為他們擔心劉郇膏會把增收這些浮收的內容塞進曾國藩和李鴻章準備上呈的第二個奏議之中，從而抵消了減賦的好處。馮桂芬本人從未為維護縣的定制而提議過任何規定。他直率地引用過一句古代的格言：“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之何？”[[78]](#_78___Xian_Zhi_Tang_Ji____Juan_4)

馮桂芬的建議得到蘇松太區一些知名紳士的支持，這些人都擁有大量的地產。由于地主要依靠他們佃戶的勞動，所以像潘曾瑋（1819—1886年，道光時期軍機大臣潘世恩的幼子）那樣的隱退官員并不一定同情為了微利與衙役又傾軋又勾結的小紳士。此外，在馮桂芬與潘曾瑋那樣有名望的紳士和幾十萬屬于蘇松太小戶的自耕農兩者的經濟利益之間，并沒有必然的沖突。[[79]](#_79_Wu_Yun____Liang_Lei_Xuan_Chi)

李鴻章以他一貫的實用主義態度，對馮、劉二人的觀點兼收并蓄。最遲到1863年12月當他的衙門搬到已被收復的蘇州時，他要馮桂芬起草第二份準備與曾國藩聯名的奏議。此奏遭到當時任布政使的劉郇膏的嚴厲批評，但曾國藩并不是一點也不同情馮桂芬的。[[80]](#_80___Li_Wen_Zhong_Gong_Quan_Ji)劉郇膏受命重新起草，但他到1865年6月9日才送上來，這時曾國藩已經赴山東剿捻去了。

在此期間減賦之事無獨有偶。負擔漕米份額分外沉重的第二個地區是浙江省富饒的杭嘉湖道。這里有著與蘇松太同樣的歷史背景（原來的租率都已經改為稅率），它負擔的漕糧份額在19世紀初也高達110萬擔。但早在1823年以來，幾乎每年都要豁免一部分份額。與蘇松太一樣，有權勢的地方也搞“注荒”，地方官除了向小戶加征浮收以彌補大戶逃避的完納外，別無他法。沉重的浮收中包括運輸費（1852年后浙江漕米開始通過海路運往北京時，已被核減）。自耕農有時在所謂“包戶”的幫助下、也取得大戶的名分，這與蘇松太的情況一樣。[[81]](#_81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

在1863年大部分時期中，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左宗棠設大本營于嚴州，向杭州的進攻進展緩慢，所以杭州到1864年3月31日才被收復。10天之前，李鴻章的部隊已經收復嘉興，但湖州到1864年8月才攻取，那是南京失守后一個多月的事了。對清廷答應核減杭嘉湖漕糧份額之舉，左宗棠的第一個答復頗有卓見地說明了漕糧為什么像蘇松太那樣已成為民眾暴亂的常見的原因。自耕農在應繳的每擔漕米外，通常至少還要另繳八九斗。他說：“竭小民終歲之力，徒為胥吏中飽、衿棍分肥之資。”[[82]](#_82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

1864年11月，左宗棠報告了關于他設立一個制定章程的局所擬定的新漕糧之事。他指望把規定的份額減少1/3。每畝地的稅率也作相應的調整。這項工作較蘇松太所進行的要簡單得多，因為只需把土地分成九等。左宗棠還打算解決浮收問題。他知道地方政府的開支必須有來源，所以提出了一種規定的浮收，名叫“運費”。這項運費是在清帝批準的漕米浮收之外以運輸名目另外征收。左宗棠暗示，縣令可以視情況需要使用附加的“運費”收入，不用說明用途。但他規定的“運費”不高，對每擔應繳的漕米只收八文，這比19世紀50年代向杭嘉湖征收的海運特別費用多四文半錢。[[83]](#_83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與馮桂芬的意見不同，左宗棠不認為他征收的“運費”會引起更強烈的貪婪。他認為制度應“因俗”制宜，這點與曾國藩是一致的。結果，戶部提出減賦8/30，此議在1865年5月被清帝批準。在杭嘉湖恢復征收糟糧的工作落到了新任浙撫馬新貽身上。負責征稅的局擬訂的稅率表比左宗棠設想的要高，從1865年秋季開始按新稅制征稅。[[84]](#_84_Xia_Ding____Tai_Ping_Tian_Gu)

同時，關于蘇松太漕糧的爭論仍在蘇州繼續進行。該城最有影響的紳士學者可能是潘曾緯，他力圖說服布政使劉郇膏接受馮桂芬的觀點，但沒有效果。在北京當官的蘇州府吳江人殷兆鏞在1865年5月中旬曾上疏，列舉江蘇省稅制的弊病，其中不但攻擊了李鴻章嚴厲的厘金稅賦，而且還攻擊了似乎與田賦一起恢復的沉重的浮收。[[85]](#_85___Xian_Zhi_Tang_Ji____Juan_4)

曾國藩和李鴻章1865年6月9日的第二次奏章，要求把蘇松太以及常州府和鎮江府的規定田賦核減二成。它還提出應把上述地點的漕項核減二成；漕項是經過清帝批準的浮收，它征收白銀，并且是以運輸漕米的名目開征的。一份附片報告說，在過去一年當蘇松太根據臨時稅制恢復征收田賦時，凡是“火耗”浮收都已被核減一半。對大小戶也不再作區分，并且今后不管是官是紳，凡再進行包稅者，都將受嚴厲懲處。[[86]](#_86___Li_Wen_Zhong_Gong_Quan_Ji)

曾國藩和李鴻章的第二次奏議可不像他們前一次的要求，它直截了當地被戶部拒絕。1865年8月的一道上諭宣稱，由于運輸漕米需要漕項，核減這項收入只會引起地方征收數目不等的“津貼”。[[87]](#_87___Jiang_Su_Jian_Fu_Quan_An)隨著太平軍的消滅，朝廷不打算在農業賦稅方面讓步了。

李鴻章的所謂腐敗的厘金稅制被殷兆鏞激烈攻擊，特別使李對他的理財名聲不安。作為兩江代理總督，他通過江蘇代理巡撫劉郇膏在蘇松太地區核減了諸如火耗、耗米和銀錢折換差額等浮收。但在1866年當李鴻章離開南京去征剿捻軍以后，劉郇膏指令，按照新稅率對蘇松太自耕農應繳的每擔漕米增收800文浮收。[[88]](#_88___Xian_Zhi_Tang_Ji____Juan_4)這等于恢復已經取消的額外負擔。代理巡撫做的事也許是勢在必行的，因為他不管出于合法或非法的目的，必須去彌補那些已被取消但又需要用來維持地方官府的陋規。此外，曾國藩和李鴻章的第二次奏議已被駁回，蘇松太的正規稅額依然過于沉重。隨著長江地區的安全有了保證，朝廷不大愿意在那里進行田賦改革了。

## 捻軍戰爭及其影響

### 捻軍對華北的沖擊

雖然太平軍的失敗給長江流域帶來了安全，但另一叛亂集團捻軍的力量卻在逐漸壯大，它使華北本身面臨巨大的威脅。清廷對捻軍之戰分兩個階段，每個階段所投下的鎮壓力量之大都不亞于對太平軍的征剿。第一階段包括到1863年初的10年，在此期間，捻軍取得了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塊農村根據地，并在那里站穩了腳跟。在這十年，捻軍襲擊了鄰近各省，從而大規模地觸發了各地的叛亂。在捻軍戰爭的第二階段，一支經過擴充并且戰術越來越精的捻軍騎兵從1864—1868年在整個華北平原發動了一場廣泛的戰爭。捻軍問題越來越嚴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勢。

在19世紀50年代中葉，捻軍已有約30名首領（其中許多人是私鹽販子），這些人率領的相當龐大的部隊，主要是從自己的宗族或農村老家組織起來的（見第六章）。大部分領袖似乎是來自20世紀稱之為“中農”的家庭。只有很少不重要的捻子擁有較低的功名。這些流竄的部隊使用了土炮和簡單的火器，所以抵擋地方小股綠營軍的能力就更強了。有些州縣官員甚至出錢送他們離開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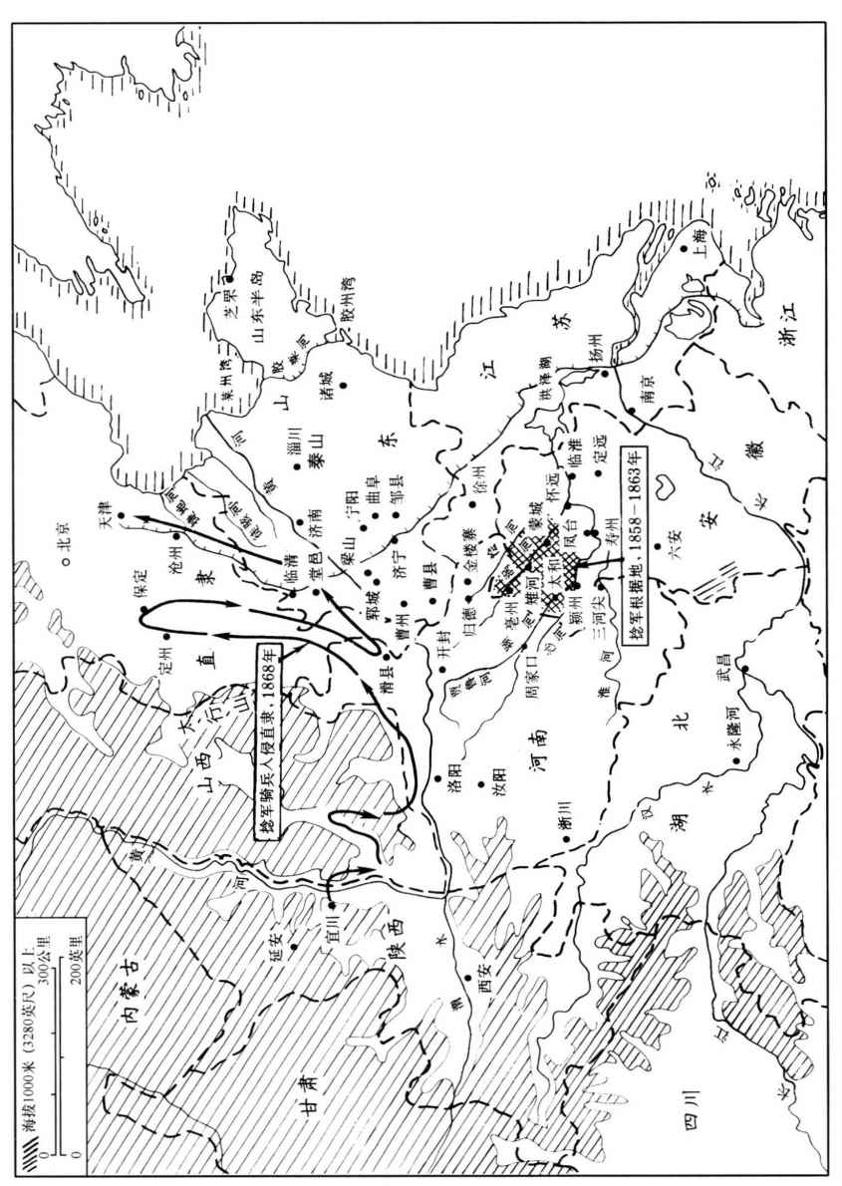
捻軍自以為他們是仁義之師。1855年夏末，“盟主”張樂行（1811—1863年）在雉河的集市上張貼告示，尤其攻擊當地府縣為錢財而把百姓刑訊致死，說他們“以刀鋸而代撲責，用賄賂而判生死”。被保存下來的為數很少的19世紀50年代的捻軍文獻表明，他們并不仇視滿洲人，也不仇視白蓮教主張的千年至福說。捻軍自視為“義軍”，而義軍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軍紀而不是靠神的力量，來致社會于安寧——“救我殘黎，除奸誅暴”。[[89]](#_89_Jiang_Di____Chu_Qi_Nian_Jun)傳統的中國價值標準遭到象征性的和實際行動的攻擊。在產生許多捻軍領袖的毫州和蒙城地區，清朝官員發現自明代以來就存在的一些廟宇近來被大事修繕，廟內只供奉盜跖（春秋時期的著名盜寇，中國文獻稱他為“舉世大盜”），因而大為震驚。但捻軍軍紀都禁止擅自掠奪村莊和強奸婦女，犯者處死。許多領袖顯然都擁護“劫富濟貧”這句傳統的綠林口號。[[90]](#_90_Yuan_Jia_San____Duan_Min_Gon)此外，人們都盛傳，許多下層捻軍頭子寧死不愿出賣戰友，甚至犧牲父母子女也在所不惜。當時在安徽指揮戰爭的儒將袁甲三（1806—1863年）見到捻軍視死如歸的情景感到驚愕。他說：“每遇行刑，談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并不戀骨肉之情。”他的兒子袁保恒寫道，捻軍“以重然諾輕生死為義”。[[91]](#_91_Yuan_Jia_San____Duan_Min_Gon)這種有骨氣的態度所表現的力量，無疑是捻軍能吸引那么多老百姓的原因。

他們在1855年后能成功地控制著安徽西北那么多村社，這必須歸因于清帝國鼓勵團練自衛組織在華北采用的出人意料的形式。在廣東、湖南或江西省，上層紳士常主動組織團練和勇，但在皖北、河南、山東和直隸等省則不同，顯貴士紳很少真正愿意親自采取這樣的措施。很明顯，異端的白蓮教傳統在華北農民中的影響，比三合會在廣東或湖南農民中的影響要廣泛得多。農村的動亂非常普遍，所以擁有大量家財的顯貴士紳都不愿把武裝和不可靠的人安置在周圍。華北的大紳士非常愿意住在城市，在城里興辦城團或練勇。[[92]](#_92_Deng_Yong_Kang____1853__1863)

由于淮河以北的平地稻田甚少，只從事旱地耕作，農村或市鎮最宜于建立周圍有溝壕的圩或寨來保護自己免遭騎兵的襲擾。圍墻很結實（一般只高七八英尺），可以用磚加固，上有土炮的炮眼。除非放下吊橋，否則不易越過約15英尺的深溝。圩寨內部權力往往集中在團練首領之手，他們通常是大宗族的成員，但其身份甚至不一定是小紳士。一個圩寨團練領袖的稱號為團總或團長，而指揮一批團練的將領被稱為練總。當時一名有見地的作者曾這樣描述典型的皖北村社：“擇諸少年豪俠習技擊，而以一人總其事，謂之練總，每秋熟時，練總率隊刈獲，與田主中分之，田主不能私有其產。”[[93]](#_93_Wang_Ding_An____Qiu_Que_Zhai)團練頭子的這些行為在某些方面與捻軍的頭目相似。

皖北的清軍將領發現農村的團練并不是補充人力的方便來源，這并不令人奇怪。他們組織的大部分團勇都是城市貧民，這些人中間的異端影響并不是根深蒂固的。在1854年，河南的乙未進士和深受曾國藩器重的好友袁甲三打算在皖北搬用曾國藩在湖南的作為，即吸收農村人力組成一支新的帝國軍隊。他從農村民團中選人，組成各有700人的五個營，每營各有自己的響亮的名稱：“忠仁”、“忠義”、“忠禮”、“忠智”和“忠信”。但這五個營在蒙城附近第一次征剿捻軍時遭到慘敗。袁甲三不得不把這支3500人的軍隊“暫時解甲歸田”。此后，他主要依靠由清帝調歸他指揮的綠營軍以及察哈爾和滿洲的少數騎兵。[[94]](#_94_Yuan_Jia_San____Duan_Min_Gon)

1856—1859年的三年中，捻軍鞏固了淮河支流澮河和沙河之間的地區、清軍只能守住毫州、蒙城及太和三個主要城市，捻軍農村根據地約4000平方英里。村長都放棄了以前的民團官銜，改稱“圩主”。捻軍在自己的組織內稱村社領袖為“堂主”，軍事頭目為“旗主”。看來他們并沒有多層的等級政治。只是在堂主和旗主的稱號前冠以“大”或“小”字，來主要表示所掌握權力的大小。[[95]](#_95_Shang_Ren_Zhi_Zi_Liu_Tang_Du)捻軍“旗主”定期召集親捻軍的村社領袖開會。各人要保證本村社為征討提供人馬。征戰的全部繳獲在事后進行分配，捻軍頭目得其中的大部分（有人說取其一半），剩下的分配給每人一份，每匹馬得兩份。然后為“裝旗”而聚集歡宴。聚會時設臺演戲，擺宴慶功，接著可能又去進行冒險活動。



地圖15 捻軍戰爭和有關的起義（1855—1868年）

研究1863年以前捻軍的最嚴謹的史學家江地認為，捻軍領袖各自為戰，這反映了這個運動內在的不團結現象。各大首領都選擇具體地區進行冒險活動。張樂行盡管稱為“盟主”，但只能控制極少數頭目，而且在1856—1862年這六年中他寧愿留在捻軍根據地以外；我們只知道，他僅在1858年回老家逗留過短暫時期。

張樂行不但希望奪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夠做到這點，像這樣的人在捻軍領袖中為數甚少。他之能攻善守，也許可以從下面這件事得到說明：他與龔得（傳奇式的捻軍領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卻是卓越的戰略家）選擇了與具有圍城戰豐富經驗的太平軍結盟的道路。張樂行自己的部隊在1857年3月1日設法奪取了淮河的要沖三河尖。此時正在為鞏固自己在長江以北的地盤而斗爭的太平軍將領李秀成和陳玉成立即訪問了他。張、龔二人為太平軍守衛淮河以南約50英里的六安達九個月之久。但在1858年中，張樂行及其盟軍在太平軍的幫助下，奪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懷遠以及洪澤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鎮（它們控制著來回于蘇北和安徽之間的私鹽販子必經的水道）。張樂行可能在1858年至1860年初期控制這個地區的時期發了大財。他從太平軍那里取得“征北主將”的稱號，不過他似乎到1861年才得到“沃王”爵位，這時他仍占有淮河的一個主要城市定遠。張樂行從皖北保護了南京的外圍，對太平軍來說其貢獻是非常寶貴的，雖然太平軍仍公開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貢獻。李秀成在1864年的“自述”中抱怨張樂行“聽封而不能聽調用”。[[96]](#_96_Jiang_Di____Chu_Qi_Nian_Jun)

雖然捻軍只在一定程度上與太平軍合作，卻在地方團練領袖中樹立了反清叛逆行為的榜樣。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紳士和惡棍苗沛霖的事例了，此人在1863年死去前，終于在淮河中部地區指揮了一支甚至比捻軍還強大的叛軍。苗沛霖是捻軍根據地正南的鳳臺的一名生員，在1856年嶄露頭角而成為該地的“聯總”，并且很快爭得了向城內及其周圍地區征稅（包括田賦和厘金）的大權。他在清廷和捻軍之間采取了騎墻姿態，擁有足以威脅利誘許多圩主與他結盟的財富和力量。他派人在各要地成立“團練局”。他像捻軍一樣，對支持他的軍隊標以各色旗幟。到1857年，苗沛霖已“連圩數十，擁眾數千”。于是他決定與清廷的將領（尤其是勝保）交往。他受封負責四川“川北道”后，就排擠捻軍，自擴地盤，并幫助袁甲三。但苗沛霖對袁甲三保舉他為有名無實的名譽布政使之職表示不滿。1860年10月前后當他知道咸豐帝已逃往熱河以及太平軍已占領江蘇省東南部大部分土地時，就自認為是富饒的兩淮區的主宰。他在致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撫的信中聲稱：他手下有編成“五旗十四營”的練軍10萬人以上；他打算占領巡撫的行營所在地壽州；他要求，“兩淮鹽卡，霖請私焉”。[[97]](#_97_Zhang_Rui_Chi____Liang_Kan_L)12月份，他奪取了淮河的官船，公開表示對清廷權威的藐視。1861年3月，他寫信給太平軍的“英王”陳玉成表示友好。經與袁甲三和安徽巡撫的長期談判，他獲準管理淮河的厘卡。但他在1861年10月還是占領了壽州。

在這一年更早的時候，苗沛霖已經接受太平軍新封的“奏王”爵位，并且已經停止與捻軍作戰。但清廷自湘軍在1861年9月奪取安慶后，已經時來運轉。1862年3月，苗沛霖又贏得了他的老恩主勝保的“友情”，并在5月初再次反對太平軍和捻軍。5月15日當毫無戒心的陳玉成經過他的壽州的新根據地時，在城門口受到隆重的歡迎，但旋即被捕解交清廷官員。張樂行雖是盜匪，但至少始終如一，苗沛霖則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軍閥：一個毫無原則的武夫，能隨時與任何人結盟，并以制造分裂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當張樂行和龔得沉溺于淮河的城市時，捻軍其他大首領卻留守著老巢，不時騷擾鄰近諸省，特別在最初就向河南遠征。由于他們部隊的騎術不斷提高，又不善于圍攻有高大的磚石城墻保護的城市，所以就滿足于掠奪繁榮的集市。可是，捻軍運動恰恰在集市這一層結構上，才能夠蔓延擴大。潛藏的心懷不滿的集團早就存在了，如集體抗稅的農民、匪幫和異端教門。對捻軍侵襲所造成的動亂，官府督辦的民間地方武裝是可以對付的。特別在河南，地方的自衛組織有時稱為“聯莊會”，它們的領袖是農民土地擁有者，不受官方和紳士的監督，因而其形式與典型的團練不同。在1853年太平軍北伐時期，聯莊會已經興起。但當太平軍的威脅剛消除，它們就轉臉反對地方政府，要求減征賦稅和浮收，并殺害前來“催稅”的衙役。被武裝起來對付太平軍的村民，常進縣城攻打監獄。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這種“抗官殺差”的行動擴大到了河南二十多個縣。

捻軍在1855年搞聯合組織后的第一次遠征是入侵歸德周圍的富饒的河南集市。在歸途中，他們的戰利品（包括馬匹和裝在大車上的財物）組成的車隊長達許多英里。到19世紀50年代末，捻軍的遠征滲入河南中部并迫近黃河。到1859年10月，“皖匪”（捻軍的另一別名）已經離河南省府開封不到30英里。1861年9月，他們迫近古都洛陽。[[98]](#_98_Jiang_Di____Chu_Qi_Nian_Jun)這些長途遠征主要是騎兵襲擾，通過奪取（甚至購買）官馬，又反過來壯大捻軍的騎兵。

捻軍對河南境內的侵擾不但鼓勵了抗稅，也助長了盜匪活動。許多地方的盜匪也普遍自稱為捻，這主要表示自己是已組織起來的集團。1856年，在河南中部橫跨六個縣的角子山中，五股捻軍組成了大聯合，開始時不到250人。他們的頭目中有的有著吸引人的外號，如“張蝙蝠”、“于和尚”和“李大黑臉”等。他們護送私鹽，常常光臨集市的富戶搶劫和吃喝，有時態度并不兇惡。一年之內這個聯合即達到1萬人，根據地約有3000平方英里。不久約有800名逃亡的礦工由于正被官兵追捕（因為要他們再為已經關閉的銀礦干活），也加入了這伙農民出身的盜匪。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角子山各股盜匪未能取得安徽捻軍的幫助。官兵在1858年擊敗了他們。

1860—1861年，河南爆發了一次由陳大喜領導的聲勢浩大的捻軍運動，此人原來是官辦鄉勇中的一名下級軍官。他在老家汝陽當地方團練頭目時，加固了自己的圩寨，然后開始搶掠附近的集市。到1861年年中，汝陽與附近三個縣的幾百個圩寨已經效忠于他。陳大喜在很大程度上幸虧擁有數千名騎兵，所以經得起官兵的一切攻擊。他自由地在各州府之間流竄，并接受在河南省的安徽捻軍的援助。他與張樂行的侄子和未來的捻軍大頭目張宗禹建立了牢固的友誼，并在1863年與后者聯合。

捻軍還重新激起了隱忍待發的白蓮教式的不滿情緒。1858年，在安徽西北近河南界的潁州（今阜陽）首先爆發了這樣的叛亂：有一個名叫王庭楨的人自稱“順天軍師”，在那里“以妖言布散”，其徒眾“服色詭異”。在河南東部的一些村莊和集市中出現了一支約有5000人的教派軍隊，里面還有穿鮮紅上衣的騎兵，這些人手舞“飛刀”，號稱無敵。但在1858年4月，這次不到五個月的起義被德楞額率軍打垮。

1861年，一次具有白蓮教傳統的新的教派叛亂在歸德以東約15英里的一座圩寨要塞中爆發。為首的名郜永清，出生在一個信奉邪教的家庭；他父親和祖父都因行左道旁門而被處決。他此時預言“大劫”臨頭，但他揚言他能幫助其信徒脫災免禍，因為他代表一個新時期的開始。在他的信徒中，有的是河南的盜匪，還有一人是安徽的捻軍首領劉玉淵（劉狗）。郜永清準備圍攻歸德，但強大的地方官軍反而攻破了他的堅固的根據地金樓寨，他也被殺死。但郜永清弟兄的遺孀郜姚氏仍按照白蓮教的傳統方式繼續叛亂。金樓寨被收復，叛亂得到更廣泛的支持，直到1862年3月才在一片炮火中被鎮壓下去。[[99]](#_99_Guan_Yu_Zhe_Xie_Pan_Luan_Shi)

雖然捻軍從1855年起已經激起了河南的幾次起義，但他們發現難以大批進入山東，這是因為在皖、蘇、魯交界區集結著袁甲三等人率領的清軍。但在1860年10月，據說有7萬人連同1萬多匹馬分多股突入山東省，席卷了4個府，掠奪了20個縣，自西南端的曹縣起，往北幾乎遠達黃河新河道的各地。[[100]](#_100_Yi__Deng_Bian____Jiao_Ping)在運河以東，這些安徽的掠奪者在孔子故地曲阜遇到強烈的抵抗，但大批人馬圍攻了寧陽和鄆城，這兩個重要城市在側面護衛著魯南運河的戰略要沖濟寧。

1860年更早的時候，清廷任命戶部侍郎杜img為負責山東地方防務的特派大臣，與順天府丞毛昶熙在河南所任的職務一樣。但山東出現的危機以及直隸南部盜匪猖獗的局勢，促使清帝在11月5日（這時甚至在英軍撤離北京之前）特命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以盡快對付山東和河南的捻軍。12月中旬，這位蒙古親王率領3500名騎兵、2萬名八旗軍的步兵和5000名綠營軍開到濟寧。但在12月26日的第一次作戰中，他的軍隊在濟寧以西約30英里之處被擊潰。其他的挫折接踵而至。捻軍威脅著省府濟南，并且往東進入山東半島而到達商埠芝罘附近。欽差大臣沒有追擊他們，因為他必須對付一些發展迅速的地方叛亂。小土地擁有者在山東農業中占統治地位，異端的教派和盜匪反抗官府的傳統十分強固，那些住在偏僻的山區或住在因19世紀50年代初黃河大改道而造成的沼澤地帶的農民在戰術上是機動靈活的。農民的不滿可以很快地被煽動起來，因為山東的賦稅已經增加，可是收成則由于自然災害而減少了。[[101]](#_101_Jian_Jing_Su_Yu_Luo_Lun___Q)

以濟寧以東不到30英里的鄒縣為中心，又爆發了一次有宗教背景的頑強的叛亂。幾十個山村早已成了白蓮教殘余的避難地。首領名宋繼朋，他的故鄉是白蓮池。他的教派公開以文賢教這一名稱作掩護，吸收了許多不識字的教徒，他們口頭上傳布佛經咒語和經文。宋繼朋以能治病聞名。他們在夜間集會中，宣講和奉行秘傳的禮節。1853年后的一段時期，他通過其信徒（其中有兩名小紳士，一個是癝生，一個是監生）控制了許多民團組織。宋繼朋宣布其年號為“天縱”，對其教派的頭目都封官賜爵。后來，當他們被清軍俘獲時，許多教徒公然向他們的無名眾神袛求取保佑。他們“多長發被面，引出駢斬，猶喃喃諷經，合掌而拜”。[[102]](#_102_Guan_Yan___Zhao_Guo_Hua_Den)

1861年1月鄒縣的教派叛亂者被打敗，但宋繼朋未被俘獲。他作了投降的安排，卻沒有像19世紀60年代的許多保留著自己實力而投降的地方叛亂者那樣在帝國的軍事官僚圈子中得到一官半職。不久，他帶領4000人去圍攻鄒縣，但又遭到慘敗。他經過居間調停又獲準投降。他重新加固了他的要塞，儲備糧草，并在周圍的山岡上建立瞭望哨。1861年9月他又叛變了，據說到1862年6月他擁有10萬人之眾。

另一個集團名長槍會，把它說成一個各股匪首的同盟最為恰當，雖然里面有許多人也是在山東西南擊退入侵捻軍的練勇。的確，捻軍入侵的經驗已在前幾年促使這些練勇首領甚至在黃河新河道以北自己組成捻軍式的組織。他們也把自己的部隊編成旗，把控制的地盤歸“堂主”管轄。在頭目之中，至少有一位名叫郭秉鈞的生員。但曾當過衙役的劉占考被公認為“河朔盟主”。長槍會在1861年11月被徹底擊潰以前，會員約發展到五六萬人。有些頭目到河南參加捻軍；其余大部分人不是投降，就是被殺。[[103]](#_103___Shan_Dong_Jun_Xing_Ji_Lue)

在1860—1862年，山東還出現了一次在黃河以北爆發的八卦教（白蓮教）叛亂。主要頭目是臨清人張善繼，他父親因信仰異端而被發配新疆，其母有著同樣信仰，把他撫養成人。到1860年張善繼率領著一支稱為五旗的軍隊，每旗都標有不同的圖案。對每個教徒都分發證明身份的小標記，這些教徒的幾百個家鄉村莊都被命名為白蓮社。官方的報告還指責張善繼僭號，罪大惡極。[[104]](#_104___Shan_Dong_Jun_Xing_Ji_Lue)五旗叛亂在1861年3月爆發，據說在鄰近直隸省的四五個縣中有兵力5萬人。北京迅速作出了反應。勝保將軍于6月份被派至臨清，其精銳部隊初勝數仗，但在7月份被張善繼親自率領的八卦教軍隊打敗。于是勝保又施展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手法，安排一些叛亂首領投降，但不改編他們帶領的隊伍。7月末，他接受了據說有2萬人之眾的黑旗軍首領宋景詩的投降。宋景詩膽略過人，武藝出眾，使他成了五旗軍中三個獨立建制之一的黑旗軍的首領。他此時轉過來與舊戰友為敵了。在壓力下，張善繼撤出山東前往直隸，在8月份被俘和處決。新首領是一位婦女，名程五姑，她在9月份戰斗中喪命。12月份教徒們在寬大的條件下全體投降。勝保鼓勵叛亂的騎兵組成新營，歸他自己節制。其他人被發給“免死牌票”。[[105]](#_105_Ba_Te_Fei_Er_De____Song_Jin)

當捻軍的侵襲使白蓮教死灰復燃時，他們還特別在山東激起了許多分散的抗稅運動。清帝在1860年重申鼓勵興辦團練之舉，使各村莊有了力量。[[106]](#_106_Liu_Jin_Zao_Bian____Qing_Zh)最近的研究充實了濟南的史學家們所編的一張抗稅事件表，研究表明，到1860年9月為止的七年中，已知山東省只有6起抗稅事件，但在1860年10月捻軍大批入省后的15個月中，至少有18起官方記載的這類事件。這些反抗基本上是由于在該省北部和中部的6個府征收漕糧和有關的浮收引起的。1862年一名衙役所發的怨言反映了這些事件的暴力氣氛：“自辦團以來，役莫敢出距城三里有年矣。”[[107]](#_107___Shan_Dong_Jun_Xing_Ji_Lue)這18起事件中，至少有9名紳士參加（進士1名、武舉1名、貢生2名、生員4名和武生員1名）。

其中一名紳士抗稅者是一個有著正義感但又妄想稱帝的生員，此人名劉德培，是一名被遣退的胥吏之子。1860年末，他親筆書寫并張貼了數百張招貼，敦促同村人只按規定稅率交納漕糧，拒繳浮收。劉德培被捕，旋即逃出，并在非官辦的民團內任頭領。1862年初他因提議組織民團抗擊捻軍而得到新知縣的赦宥。他很快控制了縣城，沒收了衙役的財產，并搶掠了其他縣的集市。他以厚餉組成一支數千人的軍隊，分隸五旗，每旗由一名大將軍指揮。他親自率領第六旗，旗上有龍鳳標志。1862年12月，他自立為“大漢德主”。城內的學宮即改成他的朝廷，把幾間房間作“軍機處”。一個小型的官僚機器形成了，里面至少有兩名學者，即一名生員和一名舉人。[[108]](#_108___Shan_Dong_Jun_Xing_Ji_Lue)

面臨著遍布于人口密集的華北平原的眾多自立為王的起事，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親王成了一個忙人。1862年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在河南和安徽進行征剿，并在捻軍根據地正北的毫州贏得了一次決定性的勝利，于是渦河兩岸的捻軍開始投降。他在清帝的催促下向南挺進，在年底遭到張樂行和其他捻軍首領的猛烈抵抗。據說在一次大戰中約有20萬捻軍參戰，但最后是張樂行在雉河集附近被圍。被認為是信仰白蓮教的捻軍首領劉玉淵戰死，有幾名大首領投降。[[109]](#_109_Jiang_Di____Chu_Qi_Nian_Jun)張樂行在1863年底被俘。

捻軍的根據地好不容易才被占領，而叛徒苗沛霖仍控制著淮河三角洲的幾個重要城市。但山東局勢是如此嚴重，對直隸省的威脅如此之大，以致清帝命僧格林沁返回山東。僭號的劉德培在他的抓捕名單中是第一名。僧格林沁率領步兵3000和騎兵4000到達淄川，在靠城墻處建造一座很高的堡壘，并用重達5000斤的大炮轟擊建筑物和街道。8月初，劉德培從挨餓的城市帶300名士兵突圍，但被趕上，他自盡而死。[[110]](#_110___Shan_Dong_Jun_Xing_Ji_Lue)

王朝所器重的這位將領又轉向了白蓮池的鄒縣教派叛亂者，在那里他顯示了圍城戰方面的才能：他在宋繼朋的要塞周圍構筑壁壘，然后于9月間進行全面攻擊。防守垮后，隨之是對約3萬名教徒的一場屠殺，宋繼朋本人也不能幸免。親王然后又去追擊宋景詩，后者在1863年5月又叛變了官軍，并召集他的7000名黑旗兵在堂邑縣他老家附近構筑要塞。當時這一地區的一名學者寫道，村莊中留下的壯丁很少，據說由宋景詩指揮的響馬“不特不擄掠，反以財物與之”；這與1951—1952年北京學者所訪問的當地老農的證詞是一致的。[[111]](#_111___Shan_Dong_Jin_Dai_Shi_Zi)僧格林沁在開始時被打敗，但隨即使用了天津通商大臣崇厚奉欽命派遣的一營外國人訓練的軍隊——天津洋槍隊，才解除了危局。宋景詩的部隊在10月中被擊潰，宋本人失蹤，以后只是在謠傳和傳說中才重新提到他。

這位蒙古親王在完成了保衛山東和直隸的主要任務以后，隨即在11月經河南前往安徽去對付那個反復無常的“團練首領”苗沛霖。苗沛霖在1862年5月投誠，但當他的恩主勝保因瀆職和行為不檢而在1863年初被撤職時，他已知自己的地位不穩了。1863年5月苗沛霖孤注一擲，再次叛變，他占領了淮河邊的幾座城市，并且圍攻在原來捻軍地盤中心的蒙城。安徽和河南省的幾支軍隊參戰，由僧格林沁的騎兵主攻，苗沛霖在1863年12月初被擊敗并戰死。

### 戰爭的第二階段

1864年初，在河南西部出現了一支新的捻軍，其戰斗力之強以及戰術之精，竟使到湖北、皖南和山東追擊它的僧格林沁連吃敗仗并最后喪了命。捻軍的力量發展到了新的高峰。在1865年至1866年，甚至用現代武器裝備的李鴻章的淮軍，在幾次大戰中也被新捻軍擊潰。

學者們認為發生這一驚人變化的原因，是在1864年春，一支試圖解南京之圍而被阻于湖北的太平軍參加了捻軍。1864年3月，這些太平軍和捻軍的首領決定組成四支別動部隊，每隊由捻軍和太平軍將領聯合指揮。主要的一支入侵湖北的軍隊擬定由太平軍的“遵王”賴文光和已得太平天國“梁王”封號的張宗禹聯合率領。江地和羅爾綱都認為，正是太平軍的影響才使捻軍從此由正規的和永久性的（而不是“亦農亦兵”的）軍隊組成，并且這些部隊還有了更集中的領導和捻軍得以聞名的高超騎術。[[112]](#_112___Yu_Jun_Ji_Lue____Juan_1_3)但是正如張珊所總結的那樣，這個假設勢必被合肥歷史討論會上提出的有著充分文獻根據的觀點所修正，因為張珊指出，賴文光的殘余部隊人數很少，而且騎馬也從來不是太平軍的特長。有明顯的證據表明，捻軍的旗制在1863年后還繼續實行，而且持續到捻軍運動結束時為止，而太平軍一套組織術語顯然沒有被捻軍和太平軍的聯軍所使用。[[113]](#_113_Zhang_Shan____Guan_Yu_Nian)

不管怎么說，捻軍由于再也守不住自己的老巢而經常流竄，因此不得不特別注重騎術。張宗禹雖然在1863年6月收復了雉河，但在8月份決定“空其巢”并回到河南南部。大批捻軍帶著家眷，有的甚至帶著同族的人追隨他前往。李鴻章后來說：“捻以走為業……大率親族男女偕行，窮年奔竄，練成猾勁。”[[114]](#_114___Yu_Jun_Ji_Lue____Juan_9_1)捻軍事實上已成為專業性的流寇。

在1863年末，單由張宗禹率領的部隊據說已超過萬人，其中有數千名騎兵。此后，數量比太平軍騎兵多得多的捻軍騎兵前往湖北。追趕捻軍和太平軍新別動隊而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擔心的是捻軍而不是太平軍。他這時擁有5000多匹馬。1865年5月，在不斷追擊敵人達兩月之久以后，這位親王在山東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捻軍一次巧妙的伏擊而身亡。他死后只剩下2000匹馬還在官軍的手中。他部下的許多滿洲騎兵實際上已攜馬潛逃，投奔了捻軍。[[115]](#_115___Jiao_Ping_Nian_Fei_Fang_L)

歷史學家通常認為清廷剿捻之戰的轉折點是1865年5月25日任命曾國藩為鎮壓捻軍的欽差大臣，這是僧格林沁死后五天的事。對這位老政治家的新任命表明清廷充分認識到北京自身的安全這時要依靠漢族官員了。在1860—1861年，河南和山東兩省的巡撫已由漢人擔任。1863年，剛被擢升為駐扎廣州的總督、前湘軍將領劉長佑轉任直隸總督，這個職務是很少由漢人來擔任的。曾國藩擔任了擁有安徽、山東和河南三省軍權的欽差大臣是這一趨勢的標志。李鴻章所指揮的仍有6萬名之眾的淮軍以及在曾國藩麾下效勞的李鴻章的將領，這時是王朝安全的保障。三十多營淮軍此時奉命向山東省疾進。6月6日，李鴻章派約6000名士兵乘四艘輪船和五艘西洋帆船前往天津，里面有1000名步槍手和炮手，他們擁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上海附近受過英國人的訓練。現代武器顯然壓倒了捻軍的騎兵。據李鴻章的一名將官回憶當時的情景：“悍賊奄忽而至，馳驟如風雨”，但被“連環槍炮”所阻，而且實際上被擊潰了。[[116]](#_116_Jian_Li_Hong_Zhang___Li_Hon)

許多歷史學家曾把捻軍的失敗歸因于曾國藩在1865—1866年制定的政策——首先，用籠絡百姓及圩主的辦法來控制皖北的圩寨。[[117]](#_117_Jiang_Xiang_Ze____Nian_Jun)他懸賞搜集捻軍首領的情報，并寬恕那些因貧困或受裹脅而偶然跟從捻軍的人。他要圩寨堅守壁壘和保護里面的百姓及其牲畜糧秣，使之不落入捻軍之手，這是傳統的“堅壁清野”戰略。新的圩寨村長由居民提名，知縣批準，欽差大臣親自發給職銜執照。村長然后不但編制倡首為敵者及“甘心從逆”者的“莠民冊”，而且編制包括“自新”的原捻軍追隨者和“全未從匪者”的“良民冊”。取得“良民”身份必須有五戶愿在村長前為他具結擔保，而村長則向知縣具結。

為了保證這一工作的進行，曾國藩專門派人充當他的“委員”去捻軍大批出沒的村莊調查，并與知縣和“耆紳”咨商，查獲并清除了隱藏的活動分子。到1866年8月，經過13個月的工作后，蒙城有59名捻軍“慣匪”，毫州有46名，潁州有5名被捕和處決，惟徐州一名未獲。有些委員僅作了調查姿態。他們既未得到知縣也未得到“耆紳”的合作。在許多地方，新的村長是經過改頭換面的原來的“圩主”，只不過沒有再被認出是捻軍罷了。曾國藩因一些“莠民”實際上就是綠營士兵而感到震驚，同時對有些委員不負責任和玩世不恭的態度表示失望。[[118]](#_118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

曾國藩“調查”圩寨的結果不論在哪一方面說都不是有成效的，因為捻軍在1865年7月已經離開他們的老窩，再也沒有回來。他們的失蹤，再加上帝國軍隊的日益加強，基本上說明了在俠盜的這些舊巢窟中又恢復了舊秩序。

在曾國藩指揮剿捻戰爭的17個月中，他還被認為對清廷的勝利貢獻了一個重要的理論概念，即實施封鎖的戰略。他在1865年7月提議，他最精銳的部隊不應追擊捻軍，而應守住四個關鍵基地，即安徽的臨淮、江蘇的徐州、山東的濟寧和河南的周家口。一年后，即在1866年7月，曾國藩進一步提出要選擇一些航道作為自然屏障，來限制叛亂者的活動。最早論述“畫河圈地”的人可能是一度當過曾國藩幕僚的趙烈文，他把李鴻章最后戰勝捻軍的原因歸之于曾國藩的戰略，而羅爾綱等人是贊同這種意見的。[[119]](#_119_Zhao_Lie_Wen_Wei_Zhou_Shi_C)但這種說法把問題搞亂了。因為曾國藩的河流封鎖戰略是利用軍隊以及河流、河壩和運河來阻止捻軍進入重要的、但防守薄弱的地區，而李鴻章后來在1867—1868年實施的戰略可以用他自己所說的“覓地兜圍”這個詞來描述則更為恰當。他更多地利用騎兵和大炮來包圍捻軍，同時依靠河流和運河來阻止他們的逃竄。

曾國藩從江蘇徐州派軍守衛4個省的13個府，它們是通向直隸省和北京的必經之地。捻軍騎兵這時依靠自己的機動性更甚于依靠民眾的支持，這是因為清廷在華北部署了新的地方軍隊，民眾起義的次數少得多了。因此，剿捻戰爭的第二個階段主要是捻軍的運動速度和巧妙的戰術與清軍——特別是淮軍——擁有現代武器的對應優勢兩者的較量。曾國藩估計捻軍騎兵每日能馳騁150里。在1866年6月，他注意到捻軍仍缺乏火藥武器。他自我安慰道，“槍炮傷人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

曾國藩認為，捻軍強烈地希望進入繁榮的山東沿海區。賴文光認為太平軍的最大失策是攻打上海，破壞了他們與外國人達成的和平協議。也許賴文光在1866—1867年希望與西方人友好接觸并在芝罘取得他們的武器。1866年5月捻軍企圖進入山東，但被劉銘傳擊退，捻軍的騎兵遭到了他麾下的主要炮手畢乃爾（法國人，此時改隸清朝并當了總兵）的炮擊。曾國藩建議沿運河建造河堤和設置木制障礙，并在一些地方挖深河道，使捻軍不能越過。他在7月間把大本營移至河南的周家口后，提議要河南也設置河防。軍隊要守衛兩條實際上連接的河道（潁河和賈魯河），它們組成了一條從淮河幾乎直達黃河的航線。他希望切斷捻軍進入東部平原的途徑，使剿捻更加有力。

曾國藩的戰略計劃迅速被北京批準，但它不到兩個月就落了空；同時也說明他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9月24日，全部捻軍在三個最高頭目張宗禹、任柱和賴文光的率領下越過開封以南單薄的障礙，迅速東移，進入山東。10月1日曾國藩提出讓在南京的代理總督李鴻章暫駐徐州，以便激勵山東的淮軍將領更加努力作戰。他認識到，李鴻章與劉銘傳等真正的軍人打交道，能比自己更見成效。他還提出，要讓1866年3月以來任湖北巡撫的兄弟曾國荃在河南的戰事中擔任更重要的職務。他在致李鴻章的機密信中說：“賊匪之日集日多，愈擊愈悍。窮民圩破，從之如歸，則流寇之禍殆不知其所終極。”這使人想起了明朝的滅亡。曾國藩的戰略已經失敗，他只能再使用他那舊的和經過試驗的辦法。由于有清帝的支持，他能扶植他信任的人，特別是李鴻章和他自己的弟弟曾國荃。[[120]](#_120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

在這關鍵時刻，淮軍將領劉銘傳和潘鼎新兼用騎兵和大炮，把捻軍拒于山東之外，并在因小說《水滸傳》聞名的匪巢梁山訓練使用英制的大炮。捻軍戰敗后，其首領在10月20日至23日作出了極為重要的決定。賴文光和其他頭目打算重返山東，張宗禹及其部下將向西經河南直奔陜西，這樣就分成了東西兩支人馬。張宗禹之所以啟程前往陜西，是因為那里的東干回民之亂還在繼續，他希望找到一個新根據地。[[121]](#_121_Zhou_Shi_Cheng____Huai_Jun)

賴文光和自封為“魯王”的捻軍首領任柱12月再次被逐出山東，并于1867年1月侵入湖北。也許他們想仿效明末的叛亂者而進入四川。但是，如果真是這樣，他們對騎兵的依賴就把他們拴在平原上了。他們打算渡過漢水，但在2月份遭到慘敗，于是在湖北放棄了他們的計劃而后撤，6月份卻又成功地突入運河以東的山東省。[[122]](#_122_Wang_Ding_An_Deng____Ceng_Z)

同時，1866年12月7日，清帝因曾國藩健康不佳接受了他的辭呈，任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李鴻章擔任新統帥后，采用了在江蘇建立的財政制度，[[123]](#_123___Li_Wen_Zhong_Gong_Quan_Ji)并且使用了現代武器和總數達4900人的騎兵（大部分來自察哈爾和滿洲）。亞洲腹地騎兵和歐洲武器的結合，使流寇感到有壓力了。

山東的東捻在6月30日抵達芝罘附近，北京為之震驚。地方官請外國人援助，于是200名英、法海軍陸戰隊應邀準備保衛這一商埠。美國駐芝罘的領事發現捻軍仍是一支有紀律的部隊：“他們并不殺傷人，除非遭到抵抗。”賴文光顯然取得少數外國人的援助并擁有少量滑膛槍，但僅此而已。[[124]](#_124___Jiao_Ping_Nian_Fei_Fang_L)

就李鴻章而言，在豫、皖兩省巡撫所派官兵的緊密合作下，在運河設置了外圍封鎖線。在山東巡撫丁寶楨的勉強幫助下，又企圖在膠萊河上設置內層封鎖。當丁寶楨的一個將領守衛的那部分膠萊河失守時，李、丁二人都受到嚴厲指責。但叛亂者被迫退入蘇北，并于11月份在那里再次戰敗。捻軍不斷企圖突破運河的封鎖，但都未能得逞。最后，任柱手下的一名“營將”受李鴻章重賞的誘惑而暗害了任柱。12月，捻軍殘部在離山東北部沿海不遠的img河被徹底打敗。賴文光逃到江蘇揚州，在1868年1月被俘和處死，他至死驕頑不悟。[[125]](#_125___Li_Hong_Zhang_Xin_Gao)

隨著遲早總要代替地方民團的省級軍隊的成長，帝國在各地方上的統治同時得到恢復。改編山東省一級軍隊時，湘軍的訓練方式造就了一支新省軍，總數約兩萬人，尚未包括1500名滿洲騎兵。[[126]](#_126___Shan_Dong_Jun_Xing_Ji_Lue)這些擴充的省軍開始剝奪地方團練經理自行征收費用的權力。早在1864年1月1日朝廷就下令規定，在山東、河南和直隸三省，只有那些“官為經理”的民團才準許繼續存在。按照清帝批準的這一制度，1866—1867年在沿運河的山東省各城市成立了許多“團營”。“團長”可由紳士擔任，但應聽命于省級將領并由地方經管官員發餉，同時地方官員又設法通過其基層官僚機器來恢復稅制。[[127]](#_127___Shi_Er_Zhao_Dong_Hua_Lu)

東捻在山東正被殲滅時，西捻卻遠在陜西。1867年1月在西安附近，張宗禹狠狠地打敗了陜西巡撫的部隊，4月份又會同東干回民攻打西安。但新任陜甘總督左宗棠宣布了他對付捻軍的先捻后回、先陜后甘的策略。10月，捻軍被迫向北撤往高原，到11月中旬，甚至已撤至比現在的延安更遠的地方。12月，張宗禹率領1.7萬軍隊（大部分為騎兵）渡過了黃河的冰凍區而進入山西。[[128]](#_128_Zhang_Sheng_Wang____Xi_Nian)到1868年1月初，他進入河南北部，1月17日又到了直隸省境內。2月3日，即張宗禹離開陜北后的七個星期，他已經逼近離北京約80英里的直隸省府保定。

清帝這時動員了京畿的精銳部隊；他賞罰兼施，以此來激勵鄰近諸省的軍隊。由醇親王率領并已擴充到近兩萬人的神機營留守京都。其他部隊被動員進擊，而新成立的山東軍以及在1866年改編的勇營——豫軍，迫使捻軍再向南后撤。[[129]](#_129_Ru___Da_Qing_Mu_Zong_Shi_Lu)由于有被困在西面的太行山和東南的黃河之間的危險，張宗禹率全軍向東北突圍，在4月進入山東。

張宗禹渡過運河的行動是致命的，因為這可使官軍再一次利用南面的黃河、西面的運河和東面的大海來實施封鎖的戰略。5月16日，李鴻章奉命限期一個月消滅捻軍，否則將受懲辦。5月21日，他與追擊捻軍來到直隸并在那里全面指揮數省軍隊的左宗棠會面，商定了進行“長圍”的戰略。這戰略旨在保衛從天津至黃河約400英里的運河，它需要10萬多名軍隊才能進行守衛。但李鴻章自己的軍隊連同山東和河南兩支軍隊只能湊集約8萬人，因此只能在兩岸建立“長墻”。李鴻章和左宗棠二人都看到民眾對官軍懷有敵意，用軍隊強逼百姓來營造長墻會引起災難。李鴻章除了命軍隊造墻外，還想出了“民捐民辦”的制度。紳士們得到了欽賜封號的諾言，平民則獲準免稅。由于依靠“民力”，運河以西的直隸部分長墻在6月初完成，山東省的部分則在6月份稍后時竣工。[[130]](#_130___Li_Wen_Zhong_Gong_Quan_Ji)這時淮軍迫使從直隸撤出的全部捻軍進入山東北部的包圍圈。7月，張宗禹遭慘敗，大批捻軍這時響應了李鴻章投誠的號召。8月16日，張宗禹跳入徒駭河失蹤。捻軍運動至此全部被鎮壓下去了。

## 對中興的透視

自從太平軍在湖北首次遭到挫折直至1868年的14年中，人們不但看到了王朝幸存下來，還看到了清朝政體的主要特征也恢復原狀。由于一位現代史學家的才能，“中興”一詞取得了適合這一時期的更確鑿的意義。芮瑪麗在論及“中興”時說：“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于19世紀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于死里求生，再延續了60年。這就是同治中興。”[[131]](#_131_Rui_Ma_Li____Tong_Zhi_Zhong)

今天一些對舊中國不很同情的學者可能沒有芮瑪麗的那種熱情，或者可能提問：這些政治家究竟杰出在哪里？但是作為時代驕子的曾國藩、李鴻章及其同僚等前人確實成功地鎮壓了叛亂，恢復了王朝的地位，甚至重新振興了王朝的治國精神，這可以說是事實俱在。他們建立起來的勇營肯定不屬于清朝的舊軍制，這時卻可以與旗兵和綠營軍相匹敵。但勇營仍是清帝批準建立的，同樣忠君，并且這時成了王朝安全的屏障。在這一實力基礎上，清帝仍繼續利用由于長期公認的正統地位而產生的有利條件：即他是文化和道德方面的仲裁人，有權封賜功名，批準獎賞，敕建紀念碑和祠廟；他也是任命下至知縣一級官僚的唯一權威。盡管作了某些必要的調整，固有的制度仍繼續存在。

宋代的理學繼續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為抗衡實用主義的恭親王力量的手段，另一個原因是用它來延續國家與文化的實質，這種實質正是清朝統治階級領導成就的標志。從太平天國叛亂的爆發直至捻軍戰爭終結的18年中，北京的會試及鄉試一次也沒有停辦過。此外，有三年在全國范圍安排了恩科會試和鄉試。在叛亂盛行地區的鄉試當然被迫中斷了，只有在山西省，這些名義上三年一次的考試才未受影響。湖北省推遲過1次，四川、河南和山東推遲過2次，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和陜西3次，湖南和江南4次，廣西5次，貴州和云南6次。但一有可能，就計劃和舉行專門的補考。在湖南，早在1857年初就舉行補考。按規定應在南京舉行的江蘇、安徽兩省補考于1859年在杭州舉辦，那時帝國的勝利還相當渺茫。[[132]](#_132_Shang_Yan_Liu____Qing_Dai_K)由于鄉試功名最后能使人獲得官職，這些及時舉辦的補考使士子們為了自己的前程而倒向清朝。不但考試盡可能按期進行，到1870年幾乎所有中斷的考試都已補齊。

可是在此期間，大部分官員的質量下降了。清王朝沿用前幾代皇帝的舊例，不但照常捐賣監生功名和一些官銜職稱，而且捐賣實授官職，甚至也賣知縣職位。巡撫們僅就“軍功”也已經在推薦候補人了。在全帝國將近1290個縣中約有512個縣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年以后，捐納的知縣大致增加了一倍，其數相當可觀。[[133]](#_133_Li_Guo_Qi___Zhou_Tian_Sheng)

實際上，許多成為知縣的低級生員，如果功名資格不與捐納相結合，無疑是當不成的；當然，有些甚至沒有生員功名而有才能的文人也是通過捐官發跡的。但大部分捐納知縣的候選人被認為是城市商人，他們企圖通過浮收和其他盤剝形式來撈錢。[[134]](#_134_Xu_Da_Ling____Qing_Dai_Juan)這樣的弊病由于所有知縣的任期越來越短而更加嚴重了，他們的任期甚至比知府和其他高級官員的任期更短。

知縣的任期短暫只能意味著地方政府的進一步腐化。因為同治時期所恢復的制度中，有一項就是恢復基層官僚機器的決定性作用。1868—1870年任江蘇巡撫和為人非常謹慎的丁日昌認為，衙門胥吏的權力正在擴大。胥吏的人數不但比知縣及其私人幕僚和仆役要多，而且更了解條例和地方情況；他們之所以有權主要是任期比其上級更長。他說縣令任期最多四五年，短則二三年，而胥吏的子孫則是世操此業。丁日昌在1868年的奏折中說，江蘇的胥吏“空缺”可由在職者出售，代價高達1萬兩，此數比捐納知縣的代價更高。[[135]](#_135_Ding_Ri_Chang____Ding_Zhong)洪亮吉（1746—1809年）曾經估計，在18世紀一個縣有胥吏200—1000名，人數視縣之大小而定。而1862年的進士、山東人游百川御史估計，捻軍以后的時期，大縣有胥吏兩三千名，小縣至少三四百名。此外，胥吏與差役相勾結，后者走鄉串村與地保（地方）聯系。19世紀初，浙江省的一些縣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東的一個大縣至少有1000名。1851年，咸豐帝在一名御史的奏折上批注道：“直隸、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縣何至盈千累百之多？” 1870年以后時期的材料說明，一個村的一件殺人案要出動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進行調查的胥吏。還必須招待就餐和致酬。[[136]](#_136_Ju_Tong_Zu____Qing_Dai_Zhon)大部分知縣不得不依靠這批下屬取得收支平衡和在一兩年內積累一筆資產。這樣，成為這一世紀中期叛亂主要原因的地方政府陋習，顯然在這場大破壞中被保存了下來。

縣以下的事務，仍然是不學無術的吏役為了攫取權勢而與地方的名門大族不是勾結，就是傾軋。但北京的確設法使省一級的官員主要由取得高級功名的文人來擔任，因為這些人對王朝的支持更為堅定。現有的最完整的統計材料表明，[[137]](#_137_Gen_Ju_Zhong_Guo_Ben_Tu_Qua)在同治時期，65.9%的知府取得高級功名——貢生或貢生以上；此外，任期三年以上的知府的這種百分比要比知縣的百分比大。

在督撫一級的領導層，清帝已經表現了靈活性。一般說來，清帝同意吏部的意見，即有“軍功”的人如擔任高級省職，仍需要相應的學術資格。但到19世紀60年代為止，北京除了允許破格外，別無其他選擇。典型的巡撫是一名文官，他能成功地駕馭軍人和征收厘金稅，此外，他通過某種考試還可能擔任過省內的按察使或布政使，這通常是擔任巡撫之職的墊腳石。[[138]](#_138_Wei_Xiu_Mei____Cong_Liang_D)湘軍將領成為巡撫的人中有左宗棠、唐訓方（都是舉人）；劉長佑、曾國荃和李瀚章（都通過考試成為貢生）；劉蓉和劉坤一（都只是生員）。太平軍戰敗后，勇營將領擔任高級文官的人較少。淮軍將領中有少數功名獲得者，其中只有三人在19世紀60年代成為按察使或布政使，他們是劉秉璋（進士和翰林）、潘鼎新（舉人）和張樹聲（生員）。隨著剿捻戰爭的結束，北京停止有“軍功”的候選人可以擔任布政使或按察使的做法，除非他們有正規的高級功名，或者符合文官條例規定的資歷。[[139]](#_139_Sheng_Kang____Huang_Zhao_Ji)

清廷收斂了滿族的種族傲慢氣焰，同時堅信通過正途上升的士大夫可以培養成更可靠的省一級官員，它希望這樣做足以確保它的官僚機器的忠誠。但清帝也有辦法迫使省巡撫和勇營將領放棄戰爭年代的那種松弛習慣。其中的關鍵在于清帝具有任命官僚的絕對權威，以及他有抽取各省財政資源的新辦法。對最近因剿捻戰爭而受破壞的地區，田賦豁免到同治六年（1868年1月24日結束）。[[140]](#_140___Jiao_Ping_Nian_Fei_Fang_L)但根據北京的指令，各省官員必須負責每年從這些地區的其他土地賦稅和厘金中抽出不同名目的款項上繳北京和解交其他省份，這種指令一反舊制。隨著許多省份的田賦和漕糧稅制的中斷，戶部在19世紀50年代已經感到要估計每省掌握的多余資金是越來越困難了。按照慣例，各省對多余資金的估計能使戶部逐年比較切合實際地估算出每省未來應負擔的任務，這種制度稱為“春秋撥”。在對次年田賦的“冬估”（它由每省隨同本省開支的報告上送）中，已經決定了“撥”往北京或其他省份的總數。這個制度在太平軍叛亂爆發后不再可靠，于是清廷在19世紀50年代決定寧可單憑主觀的估計，估計是根據戶部本身對每省財政狀況的粗略計算作出的。在對太平軍和捻軍戰爭的整個時期，清廷已從某些省份的特定財源中抽款作為“協餉”，撥給其他有軍事開支的省份。為了滿足北京自身開支的需要，清廷這時還采用了攤派辦法。它在1863年開始施行，那時有幾個省被分攤每年的固定份額作為它們上繳的傳統京餉（在此以前由每省逐年作出估算）。1868年后不久，所有省份和大部分新海關都已攤派了京餉的款額，一年按期可以征得總數800萬兩。不久，又規定在各省開征其他專款，以應京師的特殊需要。[[141]](#_141_Peng_Yu_Xin____Qing_Mo_Zhon)

北京怎么才能夠保證這些估算的收入能迅速地和大部分上繳呢？從這里可以看到清帝具有任命官員這一毋庸置疑的特權的重要性了。因為督、撫的任期從來不固定。除了像李鴻章和左宗棠那些與為王朝效忠的軍隊有特殊關系的人以外，其他各省巡撫的主要職責就是維持秩序，以及為清帝或帝國在各省的軍費開支籌措經費。[[142]](#_142_Jian_A_Xie_De___Guang_Xu_Sh)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學家們常常忽視這個事實：如果省一級長官不能上繳他分攤的收入，北京能夠不費力地撤換他。在咸豐和同治時期，總督和巡撫的平均任期非常短。咸豐時期約87.5%的巡撫和同治時期60.4%的巡撫的任期不到三年。咸豐時期73%的總督和同治時期52%的總督任期也不到三年。[[143]](#_143_Wei_Xiu_Mei____Cong_Liang_D)清帝在決定撤換或調動督、撫時，解繳稅收的能力是主要的考慮標準。1866年命令開征“固本京餉”新專款的上諭嚴厲地警告說：“自奉文日起，或一月一解，或兩三月一解，總須按期趕到，不得稍有拖延。如該督撫等任意遲逾三月不解，總由戶部指名嚴參，照貽誤京餉例議處。”最近對劉坤一擔任江西巡撫之職（1865—1874年）的研究指出，他之所以贏得恩眷，主要是因為他注意上解國家的收入。[[144]](#_144_Shang_Yu_Yin_Zi_Liu_Kun_Yi)

由于這些壓力的結果，厘金稅收和關稅——新商業稅——收入都牢牢地置于清帝控制之下。各商埠關稅的實際數字由赫德定期上報，該項收入的處理由清帝直接監管。當然，在實際征收的厘金稅中，只有一部分落到各省高級官員之手。[[145]](#_145_Jian_Liu_Guang_Jing___Dui_Q)但這部分稅收也處于清帝廣泛的權力范圍以內，因為畢竟只有北京才能任命有大量厘金收入的省的督撫。到1869年，上報清帝的全國厘金收入為1460萬兩，此數仍超過全部關稅（包括通行稅共1000萬兩）。

由于清帝能決定兩江總督、湖廣總督以及江蘇和湖北兩省巡撫等職的人選，所以對財源的間接控制還能使李鴻章的淮軍也置于清帝掌握之中。1870—1871年的淮軍軍費每年達700萬兩，其中38%來自江蘇省的厘金稅收入，29%來自上海和漢口的海關，15%來自其他省份的“協餉”，所余主要由江蘇和湖北省庫撥付，[[146]](#_146_Wang_Er_Min____Huai_Jun_Zhi)這與剿捻戰爭的最后幾年相似。清帝為了繼續表示全力支持李鴻章.1868年初任命李鴻章之友丁日昌為江蘇省巡撫。1868年9月，當支持李、丁二人的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時，李鴻章的同科進士閩浙總督馬新貽（1821—1870年）被任命為兩江總督。清帝顯然極為倚畀李鴻章，視之為最有用的心腹臣工。

1867年當剿捻戰爭快結束時，李鴻章已被任命為駐湖廣總督，他在1869年1月才來到武昌，但在11月又奉召去四川調查吳棠總督被參劾貪污的案件。李鴻章在四川時，還負責處理川、貴兩省爆發的反基督教案件。1870年2月，他奉命去貴州負責征剿那里的叛亂者。但在3月中旬正當李鴻章在準備他的西南遠征時，他又奉召去陜西與回民作戰，那時左宗棠在全力對付甘肅省的叛亂者。李鴻章于5月到達陜西；他似乎命里注定要協助鎮壓第三次大叛亂了。但是在6月，所謂的天津教案增加了與法國作戰的可能性（見第十章），于是他又奉命率領其大部分軍隊立即返回直隸省。8月29日他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接替在患病的曾國藩。清帝對李鴻章的恩寵與日俱增，他也多次為國效勞和用其他方式來報答這種恩遇。芮瑪麗指出：“李鴻章終其身的那個時代，更像是太平軍以前欽差大臣奉命來回奔波的時代，而不像是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時代。”[[147]](#_147_Rui_Ma_Li____Tong_Zhi_Zhong)

那么，19世紀70年代的中國是否很像太平天國前幾十年的中國呢？當然，不能夠忽視范圍更廣的外部世界，即李鴻章要全力對付的那個“民族力量日益擴張的兇惡的新世界”。對他在這方面的表現不管你想怎么說，他本人以及他開始懂得與華爾和戈登一起去爭取的西方武裝確實給保衛北京本身的那個省帶來了安寧——或者毋寧說，有力地制止了混亂。李鴻章也不是用武力強行維持國內秩序的唯一官員。在山東和河南，新勇營已在不斷發展，同時又像直隸省那樣，兩省還獨立地大力把綠營軍重新訓練成所謂的練軍。巡撫丁寶楨效法直隸的曾國藩，在1869年10月得到清帝批準，改組有1.4萬名士兵的山東綠營軍，遣散了大批疲而弱者，并對較精悍的進行訓練。1872年河南巡撫上奏說，他已向由地方官或派往該地的將領監督的綠營軍“營汛”灌輸了力量，從而能找出潛藏的奸盜。[[148]](#_148___Ding_Wen_Cheng_Gong_Yi_Ji)與日益注意到中國國際關系的李鴻章不同，這些巡撫更關心維持國內秩序和籌集財源等重大任務。

當然，巡撫和總督還有提高學術、移風易俗和整飭吏治的任務。這些都是咸豐和同治時期的上諭中三令五申的理學要務。但事實上，注重八股文的科舉制度形成了自己的力量。官紳在府縣所辦的書院除了培養少數擅長寫華麗空洞的韻文的優秀學者外，很少有其他成績。為了鼓勵紳商平民為戰爭捐款，清帝自1853年起就批準了長期增加各省地方上生員的名額。到1871年當不能再聽任長期增加生員名額時，在每年的府學考試中生員的全國限額已增加了20%——從1850年的25089人增加到30113人。但在省一級每三年的鄉試中，錄取士子的全國限額保持在1851年的1770人這一數字以下——1881年下降至1254人，但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又恢復到正常的1500人左右。（例如，在1881年，江蘇和安徽二省舉人的名額只有114人，山東省60人，廣東省72人。）[[149]](#_149_Zhang_Zhong_Li____Zhong_Guo)為了幫助有前途的考生（包括那些已有低級功名但準備參加高級考試的人），認為有必要增設書院。現有的研究材料說明，在同治時期，直隸省成立了29所這樣的書院（它們或是新設，或是在廢棄舊書院基礎之上成立的），而在道光時期成立了37所，咸豐時期成立了10所。在廣東省，道光、咸豐和同治在位時成立的新書院分別為46所、28所和31所。[[150]](#_150_Wang_Lan_Yin____He_Bei_Shen)這樣，另一個戰前的制度得到了恢復。但是，生員名額增加20%一事，意味著新書院甚至不得不更加注意練習寫八股文，可是學生甚至對從中挑選片言只語作為文章題目的《四書》的意義也不很了解。每個書院通常只能收10—15名學生，超過百名的極少，這就進一步限制了它們的作用。

道光年間各省高級官員不時籌措捐款，在省會或其他大城市興辦從事真正學術研究的書院。這種專門書院通過杰出的學者來領導，對學術空氣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1840年后的16年，陳澧（1810—1882年）擔任了廣州學海堂的山長（見第六章）。1858年，當英軍占領廣州迫使陳澧逃離時，他已經出版了在以后幾十年中有著深遠影響的《漢儒通義》。他雖然長期住在廣州，但很少談到當時城內外國人的挑戰，不過他在1858年寫的文章確實提到了國內施政不當的問題，例如他說過：“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陳澧是學海堂創辦人阮元（1764—1849年）所創漢學派的一位學者，他認為，務必不要以為重視訓詁考據就是忽視“義理”，這比阮元走得更遠。雖然不應放棄實證的訓詁學，但也應研究經學內包含的道德倫理意義；但陳澧又認為，漢、唐、宋歷代大學者已對經學作了權威而透徹的解釋。他雖然給予程朱理學以應有的尊重，但斷言宋代哲學家本身的哲學理論卻不如他們的注疏那樣有價值。盡管陳澧非常愛好訓詁考據，卻仍持通常的見解，認為漢代甚至唐代學者早已掌握了儒家經籍中的真諦。因此，與經學本身及宋代的注疏一樣，他們的各種注疏對學者也有幫助。事實上對大部分學者來說，集中研究某一種經書，再輔以標準的注疏，要比瀏覽許多古典經籍更為可取。使人感到矛盾的是，陳澧就這樣把自己嚴謹的訓詁考據與古代經學中近乎神秘的信仰結合起來了。[[151]](#_151_Wang_Zong_Yan____Chen_Dong)在整個同治時期，當陳澧繼續在重建的學海堂任教并主管了一個從事高級學術的新書院（1867年廣州鹽政使創辦的菊坡精舍）時，他的影響迅速擴大。他提出關于只習一經而再輔以注疏的主張，本質上就是1863年的進士和1873—1876年的四川學政張之洞這個年輕人，應用于他在四川省創辦的一所新書院的宗旨。[[152]](#_152_Zhang_Zhi_Dong____Zhang_Wen)

同治時期的學術界中，在1864年被李鴻章任命為蘇州正誼書院山長的馮桂芬（1809—1874年）代表了另一種傾向。當1863年他在江蘇推行田賦改革時，事實上他已有了一項較全面而激進的改革計劃。他在1840年成為翰林前曾當過江蘇省某些官員的幕友達七年之久，他最初只是一名知縣的幕友。他主張研究經世致治國之道，推崇顧炎武論述地方吏治和社會問題的文章。到1861年末，他完成了40篇文章并匯編成集，名為《校邠廬抗議》。[[153]](#_153_Ji_Shu_Feng_Gui_Fen_Chuan_J)他所提出的具體改革要比魏源激進得多（見第三章）。他對西方國家的力量和制度的贊賞更甚于魏源。魏源對旨在使國家富強的行政和軍事效能似乎已有一種準法家式的酷嗜心理，而馮桂芬應付西方侵略挑戰的心情雖然與魏源同樣迫切，但他還關心著人民的福利，特別是小自耕農的福利，因為他認為這些人是社會的支柱。他的論文無情地抨擊了造成嚴重弊端的頑固的清代制度：如微薄的官俸、官場上驚人的繁文縟節、受人蔑視但能發財致富的衙門吏役、捐納官職現象的大量存在以及不公平的賦稅等。他的激進建議中有這樣一條：以稱為“幕職”的文人（選自在鄉試中不幸落第的生員）來代替全部衙門胥吏。為了激勵這類屬員能有良好的表現和行為，他們在職九年后應有機會升入仁宦正途。馮桂芬還進一步提議，縣以下基層機構中那些甚至沒有小紳士地位的“董”，應由村民用片楮選出。“滿百家公舉一副董，滿千家公舉一正董。”這類民選官員支領月俸，每人任期三年，并有權在土神祠中會同農村耆紳審斷爭端。這一級的基層政府再以巡檢來充實。巡檢從獲得低級功名并當過縣級幕職的人中選出，有權受理五千多戶的上訴和作出較輕的懲處。[[154]](#_154_Te_Bie_Shi_Juan_1_Di_13__14)馮桂芬這些引人注目的建議如被采納，就可減輕知縣個人的工作重擔，延長他們的任期，清除衙役的許多積弊。

陳澧的漢學觀點在同治時期風靡一時，在蘇州書院的馮桂芬卻只能無可奈何地眼看著他設法要清除的積弊仍在盛行。1862年馮桂芬送給曾國藩一份手稿，要求曾國藩作序以示贊同。曾國藩看了十幾篇文章后發現他的主張實難付諸實施，所以直到1864年收復南京以后才答復。但曾國藩確實把馮桂芬全部（或幾篇）文章的副本送給他的朋友、博學的軍機大臣李棠階。李棠階給軍機處同僚的一份帖子只提到了馮桂芬建議中的一個問題，即以有功名的人取代京畿各部胥吏的可取性。但他指出，“然非朝廷徹底盤算，握定主意，不為浮議所淆奪，則必不能行”。[[155]](#_155_Ceng_Guo_Fan____Ceng_Wen_Zh)實際上馮桂芬很謹慎，未發表他的《校邠廬抗議》，他在此后的有生之年除了在書院講授經史外，主要對語文學和西方數學（根據當時能得到的中文譯文）進行了專心致志的研究。只是在他1874年去世以后，他的幾個兒子才決定將《抗議》一書中比較不招物議的一半連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付印。《抗議》的全文到1885年才發表，但是即使在那時，他的較重要的建議也未被最講經世致用的學者們予以認真采納。[[156]](#_156_Dan_Shu_Shi_Feng_Gui_Fen_De)

當馮桂芬和陳澧在他們主要關心的問題方面發生分歧時，活到19世紀70年代的曾國藩卻信奉另一學術重點。甚至在忠君之士中，他晚年也看到過丑惡，還被迫作出過許多妥協來獲取來之不易的勝利，他又恢復了原來的觀點：即不道德的社會歸根到底一定要由有德之士來糾正；樹立正確的道德準則和態度必須成為首要的目標。經世致用之術不管多么重要，必須處于從屬地位。1869年8月他任直隸總督時，發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勸學篇，示直隸士子》，開列了當時最講中庸之道的學者們公認的四門學問：（1）經過自我修養而獲得的“義理”；（2）考據；（3）辭章；（4）經世致用之學（經濟）。但曾國藩著重指出，一定要把個人以全部才能獻身于維護“倫紀”的行動看得比處理實際事務的知識更重要，而這種獻身行為只有通過立志和居敬，通過履行程朱的修身之道才能做到。他說：“茍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陳澧主張通過漢、唐、宋代的注疏研究經學；曾國藩則不同，他寧取朱熹的注疏以及這位圣人自己的哲學著作。但他不反對那些服膺朱熹學說的人去搞考據或辭章，也不反對為此目的而去研究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和秦蕙田的《五禮通考》：他認為這兩書合起來能提供經世致用之學的詳盡無遺的明確知識。[[157]](#_157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曾國藩與馮桂芬不同，他的戰時經驗使他深感在固有制度范圍內進行調整有著局限性。因為這個制度實在根深蒂固，以致它有了禮的神圣性質。但另一方面，由于有了清帝的支持，清政府的措施畢竟全力以赴地使湘軍和淮軍取得了勝利。曾國藩只有贊助把原來的政體全部保存下來的一途。

根據這種情況，芮瑪麗的卓見仍會有助于說明這一時期的歷史。因為正是她最終論定，清代的中興體現了“重新強調中國傳統制度有效性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這個時代的偉人們看到了正在擴大的陰影中的勝利”。[[158]](#_158_Rui_Ma_Li____Tong_Zhi_Zhong)早在19世紀70年代初，舊秩序在江蘇、山東和直隸等省已經明顯地恢復。蘇松太地區的“大戶”繼續逃稅；衙役們又活躍于山東，又在包攬稅收和中飽浮收；連直隸省在內的小紳士都感到進一步獲取舉人功名無望，就充當包稅人或搬弄是非的訟棍或訟師，與衙役或相勾結，或相傾軋。新的大規模叛亂沒有再爆發，這在很大程度上必須歸功于已經擁有西方武器的許多省的勇營，甚至重新受訓練的綠營軍。[[159]](#_159_Luo_Ri_Wu_Si_Ji____1863Nian)同時，由于王朝加緊對官員人事的控制，總督和巡撫曾因設法改進吏治而擴大自己在任命地方官員的作用方面的靈活性越來越受到限制。大半輩子搜羅“人才”的曾國藩在1872年去世之前哀嘆，隨著大部分地方恢復了和平，日子比較好過了，可是能夠激勵真才實學的挑戰也不常見了。他說：“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幸門。仍需援資按序，各循常調。”[[160]](#_160_Yin_Wen_Zai_Qian_Mu___Zhong)雖然仍須把曾國藩的一生視為中國士大夫統治階級經世致用之學的勝利，但他的成就實際上是由于清帝在戰時給予的支持和靈活性才取得的。由于傳統價值標準的影響，忠君的士大夫在任何特定時期都不得不滿足于清帝所給的回旋余地。這一事實對馮桂芬等人所提改革根本制度的建議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少數人雖然把注意力轉向國際關系和設法獲得他們所認為的那種西方強國的秘密，但是他們也面臨著同樣的限制。

（楊品泉 譯）

[[1]](#_1_8)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1期（1973年5月），第1—52頁。史密斯：《19世紀中葉的中國軍制，1850—1860年》，載《亞洲研究雜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22—161頁。

[[2]](#_2_8)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第13、17頁；卷3，第2、7、25、41頁；卷4，第1、7、15頁；《奏稿》卷2，第10、21、27—28頁。

[[3]](#_3_8)《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1，第6 8頁；《家書》卷1，第59頁；又見《雜著》卷2，第58頁。

[[4]](#_4_8)《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1，第1頁。

[[5]](#_5_8)《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1，第4頁；卷2，第2頁；《年譜》卷1，第17頁。

[[6]](#_6_8)沈陳漢音（音）：《1840—1852年期間曾國藩的經世改革思想》，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7第1期（1967年11月），第61—80頁，特別是第71頁。

[[7]](#_7_8)《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第1頁。

[[8]](#_8_8)《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第24—25頁；卷3，第11頁。羅爾綱：《湘軍新志》，第243—244頁。

[[9]](#_9_8)《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1頁。

[[10]](#_10_8)關于其分布狀況，見波特《曾國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74頁。“私人”一詞是有爭議的，因為委員不像幕友，有政府官員的身份。

[[11]](#_11_8)羅爾綱：《湘軍新志》，第106—107頁（又第55—64頁所列之表）。

[[12]](#_12_8)朱洪章的回憶錄《從戎紀略》，很可能是通過他人筆錄寫成的。

[[13]](#_13_8)《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第24頁；《家書》卷5，第39頁。

[[14]](#_14_8)《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5，第3、5、17、24、30頁。關于曾國藩的財政措施，見胡林翼《胡文忠公遺集》卷15，第20—22、25—26頁；卷30，第9—10頁。駱秉章：《駱文忠公奏議》卷11，第53—54頁；卷13，第35頁。

[[15]](#_15_8)徐世昌：《清儒學案》卷107，第19頁。

[[16]](#_16_7)吳相湘的《晚清宮廷實紀》（第9頁）引用了王闿運和薛福成的記載。

[[17]](#_17_7)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13頁。

[[18]](#_18_7)《清代籌備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0，第3頁。

[[19]](#_19_7)楊聯陞：《中華帝國的幾位女統治者》，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卷23第50期（1960—1961年）。

[[20]](#_20_7)高勞：《清宮秘史》，載《東方雜志》卷9第1期，第3—4頁；又見《英國外交部通信檔案，中國部分，卜魯斯致魯塞爾的信》，17/354，第203頁。

[[21]](#_21_7)吳秀良：《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第10—11頁。

[[22]](#_22_7)見翁同龢目擊的記載《翁文恭公日記》，辛酉（1861年），第118頁。

[[23]](#_23_7)李棠階：《李文清公遺書》，特別是卷2《書說》。

[[24]](#_24_7)赫德的中文申請書及備忘錄都保存在《海防檔·購買船炮》中，特別是卷1第10—18、21—22、76—77頁。

[[25]](#_25_7)迪安：《中國和英國：1860—1864年的商業外交》第3章和第6章。

[[26]](#_26_7)《清代籌備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第28頁。

[[27]](#_27_7)小野信爾：《論淮軍的基本性格》，載《歷史學研究》第245期（1960年10月），第27—30頁。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30期（1970年），第14—22頁。

[[28]](#_28_7)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4頁。

[[29]](#_29_7)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2頁；卷2，第47頁。

[[30]](#_30_7)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第16頁。

[[31]](#_31_7)引自史密斯《華爾、戈登和太平軍叛亂》，第246頁。

[[32]](#_32_7)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第3冊，第2136頁。

[[33]](#_33_7)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第41—42、45、46—47頁。

[[34]](#_34_7)《海防檔·購買船炮》卷1，第188頁；《清代籌備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0，第13—14頁。

[[35]](#_35_6)《海防檔·購買船炮》卷1，第156—158頁。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第80—82頁。

[[36]](#_36_6)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243頁。

[[37]](#_37_6)《海防檔·購買船炮》卷1，第203—204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第5頁。

[[38]](#_38_6)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247頁；丁韙良：《中國巡禮》，第232頁。

[[39]](#_39_6)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英文版，第2冊，第106頁。

[[40]](#_40_6)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第2冊，第1057—1061頁；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第3—4頁。

[[41]](#_41_6)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志》第2冊，附錄，第166頁。

[[42]](#_42_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第30頁；卷4，第44、46頁。

[[43]](#_43_5)《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6，第12、35—36、47—48頁；又《書牘》卷7，第15—16頁；《奏稿》卷7，第35—36頁；卷8，第40頁。

[[44]](#_44_5)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第3冊第2242頁）引曾國藩之言。關于南京陷落詳情，見戈登記載，大英博物館52號和392號文獻，1864年6月30日；又英國海軍部，125/ 105號，李致金斯頓函，1864年7月29日。關于掠奪情況，見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3冊，第1887—1888、1919頁。

[[45]](#_45_5)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第3冊，第2300頁。

[[46]](#_46_5)羅爾綱：《湘軍新志》，第204—207頁。

[[47]](#_47_5)《曾國藩未刊新稿》，第214頁。

[[48]](#_48_5)羅爾綱：《湘軍新志》，第198頁注5；第199頁注1及3；《曾文正公全集·批牘》，第30—31頁。

[[49]](#_49_5)《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6，第35頁。

[[50]](#_50_5)龐百騰：《太平軍叛亂后期江西省的收入和軍費開支》，《亞洲研究雜志》卷26第1期（1966年11月），第63頁；羅爾綱：《湘軍新志》，第119、127頁。

[[51]](#_51_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40—41頁；卷18，第38—40頁。

[[52]](#_52_5)引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第583頁；又見何貽焜《曾國藩評傳》，第340、360頁。

[[53]](#_53_5)何貽焜：《曾國藩評傳》，第360頁；《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7，第8頁；卷12，第31頁。

[[54]](#_54_5)《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6，第37頁；卷7，第7頁。

[[55]](#_55_5)《胡文忠公遺集》卷14，第4—6頁；卷23，第8—10頁；卷59，第31頁；卷63，第19頁；卷65，第3—4、5—6頁。

[[56]](#_56_5)《胡文忠公遺集》卷23，第5—8頁；卷60，第25頁；卷61，第23頁；卷64，第18頁。又見卷23，第3、6—7頁。

[[57]](#_57_5)《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6，第29、35、37—38、41—42頁；卷7，第1—2頁；卷8，第47頁、第25頁。

[[58]](#_58_5)《曾文正公全集·年譜》卷6，第23—24頁；《書札》卷7，第9頁；《年譜》卷7，第20頁。

[[59]](#_59_4)《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2，第50—51、53—54頁。

[[60]](#_60_4)《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8，第3頁；《雜著》卷2，第54—55頁；《書札》卷7，第7頁。

[[61]](#_61_4)《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8，第25頁；卷10，第11—12頁；卷12，第5頁。

[[62]](#_62_4)《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11，第12頁。

[[63]](#_63_4)夏鼎：《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載《清華學報》卷10，第2期（1935年4月）。

[[64]](#_64_3)駱秉章：《駱文忠公奏議》卷12，第19—21頁；又《駱公年譜》，第38—39頁。

[[65]](#_65_3)《胡文忠公遺集》卷23，第3、5—8頁；卷26，第1—6頁；卷31，第8—10、14—17頁。又卷23，第6—7頁；卷31，第9—13頁；卷60，第23—24頁。

[[66]](#_66_3)《胡文忠公遺集》卷26，第1—3頁；卷31，第15頁；卷60，第27—29頁；卷61，第9—10、12、21—22頁；卷63，第18—19頁；卷64，第19—20頁；卷89，第5、15—17、23—24頁，以及其他各處。

[[67]](#_67_3)《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9，第8、16—17頁；卷9，第8—10頁。

[[68]](#_68_3)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28，第35—44頁；《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11，第33頁。

[[69]](#_69_3)欣頓：《中國的漕糧稅制》，第92頁。

[[70]](#_70_3)《江蘇減賦全案》卷5，第25頁。

[[71]](#_71_3)引自郭廷以等編《郭嵩 燾 先生年譜》（上冊第246頁）中郭嵩燾、之信。

[[72]](#_72_3)吳云：《兩罍軒尺牘》卷5，第13—15頁。馮桂芬：《顯志堂集》卷5，第36—37、43—44頁；卷9，第21、23頁；卷10，第104頁。又卷4，第11—12頁；卷9，第12—13、19—20頁；卷10，第7—10頁。

[[73]](#_73_3)郭廷以編：《郭嵩燾先生年譜》上冊，第246頁。

[[74]](#_74_3)同上書，第247—248頁。《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11，第34頁。

[[75]](#_75_3)《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11，第33、34頁。

[[76]](#_76_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第56—65頁。

[[77]](#_77_3)《江蘇減賦全案》卷1，第1—4頁。

[[78]](#_78_3)《顯志堂集》卷4，第9頁；卷5，第11—12頁；卷9，第1頁。洛日烏斯基：《1863年蘇松太減賦問題及其后果》，第186—200頁。又見《顯志堂集》卷4，第11—12頁；卷10，第7—10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27頁。

[[79]](#_79_3)吳云：《兩罍軒尺牘》卷5，第11、16—17頁。《顯志堂集》卷5，第44—45頁。顧炎武及以后的作者估計蘇松太區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民是佃農。假定19世紀50年代那里的總人口數為1000萬，至少一定有20萬—30萬自耕農，也許更多。

[[80]](#_80_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第11、26頁；卷5，第1、8、12、36頁；卷6，第4—5頁。《書札》卷12，第33—34頁；卷13，第7—8、11—12頁。

[[81]](#_81_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1，第40—41頁；卷7，第42頁。

[[82]](#_82_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7，第41頁；參閱吳云《兩罍軒尺牘》卷5，第22—25頁。

[[83]](#_83_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1，第43頁。

[[84]](#_84_3)夏鼎：《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的田賦問題》，第456—457頁。

[[85]](#_85_3)《顯志堂集》卷4，第10頁；殷兆鏞：《殷譜經侍郎自敘年譜》，第54頁。

[[86]](#_86_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8，第60—66頁。

[[87]](#_87_3)《江蘇減賦全案》卷1，第5—6頁；卷2，第29—33頁。

[[88]](#_88_3)《顯志堂集》卷4，第12頁。

[[89]](#_89_3)江地：《初期捻軍史論叢》，第21—23、26—27頁。關于人民共和國檔案工作者發現的告示，見附錄，第241—243頁，此告示最先發表于《進步日報》1951年2月3日。

[[90]](#_90_3)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議》卷5，第31—32頁。江地：《初期捻軍史論叢》跋，第244—245頁，特別是第六條。蔣湘南：《蔣子瀟先生遺集》，重印于范文瀾等編：《捻軍》第1冊，第323頁。

[[91]](#_91_3)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議》卷2，第40—41頁；卷5，第31頁。袁保恒：《文誠公集·奏議》卷1，第4頁。

[[92]](#_92_2)鄧永康：《1853—1863年山東的地方防衛組織：從忠君到叛亂》。又見李棠階（1882年）和孟傳鑄（1910年）著作，轉載于范文瀾等編《捻軍》第6冊，第171—172、300—303頁。

[[93]](#_93_2)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15，第1頁。

[[94]](#_94_2)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議》卷3，第40、51、55—56頁；卷4，第12頁；卷8，第2、4、14—15、19—20、36、42、51頁：《函牘》卷1，第9、12、16、19、27頁。

[[95]](#_95_2)商人之子柳堂對捻軍的家庭生活、捻軍的道德以及紀律和組織作了詳細敘述。此人于1858年在雉河附近被架走；見范文瀾編《捻軍》第1冊，第348—355頁。

[[96]](#_96_2)江地：《初期捻軍史論叢》，特別是第130—134頁。又見第97、105—107頁在軍機處檔案中發現的張樂行的檄文和“自述”（1863年）收于《光明日報》（1962年10月10日）馬汝珩和劉守詒的一篇文章中。

[[97]](#_97_2)張瑞墀：《兩戡亂記》，載范文瀾編《捻軍》第1冊，第288、291頁。

[[98]](#_98_2)江地：《初期捻軍史論叢》，第99—101頁；關于捻軍的各次戰斗，見第188—238頁大事記。尹耕云等編：《豫軍紀略》卷2.2，第8頁；卷2.4，第1頁；卷6.2，第13—14頁。

[[99]](#_99_2)關于這些叛亂事例，見《豫軍紀略》卷3.3，第2—4、16頁；卷3.4，第2、4頁；卷3.5，第6頁。又見卷4.9，第1、6、10—11頁；卷4.10，第1—3、21頁；卷4.11，第4—6頁。又見卷2.3，第1—2、3—4、5、7頁。又見卷2.5，第1、3—4、5頁。

[[100]](#_100_1)奕等編：《剿平捻匪方略》卷85，第1頁。

[[101]](#_101_1)見景甦與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特別是附錄1和2。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第337頁。《臨清縣志》卷1，第14—15頁。

[[102]](#_102)管晏、趙國華等：《山東軍興紀要》卷19A，第1—2、4、8頁。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得到過鄧永康《1853—1863年：山東的地方防衛組織》一文的教益。

[[103]](#_103)《山東軍興紀略》卷19A，第7頁；卷11A，第4—5頁；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冊，第264—265頁；《剿平捻匪方略》卷115，第12—14頁。

[[104]](#_104)《山東軍興紀略》卷13A，第9頁；卷12，第5頁；《剿平捻匪方略》卷111，第6—7頁。

[[105]](#_105)巴特菲爾德：《宋景詩的傳說：共產黨歷史學中的一個插曲》，載《中國論文集》第18期（1954年12月），第134—139頁；《山東軍興紀略》卷13C，第1、7—8頁。

[[106]](#_106)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15，第9624頁。

[[107]](#_107)《山東軍興紀略》卷22C，第11頁。

[[108]](#_108)《山東軍興紀略》卷20A，第1—3頁；《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冊，第35—36、58、67、71、92—96、117—118頁。

[[109]](#_109)江地：《初期捻軍史論叢》，第222—223頁。

[[110]](#_110)《山東軍興紀略》卷20B，第4頁；《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冊，第92、122頁。

[[111]](#_111)《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冊，第201頁；《山東軍興紀略》卷19C，第8頁；巴特菲爾德：《宋景詩的傳說……》，第140—143頁；江地：《1865—1866年的捻軍戰爭》，（載《歷史教學》，天津，1954年11月，第36頁）所引杜松年（舉人，1849年）關于宋景詩和捻軍的評述。

[[112]](#_112)《豫軍紀略》卷1.3，第8—9頁。江地：《捻軍史初探》，第38、40、46頁；羅爾綱：《太平天國新軍的運動戰》，特別是它的序言。

[[113]](#_113)張珊：《關于捻軍的組織問題》，載《安徽史學通訊》第14期（1959年12月），第34—38頁；關于捻軍的運動戰，見同上書，第39—50頁。張珊的證據與一名芝罘的中國人的敘述是一致的，此人在1867年與賴文光的部隊一起度過了兩周；美國芝罘領事館快信第33號，1867年8月24日。

[[114]](#_114)《豫軍紀略》卷9.13，第8—10頁；卷10.14，第1頁。《剿平捻匪方略》卷195，第22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29頁。

[[115]](#_115)《剿平捻匪方略》卷195，第22頁；卷205，第12、13頁；卷211，第15、16頁；卷214，第33—34頁；卷232，第20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5頁。

[[116]](#_116)見李鴻章《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22—24頁；周盛傳：《周武壯公遺書》序言卷《自述》，第18—19頁。

[[117]](#_117)蔣湘澤：《捻軍叛亂》，第101頁。

[[118]](#_118)《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2，第26—30頁；《奏稿》卷30，第51—52頁；《批牘》卷3，第40—43、45—46、48—50、51—53、55—56、68—69頁；卷4，第1、2、5頁；《書札》，卷13，第33頁。

[[119]](#_119)趙烈文為周世澄的《淮軍平捻記》寫的序言。羅爾綱：《捻軍的運動戰》，第51—52頁。

[[120]](#_120)《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卷10，第19、20、3頁；《書札》卷13，第17、21、22、34頁。賴文光的“自述”，載向達等編《太平天國》第2冊，第863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第13—19、23、30—33頁；《家書》卷10，第32—33頁。關于畢乃爾，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第59—60頁。《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13，第24—25、36—43頁《家書》卷10，第28、37—38頁；《奏稿》卷30，第10—12、45—49頁。

[[121]](#_121)周世澄：《淮軍平捻記》卷11，第5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1，第4頁。向達等編：《太平天國》第2冊，第863頁。

[[122]](#_122)王定安等：《曾忠襄公年譜》卷2，第12—16頁；江地：《捻軍史初探》，第72—73頁；《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卷10，第43頁；鄧嗣禹：《捻軍及其游擊戰》，第184—187、198頁。曾國荃估計湖北東捻的兵力為步兵3萬人，騎兵為七八千人。

[[123]](#_12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第24、46、47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5、29、52頁。

[[124]](#_124)《剿平捻匪方略》卷278，第16—17頁；卷286，第2—3頁。《山東軍興紀略》卷6B，第9—10頁。鄧嗣禹：《關于捻軍運動及其對清朝衰亡的影響的幾點新意見》，載《紀念香港大學成立五十周年中國研究論文集》第3集（1968年）第56頁。丁寶楨：《丁文誠公遺集·奏稿》卷2，第49—50頁。

[[125]](#_125)《李鴻章新稿》，收于江世榮編《捻軍史料叢刊》第2冊，第50—64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16—28頁；《奏稿》卷12，第73頁。《剿平捻匪方略》卷282，第10—12、18—19頁；卷288，第9、22—23、28頁。

[[126]](#_126)《山東軍興紀略》卷4A，第8頁。《大清穆宗實錄》卷86，第51—53頁。《丁文誠公遺集》卷1，第4、36—37頁；卷4，第9、16頁。

[[127]](#_127)《十二朝東華錄·同治朝》卷28，第16—17頁。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16，第2629頁。張錫綸：《軍書匯鈔》第1冊，第305—306、479—481頁。《丁文誠公遺集》卷1，第51—53頁；卷8，第11頁。

[[128]](#_128)張生旺：《西捻軍在陜西的抗清斗爭》，載《史學月刊》（1964年12月），第350—352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9，第9頁。《剿平捻匪方略》卷274，第20頁。

[[129]](#_129)如《大清穆宗實錄》卷211，第24—27頁；卷222，第3—8、9—10、13—14頁。《丁文誠公遺集》卷5，第1—4頁。《豫軍紀略》卷12.12，第5—6、8頁；卷12.21，第4—5頁。《剿平捻匪方略》卷295，第15—16、19、20頁；卷296，第2—4、7、11頁。《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72頁；參閱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英文版第2冊，第114頁注1。

[[130]](#_130)《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第14、16—17、20—22、24—25、31、41頁。《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79—80頁。《丁文誠公遺集》卷5，第39、44—45、47—48頁。關于百姓對官軍的仇恨，見左宗棠《左文襄公家書》，摘載于聶崇岐編《捻軍資料別集》，第223—224頁。

[[131]](#_131)芮瑪麗：《同治中興》（1966年版序言），第7、18頁。

[[132]](#_132)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第97—100、151—152頁。

[[133]](#_133)李國祁、周天生、許弘義：《中國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第1冊，第212—213頁。總的說來，這一大規模研究的發現，可以與張仲禮、瞿同祖、梅茨格和華特等人（見參考書目章）的統計（即抽選不同的年份和地點對地方官的資格和任期所作的統計）相印證。何炳棣發現，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在1840年僅為29.3%（見《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第48—49頁）。

[[134]](#_134)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第146—149頁。參閱李國祁等編《中國地方志研究》第1冊，第384—387頁。

[[135]](#_135)丁日昌：《丁中丞政書》卷5，第19—20頁。

[[136]](#_136)瞿同祖：《清代中1國的地方政府》，第39、59頁。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28，第46頁。《大清十朝圣訓·咸豐朝》卷7，第4頁。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22，第6頁。

[[137]](#_137)根據中國本土全部180個府中的70個府的材料。李國祁等編：《中國地方志研究》第1冊，第206—207、374—377頁。

[[138]](#_138)魏秀梅：《從量的觀察探討清季布政使的人事嬗遞現象》，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6月，第525、529—530，533頁。又見她關于按察使的論文，第487、491—492頁。

[[139]](#_139)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卷21，第20、31頁。

[[140]](#_140)《剿平捻匪方略》卷320，第7—8頁。

[[141]](#_141)彭雨新：《清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系》，載《社會科學雜志》卷9第1期（1947年），第83—91頁。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9，第8261頁。

[[142]](#_142)見阿謝德《光緒時期四川的總督》，載《遠東史論文集》第4集（1971年），第41 52頁。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力范圍的再估計》，載《清華學報》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9—223頁。

[[143]](#_143)魏秀梅：《從量的觀察探討清季督撫的人事嬗遞》，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卷第1期（1973年5月），第259—292頁；見表，第276—281頁。

[[144]](#_144)上諭引自劉坤一《劉忠誠公遺集·奏疏》卷3，第40頁。李國祁：《同治中興時期劉坤一在江西巡撫任內的表現》，載《國立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1期（1972年），第260頁。

[[145]](#_145)見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計》，第195頁注2。

[[146]](#_146)王爾敏：《淮軍志》，第276頁。

[[147]](#_147)芮瑪麗：《同治中興》序言，第7頁。

[[148]](#_148)《丁文誠公遺集》卷7，第23—24、37頁。錢鼎銘的奏折，引自羅爾綱的《綠營兵志》，第204頁。

[[149]](#_149)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87—88、124頁。

[[150]](#_150)王蘭蔭：《河北省書院志初稿》，載《師大月刊》第25期（1936年2月），第1—63頁；第29期（1936年9月），第1—105頁。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第67—74、314頁。

[[151]](#_151)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第67—69、90、97頁。陳澧：《東塾集》卷2，第14、28—30頁。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冊，第602、607、614頁。

[[152]](#_152)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204，第13—15頁；卷213，第21—22、24頁。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50—54頁。

[[153]](#_153)記述馮桂芬傳記的最佳著作依然是百瀨弘的《論馮桂芬及其著述》，載《東亞論叢》第2期（1940年）。關于《校邠廬抗議》書名的意義，見馮桂芬的自序，1898年版，第4頁。

[[154]](#_154)特別是卷1，第13—14、16頁。

[[155]](#_155)曾國藩：《曾文正公手寫日記》卷3，第1428頁，1862年11月8日條。《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13，第7頁。李棠階：《李文清公遺書》卷5，第17—18頁。

[[156]](#_156)但熟識馮桂芬的丁日昌在1868年曾奏請專門開科考試法律，以征召新胥吏，并應準許有功名者應試；丁日昌：《丁中丞政書》卷5，第20頁。

[[157]](#_157)《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2，第57 58頁；《書札》卷32，第29—32頁。

[[158]](#_158)芮瑪麗：《同治中興》1966年版序言，第9頁。

[[159]](#_159)洛日烏斯基：《1863年蘇松太減賦問題及其后果》，第245 248頁。《大清德宗實錄》卷12，第6頁。《山東通志》卷81，第2565頁。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冊，第342頁。參閱《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2，第68頁。錢鼎銘：《錢敏肅公奏疏》卷4，第1—2、22頁；卷6，第23、26頁。

[[160]](#_160)引文載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冊，第583頁。

# 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 理論：對自強運動的早期倡導

1860年和約簽訂以后，中國的國際處境整個說來雖然更壞了，但由于同治時期鎮壓了叛亂，清代又得以延續了半個世紀。經歷過這一事件的政治家們不會輕易地忘掉英法聯軍占領北京這一恥辱。但是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的興起和歐洲列強的侵略，才有可能再引起一場對外戰爭。這段間隙的和平時期使清政府有機會為準備將來抵御列強而積蓄軍事和財政上的力量。這種力量對維持國內秩序當然也是可貴的。

從1861年開始，“自強”一詞在奏折、諭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經常出現。這表現出人們認識到需要一種新的政策，以應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所發生的史無前例的變化。為此目的就提出了許許多多方案，但并非每個建議都是付諸實施的，也不是所有建議都是成功地得到貫徹的。不久，“自強”一詞就變成與其說是一個號召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吁，倒不如說是一個用來為開支辯護和為官僚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口號。總的說來國內秩序維持下來了，許多地區性的暴亂被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下去。但中國在1894—1895年中日戰爭中的戰敗，表明這一被稱做是防御外國列強而制定的政策是失敗的。

雖然如此，以自強的名義作出的一些革新確實產生了意義深遠的成果。新政策必然導致對傳統的經世致用說的背離；追求“富強”的行動逐漸壓倒了儒家偏重德政的傳統。當然，所采取的妥協性措施從來沒有達到引起制度方面重大變革的程度。但是新知識和新看法傳了進來，盡管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沒有變化，但還是為新型的管理和技術人才提供了某些機會（雖然機會是偶然的，而且為數很少）。大力使中國“富強”起來的愿望不但出現在身負要職的政治家之中，而且還出現在人數越來越多的開明知識分子之中。

自強一詞是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現的，它是清朝新的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強調要與歐洲列強妥協，接受條約制度。雖然主要的重點放在與列強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國自己的力量仍被視為有助于維護這種和平的局面。但是，下述公式化的論調也太簡單化了：既然歐洲各國的軍事力量看來是依靠技術強大起來的，那就應把采用這種技術視作根本的任務。可是，在那些議論這件事的官員和學者之中，對以下兩個問題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一是為了利用西方技術，中國需要做些什么；一是在固有的制度中進行的調整應該達到什么程度。

### 恭親王和文樣

在北京，自強的主要倡導者是兩個負責與歐洲侵略者辦交涉的滿族官員。長江下游的主要地方官也持有他們的觀點，并且這種觀點至少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就得到了京師官員——包括御史和翰林在內——的支持。

恭親王和文祥首先認識到中西方接觸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通過謹慎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處。他們強烈地感到。西方列強通常能夠信守條約。“自換約以來，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與前代之事稍異。”[[1]](#_1___Chou_Ban_Yi_Wu_Shi_Mo__Xian)1860年危機時任兵部尚書、同時又是“主戰派”首要人物的沈兆霖，也持這一觀點。沈兆霖也對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后沒有為所欲為的事實所震驚。他們“仍換約而去，全城無恙。則該夷之專於牟利并無他圖已可深信……爾海邦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羈縻”[[2]](#_2_Chen_Zhao_Lin____Chen_Wen_Zho)。

恭親王和文祥還意識到歐洲人顯然對清王朝多少懷有好意，并且可以使之為清王朝所用。從1860年起的三年中，上海之所以免遭太平軍的侵擾，部分地也要感謝英法聯軍，1862年初，恭親王決定“借”外兵幫助鎮壓太平軍，并且扶植洋人率領的常勝軍（見第六章和第九章）。洋人還幫助管理海關；海關為清政府提供了戰爭的軍費。

北京領導人從與西方列強的妥協中找到了暫時的好處，但他們認識到仍需要一項更積極和更長遠的政策。1861年初，他們把這一政策概括成“自強”一詞。他們堅決主張，外交只是一種緩和的手段，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探源之策，在于自強之術，必先練兵……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3]](#_3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i)毫無疑問，建議訓練新滿軍主要是為了對付當前捻軍叛亂者對直隸省的威脅。從太平天國叛亂的爆發到英法戰爭，禍患頻仍，使他們懂得內憂外患是“互相為用”的；而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造成的困難尚無結束之望。像翰林院編修趙樹吉等朝廷命官也有著這些憂慮。他在1861年初的一份奏折中警告說，與夷人商訂的協定是靠不住的，確保未來安全的唯一辦法在于“尋求自強之術”。趙樹吉希望有一個努力恢復元氣的真正行動，他說：“誠能日夜袛懼，奮發有為，使天下曉然知圣意之所在，將智者效謀，勇者畢力；則是秋間一變，乃天所以甚彼族驕悖之疾，而警我數十年因循之弊，因災而致福，化弱而為強，此中國無疆之慶，非彼族之利也。”[[4]](#_4_Yin_Zi_Wang_Er_Min___Qing_Ji)

當恭親王和文祥強調需要訓練軍隊時，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不在于軍隊的質量，而在于他們手中的武器，這樣想也許是不足為奇的。1860年西方的火力給他們留下了難以忘卻的印象。從此他們著了迷的想法是：只要有幾艘炮艦，就能輕而易舉地攻陷南京太平天國的要塞。這個想法就導致了命運不佳的李泰國—阿思本小艦隊計劃（見第九章）。清廷接受了英國人關于由他們提供訓練使用新式滑膛槍的軍事教官的建議，于是在1861年末批準了一個在天津訓練幾百名官兵的計劃，其中包括從北京選拔的旗人軍官。文祥自己參加了組織北京神機營的工作，此營不用外國教官，使用了一些俄國在1862年送給清廷的武器。[[5]](#_5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i)

下一步不僅是使用西方的槍支和炮艦，而且要在中國制造這些武器。甚至在1860年和約談判期間，法國已經建議要幫助中國鑄造大炮，但恭親王和文祥卻懷疑歐洲人竟會如此爽快地讓人分享他們力量的秘密，不過他們確實也鼓勵過曾國藩和薛煥考慮建立新兵工廠。[[6]](#_6___Hai_Fang_Dang__Gou_Mai_Chua)新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并不一定比有些低級官員更富于想象力，這可從1861年11月御史魏睦庭的一份著名奏折中得到證明。魏睦庭指出，正是因為歐洲人對貿易的興趣大于侵占領土的興趣，所以才有此良機，即他們不僅教中國操作他們的大炮和船艦，而且允許中國人像彼得時代的俄國人那樣學會制造武器和造船的技術。魏睦庭認為，被大吹大擂的歐洲武器技術畢竟是中國自己的遺產。他的論調典型地代表了以后30年許多中國作者的論調，即：把火藥傳到歐洲的是元代的蒙古人，雖然它已在歐洲得到很大的改進，以至于“奇巧百出”。

魏睦庭要求中國重新學習它已經遺棄的技術。歸根到底來說，湯若望和南懷仁曾被允許在北京鑄造槍炮，并且西方武器對偉大的康熙和乾隆二帝的軍功也作出了貢獻。所以魏睦庭認為，所幸的是，由于西方國家渴望在中國國內安定的條件下發展中國的市場，所以它們的侵略意圖得到了緩和。大清政府應該開始制定一項計劃，即在歐洲人的幫助下制造槍炮和戰艦。由于忠于帝國的臣民之中不乏才智之士，所以將來中國在這些方面一定會勝過西方。[[7]](#_7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i)

這些意見使人想起魏源在《海國圖志》中表達的思想（見第五章）。魏源的意見不久被更多的實踐所證實。恭親王和文祥在1863年被李泰國的行為弄得非常懊惱，李泰國無非是因為擁有幾艘他答應用來攻垮太平軍的炮艦，就能對清廷的幾位軍機大臣大加嘲弄。盡管滿人在傳統上厭惡一切海上的事物，但文祥似乎已下定決心：中國必須想方設法建立自己的艦隊。[[8]](#_8_Lu_Shi_Qiang____Zhong_Guo_Zao)

滿族領袖人物特別熱心，因為在1863—1864年，李鴻章在江蘇不僅雇用外國軍官訓練他的軍隊，而且還取得洋人的幫助來制造西式彈藥。李鴻章的這些活動使人感到，對于自強計劃應有個長期安排。1864年年中，恭親王和文祥重申他們的觀點：“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他們在奏稟中推薦了李鴻章的事業，并建議選派旗軍到江蘇李鴻章的兵工廠見習。中國應當利用目前的時機，“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無事可以示威”。恭親王和文祥雖然仍未洞悉西方技術的復雜性，但感到他們終于最后找到了中國對付外國挑戰的處方：“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9]](#_9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i)

### 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

與鴉片戰爭以后的平靜時期不同，這時各省出現了一批朝氣蓬勃的督撫，此是反對太平軍的戰爭所賜。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雖然專心致志地進行內戰，但也關心在與西方商人、傳教士及領事官接觸時經常發生的麻煩問題。他們支持宮廷堅守和約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強的具體行動。

他們對西方技術的興趣是直接由內戰引起的。早在1854年，曾國藩已從廣東購買洋炮。曾國藩本人認為，湘軍在湖南湖北地區獲勝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在1860年，后來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聯軍的火力輕易地打退了太平軍，這給曾國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860年12月，他雖然反對俄國提供海軍援助以鎮壓太平軍的建議，但仍提倡“師夷智”，并且試圖制造西方槍炮和建造汽輪船。1861年8月，當曾國藩支持向英國購買一支艦隊時，他強調必須學會在中國生產新軍事裝備的必要的技術。因此，必須“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10]](#_10_Yin_Zi_Lu_Shi_Qiang___Zhong)1861年收復安慶后，曾國藩派了幾個具有一定科技知識的中國數學家到安慶的兵工廠，其中有華蘅芳、徐壽和李善蘭。

曾國藩的自強觀點不只是單純地采用西方技術。他經常反復強調他的觀點說，要安置“賢且智者”到成為武力基礎的管理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視自己倡導的關于組織和訓練軍隊的主張。但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術。1862年6月，他的日記寫道：“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11]](#_11_Yin_Zi_Deng_Si_Yu_He_Fei_Zhe)

1862年初李鴻章在準備援救上海時，似乎就已決定“用夷變夏……圖在復與之為無町畦，而求自強之術耳”[[12]](#_12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當李鴻章和他的淮軍乘著從英國商行租來的輪船通過太平軍控制區沿長江順流而下時，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有機會思考西方技術的價值。李鴻章從上海不斷地寫信給曾國藩，贊揚外國軍隊遵守紀律和外國槍炮的巨大破壞力。他在評論一次戰役時說，“洋兵數千槍炮并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李鴻章的淮軍開始用西方武器來裝備它的一部分部隊，并且開始習西洋操練。李鴻章說：“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戰之……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此外，李鴻章在上海獲得的處理世界事務的知識，更加深了他的個人閱歷。1863年他寫信給曾國藩說：“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余，敵外國亦無不足。”近幾年來，俄國和日本已經獲得了西方技術；他們的大炮和輪船也漸漸地變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們與英法進行競爭。“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長可自立。”[[13]](#_13_Yin_Zi___Zhong_Guo_Dui_Xi_Fa)李鴻章除了認識到中國軍事上的弱點外，在與富饒的西方對比之后，又痛感中國的貧困。他對洋人在條約商埠中所取得的經濟勢力感到憤慨，因此認為自強是一個長期的需要。[[14]](#_14_Tong_Shang_Shu__Di_18__19__3)

李鴻章的著眼點并不局限于單純使用西方武器。根據他在上海的經驗，他多少已知道一些關于機器生產的復雜性及西方挑選和培養人員的辦法。他得出的結論是，自強需要調整中國現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錄用制度。當他建議在上海設立一所外語學校時，他還要求學校教授西方的數學和科學。1864年春，他給恭親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條他稱之為變法的建議。[[15]](#_15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李鴻章抱怨在政府的從事制度中強調文字之學。其結果把軍事交給了一些未受過軍事知識訓練的人，而這些人與上流人物一樣蔑視技術。

中國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

李鴻章還指出，中國還因學識與技巧之間缺乏配合和協調而吃盡苦頭。“蓋中國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并。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李鴻章推測歐洲在這方面的制度則不然，在那里據說機器的發明者一定會得到當官的榮譽：“（在西方）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官，世食其業，世襲其職。故有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其通而后止。”

日本努力學習西方技術的精神很使李鴻章感動。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經把名門子弟送到西方工廠去當學徒，以獲得“制器之器”，然后在國內安裝。如果東海彼岸的小國日本尚能及時改變它的政策，難道中國就不應該改一改它的政策？李鴻章引用了《易經》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窮，事事可通。”他建議朝廷在用人時采用新政策，其辦法也許是在考試制度中對精于技術的應試者另設新科。

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鴻章關于考試制度方面的建議從未被清帝認真考慮過，雖然恭親王確實把李鴻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李鴻章的主張的具體結果是清帝批準創辦江南制造局（1865年創立）。他在一份關于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詳細地談到了機械對民生所作的各種貢獻。

洋機器于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料數十年后，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16]](#_16___Li_Wen_Zhong_Gong_Quan_Ji)

左宗棠（1863—1866年任閩浙總督）也持有李鴻章關于自強的一些觀點。他直到1862—1864年才真正強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戰，當時他在浙江指揮反對太平軍的戰役，并且經過一番猶豫后，決定接受由法國領導的法華聯軍的援助（見第九章）。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國人給他帶來了關于西方的輪船和火藥武器的知識。鎮壓太平天國以后，部分地由于法國人的勸告，他建議北京采用西方的技術，特別應采用造船的技術。西方的大炮并沒有使左宗棠產生深刻的印象，這也許是因為援助他的那支法國人訓練的軍隊，沒有英國人和常勝軍所擁有的、并為李鴻章目睹的那種現代化大炮。但他對輪船在1864年收復杭州的戰役及以后兩年對沿海海盜的戰斗中所作的貢獻非常欣賞。

像曾國藩一樣，左宗棠也認為自強政策應包括改進吏治和實行更嚴格的軍訓制度。但他強調必須學會西方的技術。“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左宗棠為人很謙虛，所以看到了中國知識遺產的弱點：“中國之睿知運于虛，外國之聰明寄于實……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17]](#_17_Zuo_Zong_Tang____Zuo_Wen_Xia)左宗棠從建議在福州建造海軍船塢（1866年建成）起，就認為自己是一個自強運動的倡導者。但他以后在中國西北的15年中，雖然最后在蘭州建了一個毛紡廠，但他的職務與李鴻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機會貫徹他的思想。

### 郭嵩燾與馮桂芬

自強運動的發起是由于中國的某些高級官員開始認識到中國有此需要，但它的意義在地位較低的人（這些人充當高級官員的顧問，并且對后者有一定的影響）中得到更充分的討論。在咸豐時期，翰林院的一名學者郭嵩燾（1818—1891年）已經為妥協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學上的理論基礎。他在24歲時已在浙江省東部親眼目睹鴉片戰爭。戰后不久他經過反省后認識到，“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理失宜”。他不斷廣泛地閱讀歷史和仔細考慮邊疆問題的重大事件，終于得出一個總的結論，即處理世界大事，勢與理都應重視——換句話說，真理總要順應生活的現實。既然歷史的本質是變，那么人們就應使自己適應形勢的需要。1856年他來到上海，他羨慕西方富強的情感與日俱增，并且進一步弄清了他對“勢”和“理”的概念。在1857年廣州的戰斗開始后，郭嵩 燾、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職（他在1847年已進入翰林院）。1858年當英法艦隊迫近大沽時，北京的許多官員主戰，郭嵩燾等少數人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夷務“不戰易了，戰便不能了”。他在1859年被調往天津幫助沿海防御時，向僧格林沁建議：“洋人以通商為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 1859年當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時，京都的人們都興高采烈，但郭嵩燾卻感到憂心忡忡，稱病返回了故鄉湖南。[[18]](#_18_Guo_Ting_Yi_Deng____Guo_Song)

郭嵩燾表示痛惜的是，中國在與西方接觸的二十余年中未得到教訓。1862年李鴻章到達上海后，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郭嵩燾堅決主張，在處理夷務時人們應力圖理解外國人的動機和考慮各種現實，而不應只考慮原則。在19世紀60年代初，他已在進行探索，以期超越技術的范圍對西方的力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談軍隊和軍備了。

但是，郭嵩燾、對李鴻章的影響不如另一位翰林馮桂芬（1809—1874年），后者是一名對經世致用感興趣的學者。馮桂芬在蘇州的書院中從事研究和教學，一直到1860年蘇州陷于太平軍之手時為止。他那時發現自己廁身于上海逃難紳士界中，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鎮壓太平軍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又聽到英法聯軍占領北京的消息。1861年他寫了《校邠廬抗議》，對中國亟須國內改革這一點作了意義深遠的建議。此書的最后四篇文章是就如何應付西方挑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馮桂芬不排除把戰爭作為政策來運用，但他對中國的顢頇和動搖感到痛惜。在過去，“宜戰反和，宜和反戰，而夷務壞；忽和忽戰而夷務壞；戰不一于戰，和不一于和，而夷務更壞”。他注意到“夷人動輒稱理，吾即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

馮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們互相既是勢均又是力敵的，所以結果至少是暫時出現僵持狀態。但在將來這四個國家可能達成協議而合謀反對中國，或者是某一國可能取得獨占地位；總之，不論出現哪種情況，中國都會失算。因此，中國極應及時自強。“不自強而有事，危道也……矧一自強，即可弭之使無事也。”[[19]](#_19_Deng_Si_Yu___Fei_Zheng_Qing)

那么，怎樣才能達到自強呢？馮桂芬認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問的自我批評；此外，當人們在尋找自己的缺點時，也應毫不猶豫地向他人學習。“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20]](#_20_Feng_Gui_Fen____Xiao_Bin_Lu)這是多么大膽的宏論！馮桂芬的心胸很開闊，所以在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的利用方面，在溝通君民思想的條件方面，在名與實（即施政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統一方面，他完全認識到西方都超過了中國。但他又宣稱，中國本身的經世致用的智慧足以對這些事務進行革新。馮桂芬提出了許多關于改革吏治的建議，他認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但中國只有在對科舉制度作出重大改革時，才能向西方學得科學和技術。[[21]](#_21_Feng_Gui_Fen____Xiao_Bin_Lu)

可能正是由于馮桂芬的建議，李鴻章才在1864年向恭親王提出要在考試制度中為精于技術的考生開設新科。馮桂芬甚至走得更遠。他攻擊現存科舉制度的考試內容貧乏，并且對文人的前程產生了不利的影響。“聰明智巧之士窮老盡氣，銷磨于時文試帖楷書無用之事。又優劣得失無定數。而莫肯徙業者，以上之重之也。”馮桂芬主張來一次大變動。他建議對兵工廠和造船廠中的優異工匠應授予舉人的功名，對那些能改進西方產品的人應授予進士的功名，并允許他們參加殿試。“今令分其半，以從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上好下甚，風行響應，當有殊尤異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22]](#_22_Feng_Gui_Fen____Xiao_Bin_Lu)

李鴻章和馮桂芬的想法說明，至少有少數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術時，愿意看到對神圣不可侵犯的科舉制度進行調整。19世紀60年代后期的另外一些建議則要求改革傳統的軍事制度。當1864—1865年李鴻章在考慮裁減他的淮軍至3萬人時，他建議大量削減全帝國的綠營軍，以便把節省的經費用于裝備和訓練剩下的軍隊。以后幾年，有幾個官員也同樣提出了改組綠營軍的建議。1866年8月，總理衙門提出的關于從直隸省綠營軍中產生1.5萬名“練軍”的計劃，得到清帝的批準。這支新軍是用西方武器裝備的，并且一反原來綠營軍的做法，只駐扎在少數幾個中心城市，并派固定的軍官來率領這些部隊。在1866年更晚的時期，左宗棠提出了有關福建浙江兩省綠營軍的同樣建議。1867年，江蘇布政使丁日昌建議，為了節省經費以用于新武器和新訓練計劃，各省綠營軍應至少裁減一半；在1869年他任江蘇省巡撫時，獲準把撫標建制下的1600名綠營軍減少1/3，并給以嚴格的訓練。[[23]](#_23_Liu_Guang_Jing____Ru_Jia_Ai)

那么，為什么這些建議沒有獲準在整個帝國推行，或至少在幾個開始這樣實行的省中貫徹呢？這回答應與當時總的學術氣氛和根深蒂固的傳統制度的惰性有關。甚至在19世紀60年代動亂的10年中，深信需要西方技術的士大夫畢竟不多；而傳統的文化準則的控制力量仍像過去那樣強大。像科舉考試和綠營軍等制度不僅有廣大既得利益集團支持，而且由于傳統而獲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質。現代化顯然需要沖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礙。

## 政治和財政結構

### 宮廷政治和總理衙門

自強運動在北京得到了總理衙門的支持，恭親王任其領班大臣直到1884年（除了中間一段短暫的時期被名義上奪去全部職務外）。起初，總理衙門負責有關通商事務的談判，但到后來成為整個“洋務”的主要協調機構；“洋務”是清政府的一種新型活動，它包括對外交、外貿收入以及與貿易商人和傳教士有關的一切事務的處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計劃，如外語學堂、軍隊訓練、兵工廠、造船廠、開礦、商船和海軍等事宜的管理。總理衙門或者直接制定這些計劃，或者在朝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對于自強運動努力的成敗，至少是部分地取決于總理衙門的政治勢力。

從1861年總理衙門創設以來的大約23年中，人們把它與軍機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它確實可以被看作是軍機處的一個機構。總署大臣的人數不斷增加：1861年為7人，1869年為10人，1876年為12人。從1861年至1868年，五名軍機大臣中有三人兼領總署大臣；從1869年至1875年，五軍機中有四人兼領；1876年至1881年，全部兼領（從1880年起，軍機大臣的人數增至六人）；而從1882年到時局大變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領總署大臣。[[24]](#_24_Meng_Si_Ming____Zong_Li_Ya_M)由于軍機處是清帝在處理重大政策和關鍵性人事問題方面的主要咨詢機構，所以，總理衙門對實現清帝的政策和政綱就處于一種戰略地位了。

當然，所有重要的提議仍然必須由清帝親自批準。恭親王和文祥（他在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兩處兼職）享有權勢的大小取決于這時行使著君權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遲是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慈禧（她的鋒芒超過了與之共同攝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級官員和皇族中提拔對立派來設法削弱恭親王的權力。

慈禧策劃的1861年宮廷政變，當然應該感謝恭親王的合作。在隨后的年代里，她作為一個仍然缺乏經驗的統治者，不得不在外交和軍事上大大地依靠恭親王。恭親王的確享有相當大的權勢，但在1865年，慈禧對他的地位給了一次打擊。4月初的一道朱諭，是由慈禧親筆用帶有別字的漢文起草并交大學士們潤飾后下頒的，[[25]](#_25_Guan_Yu_Ying_Yin_De_Ci_Xi_Sh)它列舉了言官對恭親王的一些指責，如目無君上，挾制圣意，以及暗使離間。其他宗室及大臣都為之辯護。不過10日，慈禧決定恢復他在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職務。她擔心恭親王的去職可能會在地方以及中央政府內部引起恐慌，也許更擔心列強的態度，因為它們被認為對恭親王有著特殊的信任。慈禧怕歐洲人會再來找麻煩，從而失去對形勢的控制。

雖然恭親王在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復職了，但他的聲望和權勢并沒有完全恢復過來。他被永遠地奪去了1861年所封賜的“議政王”頭銜。朝廷的命官們這時也都知道他并不總能邀得太后之寵眷，而且慈禧開始提拔那些以學識高深馳名的官員，他們的清議能力可以抵消恭親王無視祖訓的傾向。在恭親王被剝奪權力的10天期間，慈禧專與咨詢的是周祖培、倭仁，這兩名大學士一直在妒忌軍機處的權勢。1865年冬，內閣學士李鴻藻，由于擔任侍講，得以經常覲見慈禧，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署戶部右侍郎。李鴻藻的為人在思想上驕橫傲慢，在政治上圓滑狡詐，所以不久就成為宮廷中一派的領袖：這一派包括倭仁（直到他在1871年死去時為止）和后來十分出名的頑固派如徐桐和翁同龢等人在內。李鴻藻派普遍地批評恭親王對歐洲人的懷柔政策，特別是仰仗倭仁為思想楷模的青年御史們，對采用西方技術的必要性持懷疑態度。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余波中，李鴻藻及其朋友們保護了在天津曾經助長暴亂的官員，并批駁了對法國采取像恭親王和曾國藩所提倡的那種遷就態度。[[26]](#_26_Jian_Li_Zong_Tong___Liu_Feng)

在1865年以后新的宮廷聯盟中，慈禧的妹夫，即恭親王的弟弟醇親王也站到了反對恭親王的一方。他在情緒上是敵視西方的，據說他在煽起“天津教案”中曾起過作用；總之，他猛烈地攻擊恭親王在解決教案時所采取的態度。在1871年3月呈遞慈禧的密折中，他指責恭親王和另一總署大臣董恂“一味媚夷”。醇親王對總署大臣又可以任軍機大臣一事極為不滿。“辦夷之臣，即秉政之臣……常有萬不可行之事，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請旨集議。”[[27]](#_27_Wu_Xiang_Xiang____Wan_Qing_G)慈禧認為這一密奏不宜公開，但她設法使以后的一切有關外交和防務政策的事項都要在醇親王和與他意見相同的官員以及宗室諸王共同參加的宮廷會議上商討。總理衙門的決策權就這樣被削弱了。

恭親王很自負，并不掩飾自己的不滿，他繼續冒犯這位皇太后。1869年他和其他軍機大臣們進行策劃，使慈禧別無選擇地被迫授權山東巡撫丁寶楨逮捕和處決了她寵幸的太監安得海，因為他違制私自離京南下，一路窮奢極侈，極為招搖。安得海因向慈禧密告許多高級官員而臭名昭著；此時慈禧因安得海之死而遷怒恭親王。1873年同治帝到了成年并開始親政后，恭親王反對這位年輕的君主為慈禧的享樂而重建圓明園的計劃。恭親王的奏疏慷慨陳詞，像一個大膽的御史那樣剛正，它規勸清帝不要行為失慎（包括微服出游），并力諫他少浪費國庫財富，指出這首先要從停止重建圓明園工程開始。1874年9月，清帝無疑是根據他母親的示意，將恭親王革職降級——至少達一天之久。第二天的諭旨宣布按照皇太后的旨意，恭親王的職務和爵祿都予以恢復。這種既表明寬容又顯示權威的兩面三刀做法，為的是讓恭親王出丑。[[28]](#_28_Xiao_Yi_Shan____Qing_Dai_Ton)

1875年1月，同治帝沒留下一個繼承人就死了。慈禧選擇了醇親王的兒子載湉當新皇帝，以光緒為年號。向新統治的過渡顯然進行得比較順利，盡管有少數官員確實提出過規諫，要求遵從祖制從下一代人中選出新皇帝，以維護孝治的禮教。載湉只有四歲，他的母親是慈禧的妹妹。兩位太后（慈安和慈禧）第二次攝政；慈禧將長期不間斷地成為實際的統治者。

新皇帝的父親醇親王暫時引退。但有關重大事務，他都以親王的身份參與廷議，而且他的主張比以前受到了更大的重視。1876年，靠著秉性和機敏在宮廷中贏得各派尊重的文祥病死，恭親王的處境進一步惡化。

### 通商大臣：李鴻章的興起

在實際籌劃和督辦自強新政的過程中，分管南洋和北洋的兩名通商大臣，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五口通商大臣之職建置于鴉片戰爭之后，原任大臣已于1859年調往上海。1860年以后它被稱為南洋通商大臣。原來的五個通商口岸以及在長江和南方新開放的口岸都歸這位大臣管轄。1860年，江蘇巡撫薛煥兼領該職，甚至在1862年4月他離任巡撫之職后仍繼續擔任此職。從1863年初至1866年底，江蘇巡撫李鴻章兼領南洋通商大臣之職。1866年底曾國藩轉任南京時，他就成為通商大臣。此后，該職始終由兩江總督兼領。

北洋通商大臣之職最初設于1861年天津開放之時，由于直隸總督不能經常在那里處理對外關系方面的各種問題，恭親王的幫手崇厚被委派為通商大臣（通常稱為[北]三口通商大臣），駐在天津，處理在天津和牛莊、芝罘發生的涉外事務。不像南洋通商大臣，崇厚沒有欽差大臣的身份；重大事情他都要會同直隸總督、山東巡撫，或者奉天府府尹，一起采取行動。然而，當1870年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決定他以欽差大臣的全權地位負責有關對外貿易和畿輔海防等事務。（北）三口通商大臣的職銜被取消后，李鴻章的兼職被總稱為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住在天津，只有冬季住在直隸首府保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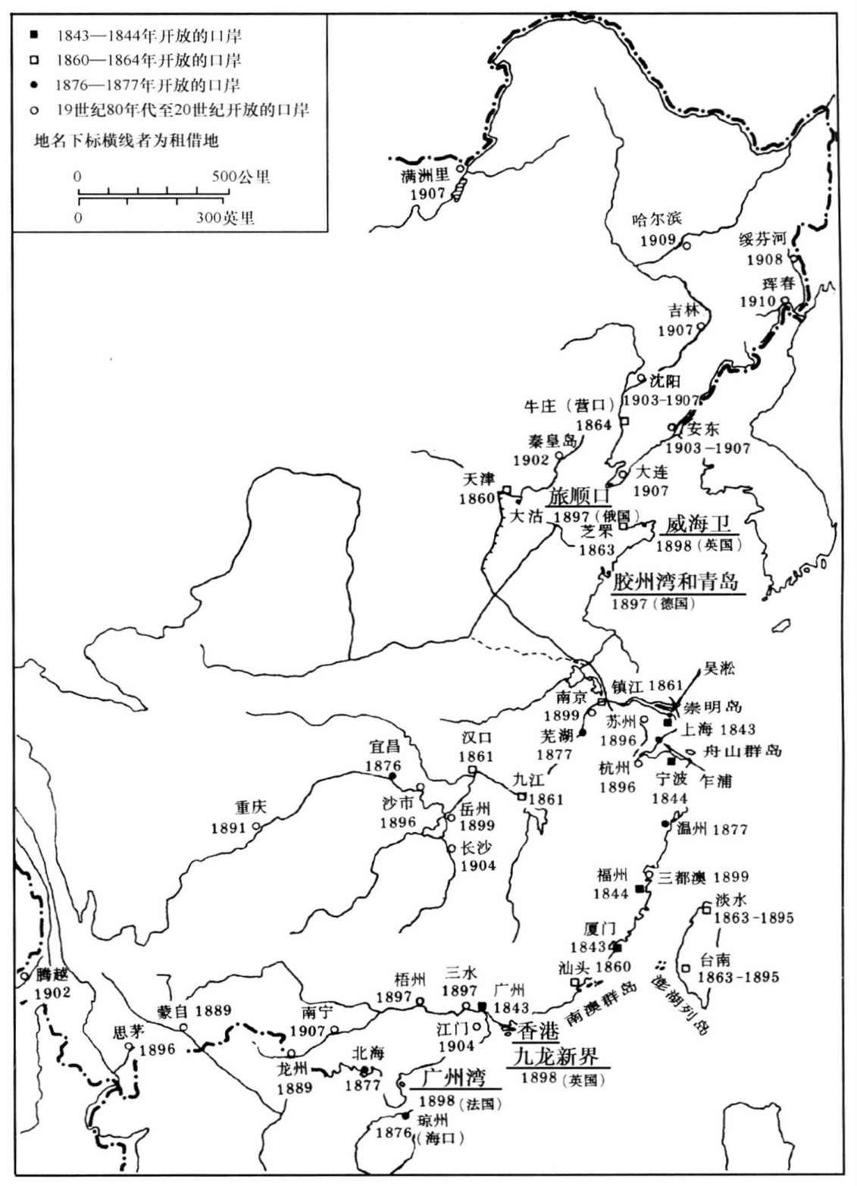
由于兩名通商大臣負責處理在各通商口岸與西方交往時發生的一切事務，所以1862年的一道諭旨授予了他們監督其轄區內各分巡道員的權力，這些分巡道員分管的地區包括各通商口岸——例如，福州道臺和寧波道臺要向在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稟報“洋務”。[[29]](#_29_Wang_Er_Min____Nan_Bei_Yang)南、北洋通商大臣的權限還擴大到包括督辦所有利用西方知識和人才的新興事業。19世紀60年代初，薛煥以及他之后的李鴻章，監督執行了雇傭外國教官的專門軍事訓練計劃。1865年李鴻章創辦了江南制造總局，1867年崇厚創辦了天津機器局。1866年末，曾國藩轉到南京任兩江總督之職后，他就督管了李鴻章創辦的各個兵工廠和外語學堂。1870年曾國藩得到清帝的批準，設立了江南輪船操練局，并調給它上海江南制造總局建造的軍艦，甚至還有幾艘福州船政局制造的軍艦。南洋通商大臣此時是大部分自強計劃的實際協調者。然而福州是一個獨立的中心。閩浙總督左宗棠1866年底調任西北后，福州船政局就由他保舉的沈葆楨經辦，為此沈葆楨被欽命為福州船政大臣。但是，沈葆楨在爭取新任閩浙總督和福建巡撫的合作方面存在著困難。

從1870年隨著李鴻章成為北洋通商大臣以來，自強新政的領導權就被這個強有力的人物所掌握。李鴻章取得了曾國藩的合作（后者以前曾接受了李鴻章關于考慮江南制造總局各項新計劃的建議，并與李鴻章聯名上奏，得到敕準選派青年學生赴美受訓）。李鴻章對華北以外的事務也有所干預，這在行政管理方面有詞可托，因為通商大臣的體制并無明確規定。由于北洋通商大臣有保衛畿輔重地的職責，李鴻章可以直接同上海道臺聯系，商討有關防務乃至貿易事務，盡管上海不在李鴻章的管轄之下。還由于江南制造總局是李鴻章1865年奏請批準創辦的，所以他被公認為對這個兵工廠的事務有發言權，雖然最后的決定權屬于南洋通商大臣。還由于赴美留學使團是根據曾國藩、李鴻章1872年的聯名上奏批準的，所以它就受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共同監管。[[30]](#_30_Jian_Ken_Ni_Di___Li_Hong_Zha)曾國藩死于1872年3月，其后不論誰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和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都盡可能設法與他們合作。兩江衙門掌管著漕糧，而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1873年初期成立）卻依賴著它所享有的漕糧北運的特權。更為重要的是，江蘇省的厘金不斷為淮軍提供大部分的年度軍費開支。盡管19世紀70年代初淮軍駐扎在五個省份（而且在直隸只有1.5萬人），但建立這支軍隊的李鴻章卻被清帝視為它的協調者。

1872年1月，福州船政局以及江南制造總局的造船計劃都遭到朝廷大臣們的攻擊。這時，李鴻章、曾國藩二人都出來為之辯護。李鴻章本人與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楨聯合起來，特地向軍機大臣們呼吁繼續對福州船政局給予財力支持。在1874年與日本沖突而發生的臺灣危機期間，李、沈二人都上疏為自強運動提出了一個龐大的計劃，其中包括一個新的海軍規劃，用洋機器采礦，以及改革現行的人事制度（沈重申他以前提出在考試中增設算學新科的倡議；李則提議在沿海和長江各省會設立講授西學的學堂，畢業生授予文職官銜）。[[31]](#_31_Chen_Ke_Bian____Xian_Wen_Su)雖然最后的這些提議未受朝廷重視，但新的海軍規劃卻得到批準，并且有兩項采礦工程被授權進行。最使李鴻章高興的是，在他的保舉下，沈葆楨1875年5月被委任為兩江總督和南洋通商大臣，同時李、沈二人又分別被特加為北洋和南洋防務大臣。1876年9月，李鴻章保舉的另一個人丁日昌被委任為福州船政局（此時劃歸在南京的通商大臣管轄）的督辦船政大臣。丁日昌不久又被任命為福建巡撫，并負責改進臺灣的防務。李、沈和丁三人合作得很好，而且在自強活動中——例如，在海軍計劃和派遣學員到歐洲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協作。

雖然李鴻章和沈葆楨作為通商大臣享有相當大的權力，但顯然他們對政策的影響歸根到底還要依靠北京的支持。總理衙門熱心地支持了李、沈的某些建議，但對他們的另一些建議要么不關心，要么感到辦不到。例如關于資助福州船政局的問題，李鴻章在1872年就已提出要一律停建軍用駁船，并把撥給傳統水師的經費轉用于火輪軍艦；[[32]](#_32_Luo_Lin_Sen____Zhong_Guo_Fa)這一提案沒有得到總理衙門的支持。1875年5月當朝廷討論沿海防務時，文祥對李鴻章關于鐵路、電報乃至在各省會設立講授西學學堂的想法持同情態度。但是，兩名頑固派的漢族官員，對李鴻章的建議猛烈攻擊，致使它們得不到進一步的討論。是年冬，李鴻章赴京師謁晤恭邸，請先試造在江蘇一地到北京的鐵路，以確保重要物資的轉輸。李回憶說：“邸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復請其乘間為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33]](#_33_Liu_Guang_Jing____Li_Hong_Zh)在朝的頑固派顯然已經形成一股不得不加以認真考慮的力量。雖然如此，李鴻章仍然發展了與恭親王、文祥的工作關系，而且也增進了與沈桂芬和寶鋆兩位軍機大臣的關系，所以他的某幾項計劃確實得到了朝廷的支持。這時，他才發現為了推動其興建海軍和發展工業的計劃，必須與醇親王聯合，以便贏得慈禧本人的歡心。

雖然李鴻章和沈葆楨都是欽差大臣，但他們卻沒有管轄其他督撫的權力。丁日昌是一個親密的同盟者，但他受到了京官們的猛烈攻擊并在1878年決定辭去巡撫職務。部分是由于有李鴻章的薦舉，才使三名前淮軍將領在19世紀70年代成為巡撫：1872—1874年張樹聲任江蘇巡撫，1874—1878年劉秉璋任江西巡撫，1876—1877年潘鼎新任云南巡撫。李鴻章經常寫信給這些人和在各省與之友好的其他官員，力主建造兵工廠和用洋機器采礦。許多人在建造兵工廠方面向李鴻章求助，以此作為響應；但在采礦，特別在開辦講授西學學堂等方面，除非北京本身積極支持鼓勵，否則各省官員很少有人采取行動。[[34]](#_34_Guan_Yu_Jing_Guan_Men_Dui_Di)



地圖16 通商口岸體系的發展

### 赫德和關稅

盡管自強的倡議必須由開明的滿漢政治家提出，但在中國的某些洋人對推動和促進這些活動卻起著關鍵性的作用。19世紀60年代中期，英國外交官阿禮國和威妥瑪以及被清朝雇用的赫德給總理衙門提議的內容，不僅涉及處理外交關系的技術問題，而且還談到采用有利于中國的各種西方新技術的問題。有名的1865—1866年的威妥瑪—赫德備忘錄，由總理衙門轉呈清帝研究并供各省官員討論。備忘錄建議實行某些內政改革，并特別強調必須派遣外交人員出國和采用包括鐵路、電報以及機器采礦在內的西方新技術。然而赫德和威妥瑪又提出，這些新技術應靠西方的企業引進，并應鼓勵在這些領域內進行中西合作。赫德—威妥瑪建議中的這一部分在當時遭到了大臣們的強烈反對，因為他們特別害怕這些由西方控制的企業。甚至連了解這些新技術內在價值的李鴻章也反對外國人向鐵路、電報和采礦業投資。在談到西方提出關于修改中英條約的要求時，他只建議中國在自己的鐵礦和煤礦中雇用外國工程師。[[35]](#_35_Bi_Nai_De____1867__1868Nian)

赫德對清政府的主要貢獻在于他組織的高效率的海關服務工作。中國傳統的關稅管理每年必須為內務府提供“盈余”，所以因貪污行賄而聲名狼藉。自1861年因李泰國請假回國而由赫德接管以來，各通商口岸的新海關事實上是由他創辦的。1865年，海關總稅務司由上海遷到北京。根據清帝批準的“關于招聘洋人協助海關稅收管理規定”，赫德繼續享有管理海關全體職員的大權。外國職員——從各通商口岸的稅務司到幫辦和潮汐觀測人員——以及華人幫辦和職員，都根據赫德制定和認真執行的業務條例歸他調配管理。赫德再三提醒他的部屬，他們從中國政府領取薪金，因此就是“中國政府的雇員”。征收的關稅都解往由華人海關督辦（大都是各通商口岸的道臺）管理的中國海關銀行。但關稅的估算以及賬目和報告的編制都由赫德的部屬來進行，他們在成功地防止走私和確保賬目準確無誤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截至1875年，海關的洋員增到408人，華人職員增到1417人，而在10年之后，則分別為524人和2075人。其間，海關總稅收不斷增加，從1865年的830萬兩增加到1875年的1200萬兩，而1885年增加到1450萬兩。[[36]](#_36_Lai_Te____He_De_Yu_Zhong_Guo_1)

如果沒有赫德的有效的海關機構，各通商口岸的貿易和航運不會那樣有條不紊地發展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主要貢獻是促使中國商業的發展，大批的華洋工商界都從中得到了好處。但清政府仍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北京深知海關收入的利益，并且責成各通商口岸的道臺來負責，所以朝廷就控制了這筆日益增加而又可靠的稅收。19世紀70年代末，為北京所確認的清帝國的總稅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內，計約6000萬兩。雖然最大部分的收入仍然來源于田賦，但厘金仍達到1800萬兩（占30%），關稅仍達到1200萬兩（占20%）。[[37]](#_37_Luo_Yu_Dong____Guang_Xu_Zhao)由于舊稅源乃至厘金到19世紀60年代初幾乎完全被指定作為既定的和不能機動的開支，所以關稅對政府的一些新辦事業以及緊急需要來說，其價值就無法估量了。關稅基金提供了一些新辦事業（如京師同文館、神機營、江南制造總局和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學使團、駐外使館和1875年以后的新海軍計劃）的一部分或全部經費。[[38]](#_38_Chen_Wen_Jin____Qing_Dai_Zhi)

由于關稅的分配是由北京控制，所以清帝對上述每一項事業的批準是保證其經費供給的關鍵。于是出現了下面的做法，即把60%的關稅分撥給有關各省，部分用于中央所轄的活動，例如用作駐扎在各省的新軍的軍費，或者解往北京用于清帝的興建事業。余下的40%首先被指定用作對英法戰后向英法兩國的賠款。賠款在1866年年中付清后，這40%就歸在北京的戶部掌管，不過動用這項資金須經特別申請，經常要得到清帝的批準。1874年李鴻章提出每年應從這筆款項中撥出400萬兩作為海防經費。這筆開支得到批準，但清帝不久又認為別的用途有優先使用這40%款項的權利——特別是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軍費和清帝在北京周圍的興建。左宗棠在軍事上之能夠取勝，是靠著從幾家英國銀行借得的五筆為數1470萬兩的貸款：它們由關稅作擔保，并且最后由關稅（部分來源于60%的款項，部分來源于40%的款項）來償還。[[39]](#_39_Jian_Si_Tan_Li___Qing_Ji_De)

由于總稅務司赫德要負責確保征收的關稅不斷增長，所以他的工作必然被當成是清朝政府財政的主要支柱。在他這一方面，赫德完全控制著海關機構。清帝批準給稅務司花銷的巨額津貼（1876年增至每年100萬兩），使得海關的洋員能夠過上豪華的生活，這為許多中國官員所羨慕，并常常引起英國領事們的妒忌。總理衙門對赫德的信任，是多年來他在以下幾個方面有著出色的表現而形成的：首先他是作為海關機構的全權管理者，其次是作為按總理衙門指令行事的雇員，第三是作為英帝國在各通商口岸處于領導地位時期的英國人。事實上，赫德成了總理衙門的主要外國顧問，并且能夠不時地對政策產生某些影響——例如，推動以1866年半官方的斌椿使團為開端的各種使團出國，擴充同文館使其包括算學和科學學科。赫德關于對外政策的意見和他在外交談判中的幫助，得到了總理衙門的高度贊揚；有幾次他的調停對清政府與歐洲各國的關系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盡管赫德很想看到中國變得強盛起來，但他對19世紀70年代中國自強政策的直接影響是有限的。他試圖勸說清政府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造幣廠，但這一設想既未得到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支持，也沒有被清朝的官員認真考慮過。赫德提議建立全國性的郵政局，但僅僅在19世紀70年代得以建起一個屬于海關總稅務司的郵政司，限于有限的一般性營業。[[40]](#_40_Jian_Fu_Lan_Ke__Jin___1845)赫德發現，他不能爭取清政府采納他關于實現中國所需要的教育和文官制度改革的意見，這就像李鴻章和沈葆楨不能使他們的考試制度的建議引起重視一樣。

從1863年李泰國—阿思本艦隊流產以來，赫德一直希望幫助中國組織一支現代化的海軍艦隊，由在華的英國僑民擔任一定的職務，負責艦艇、船員和提供訓練等事項。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赫德幫助李鴻章和其他官員從英國，主要從英國的阿摩士莊廠購買海軍艦艇。赫德的代理人金登干是他派的駐倫敦海關辦事處的稅務司；金登干可以代表赫德購買船只和其他物資，甚至還可與英國當局進行半外交性質的接觸。即使中國第一任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在1877年于倫敦開設使館之后，赫德和金登干利用郵件和電報進行密切聯系，仍能多方面地在專業問題上效力：例如，在中國沿海建立燈塔和氣象預報設施；代表中國出席在巴黎、維也納和其他地方的國際博覽會；以及為同文館聘用教授等。由于身居這樣一種中介人的地位，既與恭親王接觸密切，又能單獨接近倫敦，赫德看到了許多改革的良機。他甚至一度希望清帝國政府能夠委派他擔任總海防司的新職。“我要使中國強大起來，我要使英國成為它最友好的朋友。”赫德深信如果有一個與他創建的海關相似的海軍組織，中國在五年之內就會有一支難以對付的海軍。他并不認為英、中兩國之間有什么戰略性的利害沖突，但他還是很謹慎的，并始終意識到他只是一個顧問，他之所以受到信賴是因為他的工作取得了成果。他忠實于海關總稅務司的職守，并介入了幾項冗長的訴訟，在這些訴訟中他針對英國政府就條約規定的海關事務，為中國的權益辯護。他達到了他的一個主要目的，即確定了如下原則：在華的英國雇員為中國辦理公務時，必須首先把自己當作是中國官員，而不是在華的英國僑民。然而外國雇員總是有他們的局限之處的。1879年9月，赫德提出一項備忘錄，擬請任命一位總海防司，清廷對此本已有所考慮，但一經李鴻章和沈葆楨評頭品足，即被擱置起來。[[41]](#_41___Li_Wen_Zhong_Gong_Quan_Ji)然而，在這些忠心耿耿的中國官員和英國國民之兩種人之間，不管相處得如何圓通和如何相互合作，但清帝國政府的選擇是非常清楚的。很顯然，把估算和上報關稅的職責委托給外國顧問是一回事，而讓他們去經管軍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 早期階段：長遠的規劃

上面已經提到，由于同治朝廷中的權力結構，以及慈禧太后對一批用以抵消恭親王勢力的極端保守的官僚的依賴，諸如修改科舉考試制度等基本的改革建議都得不到加以考慮的機會。盡管如此，政治思想上到底還是允許一些規劃得以推行：這里主要指的是引進有關軍事裝備的技術，但也包括傳播西洋科學以及使一些經濟設施現代化的最初步驟。這些早期的企業實在太少了，然而回顧起來，直到19世紀70年代晚期為止的這一時期，仍應該看作是一個希望的時期。因為當時國內政治還不是那么復雜，國外對中國的壓力也不是那么嚴重，還不會使這些為數很少的事業的長期性計劃無法實現。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把注意力放在造就人才上，包括向國外派遣留學生。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兩者的創建，與其說是為了馬上獲利，還不如說是為了與中國水域中的西方航運業以及外國進口的煤炭競爭，以維護中國對本國經濟的控制權。

由于其中有些項目過于龐大，它們陷入了組織不力和經營困難的積弊之中。新的事業通常以特設新的政府機關的形式出現；它們在制度上比起一般政府機構要靈活一些，然而總的說來仍舊沒有擺脫清朝官僚主義的習俗。例如京師同文館，是由總理衙門直接管轄的。雖然終于授權給一個美國傳教士學者（丁韙良）負責指導教學，但是這所學校還是繼承了一些滿洲旗人學堂的做法。多數其他項目，例如機器局、船政局，甚至招商局和礦務局在內，都是由省一級通過新設置的“局”來辦理的。這些局是清帝按照那些以往專為某項目的設置經辦的先例而授權設立的：這類機關過去通常為清帝所敕準，而在對太平天國的戰爭開始之后，就變得格外多了。經辦人員一般由通商大臣或者總督選定，并由他簽發札委。這些人通常具有“總辦”或“會辦”的頭銜，也可以稱作“委員”。[[42]](#_42_You_Guan_1850Nian_Yi_Qian_Zh)這種新設置的局比老式衙門的效率要高一些，這只是因為辦事程序比較簡便，并且現代技術和業務方式迫使它們接受了一些新的辦事準則。但是這些新機構還是保存了不少老一套的做法，而且由于其他官僚部門的干預，常常使流弊加劇，這些流弊有時還相當嚴重。

由于新的事業往往涉及昂貴的進口機器及新的知識和新的生產程序，所以清朝的官吏們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問題和專門技術知識問題。除去各省自己支應之外，只有朝廷里的達官顯貴才能保證從寶貴的海關關稅中得到定期撥款。此外，所需要的其他各種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也有待于開發。一座兵工廠急需廉價的煤炭和運輸煤炭的良好道路，更不用說金屬冶煉工業的支持了。當時普遍缺乏工程師、機械師、自然科學教師以及足以勝任的船長，甚至于也缺乏像經過訓練的鐵匠和礦工那樣的熟練工人。但是，在清朝政府內部還有足夠的意志想把它的一些珍貴寶藏用于這些新奇的事業；而且，在通商口岸有著足夠的西洋人以及足夠的受過西洋教育的中國人，能夠推動自強事業的進行。這些事業能夠成功地興辦起來已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然而真正的問題卻在于它們是否能夠繼續發展，而且在成功的鼓舞之下，它們是否會引起制度和經濟環境的改變。

### 兵工廠和造船廠

清朝模仿西洋技術開始于1862年。當時，曾國藩在安慶這一剛剛從太平軍手里打下的戰略要地上建立了著名的安慶軍械所。軍械所的工作由徐壽和華蘅芳主持，這兩個人是學到一些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的中國數學家。他們制造土炮和火繩槍一類的舊式火器（這種槍中國在鴉片戰爭期間就已經開始生產），除此之外，還試圖制造榴霰彈和雷管。[[43]](#_43_Wang_Er_Min____Qing_Ji_Bing)徐壽制造了一個汽輪使用的小蒸汽機，可惜運轉不佳。1863年，廣東人容閎（他曾在教會的贊助下赴美求學，1854年畢業于耶魯大學，當時在上海經商）由曾國藩的工程師引薦，拜會了這位總督。容閎雖然不是一位工業方面的專家，但卻相當精明地堅持這一主張：中國所需要的是一種通用機器，能夠用它轉而生產制造軍械、輪船所需要的設備，換言之，就是需要一種“制器之器”。隨后，曾國藩決定委派他去美國選購。最初的款項中有一部分是由李鴻章在1864年1月間提供的。

在此之前，李鴻章已經在上海建立了兩座小型兵工廠，其中一座由丁日昌負責，他曾經在廣東省督造軍火，具有一定的經驗。李鴻章還授權前英國軍醫馬格里在松江建立一座兵工廠（這兵工廠于1864年遷到才收復不久的蘇州，并從李泰國—阿思本艦隊帶到中國的一個機器廠得到了設備）。[[44]](#_44_Li_En_Han____Qing_Mo_Jin_Lin)1865年，李鴻章批準了當時已是上海道臺的丁日昌的建議：政府應當購買上海虹口洋人居住區的一家美國商號——旗記鐵廠——的鐵廠和船廠。經過清帝的批準，設立一個局（即江南機器制造總局）來管理這兩個廠子。后來在1865年，容閎購買的機器也運到上海，隨即歸并到虹口的工廠里。與此同時，馬格里的工廠從蘇州遷到南京，命名為金陵制造局。

這種引進西洋機器的努力并不只限于滬寧地區。1866年，清帝批準了左宗棠的奏折：和法國人簽訂合同，在福州建立一座大型造船廠。1867年，崇厚在恭親王的贊助下，求得李鴻章的幫助在天津建立了一座兵工廠。所有上述工廠的目的都是立即生產槍炮船艦，但是，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這兩大中心從一開始還強調培訓中國的技術工作人員。

兵工廠和造船廠的早期業務經營，不可避免地要依賴外國雇員。金陵制造局名義上是由中國總辦領導，實際上是由馬格里管理的。這所兵工廠每年從李鴻章的軍費中得到撥款，大概略多于5萬兩，為淮軍生產信管、炮彈、放炮用的摩擦管和小炮。在1867—1868年，增加了一些新機器，也招聘了一些曾經在烏理治工作過的英國技師。馬格里把他初期成功的原因歸之于他可以直接會見李鴻章，并得到曾國藩的信任。到了1869年，南京已經在生產火箭（一種內藏炸藥的長形炮彈——譯者），并且試鑄更大的大炮了。[[45]](#_45_Bao_Er_Ge____Ma_Ge_Li_Chuan)

比較起來，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規模大得多，在它創建的第一年里用于生產設備的經費就有25萬兩左右；這筆經費主要來源于上海的關稅。被李鴻章挑選擔任會辦的人員大概是最能勝任其職的。上海道臺（1865年是丁日昌，1866—1868年是應寶時）是當然的總辦。其余負有特別責任的二人，一是沈保靖（他一直為淮軍采辦軍火），一是馮焌光（此人雖有舉人功名，據說仍然通曉“西學”）。但是不管怎樣，所有的技術工作還是由外國人負責的。旗記廠的總工程師料而是督造人（開始叫作“匠目”，后來叫作“監工”），他是一個曾受雇于紐約奇異工廠的美國人。旗記的八名洋匠也得到留用，并增雇了其他洋員。制造來復槍的最初努力并沒有成功，但此后不久，這所兵工廠使用一部分自己制造的機器設備，就能夠生產合用的毛瑟槍和小型開花炮了。及至1867年年中，這所兵工廠每天生產毛瑟槍15支，12磅開花彈100發，同時每月平均生產發射12磅炮彈的開花炮18門——在對捻戰爭時，這些彈藥武器立刻證明是有用的。[[46]](#_46_Ken_Ni_Di____Jiang_Nan_Zhi_Z)

雖然后來李鴻章把江南制造局看作他打敗捻軍的原因之一，但是總的說來，江南制造局卻使他大失所望。從一開始，李鴻章就要兵工廠生產一種優質來復槍。可是，一直到1871年增聘的洋員和添置的機器到達之后，江南制造局才開始制造林明敦式后膛來復槍。到1873年年底，生產了這種步槍4200支左右，但不僅它們的造價高于進口的林明敦槍，質量也遠不如后者。這種槍李鴻章連自己的淮軍都拒絕使用。[[47]](#_47_Wei_Yun_Gong____Jiang_Nan_Zh)由于李鴻章仍然不得不依靠進口武器，因此他在1871年改組天津機器局的時候，決定集中力量制造林明敦槍和克虜伯（當時亦譯作“克鹿卜”——譯者）炮所用的子彈和炮彈。幸虧有清帝從天津和芝罘的海關歲入中的撥款，天津機器局在1871—1872年兩年當中花費在建廠和生產上的費用多達25.6萬兩。沈保靖由江南制造局調津接辦；增建了另外三個廠，并聘用了新的洋員。到1874年，這所兵工廠除生產大量的子彈炮彈之外，每天還生產一噸火藥；到這時候，李鴻章才訂購了在天津制造林明敦槍的機器。[[48]](#_48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1875年，馬格里在南京制造的三門發射68磅炮彈的大炮在大沽試驗時爆炸了，所以這時李鴻章對于中國制造洋槍洋炮的能力還沒有把握。部分由于李鴻章的建議，江南制造局在1874—1875年間建立了一個分廠生產火藥和子彈，此后它對這項工作更加重視。

和初期的槍炮工業一樣，輪船制造方面最初努力的結果也令人掃興。1866年7月，李鴻章授權江南制造局開始制造一種為巡邏海港而設計的小型炮艦。次年，根據丁日昌的建議，曾國藩決定制造局應造大船：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時最好的洋匠更精于造船技術，另一方面也由于丁日昌和曾國藩兩人都感到輪船對于中國的長期防務至關重要。[[49]](#_49_Ken_Ni_Di____Li_Hong_Zhang_Y)迄今為止，制造局每年的經費一直是從淮軍軍費（它的主要來源是厘金，也有一部分來自海關關稅）中提取的。1867年5月，曾國藩獲準從上海海關關稅歲入中撥留一成給江南制造局；兩年之后這筆撥款增加到二成，每年總額在45萬兩以上。1867年下半年，這所兵工廠遷移到上海市南郊一塊10英畝的基址。在那里建造了一個干船塢并添置了新機器，用以制造輪船；還增聘了六七名英、法洋工匠。1868年8月，第一艘中國制造、可以使用的輪船下水了，這是一艘600噸位的明輪船，曾國藩給它取了一個吉利的名字——“恬吉”。雖然輪機是外國造的，但是汽爐和木制船殼均系廠內自造。隨后的五年當中，制造了三艘雙螺旋槳小型鐵甲艦，以及五艘螺旋槳木船（從600噸位到2800噸位）。除去兩艘輪船之外，所有汽爐和輪機都是廠內自造，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成就。可是不幸，這些船行駛遲緩，對于一些通商口岸來說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過多，更不要說造船本身的高昂成本了。到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中止造船計劃時，這項規劃以及輪船維修（由曾國藩1870年設立的江南輪船操練局主管）費用占該兵工廠年度進款的一半左右，據信所造輪船比在英國出售的類似輪船至少要貴一倍。[[50]](#_50_Tong_Shang_Shu__Di_210_Te_Bi)

江南制造總局制造彈藥和輪船的成本之所以極高，主要由于兩項原因：其一是幾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進口的；其二是雇員費用（尤其是洋員和中國官員的薪水）高。在19世紀70年代中葉，這所兵工廠總經費中差不多50%用于購買材料（不包括新機器和其他永久性設備），將近30%用于薪水和工資。采辦上的敷衍塞責嚴重得使曾國藩吃驚，所以他在1872年臨死之前建立了這樣一項制度：兵工廠的每一項采辦都要經由總辦本人以及采買、支應和會計三個有關單位共同批準。[[51]](#_51_Ken_Ni_Di____Jiang_Nan_Zhi_Z)雇員費用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洋員人數不可避免地增長（他們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標準衡量也是相當高的），一部分是由于中國管理人員的人數也在增加。不算小職員，隸屬于這所兵工廠的中國“官員”在19世紀70年代初是40人，到70年代末便增加了一倍。可以推測，其中許多人是通過權勢在薪水簿上掛個名字而領干薪的。[[52]](#_52_Tong_Shang_Shu__Di_148Ye___W)

和江南制造總局比較起來，福州的造船規劃需要更多的資金。左宗棠起初要求五年中300萬兩的經費總額，這于1866年7月為清帝批準。制造16艘輪船以及培訓中國造船工匠和航海人員的規劃，都由日意格和德克碑這兩名法國人負責，他們由法國領事連署而簽訂了“保約”。由于左宗棠本人要動身赴西北新任所，經他推薦委任當時在福州老家丁憂的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監督建局。沈葆楨在左宗棠所選擇的幾位提調的協助下工作，其中包括代理福建布政使周開錫，此人管理厘金和軍需頗有經驗。沈葆楨和周開錫不得不和新任閩浙總督吳棠的反對意見作斗爭。只是在吳棠被一個更能合作的官員替換之后（這是當時左宗棠在北京的勢力所采取的一項措施），才保證了每年度48萬兩的撥款額和支付在法國訂購機器的款項。[[53]](#_53_Pang_Bai_Teng____Cong_Chen_B)

在瀕臨閩江羅星塔的船廠工地上，中國官員們督視著2000名中國工匠和900名勞工工作，料理著在河前工地上建造的地基，以安裝2000噸法國機器，并安排建造房舍和采辦物資。日意格領有“監督”頭銜，于1867年下半年帶著45名歐洲人從法國回來；隨后達士博也來到中國，他是一位有經驗的工程師，擔任“總監工”一職。此后三年陸續興建了鐵廠、銅廠、一個設有若干氣錘（功力高達7000公斤）的錘鐵廠，以及一個適用于長達400英尺船艦的下水滑道。1869年6月，一艘1450噸位的螺旋槳輪機運輸艦“萬年清”號下水；此后五年又有14艘輪船下水（內有一艘沒有達到合同規定，但又有一艘比原來規定的馬力要大）。從1871年開始，該廠建造的大部分輪船都安裝了自己制造的輪機。福州不生產像江南制造局的“海安”號和“馭遠”號那樣的2800噸位的輪船。可是它卻在五年內制造了10艘從1000噸位到1450噸位的輪船，比江南制造總局上述兩艘之外的所有輪船都大。雖然福州輪船據說比江南輪船要好，但是開動起來還是速度慢、消耗高；這些船使用木制船殼和單橫梁機，它們和江南輪船一樣，以19世紀70年代的歐洲標準來看，確實應在被淘汰之列。

福州船政局在到1874年7月為止的六年半時間里，開支總額為535萬兩，大大超過預算額。法國雇員的薪水是最大的開支項目（在每月5萬兩至8萬兩的經營費用中占1.2萬兩）。2000名中國工人的工資總數為每月1萬兩，而150名中國管理人員的薪水總共只有1200兩——這里顯然沒有把許可的開銷和津貼計算在內。[[54]](#_54_Pang_Bai_Teng____Cong_Chen_B)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資方面存在著許多貪污舞弊的漏洞。有一些職員是福州達官顯宦的親戚或者是他們所推薦的人，沈葆楨在管理這些職員時特別棘手。船政局的采辦系統存在著大量侵吞公款的現象，在沈葆楨接任的第一年里尤其如此；經常發現買來的木材、煤炭和金屬材料不能使用。沈葆楨要博取廉潔奉公的楷模和嚴懲貪污的聲譽，他嚴厲懲辦了一大批公務人員，并且用更可靠的人替換了他們。但是在采辦這類事務上，他終歸還是不能不依靠像葉文瀾那樣有能力的幫辦（葉文瀾以前是左宗棠購買軍火的幫辦之一，有在通商口岸辦事的經驗）。葉文瀾手下有職員30人左右，從臺灣、香港和東南亞采購物資；他甚至于還有一名常駐仰光的代理人，從那里往國內定期海運袖木。[[55]](#_55_Tong_Shang_Shu__Di_112__145)沈葆楨的成功主要在于他能注意使中國職員充分地和日意格以及他手下的洋人合作，以便使造船計劃在合同期間能夠有條不紊地進行。但是，只有在沈葆楨不斷從福建的高級官員以及從北京取得支持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這個成績。

### 西學：同文館的局限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旨在探查西方力量奧秘的一個更大規劃的組成部分；從一開始，李鴻章和左宗棠就打算在建立兵工廠、造船廠的同時開辦培訓學校。幾百名半文盲工匠和學徒在外國工頭的指導下在工廠里做工，許多中國人將要成為技術精練的工人。年紀較輕的學徒的聰穎智力和靈巧手藝尤為外國人所贊賞。[[56]](#_56_Can_Kan_Li_Ru_1867Nian_8Yue)但是，只有在那些范圍很小的學校里，人們才能希望西方技術會在中國人中間扎下根來，因為在這里，來自書香門第的青年除去學習普通的中文課程之外，還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按照設想，這些學校應與兵工廠和造船廠合作，既講授理論，也講授實際操作。

雖然早在1862年已由總理衙門主辦了一所新的官辦學校（京師同文館），但是它的初意僅僅在于培訓中西外交上所需要的翻譯人員。因而同文館所遵循的先例是18世紀中葉在清帝贊助之下創辦的俄羅斯文館。1862年的“章程”是仿照俄羅斯文館的章程制定的，它最初的錄取人數限制在從八旗滿族子弟當中挑選的24名青年；學生們要在學習中文課程的同時，也學會一種歐洲語言。[[57]](#_57_Bi_Nai_De____Zhong_Guo_Zui_C)由于在上海和廣州未能找到可以教授英語和法語的合適的中國人，便以不準在學生中傳教為條件，延聘英國傳教士包爾騰教授英文。此后不到一年，于1863年4月，一個法國牧師和一個俄國翻譯受雇，又添設了法文館和俄文館。（俄羅斯文館便于此時停辦，那里原打算用來教授俄文的滿族人被發現并不真懂俄語。）同文館的一些學生確實至少學到了一些洋文洋話：在1866年，他們之中有三個人被選作由赫德帶領到歐洲去的第一個非官方清朝使團的低級成員。

與此同時，在1863年4月李鴻章奏請清帝在上海和廣州建立同樣的外語學校。不過，李鴻章設想中的學校具有更廣泛的目標，打算同時也教授數學和自然科學。他說：“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李鴻章的建議得到批準，上海同文館于1864年7月在上海道臺的監督下興辦起來。所取除10名已經通習中文、年齡較大的學生之外，另外限取40名由有聲望的官紳保送的十四虛歲以下的青年。[[58]](#_58_Liu_Guang_Jing____Ru_Jia_Ai)學生們除了讀經、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中文課程之外，還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講授英文，由一位中國教習講授數學。

廣州同文館雖然也是根據李鴻章的奏折在1864年夏季以同樣方式創辦的，但它基本上是由廣州的一位韃靼將軍所管轄。該校雇用了一個傳教士講授英文和數學，但學校的章程似乎是為了使這個城市的中國居民避免受過分的西方影響而制定的（由于英法聯軍之役，廣州已被英國占領將近4年之久）。招生人數定為20名，16個名額留給在廣州駐防的八旗子弟；10名年齡較大的學生取滿族、漢族均可。雖然學校的章程一部分依據了新建的上海同文館所采用的規章，但在實際上廣州同文館辦得像一所滿洲旗人學堂。[[59]](#_59_Yi_Fan_Si____Guang_Zhou_Tong)

由于清朝的文官制度和科舉考試制度沒有改變，這些新學校從一開始就不得不面臨鼓勵學生的問題。總理衙門援引原俄羅斯文館的先例請得清帝的批準：京師同文館三年制優等畢業生可以被保舉為八品或九品官，通過更進一步考試的學生甚至可以升授為七品官，直到委任為京畿官僚機構中的主事。不過，上海和廣州的學校并沒有這個有利條件。上海同文館提出，學完三年制學業的最佳學生應為“附生”（符合參加鄉試條件的低級“生員”）。[[60]](#_60_Can_Kan_Bi_Nai_De___Zhong_Gu)廣州同文館仿照旗人學校的先例，許諾它的畢業生做翻譯（最初指的是能夠在滿文和漢文之間進行翻譯的人）或者名譽“監生”。這可以使人想起，李鴻章曾在1864年春天向總理衙門建議在科舉考試中增設新科，給有專長技術的考生一個應試高級功名的機會。這個建議毫無結果，實際上，上海和廣州同文館的學生盡管進了這些學校，并領取津貼以學習英文和數學，但仍舊發現他們為準備應鄉試而在那里練習做八股文！

不過，對于那種一成不變的格局總算進行了一次突破的嘗試。回顧起來，這主要由于在1865—1866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也由于在諸如制定總理衙門政策的文祥和董恂等士大夫中間引起的思想上的騷動，雖然這種騷動是微弱的。恭親王本人被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就有關新技術所需人才的長期計劃而提出的論點所打動。赫德和丁韙良的上書也激發了總署的大臣們的熱情（丁韙良曾把沃頓所著的《萬國公法》譯成中文，并且在準備一部關于自然哲學的新書時就在總理衙門里面演示了電報發報機的操作）。[[61]](#_61_Ding_Wei_Liang____Zhong_Guo)

在1866—1867年的冬天，恭親王和文祥作出了一個實在大膽的計劃，但此計劃的激進性質通常為歷史學家們所忽略。在1866年冬天以前當赫德回國休假時，恭親王和文祥就委托他在歐洲代為招聘自然科學教習，為將在京師同文館內設立的“天文算學”科目配備人員。（按照清朝的傳統看法，“天文算學”有些實際用途，并且確實是持某種主張的儒家學者在知識探索中的正統課題。[[62]](#_62_Wang_Ping____Xi_Fang_Li_Suan)不過，這個科目的舊名稱現在被總理衙門用來包括化學和機械學之類的西方科學。）恭親王和文祥不是僅僅打算增加同文館的課程；他們的目的完全是想讓西學本身的合法性得到清帝以及像翰林院那樣的正統部門的承認。在1866年12月的奏折中，總理衙門建議應該鼓勵那些舉人和舉人出身的官吏報名到同文館肄習新開科目。之后在1月28日，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進一步上書，建議應該鼓勵進士，特別是翰林院成員——包括有聲望的編修們——報名，并在三年課程結業之后給予“格外優保”。[[63]](#_63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也許，我們作以下設想并不過于牽強：如果這個建議達到了預想的效果，那么一個清代的教育和文官體制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期了。

12月和1月的奏折都得到了清帝的批準，這正是慈禧本人在文化問題的觀點上所持模棱態度的一個證明。但恰恰在這個時候，這位太后可能第一次這么明確地認識到，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可以用來抑制恭親王的政治勢力。起初，北京的官僚們緘默地同意了總理衙門的建議。只是在3月初監察御史張盛藻才上書陳述他的觀點，認為自強不必依賴洋槍輪船，而取決于“練兵籌餉”和一個綱紀整肅、刑政嚴明的吏治。這位御史把天文學和數學僅僅看作一種“機巧”，他感到特別憂慮的是，強調這兩門學科會對士習人心產生有害的影響；在他看來，技術知識和良好的道德品質似乎是相互對立的。這位御史還對以厚給癝餼和優與獎敘為獎掖之舉深感不滿，認為這也會起到敗壞學者和官吏氣節的作用。然而甚至經過這些攻擊，清帝仍然站在恭親王一邊：有一道諭旨便說，“天文算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64]](#_64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同時，也確實有許多士子向總理衙門報考同文館的新科目。

然而在3月20日，清帝收到了大學士倭仁（1804—1871年）呈上的第二個責難性的奏折；倭仁不僅是一位受尊敬的著名學者，也是朝廷里一位剛形成的派系的領袖。盡管倭仁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卻仍舊作為當時最著名的兩三位程朱理學大師之一而受到廣泛的敬重。除了他模范的生活給他帶來聲譽之外，他還因從19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在一個其學術既與意識形態，又與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領域擔任一系列職務而對人們產生影響。他曾經連任都察院都御史和翰林院掌院學士；在1867年，除大學士外，他還是年輕皇帝的授讀之一。[[65]](#_65_Can_Kan_Zhang_Hao___Wei__Ren)他在這奏折中傲慢地表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倭仁甚至比御史張盛藻還要蔑視“天文算學”。這位大學士把技術問題和受鄙視而通常與詭譎、異端相聯系的“術數”看作是一回事。但是對士大夫在情感上具有更大感召力的是他斷言，總理衙門要讓中國人“奉夷為師”。在中國傳統中，老師的地位是特別受人尊敬的：而那些洋人也確實是夷狄，他們剛剛直接進犯京闕，如今又在傳播可惡的基督教教義。[[66]](#_66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在一個雄辯有力的奏折中答辯說，期望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完全是不現實的，但甚至在此之后，倭仁還是重申他的立場。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肯定地說，禮義確實是國家的根本，但接著便援引了那些極力倡導引進西方技術的忠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和沈葆楨等人的話作為自己的論據。作為儒家，這些人大概并不亞于倭仁！

當時雖然沒有其他官員上疏支持倭仁，但是被清帝予以公布的倭仁的這兩個奏折，竟把北京士大夫煽動到如此程度，以至開始流傳總理衙門意圖謀反這種招惹怨毒的謠言。那些報考同文館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鄉和同列們的譏笑嘲諷。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約定，不受誘于總理衙門所提供的新機會。4月下旬，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向皇帝報告說，由于倭仁的奏章已為眾所周知，“臣衙門遂無復有投考（新科目）者”。總理衙門被迫放棄了原來鼓動士大夫中的杰出人才學習技術的計劃；現在僅僅請求皇帝批準按照原計劃舉行新科目的入學考試，以接納那些“現在的投考者”。[[67]](#_67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這個結果對倭仁——他除去代表著京畿某些官吏的自我道德感和政治利益之外，也代表著文化中的主要的文化素質——來說，顯然是一個勝利。但是必須看到，他取得這個勝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慈禧太后未能給恭親王以全力支持。當倭仁被要求設立一個只用中國教習的算學館時，他大為窘困（因為他在第一個奏折中隨便說出中國教習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為了不被委任到總理衙門，他不得不請病假。在一道上諭中，倭仁還被斥為“見識拘迂”，不過盡管如此，慈禧還是沒有重新提出讓具有高級功名的人報名同文館新科目的號召；4月23日的上諭僅僅表示：“就現在投考人員，認真考試，送館攻習。”[[68]](#_68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可以想象，慈禧并不愿意反對倭仁對儒家文化解釋的本質，因為她自己作為攝政者的地位以至滿族人的統治本身，都是仰賴儒家的倫理和文化的。當然，慈禧本來可以選擇的道路是，堅持一種更加靈活而依然是正確的儒家觀點，就像恭親王和曾國藩在奏稿中所舉例說明的那樣。但那時在慈禧看來，把一個在京師官員中有大批追隨者的顯宦抬出來使之蓋過恭親王，這種做法是毫無害處的。我們發現1868年的一道上諭直接按倭仁和恭親王的順序把他們作為負有最重責任的兩名官員提出來：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導，一位是領班軍機大臣。[[69]](#_69___Da_Qing_Mu_Zong_Shi_Lu)

由于清帝未能堅持讓有聲望的士人肄習西學，同文館的新方案就只有有限的意義了。包括滿、漢兩族的72名報考者的確參加了入學考試。不過發現他們大都是失業的中年人，“對于這些身體憔悴的窮苦文人來說，衙門付給他們的津貼表明比他們的聲譽更為寶貴”。[[70]](#_70_Yin_Zi_Bi_Nai_De___Zhong_Guo)被錄取的學生有30名，但是最后畢業的只有5名。為了得到質量更高的學生，清帝批準要上海和廣州同文館選派他們最優秀的畢業生到北京攻讀新科目。恭親王和文祥并不回避奉夷為師所招致的怨憤。赫德延聘的幾名歐洲教習中有兩名在1868年到達北京。通曉中西數學的天才學者李善蘭被任命為算學教習。但是英文由歐伯連講授，他是新近從英倫三島來的非傳教士教師；化學由法國人畢利干講授；物理由丁韙良（他從1864年起一直在同文館教英文）講授。

1869年，在赫德的建議之下，丁韙良被任命為總教習，和滿、漢提調（提調除負責學生的生活安排和紀律之外，還負責中文課程）一起工作。[[71]](#_71_Can_Kan_Xiu_Ding_De_Tong_Wen)丁韙良著手把同文館辦成設置八年課程的“書院”，其課程包括一種西文，以及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之后，在1872年1月，英國傳教士醫生德貞開設了解剖學和生理學課程。這一時期前后，在大約100名學生當中大部分還是八旗子弟，但大家認為最好的學生卻是曾在上海同文館學習過的漢族青年。京師同文館的出版業務以丁韙良自己的《格物入門》和畢利干的《化學指南》為濫觴。[[72]](#_72_Guan_Yu_Zao_Qi_Tong_Wen_Guan)然而，這所學校的主要目的仍舊是為外交工作培訓人才。在資深學生的襄助下，京師同文館出版的書籍終于包括了國際法、政治經濟學以及連同俄國在內的歐洲國家的歷史等著作。雖然許多學生認為拿出相當多的時間去準備科舉考試是合算的，甚至他們也受到這方面的鼓勵，但是，其中最優秀的學生在尚未畢業之前就被任命為總理衙門的翻譯了。

### 兵工學校和造船學校

與此同時，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總局開設了更多的科學技術專科。福州船政學堂建立于1867年（甚至在福州船政局奠基之前），有一百多名十四虛歲以下的學生，大多數是從沒落的地方紳士家招收的。學生得到許諾，將來準許授給綠營水師官職，或者按照軍功保舉文職官階[[73]](#_73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這是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條著名的成功之路。起初，左宗棠和沈葆楨抱著過高的想法，即希望學生們經過五年至七年的嚴格訓練之后能夠學會如何設計和監造輪船，并且希望那些向往著成為艦長、大副的青年們能在這段時間里掌握必備的航海技能。還要求學生們學習中文課程以保證思想正確。但是沈葆楨相當明智地要求學生只學習像《孝經》和《康熙圣諭》一類的簡單著作，同時兼習淺顯的論策文章。[[74]](#_74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這所學堂的“法文班”由法國人教習，專攻輪船制造和輪船設計。除去法文之外，還要求學習一套包括解析幾何和微積分在內的數學課程，以及包括物理學和機械學在內的自然科學課程。偶爾也讓學生協助裝配機器零件，但要到第五或第六學年，他們才在船政局所屬各工廠里做更多的具體工作。這所學堂“英文班”的學員用三年時間學習航海理論（上英文、地理、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課程），然后把他們送到一艘由前皇家海軍船長指揮的教練船上。（還有一個輪機艙部，招收曾在香港和上海的鑄造廠和機器廠工作過的青年人，只教授英語、簡單數學和蒸汽輪機原理。）這所學堂各個分部的教學顯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青年當中又是人才濟濟，因而剛到7年就能確觀厥成。1874年年中日意格報告說，法文班的7名畢業生已經“能夠在兵工廠指導輪機[安裝]工作”，另有21人預料可在一年半以后具備同樣的能力；8名學生有最終勝任“設計室主任”的希望；9名畢業生證明他們能夠“計算木制輪船的數據……繪制船身和船帆設計圖，在模廠做出粗樣以及監督施工”。他還宣布說，“英文班”的14名學員受到了“為在長途航行中指揮一艘戰艦所必須的理論教育和實際教育”。[[75]](#_75_Ri_Yi_Ge____Fu_Zhou_Bing_Gon)

然而，即使是最出色的青年工程師和設計師，也不能被指望立即承擔主要職責。由于財政困難，1874年以后福州船政局大大地削減了它的造船規劃。從1875至1877年之間，只有四艘輪船下水，雖然其中的“威遠”號是一艘混合結構船（鐵脅、木面），裝有船政局自制的英式康邦臥立機，這在技術上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進步。盡管船政學堂的一些畢業生參加了這項工作，但總工程師卻是斯恭塞格：他是日意格的主要技術人員，在絕大多數法國人于合同期滿撤走之后，他仍然留在那里。[[76]](#_76___Chuan_Zheng_Zou_Yi_Hui_Bia)到19世紀70年代中葉的時候，有四名福州畢業生經過一段試用期后被授予汽輪船長頭銜。而船政局制造的大多數輪船是由在通商口岸做過事的中國人指揮的，這些人雖然缺少正規訓練，但是學會了駕駛19世紀50年代以來江蘇和浙江兩省政府購買和租賃的小輪船打擊沿海海盜。（福州船政學堂21歲的畢業生、后來成為赫胥黎和穆勒著作的著名翻譯家嚴復，在1874年是“海東云”號的代理船長，這艘小汽輪即為閩浙當局所有，但并不是福州船廠制造的。）[[77]](#_77_Pang_Bai_Teng____Cong_Chen_B)沈葆楨挑選蔡國祥做這支水師的最高長官（稱為“火輪水師兵艦”的“總統”——譯者）。他原是湘軍水師將領，曾國藩一度選任他作李泰國—阿思本艦隊司令。但這些安排并不意味著沈葆楨和丁日昌（丁日昌于1875年接替沈葆楨任福建船政大臣，于1876年又為原天津機器局的吳贊誠所繼任）忽視了船政學堂自己的畢業生。

到了1870年，由于沈葆楨本人深感造船機器的奇巧，他完全確信那些淵深的學問——尤其數學——是西方技術的基本功。在一份他和閩浙總督英桂聯銜于1870年呈上的奏折中指出：輪船與槍炮的質量取決于數學。現在西洋船艦和火器異乎尋常的改進，幾乎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這是計算能力日益精細的結果；如果計算稍稍細致一分，那么機器的使用就會靈巧十倍。沈葆楨考慮到，等到1874年福州學生畢業時最多也就上過七年學，于是他在1873年上疏清帝說，應該把最好的畢業生送到法國和英國去深造，以便使他們能夠“循序而漸進，將窺其[西學]精微之奧”。[[78]](#_78_Chen_Ke____Xian_Wen_Su_Gong)

直到1875—1877年，福州畢業生才赴歐留學；與此同時，在1874年年中和法國人簽訂的合同期滿之后，沈葆楨和他的繼任者堅持這所學堂應該按照原樣繼續開辦下去。至少有兩名法國教習被挽留下來，并在1876年重新委任了講授理論航海學的嘉樂爾。在丁日昌的倡導之卞，船政學堂招收了40名在香港英國學校里學過一點英語和數學的男童（此事經由輪船招商局總辦唐景星安排，他本人曾經在香港居住過）。[[79]](#_79___Chuan_Zheng_Zou_Yi_Hui_Bia)船政學堂開辦的法文班與英文班（即“前學堂”，主要學習法文和造船；與“后學堂”，主要學習英文和駕駛——譯者）都具有可觀的水平，而對航海人員的培訓尤受重視。

當船政學堂作為速成學校為中國培養第一代現代兵艦工程師、船舶工程師和船長的時候，江南制造總局由于它特殊的環境，作出了更加廣泛的貢獻。從一開始李鴻章就主張，那些學童應該在制造局見習機器操作的同時，也要學一些西洋算學和自然科學。[[80]](#_80_Liu_Guang_Jing____Ru_Jia_Ai)但是見習機器操作所用的教學設備不得不延緩到制造局本身搬出外國人居留地之后才予添置，因為虹口區有外國海員和他們的娛樂場所，被看作是一個不適宜設置學校的地方。盡管如此，1867年中江南制造局還是聘用了幾名曾經在安慶為曾國藩工作過的中國數學家—工程師，其中包括華蘅芳、徐壽和徐建寅；在這些人的建議之下，還建立了一所翻譯館（包括一所培養譯員的學校），以出版中文的西洋科學技術書籍。1868年春季，翻譯館任用了英國教習傳教士傅蘭雅，其后在同一年里又錄用了另外三名傳教士，他們的漢語程度都足以向中國的筆錄人員口述技術著作的譯文。曾國藩不顧一年之前倭仁的嘲諷，在1868年下半年的一份奏折中表示，他希望遴選書香門第的聰穎子弟隨同這些洋人學習，以便使這些青年領悟西洋技藝中的義理。（二三年之前，這位總督的天資頗高的長子曾紀澤開始學習英文和西洋算學，這大概是他父親鼓勵的結果。）[[81]](#_81_Ceng_Guo_Fan____Ceng_Wen_Zhe)1869年后期，在位于江南制造局新址的校舍竣工的時候，當時依然不到50個學生的上海同文館即遷往那里，由江南制造總局主辦，并改名為廣方言館。在此同時，制造局本身還安排了工人在職訓練班和徒工夜校，以便在這里教授數學和簡易科學知識。

然而，這個教學規劃中的幾個方面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配合。徐壽和其他的中國數學家—科學家對制造局的生產計劃并不負擔責任。他們追求自己的學術興趣，并且不斷地從事翻譯。到了19世紀70年代中期，12個中國人和5個傳教士學者（傅蘭雅、偉烈亞力、瑪高溫、金楷理和林樂知）合作，把許多從倫敦訂購的書籍準確地譯為中文；到1877年底，已經出版的翻譯本和改編本著作達54種之多。[[82]](#_82_You_Guan_Dao_1877Nian_Wei_Zh)其中不少是關于蒸汽輪機、制模以及鑄造技術和格林炮、克虜伯炮手冊之類。另外一些是比較有刺激性的著作，例如封·希理哈的《防海新論》（1868年版）；中譯本于1874年出版，很快就為李鴻章仔細讀過。還有一些是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教科書，諸如白起德的《運規約指》（1855年版）、鮑曼的《實用化學入門》（1866年版）以及田大理的《聲學》（1869年版）等等。這些書是通過中國書商分銷的。僅舉兩例：一部1872年發行的關于克虜伯炮的手冊八年當中銷售了904冊；一部1873年發行的代數論文七年當中銷售了781冊。但是正如負責江南制造總局翻譯工作最多的傅蘭雅所抱怨的那樣：這些書只有包括學館和訓練班在內的制造局內部幾個部門才使用，而且使用的次數也很少。[[83]](#_83_Bei_Nai_Te____Fu_Lan_Ya_Ba_X)

下述事實使江南制造局所屬學館的發展受到阻礙：它本來應該培養工程師和翻譯人才，而一個迂腐的理學士大夫涂宗瀛（1811？—1894年）在他短暫的上海道臺任期內（1870—1871年），卻責成上海縣教諭主管學校的中文課程。這樣，雖然數學在廣方言館三年至五年的課程中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時間的長短取決于各個學生的能力和專業要求），但在教授代數、幾何和三角的時候，還要求學生通習中國的《算經》，結果造成了一些概念的混亂。尤其在第一學年里，要求學生肄習繁重的中文課程。要一個星期一個星期不斷地閱讀歷史著作，包括《左氏春秋》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僅如此，還直接安排了經學課程，要求閱讀的書中有朱熹的全部著作和一部18世紀清朝論宋學的文集。[[84]](#_84___Guang_Fang_Yan_Guan_Quan_A)除此之外，學生們每周還必須花費一天時間準備一篇作文，有時是八股文。如果仍有余力，可以學習林樂知講授的英語或者傅蘭雅講授的法語。中文課程一直延續到第二學年，到這時學生們才允許專攻“外國語文及風習制度”，為做外交工作做準備，或者選擇技術性專業，例如礦物學、冶金學、機器設計與操作等等。只是對于那些無志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才單開技術專業課程，中文課在這里減少到最低限度——只讀《四書》和《五經》。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這種單獨的技術課也已經收錄了大約40名學生，它似乎分為三個班組：造船學、船舶工程學和軍事科學。開設的課程包括英文、數學、繪圖和射擊學。教習中有外國人參加，大概是些和制造局內造船及軍械制造有關的洋人。[[85]](#_85___Guang_Fang_Yan_Guan_Quan_A)

在1870年下半年江南制造總局的教育和培訓規劃開始付諸實施的時候，從一開始就贊助這一規劃的丁日昌，卻因丁母憂而不得不暫時離任，這對教育和培訓規劃來說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丁日昌雖然非常注意財政和司法管理上的問題，但他仍然確信中國需要效法西洋科學。他在1867年的一個奏折中論述說，只有致力于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抽象的研究工作，才能把西方技術學到手。“洋人……耗其心思、氣力、財貨于渺茫無憑之地，在數千百年，而其效始豁然呈露于今日。”[[86]](#_86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由于丁日昌的努力對19世紀70年代著名的赴美留學使團的成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所以可以說，在他離任丁憂之前，他幫助中國在引進西方科學方面邁進了一步。

### 海外培訓

早在1864年，一個無名的士大夫上書總理衙門警告說，日本在派人去歐洲學習制槍造船，因此總署大臣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封上書的啟發，便就是否宜于派遣學員到外國兵工廠一事咨詢李鴻章。李鴻章答復說，這是遲早終須采取的步驟，但是可以等一等，先在中國設局建廠再說。[[87]](#_87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耶魯大學畢業、以受過“自由主義教育”而自負的中國人容閎，在1868年初向剛任巡撫不久的丁日昌呈遞了一份計劃，建議讓中國青年在進行在職培訓之前先到美國大學預科和高等院校學習。丁日昌深為這個計劃所吸引，以至親自為此事寫信給文祥，并且最終取得了曾國藩的贊助。1870年10月，當丁日昌在華北協助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所造成的危機時，他說服了這位政界元老向清帝建議，派遣青年學生到海外的普通大學及陸海軍學院學習。曾國藩在他的奏折中解釋說：“其[西洋]制則廣立書院，分科肄習。凡民無不有學，其學皆專門名家。”[[88]](#_88_Ceng_Guo_Fan____Ceng_Wen_Zhe)1868年的蒲安臣簽訂的條約允許中國人到美國游學，因此丁日昌確信，由于容閎本人曾在美國受過教育，如果確實能夠給他配備一個具有正統背景的人同行，以使這個方案可以為北京所接受的話，那么他會是辦理中國學生到美國游學的一個很好的人選。恰巧曾國藩的幕府里有一個翰林學士，他仕途坎坷，幾乎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決心謀求晉升。此人即1853年的進士陳蘭彬：他雖被任命為刑部的一名主事，卻回廣東搞地方防御工作。他曾一度是湘軍將領劉長佑的隨從人員，不過現在在為曾國藩效力。陳蘭彬曾被描繪為一個“嗜利小人，敢為大言；自便私圖，不惜賣國”的人。[[89]](#_89_Hong_Wei_Lian____Huang_Zun_X)然而他畢竟是一個愿意到美國去的有聲望的翰林院學士！

曾國藩的奏折在北京擱置了兩個月之久。1870年12月，當剛做了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慫恿他準備一個詳細方案，重新上奏。李鴻章對曾國藩說：“斷不可望事由中發。”[[90]](#_90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容閎擬議派送120名12—20虛歲的青年，每人到美國游學15年。李鴻章感到如期“深造”，自非15年不可；并且說所擬為期20年的總數為120萬兩的經費預算尚不算多，可由上海海關歲入中的六成部分提拔。李鴻章還補充說，“將來果學有成效，積有經費，再義充拓，方有步驟”。起初，李鴻章希望學生在出國之前能取得“監生”功名，后來當允諾在學生結業之后授以官銜時，他也就滿意了。1871年6月，李鴻章在他和曾國藩聯名簽署的致總理衙門的一封信里闡明了這些想法，三個月之后，他和曾國藩又就這件事聯銜上奏清帝。當清帝咨詢此事的時候，總理衙門議請把原擬的候選學生年齡由12—20虛歲改為12—16虛歲，理由是這樣會減少一些父母已至垂暮之年而學生仍須逗留海外的可能！總理衙門還奏請在赴美留學使團駐處恭設孔夫子的神位。在這些奏折的基礎之上，具有歷史意義的派遣留學生這一措施得到了批準。[[91]](#_91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

與此同時，曾國藩授權在上海設局招生。由原籍是廣東香山縣的上海買辦商人徐潤負責勸說許多廣東人送子應選。1872年第一批應招入選的30名青年中，24名是廣東人（僅香山一縣便有13人），只有3名來自江蘇，而安徽、山東和福建是每省1名。[[92]](#_92_Xu_Run____Xu_Yu_Zhai_Zi_Xu_N)容閎比大隊先期一個月抵達美國，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在哈特福德市設立了清朝留學使團的辦事處。他們決定，留學生應分別派到該州12個鎮市的居民家里（付給酬金），并且就在這些鎮子里入學。陳蘭彬帶了30名學生及2名中國教習不久也到達；這兩位中國教習將在哈特福德辦事處定期地、并且利用假期教授中文課程。隨后三年中又有三批青年抵達美國，每批30名；這樣，到1875年總數共達120人。

留學章程把中文課程安排到了最低分量：《孝經》《大學》《五經》和《大清律例》；還要求青年們去聽講解歷代滿族皇帝圣諭的課，并且要定期地朝著假想的北京方向行禮。中國旅行家李圭在1876年9月訪問了哈特福德市。他在報告中說道，113名學生（因死亡、生病和撤回而缺7名）分成小組，每組12個人，每三個月里有兩個星期在哈特福德度過，在中國教習的指導下進行閱讀、背誦、習字和作文。[[93]](#_93_Guan_Yu_Zhong_Wen_Ke_Cheng_D)然而另一方面，他們也漸漸地美國化了，把辮子塞在大帽子底下，興致勃勃地打壘球。他們甚至在女監護教師（其中一位于1875年和容閎結婚）的陪同下到教堂去做禮拜。

陳蘭彬顯然是一個營求私利的機會主義者，不過，他在這一階段還能較好地和容閎合作。1873年下半年，陳蘭彬到古巴去調查苦力貿易，然后返回北京得到擢升；1876年，他作為駐美國、西班牙和秘魯公使再次來到美國，以容閎為副使。在陳蘭彬的舉薦之下，另一位翰林區諤良被任命為哈特福德辦事局監督。（區諤良似乎也是一個仕途坎坷的翰林，因為他僅僅是一名工部候補主事；駐美國的職務有希望使他更快地升遷。）[[94]](#_94_Guan_Yu_Qu_E_Liang_De_Bei_Ji)區諤良帶來一名新教習；由于剛剛來自北京這個排外黨人正在興起的地方，區諤良很快就對容閎允許學生西洋化提出了批評。不過，到1877年為止，他的苛責還不是那么嚴厲，當時他更感興趣的是增加赴美留學生的年度撥款，為此他和容閎聯名吁請李鴻章。至于李鴻章，他寫信給這兩位監督，要他們鼓勵學生特別注意選修采礦和冶金專業，因為這兩項被他認為是中國的急需。1877年后半年李鴻章向朝廷報告說，有些青年在一二年內即可上大學學習，因此在李鴻章的奏請之下，清帝批準了以后9年總數為28.98萬兩銀子的補充撥款。[[95]](#_95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

由于不幸受到中美關系中一些事件的牽連，赴美留學使團于1881年被撤銷（參看下一卷）。

與此同時，沈葆楨輸送船政學堂畢業生去歐洲的計劃也實現了。丁日昌丁憂期滿之后，1875年成為福州船政局總辦。他趁日意格返回歐洲之際，安排了五名最優秀的畢業生（其中兩名學生后來做了李鴻章艦隊的管帶）隨同赴歐。[[96]](#_96___Chuan_Zheng_Zou_Yi_Hui_Bia)1877年1月，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楨聯銜上奏，說應把船政學堂30個很有前途的畢業生送到歐洲，至少深造三年，以從海關關稅和福建省厘金中撥款20萬兩作為經費。這項計劃得到批準，在兩個月之內就有30余人啟程，由李鳳苞任赴歐學生監督；李鳳苞是一位“候補道臺”，在江南制造局受過訓，并且受過日意格的訓練。[[97]](#_97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

和赴美留學使團比較起來，赴歐的規劃在性質上更加實際；這次李鴻章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培養中國艦長，以便駕駛從歐洲訂購的近代兵艦。盡管如此，李鴻章和沈葆楨還是對清帝說，他們要鼓勵一些學生學習化學、采礦等專業。[[98]](#_98_Zai_Bei_Shi_Wei_Shi_He_Xue_S)包括嚴復在內的6名福州學員進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在志愿成為造船工程師的學員中，有4名在法國瑟堡造船學校學習，有5名在土倫海軍船廠學習。但是還有5名福州學生在巴黎國立高等礦業學校結業：這至少是從僅僅對海軍的關注擴展到了更基本的問題上。羅豐祿和嚴復一樣，是船政學堂“英文班”初期才學出眾的畢業生，他放棄航海學，改在倫敦英王學院攻讀政治和化學。在此期間，從1877—1880年，李鴻章的幕僚馬建忠（1844—1900年）在巴黎學習法律和政治。[[99]](#_99_Bi_Nai_De____Zhong_Guo_Zui_C)

在1882、1886和1897年，又有福州培訓的學生相繼赴歐，進行為期三年或者六年的學習。顯然，這些學生年齡比較成熟，出國期限也比較短暫，因而與在康涅狄格州留學使團學生的經歷相比，就更不容易西洋化了。

所有以上這些開端都有助于提供文化借鑒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即經過訓練的人才：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在此后的幾十年里發揮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作用。他們使中國向著引用西方技術方面稍稍前進了一點，就此而論，他們推進了中國的自強事業。但是，到了19世紀70年代晚期，自強新政作為中國對付外國問題的一項政策，比起60年代時期來，已經變得大為多樣化和復雜化了。中國國內工業和交通運輸業采用了西方技術，它開始使努力的中心從防務轉移到工業化方面。這就要求在歷史學家這一方面也要使研究重點有一個相應的轉移，因為中國國內的現代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所涉及的問題，其范圍比自強新政的倡導者最初于19世紀60年代所預想的要更為廣泛（參看下一卷）。

（朱玲玲 謝保成 謝綿綿 譯）

[[1]](#_1_9)《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1，第18頁。

[[2]](#_2_9)沈兆霖：《沈文忠公集》卷1，第16—19頁。參看坂野正高《總理衙門的起源》，第215—216頁。

[[3]](#_3_9)《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2，第11頁。

[[4]](#_4_9)引自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39—40頁。

[[5]](#_5_9)《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9，第16頁；《同治朝》卷25，第1—2頁。

[[6]](#_6_9)《海防檔·購買船炮》卷1，第3頁；參照《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頁。

[[7]](#_7_9)《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第35—36頁。

[[8]](#_8_9)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第105、117、152頁。

[[9]](#_9_9)《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3頁。

[[10]](#_10_9)引自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第47、53頁。

[[11]](#_11_9)引自鄧嗣禹和費正清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32年文獻概覽》，第62頁。

[[12]](#_12_9)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9頁。

[[13]](#_13_9)引自《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69頁；又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30（1970年），第15、32頁。

[[14]](#_14_9)同上書，第18—19、30、37—42頁。

[[15]](#_15_9)《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4—10頁。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70—72頁。

[[16]](#_16_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4頁。

[[17]](#_17_8)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10—13頁。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81—83頁。

[[18]](#_18_8)郭廷以等：《郭嵩燾先生年譜》卷1，第42、114，126—127、130、181—187頁。

[[19]](#_19_8)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54—55頁。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5 47頁。

[[20]](#_20_8)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10頁。馮桂芬在討論荷蘭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時作了這一論述，他說他是從《地球說略》一書中了解這些制度的。此書由寧波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祎理哲所寫，1856年用中文出版。在另一段文字中，他贊譽上海海關中的洋人職員為“彼之能實征實解者”；他評論說，孔子雖言“忠信雖蠻貊可行”，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這些在中國的夷人現在表現了這種美德。同上書，卷1，第43—44頁。

[[21]](#_21_8)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0—42頁。但呂實強認為，就連馮桂芬關于改革吏治的思想，也是因他對西方制度有了新的了解而形成的。見呂實強《馮桂芬的政治思想》，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4第2期（1971年2月），第1—8頁。

[[22]](#_22_8)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2頁。

[[23]](#_23_8)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5—36頁。王爾敏：《淮軍志》，第103—104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第16—21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186—187頁。

[[24]](#_24_8)孟思明：《總理衙門的機構和職能》，第53頁。

[[25]](#_25_8)關于影印的慈禧手詔原件，見吳相湘的《晚清宮廷實紀》圖版10。

[[26]](#_26_8)見李宗桐、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144—146、171—174頁。

[[27]](#_27_8)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121—124頁。

[[28]](#_28_8)蕭一山：《清代通史》第3冊，第661—664、672—674頁。李宗桐、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164、214—216頁。

[[29]](#_29_8)王爾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權力之擴張》，載《大陸雜志》卷20第5期（1960年3月），第15頁。關于這一要求被其他外港道臺們所實際遵從的程度，還需要進行研究。

[[30]](#_30_8)見肯尼迪《李鴻章與江南造船廠的計劃》，載《香港中文大學漢語研究所雜志》卷4第1期（1971年），第215頁。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收于費維愷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第84—87頁。

[[31]](#_31_8)沈珂編：《先文肅公政書續編》。奏折的日期是1874年12月。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96頁。

[[32]](#_32_8)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0—1895年》.第68頁。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85頁。

[[33]](#_33_8)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101頁注7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3頁。

[[34]](#_34_8)關于京官們對丁日昌的攻擊，見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44—245、361—362頁。在李鴻章自己一派中有一人在改革政策上與李有分歧，并被他批評為雖然“端謹”，但回避實際責任；關于這一突出的例子，見李在1875年2月給巡撫劉秉璋的信，載《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5頁。

[[35]](#_35_7)畢乃德：《1867—1868年的秘密通信：中國的主要政治家關于進一步向西方勢力開放門戶的觀點》，載《近代史雜志》卷22（1959年），第132頁。

[[36]](#_36_7)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325頁和附錄4。關稅數字來源于瓦格爾的《中國的財政》附錄B，它包括對往返于中國各通商口岸之間、懸掛外國旗幟的船只所征收的關稅數字。

[[37]](#_37_7)羅玉東：《光緒朝補救財政之方策》，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190—191頁，其中提到了幾種不同的估算方法。

[[38]](#_38_7)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同上書，卷1第1期（1932年11月），第49—59頁。陳文進：《清季出使各國使領經費》，同上書，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270—310頁。

[[39]](#_39_7)見斯坦利《清季的財政革新者胡光墉》，第48—52、81—84頁。

[[40]](#_40_7)見弗蘭克·金《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第222頁。鄭英還：《中國的郵政通信及其現代化（1860—1896）》，第70—77頁。

[[41]](#_41_7)《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第37—38頁；卷19，第1頁；《譯署函稿》卷9，第37—38頁。參閱9月4日赫德致金登干的信，見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1868—1907年的中國海關》第1冊，第301頁；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特別是第478頁。

[[42]](#_42_7)有關1850年以前這種“不太正規而依舊是官差”的先例的討論，見梅茨格為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幕府”制度》一書所作的書評，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卷29（1969年），第315—319頁。

[[43]](#_43_6)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24—28頁；陳其田：《曾國藩：中國汽船業的創始者》，第20—25、40—42頁。

[[44]](#_44_6)李恩涵：《清末金陵機器局的創建與擴張》，載《大陸雜志》卷3第12期（1966年12月），第368—370頁。包耳格：《馬格里傳》，第123—132頁。

[[45]](#_45_6)包耳格：《馬格里傳》，第161—167頁。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107頁。肯尼迪把1865年蘇州洋炮局遷移南京，以及1868年1月清帝從海關稅款中撥款給天津機器局，都歸因于對捻軍作戰的軍事需要。參看他的《1860—1868年中國現代軍火工業的創建》，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卷4第2冊（1974年12月），第807—818頁。

[[46]](#_46_6)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創建和發展》（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第2章，《北華捷報》1867年8月16日。

[[47]](#_47_6)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記》卷3，第2頁。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創建和發展》，第49—51、82—84、124—125、169頁。

[[48]](#_48_6)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頁。貝耳：《關于直隸省等地的軍事報告》，第89頁。

[[49]](#_49_6)肯尼迪：《李鴻章與江南造船的計劃》，第208—210頁。

[[50]](#_50_6)同上書，第210（特別是注21）、219、224頁。

[[51]](#_51_6)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創建和發展》，第74頁。

[[52]](#_52_6)同上書，第148頁。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82—85頁。

[[53]](#_53_6)龐百騰：《從沈葆楨的經歷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1969年倫敦大學博士論文），第118—132、140—144頁。關于1874年以前福州船政局的財政及其他困難的詳細敘述，也詳見張玉法《福州船廠之開創及其初期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2（1971年6月），第177—225頁。

[[54]](#_54_6)龐百騰：《從沈葆楨的經歷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第261頁。

[[55]](#_55_6)同上書，第112、145—151頁。關于沈葆楨最初接任時為難之處的生動報告參看他1867年7月18日的奏折，載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卷4，第1—4頁。

[[56]](#_56_6)參看例如1867年8月16日的《北華捷報》。

[[57]](#_57_6)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96—102頁。

[[58]](#_58_6)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3頁。《廣方言館全案》（南京大學所藏刻本的1949年手抄本，經畢乃德同意轉引），第7—8頁。參看他的《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57頁。

[[59]](#_59_5)伊凡斯：《廣州同文館的旗校背景》，載《中國論文集》22A（1969年5月），第89—103頁。

[[60]](#_60_5)參看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58頁和注5。

[[61]](#_61_5)丁韙良：《中國巡禮》，第299—300頁。

[[62]](#_62_5)王萍：《西方歷算學之輸入》，第75—124頁。

[[63]](#_63_5)《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頁。此奏之后于2月25日又有一個奏折，推薦《瀛環志略》年邁的作者徐繼畬做總管同文館書務的大臣。這個建議也得到批準。

[[64]](#_64_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16頁。

[[65]](#_65_4)參看張灝《倭 仁的排外作用》，載《中國論文集》14（1960年），第1—29頁。

[[66]](#_66_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頁。

[[67]](#_67_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第14頁。參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丁卯（1867年），第12—13、15、23—24、26、28、36頁。

[[68]](#_68_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第15頁；卷49，第24頁。

[[69]](#_69_4)《大清穆宗實錄》卷238，第17頁。有關慈禧及倭仁一派在辯論同文館問題中所起作用的進一步討論，參看劉廣京《1867年的同文館之爭》，載科恩、施雷克編《19世紀中國的改革》，第85—100頁。

[[70]](#_70_4)引自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19頁注47。

[[71]](#_71_4)參看修訂的同文館內部章程以及“總理衙門的堂諭”，載中國科學院等編輯的《洋務運動》（二），第73—81頁。

[[72]](#_72_4)關于早期同文館的出版物清單，參看同上著作第87—88頁。丁韙良的《格物入門七則》于1868年出版，以后曾多次再版。

[[73]](#_73_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第24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06頁。

[[74]](#_74_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0，第22頁。

[[75]](#_75_4)日意格：《福州兵工廠及其成果》，第33—34頁。

[[76]](#_76_4)《船政奏議匯編》卷13，第9頁；卷14，第12頁。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97頁。

[[77]](#_77_4)龐百騰：《從沈葆楨的經歷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第277—281頁。龐所列的表格說明1875年組成福州水師的18艘兵艦中只有兩艘是由原清朝水師軍官擔任艦長的。

[[78]](#_78_4)沈珂：《先文肅公政書續編》，1870年的奏稿。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卷4，第64—65頁。

[[79]](#_79_4)《船政奏議匯編》卷13，第19、30頁；卷14，第5—6頁。

[[80]](#_80_4)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8頁注103。

[[81]](#_81_4)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3，第7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20—21頁。

[[82]](#_82_4)有關到1877年為止的這一出版數字，根據貝奈特《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附錄Ⅱ和Ⅲ。關于擬譯選書的官方政策，參看《廣方言館全案》，第32—33頁。

[[83]](#_83_4)貝奈特：《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第40—42頁。

[[84]](#_84_4)《廣方言館全案》，第20—23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70—171頁。關于涂宗瀛，參看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的《清史》第6冊，第4963頁。

[[85]](#_85_4)《廣方言館全案》，第52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77頁。

[[86]](#_86_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第22頁。

[[87]](#_87_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5，第32—33頁。《海防檔·機器局》卷3，第17—19頁。

[[88]](#_88_4)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30，第8—9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10—213頁。

[[89]](#_89_4)洪煨蓮：《黃遵憲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的譯文及注釋，《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卷18（1955年），第60頁，引述了從李慈銘日記發現的有關陳蘭彬的描述。

[[90]](#_90_4)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28、30頁。

[[91]](#_91_4)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第19—22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6，第13—14頁。

[[92]](#_92_3)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卷17，第19—21、23頁。第二批30個男孩（1873年赴美）中，來自廣東的還是24名。廣東人在第三批（1874年）的30人中占17名，在第四批（1875年）的30人中占19名。徐潤所列的名單說明，很多男孩的父親受雇于福州、上海和天津的兵工廠和造船廠。參看拉法爾格所著《中國首批百名學生》中所列表格。

[[93]](#_93_3)關于中文課程的最初計劃，參看1872年3月1日核準的曾國藩和李鴻章聯銜奏折所附的“清單”，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5，第15頁。關于李圭報告的綜述，見洪煨蓮《黃遵憲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的譯文及注釋，第62頁。

[[94]](#_94_3)關于區諤良的背景，見上引洪煨蓮文第61頁。

[[95]](#_95_3)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2頁；《奏稿》卷30，第4—5頁。

[[96]](#_96_3)《船政奏議匯編》卷12，第9頁。

[[97]](#_97_3)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3頁；卷16，第3、35—36頁；《奏稿》卷82，第20—31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29—230頁。

[[98]](#_98_3)在被視為適合學生選修的其他科目中，有外交和國際法，參看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1頁。

[[99]](#_99_3)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33—235頁。《船政奏議匯編》卷18，第21頁。

#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

19世紀時，商人們來中國謀求利益。外交官和軍人來到中國則謀求特權和讓步。外國人中間唯有基督教傳教士到中國來不是為了獲得利益，而是要給予利益；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為中國人的利益效勞。那么，在19世紀所有那些來中國冒險的人們當中，為什么傳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懼和仇恨呢？

如果對這個問題有任何一個答案的話，那就是傳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堅信這一主張：只有從根本上改組中國文化，才能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全都有這種信念。他們的區別不在最終目標，而在用以達到此目標的策略。他們的共同目標是使中國皈依基督教，而且他們是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

不論是新教和天主教，絕大多數傳教士都不能容忍中國文化，但又不愿意或者不能夠對它進行有意義的改造。他們樂此不疲地傳布宗教信仰，有把改變世俗事務置于次要地位之勢。雖然他們的人生觀和宗教觀十分保守，但是他們在中國舞臺上的影響卻與保守南轅而北轍。因為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要求特別苛刻，在中國人看來，他們是公然反對祖先崇祀的人。

只有人數非常少的傳教士，主要是新教徒，能夠容忍、甚至欣賞中國文化的某些方面，認為自己的任務與其說是破壞中國文化，不如說是來“完善”它。然而說來也奇怪，在這方面走得最遠的傳教士，正是那些極力主張必須對中國生活方式進行大整大改的人。

所以，雖然有些傳教士集中力量抨擊中國的古老制度，而另一些傳教士則比較強調建立新制度，但是按照其使用的性質來說，所有傳教士都向傳統文化提出了革命的挑戰。使許多中國人感到受威脅的正是這個原因，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

感到受威脅的中國人有這么多，但不是全體中國人都這樣。而且也不是無限期地感到受這種威脅。隨著時間的流逝和西方的入侵問題開始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越來越占有中心位置，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改革。對于舊制度的信念變得淡薄了，到19世紀90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話），許多人開始熱望出現一個新的中國。這些新近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國人對于仍在力圖拯救中國人靈魂的“福音派傳教士”依然懷有敵意，不過不如以前那樣富有戰斗性。但是，他們對于為拯救中國而工作了一個世代以上的“世俗派傳教士”則表現了新的志同道合者的態度。甚至在一個短暫的、然而是熱情的時期內，他們還變成了這種傳教士的門徒。

因此，傳教事業的影響極為復雜，如果只用一種觀點來理解它，就只能模糊它的真正性質。實際上，傳教事業有許多不同的影響，每一種影響都引起了中國人一些不同的反應。而且，這些影響和反應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時因地而異，這部分地反映了中國條件的變化，部分地反映了傳教事業本身性質的演變。以下我們首先討論傳教事業性質的演變。

## 傳教事業

### 起源和早期歷史

在近代中國進行的傳教事業只是它的世界范圍活動的一部分。這種活動由許多渠道形成：宗教的、文化的和民族的。當然，基督教始終主張全人類的得救，因而它具有傳布教義的動力。但是，要使這種動力大規模地實現，必須具備某些歷史前提。傳教活動需要經費資助，需要組織指導。必須克服長途跋涉的技術障礙，正如必須克服妨礙傳教工作中民族的和文化的障礙一樣。尤其重要的是，許多西方人必須對非基督教世界有足夠的關心，使他們愿意積極去參加拯救靈魂的工作。

### 羅馬天主教

這些先決條件得到滿足的方式，與現代歐洲文明興起的歷史，與它空前的技術發展和經濟增長，與它想要發現和改造這個世界的強烈動機是分不開的。在蒙古人統治時代，早期的努力沒有取得結果，此后天主教在華的傳教活動在16世紀80年代積極地開始了，當時允許意大利的耶穌會士利瑪竇（1552—1610年）進入中國。不久，其他天主教教派的傳教士都加入利瑪竇及其同事的事業，揭開了一個蓬蓬勃勃的工作時代。這個時期與后來在華傳教活動的時期有幾個主要方面大不相同。首先，雖然國籍和方法的不同造成了傳教士之間相當大的不和，但他們都是羅馬天主教徒，體現了教皇這個唯一至高無上的宗教權威的擴張。（1727年北京設立了一個小規模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但是它的成員好像沒有在中國人中間進行過任何福音傳道工作。）第二，17和18世紀大批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對中國文明采取非常寬容的態度，有些人甚至探討過在基督教和儒教之間進行有成效的調和的可能性。第三，早期的傳教活動沒有外國軍事力量或國際條約的支持，因此，傳教能否繼續則完全視中國人是否同意而定。

1692年康熙帝曾經正式敕準可以傳教；但是繼位者雍正皇帝在1724年收回了這道敕令，因為他越來越懷疑外國傳教士的政治動機。接著，中國基督徒被勒令放棄信仰；外國傳教士除任職于北京欽天監的以外，都被要求離開中國；天主教財產被沒收，充作非宗教用途。在后來120年間，基督教被官方定為異端，在中國人看來它與經常威脅皇朝安定的秘密會社很少差別了。

禁止天主教并沒有使傳教活動令人心痛地陷于停頓。許多外國牧師繼續在內地進行活動，遲至19世紀初還有幾所培養本地牧師的學校。然而，前途絕不是有希望的。基督教團體愈是遭到像秘密會社那樣的待遇，愈是被迫像秘密會社一樣活動。內地的牧師們必須秘密地進行工作，住在窮鄉僻壤，旅途中必須喬裝改扮，還經常有被官府捉拿的危險，進而被驅逐出境，更不幸時就要被關押，甚至被處死。在乾隆在位的長久時期，不時發生全國性的迫害，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784—1785年。[[1]](#_1_Guan_Yu_Zhe_Ci_Po_Hai_De_Lian)迫害在嘉慶和道光年間變本加厲起來，因為王朝權威的削弱為秘密會社所造成的混亂的加劇鋪平了道路。

歐洲各種事態的發展，使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天主教的在華地位進一步受到損害。1773年教皇下令解散支持基督教傳教活動最有影響的機構之一耶穌會，該會從利瑪竇時代以來已有四百五十多名耶穌會士在華工作過。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個贊助最力的國家力量的衰落，也殃及傳教事業。還有兩個因素也對減少支持傳教活動起了一定影響，那就是啟蒙運動的反教權主義和繼法國革命之后發生的20多年精疲力竭的戰爭。

歐洲這些事態的發展使得教會在全世界的影響下降。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但是據估計，1705年中國至多有30萬天主教徒。100年以后，即1800年，總數可能約在20萬和25萬人之間；直到1835年或1840年，總數大體上保持在這個水平上。這種絕對總數略微減少的情形也不能說明全部情況。首先，人們普遍認為中國人口在18世紀幾乎增加了一倍。如果果真如此，這便意味著到1800年基督教徒與總人口的比率減少了一半，而且由于人口繼續增加，到1840年時基督教徒在總人數中的百分比就少得更多了。其次，在缺乏本國或國外的堅強領導下，傳教士們所施洗的基督教徒的獻身精神很可能已經退化。最后，由于傳教士接近皇上、官吏和有教養階級的機會大大受到限制，他們對這些上層居民的影響便相應地減少了。賴德烈在總述鴉片戰爭前夕羅馬天主教聲勢下落的低潮時說：“如果1835年以后傳教士進入中國的人數逐漸減少而不是增加，那么，教會可能在幾代人的時期內不復存在，不會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了。”[[2]](#_2_Lai_De_Lie____Ji_Du_Jiao_Zai)

當然沒有發生這種情形。事實上，歐洲重建和平以后，對于天主教傳教活動的興趣又活躍起來。傳教事業復興的標志是一些舊的天主教宗派恢復了活動，而且新的教派也創辦起來，其中最著名的是為了促進天主教支持傳教活動而于1822年在法國建立的教廷傳信部。傳教活動的興趣一步步地抬頭，到1840年，歐洲再也沒有妨礙天主教在華大力開展活動的重大障礙了。

### 新教

天主教恢復傳教興趣的情況與18世紀末以來新教徒中出現的傳教熱潮絲毫不能相比。在此以前，新教教徒對于到國外傳教大都漠不關心。但是英國的福音布道會和美國的大覺傳道會給新教的所有派別注入了新的生氣，無數人士在因改宗而經歷了強烈的感情危機以后，都準備為耶穌基督獻身。

福音派新教運動產生了許多新的新教團體，從像循道宗那樣的派別到救世軍、主日學校，最后到基督教青年會和基督教女青年會這樣的組織。它也直接促進了一些非常重要和有影響的新教傳教會的創辦。1792年英國的浸禮會首先成立，不久，接著出現了這樣一些團體，如倫敦（布道）會（1795年）、中華圣公會（1799年）、英國圣經公會（1804年）和美國海外布道會（1810年）。新教徒的傳教活動大部分來自英國和美國，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這兩個國家。同樣地，也由于工業革命給講英語的世界帶來了空前的財富和人們旺盛的活力。

新教在華的事業始于1807年倫敦會的馬禮遜（1782—1834年）之來華。（不算17世紀中葉荷蘭新教徒在臺灣傳教的失敗在內。）由于新教活動被限制在廣州和葡屬澳門兩地，又沒有從前在中國的經驗可資借鑒，后來幾十年福音的傳布受到了嚴格限制。到1840年，傳教士增加到20人以上，代表六個不同的差會。不過已接受洗禮的華人不到100人（馬禮遜直到1814年才給他的第一個中國信徒行洗禮），其中大多數或者是教會學校的學生，或者是教會的雇員。

評價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標準，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為后來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礎。最重要的基礎是準備了初步的、但卻是大批的中文基督教書籍。在米憐的幫助下，1819年馬禮遜完成了新舊約的翻譯，后來又編了第一部漢英字典。教士們的印刷所還源源不斷地出版宗教文章和小冊子，其中最著名的是米憐的《張遠兩友相論》（1819年），此書直到20世紀初期仍被認為是有用的書籍。有幾名最早的傳教士（其中有倫敦會的麥華陀和美國海外布道會的衛三畏）是受過專門訓練的印刷工，這一事實說明各該國國內差會高度重視基督教書籍的工作。

從長遠看，同屬必需的另一種形式的著作是編寫供外國人使用的關于中國生活和狀況以及該地傳教進展情況的資料。這類出版物中主要的是《中國叢報》，這是首批赴華的美國傳教士之一裨治文（1801—1861年）1832年在廣州創辦的月刊。1833年衛三畏（1812—1884年）與裨治文一起工作，在他們的共同編輯下，這個期刊直到1851年底為止成了發表西方人士論中國的嚴謹學術著作的主要園地。

醫學和教育是這個早期階段新教活動的另外兩個重要領域。第一個赴華的醫生傳教士伯駕（1804—1888年）于1835年在廣州創辦了一所醫院，在他的主持下，20年間醫治了五萬多名病人（最有名的是林則徐，1839年給他配了一條疝氣帶）。伯駕也是為了“解除人們的苦難和宣揚基督教義”而于1838年在廣州成立的中國博濟醫局的發起人之一。[[3]](#_3_Mai_Ji_Li_Fu_Lei_Bian____Xin)

鴉片戰爭以前在教育方面最有名的嘗試是1818年馬禮遜創辦的英華書院。它曾設在馬六甲多年，那里有大量華僑，而且也比廣州或澳門安全。基督教課程是每天的必修課。但是，英華書院的大宗旨（其成就平平）是雙重的：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文化，向西方（主要是英國）學者介紹中國文化。馬禮遜的愿望在他身后體現在馬禮遜教育協會中，它是在華外僑為了紀念他而成立的，旨在促進英文教學，從而使中國人能取得“西方的各種知識”。[[4]](#_4_Tong_Shang_Shu__Di_646Ye)

新教在華早期活動的方式，在許多方面是行將發生的情形的縮影和預習。但是，在一個方面它卻不是這樣。這不同的方面就是，它畢竟是中西接觸的開創階段，最早的傳教士是開路先鋒。像大多數創業情況一樣，人員和其他資源都嚴重不足，所以要求這些人比在后來的發展情況下擔任更復雜得多的任務。除此以外，傳教士要完成吸收信徒的這一主要任務仍然存在著種種障礙，所以早期多得不成比例的傳教士得擔任世俗職務，這樣又使傳教士的身份模糊不清，如果說沒有完全喪失這種身份的話。

因此，我們看到馬禮遜從1809—1815年擔任過英屬東印度公司的翻譯，1816年又隨同阿美士德勛爵出使北京時擔任通譯。李太郭在19世紀20年代作為博物學家赴華，以后的10年又作為英國圣經公會的代表回國，1842年被任命為英國駐廣州第一任領事。普魯士傳教士郭施拉（1803—1851年）在鴉片戰爭期間最初擔任英國通譯，隨后又擔任舟山“地方行政長官”；后來他接替馬禮遜的兒子擔任香港英國當局的中文秘書。裨治文和伯駕在1844年曾擔任過美國談判代表團的秘書；伯駕后來也完全放棄了傳教士的身份，而到外交界任美國的代辦。他是一部綜述中國的百科全書式著作《中國總論》一書的作者，最后在耶魯大學主持美國第一個中國語言和文學講座而終其余年。

這種不拘一格的工作狀況并沒有一直繼續下去。只要中國還在有力地抗拒西方的滲透，所有外國人的最高目標便只有一個。但是一旦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中西交往都按照條約進行時，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的不同興趣便油然而興。開創階段結束了。從此以后，傳教士就只當傳教士了。

### 條約與傳教活動

### 第一個條約的影響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和西方列強之間議定的條約沒有涉及基督教傳教的專門條款。但是傳教士是外國人，他們自然從條約的某些條款中獲益。英國獲得香港和開放五個口岸（廣州、上海、福州、廈門和寧波）給外國人居住，這便增加了進入清帝國的另外一些地點。還明確地允許外國人在開放的口岸建立教堂。治外法權使傳教士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而傳教士之在內地工作盡管仍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沒有多大危險了。因為條約中有一款說明，如果外國人被發現已離開通商口岸，他們只需被帶到最近的領事那里去就行。雖然不是每一個條約都十分明確地包含這些新的特權，但最惠國條款使得給予某個國家的任何特權也自動地適用于他國。

法國對天主教士和中國教徒的危險處境表示關切，企圖在它的條約里寫入信教自由條款。它的這一企圖失敗了。但是法國的談判者強使中國政府頒布了兩個稍微放松現行禁令的敕令。第一個發布于1844年12月，宣布不迫害忠誠信仰基督教的中國人。第二個發布于1846年2月，它向各省當局闡明了寬容信教的新政策，并又作出了讓步，即康熙時代以來一些舊的教堂如果仍然繼續存在而又沒有挪作他用，應歸還給基督教所有。

新的條約和敕令促使19世紀40年代剩下的幾年和50年代天主教和新教的傳教活動大為開展。涌入中國的天主教牧師顯著增加，僅僅耶穌會在1843年和1857年之間就新派了58名傳教士赴華。其他教團也恢復了活力。雖然首先考慮的是把以前建立的和聽其自生自滅的天主教團體重新建立起來，但是又開辟了一些新地區和開創了一些先例（最明顯的是19世紀40年代天主教修女先遣團的來華）。各種迫害繼續妨礙天主教工作，特別是仇視外國人的咸豐帝即位（1850年）以后，官方制造的麻煩多得很。教會的合法地位盡管仍然軟弱，但是到19世紀50年代末它已經較順利地扭轉了走下坡路趨勢，內地的天主教教士比簽訂條約以前享有更大的行動自由。

與天主教徒大不相同，新教徒在條約生效期間更喜歡開放口岸的安全和比較舒適的生活。其原因有幾點。內地還沒有新教徒團體和設備需要予以照顧。新教教士在數量上還很少，據報道1858年是81人；仍在進行的準備工作在通商口岸進行交涉要更加有效。最后，他們與天主教兄弟不同，新教徒常常有家室之累，在這個早期階段，家室之累是他們卜居口岸以外地方的無法克服的障礙。

個別新教傳教士也偶爾到內地旅行去搞偵察活動，順便有時散發圣經和小冊子，甚至向相當大的人群布道。一個特別容易受騙的傳教士郭施拉想出了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想通過一小隊來自香港進行活動的中國信徒之手，使整個清帝國矚目基督教。但是，郭施拉的許多“布道者們”原是一些狡詐之徒，他們只是假裝離開香港，卻把經費拿去抽鴉片煙，把郭施拉所交的書籍賣給印刷商，但印刷商又立刻將它們賣回給郭施拉。

有一件無比重要的事件使內地中國人認識到另一種形式的基督教，這就是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震動和蹂躪了長江下游的太平軍叛亂。古怪的太平軍思想體系受到了新教徒著作的強烈影響，兩個最高叛亂領袖洪秀全和洪仁玕曾在廣州親聆新教教士的教誨。雖然太平軍最初曾在新教徒中間激發起莫大的興奮，但是他們背離了新教公認的最低限度的精髓，很快便失盡人心。[[5]](#_5_Wu_Lun_Ru_He_Zhe_Zhong_Guan_D)不論太平軍運動有著怎樣長期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它在宗教上的影響看來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隨著運動的失敗而消失了。

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新教徒的傳教活動中比較持久的（雖然是不大引人注目的）見證是在著作方面。1850年《新約全書》的所謂“委員譯本”的翻譯工作圓滿完成，它代表了整個新教徒傳教團體把《圣經》譯成通俗中文的部分成就。雖然某些人認為這委員譯本不夠準確，但是它的淵博和典雅是不容爭辯的。英國圣經公會所采用的這個譯本到1859年印行了11版，直到20世紀20年代仍在使用。

這個時期新教徒中間另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是理雅各決定把整個儒家經典著作譯成英文，“以便使世界其余地區真正了解這個偉大的帝國，特別是使我們能夠具有足夠的知識在中國人中間進行傳教活動，從而獲得持久的成績”。[[6]](#_6_Yin_Zi_Lin_Sai__Li_De_De___Ch)理雅各（1815—1897年）抵達香港（1843年）以后不久，便在40年代在倫敦會的贊助下開始了這項工作。《理雅各英譯七經》第一冊雖已出版一百多年，至今仍被世界各國漢學家認為是標準譯本。理雅各原先承擔這副重任主要是想提高傳教活動的功效，但這一點已經被人遺忘了。

### 法國的保護領地和第二個條約

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條約使所有基督教徒在華傳教的地位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法國在中華帝國沒有實實在在的真正利益，覺得必須創造一種精神的利益，以抵消英國對手的威望和影響。這就是它在19世紀40年代開始承擔羅馬天主教傳教活動的擁護者和保護人角色（以前由葡萄牙在中國任此角色）的主要政治原因。

唯一的問題是法國怎樣大力去擔任這一角色。在40年代末期它曾猶豫不決。但是到50年代初期，國內日益增長的帝國主義情緒與在華天主教士施加的壓力相呼應，要求對法國政策進行更加有力的指導。1856年2月29日廣西省判處法國傳教士馬賴死刑是公然違背條約的，使法國獲得了參加1857—1860年軍事遠征的必要的法律口實。當戰爭結束和分配勝利果實時，法國方面最明顯的實際受益者是天主教傳教勢力。

這種利益是相當大的。《中法天津條約》（1858年議定，1860年批準）第十三款保障天主教士在清帝國各地自由布道和從事宗教活動，保障中國臣民有權進行基督教活動而不受到懲罰。這項條約還正式廢除了以前反對外國宗教的全部官方文件。

1860年中法條約法文本第六款重申以前中國的諾言：把所有被沒收的教會和慈善機構的設施全部歸還天主教會。中文本則走得更遠，這顯然是由于法方一個通譯的欺騙行為造成的。[[7]](#_7_Da_Duo_Shu_Zuo_Zhe__Bao_Kuo_T)中文本保證全中國不禁止天主教；非法逮捕天主教徒的人要受懲處；以前沒收天主教的教堂、學校、公墓、土地和建筑物的契據要交給法國駐北京的代表使之物歸原主；最重要的是允許天主教傳教士在各省租賃或購買土地，并可隨意在上面營造建筑物。

中法條約大體上確定了該世紀余下年代里天主教傳教活動的合法的基礎。由于最惠國條款，新教教士也從這個新秩序中得到利益。新舊兩派傳教士像保護寶物一樣保護他們在條約上得到的特權，并且常常逼迫本國政府堅持這些特權。然而當時似乎誰也不關心這些特權是怎樣得來的。

### 基督教傳教的機構、規模和經費（1860—1900年）

新條約為1860年以后傳教運動的空前大發展提供了合法前提。就“運動”一詞的意義是指一個共同方向和一個單獨組織而言，此詞選得并不恰當。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由于文化、語言和宗教的原因，大都各自為政，兩者常常并不和睦相處。此外，甚至在它們各自的內部，在組織上的一致性和協作方面也是很不相同的。

當然，天主教徒表現的團結比新教徒強得多。17世紀設立了一個梵蒂岡的專門機構——教廷傳信部，以監督和協調全世界各修會和教派的活動。在中國，傳信部通過稱為教皇代牧區的行政區進行活動，每個行政區由教皇代牧領導，他在教階體制中屬于主教一級。一般來說，教皇代牧區以省為單位，每區委托給一個修會負責。19世紀中葉以后不久，中華帝國的版圖大致由如下五個主要修會負責：西班牙的多明我會（福建）、耶穌會（江蘇、安徽及直隸的南部）、遣使會（直隸大部地區、蒙古、江西、河南和浙江）、方濟各會（山東、湖南、湖北、山西和陜西）、巴黎外方傳教會（四川、貴州、云南、廣西、廣東、滿洲及西藏）。當其他修會參加進某個代牧區時，則對該區再進行細分而形成一些新的代牧區。

19世紀最后40年，天主教傳教組織迅速擴大。到1870年，大約有了250名歐洲神甫。15年后，又上升到488名（包括35名主教），而到1900年達到了886名。

這樣巨大的事業（具體地表現在到1900年時在中國星羅棋布地點綴著幾千座教堂、學校和慈善機構），都是需要大規模的財政支持的。在新時代開始時，這種資助大部分來自教廷傳信部和其他歐洲來源。但是在1860—1900年期間，中國教會開始越來越少依靠歐洲的資助，不過，有些修會依靠的程度大一些。新的條約允許教會擁有土地，到19世紀末葉，在清帝國某些地區教會擁有的土地已經很多很多，最突出的是四川省和天津、上海及南京等通商口岸。教會土地究竟有多少，教會究竟成了什么樣的土地主，這是還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天主教各修會雖然各自求取資金，也偶爾強調各自傳教使命的不同方面，但是都信仰和宣講同樣的教義，承認和實行同樣的圣禮，遵守同樣的戒律，服從同一個權威。因此，即使各修會之間沒有多少合作，但是整個天主教徒的努力無形中有某種一體化的特點。

至于新教徒在華的事業，就不能這樣說了。有一位天主教學者可能言過其實，他說：“各個新教教派互相傾軋，意見老是彼此相左……”[[8]](#_8_Dai_Li_Ya____Zhong_Guo_Tian_Z)但是，說新教傳教團體僅在名義上是一個“團體”，它一般說來還是正確的。它們各自為政，到1905年時有63個單獨的差會，每個差會都有自己的組織、自己的財源和自己的基督教真理概念。

各個教派的差會（浸禮會、衛斯里美以美會和長老會等）由國內各自的教友募捐來接濟。捐獻也是維持非教派團體的主要基礎。大多數差會由國內董事會進行指導，后者除制定政策以外，還負責籌款、征募和考核新的候選人，等等。總的情況就是如此的，但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外，即有一個非教派的中華內地會，它的母會完全聽命于中華內地會在中國的創始人和領袖戴德生。

和天主教徒不一樣，新教徒在1860年以后要深入中國內地，必須從零開始。最初，進展是緩慢的。但是自經戴德生的組織帶了頭，到1877年新教徒能夠在內地三個省立下腳跟，到1890年他們已經遍布于中國各省，可能湖南省是個例外。10年以后，新教布道站（有外國傳教士的直接經管）的數目約500個，而分站（由中國人照管）的總數達數千之多。

新教傳教士的發展同樣引人注目。內地開放四年以后，在中國有189名新教傳教士。10年以后，即1874年，有436名新教傳教士。到1889年達此數的3倍，到1905年則上升到3445名。所有新教教士90%以上是英國人和美國人。英國新教傳教士一般出身于中等階級，少數人進過大學。美國新教傳教士大體上來自小城市和窮鄉僻壤，男的通常是某個教派的高校畢業生。在跨入20世紀時，新教傳教士社會中多半數是婦女。

### 傳教方法和結果（1860—1900年）

雖然人們通常都認為，19世紀下半期，新教傳教士比天主教傳教士更加關心文化和風俗變化等更為廣泛的問題，但是要好好記住，他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如此。不論新教和天主教，絕大多數的傳教士都把吸收教徒作為他們鞠躬盡瘁的目標和日常的主要任務。

### 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采用許多方法以求實現爭取人們靈魂得救的任務。有些耶穌會教士竭力仿效其卓越的先輩們，企圖用學術和科學活動的方法來打破中國人的抵抗。但是他們的最大成就像顧賽芬的字典和譯著、徐家匯出版的關于中國的學術專著《漢學雜刊》，卻是更適合于使歐洲人進一步了解中國，而不是促使中國人接受基督教。實現后一目的最有效方法是：由中國傳道師直接布道；為吸鴉片者提供戒煙所；救濟饑荒；有時為非基督徒的孩子們入學而興辦天主教學校；以及1860年以后由天主教士設立大批孤兒院。

孤兒院一般由修女管理，設在內地各地和通商口岸。這項最重要的天主教慈善事業的宗教根據是出于這種信仰：如果嬰兒在洗禮以后不久死去，就能保證他們的靈魂得到拯救。如果一個孤兒沒有死去，當然他便在基督教氛圍中由修女撫養長大。據說孤兒院有時也接受貧苦父母親的嬰兒，稍微給一點錢作為交換。在19世紀末籠罩于中國許多地區的不安定的情況下，雖然這種機構有著明顯的必要，但是它們廣泛被中國人誤會，成為民眾排外情緒的主要焦點。

1860年以后天主教士實行的另一種方法也許更加產生了反效果。這就是對當地的政治和司法廣泛進行干涉，以贏得可能的皈依者。通過這種方法入教的中國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而傳教士仗恃法國的保護來維護這些人的利益，便普遍激起了官府和非基督教平民兩方面的仇恨。

成年的中國人對天主教表示感興趣以后，要經過一個領受信仰精髓的持久的教誨過程；有時要經過幾年才最后給他們施洗禮。對于其父母為天主教徒的孩子們，傳教士設立了廣泛的學校網。可舉一個最重要的例子：在耶穌會士管理的江南（江蘇和安徽）教皇代牧區，據報道1878—1879年有345所男學校和6222名男學生，213所女學校和2791名女學生；到19世紀最后幾年，江南天主教學生的總數已逾1.6萬名。雖然設立了培養本地牧師的神學院，設立了培養獻身教會事業的中國傳道師和婦女的神學校，但是大多數天主教學校是小學水平。講課用中文，學校的全部課程和課本的宗旨則幾乎都是為了加強學生的基督教信仰。很少或根本沒有作出努力來介紹西方的非宗教知識。

到1900年，中國有70余萬天主教徒，包括大約450—500名本地牧師。在入教時，這些人被要求放棄中國生活的許多特征：例如放棄全部“異教徒的”宗教信仰和習俗，不許販賣和吸食鴉片煙，不參加民間節日（包括戲劇演出）和星期日工作，不納妾，尤其要放棄祖先崇拜。這樣一來，天主教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孤立的和自外于中國同胞的團體。如果獲悉這些人幾乎完全來自最不幸的階級，即貧苦農民、小店主、零售商和流浪漢，那也沒有理由感到驚怪，因為正是這些人在現存中國社會制度中的命運最不能經受波折。

### 新教徒

新教傳教士在努力宣示基督的教誨時，比他們的天主教對手更加直接地使用宣講方式，也更加廣泛地利用文字語言。新教和天主教的早期傳教士早就展開了活動。但兩者目的不同。新教徒需要經過若干年才能組成許多需要外國傳教士巡回監管的牧區。同時，新教徒巡回傳教的目的通常有二：向廣大地區傳播福音（講道和販賣宗教書刊），以及搜集有關在以后可能開展比較固定工作的那些地區的情報。

雖然有些傳教團體如中華內地會和圣經公會繼續強調巡回傳教工作，但是總的來說，新教徒的活動逐漸具有比較固定的性質。通常建在城市里的布道站，典型的格局是設有一座講道堂或街道禮拜堂，一座教堂建筑物，一所或幾所學校，幾處由教士及其中國傭工占用的住宅，一個診療所，有時還有一座小醫院。這種布道站形成了城市的一個核心單位，其周圍也及時地出現較小的農村集會所組成的衛星地區，各有自己的小禮拜堂和一名由外國傳教士嚴密監督的中國牧師。

從典型的布道站的具體結構來看，新教傳教士在1860年以后的時期繼續致力于教育和醫藥等非傳教性質的事業。他們也越來越積極地從事廣泛的慈善事業，如救荒、戒煙、實施盲啞人教育等等。新教徒參加這些活動有時有確定的目標，但往往產生意外的效果。即為廣泛地改變中國的生活開辟了道路。但是，參加這類活動的大部分傳教士其實是在設想：他們是在幫助訓練中國人接受基督教。

到了1900年，雖然新教的傳教士團體比天主教的傳教士團體龐大得多，但是，受過洗禮的中國新教徒總計只約10萬人，而由不足300名授予圣職的中國牧師主持著宗教儀式。如果把這些數字和天主教徒的數字作一個比較就應該記住，新、舊教對怎樣才能做一個基督徒的看法是有相當大的區別的。例如嬰兒洗禮在天主教徒看來非常重要，但大多數新教徒卻不接受這一點。有些人也認為，新教傳教士對于領受圣餐者的要求傾向于嚴格，因此，新教徒中間“好教徒”的百分數比天主教徒多。事情也許是這樣，也許不是這樣。無論如何事實始終是，不論教徒的質量如何，中國新教徒的社會地位和影響與他們的天主教同胞一樣，幾乎總是很低的。在明治時代的日本，皈依新教者有30%是武士出身，基督教徒在該國的精神生活中起著最主要的作用；反之，中國的有教養的教徒的人數卻是微不足道的。像日本基督教教育家新島讓（1843—1890年）或“無教會”運動創始人內村鑒三（1861—1930年）那種有才干的宗教領袖，在中國任何地方也是找不到的。[[9]](#_9_Guan_Yu_Ming_Zhi_Shi_Dai_Ri_B)

當然，出現這種情況并不是由于新教傳教士對此問題關心不夠。有些傳教士，例如李提摩太（1845—1919年）、丁韙良（1827—1916年）和尚賢堂創始人李佳白（1857—1927年）[[10]](#_10_Guan_Yu_Li_Ti_Mo_Tai_De_Ce_L)都曾特別強調要深入到有教養的名流中去，許多新教徒利用科舉趕考的機會散發基督教的宗教書籍。然而，在向舉子散發宗教書籍時，傳教士沒有挨打受傷便是萬幸；他們在上流社會活動時，最終能向中國名流顯要宣示的思想，其內容多是世俗之言，而非宗教之言。丁韙良的宗教的講詞在日本的影響遠遠超過在中國的影響。[[11]](#_11_Ding_Wei_Liang_De___Tian_Dao)很多中國受教育者對基督教反應冷淡，其原因很復雜。它首先必然與舊制度的性質有關，也和與傳教活動互相影響的特殊方式有關。

## 傳教事業和舊制度

一種外國宗教要在任何社會中取得進展，它必須適應該社會成員的需要。它怎樣適應（如果它要適應的話）和對誰適應，這是一些異常困難的問題，對它們的解答要看下列因素如何而定：新宗教的教義和習俗相對來說是否格格不入；它出現時的歷史環境如何；宣傳它的方式如何；是否出現了堪與匹敵的其他新宗教；以及社會上被疏遠的分子占多大的優勢（新的宗教為這些人提供了擺脫痛苦的道路或使之起來造反的精神—心理上的力量）。

19世紀中葉，太平軍叛亂可能是在中國促使人們廣泛接受某種形式基督教的一種因素。但是，太平軍以失敗告終，而在鎮壓他們的過程中激發起來的正統派熱情使得后來西方宗教要在中國深深扎下根來就更加困難了。中國有了基督教信徒。但是如上所述，他們從來人數不多，也幾乎只限于貧苦的農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聲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貧無立錐之地的人。對于大多數與現狀仍然像魚水一樣和諧的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不僅缺乏號召力，也好像是一種明顯的威脅。在各個社會階級中間，消極的和積極的抵制都大量存在。

### 過去的遺產：把基督教當作異端

抵制的原因很多。中國學者對本國近代史往往表現得感情激動，他們有一種可理解的傾向，即把責任不是歸因于基督教教義和儒家學說之間的差異，或者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態度的傳統，而是歸因于一個作者稱之為“傳教加條約”的破壞性。[[12]](#_12_Tang_Liang_Li__Yin_____Pan_L)始終存在的乖戾的仇外心理是這些學者感到難以自圓其說的客觀實際。不過，他們可以輕易地把這種心理視作愛國主義的憤慨情緒（19和20世紀的產物）。因此，中國人敵視基督教的長期傳統很容易被忽視、否認，或者被認為無足輕重。[[13]](#_13_Zhe_Yi_Dian_Zai_Zhong_Guo_Go)

這是不幸的。因為雖然在清朝末年傳教士確是主要刺激因素（我也確信如此），但他們遇到的民眾中許多人已有了易被激怒的先入之見，這一事實也是不可輕易加以忽視的。反基督教思想的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那時這樣的著作普遍得很。在19世紀下半葉中國接受基督教的“思想”氣氛中，它們是重要的組成部分。[[14]](#_14_Xia_Wen_Ji_Duan_Jun_Yin_Zi_Z)

基督教傳入中國以前很久，中國已經有一套詞匯用來稱呼那些對思想上一致、道義上純凈和（或）政治上穩定構成威脅的教義和行動。這套詞匯最常見的有“異端”、“邪”、“左道”，它們被理解為與“正”之概念針鋒相對，這樣就形成一個十分類似西方傳統中的“異端”和“正統”之間的對立面。中國的異端盡管生來就具有造反的潛在可能性，可是只要它還軟弱無力，便還可以得到容忍。但一旦它與任何可疑活動牽扯在一起，或者表現出有取得獨立政權的跡象，它便要被國家無情地撲滅。

從宋代開始，中國的國家政權與理學思想體系越來越分不開，被視為異端的信仰和實踐越來越成為在社會、政治和文化方面對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正統觀念構成最大威脅的東西。當16世紀末西方恢復傳教活動時，基督教由于來源于外國，它與儒家學說（特別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形式的儒家學說）大相徑庭，它的某些教義的內容又是不可思議的，并且它還具有進行政治顛覆的可疑動機，所以它有資格被貼上異端的標簽。

反對基督教和其他西方文明方面最早的重要著作似乎是《破邪集》。這部著作由浙江的一位文人編輯，它附有1640年寫的前言，輯錄了明末約40位佛教和儒家學者寫的將近60篇雜文、奏疏和其他短文。

書中的論點是各式各樣的。例如，有一個作者以推理和常識發問道：如果上帝像天主教徒所說確實是好心的和強有力的，那他怎么能讓亞當和夏娃犯下一種遺傳到后世的污穢的罪孽呢？即使一個軟弱無力的人都能在某種程度內防止邪惡，全能的上帝為什么不能連根鏟除這種邪惡呢？

《破邪集》中反對基督教的另一個論點是建立在懷疑論上，不是建立在推理本身上：“[天主教徒]責罵佛教徒和道教徒，說……他們關于因果與輪回的教義含糊不清和無法證實。但[天主教教義]所謂崇拜上帝的人保證可升入天國、否認上帝的人肯定會進入地獄……這說法就能得到檢驗和證實嗎？”[[15]](#_15_Yin_Zi_Bao_Luo__Ke_En___Zhon)

把天主教與佛、道二教進行比較以貶抑天主教，這現象反復見于《破邪集》和明、清兩代其他反基督教著作之中。這兩個朝代的正統知識分子僅僅根據教義的考慮，經常把佛、道貶為異端，或者至少把它們置于次于儒教的地位。但是，每當要保衛整個中國文化時，佛、道兩教的傳統教義常常被置于正統觀念的卵翼之下，試圖聯合所有能夠聯合的力量抵抗新的外來侵略者。

見之于《破邪集》的另一種論戰形式也值得一提。這就是反映于明律中的法律論點。它主張禁止夜間集會，反對天主教徒的某些可疑的活動，并指出外國宗教以其政治上和教義上的原因應視為異端。

其次一個反對基督教的文學上的軒然大波是清初官吏楊光先（1597—1669年）的著作掀起的。楊光先以性格暴戾出名，有強烈的仇外情緒，對著名的耶穌會士、天文學家湯若望（1591—1666年）在北京掌管的權力心存嫉妒：這一切便使他自封為西方宗教的反對者。他對基督教和湯若望歷法的抨擊文章，于1665年發表在《不得已》一書中。此書論據是敏銳見解（如果說不是非常冷靜的見解）的產物，它也表明楊光先曾用功至少熟悉過早期基督教歷史和教義的基本內容。但是他后來之所以有感召力（他成了19世紀反基督教的英雄，他的著作經常再版）的主要原因，是他對于西方傳教滲透的問題流露出心急如焚的感覺。在他那個時代，這種憂慮是與威脅的程度不相稱的。不過降至19世紀下半葉，這種憂慮在許多中國人看來則是理所當然的了。

楊光先死后約兩百年內，《不得已》的內容的淵博和感情的強烈仍是無與匹敵的。不過在整個這一時期內，中國的作者們對基督教的看法仍極模糊，而在鴉片戰爭的余波里，許多著名的士大夫，其中包括魏源（1794—1856年）、夏燮（1799—1875年）、徐繼畬（1795—1873年）和梁廷楠（1796—1861年），在他們論述西方的著作中都有對外國宗教的批判性評述。

在確定基督教的異端性質時，任何私人著作不論它流行多么廣泛，可能都不能與19世紀60年代以前發生的許多著名事件的影響相比擬。1724年雍正帝對基督教下禁令時便把它作為被禁止的教派而載入清代法典，而同一年頒布的《圣諭》有皇帝的詳盡批注，結果基督教在許多人心目中便與最恐怖的秘密會社之一的白蓮教聯系起來了。雍正以后的一百多年，當某些基督教教義對太平軍運動的思想發生深刻影響時，基督教的危險性質似乎終于成為定論。[[16]](#_16_Guan_Yu_Ba_Ji_Du_Jiao_Yu_Fan)

雖然禁止基督教的條款已從1870年版的大清律中刪去，雖然大多數教士也竭力斷絕和太平軍的關系，但是不能夠一朝夕之間根除在數十百年中養成的心理聯想。因此，甚至在它合法化以后，基督教仍被許多中國人視為異端，即具有此類組織進行政治和社會顛覆的全部特征的異端。在某一方面，西方人的這種宗教在1860年以后甚至不如以前那樣為人們所寬容。因為如上所述，中國人最怕的就是異端和力量的結合，而在1860年以后的時代，基督教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在中國卻空前地增大起來。

### 傳教士對傳統社會制度的威脅

在全國范圍內，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全體居民的比率，直至1900年可能還不到十萬分之一。即使考慮到中國基督教徒也高度集中的某些城市中心的這種比率高得多，但顯然也不能主要根據數量來理解1860年以后基督教事業的危險性。質的因素，例如傳教士的遠見卓識和外部政治上的支持比量的因素重要得多。像一個機體對于外界物體（甚至是顯微鏡才能見到的物體）的侵入的反應一樣，中國社會的社會、政治和各方面力量只有脆弱的平衡，它能輕易地被僅僅少數傳教士和中國基督教徒所打亂。

### 傳教士和紳士

至遲到19世紀末，在許多情況下還要晚得多，大多數中國社會中的上流社會是紳士集團。[[17]](#_17_Xia_Wen_Guan_Yu_Chuan_Jiao_S)紳士比中國任何其他社會階級都更加深刻地與中國的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堅持中國是一切文明的中心的主張。他們從孩提時起就接受儒家傳統和價值的教育，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積極同這種傳統和價值打成一片的行動上。因此當儒教受到攻擊時，紳士階級遭受的損失最大。

19世紀下半葉，傳教士充當這種進攻的先鋒。卜魯斯爵士也許夸大其詞地說，傳教士“系統地歪曲了中國的道德狀況”。[[18]](#_18_1864Nian_1Yue_12Ri_De_Yi_Fen)不管是否進行過系統的歪曲，他們對中國道德狀況——尤其對某傳教士稱之為“儒教的夢魘”——的攻擊，則是無情的和不妥協的。

這種攻擊也是很放肆的。雖然還沒有人對傳教士的中文宗教著作進行內容豐富的分析，但是迄今暴露出來的一些例子（特別是新教徒的小冊子）卻表明它們恰恰沒有適應中國人的感情（典型的例子是19世紀70年代美國傳教士散發的攻擊祖先崇拜的小冊子，書名叫《辨孝論》）。看來，新教傳教士公開布道的特點是比較粗魯的。艾約瑟（倫敦會；1823—1905年）向我們描寫了1851年春季他的一次旅游：

我帶著一名傳教士會友到龍華。正值一年一度的春節而有大群大群人們匯集在那里。我們盡可能明白地發表演說，勸人們不要搞偶像崇拜；這一席話使法師們非常憤怒……

我們到江灣去參加另一次盛大節日。嘈雜聲……使得我們幾乎無法講道。因此我們退回到郊區一座古廟……這里立即聚集了大群聽眾，其中有一些雜耍藝人；他們幾乎一動也不動地傾聽了將近一個小時：我們告訴他們搞迷信是錯誤的，他們的儒家學說有很大的缺陷，然后我向他們約略說明了基督教的偉大之處。[[19]](#_19_1851Nian_5Yue_2Ri_De_Yi_Feng)

因為孔子被認為是使中國不能皈依基督教的大敵，傳教士自然要把他們的挫折、失望和憤怒的情緒傾瀉到孔子影響最直接的體現者紳士階級身上。有一個傳教士寫道：“在中國文人主要從儒家學到的溫文爾雅的外表下面，幾乎只有狡詐、愚昧、野蠻、粗野、傲慢和對任何外國事物的根深蒂固的仇恨。”[[20]](#_20_Zhan_Yue_Han_Yu__Zhuan_Yin_Z)19世紀在中國沒有幾個傳教士認為這種評述是太過分了。

一旦把傳教士對紳士的敵視與紳士對傳教士的怨恨擺在一起來看，人們對于19世紀中葉以后在中國出現的文化沖突的深度和強度便有了一定的認識。中國人認為傳教士——特別是天主教徒——是受物質利益的驅使，傳教士則反唇相譏，認為中國人陷入了世俗塵網之中而不能自拔。傳教士認為中國人迷信，中國人則對傳教士最鐘愛的信仰采取疑而不信的態度。每一方對另一方都感到莫測高深。每一方認為另一方屬于低級文明。實際上很難設想不發生更激烈的思想交鋒。

傳教士除了向紳士是否有資格在文化和道德方面居于領導地位這一問題提出挑戰以外，他們在1860年以后還對紳士歷來把持社會領導權的情況構成了直接威脅。構成威脅的方法多得不可勝數，這里僅舉其數端。傳教士，特別是天主教士，經常打扮成儒家文人學者。除紳士以外，在地方上只有他們才被準許和官方平等來往（根據條約）。傳教士開設孤兒院，從事救災，這些社會義務按習俗本來是由紳士擔任的（如果他們要擔任的話）。他們在內地享有治外法權，使他們甚至比紳士階級更不受制于中國法律。

具體侵犯紳士傳統特權的最重要一點也許是這一簡單事實：傳教士也在為人師表。他受過教育，最低限度也能讀能寫，因為這些本事如果說不是紳士所專有，無疑也是紳士階級最具特色的屬性之一。傳教士也開辦學校，從而在真理問題上唱對臺戲。他在公開場合宣講這些真理。特別是新教徒，還撰寫和散發大量著作。一位新傳教士領袖恰當地概述了這件事對有教養的中國人所起的影響，他說：

這不能不觸怒他們。布道會使他們受辱，因為你這樣做時就處在老師的地位上。發行宗教書籍或科學書籍也會使他們受辱，因為你這樣做時也就認定中國并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識……提倡發展點什么吧，也會使他們感到侮辱，因為這是暗示中國并未達到文明的頂點，而你卻站得比他們更高。[[21]](#_21_Yang_Du_Xin__Ge_Fei___Zhuan)

### 傳教士和老百姓

雖然中國有教養的階級的敵意（哪怕對其起因不甚了了）被普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傳教士認為，數目多得驚人的沒有文化的群眾心地卻像白紙一樣潔凈：他們安定，有可塑性，能接受基督教信仰。楊篤信在談到普通老百姓的時候，為大多數人進行過辯護：“總的來說，這些人溫和、勤勞、不懷惡意。說到與外國人的關系，在我看來，老百姓是不招惹外國人的，除非他們的上司挑起敵意和仇恨。要說他們是喜歡我們，或者愿意和我們交往，未免有些過分；但要說他們對我們懷有敵意，這也離譜甚遠。”[[22]](#_22_Yin_Zi_Tang_Pu_Sen___Yang_Du)

這樣樂觀地描述中國群眾，在心理上無疑是必要的，因為傳教士決不能接受“老百姓”會自動厭棄他們的說法。但是這種描述不見得符合事實。雖然大多數皈依者確是來自老百姓，但是壓倒多數的老百姓確實也不愿意和外來宗教發生任何關系。此外，19世紀的最后幾十年老百姓公然敵視傳教士和中國皈依者的行動在全中國均有案可查，而這種敵對行為不全是他們的“上司”挑撥的結果。

老百姓害怕和敵視外國人的原因不一而足。有時其起因不過是一時一地之事。例如，19世紀60年代初期，湘贛地區許多人把天主教和太平軍的基督教等同起來，認為天主教傳教士暗地里勾結叛亂分子。雖然在經歷過和叛亂分子長期與劇烈斗爭的湖南、江西等地容易產生這種畏懼心理，但是在清帝國其他地區，這種畏懼心理卻遠沒有那么明顯。

民眾厭惡傳教士和中國皈依者的另一些原因則更為普遍。它們大體上可分為兩類：即一類是對社會和經濟的不滿，一類是由文化、種族和迷信等恐懼引起的變態心理狀態（這也可以大致歸之為排外情緒）。前一類原因是直接或間接地由體現在天津與北京條約中新的法律安排引起的。后一類原因雖然在1860年以后變本加厲，但主要是非政治因素造成的，而且在條約時代以前好幾十年就已經起著作用。[[23]](#_23_Guan_Yu_Ji_Zhong_Zai_1860__1)

引起民眾不滿的一個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許多中國教徒所表現的傲慢的甚至是肆無忌憚的行為。據報道，有些中國教徒穿著西裝，坐轎子招搖過市，因教堂事務而闖入衙門，或者利用他們和外國人的關系進行敲詐勒索和拒不納稅。特別令人憤憤的是，中國教徒普遍樂于依仗教會的支持和庇護，同非基督教徒的對手打官司。某些傳教士（主要是天主教傳教士）縱容，甚至鼓勵這種行為。因為他們能夠對衙門施加相當大的影響，使得有時作出偏袒基督徒而壓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顛倒的裁決。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到這種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紛紛攀附教會，這便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教徒和普通中國人之間的摩擦。

傳教士有力地插手于中國教徒的訴訟案件，除助長社會的不和以外，也是造成敗訴一方經濟困難的直接原因。另外一些經濟上的不滿更普遍地存在于居民中間。在反基督教徒暴亂以后，非基督徒平民常常必須支付傳教士強行勒索的賠款。[[24]](#_24_19Shi_Ji_60Nian_Dai_Mo_Fa_Gu)一旦基督教徒由于宗教原因不再為“敬神”的節日和儀式捐款，非教徒平民還必須分擔更多的費用。這種憤懣情緒司空見慣，而對于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貧苦人民來說，增攤的費用可能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

在中國籍的天主教商人掌握地方經濟重要命脈的地方，不時暴露出潛在的更加爆炸性的經濟不滿。當這樣的地區（例如1886年夏季的重慶）受到經濟危機的打擊時，當地居民幾乎必然把他們遭受苦難的憤怒鋒芒指向天主教徒眾。

民眾反基督教情緒的社會和經濟根源，常常由于各種更愚昧、更荒謬的力量而變得火上加油。這類力量之一就是當時傳教士所說的“迷信”。例如普通中國人認為，為了保障或恢復地方上的幸福，不許冒犯“神靈”。因此，每當傳教士設立新的建筑物，在高度、地勢或方位上都故意無視當地風水時，或者中國教徒在干旱季節拒不參加求雨典禮時，非教徒居民便深為不安。

基督徒奇異的風俗習慣是使中國民眾疑懼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新教傳教士之應用現代醫術（天主教傳教士在這方面不如此之甚），還有某些天主教的教規，例如懺悔、臨終涂油的圣禮以及為臨死嬰兒施洗的儀式，在中國文化中便沒有相應的東西；而基督教之反對祖先崇拜，則是公然向成為中國文化核心的價值挑戰。這樣，基督教必然會被誤解，人們也必然會把最兇惡的動機算到傳教的賬上。

最后，民眾的敵對行動還有一種更荒謬的原因，即愚昧而強烈的種族偏見。我認為，只要細心研究就會發現，這種偏見雙方都普遍存在。（駐臺灣的一位加拿大傳教士不同尋常地與自己教會里的一個中國女士結婚時，引起了其他傳教士的強烈非議。）不過這種偏見在中國人中間尤其厲害。因為，西洋人的古怪行為和相貌使得他們在中國人中間很顯眼，同時絕大多數中國人又與西洋人之間很少有或根本沒有個人來往。他們把西洋人作為整體來看待，而不知道他們也是一個一個的人。因此就可能相信他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而在某些人身上看到的可疑行為很容易以偏概全，以為他們人人有份。只要西洋人僅僅被認為是不開化但又可以教化的野蠻人時，他們便能得到同情和幫助。但是，一旦他們被看成是野獸和魔鬼（不是人，或比人更壞）時，他們便不可救藥。這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們驅逐出境。

### 舊制度的反應：反基督教的暴力行動

由于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引起的疑懼和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沖突極為普遍。從1860—1900年這40年間，發生了需要通過最高級外交途徑來處理的數百起重大事件或騷亂，至于地方上不難了結的案件則有數千起之多。（19世紀60年代冀東一個天主教傳教士報告說，有一年他的工作被200多起較輕的“迫害”事件所打亂。）其次，除這類事件以外，有時候清帝國一些主要地區充斥著煽動性的反基督教小冊子、標語[[25]](#_25_Bao_Luo__Ke_En_De___Zhong_Gu)和傳單，這在某些情況下看來是對傳教士挑起的文字論戰的反應。

清末反基督教的作品大體上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一般性的，典型的形式為“檄文”、標語和小冊子，其目的在于造成強烈仇視和嫌惡的氣氛。據推測這類作品可能出自文人學士之手，它們利用最淫蕩和最沒有人性的罪名來指控，例如說牧師們為了神秘的煉丹術目的而殘害懷孕的婦女或挖掉瀕死的中國教徒的眼珠；利用密室懺悔之機來強奸中國婦女；外國人（連累而及還有被認為是著了魔的中國教徒）被他們的妻子戴上綠帽子，與他們的父親和兄弟雞奸，與他們的母親和姊妹發生亂倫關系。這種不可思議而用心羅織的說法和沒完沒了的重復，頗能使人信以為真，于是繪聲繪影的反基督教民間傳說便甚囂塵上。

這類抨擊文小冊子中有一本名叫《辟邪紀實》，從19世紀60年代初期起流行得特別廣泛。至少有三個省的中國官員禁止過這本小冊子，下述摘錄生動地說明了它的煽動性質：

所有出生三個月的[基督教徒的]嬰兒，不論男女，肛門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他們稱這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術”。這使肛門擴大，長大時便于雞奸。每年春夏之交，男孩子們弄到婦女的月經排泄物抹在臉上，去教堂做禮拜。他們把這叫做“在向上帝致敬以前，先把臉洗干凈”，以此為禮拜上帝最虔誠的儀式之一。父子、兄弟的行為互相放蕩不羈，他們把這叫做“生命力的結合”。而且他們還說，如果不這樣做，父子兄弟將會互相疏遠。所有這類事情是不勝枚舉的。令人難于相信的是，我們中國也有人信奉他們的宗教。他們不是比禽獸還不如么？[[26]](#_26_Yin_Zi_Bao_Luo__Ke_En___Zhon)

第二類反基督教作品非常簡單，通常為匿名揭帖形式，是把前一類作品中的內容用到具體情況中去，并且能做到非常有力地煽動群眾起來行動。有些這類作品指名道姓地提到傳教士的名字；另一些則指出具體的地點。許多作品還指導怎樣進行一些破壞活動。此外，在許多情況下，散發這些揭帖都是利用特殊時機進行的，最常見者是利用舉子趕考的機會散發。

反基督教的作品或者張貼在通衢鬧市，或者大量翻印散發（據說19世紀90年代初最為聲名狼藉的反基督教抨擊文《鬼教該死》印行了80萬冊，免費散發）。它們對群眾產生影響的方式有兩種性質。一方面，它通過探究想入非非的兩性行為和種族恐懼，對外國人的各種活動散布爆炸性的疑云。另一方面，它們對非教徒平民在與傳教士和中國教徒的直接的親身經歷中所積累起來的懷疑、恐懼和憤怒火上加油。因此，這些力量是相互影響的，只要稍有火星便會導致暴力行動。

暴力行動不能用量表示。公開暴亂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表現。在探討19世紀最后幾十年反基督教的騷亂時，要好好記住這一點。這些騷亂常常是紳士階級人士直接或間接部署和煽動的。但是不大能證實外國人經常所持的說法：它們是為了在中國根除基督教而嚴密組織起來的地方性或全國性“陰謀”的一部分。騷亂行為的嚴重程度不一，從日常向基督徒家庭的房屋扔石頭或騷擾一群過路的傳教士，到損毀貴重財產和殺傷人命等等都有。除天津教案（1870年）和義和團起義（1899—1900年）這樣的大災難以外，持平而論也許可以說，在清朝末年，暴亂本身并不像由之產生的、不可克服的政治問題那樣重要。

### 傳教士和中國政權的削弱

雖然嚴格遵守新條約是1860年以后中國政府公開宣稱的政策，但是實際上只有各省和地方當局的真誠合作才能使之實現。[[27]](#_27_Xia_Wen_Wo_Da_Liang_Li_Yong)不幸的是，有大量證據表明，對于傳教士的活動，這種合作經常遠遠不是真心誠意的。為什么有這么多中國官員，特別是下級官員，反對外國傳教士呢？最簡明和最直接的回答是，所有官員在廣義上都是紳士階級的成員。從他們具有這個階級的文化和思想信念的角度來說，他們自然要拼命反對基督教的傳播。但是從官吏必須對皇帝認真負責這個角度來說，人們應當期待他們會盡量克服個人的惡感而極認真地履行條約。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的可笑。實際上，有許多因素傾向于既鼓勵官員們反對基督教的本性，又阻止他們認真履行對帝國的職責。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許是紳士階級與傳教事業的對立。在既靠說服又靠強力來進行統治而人員嚴重不足的官僚體制中，一個官員又總是任職于異鄉，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賴當地紳士階級的積極合作。如果他不遺余力地試圖執行條約中有關傳教士活動的條款，公然無視紳士的情緒，他就要冒著與這個階級疏遠和毀掉自己宦途的風險。

另一個因素是傳教士利用他享有特權的合法地位，和由此而產生的對官員的威望及權威的挑戰。有時，這種挑戰是條約上關于傳教士權利的規定的直接結果，例如每當傳教士受到損害或他的財產遭到破壞時，他從中國政府得到賠償。但也有時是，傳教士濫用他們從條約上得到的權利或者起碼是輕率地行使這種權利，以便在地方上抖抖威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兩者都經常用強力為自己索取賠償。天主教士常常為所受損失而要求過多的賠償。（在1863年和1869年間，他們僅在四川一省就得到26萬兩銀子。）19世紀60年代初期，天主教徒充分利用條約中關于歸還前被沒收教堂財產的條款；方濟各會的神父們則走得更遠，甚至額外要求償還以前一百年期間征收的房租和地租。在這方面也還有其他事例，例如天主教士還照例索取用公款建筑起來而在中國有象征性重要意義的建筑物（例如文廟和廟宇），作為在反教騷亂中所受損失的賠償。

有時傳教士甚至更加直接地侵犯官方權力。他們經常催迫本國公使館設法調走抱有敵意的地方官。天主教徒不得體的通訊格式偶爾也引起中國政府的怒火。最后，在中國官員看來傳教士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非法行為，如上所述，是為了偏袒中國教徒或為了爭取更多人入教而特別喜歡干涉地方官員的事務。

官方敵視傳教事業有時變成公開對抗，這里最重要的例子是19世紀60年代初期貴州的田興恕和其他高級官員一再找貴州基督徒麻煩之事。不過官員們所起的作用，其性質更常見者是間接的和被動的。發生反教事件時，官員們放手讓紳士從事宣傳和組織活動，并且保護他們免遭報復，從而為反教行動提供一個比較沒有滯礙或危險的活動基礎。

不論哪一級官員同情反教活動，事實是在1860年以后，反教活動總是使中國各級政府處于非常困難境地的根源。在省縣兩級，如果這種行動十分嚴重，官員們可能被降級或受懲處。如果在中央政府一級，則始終存在著外國要動用武力的可能性，結果會使得已經搖搖欲墜的王朝丟臉和喪失威望。由此可見，要履行新條約中的條款，這本質上就是一個自己拆臺的行動：如果行得通，則侵蝕了地方官員的權力；如果行不通，則損害了中央政府的地位。

### 真正的排外主義和政治上的排外主義

這便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問題：如果反教活動給中國當局造成了如此嚴重的問題，我們怎能夠確信在1860—1900年期間，積極反教的主要推動力一定是一種反教情緒，而決不是反官方或反朝廷的情緒呢？換一個稍微不同的說法，即排外主義始終是“真正的”嗎？它是否有時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挑起來的？19世紀的中國確實有足夠的緣由挑動起真正的排外情緒。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如果氣候適宜，排外主義不能被人用來達到政治目的。

舉例來說，有證據表明，1891年長江流域的騷亂部分原因是心懷不滿的秘密會社成員煽動起來的，目的不是要傷害基督徒，而是要迫使清朝與西方列強沖突以推翻它。在義和團運動的開始階段，秘密會社的卷入是最重要的因素，這時的運動也許是受同樣的動機所指引的：這便使人想起，早在1899年義和團所大肆宣傳的是“掃清滅洋”的口號。

相反地，官方本身有時也故意地和極端排外的立場聯系在一起，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極端排外，而是因為這是預防民眾的排外情緒轉而指向自己的唯一途徑。在19世紀40年代，廣州就發生過這種情況。這也可能是官方和朝廷響應義和團的一個原因。很顯然，19世紀下半葉以政治為動機的整個排外主義問題，應該受到比迄今為止更大的注意。這樣的探索可以取得一個重要的附帶成果，即肯定能夠更深入地剖析中國人反對基督教的復雜因素。[[28]](#_28_Zhe_Yi_Duan_Lun_Shu_Gen_Ju_B)

## 傳教事業和新制度

按照通常標準來估計，西方宗教在清末沒有使自己有效地迎合中國的需要。西方的非宗教知識和實踐（到20世紀初它的傳播已主要掌握在新教傳教士手里）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使傳教士參與非宗教活動的理由多得很。有些人認為這種參與是一個楔子，是迷魂湯，可以用來削弱對基督教的抵制。另一些人比較喜歡從哲學上考慮問題，認為基督教是整個西方文化中所固有的，因此，接受西方文化的任何部分，也就是朝著西方文化的方向前進了一步。所有這些理由的難處在于，它們對西方文化的接受者沒有約束力。[[29]](#_29_Chuan_Jiao_Shi_Zhong_Bi_Jiao)在接受西方知識的同時拒絕西方宗教不但證明是可行的，而且前者甚至可以變成用來反對后者的武器。

### 傳教工作的專業化

隨著新教傳教事業在清朝最后幾十年的巨大發展，傳教活動的某些領域中也出現了向專業化的重要轉變，最明顯的是在醫學和教育方面。這些領域長期以來是傳布福音的副業。當它們與布道目的日益分道揚鑣以后，便具有半獨立的性質，不論就學科和傳教士本人而言，專業標準都提高了，更高的專業化水平開始產生了。傳教事業在準備為中國的現代化起作用時，它也在經歷著類似的提高過程。[[30]](#_30_Zai_Zhe_Yi_Jie_Wo_Zhu_Zhong)

### 醫學

雖然早就有必要專門指出傳教士之開設醫藥慈善機構是正當的，但直到1907年在上海舉行的新教布道一百周年會議上才宣布醫務工作成為“全世界幾乎每一個教會團體的工作的一部分”。[[31]](#_31___Zai_Hua_Chuan_Jiao_Bai_Zho)在以前的30年中，這項工作在中國的發展是驚人的。完全合格的傳教士醫生從1874年的10人猛增到1905年的300人左右。1876年有41281名病人在大約40所醫院和診療所接受過治療；30年后，據報道每年至少有200萬病人在250所教會醫院和診療所接受治療。[[32]](#_32_Tong_Shang_Shu__Di_267Ye__Sh)

許多這樣的醫院以及所有的診療所，其規模都很小，不妨說只在偶然情況下才擁有最現代的醫療護理和使用最好的器械。但是，它們的治療方法不同于中國人慣常采用的任何方法，而且每年就醫病人的總數不僅說明它們的水平相當高，而且促使大批中國人從親身經歷中對注重實際的西方科學知識和技術采取比較肯定的態度。

有些比較突出的成績值得特別一提。美國長老會（北方）的嘉約翰博士接任伯駕在廣州建立的醫院，其后的幾乎50年間它主治了100多萬病人，到19世紀末他又建立了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精神病醫院。由于梅img更（英國教會）的努力，到1890年在杭州建立了一家100張病床的醫院、一所兒童收容所以及一些麻風病院和戒煙所。1880年倫敦會的馬根濟博士在天津建立了一家大醫院；李鴻章的夫人給這家醫院捐了款，因為馬根濟及其同事救過她的命。

傳教士也專心致志于培養中國第一批現代醫生。少數人如黃寬、何啟年輕時讀完教會學校以后去西方留學學醫。而且到19世紀最后幾十年，有大批人（包括未來的革命家孫中山）在附屬于中國或香港教會醫院的醫科學校得到培養。到1897年為止，約300名中國人從這樣一些學校畢業，另外在肄業者尚有250—300人。這些中國醫生中的許多人結業以后被選派到政府部門任職；少數人則在口岸城市開業賺錢。作為一個集團，他們和自己同胞的往來程度也許不如那些受訓較差和構成大多數醫院和診療所的醫務人員的“中國助手們”。

向中國人傳播西方醫學知識的另一個媒介是醫學著作。最著名的早期作者是合信（1816—1873年）博士，他編輯的東西多年來都是標準本，他的解剖學著作《全體新論》（廣州，1851年版，第99頁）被收入中國最主要的類書中，以此獲得了罕見的聲譽。后來，嘉約翰博士、德貞博士、傅蘭雅等人翻譯了大量醫學著作，其中包括診斷法、繃帶包扎法、皮膚病、梅毒、眼病、炎癥、醫學原理和實踐、藥物學、熱病、衛生學、外科學、解剖學和生理學。這種著作對讀者的影響常常是傳教士所不能直接為力的，它們有助于使日益增多的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接受西方科學知識。

絕大多數教會醫院和診療所繼續向病人傳播基督教。兼行醫術的傳教士因負擔過重，越來越脫離布道工作。傳教士成為專職醫生以后，他的專業性質便加強了。1886年成立的中華博醫會出版了自己的醫學雜志。中國官員越來越頻繁地向兼行醫術的傳教士征求有關公共衛生、衛生措施、房屋建筑、供水、政府醫院和醫學教育等方面的意見。行醫的傳教士開始“為整個帝國的保健事業進行規劃”，[[33]](#_33_Lai_De_Lie____Ji_Du_Jiao_Zai)在許多人看來，建立一個健康的中國開始顯得像建立一個基督教的中國一樣重要。

### 教育

傳教士進行非宗教的教育與治病的活動相比，前者在《圣經》中的根據要少一些。因此，要得到差會團體同意和批準這項工作就困難一些。但是到20世紀之初，至少在新教方面進行了一些重大的斗爭，并且贏得了勝利。如上所說，天主教傳教士開辦了許多學校。除少數例外（主要是耶穌會士的學校），這些學校都是小學水平，只講授宗教和中國經書。

在19世紀中葉幾十年間，新教徒對于非宗教的教育普遍采取否定立場。但是大約從新教傳教士在華第一次大會（1877年）前后開始，情況發生了十分顯著的變化。在這次會議上，美國長老會的狄考文懇求傳教士同道們在教育方面負起更大的責任。雖然狄考文當時受到猛烈批評，但是冰層打破了，在后來十年間，越來越多的傳教士轉而贊助他的立場了。

主要由狄考文的發言引出了1877年會議的另一重要結果，即設立了一個益智會，由傅蘭雅董其事，此會的委員們信奉狄考文所提的主張，即“教會學校的成敗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是否擁有好的和適用的教科書”，[[34]](#_34_Yin_Zi_Xiao_Hai_Ya_Te___Xin)到1890年，在他們的監督下編輯和出版了84種課本、50幅地圖和圖表，內容多半是非宗教的。這期間賣出了3萬多冊書，該會的工作很快就自給自足起來。

講授西方學科的另一方法是用英語教學，因而可以不必依靠翻譯的課本，因為它們的譯文常常幾乎是晦澀難懂的。開始時許多傳教士反對英語教學，以為英語知識在經濟上有用，許多中國人會出于物質利益的目的進教會學校。但是英語教學利多而弊甚少，于是在19世紀80年代，英語教學獲得了越來越多的人的支持。

傳教士看法的日益寬闊，它與新教教育設施的長足進展相得而益彰。1877年有6000人進入教會學校學習。到1890年上升到16836人，到1906年又升到57683人。除兩千多所小學外，到1906年開辦了近400所高等專業學校，包括許多大學在內。與天主教的做法大異其趣，絕大多數新教的各級學校都開設有西方科目的教學。

與醫學領域內發生的情況相類似，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出現了職業的教會教育家。海亞特指出，在1877年的會議上就教育問題發言的那些傳教士，像狄考文等人那樣，他們是“作為傳布福音的人來到中國的，但卻因偶然機會變成了教員。相反，1890年對辦教育評頭品足的許多人們……由于擁有高級學銜和比較專門的興趣，他們與其說是牧師，倒不如說是職業教育家。這些人都主要從事教育或文化工作，到中國都比較晚，并且代表了新的一代和新型的教會教育家”。[[35]](#_35_Tong_Shang_Shu__Di_73__74Ye)這種趨勢在1900年以后更是顯著。

專業化日益增強的另一個標志是1890年成立“中國教育會”。作為益智會的后身，中國教育會非常關心改善教會學校教科書的狀況。而且與中國教育有關的一切事務也都是它所關心的范圍。到新教傳教士第三屆大會時（1907年），中國教育會擁有400名會員。除了出版書籍以外，它還制定了14年一貫制的綜合性的教學大綱，同時也是“全體新教徒中實施教育標準的公認的監護人”。[[36]](#_36_Yin_Zi_Xiao_Hai_Ya_Te___Xin)

### 傳教士促進西學

學校就其性質來說，只能影響青年人。為了向中國受過教育的成年人傳播西學，傳教士采取出版中文書籍和雜志的辦法。新教徒投身于非宗教的出版工作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以前的時代。早期的著名例子為《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文月刊；廣州，1833年及以后諸年），由裨治文等人編輯，登載過論述蒸汽機、世界地理、英美政制和華盛頓的生平等文章。在1810—1867年期間，根據一個材料的估計，新教徒關于非宗教問題的著作總數達108種，約占他們著作總數的14%。到19世紀末比較活躍的教會出版機構超過12家，新教學者除編輯幾種著名期刊外，還撰述和翻譯了幾百種范圍廣泛的非宗教問題的書籍。

### 科學和數學

20世紀中國人反對基督教的主要論據之一是，它的主張與現代科學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教傳教士在19世紀把西方科學傳入中國時都起了主要作用。的確，雖然在創建中文科學新詞匯中存在著一些專門問題，但是新教徒創作的科學和數學著作比所有其他非宗教問題著作的總數還要多。

科學方面最有成就的翻譯小組之一由有相當漢學造詣的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1815—1887年）和卓越的中國數學家李善蘭（1810—1882年）所組成。他們在19世紀50年代曾在上海共事，翻譯了歐幾里得的《續幾何原本》（九卷）、赫希爾的《談天》（十八卷加一卷）、奧古斯塔斯·德·摩爾根的《代數學》（十三卷）和盧米斯的《代微積拾級》（十八卷）等書。多產的李善蘭還翻譯了威廉·惠威爾的著作（與艾約瑟合作）和約翰·令利的著作（與艾約瑟及韋廉臣合作）。

由于西方著作的翻譯如果要有被人閱讀的機會，就必須譯成可誦的漢文，又由于即使傳教士中最有造詣的學者（像偉烈亞力）也不能寫出任何典雅的文學語言，因此必須采取一種特殊的寫作方法。實際上這是耶穌會士早在250年前就已采用過的方法。首先，外國傳教士把原文口譯給他的中國助手聽。然后，助手把口頭翻譯改寫成文言文。最后，如果傳教士對漢文也有一套功夫，他就要通讀譯文，以使表達更加準確和曉暢。

19世紀最充分使用這種方法的是傅蘭雅（1839—1928年）。英國人傅蘭雅最初作為教會學校的教員來到中國，他可以稱為“世俗派傳教士”的最初典型。雖然他在各種教育事業中與傳教士合作，但他和教會的任何差會沒有關系，并且他重視加強中華民族更甚于使中國人改信基督教。傅蘭雅的使命是向中國傳播西學，特別是傳播科學。

傅蘭雅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當過28年（1868—1896年）翻譯。他一生翻譯了129篇譯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學，48篇應用科學，14篇陸、海軍科學，10篇歷史和社會科學；他離開中國擔任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路易斯·阿加西斯東方語言文學教授職位以后，繼續從事翻譯工作。江南制造局刊行了傅蘭雅的77篇譯文。

除替中國政府工作以外，傅蘭雅還積極參加與倡導西方科學有關的許多私人事業。他是上海格致書院的干事，也是其創始人之一：這個書院是一批關心促使中國了解西方的中外人士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創建的。傅蘭雅每星期六晚在書院進行幻燈教學，是院里舉行征獎論文比賽的熱情支持者。這項比賽開始于1886年，“目的在于誘導中國知識界探討各科西方知識，以便將它們運用于中國”。[[37]](#_37_Yin_Zi_Fu_Lan_Ya_De_Yi_Pian)1876年至1892年間，傅蘭雅還擔任圖文并茂而頗有影響的雜志《格致匯編》（后來的英文名稱為《中國科學與工業雜志》）的編輯。《格致匯編》上的文章通俗易懂，許多是新教傳教士寫的，它們涉及的范圍有大量科學的及其有關的問題。

傅蘭雅的另一個計劃也必須在這里談一談，雖然它的目的比單純傳播科學知識要更加廣泛。這就是傅蘭雅1885年在上海建立的一個非營利性的書店格致書社。到1888年，該書社擁有約650種關于西方問題的書籍，在天津、杭州、汕頭、北京、福州和香港設有分店。

### 歷史和國際法

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的真正寵兒，即敢于從事寫作的傳教士，通常都想把精力用于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包括軍事科學）。但是在其他領域，特別是歷史和國際法領域，也出現了傳教士的許多有影響的出版物。最早的出版物之一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裨治文此書最初出版于1838年，經過了許多次修訂，最后修訂本于1862年出版，書名為《聯邦志略》。它是中國敘述世界歷史和地理的兩部草創著作——魏源的《海國圖志》（1844年）和徐繼畬的《瀛環志略》（1850年）——中有關美國的材料的主要來源。

另一部被廣泛閱讀的歷史著作是慕維廉（1822—1900年）的《大英國志》（1856年）。慕維廉的譯文之所以受到中國學者的贊揚，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合作者、19世紀50年代上海文學界的主要名人蔣敦復（1808—1867年）的技巧。

傳教士另外編纂的歷史讀物有謝衛樓的《萬國通鑒》（上海，1882年），史亞實稱此書“使整個一代中國人對于偉大而不可思議的外部世界獲得了一些初步的概念”，[[38]](#_38_Yin_Zi_Pei_Te_Nuo___Xie_Wei)另外還有李提摩太所譯麥肯齊的《19世紀的歷史》（1880年）（下面將有所評述），他的這本通俗譯著于1894年出版，書名叫《泰西新史攬要》。

傳教士的譯著產生重要影響的另一個領域是國際法。這主要是由于美國傳教士兼教育家丁韙良的努力。丁韙良的國際法譯著中最重要的是《萬國公法》（北京，1864年），它使中國政府掌握了亨利·惠頓的權威著作《國際法原理》。

史亞實對謝衛樓著作的評價，如果不計較它的盛氣凌人的語氣，則對于傳教士的所有非宗教著作都是適用的。這種著作使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能得到向來很難得到的關于西學方面和關于西方世界總的方面的豐富資料。而且直到19世紀最后幾年為止，它們是這些知識的基本來源。可是，這類著作只不過給我們提供了像一部非常復雜的故事的章回題目，故事的內容尚有待分曉。

我們可以簡單地談談在填充故事的內容時，未來的學者們需要探索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向研究中西思想交往的學者提出的問題是傳教士傳布的內容清晰到什么程度？傳教士編纂的東西能被看懂到什么程度？而且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表達了編輯者想要通過它們來說明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向思想史學家提出來的，即傳教士傳布的內容究竟為何物？傳教士翻譯者儼然自以為傳遞了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精髓。然而，斯賓塞、J.S.穆勒和孟德斯鳩的著作則有待于嚴復（1853—1921年）這樣一些人去翻譯，而傳教士翻譯的所有非宗教內容的著作中流傳最廣的麥肯齊的著作，是對科學成果和進步學說的庸俗頌贊，科林伍德把這樣的著作描寫為“第三流的歷史著作中最叫人惡心的渣滓”。[[39]](#_39_Ke_Lin_Wu_De____Li_Shi_De_Gu)（必然叫人想起另一部第三流作品，即塞繆爾·斯邁爾斯的《自助》在明治時代的日本所引起的轟動。）第三個，也就是最后一個問題是：誰接受了傳教士傳布的內容？傳教士譯著的讀者范圍，在社會上和地域上究竟有多大？讀者的類型在那些年間是怎樣發生變化的？總之，只有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我們才能較準確地估量傳教士的非宗教性著作所產生的影響的程度和性質。

### 中國的改革思想和活動：傳教士的影響

根據詞典解釋，“reform”即指“改變成新的和更好的形式或狀態”。[[40]](#_40___Wei_Bo_Si_Te_Zui_Xin_Da_Zi)如果我們對這個概念作出不太確切的解釋，則從傳教士的觀點來看，傳教士的所有努力都可以被認為是具有改革傾向的。根據比較合理的解釋，則“改革”一詞僅限于在政治、經濟、教育和社會方面提倡或實現的改進。即使從這一較狹窄的意義來看，傳教士對于中國的改革思想和活動的影響也是一種多方面的現象。新教徒學校里講授非宗教性的科目，還有新教徒出版物上介紹的西方和西方文化的知識，養成了一種有利于改革的氣氛。傳教士在政治、方法和社會態度上為中國改革派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活生生的、現成的榜樣。最后，有幾位傳教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提摩太、林樂知和李佳白，他們都成了改革中國的熱情宣傳者，并且和官場內外中國的改革派領袖人物建立了密切關系。

### 婦女的解放

一般說來，現代化的標志是婦女地位的提高，特別對中國現代化來說更是如此。在傳統上，婦女被要求在家里對父母和丈夫絕對順從，而在家庭外面，她們的自我表現和投身于社會的機會又是極小的。對婦女不存在正式教育。婦女被禁止參加科舉考試或擔任官職。納妾、殺害女嬰，特別是纏足之風盛行，這些都是中國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的象征和結果。

傳教士的事業最適合在這個方面促進變化。在跨入本世紀時，大多數新教傳教士和相當數量的天主教傳教士本人就是婦女。雖然這些人中只有少數人可以算得上受過高等教育，但她們都是有文化的人，許多人在教會學校擔任教員，有些人被培養成醫生。此外，新教教徒中很多人明確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則，而且決心投入一場十字軍運動，以爭取中國婦女的“平等權利”。

這場運動采取許多形式。傳教士當然直言不諱地譴責纏足和溺嬰行為。他們也對教會成員的包辦婚姻表示不滿。但是，他們的最大影響是在清朝末年反對纏足的運動方面。據說1874年廈門成立了一個主張禁止纏足的傳教士團體。那時婦女入教要放足，這已成為慣例；許多學校則禁止纏足的女孩入學。致力于廢除纏足的最重要外國組織是1895年在上海建立的、由李德夫人（她不是傳教士）任會長的天足會；此會廣泛地寫作和出版時文小冊子，而李德夫人還作了種種努力來影響上層中國人。19世紀90年代的改革派憬悟于外國人對中國這種野蠻風俗的譴責，也熱情地推進反纏足運動。慈禧太后為了應付日益增長的壓力，也于1902年頒布懿旨正式廢除纏足。從20世紀起，婦女纏足便越來越不合時尚了。[[41]](#_41_Lie_Wei_Ren_Wei__Chuan_Jiao)

在提高中國婦女的地位中一個不像上面行動那樣引人注目、但最后卻是極端重要的做法，是傳教士在教育領域內的努力。1844年在寧波開辦了由東方婦女教育促進會（1834年成立于倫敦）監督的第一個教會女生學校（由阿爾德西小姐主持）。到1905年，新教教會小學共有7168名女生，中學共有2761名女生。在傳教士的倡導下還培養出了幾名女醫生。還努力在成年婦女中開展識字運動（經常以拉丁化漢字為媒介）和提供家政學的基本教育。雖然這樣辦的婦女教育質量很是參差不齊，但是值得加以表彰的是，截至辛亥革命前夕，新教教徒設立的學校在中國仍然是使婦女受教育的機會與中國男子大體相等的僅有的學校。

### 沿海地區的“基督教”改革派

因為基督教是以反孔面貌在19世紀的中國出現的，它很可能最受某些中國人的歡迎，這些人不管其內心信念如何，在他們看來，繼續披戴儒巾儒服是最沒有出息的。對受過教育的人來說，19世紀90年代以前這種人最大的集中地是在通商口岸和香港。中國許多最早主張現代化的人也產生在沿海地區。雖然這一事實通常被人所忽略，但是這些先驅者中有相當多的人或者是基督徒，或者是受過傳教士思想和觀點的深刻影響。

太平軍運動的最高領導人中間，對西方式的改革最有口才的發言人洪仁玕（1822—1864年）于19世紀50年代在香港受過新教福音派的訓練。盡管早期幾個工業企業的主要人物唐景星（1832—1892年）和發起第一個留美學生使團（1872—1881年）的容閎（1828—1912年），都是教會學校的學生，容閎還成為美國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畢業生（耶魯大學，1854年）。一位商人（此人以前當過與倫敦會香港分會有關系的傳教士）的兒子何啟（1859—1914年）曾在英國得過法學和醫學高級學位，回國以后成為香港最有名望的中國居民之一。何啟積極參加各種慈善事業（包括建立給中國人攻讀的香港西醫書院，孫中山在這所學院里完成了自己的醫學訓練），并于19世紀80年代末最早提倡實行議會制政府。何啟的姻兄伍廷芳（1842—1922年）在香港教會學校受完中等教育和留學英國學習法律以后，任李鴻章的幕僚達14年，后來成為著名外交家和法律改革的倡導者。另一位早期改良派鄭觀應（1842—1923年）一度向傅蘭雅學習英文，是傳教士著作的熱心讀者。雖然沒有材料證明這位與外國人有廣泛聯系而事業順手的買辦皈依了基督教，[[42]](#_42_Ling_Yi_Fang_Mian__Guan_Yu_T)但是在他的有影響的改革派著作《盛世危言》中所滲透的人道主義感情，顯然來源于基督教。

有些基督教改革派人物，其中包括蔡爾康（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的中國合作者）和極罕見的天主教家庭出身的改革派之一馬良（馬相伯，1840—1939年，在19世紀70年代他實際上做過耶穌會牧師），他們基本上被學者們所忽視。另一些基督教改革派，如王韜（1828—1897年）和馬良之弟馬建忠（1844—1900年），人們給予他們應得的評價是改革者，而不是基督徒。馬建忠年輕時期曾經就讀于天主教學校，后來留學法國。19世紀70年代末回到中國以后，他參加了李鴻章的幕府，由于他對西方具有無與匹敵的知識，迅速成為李鴻章最器重的外交顧問。王韜的經歷更加異乎尋常。在幫助麥華佗準備《新約全書》的委員譯本以后，1854年他在上海接受洗禮。19世紀60年代他在香港與理雅各密切合作翻譯中國七部經書。60年代末他與理雅各在蘇格蘭度過兩年以后，回到香港，于1874年自辦報紙。王韜著的書和他每天寫的關于時事和改革的政論文章，使他享有西方問題專家的聲譽。1884年回上海后，他到傅蘭雅的格致書院工作，90年代初，他經常為有改革傾向的傳教士刊物《萬國公報》寫稿。

把這些人稱為“基督教改革派”是什么意思呢？當然，這不意味著他們的改革思想是建立在明確的基督教概念上面，或者他們把改革看成是將來使中國基督教化的橋梁（像某些傳教士所希冀的那樣）。（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很難知道他們與基督教的關系有多深、多久。19世紀對于基督徒的責罵如此其甚，致使受過教育的中國教徒都盡量隱瞞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在王韜印行的大量著作中，無一個字提及他是一個基督教徒，只是他在19世紀50年代一篇未發表的日記中隨帶了一筆。）此詞更多的是意味著，這些人是早期擺脫了儒家樊籬的人。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基督教似乎并不能取代儒家的思想體系（而明治時代的許多新教教徒則用基督教取代了）。毋寧說，它使人注意到這一事實：其他合法的和值得尊重的世界觀都是可能存在的。一旦把這一點弄清楚了，儒家社會便第一次處于守勢。這樣我們就發現，甚至當基督教徒（或受基督教影響的）改革派保持對儒家學說的信念——事情也常常是這樣的——時，這種信念的性質已有所改變。他們的推論似乎是，如果儒家學說要在中國繼續占統治地位，它應該是與從前迥然不同的儒家學說。因此，需要進行改革。

### 19世紀90年代的新改革派

雖然個別“基督教”改革派在20世紀開始以后仍很活躍，但是作為一個集團來說，他們在19世紀90年代已把活動的舞臺讓給了更年青一代的改革派和革命家。因為革命運動是一種屬于20世紀而不是屬于19世紀的現象，因此本章只提一下這個問題，以指出基督教徒在1905年以前階段的革命運動歷史上所起的非常突出的作用（至少是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中所起的那部分作用）。興中會香港分會的大多數領袖（當然包括孫中山在內）都是基督教徒。1895年廣州密謀事件的領導人中主要是新教教徒，據一個中國人估計，在最初參加1900年惠州起義（包括其組成部分的廣州起義）的人中，基督教徒占30%。雖然這個問題尚有待研究，但我傾向于贊成希夫林的論點：革命者的基督教（與早期太平軍的基督教不同）作為一種動力來說，只有微小的價值，它所構成的“只是他們全盤西方化方針中的一個宗教方面”。[[43]](#_43_Xi_Fu_Lin____Sun_Zhong_Shan)

與人們所想象的相反，在19世紀90年代走向前臺的新改革派人士，他們雖然比舊改革派更加激進，但一般都在舊學方面更有根底。實際上，他們中間某些最著名的人物是從儒家今文學傳統中找到他們改革思想的主要根據的。大部分舊改革派人物是因多年來直接生活在通商口岸才走向改革主義的，新改革派則不同，他們一開始就有志投身于改革（誠然，有時是在短暫地訪問通商口岸以后才有志于此的），只是在后來才實際上卜居于通商口岸，那時這樣做通常是出于方便或政治安全的原因。最后還有一個不同之點，但這不同之點的性質是自相矛盾的：即雖然19世紀90年代比較重要的改革派中沒有一人是基督教徒，但其中某些人——像他們名義上的基督教前輩那樣——至少是受到了基督教或其傳教方法的深刻影響。

緊接中國敗于日本之后，康有為（1858—1927年）領導的新改革派于1895年首先取得了全國性的聲望。在后來幾年間，維新改良的浪潮高漲。它在1898年夏天臻于極盛，此后即戛然而止，因為慈禧太后的政變使敵視激進變革的勢力重新掌權。

正是從1895—1898年這個時期，傳教士對于中國改革嘗試的影響達到頂點。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影響是通過私人關系取得的。李佳白的尚賢堂（1894年建）以促使北京官員對改革感興趣作為主要目標，他在1896年聲稱，他個人認識250多名官員，另外還和200人有交往。[[44]](#_44___Bei_Hua_Jie_Bao____1896Nia)威爾士傳教士李提摩太是另一個把培植與中國高級人士的私人關系作為促進改革的有效方法的人。李提摩太拜訪過李鴻章和張之洞等顯貴人物。（李提摩太的特點是操切從事，他在1894年試圖勸說張之洞提出倡議，使中國在規定的年限內變成相當于外國的保護國。張之洞的反應顯然并不熱情。）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訪問北京時，結交了康有為、梁啟超（他曾短時間擔任過李提摩太的秘書）和短命的強學會的其他成員，也經常在強學會的集會上發表演說。

比私人交往更有影響的是新教傳教士的改革主義的著作，它們從19世紀80年代末起迅速傳播開來。1891年李提摩太擔任了出版這類著作的主要贊助機構廣學會的總干事。廣學會出版了他所譯麥肯齊的著作（1894年）和林樂知所編關于中日戰爭的書（《中東戰紀本末》，1896年）。從1889年起，它還出版有影響的月刊《萬國公報》，由林樂知和蔡爾康任總編輯。

作為主張改革的宣傳者，傳教士在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超出了他們最狂熱的夢想。每年廣學會從銷售出版物中得到的收入從1893年的800美元猛增到1898年的1.8萬美元。1896年傅蘭雅興高采烈地報告：“書籍生意正在全中國迅猛開展，這里的印刷商不能滿足書籍生意的需要。中國終于覺醒起來了。”[[45]](#_45_1896Nian_4Yue_1Ri_De_Yi_Feng)林樂知關于中日戰爭的書籍（書中有一節清楚地說明了作者的改革派觀點）和李提摩太所譯麥肯齊的書（這兩本書很受人歡迎，中國書商一再非法翻印），[[46]](#_46_Ju_Shuo_Li_Ti_Mo_Tai_De_Yi_B)都是1896年長沙鄉試舉子的必備讀物。強學會出版的第一個刊物（1895年）不僅有許多材料引自《萬國公報》，而且也一度采用了《萬國公報》這同一名稱。像李提摩太和林樂知這些人的中文姓名在全國是人們所熟悉的。如果不發生1898年9月的政變，很可能根據康有為的推薦，李提摩太會被邀進入清帝內廷顧問之列。光緒帝（他在丁韙良的間接督導下已學了幾年西學）已經研究過麥肯齊著作的中譯本，并且產生了深刻印象。

基督教傳教士在最初喚醒中國人使之感到需要變法這一方面，曾起過重要作用（據說康有為在1898年對一個記者說過，他轉而主張變法，主要歸功于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的著作）；此外，他們還幫助形成了改革派的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觀。成立各種變法維新團體和利用定期刊物以喚起人們對于變法維新的興趣和支持，這些做法如果不是受到傳教士榜樣的直接鼓舞，至少也是受到它們的強烈影響。顯而易見，康有為把孔教變成國教的計劃（有自己的節日、全國范圍的教堂系統和傳教士），也同樣受到他們榜樣的鼓舞或影響。（這里也應該提到著名的佛教改革派楊文會，他對于基督教傳教士的形象深有印象，并且學習他們的經文，和到內地去向俗人宣揚他們的學說。）

把傳教士和變法維新派的作品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傳教士在教育與經濟方針方面以及對于各種社會問題，都有很大的影響。傳教士之偏重外交事務，似乎在許多維新派著作中也有反映，典型的例子是主要在英、美新教傳教士中存在的反俄情緒。而且正是中國人關于世界與人類的進化觀念，可能受到了傳教士作者最深刻的影響。譚嗣同的《仁學》（1898年）是清末最大膽的哲學論述之一，它同樣重視基督教的倫理學和儒家的倫理學，不分軒輊：這在當時是前所未聞的說法。康有為、譚嗣同和早期的梁啟超都有關于未來世界制度的烏托邦幻想，即在那樣的制度下，分隔各民族的藩籬將被打破，人類將共同生活在和諧與和平之中；這些幻想雖然在中國傳統中不無淵源，但其論點卻從李提摩太和其他傳教士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充實。的確，并不是中國所有革新之士都準備接受這種關于未來的玫瑰色的憧憬，何況有些人（如嚴復）寧愿認為斗爭和沖突仍將在未來世界中占中心位置。但是到1900年，大多數改革派都準備在他們的新的世界觀中也糅合進關于進步的信條和無保留地相信科學進步有益于人類的信念（這在當時傳教士的著作中是喋喋不休地被反復提出的兩種見解）。

19世紀末，傳教士最無成效的說教是向中國人兜售說：西方的知識和制度及其相伴隨的富強，其源反正出于基督教。[[47]](#_47_Guan_Yu_Chan_Shu_Zhe_Zhong_S)有的人，如康有為，承認宗教可以救中國，甚至可以救全世界。但是當要他選擇自己的宗教時，康有為對他的傳教士兼良師益友最大的讓步是選擇一個基督教化的儒教：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這是很大的讓步，當然傳教士并不這樣認為。李提摩太認為上帝對全世界的統治就是進步，這即是說，承認進步便應自動地導致承認上帝；他的這個論點也遭到相似的命運，因為中國人很快就發現他們可以否認上帝，但仍能取得進步。簡言之，中國維新派在那些年愿意買進傳教士兜售的東西。但是他們不想接受傳教士想要在交易中暗藏的條件。

正當對義和團的鎮壓為20世紀頭10年的恢復變法活動創造條件時，傳教士的卷入和影響卻急劇減少了。產生這一突變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政治問題已日益增加其重要性，例如維新派和革命派之間的斗爭即是這樣，而傳教士對這種公開爭論是采取回避態度的。[[48]](#_48_Dang_Ran_Ye_You_Li_Wai___19S)第二個原因，肯定也是更有決定性的原因，是出現了另一可供選擇的途徑（也是大多數中國人更容易接受的途徑）以獲得關于非中國的外部世界的情報。中日戰爭以后，中國自己的刊物大量涌現，使得讀者可以不再那樣依賴外國人出版的中文報刊了，而從1900年起又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留學國外（特別是去日本留學）。

由于不再需要他們作為宣傳改革的使徒和傳布西方非宗教文化的工具，像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等傳教士發現自己在1900年以后對中國舞臺已逐漸不能產生影響了。有改革思想的傳教士深切地關懷中國人民的幸福及中國國家的命運，他們在20世紀繼續起著積極作用，而以在公共衛生、教育和鄉村建設等領域內為尤著。但是，不論他們的貢獻如何重要，貢獻的內容卻日趨雜亂，其范圍只限于在地方上舉辦而已。中國的問題太多，政治情況太混亂，主張改革的非宗教界代表（國內的和國外的）多而且雜，致使傳教士們再也沒有過去19世紀年月中能在全國范圍內（雖然為時很短）產生的那種影響了。

本世紀開始時也不妨說是基督教傳教活動的真正轉折點。義和團的大屠殺差不多殘殺了200名外國傳教士（不算新教教徒的子女）和三千多名中國教徒（主要是天主教徒），它使得多年來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達到了頂點，它也標志著以仇外情緒為契機的反對基督教傳教活動已達到高水位。反教情緒在20世紀尚未平息下來。它持續到國民黨統治的年代，并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變得有效地制度化了。但是有一個顯著的區別。從前的反對基督教象征著一個古老的文明決心抗御有毀滅它的危險的外來勢力，20世紀的反對基督教則表現在一個年輕國家急于要尋找新的自尊基礎。排外主義仍延續了下來，但它是在新的環境中延續下來的，而這個環境與其說形成于畏懼，不如說形成于憤怒；與其說形成于舊式仇外情緒，不如說形成于現代的民族主義。

（一山 譯）

[[1]](#_1_10)關于這次迫害的兩個權威性的論述，見威勒克《1784—1785年清政府與天主教在華的傳教活動》；矢澤利彥：《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對天主教的鎮壓》，載《埼玉大學紀要》卷7附刊，第47—98頁。

[[2]](#_2_10)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第196頁。關于上文估計的統計數字，見同上書，第129、182—183頁。

[[3]](#_3_10)麥吉利夫雷編：《新教在華傳教一百周年（1807—1907年）紀念會議歷史文集》，第653頁。

[[4]](#_4_10)同上書，第646頁。

[[5]](#_5_10)無論如何這種觀點仍然普遍流行。最近一部持修正態度的新著作爭辯說，太平天國的宗教“異常忠實地再現了”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新教的原教旨主義。見特雷德戈爾德《西方在俄國和中國：近代的宗教和世俗思想》卷2，第50頁及其他諸頁。

[[6]](#_6_10)引自林賽·里德的《傳記筆記》，此文介紹了1960年香港出版的《理雅各英譯七經》第1冊。

[[7]](#_7_10)大多數作者（包括天主教作者）認為，這個通譯即傳教士德拉馬。盡管中國官員以中文本的合法性表示懷疑，但他們至少試圖敷敷衍衍地使之生效。1865年柏德美協定只是部分地消除了兩種文本的差異所產生的摩擦。

[[8]](#_8_10)戴里亞：《中國天主教簡史》，第58頁。

[[9]](#_9_10)關于明治時代日本的新教，見托馬斯《新教在日本的開始》；沙依內：《明治時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會抗議》。據賴德烈說：“到1897年，中國新教基督徒中沒有產生重要的著作”，見《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第434頁。

[[10]](#_10_10)關于李提摩太的策略，見保羅·科恩《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傳教方法》，載《中國論文集》第11期（1957年），第43—52頁；關于丁韙良，見彼得·杜斯《丁韙良的生平和工作》，同上書，第10期（1956年），第97—127頁（此文重載于劉廣京編的《在華的美國傳教士：哈佛大學討論會文集》，第11—41頁）；李佳白在《傳教士對中國上層階級的責任感》一文中清楚地說明了他的方法，載《中國記事者和傳教士雜志》第19期（1888年），第358—364、397—402、465—472頁。

[[11]](#_11_10)丁韙良的《天道溯原》（三卷）由中村正直譯成日文，日譯本印行了多版，仍叫《天道溯原》。丁韙良在書中把孔子學說說成基督教的先驅，利用儒家術語來介紹這種西方宗教。日本的許多儒者因讀了此書被感悟而接受基督教。見托馬斯《新教在日本的開始》，第194頁；沙依內：《明治時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會抗議》，第62頁；以及海老澤有道（音）編《基督教在日本：日文和中文史料目錄》第一部分，（1543—1858年），第114—115頁。

[[12]](#_12_10)唐良理（音）：《叛亂中的中國：一個文明怎樣成為一個國家的》，第57—78頁。

[[13]](#_13_10)這一點在中國共產黨的著作中被忽略了，例如李時岳《甲午戰爭前三十年間反洋教運動》，載《歷史研究》，1958年第6期。王爾敏在《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1965年第28卷第1期第184—185頁）上發表的一篇評論中也明確地否認這一點。在呂實強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一文中對這一點也降低了調子。中國許多非共產黨作家都同意共產黨歷史學家胡繩的這一意見：中國人民“沒有‘排外’的偏見，如果他們表現了‘排外’的態度和行動，那正是資本主義對華實施侵略戰爭和經濟掠奪所造成結果”。《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第3頁。

[[14]](#_14_10)下文幾段均引自拙著《中國的反基督教傳統》，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0第2期（1961年2月），第169—175頁。此文也重載于杰西·G.盧茨編輯的《基督教在華的傳教》。關于中國反基督教傳統的詳細評論，見拙著《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1870年）》第1章。

[[15]](#_15_10)引自保羅·科恩《中國和基督教》，第22頁。

[[16]](#_16_9)關于把基督教與反抗朝廷的秘密會社（以及與太平軍）廣泛地混為一談的新證據，見李恩涵《咸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載《清華學報》（臺北）卷6第1—2期（1967年12月），第55—60頁。

[[17]](#_17_9)下文關于傳教士對紳士社會和文化地位的威脅的論述，除另注出處者外，均見保羅·科恩《中國和基督教》，第77—86頁；又《關于清末反傳教士情緒的一些資料》，載《中國社會雜志》第2期（1962年），第4—9頁。

[[18]](#_18_9)186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轉載在《清史問題》（1967年4月第1卷第5期，第14頁）；這信來源于蘇格蘭布魯姆霍爾的額爾金—卜魯斯檔案室。

[[19]](#_19_9)1851年5月2日的一封信，載《傳教士雜志和大事記》第15期，第205—206頁。

[[20]](#_20_9)湛約翰語，轉引自保羅·科恩《中國和基督教》，第80頁。

[[21]](#_21_9)楊篤信（格非），轉引自保羅·科恩《中國和基督教》，第85頁。

[[22]](#_22_9)引自湯普森《楊篤信在中國五十年的經歷》，第256頁。

[[23]](#_23_9)關于集中在1860—1874年的民眾敵對行動的因由，最詳盡的敘述見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130—194頁。

[[24]](#_24_9)19世紀60年代末法國駐中國的代表認為，四川居民反對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西陽地區居民向范若瑟先生繳納大宗款項，……向居民征收的這筆款子由這位主教分配給基督教徒”。見保羅·科恩《中國和基督教》，第315頁注3。60年代這類其他例子，又見此書第217—221頁。

[[25]](#_25_9)保羅·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一書轉載了一些這種東西。關于這方面的俄文著作，見加拉寧《19世紀中國反基督教的民間圖片》，載《宗教和無神論史博物館年鑒》第4冊（1960年），第403—426頁。

[[26]](#_26_9)引自保羅·科恩《中國和基督教》，第51頁。（由于未見到中文原書，姑直譯于此。—譯者）

[[27]](#_27_9)下文我大量利用了同上頁注，著作的第四章。

[[28]](#_28_9)這一段論述根據保羅·科恩《清代中國與西方的沖突：1850—1900年》，載克勞利編《近代東亞文集》，第55—57頁。

[[29]](#_29_9)傳教士中比較清醒的人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例如，艾約瑟寫道，李鴻章善于“仿效外國的慈善事業設立醫院和戒煙所，并且能夠接受外國科學……但在同時……他并不同意基督教的所有主張”。引自《當前中國的作品：他對抗基督教到了什么程度？》，載《1890年5月7—20日在上海舉行的新教在華傳教士大會記錄》，第572—573頁。

[[30]](#_30_9)在這一節我著重依據小海亞特《新教在華的傳教活動（1877 1890年）：慈善工作的制度化》，載《中國論文集》第17期（1963年），第67—100頁（此文也轉載在劉廣京的《在華的美國傳教士》，第93—126頁）。

[[31]](#_31_9)《在華傳教百周年會議》，第247頁。

[[32]](#_32_9)同上書，第267頁；試比較麥吉利夫雷所編《新教在華傳教一百年》第670頁上的統計，表上所列1905年醫院（166所）和診療所（241所）的總數比文中所引的數字高，就醫病人的數日則較少一些（不到110萬人）。

[[33]](#_33_9)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第460頁。

[[34]](#_34_9)引自小海亞特《新教在華的傳教活動》，第75頁。

[[35]](#_35_8)同上書，第73—74頁。

[[36]](#_36_8)引自小海亞特《新教在華的傳教活動》，第77頁。

[[37]](#_37_8)引自傅蘭雅的一篇報告，載畢乃德《上海格致書院》，載《太平洋歷史評論》卷25第2期（1956年5月），第141頁。

[[38]](#_38_8)引自佩特諾《謝衛樓和華北協和大學的創辦》，載《中國論文集》第14期（1960年），第121頁（此文也轉載在劉廣京的《在華的美國傳教士》，第53頁）。

[[39]](#_39_8)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第145頁。

[[40]](#_40_8)《韋伯斯特最新大字典》，第711頁。

[[41]](#_41_8)列維認為，傳教士“對于廢除纏足施加了強烈影響”。見《中國的纏足：一種引起性愛的奇異風俗》，第78頁。

[[42]](#_42_8)另一方面，關于唐景星和伍廷芳接受過洗禮的假設是強有力的，雖然還缺乏證據。西里爾·珀爾的《馬禮遜在北京》（第234頁）把伍廷芳描寫成“有兩個小老婆和接受過洗禮的基督徒”。

[[43]](#_43_7)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89—90、228—229頁。

[[44]](#_44_7)《北華捷報》1896年11月6日，第784—785頁。

[[45]](#_45_7)1896年4月1日的一封信（著重點是原有的），《傅蘭雅書信集》，加利福尼亞大學圖書館（伯克利）藏。在1898年7月1日的一封信中，傅蘭雅寫道：“每一本有價值的書現在都在被人非法翻印。”

[[46]](#_46_7)據說李提摩太的譯本于1898年僅在四川省就被非法翻印19次。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40—42頁。

[[47]](#_47_7)關于闡述這種失敗的中文文章，可看《論西政西學治亂興衰俱與西教無涉》，1898年載于譚嗣同等人編的維新派刊物《湘學新報》四卷集，卷1，第441—477頁。

[[48]](#_48_7)當然也有例外。19世紀70年代初期韋廉臣發表了一篇文章，建議逐漸成立議會政府。參看劉廣京《19世紀的中 國：舊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響》，載何炳棣等編《中國的危機》兩卷集，卷1，第104頁注。到20世紀初，有些傳教士也曾宣稱他們同情年輕革命者的事業。但一般說來，傳教士似是害怕官府結果會不管真假，都把基督教徒與革命者混為一談，從而作出強烈不利的反應。見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90頁。

# 參考文獻介紹

## 第一章 導言：舊秩序

在2000年中，中國積累了大量歷史文獻，以致文獻學早已成為一門專業。研究中國史的中外史學家經常提供書目，竭力防止初學者陷入浩瀚的歷史文獻之中。對于英語讀者來說，捷徑是為顯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門而入的初學者所寫的各種附于概論性文章后面的書目。目前，最通用的是徐中約的《近代中國的興起》和克萊德及比爾斯的《遠東：西方影響及東方反應的歷史（1830—1973）》兩書中所列的閱讀文獻。有一部概論性的著作甚至用50頁的篇幅評述了有關中國（主要是近代的）650部書，見費正清的《中美關系史》。我們這一介紹性的篇章使用了賀凱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導論》這一最新的背景研究著作，書中附有經過選擇的書目。

所有這些西方的著作都來源于什么樣的中國歷史記載呢？對中國感興趣的英語讀者（直到其中有更多的人能讀中文、日文書以前）事實上是不會關心成本大套地刊行的、在漢學圖書館中使用的原始資料、圖書目錄、參考書和工具書的；這類著作之龐大和種類之繁多明顯地證明了漢學的存在與發展。然而，非漢學家確實可以通過閱讀像威爾金森的《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這樣的漢學工具書而引起興趣和受到啟發，此書詳細提供了1911年以前在中國、日本和西方出版的有關中國的原始資料和學術著作的主要類目。繼此宏著之后的是內森的《1840—1972年的現代中國：資料和工具書介紹》，此書著錄了圖書館、檔案館以及直到70年代的有價值出版物的大量重要情報。這些最新的圖書指南也提到了它們依據的一些更早期的著作。

本文當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一本概論性著作（費正清等編的《東亞的傳統和變化》），但是，像所有評述一樣，它也得益于許多其他作者，其中有些人的著作被引用于腳注中。

## 第二章和第八章 清朝的亞洲腹地

1800年和1862年間清朝亞洲腹地的歷史一直是一個被忽略的論題。這部分歷史雖有充足的原始資料可供詳細研究，但很少史學家試圖做這項工作。

最優秀的一部著作是羅薩比的《1368年迄今的中國和亞洲腹地》。克拉布的《中國和俄國的“大賭博”》一書在中俄關系方面對清朝亞洲腹地作了很好論述。蕭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二部分（1962年修訂版）把亞洲腹地置于整個清代歷史之中加以考察，這反映了一個中國漢族人的看法。《巖波講座世界歷史》第13卷提供了有價值的背景材料，作者是荻原淳平、佐口透（他撰寫19世紀的清朝部分）、佐藤長和若松寬。關于亞洲腹地國際政治結構的論述，在拉姆·拉烏爾的《中亞的政治》一書中可以看到。歐文·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腹地邊疆》一書，仍舊是所有研究亞洲腹地學者的基本讀物。最易看到的賽諾所編的《中部歐亞大陸研究介紹》是一部列舉歐洲文著作的總書目，但其中有關1800—1862年清朝亞洲腹地的著作很少。中文著作書目有鄧衍林編的《中國邊疆圖籍錄》。

清代所傳主要作品有這樣幾種：有三種文字的《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1795年）以及為嘉慶、道光、咸豐和同治時期寫的續編；祁韻士編輯的《皇朝藩部要略》，它利用了上述著作的材料；以及有三種文字的《欽定理藩院則例》（特別是1827年版，該版經過修訂于1843年再版）。對清朝政治制度的概述可見《會典》和《事例》，特別是1818年和1899年的兩種版本。

對于一般英語讀者來說，都能看到單獨的滿洲史、蒙古史、東突厥斯坦史和西藏史的優秀著作，另外還有用其他文字撰寫的重要史書。對滿洲作綜合論述的，只有羅伯特·李的《清代歷史中的滿洲邊疆》一書。

論述蒙古的歷史文獻更為豐富，但它們往往重在敘述外蒙，比較忽視內蒙和衛拉特。用英文編寫的主要著作有鮑登的《蒙古近代史》和米勒的《內蒙古的寺院和文化變化》。但是，論述最充分的是蒙古人自己編寫的著作，如《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第2卷（1604—1917年），納扎格多爾濟的《滿洲統治時期的喀爾喀簡史，1691—1911年》，以及題旨比較狹窄的一些文件匯集和專著，特別是納扎格多爾濟和那桑巴爾吉日編的《四艾馬克稅冊》；那桑巴爾吉日的《1691—1911年外蒙對滿清王朝履行的義務》，以及那桑巴爾吉日和納扎格多爾濟編的《18世紀至20世紀初的人民申訴書》，此書已由拉錫登杜格和弗隆尼卡·維特合作譯成英文。

主要的中文著作有張穆的《蒙古游牧記》，此書已由波波夫譯成俄文，又由須佐嘉桔譯成日文。中文的著作書目有張興唐編的《蒙古參考書目》（臺北，1958年版）。

論述19世紀蒙古的許多最重要的歷史著作大部分出自日本和蘇聯的歷史學家之手。兩部有名的舊著是：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和橋本光寶的《蒙古的喇嘛教》；這兩部書基本上已被隨后出版的田山茂的《清代的蒙古社會制度》所吸收并替代，此書是研究清代蒙古史的所有學者的必讀書。關于日文的蒙古學書目有巖村忍和藤枝晃合編的《1900—1972年蒙古研究文獻目錄》。主要的俄文著作有格魯姆-芝邁洛的《蒙古西部和烏梁海邊區》卷2：《與中亞史有關的各該國家的歷史綱要》，以及蘇聯和蒙古學者合寫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此書于1967年予以修訂并增補。1954年有中譯本）。胡爾拉特編了《有關蒙古的著作書目》1—3卷，其中主要收錄的是俄文書，也有其他歐洲文字的著作。在文學方面，有米哈伊洛夫的《蒙古文學遺產》，此書是一簡明本著作。論述19世紀蒙古文學史的最重要作品是海希格的卓越著作《蒙古文學史》第1卷。

研究19世紀70年代以前時期新疆的主要權威是佐口透，他的《18世紀至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及其有關此研究領域的許多論文指導著這一領域。他的《東突厥斯坦》一書中有兩個部分已譯成英文，即《浩罕王國的東方貿易》（第六章，載《東洋文庫研究紀要》1965年第24期）和《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復興》（第二和第七章中的部分譯成，載《亞洲學報：東洋文化研究所通報》1968年第14期）。他的《俄國和亞洲的草原》一書對16—19世紀的中亞史作了引人入勝的介紹。日文著作的一本重要研究書目是袁同禮和渡邊宏合編的《1886—1962年新疆研究文獻目錄》。

對于六城地區各次暴亂的最有影響的記述是魏源的《圣武記》，此書在新亞政務部的贊助下已譯成日文（1943年）。論述張格爾的部分由伊姆波爾特—胡阿特譯成法文，載入他的《中亞文獻匯編》。中國人研究新疆史的主要著述有曾問吾的《中國經營西域史》。中亞本地人的著作是穆罕默德·阿明的《東突厥斯坦史》，此書是用分離主義的觀點寫成的。張格爾的圣戰在曹振鏞等人編的《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中有敘述。

蘇聯的卓越歷史學家庫茲涅佐夫的著述大大推進了這個領域的研究，他出版有專著《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以及下面幾篇重要文章：《論張格爾運動的反動實質》（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歷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1期）、《論19世紀第二個25年期間清政府對東突厥斯坦的政策》（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歷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2期）、與上面專著同名的《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載《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歷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3期）、《18世紀末哈薩克和中國的貿易關系》（根據中文資料）（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瓦里哈諾夫歷史、考古與人種學研究所著作集》1962年第15輯）和《關于19世紀上半葉英、俄兩國同新疆貿易的問題》（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社會科學專集》1963年第6期）。前三篇文章有英文摘要，名《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對新疆的行政管理》（載《中亞評論》第10卷第3期，1962年）。

杜曼的《18世紀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一書論述了與19世紀有關的許多事實，他把此書內容又壓縮成為《清帝國對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的征服》一文（載齊赫文斯基編《滿人在中國的統治》一書中）。

19世紀，隨著英、俄兩國敵對的加劇，雙方加緊在新疆收集情報，最后提出了兩篇事實上能互相配合的報告。俄國的一篇報告是瓦里哈諾夫的《論1858—1859年六城的形勢》，此文后來又被瓦里哈諾夫《全集》第二卷中發表的有關準噶爾和六城地區的其他許多文章所充實。與此相應的是英國人戴維斯編寫的報告《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戴維斯的這份報告雖然對史學家有很大價值，但似乎被完全遺忘了，而瓦里哈諾夫的記述卻實際上給后來的整個學術界留下了印象。這個記述的英譯本見于約翰和羅伯特·米其爾的著作中，譯名為《中亞的俄國人》。

貝柳大量吸取瓦里哈諾夫的材料寫成了《喀什噶爾史》一文，此文收錄在福賽思的《1873年出使葉爾羌報告》中。福賽思的俄國同時代人庫洛珀特金寫了一份對應報告，標題是《從歷史和地理方面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并由瓦爾特·高恩譯成了英文。庫洛珀特金的報告也應大大地歸功于瓦里哈諾夫；而在所有全面敘述東突厥斯坦的歷史中，最優秀的是格里戈里耶夫的《東突厥斯坦或中國突厥斯坦》，它也同樣得益于瓦里哈諾夫，此文載于他的《利特爾地理志》第二部分，此書也包括戴維斯《報告》中的資料。另一些俄國人的重要著作可以在庫茲涅佐夫上述的《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一書的書目中看到。

對西藏史的論述相當全面，但1800—1862年這段時期未受到應有的注意，而且文獻論述的重點是西藏本身。青、康兩地區特別為近代史學家所忽略。英文的主要論著有卡拉斯科的《西藏的土地和政體》；拉姆的《不列顛和中國的中亞：1767—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黎吉生的《西藏簡史》；涂奇的《雪山之國西藏》；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斯內爾格羅夫和黎吉生的《西藏文化史》；石泰安的《西藏文明》；還有彼特奇的《1728—1959年西藏的貴族和政府》。羅克希爾的《拉薩的達賴喇嘛及其同清帝的關系（1644—1908）》（載《通報》第11卷，1910年）現在仍然有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書第335—339頁開列有關于西藏的原始資料。關于日本研究西藏的主要著述，有鈴木中正的《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舒爾曼的《達賴喇嘛史》也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

施拉姆的《甘藏邊境的土族》一文對青海湟中地區作了闡述，此文第一篇載《美國哲學協會會刊》自然科學類，1954年第44卷第1部分；第二篇載《會刊》自然科學類，1957年第47卷第1部分；第三篇載《會刊》自然科學類，1961年第51卷第3部分。論述拉達克歷史的主要作品有弗蘭克的《西藏西部史》；關于1800年和1862年間的記述，坎寧漢的《從自然、統計和歷史角度看拉達克，兼其及毗鄰諸國》一書是必讀書。關于不丹，可看拉烏爾的《近代不丹》，此是有用之書。關于尼泊爾，可看羅斯的卓越著作《尼泊爾：求生存的戰略》，這是一部資料豐富而又引人入勝的讀物。

##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

關于嘉慶和道光時期的中國本國史，現在還沒有人用哪一種語言寫出能使人滿意的著作。這不是因為資料缺乏，而是因為我們對近代史的概念已形成這種傾向：即或者想促進對清朝基本制度形成時期的研究，或者想促進研究這些制度對于西方挑戰的反應。因此對這個重要時期，即晚清帝國社會的突出問題已在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中被感受到的時期，沒有多加研究。因此，要寫出重要歷史著作的機會是非常之多的。

研究這個時期必須從它在漫長的清代歷史中的地位入手。何炳棣撰寫了兩篇出色的綜合性論文，表述了他對清代中期總的看法：其一是《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亞洲研究雜志》1967年2月號）；第二篇是《1368—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一書的第九章。另一篇關于清代前半期的綜合性論文是小韋克曼的《1683—1839年鼎盛時期的清帝國》（載克勞利編的《近代東亞論文集》）。有兩部標準的中國清代史，一是孟森的《清代史》，此書對于全面分析清代政治制度最為有用；一是蕭一山的《清代通史》，此書包括大量從官私著作摘引而常常不見于文獻記載的細節，還有引自“外史”的許多趣聞軼事。鈴木中正論述白蓮教叛亂的一些著作占著主導地位，它們已在這一章的注釋中交代明白。要了解各種文字所寫的專題參考論著，可查閱施堅雅的《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一書。

在大量中國宮廷檔案和軍機處檔案公布以前（對19世紀末檔案的整理工作已經在臺灣開始進行），有關19世紀早期史的基本資料仍然是《大清歷朝實錄》及其他權威性的文獻集。威爾金森的《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一書對這些資料的性質進行了討論。對于原始資料最有價值（但尚未充分利用）的綜合性介紹，特別應該提到《皇朝政典類纂》這部政務大全，編者是席裕福，其中廣泛引用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并且注明了它們的出處。

官方政策的發展可以通過一些官方文件匯編和各種類書來探索，但研究地方社會的情況則是一個更加困難的問題。除了數以千計的地方志（縣以上皆有方志），有價值的材料也可見于用宮廷檔案編成的兩部奏疏匯編：一部是羅振玉編的《皇清奏議》，其中包括直到1820年為止的奏折；另一部是此書的續編，即王云五編的《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這些奏議顯然抄錄自清代宮廷，雖然它們是為了作為范例（思想的和文學的），而不是因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其重要性，但它們對于詳細了解地方情況有著巨大價值。

除非我們能夠弄清楚官方文獻背后的一整套非正規的關系，否則我們對這一時期的了解，將依然是膚淺的。最好的辦法之一是利用傳記。恒慕義編的《清代名人傳》是標準的英文參考書，其中包括有文獻參考目錄。然而，恒慕義的著作內容僅限于主要官員和一些有影響的或德高望重的學者紳士。威爾金森著《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附有中文的清代名人索引。在傳記書中，最有用的是錢儀吉編的《碑傳集》和李桓編的《國朝耆獻類徵》。后一部書的每一人的傳記一般收有國史館編的官方傳記和來源于其他史料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傳記。前一部書只包括私人撰寫的紀念文章和少量摘自方志的記述，都有出處。比起《國朝耆獻類徵》來，《碑傳集》往往對每一個人收有更多的記述。這兩部書最好是合起來使用，雖然許多材料是重復的。《碑傳集》完成于1826年，后來又編寫了《續碑傳集》（繆荃孫編）和《碑傳集補》（閔爾昌編）。沒有收在這些重要集子中的個人傳記常常可見于清史館編的《清史列傳》。這部書只對每個作傳對象登一篇官方傳記。對私人所寫傳記探本求源，除了可以與其他資料進行核對以外，還是了解友情和政治結合這些非正式結構的有用的初步線索。

在所謂的野史或外史中，有著研究清代歷史和政治的豐富的、基本上尚未被發掘使用的材料。下面列舉的七部書是這類著作中最好的。由小橫香室主人編的《清朝野史大觀》，共十二卷，其中軼事引自110多種資料（有些資料由編者在前言中列舉）和編者本人的回憶，但均無出處。著名的多卷本著作《清稗類鈔》（十二卷），徐珂編，分為92類，每類按年為序編成。此書內容已被編入佐伯富編《中國隨筆雜著索引》中。裘匡廬（裘毓麟）編的《清代軼聞》，共分7類，如名人、宮闈瑣談、外交關系及太平軍叛亂等，這些資料均無出處。編者提供了“幾百部”參考書的一部分書目。歐陽紹熙所編《清譚》，分為宮廷事務、軍事問題、外交關系、自然災害和權貴等類。在有些情況下，編者給個別條目注明了資料來源。姚永樸編的《舊聞隨筆》，對只提姓或字的人物注上了他們的名字。李岳瑞（李孟符）編的《春冰室野乘》則未予分類，但其中也包括了許多曾在其他資料（如上面提到的《清譚》）中出現過的著名軼事。

在這類書中，最后一部分受到較多注意和尊重的資料是滿人昭梿親王的《嘯亭雜錄》和《嘯亭續錄》。《續錄》是在1826年完成的，因此主要是對嘉慶年間的觀察。他的觀察是了解和珅年間和嘉慶初年的有價值的史料。這兩本書的內容1954年已被編入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會出版的《中國隨筆索引》中。

## 第四章 廣州貿易和鴉片戰爭

關于廣州貿易史和鴉片戰爭史的文獻材料是很豐富的。除了在對第五章的書目介紹中提到的原始資料外，還有一些加有注釋的外交文獻集，如蔣廷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本）、傅樂淑的《中西關系文件匯編（1644—1820年）》和郭斌佳的《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陶希圣的《列強侵略》（四卷本）由國民黨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委員會出版，其中所收文章和回憶錄是北京的論述鴉片戰爭的文集（齊思和編的《鴉片戰爭》）所沒有的。

比鴉片戰爭更早的中國和西方的外交關系，普里查德在其1936年出版的《英中關系的艱難歲月（1750—1800）》一書中作了部分論述，并闡明了歐洲人的觀點。在費正清所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一書中的許多出色文章對中國的外交事務概念作出了更加新穎的評價；而費正清的杰作《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一書中的開頭幾章，對中國處理外交關系的方式作了迄今為止最好的評論。

馬士在其《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五卷本）一書中，幾乎確鑿有據地詳細記述了19世紀以前貿易的背景。格林堡在其《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一書中，對散商的“港腳貿易”作了精辟分析，此書是根據劍橋大學的查頓檔案研究寫成的。對鴉片戰爭前中外貿易最優秀和最概括的研究著作是德米尼的權威著作《中國與西方：18世紀的廣州貿易》（共三卷，對開本）。

有許多論述廣州行商的有價值的著作。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法國漢學家考爾迭寫的《廣州行商》，載于《通報》。梁嘉彬根據中文材料寫了一部內容非常廣泛的著作《廣東十三行考》，在1937年出版。后來，巴蘇寫了一篇博士論文，題為《亞洲商人和西方貿易：對1800—1840年加爾各答和廣州的比較研究》，此文詳細敘述了行商和其他商業團體（如印度商人、波士頓的私人商行和塞勒姆私人商行）之間的關系。張榮洋有一篇重要文章，題為《對1784—1834年中國貿易和財政的再評價》（載《商業史》雜志1965年1月號），此文也強調指出了這些貿易關系和廣州貿易中私人匯票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上述許多論著都著重敘述了鴉片對于散商和公司進行的對華貿易具有的重要性。歐文在《英國在印度和中國的鴉片政策》（1934年出版）一書中對英國政府的鴉片貿易政策作了詳細研究。三年后，科斯廷出版了他的《1833—1860年的英國與中國》，其中頗為謹慎地論述了鴉片問題。韋伯斯特爵士的《巴麥尊在1830—1841年的外交政策》（兩卷本）一書后來從英國自由派運動的觀點考察了中國問題，因而強調的是英國的國內政治問題，而不是鴉片貿易對英國政府經濟上的重要性。然而，上面提到的格林堡糾正了這個偏差。最后，研究鴉片問題的最有權威的著作是斯賓士的《清代吸食鴉片概況》，此文載小韋克曼和格蘭特合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張馨保的重要著作《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爭》一書，詳細考察了中國對鴉片貿易的反應。還有一本用中文為欽差大臣林則徐寫的優秀傳記，即林崇墉的《林則徐傳》，其中相當詳盡地敘述了林則徐的禁煙措施。

鴉片戰爭本身引起當時的觀察者和參與者寫下了大量的回憶錄。在西方，像奧赫特洛尼的《英國的對華戰爭》和伯納德的《1840—1843年復仇女神號航行和服役記事》（均出版于1844年），都生動地描述了沖突情況。在這兩部書的影響下，又出現了一系列生動地描寫鴉片戰爭的軍事史書，首先是1946年出版的科利斯的《外國泥淖》，接著是1964年出版的賀爾特的《在中國進行的鴉片戰爭》，最后是比欽的《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在這類英文著作中，寫得最好的是費伊的《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一書，此書把軍事史和對社會及政治的精辟分析結合了起來。

也有戰爭參加者所寫的中文回憶錄。林則徐本人的《林文忠公全集》（兩卷本）內有當時的日記以及給朋友的書信和呈給清帝的奏折。林則徐的顧問們也寫了有關鴉片戰爭的歷史，如梁廷楠的《夷氛記聞》，以及魏源《圣武記》中的部分章節；派克在1888年已將它們的一部分譯成英文，書名為《中國人對鴉片戰爭的記述》。1851年，夏燮發表了他的《中西紀事》一書，此書對這一時期的中西交往史作了更加全面的敘述，而且包括許多第一手材料。在先前提到的一些文獻集子和阿英的《鴉片戰爭文學集》（兩卷本）中還有當時其他一些記述，其中有些內容（包括林則徐日記）已被譯成英文，收于韋利的既富于同情心而又引人入勝的《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一書中。

蔣廷黻的幾篇著作對于締結《南京條約》的歷次談判進行了探討，其中包括他用英文寫的關于把同樣的商業特權普遍給予西方各國的一篇文章（載《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1931年10月）。這些談判既是鄧嗣禹的《張喜和南京條約》一書的主題，也是上述費正清論述貿易和外交那部著作的主題。最后，研究太平天國的史學家謝興堯的幾篇重要文章，討論了鴉片戰爭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這些文章收錄在他的《太平天國史事論叢》中。鴉片戰爭與太平軍叛亂起源之間的關系問題，也是波多野善大論述太平天國的一篇文章（載日文《歷史學研究》1951年3月）和小韋克曼的《1839—1861年中國南方的社會騷亂》一書的研究重點。

## 第五章 條約制度的形成

有關19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中國“開放”或者說外國入侵的資料，有著非常明顯的淵源可查。首先是英國在入侵中國的事件發生后不久就在議會文件（即藍皮書）中公布了英國一方的報道——如1840年的大藍皮書和1859年的488頁的藍皮書；這兩本藍皮書中的文件說明了英國的政策為何必須這樣發展。了解才能得到諒解，從那時起人們已理解了英國的行動。只是到最近才出現對一些證據重新評價的研究作品，例如，提出1856年駐廣州巴夏禮領事在引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謊稱“亞羅”號上掛有英國國旗之事（見第五章注42）。

中文方面的可利用資料只是在1930年才開始出版，這就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編的關于“籌辦夷務”的專集，它自1836年道光時期經咸豐和同治時期至1874年止（見下面書目中的《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和斯威舍的《1841—1861年中美關系研究》一書中的記述）。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1937年，從故宮文獻館中出版了大量有關中外關系的文獻（見費正清的《清代文獻入門提要》中的目錄）。1936年東京出版了《大清歷朝實錄》（共4485卷），所以史學家們大出意外地能夠得到迄今基本上還是保密的和體現了清政府主要意圖的官員們的重要奏折和皇帝的諭旨。不錯，有些宮廷起居注選編（像《東華錄》，以及一些重要官員奏議集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就可以得到，但其數量還不足以促進這個方面的研究，那時許多研究者也沒有根據藍皮書的豐富內容去搜索倫敦檔案局保存的材料。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40年中，中英雙方都提供了更多的文獻：倫敦檔案局中有從中國帶回的英國公使館和領事館的檔案，有機密印刷品（參見羅惠民的《外交部關于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和最近從英國駐北京大使館帶回的中文檔案（參見龐百騰著《對倫敦檔案局所藏廣東省檔案的批判性指南》）。日本在這方面也由佐佐木正哉作了貢獻，他連續公布了數卷在倫敦檔案局發現的中文材料（見浦地典子、費正清和市古宙三編的《1953年以來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

中國方面，從1950年以來臺北和北京都出版了一些內容廣泛的文獻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1954年出版齊思和編的六卷本《鴉片戰爭》一書，它竭力用文件說明人民大眾的心情和行動，以補充書中官方記載的不足。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阿英（錢杏邨的筆名）編的來源于民間的資料。

條約口岸很早就開始產生了一批論述當時中國的文獻，此傳統一直持續不衰。第一個漢學權威是德庇時爵士，他原是東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員，后來為英國駐香港的全權公使和總督，1836年他出版了兩卷本的《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論》，后來1857年出了修訂版，篇幅擴大到980頁，仍為兩卷本。那時，衛三畏的《中華帝國地理、政府、文化、社會生活、藝術和歷史概述》（兩卷本，1848年初版，第1204頁；1883年修訂版，第1611頁）一書已超過了德庇時的著作。衛三畏的著作是這類書籍中最有影響的一部。此書直接反映了1833年以來駐廣州外國人的經驗，特別是表達了早期傳教士們的觀點。這部書還利用了在廣州和澳門出版的《中國叢報》月刊（編者為裨治文和衛三畏，從1832年辦到1851年）。1845年在香港開始出版《中國差報》，1850年在上海出版《北華捷報》。所有這些報刊都刊載各種事件，同時也用來表達并保存了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看法。

由于有了這些可利用的資料，出現了一位重要的歷史學家，他就是退休的中國海關監督馬士（他在哈佛大學1874年得文學士學位，1924年得文學博士學位）。他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于1910年出版，是“藍皮書歷史”的主要經典著作。馬士有30年當晚清官員的經驗，這使得他對1834—1860年記載的論述有一定程度的現實性和（對他那個時代來說）難得的公正性。在日本，論述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已由東京大學坂野正高教授發表（參見浦地典子等人的《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中的二十多個條目）。他的主要英文著作是《1858—1861年的中國與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當然，另外一些有價值的著作已在第五章的腳注中列出。

記述通商口岸人物的著作有萊恩—普爾和迪金斯的熱情洋溢的兩卷本《巴夏禮爵士生平》，以及米基記述阿禮國爵士生平的兩卷本《維多利亞時代一位駐華的英國人》。巴夏禮與阿禮國這兩位書中人物現在應當受到重新評價。旅行記包括法國神父古伯察所著引人入勝的觀察記《一次穿越中華帝國的旅行》（兩卷本），以及英國植物學家福鈞的觀察記，他為印度獲得茶種，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三次穿越中國內地各省旅行。兩次鴉片戰爭使參戰的外國人寫下了許多回憶錄。

中國的觀察家在當時也寫下了大量的著作。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的《贏環志略》：這兩部書在19世紀40年代是作為世界地理出版的；最近倫納德、米切爾和德雷克等人對它們進行了研究。已故的張馨保研究欽差大臣林則徐的著作已在上文提及。J.Y.黃則根據倫敦檔案局的廣東省檔案研究了葉名琛大臣。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據總理衙門檔案寫了四十多種專著，主要涉及的是1860年以后的時期，但是呂實強和王爾敏等人的著作也涉及1860年以前。

論述法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作用的著作，可參看卡迪的《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關于香港本地史的著作，見恩迪科特的《1841—1962年香港的政府和人民》。上海的早期歷史尚有待研究。

然而總的來說，如果把整個有關中國和西方最初密切接觸的歷史研究工作用出版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來衡量時，史學家們在這方面似乎處于發軔階段。這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860年以后的更大事件上，部分也是由于對整個19世紀上半葉中國史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現在還沒有發現用任何文字撰寫的論述嘉慶和道光時期（1796—1850年）的重要著作。《歷史研究》雜志上的文章已經提出了問題并表明了新的看法，我們期待眾多的中國史學家們能做出成績來。

## 第六章 太平軍叛亂

由于基本資料既缺乏，又流失于全世界，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有專攻太平軍叛亂的史學。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現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論性著作。在他的帶動下，新一代有創見的史學家根據從外國博物館和圖書館新發現的許多中文資料，開始開發這個領域。在西方，1927年黑爾突破了前此從通商口岸的角度觀察這次叛亂的觀點；他的《曾國藩和太平軍叛亂》一書通過利用曾國藩全集的資料扎扎實實地用中國人的觀點來考察常勝軍。自那時以來，出現了大量的資料集和研究著作，要了解它的概貌和廣度，最好去查閱鄧嗣禹所編的優秀的批判性書目——《關于太平軍叛亂的史學》，此書對東亞文字和西方文字所寫的資料及專著都進行了評述。

研究人員還有必要參考張秀民等編的《太平天國資料目錄》，它以擁有各省的資料見長。關于地方志中的重要材料（這是了解叛亂對地方社會所起影響的唯一途徑），可參考郭廷以的《太平天國史事日志》所附的374篇書目。

自從鄧嗣禹的書目出版以來，大量重要著作問世。其中論述這次運動的最優秀的英文著作是邁克爾和張仲禮的《太平天國叛亂的歷史與文獻》。第一卷是精心研究的敘事史。第二、三卷是篇幅龐大的新譯太平天國文獻集，其范圍從主要的典籍直到片斷的曇花一現的事件。除了內容廣泛的東亞和西方文字寫的書目外，這三卷書中的評點性注釋使它成為認真研究太平天國者的必備之書。

自鄧嗣禹的書目問世以后，又出版了一部大部頭資料集，這是南京太平天國博物館根據從各省地方圖書館周密搜尋得來的資料編成的（顯然由羅爾綱指導進行）。發現了許多罕見的或未曾公布的資料，由于收集的全部資料分量過大，不能完全發表，所以出了六卷選集，即《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還發表了一部點燃太平天國叛亂的宗教小冊子的復制本，即梁阿發的《勸世良言》，這是一份人們經常討論但卻很少讀過的罕見文獻。

晚近另一些著作中有王爾敏研究李鴻章淮軍的《淮軍志》；鄧嗣禹的《太平軍叛亂和西方列強》，此書的內容大大超出了書名的范圍，也論及這次運動的許多附帶事件，包括另外一些叛亂在內；而簡又文的有長期價值的著作《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已有英文節本。其他一些可使用的資料另見第六章的腳注。

## 第七章 中俄關系，1800—1862年

已出版的有關19世紀中俄關系的書籍，著重研究的是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談判。對于中俄貿易，特別是新疆的中俄貿易。以及對固勒扎條約背景的研究則很不夠。蘇聯著作主要是試圖開脫它侵占清朝領土的罪責。中國著作則針鋒相對地予以譴責。甚至對這個題目，持任何一方觀點的人都沒有發表過分析深刻的論著。我們期待著全面了解俄國政府內部關于黑龍江問題的意見和穆拉維約夫按照官方訓令行事的程度。我們還希望了解北京怎么會容忍事態發展到讓俄國侵吞領土的地步，清政府對滿洲東北部的了解或關注的程度有多大，以及喪失領土在中國產生了什么反應。（政府對此是如何解釋的？誰關心過此事？）

對英語讀者來說，克拉布的《中國和俄國的“大賭博”》一書是研究整個中俄關系的最好著作。對1858—1860年間的談判論述最充分的是奎斯特德的《1857—1860年俄國在東亞的擴張》。徐中約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一書也很有價值。更早一些時候論述俄國合并黑龍江的優秀著作是拉文斯坦的《俄國人在黑龍江》。論述19世紀的中俄關系而以18世紀為背景的有法烏斯特的《1727—1805年俄國對華貿易及其背景》。

蘇聯的最重要著作是斯拉德科夫斯基的《1917年以前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的商業經濟關系史》和納羅契尼茨基的《1860—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巴爾蘇科夫的《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一書仍舊是研究俄國在黑龍江活動的必要資料。對于研究總的俄國對外政策來說，《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俄國對外政策》是一大貢獻。《俄國東方學史概論》叢書，提供了關于俄國漢學、蒙古學及有關學科的發展的有見識的資料。

中國關于1800—1862年中俄關系的學術成績粲然可觀，但是大半都著重談領土喪失問題，而且對俄國擴張行為的評論過分簡單。對俄國行為的大部分論述無非反映了他們的認識，即俄國人需要一個不凍港口，以及他們在中近東受到了挫折；例如，陳登元的《中俄關系述略》和曾志陵的《中東路交涉史》即是如此。陳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一書對中俄關系有較深刻的認識，它還使用了俄文材料。

最好的一本書是趙中孚的出色的研究著作《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

關于包括蒙古和新疆邊界在內的整個中俄領土問題，研究最全面的是程發軔的《中俄國界圖考》（1970年增訂版）。此書由于為清帝國提出過分要求，對清朝的藩屬的涵義作了誤解，從而損害了它自己的論據。此書和第20頁相對的那張地圖頗引人注目，它把浩罕、布哈拉、阿富汗、尼泊爾、不丹和緬甸都劃入清朝版圖。雖然如此，但此書資料豐富，如果審慎地使用，還是有所幫助的。在《中俄交界詳圖》一書中可以看到極其出色但尚欠細致的地圖。

上述趙中孚、克拉布、奎斯特德、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以及徐中約的《伊犁危機》中，都附有不同文字的參考書目，包括一些日文著作。主要的原始文獻匯集有《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和《四國新檔》（第三卷）。

## 第八章 清朝的亞洲腹地（已見上文，茲不贅）

## 第九章 清代的中興

研究清朝中興，在書目和概念方面仍然要以芮瑪麗的《同治中興》一書作為起點。至少對同治時期（1862—1874年）來說，芮瑪麗不僅僅鉆研了《大清歷朝實錄》，而且還鉆研了許多呈給皇帝的奏折匯編，更不用說許許多多次要的中文著作了。但是清代文獻性質是如此蕪雜，數量是如此龐大，以致一部描述有清一代的全面著作不可避免地會遺漏某些資料。此書較為重要的遺漏是現已發表的曾國藩和胡林翼之間的機密通信；另一些重要遺漏是已公布的地方大員的“批牘”部分，包括像曾國藩、胡林翼等督撫對地方官（府縣官員和地方統領）的呈文的“批答”。根據留存的江蘇巡撫1868—1870年文件中內容廣泛的“批牘”，奧斯科在1975年后期完成了《丁日昌在同治中興時期的江蘇》這篇優秀的耶魯大學博士論文；此文研究了芮瑪麗所研究的一個課題，即衙門胥吏的行為方式未起變化，他們仍在收稅和處理訴訟方面起重要作用。

自從《同治中興》發表以來，北京史學家公布了他們的文獻匯集，其中有些文件選自未轉移到臺北的故宮檔案和軍機處檔案（雖然清代歷朝的大部分極珍貴的文獻現在在臺北，但是同治時期的大批文件仍留在北京）。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經系統出版它所保管的總理衙門檔案。許多官員和學者的集子目前已在臺灣重印，迄今尚不易得到的許多地方志也在臺灣印行。雖然芮瑪麗未見過的資料中只有一部分現在得到了研究，但所做的新探討已足以引起爭論和提出對這一時期的新觀點。

邁克爾在他給斯佩克脫的《李鴻章和淮軍》一書所作的導言中論證說：“沒有什么真正的‘同治中興’，因為地方政權一旦建立，就得繼續下去。”但是芮瑪麗在評論斯佩克脫的這本書時（載《亞洲研究雜志》1966年2月號）指出：斯佩克脫先生本人好像在書中半途改變了他的看法，他在書中第171頁上聲稱，地方利益和帝國有利益之間的沖突“在李鴻章身上（更不要說曾國藩）也許部分地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因為在他行使的中央職能和地方職能之間不可能劃出一條清楚的界限”。此后的論著有李國祁（論劉坤一在江西）、阿謝德（論1875年之后的幾任四川總督）和貝斯（論1884—1889年期間張之洞在廣東）等人的文章，已經證實了芮瑪麗有關中央繼續擁有大權的論點。晚清督撫們的所作所為與清初的“三藩”很不一樣。皇帝在19世紀后期任免官吏的權力，像鴉片戰爭前的年代一樣，事實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魏秀梅的統計學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表明，整個光緒年間98.6%的巡撫和82.4%的總督在一省供職均不超過六年。

論述督撫以下人事政策問題的專著有兩部，它們都強調同治時期官員們日益使用“幕友”的重要性，這就是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幕府”制度》和波特的《曾國藩的私人官僚班子》。弗爾索姆使用“幕府”一詞來概括全部朝廷許可的和半正式的辦事處局（像厘金局、制造局，甚至勇營），從而把“幕府”這個特定的詞變成了一個隱喻。但是像斯佩克脫一樣，弗爾索姆也指出像曾國藩等高級官員和被他們引進半正式的政府處局的那些人之間的私人感情具有重要意義。但波特的著作論證說，盡管有這種“儒家”式的關系，但湘軍及其許多所屬單位很重視專長，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走上了“專業化”的道路。在曾國藩這位欽命統帥的推動下，內戰的危機迫使清廷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行政合理化的改革，這個行動足以促使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自強運動”發展起來。這兩部書使我們目前對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認識大為增加，盡管像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和左宗棠這些人物的經歷仍然有待于充分地評價。

芮瑪麗關于清代中興的論點遇到了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敵人》）和波拉切克（《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的最強烈的挑戰。庫恩的卓越的研究著作，不僅闡明了規模甚小的地方防衛力量在與太平軍戰爭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指出了在1864年后地方名流在縣以下的地方可能加強了治安和財政管理等方面的權力。這個重要假設必然會促進學者去探討光緒時期的浩瀚的史料，以研究各省的帝國新型軍隊在面臨動亂時的部署和官員們試圖恢復“團練”的經驗，例如在1891年長江流域普遍發生反基督教騷亂時期的這類情況就應該研究。

波拉切克甚至更加確信，清朝在19世紀60年代的勝利，只是導致紳士勢力超過官僚（包括基層官僚在內）。此外，他對甚至戰后恢復時期實行的儒家經世之道的吏治也有懷疑。他從一篇研究農村佃戶困境的優秀著作《租核》中得到了重要論據，此書是陶煦在1876年和1884年間寫成的；陶煦是江蘇的一個文人，他批評馮桂芬只是半心半意地支持減租，雖然后者1863年在江蘇東部為減賦作了很大努力。（《租核》一書首次發表于1895年，1927年由其子重印，后被鈴木智夫復印而成為他1967年的一篇文章的附錄）。這份有價值的史料連同村松祐次所編的論述江南地主租棧業的一本論文集（1970年）一起，現在值得引起研究同治時期學者們的注意，也應引起研究儒家經世之道的所有學者的注意。因為我們必須做出抉擇，要么接受，要么以某種形式修正波拉切克的這個論點：佃戶的人數在中國許多地區比勉強能自給的農村小土地所有主人數更多，從他們的立場來看，即使紳士和官吏中最想改革的人實際上也是虛偽而貪婪的，因為這些人并不關心眾多老百姓的疾苦。

## 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要研究被稱之為“自強”（或稱之為“洋務”）運動的政策和方略，奏議和諭旨仍然是基本史料。可是，雖然我們從八卷本的文獻匯編《洋務運動》（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能看到一些情況，但在為一些官員身后出版的文集中所收的半私人信件也能透露出更多的內情。這部八卷本的匯編還有另外四類：（1）雜文，例如從薛福成或鄭觀應談改革問題的文章中抽出的章節；（2）雜記，例如在王韜的幾篇上海隨筆中抽出的關于江南制造局的簡述；（3）傳記，像官僚買辦徐潤的自傳；（4）日記，如翁同龢（清帝的老師，在京畿追求權勢）的極其有價值的日記，它們對了解直到1898年年中為止的北京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總理衙門制定政策的問題，特別反映在兩位通商大臣和其他以督撫為一方同總理衙門為另一方的來往文件（附有下屬官員的文件）中。這個問題現在可以利用九卷精裝本或者十七卷平裝本的《海防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進行研究。這部資料集有時收有總署大臣們坦率直陳的半私人信件，可以用來和督撫們的私人信件（如李鴻章給丁日昌的信）相對照，進而推斷他們向清帝上疏時的動機。《海防檔》中涉及實施各種不同革新計劃的材料，可以和中國及西方的個人或報刊上的記述合起來讀：例如，包耳格所著馬格里的傳記中保存的馬氏的信件，或者在《北華捷報》或《申報》上發表的有關機器制造局和學校的報道，均可讀。

關于西方報刊的資料，可參看弗蘭克·金和克拉克合編的《1822—1911年中國沿海報紙研究指南》。關于赫德及其下屬海關稅務司的作用，可見費正清等編的《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涉及中國外交關系的幾部分海關檔案，都已譯成中文并在中國大陸出版，書名為《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北京的幾個歷史學家（如邵循正）為了研究“自強運動”，使用過這些檔案中的一些資料。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是一部很出色的綜合性資料，它把有關資料都收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他為此書所翻譯的西文材料），可惜它不大使用檔案材料和清代官員的通信。

因為我們在第十章僅僅闡述“自強運動”的一個方面，即主要為“軍事” 目的而去尋求西方技術的方面。所以下面提到的只是有關這個縮小了的論題的重要著作。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老一輩史學家主張“自強運動”是出于愛國主義，例如蔣廷黻關于“中國與歐洲的擴張”的主旨即是如此。但甚至蔣博士和與他具有同樣思想的學者們對李鴻章也并不寬恕，認為他有所謂的貪污行為，特別是認為他對中日戰爭的失敗負有責任。牟安世的內容廣博的著作《洋務運動》則把“洋務運動”放入了毛主義的史學框框，認為它是“封建官僚”向西方帝國主義屈膝投降。在19世紀60年代建立兵工廠和造船廠被看作是旨在鎮壓國內起義，是盜竊國庫的手段。此外，由于容許赫德干預中國事務及助長經濟帝國主義（特別是西方軍火商的操縱）和文化帝國主義（包括教會的宣揚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出版物），像李鴻章這樣的人就被視為賣國賊了（北京史學家研究“洋務運動”的文章有33篇，書有10部，請看林要三1966年發表的一篇史學論文）。K.H.金在《日本人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觀察》一書中指出，許多研究中國史的日本學者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就已經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來論述這次運動了。

日本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市古宙三在他1960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認為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在清朝衰亡時期是致力于保護“紳士地方利益”的保守勢力。盡管如此，市古還是相信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是關心公職的，雖然在他們的思想意識中，更重要的政治實體仍然是天朝，而不是民族—國家。波多野善大在他論述李鴻章的文章（1961年）中，同樣相信這個政治家不斷進行“軍事”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反對日本對清朝屬國朝鮮的侵略。美國史學家們也把李鴻章的改革動機當作一個爭論的問題。斯佩克脫在《李鴻章和淮軍》一書中說：“當李鴻章談論自強時，他所討論的是一般原則；當他投身于自強運動時，他是在加強他本人的勢力。”（第153頁）但是弗爾索姆認為，李鴻章雖然小心翼翼地維護他的個人權力，但同時必須把他看成一位愛國者。弗爾索姆認為，李鴻章甚至用私人財富去爭取北京的支持，也用這些財富來供養不在正式文官或綠營軍編制中的大批部屬。（這個假設現在已被李鴻章給潘鼎新的機密信件中的話所證實；這些信件是在上海發現的，已于1960年公布。）由此弗爾索姆先生得出結論說：“曾國藩在權力面前退縮，李鴻章則是伸手要權力；曾國藩力求保衛儒家文化，李鴻章則是力圖保全中國。”（《晚清時期的“幕府”制度》，第190頁。）

此后一些著作研究了與李鴻章有共同觀點的另外幾個官員，認為“儒家愛國主義”之說并非謬論。呂實強1972年論述江蘇巡撫丁日昌的專著指出，自從1864年丁日昌署理上海道臺以來，他就致力于實現一個廣義的“自強運動”，使它甚至包括國內的行政改革。王家儉1973年論述文祥的文章，也同樣證明這位清朝大臣確信（這信念形成于1864—1866年），學習造輪船甚至建設鐵路，是復興中國之所需。“儒家的愛國主義”概念在龐百騰1973年論述沈葆楨拆毀最初由外國商人在違反條約規定情況下修建的吳淞鐵路的文章中被詳加發揮。

為什么“自強運動”所辦的事業那么少，而往往又被批準得那樣慢呢？為什么已興辦的項目沒有辦得差強人意一些呢？“毛病出在何處？”托馬斯·肯尼迪的一篇史學史文章《根據最近著作試析自強運動》（載《清史問題》1974年11月號）從這個角度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進行了再考察；此文特別提及李國祁、呂實強和王爾敏的著作。此外，肯尼迪還指出了學者們中間存在著一種傾向，即超出了自強運動的成敗問題的范圍，而去研究“自強運動時期各種演變和發展傾向，力圖把這些傾向和后來20世紀的發展聯系起來”。

自強運動舉辦的事業沒有實效，而且所做之事甚少，這仍然是歷史事實，并且由于在對外戰爭中可恥地失敗，這些事實在維新和革命聲中就顯得更突出了。要進一步分析中國吸取西方力量的秘密為什么出師就不利，下述著作提供了良好的開端：（1）論慈禧朝廷中派系政爭的有吳相湘的書（1961年）、伊斯特門的文章（1965年）以及李宗桐和劉鳳翰所寫的李鴻藻傳記（1969年）；（2）論造船廠和制造局的有張玉法的文章（1971年）和托馬斯·肯尼迪的兩篇文章（1971年與1974年）；（3）論水師和陸軍訓練計劃無效能的有羅林森的書（1967年）、王爾敏的《淮軍志》（1967年）中的有關章節，以及史密斯在《近代亞洲研究》（1976年）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4）論負責沿海防務而對西方革新持漠然態度的地方官的有李國祁論劉坤一的第二篇文章（1975年）；（5）論為引進科學技術而開辦培訓學校的，有畢乃德的權威性專著（1961年）以及貝奈特關于傅蘭雅傳記性文獻書目的研究著作（1967年）。（關于“自強運動”之經濟問題的著述，見本書下一卷的書目介紹。）

##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

論述19世紀在中國的基督教布道會的書籍數量很多。可是，這類著作的絕大部分是傳教士們自己寫的，所以不難理解，其總的觀點就是傳教士們所持的觀點。只是在最近的幾十年學者們才開始使用中文資料，并從中國史的角度認真考察基督教的傳教會。這一節書目介紹的主旨在于評述這個新的研究領域方面已經取得的成就。

就用英、法和德文寫的主要書目和研究指南來說，最合適的工作起點是參看盧茨所編《基督教在華的傳教》一書中有注釋的“對輔助讀物的幾點意見”。此書未收錄兩篇有價值的作品，一本是馬錢特編的《英倫三島派往中國的新教差會檔案與記事索引，1796—1914年》，另一本是懷利編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紀念華人的回憶錄：附他們的出版物與訃告一覽》。懷利的著作收錄了新教在清帝國最初60年活動時期傳教士的中、西文出版物，并對之作了概述。論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間三百多起沖突（教案）的中文文獻全部收在吳盛德和陳增輝合編的《教案史料編目》一書中。

盡管賴德烈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從出版至今已近半個世紀，但它仍是全面概述傳教事業的最出色的西文著作。賴德烈是從寫傳教史這一有利地位出發來探討他的論題，他沒有使用中文資料。此外，他的新教的偏見也表現在許多地方。雖然如此，他的論述有充分的史料根據。而且總的來看是非常客觀的，有一部規模類似的日文著作（雖然僅以清朝為限）為佐伯好郎的《清朝基督教研究》。長期以來，人們期望中國方面能寫出一部綜述基督教傳教事業的著作來。

由非當事人對19世紀中國的新、舊教傳教運動進行的認真研究，現在剛處于開始階段。魏景星的《1842—1856年法國在中國的傳教政策》一書，探討了整個條約時期，并且廣泛使用了中國官方文獻以及法國政府和天主教會的檔案。有兩篇短的著作對新教傳教主張的不同方面進行了探討，這就是米勒的《目的和手段：傳教士在19世紀中國為武力作的辯解》（載費正清編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和福賽思的《駐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團體（1895—1905）》。近年來對新教事業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一些著名傳教士的生活和經歷。這方面的幾個例子可參看《中國論文集》。大部頭的研究著作有古利克的《伯駕與中國的開放》以及小海亞特的《19世紀山東東部的三個美國傳教士》。

新教與傳教士對太平軍叛亂的影響已經引起人們的重大興趣，特別在西方史學家們中間是這樣。這方面的開山著作是博德曼的《基督教對太平軍叛亂的思想影響》。中國學者們所寫少數幾部著重論述基督教作用的著作中，有一部是簡又文的權威作品《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邁克爾和張仲禮合編的《太平軍叛亂的歷史與文獻》第2卷和第3卷中，載有太平天國時期基督教史料的英譯文。

近些年來，對于傳教運動對中國社會起的破壞作用展開了廣泛研究。最先論述19世紀后半葉主要“教案”的是王文杰的《中國近世史上的教案》。探討反基督教思想的有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1870年）》和李恩涵的《咸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載臺北《清華學報》1967年12月號）。

總理衙門關于1860—1871年間教案的檔案，已分作兩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每輯有三大卷。總共有3209件文件，按省份排列。可參看張貴永等編《教務教案檔》。關于同治時期教案（包括1870年天津教案）的論述，見以下三部書：保羅·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1860—1870年》、呂實強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和費正清的《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57年第20卷）。卡爾森在他的《1847—1880年的福州傳教士》一書中考察了福州地區中國人和傳教士之間的摩擦。有許多對個別事件的出色研究之作見《中國論文集》。韋爾利的《1891—1900年的英國、中國和反教騷亂》、矢澤利彥的《長江流域教案的考察》（載《近代中國研究》1958年第1期）及其《長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載《近代中國研究》1960年第4期），都對1891年長江流域的騷亂作了考察。關于共產黨人對19世紀最后三十多年反基督教運動的看法，可見李時岳的《甲午戰爭前三十年間反洋教運動》（載《歷史研究》1958年第6期）。

要知道從19世紀中葉中國教徒的角度對基督教作出的有趣的觀察，可見貝奈特和劉廣京的《中國諺語中的基督教：1868—1870年時期林樂知和早期的〈教會新報〉》（載費正清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

基督教傳教運動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影響很受注意，但很少研究。關于以醫學、教育和救荒為重點的簡要介紹和分析，見小海亞特的《新教在華的傳教活動（1877—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此文載《中國論文集》1963年第17期，轉載于劉廣京編的《在華的美國傳教士》，博爾的《作為救災官員和國家改革倡導者的李提摩太》一書，對李提摩太的救濟饑荒和預防饑荒措施做了研究。

格雷格的《中國與新教的教育自治》一書，對基督教在教育領域中的活動作了概述。盧茨的《中國與基督教所辦書院一百年》一書，對晚清的基督教高等院校作了全面評述。

許多著作談到了傳教士對近代中國醫學發展的貢獻，其中最有用的仍然是王吉民和伍連德的《中國醫學史》（第二版）。基督教傳教士的戒（鴉片）煙活動常常是和教會醫院聯合進行的，探討這個問題的書有貝蒂的《新教傳教活動與中國的鴉片》（載《中國論文集》1969年，22A）。斯賓士在《1830—1910年美國的傳教活動》一文（收于鮑爾斯等編的《中國的醫學和社會》）中提出，研究傳教士在醫學方面的活動可以加深對晚清社會內部動態的了解。

關于新教參與非宗教性出版工作和它在這方面影響的有兩篇文章，即巴尼特的《長老會傳教士和在華的教會出版事業》（載《長老會歷史雜志》1971年冬季號，第49卷第4期）和《新教在中國的發展和中國人對西方的看法》（載《近代亞洲研究》1972年4月號）。貝奈特的《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一書，探討了傅蘭雅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所起的促進作用。

研究1890年前人基督教的中國改革家的著作，有科恩的《19世紀中國的“基督教”改革家》（載費正清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最先研究新教傳教士著作（尤其是《萬國公報》）對19世紀90年代改革運動之影響的作品，有王樹槐的《外人與戊戌變法》。陳啟云的《梁啟超所受的“教會教育”》（載《中國論文集》1962年第16期），研究了傳教士對一位改革領袖所起影響。

共產黨人在評價傳教士對晚清改革運動之影響時，強調文化帝國主義這一主題，丁則良的《李提摩太——一個典型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一書即其一例。

（陳書梅 譯）

# 參考書目

## （甲）書刊名稱縮寫法

[1]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

[2]CPNF I-hsin et al.，Chiao-P’ing Nien-fei fang—liieh，

奕等編：《剿平捻匪方略》

[3] CSL Ta-Ch’ing li-ch’ao shih-lu

大清歷朝實錄

[4]CYCTChung-yang yen-ehiu-yü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5]FEQ Far Eastern Quarterly and JAS

遠東季刊

[6]HCTC Feng Kuei-fen，Hsien-chih t’ang chi

馮桂芬：《顯志堂集》

[7]HFT Hai-fang tang

海防檔

[8]HJ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亞洲研究雜志

[9]HWCK Hu Lin-i，Hu Wen-chung kung i-chi

胡林翼：《胡文忠公遺集》

[10] HWHTK Liu Chin- tsao，Ch’ing-ch’ao hsüwen-hsien t’ung-k’ao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

[11]IMH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2] IWSM Ch’ing-tai ch’ou-pan i-wu shih-mo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

[13]JAH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亞洲史雜志

[14]JA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亞洲研究雜志

[15] LHCC Li Hung-chang，Li Hung-chang chih Pan Ting-hsin shu-cha

李鴻章：《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

[16]LWCK Li Hung-chang，Li Wen-chung kung ch’üan-chi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

[17] MBS Modern Asian Studies

現代亞洲研究

[18] SFLS Kuo-li Tai-wan shih-fan ta-hsiieh li-shih hsüeh-pao

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

[19]STCH Shan-tung chün-hsing chi-l üeh

山東軍興紀略

[20]STCT Chung-kuo shih-hsüeh hui Chi-nan fen-hui，Shan-tung chin-tai-shih tzu-Liao

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

[21]THL Tung-hua lu

東華錄

[22] TPTK Hsiang Ta et al.ed.，T’ai-p’ing t’ien-kuo

向達等編：《太平天國》

[23] TWCK Tseng Kuo-fan，Tseng Wen-cheng kung ch’üan-chi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

[24]TWCKIC Ting Pao-chen，Ting Wen-ch’eng kung i-chi

丁寶楨：《丁文誠公遺集》

[25] TWHK Tso Tsung-t’ang，Tso Wen-hsiang kung ch’üan-chi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

[26] YCCL Yin Keng-yün，Yü-chün chi-l üeh

尹耕云：《豫軍紀略》

## （乙）西文書目

[1 ]‘Abd al-Karim hukhārī. Histoire de l’Asie Centracee（Afghanistan，Bouhka-ra，Khiva，Khoqand）depuis les denières années du règne de Nadir Châh（1153）.jusqu’en 1233 de l’Hégire（1740—1818），tr Charles Schefer.Paris：Ernest Leroux，1876

阿布杜·卡里姆·布哈里：《1740—1818年中亞史》

[2]Academia Sinica：see Chung-yang yen-chiu-yüan

見“中央研究院”

[3]Academy of Sciences：see Chung-kuo K’o-hsüeh yüan

見“中國科學院”

[4]Adshead，S.A.M.‘Vice-regal government in Szechwan in the Kuang-hsü period’.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4（1971）41—52

阿謝德：《光緒時期四川的總督》

[5]Ahmad Shāh Naqshbandī.‘Route from Kashmír.viâ Ladakh，to Yarkand.by Ahmed Shah Nakshahbandi’，tr J.Dowson.Journal of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2（1850）372—385

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從克什米爾經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

[6]Ahmad Shāh Naqshbandī.‘Narrative of the travels of Khwajah Ahmud Shah Nukshbundee Syud who started from Cashmere on the 28th October，1852，and went through Yarkund，Kokan，Bokhara and Cabul，in search of Mr.Wyburd’.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Bengal，25.4（1856）344—358

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旅行記》

[7]Alder，G.J.British India’s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a study in imperial policy（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Imperial Studies，ⅩⅩⅤ）.London：Longmans， 1963

阿爾德：《1865—1895年英屬印度的北部邊境》

[8]Aleksandrov，V.A.Rossiia na dal’nevostochnykh rubezhakh（vtoraia polovina ⅩⅦ v）.Moscow：Nauka，1969

亞列克桑德羅夫：《17世紀后半期俄國的遠東邊境》

[9]Amales Tripathi. Trade and finance in the Bengal presidency 1793—1833.Calcutta：Orient Longmans，1927

阿馬爾斯·特利帕西：《孟加拉管區的貿易和金融》

[10]Atkinson，T.W.Travels in the region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Amoor and the Russian acquisitions on the confines of India and China. London：Hurst and Blackett，1860

阿特金森：《黑龍江上下游地區游記以及俄國人在印度和中國邊境區的收獲》

[11]Ayalon，David.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the Mamluk Kingdom：a challenge to mediaeval society.London：Vallentine，Mitchell，1956

阿亞倫：《馬木留克王國的火藥與火藥武器：對中世紀社會的一個挑戰》

[12]Ayers，William.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

[13]Banno，Masataka.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坂野正高：《1858—1861年的中國與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

[14]Barnett.Suzanne Wilson. Wei Yüan and Westerners：notes on the sources of the Hai-kuo t’u-chih.Ch’ing- shih wen-t’i，2.4（1970）

巴尼特：《魏源與西方人：〈海國圖志〉源流考》

[15]Barnett，Suzanne Wilson.Silent evangelism：Presbyterians and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1807—1860.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49.4（Winter 1971）287—302

巴尼特：《長老會傳教士和在華的教會出版事業》

[16]Barnett，Suzanne Wilson，Protestant expansion and Chinese views of the west.MAS，6.2（April 1972）129—49

巴尼特：《新教在中國的發展和中國人對西方的看法》

[17]Barnett，Suzanne Wilson.Practical evangelism：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o China，1820—1850.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1973

巴尼特：《新教的傳教事業及其向中國介紹西方文化的活動》

[18]Barsukov，Ivan. Graf Nikolai Nikolaevich Murav’ev—Amurskii Po ego pis’mam，of fitsial’nym dokumentam，razskazam sovremen nikov i pechatnym istochnikam（Materialy dlia biografii）.Moscow：Sinodal’naia Ti pografiia，1891

巴爾蘇科夫：《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

[19]Basu，Dilip.Asian merchants and Western trade：a comparative study of Calcutta and Canton， 1800—1840.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巴蘇：《亞洲商人和西方貿易：對1800—1840年加爾各答和廣州的比較研究》

[20]Bawden，Charles R The modern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and Washington：Praeger，1968

鮑登：《蒙古近代史》

[21]Bawden，Charles R.A juridical document from nineteenth-century Mongolia.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des Seminars für Sprachund Kultuw is senscha 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ät Bonn， 3（1969）225—256

鮑登：《一件19世紀的蒙古法律文書》

[22]Bays，Daniel H.‘The nature of provincial authority in late Ch’ing times：Chang Chih-tung in Canton，1884—1889’.MAS，4.4（1970）325—347

貝斯：《張之洞在廣州：清末省政本質的研究》

[23]Beattie，Hilary J.‘Protestant missions and opium in China，1858—1895’.Papers on China，22A（1969）104—333

貝蒂：《新教傳教活動與中國的鴉片》

[24]Beeching，Jack.The Chinese Opium Wars.London：Hutchinson，1975

比欽：《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

[25]Bell，Mark S.China： being a military report on the north-eastern portions of the provinces of Chih-li and Shang-tung：Nanking and its approaches；Canton and its approaches；etc，etc.Simla：1884

貝耳：《關于直隸省等地的軍事報告》

[26]Bellew，Henry Walter. History of Káshghar，in T.D.Forsyth，ed.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under command of Sir T.D.Forsyth，K.C.S.I.，C.B.，Bengal Civil Service，wit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ossessions of the Ameer of Yarkund.Calcutta：Foreign Department Press，1875

貝柳：《喀什噶爾史》

[27]Bennett.Adrian A. John Fryer：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貝奈特：《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

[28]Bernard，W.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Nemesis’from 1840 to 1843；and of the combined naval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London，2 vols.，1844

伯納德：《1840—1843年復仇女神號航行和服役紀事》

[29]Biggerstaff，Knight.The secret correspondence of 1867—1868：the views of leading Chinese statesmen regarding the further opening of China to Western influence.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2（1950）127—149

畢乃德：《中國的主要政治家關于進一步向西方勢力開放門戶的觀點》

[30]Biggerstaff，Knight.‘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an attempt to introduce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hines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25.2（May 1956） 127—149

畢乃德：《上海格致書院》

[31]Biggerstaff，Knight.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

[32]Boardman，Eugene.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851—1864.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2

博德曼：《基督教對太平軍叛亂的思想影響》

[33.]Bodde，Derk and Morris，Clarence.Law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卜德等：《中華帝國的法律》

[34]Bohr，Paul Richard.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1876—188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博爾：《作為救災官員和國家改革倡導者的李提摩太》

[35]Bonin，Charles-Eudes.‘La conquête du Petit- Tibet’，Revue du Monde Musulman，11.6（June 1910）207—231

鮑寧：《對小西藏的征服》

[36]Borovkov，A.K.‘Vakufnaia gramota 1812g.iz Kashgara’，in M.N.Tikhomirov，ed.Arkheogra ficheskii ezhegodnik za 1959 god，344—349.Moscow：AN SSSR，1960

波羅夫科夫：《喀什噶爾所出1812年的瓦庫夫文書》

[37]Boulger，Demetrius C.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KCMG.London and New York：John Lane，1908

包耳格：《馬格里傳》

[38]Bruce，Sir Frederick.Letter of 12 Jan.1864，reproduced in Ch’ingshih went’i，1.5（Apr.1967）14

卜魯斯爵士1864年1月12日書信

[39]Bügd Naǐramdax Mongol Ard Ulsyn tüüx，Ded bot’[2]：1604—1917（img uxaany akademi Tüüxiǐnxüreelen）.Ulan Bator：Ul-syn xevleliǐn xereg erxlex xoroo，1968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

[40]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History.Academia Sinica：see Chungyang yen-chiu-yii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also cited as CYCT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41]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Studies.London：London University，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17—

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

[42]Burnes，Alexander.Travels into Bokhara；being the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Cabool，Tartary，and Persia；also，narrative of a voyage on the Indus，from the sea to Lahore，with Presents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performed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Supreme Government of India，in the years 1831，1832，and 1833.London：John Murray，1834

柏尼思：《布哈拉之行》

[43]Butterfield，Fox.The legend of Sung Ching-shih：an episode in Communist historiography.Papers on China 18（1954）129—154

巴特菲爾德：《宋景詩的傳說：共產黨歷史學中的一個插曲》

[44]Cady，John F.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4

卡迪：《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

[45]Cammann，Schuyler.Trade through the Himalayas：the early British attempts to open Tibe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

坎曼：《不列顛打通西藏的最初嘗試》

[46]Carlson，Ellsworth C.The Wu-shih-shan incident of 1878，in David H.Pinkney.ed.A Festschrift for Frederick B.Artz.Durham，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1964

卡爾遜：《1878年（福州）烏石山事件》

[47]Carlson，Ellsworth C.The Foochowmissionaries，1847—188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卡爾遜：《1847—1880年的福州傳教士》

[48]Carrasco，Pedro.Land and polity in Tibe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9

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體》

[49]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see China Centenary

《在華傳教百周年會議》

[50]Chang Chih-yi.Land utilization and settlement possibilities in Sinkiang.The Geographical Review，39（1949）57—75

張志義：《新疆的土地利用和定居的可能性》

[51]Chang，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

張仲禮：《中國的紳士：在19世紀中國所起的作用》

[52]Chang，Chung- li and Michael，Franz，The Taiping Rebellion：hi 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3 vols.，1966—1971

張仲禮等：《太平軍叛亂的歷史與文獻》

[53]Chang，Hao.Theanti-foreignist role of Wo-jen，1804—1871.Papers on China，14（1960）1—29

張灝：《倭仁的排外作用》

[54]Chang，Hao.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

[55]Chang，Hsin-pao.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張馨保：《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爭》

[56]Chang Mu Men-gu-iu-mu-tszi：Zapiski o mongol’skikh kochev’iakh，tr P.S.Popov（Zapiski Imperalorskogo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pootdeleniiu etnograf ii，vol.24）.St Petersburg：IRGO，1895

張穆：《蒙古游牧記》（俄譯本，波波夫譯）

[57]Chang Te-ch’ang.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Nei-wu fu）in the Ch’ing dynastyJAS，31.2（Feb.1972）243—273

張德昌：《清朝內務府的經濟作用》

[58]Chen，Chi-yun.‘Liang Ch’i-ch’ao’s“Missionary education”：a case study of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the reformers’.Papers on China，16（1962）66—125

陳啟云：《梁啟超所受的“教會教育”》

[59]Chen，Gideon.Tseng Kuo-fan：pioneer promoter of the steamship in China.Peiping：Yenching University，1935

陳其田：《曾國藩：中國汽船業的創始者》

[60]Ch’en Ch’ing-lung.cin ve Batl kaynaklarlna göre 1828 isyanlarlndan Yakup Bey’e kadar Dou Türkistan tarihi.PhD dissertation，Ankara，1967；printed Taipei，1967

陳慶隆：《從1828年暴動到阿古柏時期的新疆史》

[61]Ch’en，Jerome.The Hsien-feng inflation.BSOAS，21（1958）578—586

陳志讓：《咸豐時代的通貨膨脹》

[62]Cheng，J.Chester.Chinese sources for the Taiping Rebellion，1850—1864.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3

鄭吉士：《太平軍叛亂的中文資料》

[63]Cheng，Ying-wan.Post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ization，1860—189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鄭英還：《中國的郵政通信及其現代化，1860—1896年》

[64]Cheong，W.E.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a reappraisal.Business History，7.1（Jan.1965）34—56

張榮洋：《對1784—1834年中國貿易和財政的再評價》

[65]Chesneaux，Jean，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謝諾：《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

[66]Chiang，Siang-tseh.The Nien Rebell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4

蔣湘澤：《捻軍叛亂》

[67]Chiang T’ing-fu，The extension of equal commercial privileges to other nations than the British after the Treaty of Nanking，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5.3（Oct.1931）422—444

蔣廷黻：《南京條約后商業特權擴及英國以外的其他國家》

[68]China，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Treaties，conventions 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Shanghai，1887

中華帝國海關編：《中外條約協定匯編》

[69]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Shanghai：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1907

《在華傳教百周年會議》

[70]China Mail.Hong Kong，weekly，1845—

《中國差報》

[71]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Foochow，1868—1872；Shanghai，1874—

《中國紀事與傳教雜志》

[72]Chinese Repository.Macao and Canton，1832—1851

《中國叢報》

[73]Ch’ings-hihwen-t’i（Problems in Ch’ing history），Society for Ch’ing Studies（Jonathan Spence et al.ed.）New Haven，Connecticut，May 1965—

《清史問題》（斯賓士編），紐黑文，康涅狄格

[74]Chiu，Hungdah.‘Comparison of the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Chinese views of unequal treaties’in J.A.Cohen，ed.China’s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aw：some case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邱宏達：《中國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對不平等條約看法的比較》

[75]Chu，Clayton H.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books，articles and pamph lets extracted from the subject catalogue of the 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3 vols.1960

克雷敦·朱：《在華的美國傳教士：傳教士圖書館所藏著作、論文和小冊子目錄》

[76]Ch’ü，T’ung-tsu.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The Hague：Mouton，1961

瞿同祖：《傳統中國的法律和社會》

[77]Ch’ü.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aper repri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翟同祖：《清代中國的地方政府》

[78]Clubb，O.Edmund.China and Russia：the‘great ga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

克拉布：《中國和俄國的“大賭博”》

[79]Clyde，Paul H.and Beers，Burton F.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Western impacts and Eastetn responses，1830—1973.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6th edn，1975

克萊德等：《遠東：西方影響及東方反應的歷史，1830—1973年》

[80]Cohen，Myron L.‘The Hakka or“Guest People”：dialect as a sociocultur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Ethnoh istory，15.3（1968）237—292

邁隆·科恩：《作為中國東南地區社會文化變種的客家方言》

[81]Cohen Paul A.‘Missionary approaches：Hudson Taylor and Timothy Richard’.Papers on China，11（1957）43—52

保羅·科恩：《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傳教方法》

[82]Cohen，Paul A.‘The anti-Christian tradition in China’.JAS，20.2（Feb.1961）169—175

保羅·科恩：《中國的反基督教傳統》

[83]Cohen，Paul A.‘Some sources of antimissionary senti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2（1962）4—9

保羅·科恩：《關于清末反傳教士情緒的一些資料》

[84]Cohen，Paul A.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 foreignism，1860—187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保羅·科恩：《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1870年》

[85]Cohen，Paul A.‘Ch’ing China：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1850—1900’in James Crowley，ed.Modern East Asia：essays in interpretation.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1970

保羅·科恩：《清代中國與西方的沖突：1850—1900年》

[86]Cohen，Paul A.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保羅·科恩：《王韜與清末的改革》

[87]CohenP.aul A.‘Littoral and hinterland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Christian” reformers’in J.K.Fairban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保羅·科恩：《19世紀中國的“基督徒”改革家》

[88]Collingwood，R.G.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科林伍德：《歷史的概念》

[89]Collins，P.M.A voyage aown the Amoor.New York：D Appleton＆Company，1860

科林斯：《沿阿穆爾河而下的航行》

[90]Collins，P.M.Siberian fourney dow nthe Amur to the Pacific 1856—1857，ed.Charles Vevier.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2

科林斯：《1856—1857年沿黑龍江直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亞之行》

[91]Collis，Maurice.Foreign mud.London：Faber and Faber，1946

科利斯：《外國泥淖》

[92]Cordier，Henri.‘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T’oung Pao，2.3（1902）281—315

考爾迭：《廣州行商》

[93]Cordier，Henri.Bibliotheca Sinica：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 f s de l’empire Chinois，2nd edn，Paris：E.Guilmoto，4 vols.，1904—

考爾迭：《中國研究論著綜錄》

[94]Costin，W.C.Great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7

科斯廷：《1833—1860年的英國與中國》

[95]Cressey，George B.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New York：McGraw Hill，1934

克雷西：《中國的地理基礎》

[96]Cressey，George B.Land of the 500 million.New York：McGraw Hill，1955

克雷西：《五億人的國土》

[97]Crowley，James B.，ed.Modern East Asia：essays in interpreta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World，1970

克勞利：《近代東亞論文集》

[98]Cunningham，Alexander.Ladák physical，statistical，and historical，with notices of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New Delhi：Sagar Publications，1970；first published 1854

坎寧漢：《從自然、統計和歷史角度看拉達克，兼及其毗鄰諸國》

[99]Curwen，C.A.，ed.Taiping Rebel：The Deposition of Li Hsiuch’e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卡爾溫編：《李秀成的供詞》

[100]Dabbs，Jack A.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Central Asiatic Studies，8）.The Hague：Mouton，1963

戴布斯：《中國突厥斯坦的發現與探險史》

[101]Danibegashvili，Rafail.Puteshestvie Ra faila Danibegashvili，ed.L.I.Maruashvili.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geograficheskoi literatury，1961

達尼別加什維里：《達尼別加什維里旅行記》

[102]Das，Sarat Chandra.‘The monasteries of Tibet’，Journal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4（1905）106—116

錢德拉·達斯：《西藏的寺院》

[103]Davies，R.H，comp.Report on the trade and resources of the countries on the northwestern boundary of British India.Lahore：The Government Press，1862

戴維斯編：《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

[104]Davis，（Sir）John Francis.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New York：Harper，2 vols.，1836；revised edn 1857

德庇時：《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論》

[105]Dean，Britten.‘Sino-British diplomacy in the 1860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 at Hankow’.HJAS，32（1972）71—96

迪安：《漢口英租界的建立》

[106]Dean，BrittenC.hina and Great Britain：the diplomacy of commercial relations，1860—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迪安：《中國與英國1860—1864年的商業外交》

[107]Dermigny，Louis.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ⅩⅤⅢe siècle 1719—1833.Paris S.E.V.P.E.N.，3 vols.and folio，1964

德米尼：《中國與西方：18世紀的廣州貿易》

[108]Drake，Bill.The cultivator’s handbook of marijuana.Berkeley，California：Book People，1970

德雷克：《大麻種植者手冊》

[109]Drake，Fred W.‘A mid-nineteenth-century discovery of the non Chinese World’.MAS，6.2（April 1972）205—24

德雷克，F.W.：《19世紀中葉非中國人世界的發現》

[110]Drake，Fred W.China charts the world：Hsü Chi-yii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德雷克，F.W.：《徐繼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學》

[111]Duman，L.I.Agrarnaia politika Tsinskogo（manchzhurskogo）pravitel’stvav Sin’tsziane v kontse ⅩⅤⅢ veka（Agrarian policy of the Ch’ing[Manchu]government in Sinkiang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Moscow and Leningrad：AN SSSR，1936

杜曼：《18世紀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

[112 ]Duman，L.I.‘Zavoevanie Tsinksoi imperiei Dzhungarii i Vostochnogo Turkestana’（Conquest of Zungharia and Eastern Turkestan by the Ch’ing empire），in S.L.Tikhvinskii，ed.Man’chzhurskoe vladychestvo v Kitae（Manchu dominion in China），264—88（AN SSSR，Institut Narodov Azii）.Moscow：Nauka，1966

杜曼：《清帝國對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的征服》

[113]Dunne，George A.Generation of giants：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Notre Dame，Ind.：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62

鄧恩：《明末的耶穌會士》

[114]Duus，Peter.Science and salvation in China：the life and work of W.A.P.Martin，1827—1916.Papers on China，10（1956）97—127

彼得·杜斯：《科學和在中國拯救靈魂的工作：丁韙良的生平和工作》

[115]Eastman，Lloyd E.‘Ch’ing-i and Chinese Policy form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JAS，24.4（1965）595—611

伊斯特門：《19世紀清議和中國政策的形成》

[116]Ebisawa，Arimichi，comp.Christianity in Japan：a bibliography.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ources.Tokyo：Committee on Asian Cultural Studies，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1960

海老澤有道（音）編：《基督教在日本：日文和中文史料目錄》

[117]Edkins，Joseph.Letter of 2 May 1851，in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15.205—206

艾約瑟1851年5月2日的一封信

[118]D’Elia，Paschal M.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a short sketch of the h 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the earliest records to our own days.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4

戴里亞：《中國天主教簡史》

[119]Endacott，G.B.A history of Hong Kong.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恩迪科特：《香港史》

[120]Endaeott，G.B.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1841—1962：a constitutional history.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4

恩迪科特：《1841—1962年香港的政府和人民》

[121]Evans.Nancy.‘The banner-school background of the Canton T’ung-wen kuan’.Papers on China，22A（May 1969）89—103

伊凡斯：《廣州同文館的旗校背景》

[122]Fairbank，John K.Trade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 vols.，1953；paper repri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

[123]Fairbank，John K.‘Patterns behind the Tientsin Massacre’.HJAS，20（1957）

費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

[124]Fairbank，John 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125]Fairbank，John K.‘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費正清：《中國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條約制度》

[126]Fairbank，John K.Ch’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3rd edn；reprinted with index added，1970

費正清：《清代文獻入門提要》

[127]Fairbank，John 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3rd edn，1971

費正清：《中美關系史》

[128]Fairbank，John 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費正清編：《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

[129]Fairbank，John K.，Bruner，Katherine Frost and Matheson，Elizabeth Macleod，eds.The IG 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K.Littl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 vols.，1975

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1868—1907年的中國海關》

[130]Fairbank，John K.，Reischauer，Edwin O.and Craig，Albert M.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 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

費正清等編：《東亞的傳統和變化》

[131]Far Eastern Quartery（late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Inc.1941—1956

《遠東季刊》（后改名《亞洲研究雜志》）

[132]Fay，Peter Ward.‘The French Catholic Mission in China during the Opium War’.MAS，4.2（1970）115—128

費伊：《鴉片戰爭時期的法國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

[133]Fay，Peter Ward.The Opium War 1840—1842.Barbarian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war by which they forced her gates aj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

費伊：《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

[134]Feetham，Richard.Report of Richard Feetham，Judg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Shanghai：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Ltd，1931

費塔姆：《費塔姆對上海工部局的報告》

[135]Feuerwerker，Albert，Murphey，Rhoads，Wright，Mary C，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費維愷：《中國近代史考察》

[136]Fletcher，Joseph.‘China and Central Asia，1368—1884’，in J.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206—24，337—368

弗萊徹：《1368—1884年的中國和中亞》

[137]Folsom，Kenneth E.Friends，guests，and colleagues：the‘mu-fu’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弗爾索姆：《晚清時期的“幕府”制度》

[138]Forsythe，Sidney A.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1895—190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福賽思：《駐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團體，1895—1905年》

[139]Fortune，Robert.Three years’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including avisit to the tea，silk，and cotton countries：with an accou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new plants，etc.London，1847

福鈞：《在華北諸省三年的游歷》

[140]Fortune，Robert.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including Sunglo and the Bohea Hills...London，1852

福鈞：《對中國茶鄉的一次旅行》

[141]Fortune，Robert.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London，3rd edn，2 vols，1853

福鈞：《對中國茶鄉的兩次參觀》

[142]Fortune，Robert.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inland，on the coast and at sea.Being a narrative of scenes and adventures during a third visit to China，from 1853 to 1856.London，1857

福鈞：《在中國人中間居住：1853—1856年在華見聞錄》

[143]Foust，Clifford M.Muscovite and Mandarin：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1727—1805.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

法烏斯特：《1727—1805年俄國的對華貿易及其背景》

[144]Francke，A.H.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one of the unknown empires.London：S.W Partridge＆Company，preface 1907

弗蘭克：《西藏西部史》

[145]Fryer，JohnL.etters of 1 Apr.1896 and 1 July 1898，in Fryer Paper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y（Berkeley）

傅蘭雅1896年4月1日和1898年7月1日的兩封信

[146]Fu，Lo-shu.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1644—1820），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and Papers，No.22.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6

傅樂淑：《中西關系文件匯編（1644—1820年）》

[147]Gallagher，Louis J.，t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 83—1610.New York：Random House，1953

加拉格爾譯：《利瑪竇日志》

[148]Gankovskii，Iu.V.Imperiia Durrani：Ocherk administrativnoi i voennoi sistemy.Moscow：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1958

甘科夫斯基：《杜蘭尼人的帝國》

[149]Gapanovich，J.J.‘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Amur’，The China Journal，15.4（Oct.1931）173—182

加帕諾維奇：《俄國在黑龍江的擴張》

[150]Garanin，I.P.‘Kitaiskii antikhristianskii lubok ⅩⅨv.’（Chinese anti-Christian folk pictures of the 19th century）.Ezhegodnik Muzeia Istorii Religii i Ateizma（Annual of th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of Atheism），4（1960）403—426

加拉寧：《19世紀中國反基督教的民間圖片》

[151]Gerson，Jack L.Horatio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1854—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格爾森：《李泰國與中英關系》

[152]Giquel，Prosper.The Foochow arsenal and its results（H.Lang tr，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Shanghai，1874

日意格：《福州兵工廠及其成果》

[153]Golomb，Ludwig.Die Bodenkultur in Ost-Turkestan：Oasenwirtschaft und Nomadentum（Studia Instituti Anthropos，vol.14）.Posieux，Freiburg，Switzerland：Anthropos-Institut，1959

哥隆布：《東突厥斯坦的耕種：綠洲經濟和游牧》

[154]Goodrich，L，C.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New York：Waverly Press Inc.，1935；reprint，1966

富路特：《乾隆時期的文字獄》

[155]Greenberg，Michael，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

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

[156]Gregg，Alice H.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1807—1937.Syracuse，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46

格雷格：《中國與新教的教育自治，1807—1937年》

[157]Gregory，J.S.Great Britain and the Tai pings.New York and Washington：Praeger，1969

格雷戈里：《英國與太平軍》

[158]Griffith，Samuel B.Sun Tzu：theart of war.Oxford：Clarendon Press，1963

格里菲思：《孫子兵法》

[159]Grigor’ev，V.V.‘Vostochnyi ili Kitaiskii Turkestan’（Eastern or Chinese Turkestan）in V.V.Grigor’ev，Zemlevedenie K.Rittera：Geograftia Stran Azii nakhodiashchikhsia v neposredstvennykh snosheniiakh s Rossieiu，Vypusk 2，Otdel 1，vi，525 and 1 map（facing p.60）.St Petersburg：IRGO，1873

格里戈里耶夫：《東突厥斯坦或中國突厥斯坦》

[160]Gross，George W.‘Ho Ch’ang-ling and the 1825 debate over shipment of the imperial grain tax’.University of Chicago，Department of History，unpublished paper，1970

格羅斯：《賀長齡與1825年關于皇糧運輸的辯論》

[161]Grosse-Aschhoff，Angelus.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ying and Lagrené，1844—1846.St Bonaventure，New York：Franciscan Institute；Louvain，Belgium：E.Nauwelaerts，1950

格羅士—阿肖夫：《耆英與拉萼尼的談判》

[162]Grumm-Grzhimailo，G.E.Zapadnaia Mongoliia i Uriankhaiskii krai：Western Mongolia and the Uriankhai Country，vol.2：Istoricheskii ocherk etikh stran v sviazi s istoriei Srednei Azii：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se countries in connectionwith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Leningrad：Gosudarstvennoe Russkoe Geograficheskoe Obshchestvo，1926

格魯姆-芝邁洛：《蒙古西部和烏梁海邊區》

[163]Gulick，Edward V.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古利克：《伯駕與中國的開放》

[164]Hail，William J.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and London：H.Milford，1927

黑爾：《曾國藩與太平軍叛亂》

[165]Handbook on People’s China.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7

《人民中國手冊》

[166]Hao，Yen-P’ing.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

[167]Hart，Robert.‘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London：Chapman＆ Hall，1901

赫德：《關于中國問題的論文集》

[168]Hartmann，Martin.‘Ein Heiligenstaat im Islam：Das Ende der Caghataiden und die Herrschaft der Chogas in Kašgarien’，in M.Hartmann，Der islamische Orient：Berichte und Forschungen，pts.6—10，195—374.Berlin：Wolf Peiser Verlag，1905

哈特曼：《察哈臺汗的終結與和卓在喀什噶爾的統治》

[169]Hartmann，MartinD.er islamische Orient：Berichte und Forschungen.Berlin：Wolf Peiser Verlag，19O5

哈特曼：《伊斯蘭東方的報告和研究》

[17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1936—

《哈佛亞洲研究雜志》

[171]Heissig，Walther.Fin Volk sucht seine Geschichte：die Mongolen und die verlorenen Dokumente ihrer grossen Zeit.Düsseldorf and Vienna：Econ-Verlag，1964

海希格：《蒙古人及其偉大時代的佚文》

[172]Heissig，Walther.‘Die Religionen der Mongolei’，in Giuseppe Tucci and Walther Heissig，Die Religionen Tibets und der Mongolei，293—428.Stuttgart：Kohlhammer，1970

海希格：《蒙古的宗教》

[173]Heissig，Walther.Geschicht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Wiesbaden：Harrassowitz，2 vols.，1972

海希格：《蒙古文學史》

[174]Helmersen，Gregor von，ed.‘Nachrichten über Chiwa，Buchara，Chokand und den nordwestlichen Theil des chinesichen Staates，gesammelt von dem Präsidenten der asiatischen Grenz-Commission in Orenburg，General-Major Gens’.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s Russischen Reiches und der angrenzenden LänderAsiens，series 1，2（1839）vi，123 and 1 map

赫爾麥森：《關于基發、布哈拉、浩罕和中國西北的報告》

[175]Hesei toktobuha Tulergi golo-be dasara jurgan-i kooli hacin-i bithe（Manchu version of Ch’in-ting Li-fan Yüan tse-li，q.v.）

滿文本《欽定理藩院則例》

[176]Hesei toktobuha tulergi Monggo Hoise aiman-iwang gung-sai iletun ulabun（commissioned 1779；Manchu version of Ch’in-ting wai-fan Meng-ku Hui-pu wang kung piao chuan，q.v.）

滿文本《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

[177]Hinton，Harold C.‘Grain transport via the Grand Canal，1845—1901’.Paperson China，4（April 1950）

欣頓：《經由運河的漕運》

[178]Hinton，Harold C.‘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the Ch’ing dynasty’.FEQ，11.3（May 1952）339—354

欣頓：《清代的漕運制度》

[179]Hinton，Harold C.The grain tribute syste mof China，1845—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

欣頓：《1845—1911年中國的漕糧稅制》

[180]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何炳棣：《中國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

[181]Ho，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aper edn，1964

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1368—1911年》

[182]Ho，Ping-ti.‘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AS，26.2（Feb.1967）189—195

何炳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

[183]Ho，Ping-ti and Tsou，Tang，eds.China in crisi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 vols.，1968

何炳棣等編：《中國的危機》

[184]Holt，Edgar.The Opium Wars in China.London：Putnam，1964

賀爾特：《在中國進行的鴉片戰爭》

[185]Hsiao，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肖公權：《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

[186]Hsü，Immanuel C.Y.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徐中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1880年》

[187]Hsü，Immanuel C.Y.The Ili crisis：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徐中約：《伊犁危機，1871—1881年》

[188]Hsü，Immanuel C.Y.The rise of modern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nd edn，1975

徐中約：《近代中國的興起》

[189]Hu，Ch’ang-t’u.‘The Yellow Riv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Ch’ing dynasty’.FEQ，14.4（Aug.1955）505—513

胡昌度：《清代的河政》

[190]Hu，Sheng.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5

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

[191]Huc，Evariste，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New York，2 vols.，1855

古伯察：《一次穿越中華帝國的旅行》

[192]Hucker，Charles O.China’s imperial past：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賀凱：《中國歷史與文化導論》

[193]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 vols.，1943—1944；New York：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1964

恒慕義編：《清代名人傳》

[194]Hung，William.‘Huang Tsun-hsien’s poem“The closure of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in America.”translated and annotated’.HJAS，18（1955）50—73

洪煨蓮譯注：《黃遵憲的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

[195]Hyatt，Irwin T.，Jr.‘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77—1890）：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Papers on China，17（1963）67—100

小海亞特：《新教在華的傳教活動（1877—1890年）：慈善工作的制度化》

[196]Hyatt，Irwin T.，Jr.‘The Chengtu riots（1895）：myths and politics’.Papers On China，18（1964）26—54

小海亞特：《1895年成都的騷動》

[197]Hyatt，Irwin T.，Jr.‘The missionary as entrepreneur：Calvin Mateer in Shantung’.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49.4（Winter 1971）303—27

小海亞特：《山東的狄考文牧師》

[198]Hyatt，Irwin T.，Jr.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three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小海亞特：《19世紀山東東部的三個美國傳教士》

[199]Imbault-Huart，Camille，tr.Recueil de documents sur l’Asie centrale（Publications de 1’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16）.Paris：Ernest Leroux，1881

伊姆波爾特—胡阿特譯：《中亞文件匯編》

[200]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see Chung-yang yen-chiu-yü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Irick，Robert Lee.‘Ch’ing policy toward the coolie trade，1847—1878’.Harvard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1971

艾里克：《1847—1878年清朝對苦力買賣的政策》

[202]Istoriia Mongol’skoi Narodnoi Respubliki，2nd edn.Moscow：Nauka，1967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

[203]Istoriia Uzbekskoi SSR，Vol.1：Sdrevneishykhvremen do serediny ⅩⅨ veka（AN UzSSR，Institut istorii i arkheologii）.Tashkent：Fan，1967

《烏茲別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史》

[204]‘Izzat Allāh.Mir.’Travels in central Asia by Meer Izzut-Oollah in the years 1812—1813，tr.P.D.Henderson.Calcutta：Foreign Department Press，1872

米爾·伊扎特·阿拉：《1812—1813年中亞游記》（亨德森英譯）

[205]Jarligh-iyar toghtaghaghsan ghadaghadu Mongghol Khotong ayimaghun wang güng-üd-ün iledkel shastir（commissioned 1779；Mongolian version of Ch’iirting wai-fan Meng-ku Hui-puwang kung piao chuan，q.v.）

蒙文本《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

[206]Jarligh-iyar toghtaghaghsan Ghadaghadu Mongghol-un törö-yi jasakhu yabudal-un yamun-u khuuli Jüil-ün，bichig（Mongolian version of Ch’inting Li-fan Yüan tse-li，q.V.）

蒙文本《欽定理藩院則例》

[207]Jarring，Gunnar.‘A note on Shamanism in Eastern Turkestan’.Ethnos，1961，nos.1—2，pp.1—4

賈林：《記東突厥斯坦的薩滿教》

[208]Jen，Yu-wen.The Tai 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New H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簡又文：《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209]Jones，Susan Mann.‘Finance in Ningpo：the Ch’ien chuang，1750—1880’，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瓊斯：《寧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錢莊》

[210]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nn Arbor，Michigan，1956—

《亞洲研究雜志》

[211]Kamachi，Noriko，Fairbank，John K.and Ichiko，Chūzō.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浦地典子等：《1953年以來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

[212]Kennedy，Thomas L.‘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Kiangnan Arsenal，1860—1895’.Columbi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1968

托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創建和發展》

[213]Kennedy，Thomas L.‘Industrial metamorphosis in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Li Hung-chang and the Kiangnan shipbuilding program.’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4.1（1971）215

托馬斯·肯尼迪：《李鴻章與江南造船廠的計劃》

[214]Kennedy，Thomas L.‘Self-stréngthening：an analysis based on some recent writings’.Ch’ing-shih wen-t’i 3.1（Nov.1974）3—35

托馬斯·肯尼迪：《根據最近著作試析自強運動》

[215]Kennedy，Thomas L.‘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military industry in China.1860—1868’.CYCT，4.2（Dec.1974）779—823

托馬斯·肯尼迪：《1860—1868年中國現代軍火工業的創建》

[216]Kessler，Lawrence D.‘Ethnic composition of provincial leadership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JAS，28.3（May 1969）489—511

凱斯勒：《清代省一級領導班子的種族成分》

[217]Khōqandī，Mullā Niyāz Muhammad b.Mullā‘Ashūr Muhammad Tārikh-i Shahrukhi.ed.N.N.Pantusov.Kazan：Tipografiia Imperatorskogo Universiteta，1885

和罕迪：《沙勃魯希史》

[218]Khurlat，V.V.，comp.Bibliografiia rabot po Mongolii：Ukazatel’knig i statei na russkom i drugikh evropeiskikh iazykakh.postupivshikh v Gosudarstvennuiu Publichnuiu biblioteku po 1957 god vkliuchitel’no.Ⅰ-Ⅲ（Gos-udarstvennaia Publichnaia biblioteka MNR）.Ulan Bator：imginimglex Uxaany Akademiin xevlel.1962—1963

胡爾拉特編：《有關蒙古的著作書目》

[219]Kibirov，Sh.and Iu.Tsunvazo，eds.‘Uigursko-russkii slovar’.Alma-Ata：Izdatel’stvo AN KazSSR，1961

基比洛夫等編：《維吾爾文—俄文詞典》

[220]Kim，K.H.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1860—1895，a bibliographical surve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4

K.H.金：《日本人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觀察》

[221]King，Frank H.H.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845—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弗蘭克·金：《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

[222]King，Frank H.H.and Clarke，Prescott.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1822—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弗蘭克·金、普雷斯科特·克拉克：《1822—1911年中國沿海報紙研究指南》

[223]Kling，Blair B.‘The origin of the managing agency system in India’.JAS 26.1（Nov.1966）37—48

克令：《印度代辦制度的起源》

[224]Kryzhanovskii，V.，ed.‘Perepiska Nachal’nika Pekinskoi Dukhovnoi Missii Arkhimandrita Palladiias General-Gubernatorom Vostochnoi Sibiri Gr.N.N.Murav’evym-Amurskim’.Russkii arkhiv，10（1914）155—206

克里占諾夫斯基編：《駐北京傳教士團團長鮑乃迪與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的通信》

[225]Kuhn，Philip A.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

[226]Kuo，Pin-chia.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with documents.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5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

[227]Kuropatkin，A.N.Kashgariia：istoriko-geograficheskii ocherk strany，eë voennye sily，promyshlennost’i torgovlia.St Petersburg：IRGO，1879

庫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

[228]Kuropatkin，A.N.Kashgaria：Easternor Chinese Turkistan：historical and geogra phical sketch of the country，its military strength，industries and trade，tr.Walter E.Gowan.Calcutta：Thacker，Spink and Co.，1882

庫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英譯本）

[229]Kuznetsov，V.S.‘O reaktsionnoi sushchnosti dvizheniia Dzhangira’（On the reactionary nature of Jahāngir’s movement）.Izvestiia Akademii Nauk Kazakhskoi SSR，Seriia istorii，arkheologii i etnografii，No.1（15）（1961）70—91

庫茲涅佐夫：《論張格爾運動的反動實質》

[230]Kuznetsov，V.S.‘K voprosu o politike Tsinskogo pravitel’stva v Vostochnom Turkestane vo vtoroi chetverti ⅩⅨ v.’（On the question of the Ch’ing government’s policy in Eastern Turkestan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zvestiia Akademii Nauk Kazakhskoi SSR，Seriia istorii，arkheologii i etnografii，no.2（16）（1961）54—64

庫茲涅佐夫：《19世紀第二個25年期間清政府對東突厥斯坦的政策》

[231]Kuznetsov，V.S.‘Ekonomicheskaia politika Tsinskogo pravitel’stva v Sin’tsziane v pervoi polovine ⅩⅨ veka’（Economic policy of the Ch’ing government in Sinkia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zvestiiaAkademii Nauk Kazakhskoi SSR，Seriia istorii，arkheologii i etnografii，no.3（17）（1961）78—89

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

[232]Kuznetsov，V.S.（summarized）.‘Tsin administration in Sinkia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entral Asian Review，10.3（1962）271—284

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對新疆的行政管理》

[233]Kuznetsov，V.S.‘K voprosu o torgovle Anglii i Rossii s Sin’tszianom v pervoi polovine ⅩⅨ veka’（On the question of the trade of England and Russia with Sinkia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zvestiia Akademii Nauk Kazakhskoi SSR，Seriia obshchestvennykh nauk，6（1963）20—30

庫茲涅佐夫：《關于19世紀上半葉英、俄兩國同新疆貿易的問題》

[234 ]Kuznetsov，V.S.Ekonomicheskaia politika Tsinskogo pravitel’stv av Sin’tsziane v pervoi polovine ⅩⅨ veka（Economic policy of the Ch’ing government in Sinkia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AN SSSR.Institut Dal’nego Vostoka）.Moscow：Nauka，1973

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

[235]LaFargue Thomas E.China’s first hundred.Pullman：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1942

拉法爾格：《中國首批百名學生》

[236]Lamb，Alastair.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0

拉姆：《不列顛與中國的中亞：1767—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

[237]Lamb，Alastair.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s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拉姆：《中印邊境爭議的淵源》

[238]Lane-Poole，Stanley and F.V.Dickins.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London：Macmillan，2 vols.，1894

萊恩—普爾等：《巴夏禮爵士生平》

[239]Latourette，Kenneth Scott.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929

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

[240]Latourette，Kenneth Scott.The great century in northern Africa and Asia AD 1800—AD 1914，in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vol.6.New York：Harper，1944

賴德烈：《1800—1914年基督教在北非和亞洲的傳布》

[241]Lattimore，Owen.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2nd edn.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51

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腹地邊疆》

[242]Lattimore，Owen.Nomads and commissars：Mongolia revisit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拉鐵摩爾：《重訪蒙古》

[243]Launay，Adrien.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Paris：Société des Missions-Etrangéres，1903—1917

勞內：《在華傳教史》

[244]LeFevour，Edward.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Matheson＆ Company’s operations 1842—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勒菲弗爾：《1842—1895年的怡和洋行》

[245]Lee，Robert H.G.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

[246]Legge，James，tr.The Chinese classic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

《李雅各英譯七經》

[247]Leonard，Jane Kate.‘Chinese overlordship and Western penetration in maritime Asia：a late Ch’ing reappraisal of Chinese maritime relations’.MAS，6.2（April 1972）151—174

倫納德：《中華帝國與西方對亞洲海岸的侵入》

[248]Leonard，Jane Kate.‘Statecraft reform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a’.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Boston，April 1974

倫納德：《19世紀初期中國經世致用論者的改革》

[249]Levenson，Joseph R.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the problem of monarchical deca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8

列文森：《儒家的中國及其現代的命運》

[250]Levering，Miriam.‘The Chungking riot of 1886：justice and ideological diversity’.Papers on China，22A（1969）158—83

列維林：《1886年的重慶騷動》

[251]Levy，Howard S.Chinese footbinding：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New York：Rawls，1966

列維：《中國的纏足：一種引起性愛的奇異風俗》

[252]Liu，Kwang-Ching.‘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JAS，20.1（Nov.1960）71—78

劉廣京：《中國的早期基督教書院》

[253]Liu，Kwang-Ching.Americans and Chinese：a historical essay and a bibliogra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劉廣京：《美國人和中國人：一篇歷史文章及書目》

[254]Liu，Kwang-Ching，ed.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劉廣京編：《在華的美國傳教士》

[255]Liu，Kwang-Ching.‘Li Hung-chang in Chihli：the emergence of a policy，1870—1875’，in Albert Feuerwerker，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Wright，eds.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pp.68—10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

[256]Liu，Kwang-Ching.‘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ord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West’，in P.T.Ho and Tang Tsou，eds.China in crisis，pp.93—178.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劉廣京：《19世紀的中國：舊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響》

[257]Liu，Kwang-Ching.‘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Li Hungchang’s formative years，1823—1866’.HJAS，30（1970）14—22

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

[258]Liu，Kwang-Ching.‘The limits of regional power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a reappraisal’.Ch’ing-hua hsueh-pao，NS，10.2（July 1974）176—207（in Chinese），207—223（in English）

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

[259]Liu，Kwang-Ching.‘Politics，intellectual outlook and reform：the T’ung-wen kuan Controversy of 1867’，in Paul A.Cohen and John E.Schrecker，eds.Refor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劉廣京：《1867年的同文館之爭》

[260]Lo，Hui-min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apers relating to China and 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1840—1914 with an additional list 1915—1937.The Hague and Paris：Mouton，1969

羅惠民：《外交部關于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1840—1914年》

[261]Lobanov-Rostovsky，A.Russia and Asia.New York：Macmillan，1933

羅班諾夫-羅斯托夫斯基：《俄國與亞洲》

[262]Lockwood，Stephen C.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1858—186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洛克伍德：《1858—1862年的赫得公司》

[263]Lojewski，Frank A.‘Confucian reformers and local vested interests the Su-Sung-T’ai tax reduction of 1863 and its afterma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Davis，1973

洛日烏斯基：《1863年蘇松太減賦問題及其后果》

[264]Lui，Adam Yuen-chung.‘The Han-lin Academy：a biographical approach to career patterns in the early Ch’ing，1644—1795’.University of London PhD dissertation，1968

呂元聰：《清代初年的翰林院》

[265]Lutz，Jessie G.，ed，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evangelists of what？ Boston：Heath，1965

盧茨編：《基督教在華的傳教》

[266]Lutz，Jessie G.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盧茨編：《1850—1950年中國與基督教所辦書院一百年》

[267]Macdonald，David.The land of the lama.London：Seeley，Service and Co.，1929

麥克唐納：《喇嘛的土地》

[268]MacGillivray，D.，ed.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

麥吉利夫雷編：《新教在華傳教一百周年（1807—1907年）紀念會議歷史文集》

[269]Maidar，D.Arkhitektura i gradostroitel’stvo Mongolii：Ocherki po istorii.Moscow Stroiizdat，1971

馬伊達爾：《蒙古的建筑學與城市建筑》

[270]Maiskii，Ivan Mikhalovich.Mongoliia nakanune revoliutsii.Moscow：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1959

邁斯基：《革命前夕的蒙古》

[271]Mancall，Mark.Russia and China，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曼考爾：《1728年以前俄中兩國的外交關系》

[272]Marchant，Leslie R.A guide to the archives and records of Protestant Christian missions from the British Isles to China，1796—1914.Nedlands：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1966

馬錢特：《英倫三島派往中國的新教差會檔案與記事索引，1796—1914年》

[273]Margulan，A.Kh.‘Ocherk zhizni i deiatc fnosti Ch.Ch.Valikhanova’，in Ch.Ch.Valikhanov，Sobranie sochinenii，1.9—103

馬爾古蘭：《瓦里哈諾夫的生平事跡》

[274]‘Marshrut ot goroda Turfana do Kashkara po slovam kitaiskogo poddanogo Ma-Tiang-Shi，zhitelia pervogo iz sikh gorodov’，Russkii arkhiv，10（1914）207—212

《中國人馬天時（音）提供的一條自吐魯番至喀什噶爾的路線》

[275]Martin，W.A.P.A cycle of Cathay.New York：Revell，3rd edn，1900

丁韙良：《中國巡禮》

[276]Mayers，William Fred.，Dennys，N.B.and King，Charles.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a complete guide to the open ports of those countries，together with Peking，Yedo，Hong Kong and Macao.London：Trübner＆Co.；Hong Kong：A.Shortrede＆Co.，1867

梅耶等：《中國和日本的通商口岸》

[277]McCulloch，J.R.，comp.A dictionary，practical，theoretical，and historical，of commercial navigation.London：Longman，Brown，Green，and Longmans，1850

麥庫洛克編：《商業航海辭典》

[278]McDonald，Graeme.‘George Leslie Mackay：missionary succ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Papers on China，21（1968）131—183

格雷姆·麥克唐納：《喬治·列斯里·馬凱：19世紀臺灣傳教事業取得的成就》

[279]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See Wylie，Alexander

《新教傳教士紀念華人的回憶錄》

[280]Meng，S.M.The Tsungli Yamen：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孟思明：《總理衙門的機構和職能》

[281]Metzger，Thomas A.‘T’ao Chu’s reform of the Huaipei salt monopoly’.Papers on China，16（Dec.1962）1—39

梅茨格：《陶澍對淮北鹽務專賣的改革》

[282]Metzger，Thomas A.Review of Kenneth E.Folsom，Friends，guests，and colleagues：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in HJAS，29（1969）315—320

梅茨格：《評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幕府”制度〉》

[283]Metzger，Thomas A.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legal，normative，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梅茨格：《清代官僚政治的內部組織》

[284]Michael，Franz and Chang，Chung-li，eds.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3 vols.，1966—71

邁克爾等編：《太平軍叛亂的歷史與文獻》

[285]Michell，John and Robert，trs.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their occupation of the Kirghiz steppe and the line of the Syr-Daria：their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Khiva，Bokhara，and Kokan，also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Dzungaria.London：E.Stanford，1865

米其爾等譯：《中亞的俄國人》

[286]Michie，Alexander.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as illustrated in the career of Sir Rutherford Alcock.London，2 vols.，1900

米基：《維多利亞時代一位駐華的英國人：阿禮國爵士事跡》

[287]Mikhailov，G.I.Literaturnoe nasledstvo mongolov（The Mongols’literary legacy）.Moscow：Nauka，1969

米哈伊洛夫：《蒙古文學遺產》

[288]Miller，Robert James.Monasteries and culture change in Inner Mongolia.（Asiatische Forschungen，2）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5 9

米勒：《內蒙古的寺院和文化變化》

[289]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London：The Directors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37—1866

《傳教士雜志和大事記》

[290]Mitchell，Peter.‘A further note on the HCCSWP’.Ch’ing-shihwen-t’i，2.3（July 1970）40—6

米切爾：《〈皇朝經世文編〉補注》

[291]Mitchell，Peter M.‘The limits of reformism：Wei Yüan’s reaction to Western intrusion’.MAS，6.2（April 1972）175—204

米切爾：《改革主義的極限：魏源對西方入侵的反應》

[292]Modern Asian Studi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Jan.1967—

《現代亞洲研究》

[293]Moorcroft，William and Trebeck，George.Travels in the Himalayan provinces of Hindustan and the Panjab；in Ladakh and Kashmir；in Peshawar，Kabul，Kunduz，and Bokhara；by Mr.William Moorcroft and Mr.George Trebeck，from 1819 to 1825，ed.H.H.Wilson.London：John Murray，1841

穆爾克羅夫特等：《1819—1825年在印度斯坦喜馬拉雅山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記》

[294]Morse，H.B.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5 vols.，1926—1929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

[295]Morse，H.B.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3 vols.London，New York（etc.）：Longmans.Green＆Co.，1910—18；Taipei reprint，Book World Co.，1963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296]Muhammad Amīn Beg Boghra.Sharqí Türkistūn tāríkhī（History of Eastern Turkestan）.Srinagar：author，1940

穆罕默德·阿明：《東突厥斯坦史》

[297]Muhammad Haydar Dughlat.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Dughlát，tr.E.D.Ross；ed.N.Elias.London：Sampson Low，Marston，1898

穆罕默德·海德·達格拉特：《中亞莫臥兒人的歷史》

[298]Muh ammad Taqī Lisān al-Mulk Sipihr.Nāsikhat- tawāríkh：Salātín—i Qājāriyya，ed.Muhammad Bāqir Bihbūdī，pt.1.Teheran：Kitābfurūshī-yi Islāmiyya，1965

穆罕默德·塔齊·西皮爾：《薩拉丁·哈札兒傳記》

[299]Muramatsu，Yuji.‘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BSOAS，29.3（1966）566—599

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度的文獻研究》

[300]Murphey，Rhoads.Shanghai，key to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墨菲：《作為近代中國鎖鑰的上海》

[301]Murphey，Rhoads.The outsiders：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6

墨菲：《西方外來者在中國和印度的經歷》

[302]Nacagdorimg，š.img erxšeeld baǐsan üyeiin Xalxyn xuraangui tüüx（1691—1911）（Short history of Khalkha in the period of Manchu dominion，1691—1911；sinimglex uxaany akademiǐn Tüüxiǐn xüreelen）.Ulan Bator：Ulsyn xevleliǐn xereg erxlex xoroo，1963

納扎格多爾濟：《滿洲統治時期的喀爾喀簡史，1691—1911年》

[303]Nacagdorimg，š.and Nasanbalimgir，C.，eds.Dörvön aǐmgiǐn alba tegšitgesen dans（Tax regulation registers for the four aimaks；Monumenta historica Instituti historiae Academia[e]scien-tiarum Reipubllicae Populi Mongoli，Tomus Ⅲ，Fasc.2）.Ulan Bator：sinimglex uxaany Akademiǐn xevlel，1962

納扎格多爾濟：《四艾馬克稅冊》

[304]Nalivkine，V.P.Histoire du khanat de Khokand.tr A.Dozon（Publications de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series 3，Vol.4）.Paris：Ernest Leroux，1889

納里夫金：《浩罕王國史》）法譯本）

[305]Narochnitskii，A.L.Kolonial’naia politika kapitalisticheskikh derzhav naDal’nem Vostoke 1860—1895（Colonial policy of the capitalist powers in the Far East 1860—1895）.Moscow：AN SSSR，1956

納羅契尼茨基：《1860—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

[306]Nasanbalimgir，C. img ulsad Ar mongoloos niǐlüülimg baǐsan alba（1691—1911）（Obligations to the Manchu Ch’ing dynasty fulfilled by Outer Mongo-lia，1691—1911）.Ulan Bator：sinimglex uxaany Akademiimgn xevlel，1964

那桑巴爾吉日：《1691—1911年外蒙對滿清王朝履行的義務》

[307]Nasanbalimgir，C.and Nacagdorimg.š.，eds.Ardyn zargyn bičig（ⅩⅤⅢ-ⅩⅩzuuny exen）（Petitions of grievances submitted by the people [18th-begin-ning 20th century]；Monumenta historica Instituti historiae Academiae scientiarum Reipublicae Populi Mongoli，Tomus Ⅳ，Fasc.1）.Ulan Bator：šinimglex uxaany akademiǐn xevlex üǐldver，1968

那桑巴爾吉日等編：《18世紀至20世紀初的人民申訴書》

[308]Nathan，Andrew J.Modern China，1840—1972：an introduction to sourcesand research aid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3

內森：《1840—1972年的現代中國：資料和工具書介紹》

[309]Natsagdorj，Sh.（š.Nacagdorimg）.‘The economic basis of feudalism in Mongolia’，tr.Owen Lattimore.MAS，1.3（1967）265—281

納扎格多爾濟：《蒙古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英譯本）

[310]Nazarov，Filipp.Zapiski o nekotorykh narodakh i zemliakh srednei chastiAzii（Russkie puteshestvenniki v stranakh Vostoka）.Moscow：Nauka，1968

納扎洛夫：《中亞民族和地理概述》

[311]Nebol’sin，P.I.‘Ocherki torgovli Rossii s Srednei Aziei’.Zapiski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10（1855）1—373

涅波爾辛：《俄國的中亞貿易概述》

[312]North-China Herald.Shanghai，1850—

《北華捷報》

[313]‘O sostoianii Altyshara ili shesti vostochnykh gorodov kitaiskoi provintsii Nan-lu（Maloi Bukhary）v 1858—1859 godakh’.in Ch.Ch.Valikhanov，So-branie，2.265—412.Alma-Ata：AN KazSSR，1961

《關于1858—1859年六城的情況》

[314]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go vostokovedeniia （Sketches o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oriental studies），Sbornik 2，esp.Z.I.Gorbacheva，N.A.Petrov.G.F.Smykalov and B.I.Pankratov，‘Russkii kitaeved akademik Vasilii Pavlovich Vasil’ev（1818—1900）’，232—340.（Akademiia Nauk SSSR，Institut Vostoko-vedeniia）.Moscow：AN SSSR，1956

《俄國東方學史概論》

[315]Ocko，Jonathan Kevin.‘Ting Jih-ch’ang in restoration Kiangsu，1864—1870’.Y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1976

奧斯科：《丁日昌在同治中興時期的江蘇》

[316]Ouchterlony，John.The Chinesewar：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2nd edn.London，520pp.，1844

奧赫特洛尼：《英國的對華戰爭》

[317]Overmyer，Daniel.‘Folk Buddhist sects：a structu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PhD dissertation，1971

奧弗邁耶：《中國民間的佛教宗派》

[318]Owen，David Edward.British opium policy in India and Chin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

歐文：《英國在印度和中國的鴉片政策》

[319]Papers o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Committee on 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1947—1966

《中國論文集》

[320]Parker，E.H.，trC.hinese account of the Opiumwar.Shanghai：1888

派克譯：《中國人對鴉片戰爭的記述》

[321]Paterno，Roberto M.‘Devello Z.Sheffiel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Papers on China，14（1960）121

佩特諾：《謝衛樓與華北協和大學的創辦》

[322]Paterno，Roberto M.‘The Yangtze valley anti-missionary riots of 1891’.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1967

佩特諾：《1891年長江流域的反教騷動》

[323]Pearl Cyril.Morrison of Peking.Sydney：Angus and Robertson，1967

珀爾：《馬禮遜在北京》

[324]Pearson，M.N.Merchants and rulers in Gujarat：the response to the Portu-gues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皮爾森：《古吉拉特的商人與統治者：對16世紀葡萄牙人的反應》

[325]Pelcovits，Nathan A.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New York：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8

佩爾科維茨：《中國通和外交部》

[326]Pelliot，Paul.Notes on Marco Polo.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59—1963

伯希和：《馬可波羅游記注釋》

[327]Perkins，Dwight H.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 1969

珀金斯：《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

[328]Petech，Luciano.Aristocracy and government in Tibet 1728—1959，Serie Orientale Roma，XLV.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73

彼特奇：《1728—1959年西藏的貴族和政府》

[329]Pinkney，David H.，ed.A Festschrift for Frederick B.Artz.Durham，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1964

平克尼編：《阿茨紀念文集》

[330]Polachek，James.‘Gentry hegemony：Soochow in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in Frederic Wakeman，Jr 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11—2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波拉切克：《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

[331]Pong，David.‘The income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of Kiangsi Province in the last years（1860—1864）of the Taiping Rebellion’.JAS，26.1（Nov.1966）49—65

龐百騰：《太平軍叛亂后期江西省的收入和軍費開支》

[332]Pong，David.‘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s in China as seen in the career of Shen Pao-chen（1820—1879）’.University of London PhD dissertation，1969

龐百騰：《從沈葆楨的經歷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

[333]Pong，David.‘Confucian patriot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osung Railway，1877’.MAS，7.4（1973）647—676

龐百騰：《儒家的愛國主義與吳淞鐵路的被毀》

[334]Pong，David.A critical guide to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archives deposíted at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Lond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龐百騰：《對倫敦檔案局所藏廣東省檔案的批判性指南》

[335]Porter，Jonathan.Tseng Kuo-fan’s private bureau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2

波特：《曾國藩的私人官僚班子》

[336]Pritchard，E.H.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4.3—4（Sept.—Dec.1936）

普里查德：《英中關系的艱難歲月，1750—1800年》

[337]Pumpelly，Raphael，ed.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expedition of 1904：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f Anan：origins，growth，and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Washington，D.C.：Carnegie Institution 1980

普姆佩利編：《對突厥斯坦的考察》

[338]Purcell，Victor.The Boxer uprising：a background study.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珀塞爾：《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

[339]Quested，R.K.I.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

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國在東亞的擴張》

[340]Rahul，Rarn.Modern Bhutan.Delhi：Vikas Publications，1971

拉烏爾：《近代不丹》

[341]Rahul，Ram.Politics of central Asia.London：Curzon Press，1974

拉烏爾：《中亞的政治》

[342]Rankin，Mary Backus.‘The Ku-t’ien incident（1895）：Christians versus the Ts’ai-hui’.Papers on China，15（1961）30—61

藍金：《1895年古田教案：基督教對抗齋教》

[343]Rasidondug，S.in collaboration with Veronika Veit.Petitions of grievances submitted by the people（18th—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Asiatische Forschungen，45）.Wiesbaden：Harrassowitz 1975

拉西東杜格等：《人民的申訴書》

[344]Ravenstein，Ernst G.The Russians on the Amur；its discovery，conquest，and colonization，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its inhabitants，productions，and commercial capabilities；and personal accounts of Russian travellers.London：Trübner and Co.，1861

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

[345]Rawlinson，John L.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

[346]Rawski，Evelyn Sakakida.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羅斯基：《華南的農業變化和農民經濟》

[347]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Shanghai，1878.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Shanghai，1890

《新教在華傳教士大會記錄》

[348]Reid，Gilbert.‘Duty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to the upper classes of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9（1888）358—64，397—402，465—472

李佳白：《傳教士對中國上層階級的責任感》

[349]Richardson，H.E.A short history of Tibet.New York：Dutton，1962

黎吉生：《西藏簡史》

[350]Ride，Lindsay.‘Biographical note’，in James Legge，tr.The Chinese classics，vol.1.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5 vols.，1960

林賽·里德：《傳記筆記》

[351]Rockhill，W.W.‘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1644—1908’.T’oung pao，11（1910）1—104

羅克希爾：《拉薩的達賴喇嘛及其同清帝的關系，1644—1908年》

[352]Rose，Leo E.Nepal：strategy for surviv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利奧·羅斯：《尼泊爾：求生存的戰略》

[353]Ross，E.Denison，ed.and tr.Three Turki manuscripts from Kashghar，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Lahore：Mufid-i’am Press.nd

丹尼森·羅斯編譯：《喀什噶爾的三份突厥文手稿》

[354]Rossabi，Morris.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5

羅薩比：《1368年迄今的中國和亞洲腹地》

[355]Rowbotham，Arnold H.Missionary and Mandarin：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2

羅博塔姆：《清宮中的耶穌會士》

[356]Saguchi Tōru.‘The Eastern trade of the Khoqand Khanate’.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24（1965）47—114

佐口透：《浩罕王國的東方貿易》

[357]Saguchi Tōru.‘The revival of the White Mountain Khwājas，1760—1820（from Sarimsāq to Jihāngir）’.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14（1968）7—20

佐口透：《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復興》

[358]Sbornik dogovorov Rossii s Kitaem.1689—1881 gg.St Petersburg：Ministerstvo Inostrannykh Del，1889

《俄中條約匯集，1689—1881年》

[359]Scheiner，IrwinC.hristian converts and social protest in Meiji Japa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沙依內：《明治時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會抗議》

[360]Schiffrin，Harold Z.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

[361]Schlagintweit-Sakünlünski，Hermann von.Reisen in Indine und Hochasien：Eine Darstellung der Landschaft，der Cultur and Sitten der Be wohner，in Verbindung mit klimatischen und geologischen Verhältnissen：Basirt auf die Resultat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Mission von Hermann，Adolph und Robert Schlagint weit ausgeführt in den Jahren 1854—1858，4 vols.，Jena：Hermann Costenoble，1869—1880

什拉琴威特-薩孔倫斯基：《印度和亞洲高原旅行記》

[362]Schram，Louis M.J.‘The Monguors of the KansuT-ibetan Frontier：their origin，history，and social organization’.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S，44.1（April 1954）1—138

[363]Schram，Louis M.J.‘The Monguors of the Kansu-Tibetan border，Part Ⅱ.Their religious life’，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S.47.1（March 1957）1—164

[364]Schram，Louis M J.‘The Monguors of the Kansu—Tibetan frontier，pt Ⅲ.Records of the Monguor Clans：history of the Monguors in Huangchung and the chronicles of the Lu Family’.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S，vol.51（May 1961）pt 3，pp.1—117

施拉姆：《甘藏邊境的土族》（第一、二、三篇）

[365]Schulemann，Günther.Geschichte der Dalai-Lamas.Leipzig：Harrassowitz，1958

舒爾曼：《達賴喇嘛史》

[366]Schurmann，Herbert Franz.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üan dynas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

舒曼：《元代的經濟結構》

[367]Sebes，Joseph，S.J.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1689）.Rome：Institutum Historicum SI，1961

塞布斯：《耶穌會士與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

[368]Semenov，A.A.，et al.comp.Sobranie vostochnykh rukopisei Akademii Nauk Uzbekskoi SSR，vol.7（AN UzSSR，Institut Vostokovedeniia）.Tashkent：Nauka UzSSR，1964

西蒙諾夫等編：《蘇聯烏茲別克科學院東方文獻抄本匯編》

[369]Shakabpa，W.D.Tibet：a political histor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夏格巴：《西藏政治史》

[370]Shchepetil’nikov，N.M.Arkhitektura Mongolii.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literatury po stroitel’stvu，arkhitekture i stroitel’nym materialam，1960

謝別迪爾尼科夫：《蒙古建筑學》

[371]Shen，Han-yin Chen.‘Tseng Kuo-fan in Peking，1840—1852：his ideas on statecraft and reform’.JAS，27.1（Nov.1967）61—80

沈陳漢音（音）：《1840—1852年期間曾國藩的經世改革思想》

[372]Shih，Vincent Y.C.The Taiping ideology：its sources，interpretations，and influenc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

施友忠：《太平軍的思想體系》

[373]Singh，Bawa Satinder.The Jammu Fox：a biography of Maharaja Gulab Singh of Kashmir 1792—1857.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4

B.S.辛格：《查謨之狐：克什米爾大王古拉布·辛格》

[374]Singh，Khushwant.A history of the Sikh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 vols，1963—1966

胡希旺特·辛格：《錫克人歷史》

[375]Sinha，H.Early European banking in India.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present conditions.London：Macmillan，1927

辛哈：《歐洲人在印度的初期銀行業務》

[376]Sinor，Denis，comp.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Eurasie centrale.Wiesbaden：Harrassowitz，1963

賽諾編：《中部歐亞大陸研究介紹》

[377]Sinor，Denis.Note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ner Asia I.JAH，7.2（1973 178—206）

賽諾編：《雜談關于亞洲腹地的史學》

[378]Skachkov，P.F.and Miasnikov，V.S.Rus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1689—1916：Ofitsial’nye dokumenty.Moscow：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1958

斯卡奇科夫等：《俄中關系史，1689—1916年》

[379]Skinner，G.William.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AS，24.1（Nov.1964），24.2（Feb.1965），24.3（May 1965）

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

[380]Skinner，G.William et al.ed.Modern Chinese society：an analytic bibliograph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3 vols.，1973

施堅雅等編：《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

[381 ]Sladkovskii，M.I.Istoriia torgovo-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narodov Rossii s Kitaem（do 1917 g.）（History of commercial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of Russia with China，to 1917）.Moscow：Nauka，1974

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的商業經濟關系史》

[382]Smith，Richard J.Barbarian officers of imperial China：Ward，Gordon，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Da-vis，1972

史密斯：《華爾、戈登和太平軍叛亂》

[383]Smith，Richard J.‘Chinese military institution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1850—1860’.Journal of Asian History，8.2（1974）122—161

史密斯：《19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

[384]Smith，Richard J.‘Foreign training and China’s self-strengthening：the case of Feng-huang-shan.1864—1873’.M AS，10.1（1976）83—111

史密斯：《外國人的訓練與中國的自強》

[385]Snellgrove，David and Richardson，H.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8

斯內爾格羅夫等：《西藏文化史》

[386]Spector，Stanley.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

斯佩克脫：《李鴻章和淮軍》

[387]Spence，Jonathan.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Boston：Little Brown，1969

斯賓士：《中國的西洋顧問：1620—1960年》

[388]Spence，Jonathan.‘The American missionary endeavor，1830—1910’，in John Z.Bowers and Elizabeth F.Purcell，eds.Medicine and society in China.New York：Josiah Macy，Jr，Foundation，1974

斯賓士：《1830—1910年美國的傳教活動》

[389]Spence，Jonathan.‘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Jr 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143—7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斯賓士：《清代吸食鴉片概況》

[390]Stanley，C.John.Late Ch’ing finance：Hu Kuang-yung as an innovat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斯坦利：《清季的財政革新者胡光墉》

[391]Stein，R.A.Tibetan civilization，tr J.E.Stapleton Driv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

[392]Streit，Robert and Dindinger Johannes，comps.Bibliotheca Missionum：vol.12，Chinesiche Missionsliteratur，1800—1884（Freiburg，1958）；vol.13，Chinesische Missionsliteratur，1885—1909（Rome，Freiburg and Vienna，1959）

斯特雷特等編：《基督教傳教書目：中國部分（1800—1909年）》

[393]Suleimanov，B.S.，ed.Kazakhstan v，ⅩⅤ-ⅩⅤⅢ vekakh（Voprosy sotsial’nopoliticheskoi istorii）.Alma-Ata：Nauka KazSSR，1969

蘇雷曼諾夫：《15—18世紀的哈薩克斯坦》

[394]Swisher，Earl.China’s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s：a stud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1841—1861.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

斯威舍：《1841—1861年中美關系研究》

[395]Tan，Chester C.The Boxer catastroph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

譚春霖：《拳亂》

[396]Tang，Wing-hang.‘Local defense organizations in Shantung，1853—1863；from loyalism to rebell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A dissertation，Davis，June 1975

鄧永康：《1853—1863年山東的地方防衛組織》

[397]T’ang，Leang-li.China in revolt：how a civilization became a nation.London：N.Douglas，1927

唐良理（音）：《叛亂中的中國：一個文明是怎樣成為一個國家的》

[398]‘Ta’rīkh-i sighārī’anonymous MS，British Museum.Oriental 8156（completed 1874），erroneously ascribed to‘Abd Allāh Pānsadbashī

塔里希·斯哈利佚名手稿

[399]Teng，Ssu-yü.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184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

鄧嗣禹：《張喜與南京條約》

[400]Teng，Ssu-yü.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1851—1868.Paris：Mouton，1961

鄧嗣禹：《捻軍及其游擊戰》

[401]Teng，Ssu-yü.Historiograph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鄧嗣禹：《關于太平軍叛亂的史學》

[402]Teng，Ssu-yü.‘Some new lights on the Nien movement and its effect on the fall of the Manchu dynasty’.Symposium on Chinese Studies：commemorating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11—1961，3（1968）50—69

鄧嗣禹：《關于捻軍運動及其對清朝衰亡的影響的幾點新意見》

[403]Teng，Ssu-yü.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鄧嗣禹：《太平軍叛亂和西方列強》

[404]Teng，Ssu-yü and Fairbank，John K.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survey，1839—192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鄧嗣禹、費正清合著：《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23年文獻研究指南》

[405]Teng，Ssu-yü and Fairbank，John K.，comp.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o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aper reprint，New York：Atheneum，1969

鄧嗣禹、費正清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23年文獻概覽》

[406]Thomas，Winburn T.Protestant beginnings in Japan：the first three decades，1859—1889.Tokyo and Rutland：Tuttle，1959

托馬斯：《新教在日本開始的30年》

[407]Thompson，Wardlaw R.Griffith John：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London，1908

湯普森：《楊篤信在中國50年的經歷》

[408]Tikhvinskii，S.L.ed.Man’chzhurskoe vladychestvo v Kitae（Manchu dominion in China）.Moscow：Nauka，1966

齊赫文斯基：《滿人在中國的統治》

[409]Timkovskii，Egor.Puteshestvie v Kitai chrez Mongoliiu v 1820 i 1821 godakh.StPetersburg：Meditsinskii Departament Ministerstva Vnutrennikh De（l1824），2.77

葉戈爾·季姆科夫斯基：《經蒙古至中國的旅行記》

[410]Timkowski，George.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and residence in Peking，in the years 1820—1821，ed.Julius von Kl-aproth，vol.I.London：Longman，Rees，Orme，Brown and Green，1827

喬治·季姆科夫斯基：《俄國使團經蒙古至華旅行記》

[411]Torbert，Preston M.‘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1662—1796’，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 dissertation，1973

托伯特：《對清代內務府組織及其主要職能的研究》

[412]Treadgold，Donald W.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religious and secular thought in moderntimes，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特雷戈爾德：《西方在俄國和中國：近代的宗教和世俗思想》

[413]Tripathi，Amales.Trade and finance in the Bengal presidency，1793—1833.Bombay：Orient Longmans，1956

特里帕西：《1793—1833年孟加拉管轄區的貿易和金融》

[414]Tsiang，T.F.（Chiang T’ing-fu）.‘China and European expansion’.Politica，2.5（1936）1—18

蔣廷黻：《中國與歐洲的擴張》

[415]Tucci，Giuseppe.Tibet land of snows，tr J.E.Stapleton Driver.New York：Stein and Day，1967

涂奇：《雪山之國西藏》

[416]Tucci，Giuseppe，and Heissig，Walther.Die Religionen Tibets und der Mon -golei（Die Religionen der Menschheit，vol.20）.Stuttgart：Kohlhammer，1970

涂奇等：《西藏宗教與蒙古》

[417]Valikhanov，Ch.Ch.‘O sostoianii Altyshara ili shesti vostochnykh gorodov kitaiskoi provintsii Nan-lu（Maloi Bukharii）v 1858—1859 godakh’（On conditions in Altishahr or the six eastern cities of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Nanlu[Little Bukharia]in 1858—9），in Ch.Ch.Valikhanov，Sobranie sochinenii，2.265—412.Alma-Ata：AN KazSSR，1962

瓦里哈諾夫：《關于1858—1859年六城的情況》

[418]Valikhanov，Ch.Ch.Sobranie sochinenii（Collected works）Alma-Ata：AN KazSSR，5 vols.，1961—1972

《瓦里哈諾夫全集》

[419]Vladimir（Zenone Volpicelli）.Russia on the Pacific and the Siberian rail-way.London，1899

弗拉基米爾：《太平洋上的俄國和西伯利亞鐵路》

[420]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 ⅩⅨ i nachala ⅩⅩ veka：Dokumenty rossiiskogo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del（Russia’s foreign policy of the nineteen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oscow：Gospolitizdat，1960—

《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俄國對外政策》

[421]Wagel，Srinivas R.Finance in China.Shanghai，1914

瓦格爾：《中國的財政》

[422]Wakeman，Frederic，Jr.St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小韋克曼：《1839—1861年中國南方的社會騷亂》

[423]Wakeman，Frederic Jr.‘The Huang-ch’ao ching-shih wen-pien’.Ch’ing-shih wen-t’i，l.10（Feb.1969）8—22

小韋克曼：《關于〈皇朝經世文編〉》

[424]Wakeman，Frederic，Jr.‘The secret societies of Kwangtung，1800—1856’，in Jean Chesneaux，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小韋克曼：《1800—1856年廣東的秘密會社》

[425]Wakeman，Frederic，Jr.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小韋克曼：《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觀點》

[426]Wakeman，Frederic，Jr and Grant，Carolyn，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小韋克曼等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

[427]Waley，Arthur.The Opium Warthrough Chinese eyes.London：Allen ＆Unwin，1958

韋利：《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

[428]Walrond，T.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London，1872

沃龍德：《額爾金伯爵的書信與日記》

[429]Wang，Erh-min.Review of Paul A.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28.1（1965）184—185

王爾敏：《對保羅·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一書的書評》

[430]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王賡武：《明朝初年與東南亞的關系》

[431]Wang，Yeh-chien.Land 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王業鍵：《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

[432]Wang，Yeh-chien.‘The secular movement of prices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in China，1644—1935’（paper deliver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Chicago，1973

王業鍵：《數世紀的價格波動與中國的農民經濟，1644—1935年》

[433]Wathen，W.H.‘Memoir on the U’sbek State of Kokan，properly called Khokend，（the ancient Ferghana）in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3.32（Aug.1834）

沃森：《中亞浩罕的烏茲別克地區紀要》

[434]Wathen，W.H.‘Note of a pilgrimage undertaken by an Usbek and his two sons from Khokend or Kokan，in Tartary，through Russia，＆o.to Mecca.Obtained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parties’.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3.32（Aug.1834）379—382

沃森：《浩罕的烏茲別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麥加朝圣記》

[435]Wathen，W.H.‘Memoir on Chinese Tartary and Khoten’.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4.48（Dec.1835）653—664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

[436]Watt，John R.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

瓦特：《中華帝國末年的縣官》

[437]Way，Richard Quarterman：see Wei-li-che

見祎里哲條

[438]Webster，Sir Charles.The foreign policy of Palmerston 1830—1841：Britain，the Liberal movement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London：G.Bell ＆Sons，2vols.，1951

韋伯斯特爵士：《巴麥尊在1830—1841年的外交政策》

[439]Wehrle，Edmund S.Britain，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1891—1900.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6

韋爾利：《1891—1900年的英國、中國和反教騷亂》

[440]Wei，Louis Tsing-sing.La politique missionnaire de la France en Chine 1842—1856：L’ouverture des cinq ports chinois au commerce étranger et la liberté religieuse.Paris：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1960

魏景星（音）：《1842—1856年法國在中國的傳教政策》

[441]West，Philip.‘The Tsinan property disputes（1887—1891）：gentry loss and missionary“victory”’.Papers On China，20（1966）119—143

韋斯特：《濟南的教產糾紛，1887—1891年》

[442]Widmer，Eric.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威德默：《18世紀俄國的在華傳教士團》

[443]Wilkinson，Endymion.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a research guid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威爾金森：《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

[444]Willeke，Bernward H.Imperial government and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784—1785.New York：St Bonaventure，1948

威勒克：《1784—1785年清政府與天主教在華的傳教活動》

[445]Williams，S.Wells.The Middl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government，literature，social life，arts，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2 vols.London，1848；revised edn，1883

衛三畏：《中華帝國的地理、政府、文化、社會生活、藝術和歷史概述》

[446]Willmott，W.，E.，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447]Wong，J.Y.‘The Arrow incident：a reappraisal’.MA S，8.3（1974）373—89 J.Y.黃：《亞羅號事件的再評價》

[448]Wong，J.Y.‘Harry Parkes and the Arrow War in China’.M A S，9.3（1975）303—320

J.Y.黃：《巴夏禮與中國的亞羅號戰爭》

[449]Wong，J.Y.Yeh Ming-ch’en：Viceroy of Liang Kuang（1852—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J.Y.黃：《兩廣總督葉名琛》

[450]Wong，K.Chimin and Wu，Lien-teh.A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2nd edn，1936

王吉民、伍連德：《中國醫學史》

[451]Wright，Mary C.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revised edn with new preface，New York：Atheneum，1966

芮瑪麗：《同治中興》

[452]Wright，Mary C.Review of 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J A S，25（Feb.1966）331—333

芮瑪麗：《評斯佩克脫的〈李鴻章與淮軍〉》

[453]Wright，Stanley F.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Belfast：Queen’s University by W.Mullan，1950

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

[454]Wu，Silas H.L.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1693—173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吳秀良：《中國的通訊聯絡與皇帝的控制：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

[455]Wylie，Alexander.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

懷利：《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紀念華人的回憶錄：附他們的出版物與訃告一覽》

[456]Yang，Lien-sheng.‘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HJAS，23（1960—1961）47—6

楊聯陞：《中華帝國的幾位女統治者》

[457]Yü’Ying-shih.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余英時：《漢代的貿易與擴張》

[458]Yuan，Chung Teng.‘Reverend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J A S，23.1（Nov.1963）55—67

袁中登（音）：《羅孝全與太平軍叛亂》

[459]Yuan，Tung-li.China in Western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袁同禮：《西方文學中的中國：考爾迭〈中國研究論著綜錄〉補》

## （丙）中文和日文書目

[1]A-ying

阿英（錢杏邨）：《鴉片戰爭文學集》（Collected literary materials on the Opium War）.北京：Kuc-hi，2 vols，1957

[2]Chang Che-lang

張哲郎：《清代的漕運》（Grain transport in the Ch’ing dynasty）.臺北：Chiahsin，1969

[3]Chang Ch’i—yün

張其昀等編：《清史》（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臺北：Kuo-fang yenchiu-yüan，8 vols.，1961

[4]Chang Chih-tung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Complete papers of Chang Chih-tung）.158 chüan.北京，1937

[5]Chang Ching-lu

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in modern China），1 st series.上海：Shang-tsa，2nd edn.1954（vol.2 published by Lien-ch’un）；also上海：Chung-hua，6 vols.，1954—9

[6]Chang Hsi-lun

張錫綸：《軍書匯鈔》（Collected copies of military dispatches，1868）.臺北：Wen-hai reprint，1970

[7]Chang Hsing-t’ang

張興唐編：《蒙古參考書目》（Bibliography of research on the Mongols；Chung-hua ts’ung-shu中華叢書）.臺北：Chung-hua ts’ung-shu wei-yüanhui，1958

[8]Chang Hsiu-min

張秀民等編：《太平天國資料目錄》（Bibliography of sources on the Taiping Rebellion）.上海：Jen-min ch’u-pan-she，1957

[9]Chang Jui—ch’ih

張瑞墀：《‘Liang-huai k’an-luan chi’兩淮戡亂記》（Dealing with rebellions on both banks of the Huai River），1887，in范文瀾等編《捻軍》，1.285—308.上海：Shen-chou kuo-kuang she，1953

[10]Chang Kuei-yung

張貴永、呂實強等編：《教務教案檔》（Archives on church affairs and disputes involving missionaries and converts）.臺北：IMH，Academia Sinica，9 vols.，1974—1975

[ll]Chang Mu

張穆：《蒙古游牧記》（On the nomads of Mongolia），1867.長沙：Commercial Press，1938

[12]Chang Mu

張穆：《改稿蒙古游牧記》Susa Kakitsu須佐嘉橘譯.東京：Kaimeido Shuppambu，1939

[13]Chang San

張珊：《關于捻軍的組織問題》（Problems concerning the Nien Army’s organization）.《安徽史學通訊》（Bulletin of Anhwei historical studies），14（Dec.1959）28—38

[14]Chang San

張珊：《和羅爾綱先生商榷捻軍戰術問題》（Discussing the problem of the Nien Army’s military tactics with Mr Lo Erh-kang）.《安徽史學通訊》，14（1959）39—50

[15]Chang Sheng-wang

張生旺：《西捻軍在陜西的抗清斗爭》（The antiCh’ing struggle of the western Nienarmy in Shensi）.《史學月刊》，開封（Dec.1964）348—353

[16]Chang Te-chien

張德堅：《賊情匯纂》（Intelligence handbook on the Taipings，1854—1855），reprinted in Hsiang Ta et al.ed.Tai-p’ing t’ienkuo（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3.25—347.北京：Shen-chou kuokuang she，8 vols.，1952

[17]Chang Yü-fa

張玉法：《福州船廠之開創及其初期發展》（The founding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Foochow Navy Yard）.CYCT，2（June 1971）177—225

[18]Ch’ang-sha hsien-chih

《長沙縣志》（Gazetteer of Changsha county）.長沙，1886

[19]Chao Chung-fu

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Sino-Russian negotiations over the Manchurian border issue 1858—1911）.臺北：IMH，Academia Sinica，1970

[20]Chao Lieh-wen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Chao Lieh-wen’s diary）.臺北：Hsüeh-sheng，1964

[21]Chao-lien

昭梿：《嘯亭雜錄》（Miscellaneous notes from the Hsiao pavilion）；《嘯亭續錄》（Notes from the Hsiao pavilion.continued）.上海，1880，reprinted Chung-kuo 1909：and臺北：Wen-hai，1967

[22]Ch’en Ch’iu

陳鍫：《黃恩彤與鴉片戰后外交》（Huang En- t’ung and Chinese diplomacy after the Opium War）.《史學年報》，3.2（Dec.1940）111—141

[23]Ch’en Fu-kuang

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昆明：Kuo-li Yün-nan ta-hsüeh wen-fa-hsüeh-yüan，1947

[24]Ch’en Li

陳澧：《東塾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Ch’en Li），Liao T’ing-hsiang廖廷相編.臺北：Wen-hai，1973

[25]Ch’en Te-ch’ang

陳德昌：《對百年前上海是一片荒涼漁村說法的疑義》（Note on Shanghai）.in《歷史研究》1957，no.l，p.58

[26]Ch’en Teng-yüan

陳登元：《中俄關系述略》（Accou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上海：Commercial Press，1926

[27]Ch’en Wen-chin

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The Ch’ing Tsungli Yamen and its financial support，1861—1884）.《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1.1（Nov.1932）

[28]Ch’en Wen-chin

陳文進：《清季出使各國使領經費，1875—1911》（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legations and consulates abroad during the late Ch’ing）.《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1.2（1933）270—310

[29]Cheng Kuan-ying

鄭觀應：《盛世危言》（Warnings to a prosperous age），1893 preface.臺北，1965

[30]Cheng Yüan-shan

鄭元善：《宦豫紀事》（Events during an official career in Honan）1872，in范文瀾等編：《捻軍》1.330—347.上海：Shen-chou kuo-kuang she，1953

[31]Ch’eng En-tse

程恩澤：《程侍郎遺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late Ch’eng En-tse），in叢書集成，vol.96，no.2212，5—7

[32]Ch’eng Fa-jen

程發軔：《中俄國界圖考》（Illustrated study of the SinoR-ussian borders）.enlarged edition.臺 北：Meng-Tsang Wei-yüan-hui，1970

[33]Ch’i Ssu-ho

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Wei Yüan and 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the late ch’ing）.《燕京學報》，39（Dec.，1950）177—226

[34]Ch’i Ssu-ho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上海：Shen-chou kuo-kuang she，6 vols.，1954

[35]Ch’i Yün-shih

祁韻士編：《皇朝藩部要略》（Summary of essential data on the Inner Asian tribes[subordinate to]the imperial dynasty；first printed 1845）

[36]Chiang Hsiang-nan

蔣湘南：《蔣子瀟先生遺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the late Chiang Tzuhsiao），1869.Extract on Nien behaviour in范文瀾等編《捻軍》1.323.北京：Shen-chou kuokuang she，1953

[37]Chiang Shih-jung

江世榮編：《捻軍史料叢刊》（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Nien Army）.上海：Commercial Press，3 vols.，1957—8

[38]Chiang Shih-jung

江世榮編：《曾國藩未刊信稿》（Hitherto unpublished letters of Tseng Kuofan）.北京：Chung-hua，1959

[39]Chiang- su chien-fu ch’üan-an《江蘇減賦全案》（Complete record of the tribute-grain reduction in Kiangsu）.蘇州：preface by Li Hung-chang，1866

[40]Chiang Ti

江地：《1865—1866年的捻軍戰爭》（The Nien War of 1865—1866）.歷史教學，天津，Nov.1954，84—86

[41]Chiang Ti

江地：《捻軍史初探》（A preliminary study of Nien Army history）.北京：San-lien，1956

[42]Chiang Ti

江地：《初期捻軍史論叢》（Studi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Nien Army）.北京：San-lien，1959

[43]Chiang T’ing-fu

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A source book of important documents in moder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2 vols.上海：Commercial Press 1931—1934；臺北：Commercial Press，1958

[44]Chien Po-tsan

翦伯贊等編：《義和團》（The Boxers）.上海：Jenmin，4 vols.，1953

[45]Chien Yu-wen

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aiping institutions）.香港：Chien’s Meng-chin studio，3 vols.，1958

[46]Chien Yu-wen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Complet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香港：Chien’s Meng-chin studio，3 vols.，1962

[47]Ch’ien I-chi

錢儀吉編：《碑傳集》（Collected memorial inscriptions）.江蘇書局edn of 1893；reprinted in Chin-tai Chung-kuo shihliao ts’ung-k’an，臺北：Wen-hai，nos.921—930

[48]Ch’ien Mu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A history of Chinese scholarship over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7；reprint臺北：Commercial Press，1957，1968

[49]Ch’ien Ta-hsin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A record of new knowledge cultivated in the Shih-chia study），1806.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7

[50]Ch’ien Ting-ming

錢鼎銘：《錢敏肅公奏疏》（Memorials of Ch’ien Ting-ming），1880.臺北：Wen-hai，1968

[51]Ch’in Hui-t’ien

秦蕙田：《五禮通考》（Encyclopaedia of five categories of rites and institutions）.First published c.1761；262 chüan，1880

[52]Ch’in-ting Huang-yü Hsi-yü t’u-chih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傅恒等編。北京：武英殿，1782

[53]Ch’in-ting Li-fan Yüan tse-li

《欽定理藩院則例》（Imperially commissioned [compilation of]precedents for the Li-fan Yüan；edns of 1789，1817，1826，1841，1891，and 1908）

[54]Ch’in-ting Ta-Ch’ing hui-tien shih-li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Collected statutes of the Ch’ing dynasty with cases and precedents）.嘉慶edn，preface 1818 also edn of 1899

[55]Ch’in-ting wai-fan Meng-ku Hui-pu wang kung piao chuan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Imperially.commissioned genealogical tables and biographies of the princes and dukes of the Mongols and Muslim tribesmen of the outer entourage；commissioned 1779）

[56]Ching Su and Lo Lun

景甦、羅侖：《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tung managerial landlords in the Ch’ing period）.濟南：Jen-min，1959

[57]Ch’ing-ch’ao yeh-shih to-kuan

《清朝野史大觀》（An over-view of unofficial history from the Ch’ing dynasty），小橫香室主人編.上海：Chung-Hua，12 vols.，1936

[58]Ch’ing-hua hsüeh-pao

《清華學報》（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北京清華大學，1924—；NS.臺北1962—

[59]Ch’ing-shih kuan

清史館編：《清史列傳》（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the Ch’ing period）.上海：Chung hua，1928

[60]Ch’ing shih-lu

《清實錄》see Ta-Ch’ing li-ch’ao shih-lu《大清歷朝實錄》

[61]Ch’ing shih-lu ching-chi tzu-liao chi-yao

《清實錄經濟資料輯要》（Selected economic materials from the Ch’ing Veritabla records），南開大學歷史系編.北京：Chung-hua，1959

[62]Ch’ing-shih pien-tsuan wei-yüan-hui

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史》（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臺北：Kuofang yen-chiuyüan，1961

[63]Ch’ing-tai ch’ou-pan i-wu shih-mo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Complete record of the management of barbarian affairs），80 chüan for the later Tao-kuang period 1836—50，80 chüan for the Hsien-feng period 1851—1861，100 chuan for the T’ungchih period 1862—1874.北平：Palace Museum photolithograph.1930

[64]Ch’iu K’uang-lu

裘匡廬（毓麟）編：《清代軼聞》（Anecdotes about the Ch’ing dynasty）.上海：Chung-hua，1932；臺北：Huawen，1969

[65]Chou Sheng-ch’uan

周盛傳：《周武壯公遺書》（A collection of Chou Sheng-ch’uan’s papers），14 chüan.南京，1905.臺北：Kuang-wen，1971

[66]Chou Shih-ch’eng

周世澄：《淮軍平捻記》（The Anhwei Army’s suppression of the Niens），12 chüan.上海：The Kiangnan Arsenal.1877

[67]Chou Yü-t’ung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New and Old Texts in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上海，1929；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1967

[68]Ch’ou-pan i- wushih-mo：see Ch’ing-tai ch’ou-pan i-wu shih-mo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

[69]Chou-pan i- wushih-mo pu-i

《籌辦夷務始末補遺》（Supplement to Ch’ing-tai ch’ou-pan i-w ushih-mo）.臺北：IMH，Academia Sinica，1968

[70]Chu Hung-chang

朱洪章：《從戎紀略》（Brief account of participation in war）.Tzu-yang t’ang，1893

[71]Ch’u Chin

楚金（瞿宣穎）：《道光學術》‘Tao-kuang hsüeh-shu’（Scholarship in the Tao-kuang period），in Ts’un-ts’ui hsüehshe，ed.Chung-kuo chin-san-painien hsüeh-shu ssu-hsiang lun-chi（Collected articles on scholarship and thought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300 years）.香港：Ts’un-ts’ui，1971，1，341—345

[72]Ch’uan-cheng tsou-i hui-pien

《船政奏議匯編》（Compendium of memorials regarding the Foochow Navy Yard）.福州，1888，54 chüan.臺北reproduction：Ta-t’ung，196 8.

[73]Ch’un-yüan Ch’i-shih-i

椿圓七十一：《西域聞見錄》（青照堂叢書series 3，vol.93；preface 1760）

[74]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 shih yen-chiu chi-k’an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Studies in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Academia Sinica.北平，quarterly，1932—

[75]Chung-kuo k’o-hsüeh yüan et al.comps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洋務運動》（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上海：Jen-min，8 vols，1961

[76]Chung-kuo k’o-hsüeh yüan Shang-hal li-shih yen-chiu-so

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編：《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A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Small Sword Society’s Shanghai uprising）.上海：Jenmin，1958

[77]Chung-kuo shih-hsüeh hui Chi-nan fen-hui

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Tsinan branch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comp.《山東近代史資料》（Materials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Shantung）.濟南：Jen-min，1957

[78]Chung-O chiao-chieh hsiang-t’u

《中俄交界詳圖》（Detailed maps of the Sino-Russian boundaries）.武昌：Ya Hsin-ti-hsüeh she，nd

[79]Chung Wen-tien

鐘文典：《太平軍在永安》（The Taiping army at Yung-an）.北京：San-lien.1952

[80]Chung-yang yen-chiu-yüan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

[81]Chung-yang yen-chiu-yü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臺北

[82]Chung-yang yen-chiu-yü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comp《海防檔》（Archives on coastal defence）.

臺北：IMH，Academia Sinica，9 vols.hardbound，17 vols，paperbound，1957

[83]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臺北，Aug，1969—；also cited as CYCT [84]Fan Wen-lan

范文瀾等編：《捻軍》（The Nien Army）.北京：Shen-chou kuo-kuang she，6 vols.，1953

[85]Feng Kuei-fen

馮桂芬：《顯志堂集》（Collected writings from the Hall of Manifest Aspirations），1876.臺北：Hsüeh-hai.1967

[86]Feng Kuei-fen

馮桂芬：《顯志堂稿》see Feng Kuei-fen.Hsien-chih-t’ang chi《顯志堂集》

[87]Feng Kuei-fen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Straightforward words from the Lodge of Early Chou studies）.臺北：Wen-hai reproduction of 1898 edn，1971；臺北：Hsüeh-hai，1967

[88]Feng Yu-lan

馮友蘭：《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Collected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modern China）.上海：Jen-min，1958

[89]Fu-heng

傅恒等編：《欽定皇輿西域圖志》（Imperially commissioned gazetteer of the Western Regions）.北京：Wuying-tien，preface 1782

[90]Hai-fang tang

《海防檔》（Archives on coastal defenee）.臺北：IMH，Academia Sinica，9 vols.，1957

[91]Hai-kuan tsung-shu yen-chiu shih

海關總署研究室：《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Imperialism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北京：K’o-hsüeh ch’u-pan she，vols.4—8，1957—1959；香港：Lung-men reprint

[92]Haneda Akira

羽田明：《倭里汗之亂的一件史料》，in 塚本博士頌壽《紀念佛教史學論集》，京都：Naigai Printing Co.，1961.62—78

[93]Haneda Tōru

羽田享編：《內藤博士還歷祝賀支那學論叢》（Collected essays in sinology in honour of the sixtieth birthday of Naitō Torajirō）.京都：Kōbundō shobō 1926

[94]Hashimoto Kōhō

橋本光寶：《蒙古的喇嘛教》（Mongolia’s lamaist religion）.東京：Bukkyō kōronsha，1942

[95]Hatano Yoshihiro

波多野善大：《關于太平天國二三問題》（On certain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歷史學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150（March 1951）32—42

[96]Hatano Yoshihiro

波多野善大：《李鴻章19世紀80年代的對日政策》（Li Hungchang：his policy towards Japan in the 1880s）.《歷史學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253（May 1961）38—42

[97]Hayashi Yōzō

林要三：《中國歷史學界對洋務運動的研究》（Chinese historians’studies of 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歷史學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311（April 1966）16—27

[98]Ho Ch’ang-ling

賀長齡：《耐庵詩文存》（Poems and essays of Ho Ch’ang-ling），1860 preface.1861

[99]Ho Ch’ang-ling

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Collected writings on statecraft of the reigning dynasty）.1898 edn；reprint臺北：Shih-chieh，1963

[100]Ho I-k’un

何貽焜：《曾國藩評傳》（Tseng Kuo-fan：an appraisal and a biography）.上海：Cheng-chung，1947；reprint臺北，1957，1964

[101]Hoshi，Ayao

星斌夫：《清末河運向海運的轉移》（The shift from canal to sea transport at the end of the Ch’ing dynasty），in Tōyōshi ronsō：Wada Hakushi koki kinen kaihen.東京.1960

[102]Hoshi，Ayao

星斌夫：《大運河：中國的運》（The Grand Canalgrain transport in China）.東京：Kondō，1971

[103]Hsi Yü-fu

席裕福編：《皇朝政典類纂》（Classified compendium on the governmental statutes of the Ch’ing dynasty）.臺北：Ch’eng-wen，1969 reproduction of Shanghai：T’u-shu chi-ch’eng，1903 edn

[104]Hsia Hsieh

夏燮：《中西紀事》（Records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24 chüan，1865；reprint臺北：Wen hai，1962

[105]Hsia Nai

夏鼐：《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The problem of land levies in the Yangtze provinces around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清華學報》，10.2（April 1935）409—474

[106]Hsiangp-ao lei-tsuan湘報類纂.（Classified compilation of articles from the Hsiangpao），6 chüan.上海：Chung-hua，1902；臺北：Ta-t’ung，1968

[107]Hsiang Ta

向達等編：《太平天國》（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北京：Shenchou kuo-kuang she，8 vols.，1952

[108]Hsiao-fang-hu chai yü-ti ts’ung-ch’ao：see Wang Hsi-ch’（i王錫祺）

[109]Hsiao I-shan

蕭一山：《清代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g period）.上海：Commercial Press，1928：臺北：Commercial Press，5 vols.，1962

[110]Hsiao I-shan

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Collected works 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6

[111]Hsiao Ling-yu

蕭令裕：《英吉利記》（Treatise on England）in《小方壺齋輿地叢鈔》（Hsiao- fang-hu chaii geographical collection），王錫祺編，2nd supplement，pt Ⅱ，1897 preface.上海：Chu-i-t’ang.1897

[112]Hsiao Ling-yü

蕭令裕：《粵東市舶論》（A discussion of foreign trade at Canton），in the above Hsiaofang- hu chai geographical collection，2nd supplement，pt 9，1897 preface.上海：Chu-i-t-ang，1897

[113]Hsieh Ch’ing-kao and Yang Ping-nan

謝清高、楊炳南：《海錄》（Record of the seas），c.1820.上海：Chung-hua，1955

[114]Hsieh Hsing-yao

謝興堯：《太平天國史事論叢》（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5

[115]Hsieh Hsing-yao

謝興堯：《太平天國前后廣西的反清運動》（The anti-Ch’ing movement in Kwangsi around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北京：Sanlien，1950

[116]Hsin-ning hsien-chih

《新寧縣志》（Gazetteer of Hsin-ning hsien，Hunan），1893 edn

[117]Hsü Chi-yü

徐繼畬：《瀛環志略》（A brief survey of the maritime circuit），10 chüan.福州，1850；臺北：Hua-wen，1968

[118]Hsü Chi-yù

徐繼畬：《松龕先生全集》（Complete papers of Hsü Chiyü），10 chüan.太原，1915

[119]Hsü Jun

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Hsü Jun’s chronological autobiography），Hsü family edn，1927

[120]Hsü K’o

徐珂編：《清稗類鈔》（Unofficial sources on the Ch’ing arranged by categories）.上海：Commercial Press，12 vols.，1928

[121]Hsü Shih-ch’ang

徐世昌：《清儒學案》（Records of the scholarship of Ch’ing Confucianists）.

天津Hsü family edn，1938

[122]Hsü Sung

徐松：《西域水道記》（西域三種）.北平：Lung-fu-ssu Wen-k’uei-t’ang，nd

[123]Hsü Ta-ling

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The Ch’ing dynasty system of obtaining degrees，ranks and offices through monetary contributions.北京：Yenching University，1950

[124]Hsüan-tsung shih-lu：see Ta-Ch’ing li-ch’ao shih-lu（《大清歷朝實錄》）

[125]Hsüeh Fu-ch’eng

薛福成：《籌洋芻議》（Preliminary proposals on foreign affairs），in《庸盦全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Hsüeh Fu-ch’eng）.上海：Tsui-l iu-t’ang，1897

[126]Hsün-chou fu-chih《潯州府志》（Gazetteer of Hsün-chou prefecture Kwangsi），1874 edn

[127]Hu Lin-i

胡林翼：《胡文忠公遺集》（Collected papers of the late Hu Lin-i）.湖北：Ch’ung-wen，1875；臺灣：Hua-lien，1965

[128]Hu Ssu-ching

胡思敬：《戊戌履霜錄》（Perilous experiences during the 1898 reform），4 chüan.南昌，1913

[129] Huang-ch’ao ching-shih-wen hsü-pien：see Ko Shih-chǖn《葛士濬）and Sheng K’ang（盛康）

[130]Huang-ch’ao ching-shih wen-pien：see Ho Ch’ang-ling（賀長齡）

[131]Huang Chün-tsai

黃鈞宰：《金壺七墨》（Seven items of Huang Chün-tsai’s writings）.上海：Shao-yeh Shan-fang，1929；《清史資料》（Ch’ing historical sources），5th series，vol.3；臺北：Tai-lien kuo-feng，1969

[132]Huang En-t’ung

黃恩彤：《撫夷紀略》（Records on the soothing management of barbarians），1865 preface，unpublished hand copy.臺北Academia Sinica

[133]Huang Hsieh-yün

黃協塤，camp.《自強學齋治平十議》（Ten proposals for good and peaceful government from the studio for self-streng thening studies）.上海，1897

[134]Hung Liang-chi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遺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Hung Liang-chi），臺北：Hua-wen facsimile of 1877-9 edn，1969

[135]Ichiko Chūzō

市古宙三：《洋務運動與變法運動》（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 and the reform movement），in西順藏等編：《近代亞洲思想史講座——中國篇》（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sian thought-China）.東京：Kōbundō，1960

[136]I Ching

《易經》（The book of changes）.《周易正義》edn.臺北Chunghua，1965

[137]I-ho-t’uan tang-an shih-liao

《義和團檔案史料》（Archival materials on the Boxers）.北京：Kuo-chia tang-an chü，2 vols.，1959

[138]I-hsin

奕等編：《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preface 1896）

[139]I-hsin

奕等編：《剿平捻匪方略》（Campaigns to suppress the Nien bandits），Kuang-hsü period edn，320 chüan.臺北，1968

[140]Irie Keishiro

入江啟四郎：《中國邊疆和英俄角逐》（The Chinese frontier and Anglo-Russian rivalry）.東京：Nauka sha，1935

[141]Iwamura Shinobu

巖村忍and Fujieda Akira藤枝晃編：《蒙古研究文獻目錄》（1900—1972）：Bibliography of Mongolia for 1900—1972.東京：Japan Association of Mongolian Studies，1973

[142]Iwanami-kōza Sekai rekishi

《巖波講座世界歷史》vol.13.東京：Iwanami shoten，1971

[143]Jen-tsung shih-lu：see Ta-Ch’ing li-ch’ao shih-lu（《大清歷朝實錄》）

[144]Juan K’uei-sheng

阮葵生：《茶余客話》（Conversation with guests after tea）.上海：Chunghua，1959；北京：Chung-hua，1959

[145]Juan Yüan

阮元，ed.《詁經精舍文集》（Prose collection of the Ku-ching ching-she academy），in叢書集成.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6

[146]Jung Meng-yüan

榮孟源：《張樂行告示》（Chang Lo-hsing’s Proclamation）.《進步日報》（Progress daily）.天津，3 Feb.1951

[147]Kao Lao

高勞：《清宮秘史》（Secret history of the Ch’ing palace）.《東方雜志》，9.1（July 1912，18th article separately paginated）3—4

[148]Kind ai Chügoku kenkyū

《近代中國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東京：Tōyō Bunko，1958—

[149]Ko Shih-chün

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Collection of Ch’ing dynasty writings on statecraft，continued）—a different work from that compiled by Sheng K’ang under the same title.120 chüan.上海：Tu-shu chi-ch’eng，1888；臺北：Wen-hai facsimile of 1901 edn，1972

[150]Kuang fang-yen kuan ch’üan-an

《廣方言館全案》（Complete record of the Kuang fang-yen kuan），no place or date，last document dated May 1894；Copy from a block-print volume made by hand in 1949 for Prof.Knight Biggerstaff（畢乃德），original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南京大學）

[151]Kung Tzu-chen

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in王佩諍編：《龔自珍全集》.上海：Chung-hua shu-chü，1959，1.105—112

[152]Kung Tzu-chen

龔自珍：《罷東南番舶議》（text lost）

[153]Kuo-li Taiwan shih-fan to-hsüeh li-shih hsüeh-pao

《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臺北，Jan.1973—Also cited as SFLS

[154]Kuo Sung-t’ao

郭嵩燾：《郭侍郎奏疏》（Kuo Sung-tao’s memorials），12 chüan，1892.臺北：Wen-hai，1968

[155]Kuo T’ing-i

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志》（A historical chronolog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重慶：Commercial Press，1946；臺北reprint：Commercial Press，1963

[156]Kuo T’ing-i

郭廷以等編：《郭嵩燾先生年譜》（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r Kuo Sung-tao）.臺北：IMH，Academia Sinica，2 vols.，1971

[157]Li Ch’un

酈純：《太平天國制度初探》（Preliminary study of Taiping institutions）.

北京：Chung-hua，rev.edn，1963

[158]Li En- han

李恩涵：《清末金陵機器局的創建與擴張》（The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Nanking Arsenal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大陸雜志》（‘The Continent Magazine’），33.12（Dec.1966）368—370

[159]Li En-han

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The diplomacy of Tseng Chi-tse）.臺北：Chungkuo hsüeh-shu chu-tso wei-yüan-hui，1966

[160]Li En-han

李恩涵：《咸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Anti-Christian opinion expressed during the Hsien-feng period）.《清華學報》，臺北：（NS）6.1—2（Dec.1967）44—71

[161]Li Hsiu-ch’eng

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The Loyal King Li Hsiu-ch’eng’s own account：the restored version）.上海：Chung-hua，1961

[162]Li Huan

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Classified biographical records of venerable persons of the reigning dynasty），published privately by the Li family of Hsiang-yin《湘陰），1884—1890

[163]Li Hung-chang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Complete papers of Li Hung-chang）.上海：Commercial Press，photo reprint of Nanking，1905 edn；臺北：Wen-hai reproduction，1962

[164]Li Hung-chang

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The memorials of Li Hung-chang），80 chuan.南京，1905；臺北：Wen-hai，1962

[165]Li Hung-chang chih P’an Ting-hsin shu-cha

《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Li Hungchang’s letters to P’an Ting-hsin），年子敏編.北京：Chung-hua，1960

[166]Li Ju-chao

李汝昭：《鏡山野史》（An unofficial history by Li Ju-chao）.in向達等編：《太平天國》3.15

[167]Li Kuo-ch’i

李國祁：《同治中興時期劉坤一在江西巡撫任內的表現》（Liu K’un-i’s performance as governor of Kiangsi during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SFLS.1（1973）241—270

[168]Li Kuo-ch’i

李國祁：《由劉坤一初任總督的表現看晚清的政治風尚》（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e late Ch’ing as seen in Liu K’un-i’s performance during his early years as governor-general）.SFLS.3（1975）159—86

[169]Li Kuo-ch’i，Chou T’ien-sheng and Hsü Hung-i

李國祁、周天生、許弘義：《中國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Chinese gazetteer studies：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reers of prefects and magistrates in the Ch’ing dynasty）.臺北：National Science Council，3 vols.，1975

[170]Li-shih yen-chiu

《歷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北京：1954—1966，1975—

[171]Li Shih-yüeh

李時岳：《甲午戰爭前三十年間反洋教運動》（The movement against the Western religion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prior to the war of 1894）.《歷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1958，no.6，pp.1—15

[172]Li T’ang-chieh

李棠階：《李文清公遺書》（The writings of the late Li T’ang-chieh），1882

[173]Li Tsung-t’ung and Liu Feng-han

李宗桐、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r Li Hung-tsao）.臺北：Chung-kuo hsüeh-shu chu-tso wei-yüan hui，2 vols.，1969

[174]Li Wen-chih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Materials on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北京：Sanlien，3 vols.，1957

[175]Li Yüeh-jui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Unofficial record from the Spring Ice Studio）.上海：Shih-chieh，1926

[176]Liang A-fa

梁阿發：《勸世良言》（Good Words to admonish the age）.廣州.1832；臺北：Hsüeh-sheng shu-chü，1965

[177]Liang Chang-chü

梁章鉅編：《樞垣記略》（Brief notes on the Grand Council），1975.臺北：Wen-hai，1967

[178]Liang Ch’i-ch’ao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Collected works from the Ice-drinkers’Studio）.上海：Chung-hua，1936

[179]Liang Chia-pin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Study of the thirteen hongs of Kwangtung）.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7

[180]Liang T’ing-nan

梁廷枬：《夷氛記聞》（An account of the barbarian invasion）.北平：Kuo-li Pei-p’ing yen-chiu yüan，shih-hsüeh yen-chiu hui，5 chüan，1937

[181]Lin-ch’ing hsien-chih

《臨清縣志》（Gazetteer of Lin-ch’ing county）.Chang Shu-mei張樹梅等編，16 chüan，1934

[182]Lin Ch’ung-yung

林崇墉：《林則徐傳》（A biography of Lin Tse-hsü）.臺北：Chung-hua tatien pien-yin hui，1967

[183]Lin Kuo-keng

林國賡等編：《新寧縣志》（Gazetteer of Hsinning county，Hunan）.1893.

香港：蟄廬reprint based on 1893 edn，1921

[184]Lin Po-t’ung and Ch’en Li

林伯桐、陳澧編：《學海堂志》（A treatise on the Hsüeh-hai Academy）.香港：Ya-tung hsüeh-she，1964 reproduction of 1866 edn

[185]Lin Tse-hsü

林則徐：《林文忠公全集》（Complete writings of Lin Tse-hsü）.臺北：Techih，2 vols.，1963

[186]Liu Chin-tsao

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Ch’ing dynasty，continued）.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5；臺北：Hsin-hsing，1965

[187]Liu Kuang-ching

劉廣京：《鄭觀應易言——光緒初年之變法思想》（Cheng Kuan-ying’s I-yen：reform proposals of the early Kuang-hsü period）.《清華學報》，臺北：NS 8.1—2（Aug.1970）373—425

[188]Liu K’un-i

劉坤一：《劉忠誠公遺集》（Collected papers of the late Liu K’un-i）.歐陽輔之編，1909.臺北：Wenhai reprint，1968

[189]Liu Po-chi

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local academies in Kwangtung）.長沙：Commercial Press，1939；Taipei：Chung-hua，1958

[190]Lo Chen-yü

羅振玉編：《皇清奏議》（Memorials of the great Ch’ing）.墨緣堂.1936

[191]Lo Erh-kang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7

[192]Lo Erh-kang

羅爾綱：《湘軍新志》（A new history of the Hunan Army）.長沙：Commercial Press，1939

[193]Lo Erh-kang

羅爾綱：《捻軍的運動戰》（The mobile warfare of the Nien Army）.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9

[194]Lo Erh-kang

羅爾綱：《綠營兵志》（A treatise on the Green Standard Army）.重慶：Commercial Press，1945

[195]Lo Erh-kang

羅爾綱：《太平天國新軍的運動戰》（The mobile warfar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s new army）.上海：Commercial Press，3rd edn，1955

[196]Lo Erh-kang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Draft histor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北京：Chung-hua，1957

[197]Lo Ping-chang

駱秉章：《駱文忠公奏議》（Memorials of Lo Ping-chang）.臺北：Wen-hai reprint，1966

[198]Lo Ping-chang

駱秉章：《駱公年譜》（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Lo Ping-chang）.臺北：Wen-hai reprint，1967

[199]Lo Yü-tung

羅玉東：《光緒朝補救財政之方策》（The remedies adopted for the fiscal crisis during the Kuang-hsü period）.《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1，2（May 1933）189—270

[200]Lo Yü-tung

羅玉東：《中國厘金史》（History of likin in China）.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6

[201]Lü Shih-ch’iang

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Early steamship projects in China）.臺北：IMH，Academia Sinica，1962

[202]Lü Shih-ch’iang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The causes of opposition to Christianity among China’s officials and gentry 1860—74）.臺北：IMH，Academia Sinica，1966

[203]Lü Shih-ch’iang

呂實強：《馮桂芬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Feng Kuei-fen）.《中華文化復興月刊》（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臺北），4.2（Feb.1971）

[204]Lü Shih-ch’iang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Ting Jih-ch’ang and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臺北：IMH，Academia Sinica，1972

[205]Ma Chien-chung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Ma Chien-chung’s essays）.4 chüan，1896 preface.北京：Chung-hua，1960

[206]Ma Ju-yen and Liu Shou-i

馬汝珩、劉守詒：《關于捻軍領袖張樂行的自述和檄文》（On the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and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Nien Army leader Chang Lo-hsing）.《光明日報》（Illumination daily），北京（10 Oct.）1962

[207]Ma Shao-ch’iao

馬少僑：《清代苗民起義》（Risings of the Miao people during the Ch’ing period）.武漢：Jen-min，1956

[208]Mamiya Rinzō

間宮林藏：《間宮林藏的黑龍江探險——東韃靼紀行》（Mamiya Rinzo’s explorations in Heilungkiang—a travel account of eastern Siberia）.沈陽：Mantetsu kōhōka，1940

[209]Martin，W.A.P.

丁韙良：《天道溯原》（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寧波，1854

[210]Martin，W.A.P.

丁韙良：《格物入門》（Introduction to science）.1868 Meng-ku Jen-min Kung-ho-kuo t’ung-shih《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蘇聯科學院、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北京：K’o-hsüeh Ch’u-pan-she，1958

[211]Meng Sen

孟森：《清史講義》（Lectures on Ch’ing history）.上海，1937

[212]Meng Sen

孟森：《清代史》（A 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臺北：Cheng-chung，2nd edn，1960

[213]Miao Ch’üan-chi

繆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長原因》（Reasons for the growth of the mufu system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思與言》，5.3（Sept.1967）25—33，41

[214]Miao Ch’üan-sun

繆荃孫編：《續碑傳集》（Collected memorial inscriptions，continued）.Chiang-Ch’u pien-i shu-chü edn of 1910

[215]Mien-hsin

綿忻等編：《欽定新疆識略》.北京：Wu-ying-tien，1821

[216]Min Erh-ch’ang

閔爾昌編：《碑傳集補》（Supplement to collected memorial inscriptions）.

北平：Yench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Sinological Studies，1931

[217]Miyazaki，Ichisada

宮崎市定：《清代的胥吏與幕友》（The clerks and runners and the advisory staffs of the Ch’ing dynasty）.《東洋史研究》，16.4（March 1958）1—28

[218]Momose Hiromu

百瀨弘：《論馮桂芬及其著述》（On Feng Kuei-fen and his writings）.《東亞論叢》，2（1940）95—122

[219]Mou An-shih

牟安世：《洋務運動》（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上海：Jen-min ch’upan she，1956；6th printing 1961

[220]Muramatsu Yūji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之研究》（Landlord bursaries in modern Kiangnan：studies in Chinese landlordism）.東京：Tokyo University Press，1970

[221]Nakamura Masanao

中村正直譯：《天道溯源》（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Heavenly Way）.

東京：collection of Yamada Jun山田俊，1877

[222]Nankai ta-hsü eh li-shih hsi

南開大學歷史系編：《清實錄經濟資料輯要》（Selected materials on economic history from Ch’ing shih-lu）.北京：Nankai，1959

[223]Nieh Ch’ung-ch’i

聶崇岐編：《捻軍資料別集》（Supplementary materials on the Nien Army）.上海：Jen-min，1958

[224]O-hui

鄂輝等編：《欽定平苗紀略》（Imperially commissioned record of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Miao）.Wu-ying-tien武英殿edn，1797

[225]Ono Shin ji

小野信爾：《論淮軍的基本性格》（On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the Anhwei Army）.《歷史學研究》.245（Oct，1960）22—38

[226]Onogawa Hidemi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late Ch’ing）.京都：Kyoto University，1960

[227]Ou-yang Shao-hsi

歐陽紹熙編：《清譚》（Pure discourse）.上海：Kuangi，1916

[228]Pao Shih-ch’en

包世臣：《安吳四種》（Four treatises written for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Kiangsu），36 chüan.蘇州，1851

[229]P’eng Tse-i

彭澤益：《鴉片戰后10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系》（Chinese economy and class relations under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coppersilver exchange rate in the post-opium War decade）.《歷史研究》，6（1961）40—68

[230]P’eng Yü-hsin

彭雨新：《清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系》（The fis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vinces during the late Ch’ing）.《社會科學

雜志》，9.1（1947）83—110

[231]Rekishigaku kenkyü

《歷史學研究》（‘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Iwanami shoten.Nov.1933—

[232]Saeki Tomi

佐伯富：《清代鹽政的研究》（A study of the salt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g dynasty）.京都：Tōyōshi kenkyūkai.1956；2nd edn，1962

[233]Saeki Tomi

佐伯富編：《中國隨筆雜著索引》（An index to the notebooks of various writers）.京都：Tōyōshi kenkyūkai，1960

[234]Saeki Yoshirō

佐伯好郎：《清朝基督教研究》（A study of Christianity under the Ch’ing dynasty）.東京：Shunj ū sha，1949

[235]Saguchi Tōru

佐口透：《18—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Study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Eastern Turkesta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東京：Yoshikawa Kōbunkan，1963

[236]Saguchi Tōru

佐口透：《俄國和亞洲的草原》（Russia and the Asian steppe）.（《歐亞文化史選書》3.）東京：Yoshikawa Kōbunkan，1966

[237]Sasaki Masaya

佐佐木正哉：《咸豐二年鄞縣的抗糧暴動》（Land tax resistance riot in Yin-hsien in 1852）.《近代中國研究》，5（1963）185—299

[238]Sasaki Masaya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后的中英抗爭資料稿編》（Draft volum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Chinese-English disputes after the Opium War）.東京：Modern China Seminar，Tōyō Bunko，1964

[239]Sasaki Masaya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史料編.東京：Modern China Seminar，Tōyō Bunko，1964

[240]Sasaki Masaya

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密結社資料匯編》（Collected documents on late Ch’ing secret societies）.東京：Modern China Seminar，Tōyō Bunko，1967

[241]Shan-tung chün-hsing chi-lüeh《山東軍興紀略》（Brief record of military campaigns in Shantung），22 chüan，1885；also cited as STCH

[242]Shan-tung t’ung-chih

《山東通志》（General gazetteer of Shantung），200 chuan，1918

[243]Shang-hai Hsiao-tao-hui ch’i-i shih-liao hui-pien

《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Small Sword Society rising at Shanghai）.上海：Jen-min ch’u-pan she，1958 Shang-hai t’ung-she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Research materials on Shanghai）.臺北：Chung-kuo reprint，1973

[244]Shang-hai t’ung-she

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Research materials on Shanghai，supplement），1935 preface.臺北：Chungkuo，1973

[245]Shang Yen-liu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A descriptive account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under the Ch’ing）.北京：Sanlien，1958

[246]Shao Hsün-cheng

邵循正：《關于洋務派民用企業的性質和道路》（On the nature and orientation of consumer enterprises of the Western Affairs faction）.《新建設》，I（Jan.1964）.reprinted in Ts’un ts’ui hsüeh-she存萃學社編：《洋務運動研究論集》（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articles on 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香港：Ch’ung-wen，pp，52—63，1973

[247]Shen Chao-lin

沈兆霖：《沈文忠公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Shen Chao-lin）.1869.臺北：Wen-hai reprint，1970

[248]Shen K’o

沈珂編：《先文肅公政書續編》（Supplement to the political papers of my father，Shen Pao-chen）.Copy made by hand for Prof.David Pong from a printed volume in possession of the Shen family.Publisher and place unknown，1 ts’e，1885

[249]Shen pao（‘The Shun Pao’）

《申報》（Shanghai news）.Reprint in reduced form for the years 1872—87.臺北：Hsüeh-sheng shuchü，40 vols.，1965

[250]Shen Pao-chen

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The political papers of Shen Pao-chen）.南京，1880；臺北：Wen-hai reproduction，1966

[251]Shen Yün-lung

沈云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Collectanea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臺北：Wen-hai.1966—

[252]Sheng-hsün：see Ta-Ch’ing shih-ch’ao sheng-hsün

（《大清十朝圣訓》）

[253]Sheng K’ang

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Collection of Ch’ing dynasty writings on statecraft，continued）-a different work from that compiled by Ko Shih-chün under the same title.120 chüan，江蘇武進：Sheng-shih ssu-pu-lou，1897

[254]Sheng Lang-hsi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The system of local academies in China）.上海：Chung-hua，1934

[255]Shih-ch’ao sheng-hsün：see Ta-Ch’ing shih-ch’ao sheng-hsün（《大清十朝圣訓》）

[256]Shih-erh ch’ao Tung-hua lu

《十二朝東華錄》（The Tung-hua records of twelve Ch’ing reigns），509 chuan.including the Kuang-hsü reign，comp.Chu Shou-p’eng.臺北：Wenhai reproduction，30 vols.，1963

[257]Shih-hsüeh nien-pao

《史學年報》（‘Historical Annual’）北平：History Society of Yenching U-niversity，1939—

[258]Shih-liao hsün-k’an

《史料旬刊》（Historical materials published every ten days）.北平：Palace Museum，1930—1

[259]Ssu-kuo hsin-tang

《四國新檔》（New files on the four powers），vol.3：Ok-uo tang《俄國檔》，臺北：IMH，Academia Sinica，1966 Ssu yü Yen《思與言》，臺北，1963—

[260]Sun Yü-t’ang

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Materials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industry），series 1，1840—95.北京：K’o-hsüeh ch’u-pan she，2 vols，1957

[261]Sung shih

《宋史》（History of the Sung dynasty），496 chüan.臺北：Chung-hua，1965

[262]Suzuki Chūsei

鈴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A study of mid-Ch’ing history）.豐橋：Aichi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Problems，1952

[263]Suzuki Chūsei

鈴木中正：《清末的財政和官僚的性格》（Late Ch’ing fisc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bureaucracy），in《近代中國研究》，3（1959）

[264]Suzuki Chūsei

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concerning Tibet：from mid-eighteenth century to mid-nineteenth century）.東京：Hitotsubashi，1962

[265]Suzuki Chūsei

鈴木中正：《中國的革命和宗教》（Revolution and religion in China）.東京：Tokyo University，1974

[266]Suzuki Tomoo

鈴木智夫：《清末減租論之展開——“租核”的研究》（The development of rent reduction theories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a study of‘Inquiry into rents’）.in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編：《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rural social history）.東京：Taian，1967，pp.199—246

[267]Ta-Ch’ing hui-tien shih-li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Ch’in-ting Ta-Ch’ing hui-tien shih-li）

[268]Ta-Ch’ing li-ch’ao shih-lu

《大清歷朝實錄》（Veritable records of successive reigns of the Ch’ing dynasty）.沈陽：Manchoukuo kuo-wu-yüan，1937：also cited as CSL（for the complete work），Jen-tsung shih-lu《仁宗實錄》；Hsüan-tsung shih-lu《宣宗實錄》，etc.

[269]Ta-Ch’ing shih-ch’ao sheng-hsün

《大清十朝圣訓》（Sacred instructions from ten reigns of the Great Ch’ing），preface 1880.臺北：Wen-hai reprint，1965

[270]Ta-lu tsa-chih

《大陸雜志》（The Continent Magazine）.臺北，July 1950—

[271]Tai Chün-jen

戴君仁：《閻毛古文尚書公案》（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Old Text of the Book of history between Yen Jo-chü and Mao Ch’i-ling）.臺北：Chunghua，1963

[272]T’ai-p’ing t’ien-kuo li-shih po-wu-yüan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院（Taiping Rebellion historical museum）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Shortened collection from the 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Taiping Kingdom）.北京：Chung-hua shu-chü，6 vols.，1961—1963

[273]T’an Ssu-t’ung

譚嗣同等編：《論西政西學治亂興衰俱與西教無涉》（The condition of Western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of Western learning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estern religion）.《湘學新報》（The new journal of Hunan），4.1（1898）441—478

[274]T’ang Chih-chün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Collected writings o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漢口：Jen-min，1957

[275]T’ang Ⅰ

湯彝：《柚村文》（T’ang Ⅰ’s essays）6 chüan，長沙，1847

[276]T’ao Hsi-sheng

陶希圣等編：《列強侵略》（The aggression of the great powers）.臺北：Chung-hua min-kuo k’ai-kuo wu-shih nien wen-hsien pien-chi wei-yüanhui，4 vols，1964

[277]T’ao Hsü

陶煦：《租核》（Inquiry into rents）.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1927 edn in Suzuki Tomoo（鈴木智夫），《清末減租論之展開》，appendix

[278]Tayama Shigeru

田山茂：《清代的蒙古社會制度》（The Mongolian social system in the Ch’ing period）.東京：Bunkyō shoin，1954

[279]Teng Yen-lin

鄧衍林編：《中國邊疆圖籍錄》（Bibliography of works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上海：Commercial Press，1958

[280]Ti-kuo chu-i yü Chung-kuo hai-kuan

《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海關總署研究室》（Inspectorate General of Mari-time Customs，Research Department）等編.北京：K’o-hsüeh ch’u-pan she，vols.4—8，1957—1959；香港：Lung-men reprint

[281]Ting Jih-ch’ang

丁日昌：《丁中丞政書》（Political papers of Governor Ting），manuscript copy，36 chüan.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Sterling Library，Yale University

[282]Ting Ming-nan

丁名楠等編：《第一次鴉片戰爭》（The first Opium War），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1（July 1954）114—152

[283]Ting Pao-chen

丁寶楨：《丁文誠公遺集》（Papers of the late Ting Pao-chen）.26 chüan.北京，1893；臺北：Wen-hai，1967

[284]Ting Tse-liang

丁則良：《李提摩太——一個典型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Timothy Richard：a typical missionary in the service of imperialism）.北京：K’aiming，1951

[285]Tōa ronsō

《東亞論叢》.Būnkyūdō Shoten，July 1939-April 1948 Tōyōshi kenk yū《東洋史研究》（Studies in East Asian history）.京都：Kyoto University，bimonthly，October 1935—

[286]Tōyōshi Kenkyūkai

東洋史研究會編：《中國隨筆索引》（Index to Chinese random notes）.東京，1954

[287]Tōyōshi ronsō

《東洋史論叢：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會編》（Studies in Far Eastern history：a collection in honour of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Wada Sei）.東京，1960

[288]Ts’ao Chen-yung

曹振鏞等編：《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An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Muslim frontier and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rebels’posterity），preface 1830

[289]Ts’ao Tsung-ju

曹宗儒：《總管內務府考略》（A study of the Nei-wu Fu）.《文獻論叢》（Collected essays）1936，85—116

[290]Tseng Chi-tse

曾紀澤：《曾惠敏公手寫日記》（Tseng Chi-tse’s holograph diary）.臺北：Hsüeh-sheng，8 vols.，1965

[291]Tseng Chih-ling

曾志陵：《中東路交涉史》（History of negotiations over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北平：Pei-p’ing Chienshe T’u-shu-kuan，1931

[292]Tseng Kuo-fan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Complete papers of Tseng Kuo-fan），1st edn，not amplified，1876.In the collection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293]Tseng Kuo-fan

曾國藩：《曾文正公（國藩）全集》（Complete papers of Tseng Kuo-fan），amplified version，1876 et seq.臺北reproduction：Wen-hai，40 vols.，1974

[294]Tseng Kuo-fan

曾國藩：《曾文正公手寫日記》（Tseng Kuo-fan’s holograph diary）.臺北：Hsüeh-sheng，6 vols.，1965

[295]Tseng Wen-wu

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History of China’s dealings with the Western Regions）.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6

[296]Tso Tsung-t’ang

左宗棠等：《船政奏議匯編》（Compendium of memorials on the Foochow Navy Yard）.福州，1888；臺北：Ta-t’ung reprint，1968

[297]Tso Tsung-t’ang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Complete collection of Tso Tsung-t’ang’s papers），1890.臺北：Wen-hai reproduction，1964

[298]Ts’un-ts’ui hsüeh-she

存萃學社：《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Collected articles on scholarship and thought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300 years）.香港：Ts’un-ts’ui，1971

[299]Tung-fang tsa-chih《東方雜志》（Eastern Miscellany），monthly or semimonthly，上海，1904—

[300]Tung-hua lu

《東華錄》（Tung-hua records），various edns：（a）蔣良驥（1723—1789）編，32 chüan；through the Yung-cheng period

（b）王先謙（1847—1917）編，《九朝東華錄》（Tung-hua records of nine reigns）.or《東華全錄》（Complete Tung-hua records），425 Chian；through the Tao-kuang period，1884

（c）Shih-i-ch’ao tung-hua lu《十一朝東華錄》（of eleven reigns），the previous compilation（b）with the addition of one for the Hsien-feng period，潘頤福編，and one for the T’ung-chih period，comp.Wang；these two by Pa’n and Wang are sometimes known as《東華續錄》（Tung-hua records continued）

（d）朱壽朋編：《東華續錄》，220 chüan；through the Kuang-hsü period.上海，1909

[301]T’ung-chih Shang-hai hsien chih：see Yü Yüeh（俞樾）

[302]Wang Chia-chien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Wei Yü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 and his ideas of coastal defenee）.臺北：Taiwan University，1964

[303]Wang Chia-chien

王家儉：《文祥對于時局的認識及其自強思想》（Wen-hsiang’s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his time and his ideas regarding self-strengthening）.SFLS，1（1973）219—240

[304]Wang Chün-ch’en

王俊臣等：《潯州府志》（Gazetteer of Hsünchou prefecture），1874

[305]Wang Erh-min

王爾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權力之擴張》（The institution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commissioners of trad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ir power）.《大陸雜志》（The Continent Magazine），20.5（March 1960）153

[306]Wang Erh-min

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armament industry during the late Ch’ing）.臺北：IMH，Academia Sinica，1963

[307]Wang Erh-min

王爾敏：《耆英外交》（Ch’i-ying’s diplomacy）.《大陸雜志》（The Continent Magazine），309—310（1965）

[308]Wang Erh-min

王爾敏：《淮軍志》（Treatise on the Anhwei Army）.臺北：Academia Sinica，1967

[309]Wang Erh-min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臺北，1969

[310]Wang Erh-min

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The‘Brave Battalions’system of the Ch’ing dynasty）.CYCT，4.1（May 1973）1—52

[311]Wang Hsi-ch’i

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Hsiao-fang-hu chai geographical collection）.上海，1891；1st supplement，上海，1894；2nd supplement，上海：Chu-i-t’ang，1897

[312]Wang Lan-yin

王蘭蔭：《河北省書院志初稿》（Draft history of local academies in Hopei）.《師大月刊》（北平），25（Feb.1936）1—63；29（Sept.1936）1—105

[313]Wang P’ei-cheng

王佩諍編：《龔自珍全集》（Collected works of Kung Tzu-chen）.上海：Chung-hua，1959

[314]Wang Ping-hsieh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in the Wu-tzu-ch’i study）.10 chüan.天津，1885；臺北：Wen-hai，1968

[315]Wang P’ing

王萍：《西方歷算學之輸入》（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astronomical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s into China）臺北：IMH.Academia Sinica，1966

[316]Wang Shih-to

汪士鐸：《乙丙日記》（Diary of Wang Shih-to），鄧之誠編，1936

[317]Wang Shu-huai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Foreigners and the 1898 reform）.臺北：IMH，Academia Sinica，1965

[318]Wang Ta-hai

王大海：《海島逸志》（Lost gazetteer of the islands in the sea），in《海外番夷錄》（Records of overseas barbarians）.北京：Sou-liu hsien edn，1844

[319]Wang T’ao

王韜：《弢園尺牘》（Wang T’ao’s letters）.6 chüan.1876.臺北：Tat-’ung，1968

[320]Wang T’ao

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Examination essays of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13 vols.，1886—1893

[321]Wang T’ao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Supplementary writings of Wang T’ao），12 chüan.上海，1897

[322]Wang Ting-an

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A disciple’s record of Tseng Kuo-fan’s life）.北京：Tu-men，1876；臺北：Wen-hai，1967

[323]Wang Ting-an

王定安等：《曾文襄公年譜》（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Tseng Kuoch’üan）.4 chüan，c.1903

[324]Wang Tsung-yen

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r Ch’en Li）.香港：Commercial Press，1964；臺北：Wen-hai，1970

[325]Wang Wen-chieh

王文杰：《中國近世史上的教案》（A study of missionary cas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福州：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1947

[326]Wang Yen-wei

王彥威編：《清季外交史料》（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242 chüan.北平.1934；臺北：Wen-hai，1964

[327]Wang Yün-wu

王云五編：《叢書集成》（Collected collectanea）.上海：Commercial Press，1935—1940

[328]Wang Yün-wu

王云五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Memorials from the Tao-kuang，Hsien-feng，T’ung-chih and Kuang-hsü reigns）.臺北：Commercial Press，1970

[329]Wei Hsiu-mei

魏秀梅：《從量的觀察探討清季布政使的人事嬗遞現象》（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reers of provincial finance commissioner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CYCT，2（June 1971）505—534

[330]Wei Hsiu-mei

魏秀梅：《從量的觀察探討清季按察使的人事嬗遞現象》（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reers of provincial judicial commissioner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CYCT，3.2（1972）475—495

[331]Wei Hsiu-mei

魏秀梅：《從量的觀察探討清季督撫的人事嬗遞》（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reers of provincial governors-general and governor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CYCT，4.1（May 1973）259—292

[332]Wei-li-che

祎里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地球說略》（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globe，or‘Illustrated Geography’）.rev.edn.寧波，1856

[333]Wei Yüan

魏源：《圣武記》（Chronicle of imperial military campaigns）.Ku-wei-t’ang edn，1842；臺北：Wen-hai，1967

[334]Wei Yüan

魏源：Seibu ki《圣武記》，興亞院政務部譯.東京：Seikatsusha，1943

[335]Wei Yüan

魏源：《海國圖志》（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maritime kingdoms）.50 chüan.1844；60 chüan，1847；100 chüan，1852，1876，1898

[336]Wei Yüan

魏源：《古微堂內集》（Inner writings of the Ku-wei studio），1878 edn.臺北：Wen-hai ch’u-pan she，3 chüan，1964

[337]Wei Yüan

魏源：《古微堂外集》（The exoteric collection from the Ku-wei studio）.Huai-nan shu-chü，1878；臺北：Wen-hai，1964

[338]Wei Yün-kung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記》（Record of the Kiangnan Arsenal）.上海：Wen-pao，1905

[339]Weng T’ung-ho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Weng T’ung-ho’s diaries）.上海：Commercial Press，1925

[340]Wu Hsiang-hsiang

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True account of palace politics during the late Ch’ing）.臺北：Cheng-chung，1961

[341]Wu Hsü

吳煦：《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Se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from the archives of Wu Hsü）.生活.三聯，1958

[342]Wu Sheng-te and Ch’en Tseng-hui

吳盛德、陳增輝編：《教案史料編目》（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source materials dealing with local or international cases involving Christian missions）.北平：Yenching University，1941

[343]Wu Yün

吳云：《兩罍軒尺牘》（Letters from the Pavilion of Two Jars），1884 preface.臺北：Wen-hai，1968

[344]Yamaguchi Michiko

山口迪子：《清代的漕運和船商》（Tribute grain transport and merchant shipowner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東洋史研究》，17.2（Sept.1958）56—59

[345]Yano Jin’ichi

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Study of modern Mongolian history）.東京：Kōbundō shobō，1925

[346]Yano Jin’ichi

矢野仁一：《論白蓮教叛亂》（On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in羽田享編：《內藤博士還歷祝賀支那學論叢》（Collected essays in sinology in honour of the sixtieth birthday of Naitō Torajirō）.京都，1926

[347]Yao Ying

姚瑩溟：《東溟文后集》（Supplementary writings of Yao Ying），14 chü an，1867

[348]Yao Yung—p’u

姚永樸：《舊聞隨筆》（Random notes on old tales）.北京1919；reprint天津，1925

[349]Yazawa Toshihiko

矢澤利彥：《長江流域教案的考察》（The attitude of Chinese officials towards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1891）.《近代中國研究》，1（1958）107—136

[350]Yazawa Toshihiko

矢澤利彥：《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對天主教的鎮壓》（The suppression of Catholicism in 1784—5）.琦玉大學紀要（Builetin of Saitama University），vol.7（1959）supplement 47—98

[351]Yazawa Toshihiko

矢澤利彥：《長江流域教案的研究》（The anti-foreign riots of 1891）.《近代中國研究》4（1960）109—158

[352]Yeh Chung-chin

鐘進葉：《英吉利國夷情記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English barbarians），in《小方壺齋》，王錫祺編.2nd supplement，pt.11 1897.上海：Chu-i-t’ang，1897

[353]Yen-ching hsüeh-pao

《燕京學報》（‘The Yenching Journal’）.北平：Yenching University，semiannually，1927—

[354]Yen Chung-p’ing

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Selected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北京：K’o-hsüeh ch’u-pan she，1955

[355]Yen Fu

嚴復：《嚴幾道詩文鈔》（A collection of the poems and essays of Yen Fu），6 chü an.上海：Kuo-hua，1922

[356]Yin Chao-yung

殷兆鏞：《殷譜經侍郎自敘年譜》（Chronological autobiography of Vice-President Yin P’u-ching）.np.nd.臺北：Wen-hai reproduction，1968

[357]Yin Keng-yün

尹耕云等：《豫軍紀略》（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onan Army），1872 preface（1874—）.臺北：Wen-hai，1968

[358]Yokoyama Suguru

橫山英：《太平天國前的抗糧運動》（A type of agrarian outrage before the Taiping Rebellion）.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7（1955）311—349

[359]Yü Cheng-hsieh

俞正燮：《癸巳類稿》（Classified notes and essays of Yü Cheng-hsieh），1833 edn，in《安徽叢書》，vol.7，1934.上海：Commercial Press，1957

[360]Yü Yüeh

俞樾等：《同治上海縣志》（Shanghai county gazetteer of the T’ung-chih period），1871

[361]Yüan Chia-san

袁甲三：《端敏公集》（Collected papers of Yüan Chia-san）.臺北：Wen-hai，1966

[362]Yüan Pao-heng

袁保恒：《文誠公集：奏議》（Collected papers of Yüan Pao-heng：memorials），1911.臺北：Wen-hai，1966

[363]Yüan T’ung-li and Watanabe Hiroshi

袁同禮、渡邊宏編：《新疆研究文獻目錄1886—1962》；日文本：Classified bibliography of Japanese books and articles concerning Sinkiang 1886—1962.（《新疆研究叢刊》，2.）東京：Yüan T’ung-li，1962

[364]Yung Chao-tsu

容肇祖：《學海堂考》（A history of the Hsüeh-hai Academy）.《嶺南學報》，3.4（June 1934）1—147

## 中國和日本出版社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臺北）

Bukkyō koronsha佛教公論社（東京）

Cheng-chung正中書局（臺北）

Ch’eng-wen成文（臺北）

Chia-hsin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臺北）

Chien’s Meng-chin studio簡氏猛進書屋（香港）

Chu-i-t’ang著易堂（上海）

Chung-hua中華書局（各大城市）

Chung-kuo中國（上海、臺北）

Chung-kuo hsüeh-shu chu-tso chiang-chu wei-yüan hui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臺北）

Commercial Press商務（各大城市）

Hitotsubashi一橋（東京）

Hsin-hsing新興（臺北）

Hsüeh-hai學海（臺北）

Hsüeh-sheng學生（臺北）

Hua-lien華聯（臺北）

Hua-wen華文（臺北）

J en-min人民（各大城市）

K’ai-ming開明（北京）

Kōbundō shobō弘文堂書房（京都）

Kondō近藤（東京）

Ku-chi古籍（北京）

K uang-wen廣文書局（臺北）

Kuo-chia tang-an chü國家檔案局（北京）

Kuo-fang yen-chiu yüan國防研究院（臺北）

Kuo-hua國華（上海）

Lien-ch’ün聯群出版社（上海）

Mantetsu kōhoka滿鐵弘報課（沈陽）

Nauka shaナウカ社（東京）

San-lien三聯（北京、上海）

Shang-tsa上雜出版社（上海）

Shao-yeh shan-fang掃葉山房（上海）

Shen-chou kuo-kuang she神州國光社（北京、上海）

Shih-chieh世界（上海、臺北）

Ta-t’ung大通（臺北）

T’ai-lien kuo-feng臺聯國風出版社（臺北）

Te-chih德志出版社（臺北）

Tsui-liu-t’ang醉六堂（上海）

Tu-men都門（北京）

T’u-shu chi-ch’eng圖書集成（上海）

Wen-hai文海（臺北）

Wen-pao文寶（上海）

Ya-tung亞東（香港）